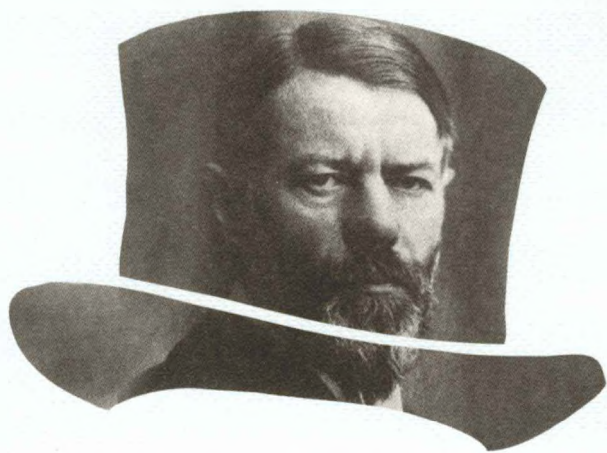




明德大学  
学术即人生



#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 (Marianne Weber) | 著  
简 明 | 译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2299号

这是第一部从德文原文译出的中译《马克思·韦伯传》。

马克思·韦伯是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的《马克思·韦伯传》是这位伟大的德国学者的权威传记。作为韦伯的妻子，作者以她独特的视角生动感人地记叙了韦伯天才横溢而又饱受疾病折磨的一生；作为学者和韦伯的学生，她忠实而简明地阐述了韦伯深刻和富有开创性的学术思想。

作者通过韦伯的生活、学术和政治活动以及广泛的游历给读者描绘了一幅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和欧洲生活壮观的全景图。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信件和其他原始资料，叙述和描写细腻、生动、充满深情而富有文采。该传记自1926年问世以来一直是了解韦伯其人以及研究韦伯的学说和思想不可或缺的必读书。



ISBN 978-7-300-18461-6



9 787300 184616 >

定价：89.00元



大师传记馆  
学术即人生

#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 (Marianne Weber) | 著  
简 明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著; 简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300-18461-6

I. ①马… II. ①韦… ②简… III. ①韦伯, M. (1864—1920) —传记 IV. ①K8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0217 号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 著

简明 译

Makesi Weibo Zh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6.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13 000

定 价 8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那个人，总在下一刻重现：  
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对自身价值  
再次作出评估。  
他举起时代的整个重负，  
将它掷入自己心灵的深谷。  
  
前人有过痛苦和欢乐；  
而他只感到生命的沉重，  
他将万有化作了一物——  
唯有上帝超越了他的意志：  
他满怀深仇地热爱着上帝，  
因为上帝无法企及。

——R. M. 里尔克

## 卷首语

承蒙马克斯·韦伯的朋友和同事为这部传记提供了韦伯写给他们的信件。只有将无数的信件内容融入叙述之中，才有可能让韦伯自己在书中现身说法，才能生动地展示他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 and 政治运动的反应和产生的影响。

本书作者感谢各位，尤其感谢那些在同韦伯争论中收到韦伯书信的朋友和同事，感谢他们提供了这类信件并授权作者将其摘录发表。

本书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她的朋友们，他们的至诚关切和提供的咨询给了作者无法估量的帮助和鼓励。

# 目 录

第 1 章 家 世	1
第 2 章 父母与少年时代	26
第 3 章 大学生活与服兵役时期	53
第 4 章 崭露头角	85
第 5 章 家中生活与个人发展	109
第 6 章 婚 姻	135
第 7 章 青年教师与政治家（1893 年秋—1897 年）	152
第 8 章 精神崩溃	179
第 9 章 新阶段	210
第 10 章 著述的新阶段	243
第 11 章 拓 展	270
第 12 章 历经世事与论辩诉讼	298
第 13 章 美好生活	343
第 14 章 旅行散记	367
第 15 章 母 亲	389
第 16 章 为国效力	398
第 17 章 革命前夜的政治家	424

第 18 章 间 奏	460
第 19 章 革命后的政治家	477
第 20 章 教师与思想家	509
第 21 章 生命的最后乐章	529
书中提到的韦伯著作索引	540
马克斯·韦伯年表	545
人名缩写和真实姓名密钥	549
人名索引·注释	552
译后记	573



# 第1章 家世

## 1

马克斯·韦伯的外祖父母本身都很不寻常，并且将自己身上一些显著的性格特征遗传给了外孙，因此马克斯·韦伯的传记理应从他外祖父母的生平概约开始。

法伦斯坦 (Fallenstein) 家族可追溯到 17 世纪中叶的图林根 (Thüringen)。<sup>①</sup> 韦伯的外祖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 (Georg Friedrich Fallenstein) 的父亲和祖父就已经堪称知识分子了。弗里德里希的祖父生于迈林根 (Meiningen) 附近的维策尔罗德 (Witzelrode)，曾任赫尔福德 (Herford) 的高级文科中学副校长；法伦斯坦的父亲曾任克累弗 (Kleve) 市师范学校的校长。关于韦伯的这位外曾祖父的生平我们略有知晓，他天分极高，精力极为旺盛，但使用精力毫无节制。他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妻子出身于一个胡格诺教派家庭，跟他一样富有激情，性情急躁，喜好冒险。

---

<sup>①</sup> 这个家族有一位跟美国人一样喜好家谱研究的德裔美籍亲戚，他根据自己的考订结果认为，这个黑森 (Hessen) 州的贵族之家原来的姓是瓦伦斯坦 (Wallenstein)，属于阿尔布雷希特·瓦伦斯坦 (Albrecht Wallenstein) 家族中新教一支。他发现，一个名叫威廉·冯·瓦伦斯坦 (Wilhelm von Wallenstein) 的中校在瑞典军中服役，并被古斯塔夫·阿道夫 (Gustav Adolph) 授予封地，几年后他又将封地卖掉了。这位家谱考订者猜测，这个军人 1631 年随同古斯塔夫·阿道夫开赴德国，在那里留下了子嗣，而后阵亡了。由于瑞典语中没有“W”这个字母，他的姓就以“V”开头，而在德语中“V”发“F”音，结果“V”就写成了“F”。“即便这不是真的，编织得也很巧妙。”(Se non e vero e ben trovato.) 格维努斯 (Gervinus) 收集到了关于这个家族的可靠资料，并将此记载在他的《回忆 G. F. 法伦斯坦》一文中，以上信息就出自此处。

2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是他们的长子，生于1790年。弗里德里希既是父母的宠儿，也是他们口角的肇因。儿时的他不得不逃避父母的争吵，这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还有更为不幸的事，他的父亲，一个颇有名气的语言学者，开始酗酒，一天突然与家人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信。

他到底是移居他乡了，还是在漂洋过海时溺水而死，一直不得而知。撇下妻子带着几个孩子在极度贫困中度日。长子弗里德里希像孤儿一样在一群陌生人中间长大，但他的秉性帮他脱离了种种危险，战胜了多舛的命运。迈林根的公爵助他上了大学，不过他一直学无所专。他修了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做诗的才华又驱使他转向语言文学，他翻译了古典作家的作品，用“弗劳恩罗布”（Frauenlob）的笔名写了具有浪漫派风格的诗歌，还写了一些故事和小品。

未及弱冠之年，他就知道母亲和几个弟妹住在柏林一栋背街的楼房里，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虽然他自己也一贫如洗，也什么都不是，却想要帮助他们。不过，他十九岁那年还是同一个十五岁的漂亮姑娘订了婚，这位姑娘也跟他一样一无所有。当她的爷爷因他们经济状况不堪而拒绝他们成婚时，这个绝望发狂的年轻人精神彻底崩溃了，这种病态持续了几个月。待他康复后，朋友给他找了一份私人秘书的工作。二十岁那年他终于办成了这桩婚事。这个妩媚、俊俏、温柔的女子成了他美丽的天使；他打心里爱自己的妻子，在他变化无穷的一生中对她始终忠诚如一。她为他生了六个孩子。他们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夫妻多年不得不两地分居。起初，弗里德里希时而做家庭教师，时而做县府秘书，同时还当作家和诗人。他的收入仅能养活自己，妻子和孩子则寄宿在朋友家里。不过，他的能力、责任感和伟大的抱负使他能够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战胜困难的确让他乐在其中。他有男子的充沛精力，精神上富有活力，有严格的道德操守和不留情面的坦率，同时又富于激情，性情急躁、易暴怒；但对于弱者，尤其是对女性和儿童，他却具有骑士风度和孩童般的柔软心肠，这对他的急躁暴烈的性情有制约作用。

3 同弗里森（Friesen）、鲁登（Luden）和雅恩（Jahn）的交往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对祖国的热爱经受住了每一次考验。1813年，他预料到普鲁士国王会号召国民起来抗击拿破仑，便毫不迟疑地参加了吕措（Lützow）的志愿狙击团。虽然自己囊中羞涩，他仍然自费给两名自愿参战的战友购置了装备。他坚信国家会照顾自己的家庭，便把余下的钱一部分给了妻子，另一部分给了自己所在的团队。可是，假如没有朋友帮助，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早已陷入绝境。实际上，他的一个孩子就死于营养不良。他把责任归咎于拿破仑，因而一生对拿破仑恨之入骨。军营和战地生活激发了他的文学创造力。他同特奥尔多·克尔纳<sup>①</sup>（Theodor Körner）结下了一段炽热的友谊。二人共同创作了战歌和歌颂自由的歌曲，在战友中间传唱。

<sup>①</sup> 原文中有很多字词以疏排法印刷以示强调，在译文中均以黑体字标出。下不一一说明。——译者注

那个时代给他脑子里装满了条顿民族的理想和自由的理念。他从那时起就开始收集关于古代德国语言文字的文献古籍，用古德语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仇恨一切跟罗曼语国家有关的人和事，他在社交场合中总是直言不讳，十分坦率，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乖僻执拗”。

从战场归来后，他感到十分痛苦，因为这场战争在政治上一无所获。此外，就他个人而言，他难以忍受的是普鲁士政府的忘恩负义，尽管国王有过许诺，但是普鲁士政府并没有为解甲归来的士兵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所以，当1815年战争再度爆发时，他第二次参军就随部队去了巴黎，在那里的宪兵部队谋得了一个报酬颇丰的职位。他平生第一次可以舒一口气，享受一下生活了。他习惯了贫困生活，现在有了钱便陶醉于大手大脚地赠送礼物。他的爱妻在家度日维艰，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不足，可他给她寄去了银制餐具、丝绸衣服、摩洛哥拖鞋，以及被他叫做“废旧便宜货”的东西，例如给他最年幼的儿子买的银质拨浪鼓。这表明他的性格充满矛盾。一位女性朋友曾这样描述过他：“毫无疑问，很多人了解的只是他自负和严厉的一面，但任何与他相知甚笃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沐浴在真挚和丰沛的爱里。他最为贫穷之日，也就是我看到他那颗美丽的心灵最为富有之时。”对于贫困者，他一生都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与此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生都俭省得出奇，就跟他生活困难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一样。例如，在他拥有一所漂亮住宅后，他仍然不让在家里烘烤点心，甚至连给客人做都不行。

1816年，他去杜塞尔多夫出任政务秘书，成了一名敬业敬职、兢兢业业、勤奋不怠和富有献身精神的模范雇员。他随时准备着用自己超常的精力去做远远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公益事业。因此，人们很快就把一副极为沉重的工作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身为秘书，他也只拿秘书的工资，做的却是政务委员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他的上司对他出类拔萃的才能、不竭的精力和他的多才多识赞不绝口。“他具有纯种赛马的好胜心和旺盛精力，像它们那样竭尽全力，崩溃而后已。”（格维努斯语）

尽管如此，他却遭到柏林部里的轻视和蓄意冷落。他没得到提升，薪水微薄，以至于随着家里人口增多，他不得不在日常工作之外从事写作。何以至此呢？原因之一是他的民主倾向和自由派观点。他看到了“时代精神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走进所有民族和文明，这种精神有如欢乐的上帝之子和快乐的自由之子，有如那个走在摩西前面的上帝”。因此，他醉心于公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同雅恩及他的同道一起竭力反对保守派。不过，他还有其他令当局不快的地方。他在一篇措辞激烈的檄文中批评了政府的举措，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抗议将一份国有地产赠送给一位法国贵族。为此，他甚至向德皇呼吁，反而因此遭到起诉。他虽然未被判罪，但仍然受到贬谪的威胁，只是因为他的上司一致抗议，他才得以免遭被贬黜的厄运。自此以后，柏林方面就一直对他心存芥蒂。工作上几次遭受故意冷落后，他感到愤然，准备移居他乡，以摆脱这种做“奴仆”的状态。等

到能够舒一口气时，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种“忙于苦差事的可悲生活”，因而感叹道：“如果上帝不能让我过另一种生活，但愿他能让我摆脱我现在的感受。”1832年，尽管他在政府已供职十四年，人们还是对他进行了考核，考核之后他才获得了一个相称的职位，担任了科布伦茨（Koblenz）行政专区顾问。

5 迁居科布伦茨之前，他经受了一场可怕的打击：他失去了无时无刻不让他充满幸福感的爱妻。妻子给他留下一大堆未成年的孩子。这个激越狂躁但又情感丰富的人如临深渊。他的孩子（其中几个被他送走了）将可能受到这个变得阴郁的父亲比以前更为严厉的管束。其实他们本来就很难躲过他的压制。这位吕措兵团的老兵是个严厉的道学家，无条件相信无所不能的意志力，相信“你能够，因为你应该”的定言令式。因此，他常常气得额头上青筋暴突。尤其是对儿子们，他是一个严厉的、要求很高的父亲。小姑娘们则像所有的弱者一样，通常觉得他温和宽厚。不过，即便是对她们，他也时常用今天看来野蛮的教育方式来达到磨炼她们的目的。例如，为了给孩子治头疼，他会一大清早就亲手把孩子的脑袋摁在水泵前冲凉水；冬天，小姑娘们在外面走动时，他不让她们穿暖和的内衣；夏天，在火炉一般的烈日下，他也不让孩子们戴帽子。饭桌上，他的管教格外严厉。他给孩子们盛上大盘他们不大喜欢的食物，要是他们不吃得干干净净，那可够他们受的！对撒谎的惩罚是相当重的体罚，即使是年幼的女儿也不例外。不过，女儿对父亲还是爱戴多于惧怕。

相反，儿子们一旦有可能就会摆脱父亲的管束：其中三个儿子去了海外，另一个也悄然逃离家中。父亲此后再也没见到过他们。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给其中一个要在教堂受坚信礼的儿子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何等坚信自己对孩子们在道德伦理方面的严格要求能够影响他们的成长，他以何等的勇气和严厉态度来批评他们的不足。在这位父亲看来，青少年只能在两条路中选择一条：要么“勇往直前”，要么沉沦。

亲爱的奥托：

6 你附在姑母信中的几行字给我带来了虽出乎意料却令人欣慰的消息，即你将受坚信礼。现在想必已经受过了。孩子，但愿上帝让你真正理解你生命中这一篇章的重要意义，让你为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而做的打算和下定的决心，以及你在圣坛前做出的保证和许诺能够持久并得以兑现。你一生一世都要谨记上帝，谨记一个正直的德国人的荣誉。对自己的良心、对基督要保持真诚和忠实，要有信念，这样你立身处世就会有信心和安全感。尽管你表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陋习，但让你父亲感到欣慰的是，你是一个忠实、真诚、勤奋和心地善良的人。保留这些品质，逐渐改掉陋习，尤其是不讲礼貌、脾气暴躁、自以为是等坏习惯。孩子，你要在达到自己生活目标的努力中更加勤奋。尤其要记住，一个人若非出类拔萃或做出优异的成

绩，他就会微不足道或一文不值，就会一事无成。凡事都要向最好的、最高的、最优秀的看齐，不管做什么事情，平庸都不足取，都有愧于荣誉和生命。你尤其要保持真诚和道德上的纯洁，这样，你就可以无愧于我们，就可以依赖于上帝，就能做到不想、不做也不会容忍任何不光彩的事物。言谈须谨慎，但行事得坦荡敞亮。你耻于被人看见的东西，在上帝那里也一定是罪恶的东西。谨守你的信仰，要乐于助人，尤其应当怀有感激之心。忘掉你自己，但绝对不能忘记对你和你家人友好的以及帮助过你们的人。保持你的清纯无邪，不要对别人心存不敬。不要行不义之事，但也不可忍受别人有意对你行不义。要永远记住三件事：敬畏上帝、尊重女性和爱你的邻人。要记住的第四点就是，我宁愿看到你做鬼，也不愿听到有人骂你是无赖和懦夫。除上帝之外，不要敬畏任何人；憎恶邪恶、谎言和不纯正的思想。为你母亲的缘故，也为了使你自己防患于未然，你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尊重女性。要爱你的邻人。要记住没有谁只是为自己而存在，每个人都为他人而存在，因此，最大的爱和忠诚莫过于为自己的弟兄献出生命。要全心全意地恪尽职守，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与忠诚、真实和勇敢带来的荣誉相比，任何世俗所获都微不足道。我亲爱的儿子奥托，愿这些话成为你生活道路上的伴侣，愿这些话能使你想起你的父亲、死去的母亲和你的继母。只要你无愧于他们，他们都会爱你，想念你。你知道别人给我造成了多少苦恼，你可别对我做出类似的事情来。你的姓是法伦斯坦，我给了你一个为人所敬重的姓氏，不要玷污这个姓氏；相反，要让人们因为你而尊敬这个姓氏——上帝保佑——永远不要因为你而使这个姓氏受到诅咒和责骂。你应当为此而尽心和生活——甚或献出你的生命！……

现在让我对你的未来和命运讲几句。我并非不知道你对学习兴味索然，也不能专心致志。你对学习的漠然和怠惰无论怎么看都没有道理，在我看来尤其不应该。你最近一次成绩报告单上的成绩又不佳，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你理应给我带回好一点的学习成绩。你的成绩之糟糕让我始料不及，而它发生在我们上次谈话之后，尤其出乎我的预料。我不希望强迫你违心地去去做你不乐意做的事情，但我得要求你现在做出决定——而且以你的名誉担保，决定你这一生想要严肃地、敬业地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你从小就希望去航海，就我所知，至今这仍然是最令你心醉的梦想。那么好吧，如果你是认真的，如果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这仍然是你果断的决定和坚定不移的心愿，那么，通过你住在此地的舅舅的职位之便，我将有机会为你在利物浦的一艘船上物色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工作。仔细斟酌一下你想要做什么，特别要记住你现在迈出的是决定性的一步，不能走回头路。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一个诚实的人唯一的座右铭就是：“勇往直前！”如果你下定了决心，就要马上启程去热那亚（Genua）上船。船名是拉布

(Rabb?)，你要在船上生活五年，或者与船共沉浮。关于这事我随后会再给你写信。我也希望在这之前能见到你，以父亲的吻和握手祝福你得到上帝的怜悯，并祝你好运。但暂时别把这事告诉任何人。首先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待我来的时候，敞开心扉，给我谈谈你心灵最深处的想法。再见吧，孩子！你妈妈还要添加几句话。再见，不管你做什么，别忘了深爱着你的父亲。

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

1835年6月9日

8 对在家和已经离家的所有孩子来说，幸运的是，他们那豪气和脾气火爆的父亲在鳏居四年后遇上了一位温柔的姑娘。仿佛他逝去的妻子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他对她一见钟情。这位姑娘就是埃米莉·苏谢<sup>①</sup> (Emilie Souchay)，系法兰克福 (Frankfurt) 一个高贵而富有的城市贵族家庭之女。她的父亲卡尔·科内利乌斯·苏谢 (Karl Cornelius Souchay) 是一家分布于法兰克福、曼彻斯特和伦敦的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出身于一个胡格诺派家庭，也就是苏谢·德·拉·迪布瓦西埃 (Souchay de la Duboisnière) 家族。这个家族在奥尔良 (Orleans) 附近曾拥有一座庄园，在举家逃往德国时放弃了贵族称号。其中一部分人流亡到哈瑙 (Hanau) 做了金首饰商人，另一部分人去了法兰克福。K. C. 苏谢的爷爷在哈瑙经营金首饰，而他父亲是法兰克福的法国归正教会牧师。

K. C. 苏谢 (马克斯·韦伯的外曾祖父) 是个乐观、和蔼和有艺术修养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婚姻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对此他毫不吝啬，因为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财富的经管人，并把这种观念灌输给了自己的孩子。他住在法兰克福城门边的一栋装饰优雅的漂亮住宅里。住宅宽敞、向阳，俯瞰着美因河，远眺河对面向上伸展的萨克森豪斯 (Sachsenhausen) 小山。这个善良、开心的人喜欢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也乐意让别人开开心心地生活。他谈到自己时笑称：“我总是生活得像个富翁，上帝的保佑让我得以如此生活。我身边的吝啬鬼一直都认为我富有，即便在我并不富有时也这样认为。”

为了让这种富裕生活更加幸福，他娶了一位纯德国血统的、出生在殷实之家的姑娘为妻。她就是家住斯吕西特尔恩 (Schlüchtern) 的舒恩克少校之女海伦妮·舒恩克 (Helene Schunck)。海伦妮为他生了七个孩子。她在自己身边营造了一种和谐的气氛。她楚楚动人，画家斯蒂勒 (Stieler) 称她是德国最美丽的女人，主动为她画了一幅画像，捕捉到了她的妩媚，他们家至今还保存着这幅画像。据此可以推断，马克斯·韦伯的母

---

<sup>①</sup> 为区分母亲埃米莉·苏谢 (嫁给法伦斯坦后改为埃米莉·法伦斯坦) 和女儿埃米莉·法伦斯坦，我们在母亲“埃米莉”下面加下划线。——译者注

亲那种典雅和高贵的美（她将此遗传给了好几个子女）遗传的也许是德国而不是法国血统。

不过，韦伯的外祖母埃米莉·苏谢却全然没有获得这样的遗传。她身材非常矮小，长得很不引人注目。她睿智、深刻，但极为纤细羸弱，而且腴腆、不谙世故。她力量的源泉来自深沉的宗教情怀、天使般的善良和为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业献身的精神。在她为自己家人写的回忆录里，有下面一段话讲她自己：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大的（应当说是我唯一的）痛苦是我的体质造成的。我从不记得自己生过什么病，但一种难以言表的胆怯却深入骨髓，常常让我的情绪很受压抑。……在一些焦虑的日子里，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成了我最迫切需要的祈祷。一天，我翻开《圣经》，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哥林多后书》，12：9）。对这几个字的深刻内涵我思考了很多，从中发现了对《圣经》里那个按才智受责任的比喻（《路加福音》，19：11-27）的最美妙的阐释。

一种先天不足的感觉总是威胁着她孱弱的生命，上了年纪之后，她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自己的这种成长经历：

我们都喜欢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却不懂得自己的秉性已经为我们设立了目标，无视这个目标是要受到惩罚的。勇敢地面对自己资质的局限，防止非分的企盼，但要全心全意地完成我们被赋予的使命，谦卑地求助于上帝——在我看来，我们如果做到这些，就会得到上帝的恩惠。

法伦斯坦遇到埃米莉·苏谢时，她已年届三十，但还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各种迹象表明，按其天性，她注定要过修女那种清静而又倾心的沉思默祷的生活，而远非同一个精力旺盛、追求不息的男人一起生活。她所了解的婚姻，仅仅是男女之间心灵的结合和真挚的友谊。但是，法伦斯坦的紧追不舍让她陷入了内心的巨大矛盾，她要求法伦斯坦给她时间考虑。她之所以不顾自己的忧虑，最后还是答应了法伦斯坦，是因为她的善良战胜了对生活的焦虑。她感到是上帝在亲自呼唤她去做法伦斯坦的妻子，做他失去母爱的孩子们的母亲。“把这副担子压在我肩上让他感到为难，所以起初他难以启齿。但我强烈地意识到，是上帝把这个伟大而美好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坚信上帝会帮助我完成这项使命。”

法伦斯坦和埃米莉·苏谢的信件交往既表现了那个时代（1835年）的风格，也反映了写信人的个性。

我，尊敬的小姐您或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人，怀着一颗被深深打动而又感到难为情的心，摒弃传统的顾虑，在内心冲动的驱使下，冒昧地走出了这一步。可我苦于自己拙于言辞，不知如何向您表达自见到您以来我脑子里形成的弥足珍贵的感受。但愿您的和善——它们从您蓝色的眼睛和整个外表之中散发出来——能让我不再去搜肠刮肚而是直抒胸臆。

这是发自内心的爱情表白，是一个男人带着惴惴不安的窘迫之情大胆表达的爱情。这个男人在生活中久经历练，他曾镇定自若地面对过危险，可是现在面对着您却不知所措。

二十五年前，我情窦初开，怀着热烈的情感遇到了那个忠实、温柔的女子。我是她的初恋情人，二十一年中，她与我患难与共。她曾是我唯一的至爱，从十五岁起，她就安然、充满信赖地在我的怀抱里度过了她沧桑的一生。那天晚上我在您兄弟家看到您的刹那，这个我四年前已经安葬的女人，我那六个孩子所爱戴的母亲，又骤然在我眼前复活了，她的整个个性特征、整个存在以及整个内在和外在生活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个印象触及了我心灵的最深处，惊奇中又有些许痛楚伴随。接下来就是我现在迈出的这一步。小姐，我感到我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一步的结果如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您的出现如此神奇地将我整个的过去和上帝为我安排的将来联系在一起了，让我能在上帝面前，真挚地亲手将我青春的爱和我终身的爱都奉献给您，我温柔、恬静、可爱的埃米莉，这种爱因我一生的阅历和我的所失而显现出纯洁和美丽。迈出这一步之前，我是认认真真地静心思考过的。尊敬的小姐，如果您能够像上帝一样窥透我的心，如果我能像此时在造物主面前一样，用言词向您敞开心扉，那么，您就会相信这个诚实的男人下面这一番朴素和审慎的话语：这个男人向您保证，他对您表达的是心灵深处的感受，也就是说，这不是因一时的激情冲动而产生的爱，而是在最诚挚、最坚定不移的敬慕基础上产生的爱情，这种爱情将痛失所爱而感到的深切悲哀化作了因重新获得所爱而感到的由衷的喜悦。

11

尊敬的小姐，我明白我下面的要求意味着什么。我不仅恳请您做孩子们的继母，而且恳请您做他们重新得到的母亲，我要您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而我唯一能回报您的只是一颗诚实、忠诚的心，不过，同时我也把我的一生都诚挚地奉献给您。可爱的埃米莉，您就像我那幸福的贝蒂（Betty）一样让人珍爱。我只能吐露出简单、虔诚的话语，因为我的心虽然激动不已，但又肃穆庄严。现在正好是我同逝去的贝蒂订婚的第二十五个年头，正好是她离开我的怀抱长眠于墓地的第四个年头。在缅怀亡者的这样一个时刻，人的心灵是不会撒谎的。

您在我们的事情上做个决断吧。不管您怎样决定，我对您充满敬意的爱都将是我的财富，即使您拒绝我，这种爱也将伴随我的一生。



埃米莉·苏谢的回信写道：

我不知道今天我能否以自己应该和希望的方式回复一封深深触动我心灵最深处的来信。但我将尽力对那个以令我始料未及的丰富爱情向我敞开心扉的高贵的男人说出我的感受，尽管我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这些感受。我郑重地下定决心，对您要坦诚以待，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于您于我都会有益；但尽管我竭尽所能，也只有那个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上帝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别人看来，迄今为止我的生活一直是非常幸福的。假如我不能愉快地承认自己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那我可就是忘恩负义了。我也没向往过——特别是最近这些年——要离开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性格不宜于给别人带来幸福，至少如果新的环境对我有很多要求的话，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越是了解我的人，也就越能比我自己更清楚地向您证实这一实际情况。

我母亲答应我要把我的一切过失和弱点都告诉您。您要相信她的话，而且您大可放心，我比任何人都更知道她的话是真确的。起初我止不住想，我在您心中唤起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形象，那您定是把我看错了。我姐姐向我透露了您的这一印象后，您可以想象，当我后来再见到您的时候，我是多么激动！只因我下了决心不要肆意毁掉您所珍惜的记忆，我才稍稍镇静下来，或者毋宁说我的情感得到了升华，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12

当您离开时，一种可能得到的幸福憧憬攫住了我的心，但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胜任这样一个角色。打那以后，这种感觉在不少难熬的时候让我感到压抑；在另一些时候，我的心情又变得轻松起来，能够将我和您的未来交到永恒的上帝手里。我心乱如麻，但有一点却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我必须倾听纯粹发自内心的声音，对您就像对我自己一样坦诚以待。您可以相信我，一旦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意旨，我就会离开这个我喜爱的环境，我内心虽然会有矛盾，但会带着欢乐和勇气去完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使命。不过，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命运会刚好落到我的头上。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从初始的激动重新回到完全的理智，您也考虑一下我将做出的决定对您的幸福会有多大的影响。不管怎样，对那些美好日子的回忆都将伴随我的一生，给我带来幸福。愿上帝保佑，不管我如何决定都给您带来祝福。

※ ※ ※

对法伦斯坦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可借助于新妻温柔的扶助将自己生活的航

13 船驶入一片比较平静的水域。他在生活中很早就殚精竭虑，现在精力已经开始衰退，抑郁也常常向他袭来。现在终于摆脱了钱财的忧虑，的确让他如释重负。苏谢家族也像他自己一样慷慨大方，他们也有财力这样做。所以，现在法伦斯坦也能够满足自己乐善好施的愿望了。不过，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他都还有不少痛苦的事。他的儿子们走后杳无音信，后来他也没有再见到过他们，这也许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他的工作负担过重，要求分配一个助手，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提出了辞呈，辞呈被接受了，但他受到了有伤自尊心的责难。然后（1842年）他被调到位于柏林的财政部，当了一个负责财务报告的官员。但他发现自己不能适应那里迥异的工作环境和工  
14 作。这个在过去多年中有着非凡业绩的人，现在坦白地承认自己因不能愉快地胜任新工作而痛苦。所幸的是，几年后他离开了这个职位。

他把家搬到了海德堡（Heidelberg）。1847年，他在内卡（Neckar）河畔修建了一幢朴实却不失典雅的宽敞住宅，与城堡隔河相望。他亲自规划了一个建在山坡上的大花园，花园向上一直延伸至哲人小道（Philosophenweg），园里泉水潺潺，与内卡河的水流相映成趣。他的住宅和花园构成了一座美丽之岛，成了他的儿孙们喜爱的家园，也让无数人感到赏心悦目。除此之外，他仍然保留了自己生活方式中斯多葛式的简朴和自然。他要求自己的家人也具有这些品质：早起，用凉水洗漱，经受各种形式的磨炼，最大限度地使用意志力和自制力。女儿海伦妮（Helene）在自己的生活中和养育子女时传承了所有这些准则，尽管她的体质弱不经风，在孩提时代深为这些准则所苦。

法伦斯坦仍然不知疲倦地参加各种活动。在公共生活中，他特别有兴趣的是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和睦以及在莱茵兰（Rheinland）保留《拿破仑法典》。对拿破仑的仇恨并没有妨碍他在拿破仑和当时普鲁士的体制之间选择前者。特别是，他确信强行废除拿破仑体制会使莱茵兰疏离普鲁士。除政治方面的兴趣之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例如，他在苏谢家人的帮助下，通过提供贷款和出借家畜，为奥登瓦尔德（Odenwald）地区遭受饥饿之苦的村庄之一舍瑙（Schönau）的农民组织了系统的救助。他重新开始写作，收集德国谚语，是《格林词典》勤奋的撰稿人。在海德堡，他加入了以施洛塞尔（Schlosser）和霍伊塞尔（Häusser）为中心的“历史俱乐部”，同历史学家格维努斯（Georg Gervinus）成了朋友，后者搬到了他家里住。本着一名政府官员真正的忠诚，法伦斯坦坚定地同他的祖国普鲁士站在一起。但大约在1848年，他完全放弃了对君主的顶礼膜拜，开始热爱德国更甚于普鲁士。在南方暖风的吹拂下，他又回到了有自由主义理想的年轻时代。

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法伦斯坦在生活中一旦有了目标，就似乎仍然拥有巨人的力量。他六十三岁那年去世，死得“年轻”一直是他自己的愿望，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年老体衰才撒手人寰。在他的幼女们（第二次婚姻所生）“梦境一般的美好记忆中”，他仍

然是以前的那个父亲，“我们感觉仍然握着他那双温暖的手，他那颗慈爱的心仍然时刻准备着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带给孩子们欢乐”。

在那些认识他的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精力非常旺健、充满道德力量的人，一个在生活这所学校里被磨砺得意志坚强的人，一个激情饱满、容易激动的人，一个有强烈的爱憎感情，同时对弱者具有慈善心肠又彬彬有礼的人。他缺乏中庸适度，常常令人感到不自在，在日常生活中令人厌烦，但他在工作中的奉献精神 and 忘我精神甚至使他战胜了自己的急躁情绪。格维努斯对他的评价是：“因为他精力充沛，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容易近于过度——不管是一时的情感，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永久性原则，均不例外。”这些话也适用于法伦斯坦的外孙马克斯·韦伯。法伦斯坦的亲友们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了这样的铭文：“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8：14）

※ ※ ※

纤弱的埃米莉·苏谢在法伦斯坦身边生活得又如何呢？根据她在丈夫去世很久以后写给朋友的一封信来看，她并没有获得心灵的完全和谐一致以及精神上的结合所带来的深刻意义上的那种幸福。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拥有刚强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相信，他能够迫使自己和别人做任何事情，同时也显然使他从未怀疑过，他自己对于什么是应该做的有正确的认识，这使他无法了解妻子长期的内心挣扎。埃米莉总有一种觉得自己不行的自卑感，同时也虔诚地接受天性赋予她自己和别人的种种局限，这使她丈夫感到不耐烦，心想：她这么优秀，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呢？尽管他自己也坚守着前辈传下来的信仰，但妻子的宗教情怀的深度却是他所无法企及的。法伦斯坦是一个严厉的道学家，想要并能够做到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同时确信别人也应当如此而行，而埃米莉是一个顺从的人，缺乏勇气和信心，但坚信上帝，结果他们二人难以沟通。

15

因此，在丈夫去世很久以后，埃米莉这样总结了她的婚姻生活：

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挣扎算是过去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这种挣扎表现在完全没有可能让我已故的丈夫理解那个实实在在的我。他过高地估计了我，因而认为我在生活中达不到我心中的理想是因为我不肯努力去做，而其实这应归咎于我的个人能力先天不足。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我对此感到的痛苦被他看作是我的弱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他不能理解这一点，全然不能想象一个人尽管对自己的不足感到悲哀，却仍然能够不放弃希望，不能想象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天生的能力有限，却仍然能够使用有限的努力去努力完成上帝吩咐我们做的事情，确信上帝会引领我们达到目的——因为据说弱者最能感受到上帝力量，对我来讲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无数次从这句话中得到了鼓励。简而言之，他不能理解在我看来似乎正是基

宗教的基本原则的东西，这的确让我难以接受，而这恰恰发生在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痛苦的时候。他拒斥我的方式令我不快，使我不能同他推心置腹。若非如此，我一定会在各方面相互适应得更好。我只能间或窥探到他心灵里珍藏的东西，他这个人，尤其是他的宗教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对我而言仍然是个谜。不过，我确实一直觉得他比格维努斯要热忱得多，因而也更有远见。例如，他对我去教会没有任何异议，而后也愿意听我给他讲述布道的内容；他也没像格维努斯对待他妻子那样，给我泼冷水。但同我交流对这些内容的看法对他而言并不重要，而纯粹的基督教信仰恰恰是我生命的精髓，探索它的奥秘是我一生的渴望。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我只是想在自己心里弄清楚，这些年里到底是什么让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这种不愉快的程度其实比我现在所理解的还要严重），却又不能将其归咎于我自己或法伦斯坦。我以前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要使婚姻幸福，一个女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得同丈夫亲密无间。

夫妻之间的共同生活应建立在精神基础之上，埃米莉·苏谢将这一观念传给了她的女儿们，她们当中有的人也像她一样在这方面未能如愿以偿。不过，尽管有那些遗憾，她的生活还是幸运的，因为她喜爱的《圣经》经文里的预言兑现了。她生了七个孩子，其中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肩负着生活的重担，这个胆怯、腼腆的女人在道德方面成了一个巨人。她圣徒般的善良、温厚和无私使她能够应对生活中需要面对的一切。她的继子们把她视为慈爱、善解人意的母亲，同时在他们品格虽然高尚但过于暴虐的父亲面前，又将她视为自己勇敢的保护者。他们对她的感激充满着敬意和挚爱。她不断地将丈夫身上的骑士精神、温柔和善良等潜质诱导出来。她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她自己女儿的眼里（她们比她更为生气勃勃），她是生活的楷模，这种生活充满着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深邃的内心感悟。她们每个人都感到，仅仅是母亲的存在本身就对自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即便在晚年，她仍然影响着后辈，对此，她的一个外孙女这样写道：

一想到我的外祖母法伦斯坦，我就想到《圣经》里关于那棵芥菜种子的话。这棵种子比什么都小，但后来长成了一棵大树，天上的飞鸟都寄宿在树上。恐怕没有人比这位出生于城市贵族的富家小姐更“小”了，我指的不仅仅是身材。她腼腆，外表没有一点光彩，缺乏自信，完全忘却了自我，也没有任何要确立自己的威望的心愿。但她的孙辈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希望她是另外一种样子。童稚不可欺，他们善于抓住根本的东西。外祖母是个和善的人，你不管什么时候去她那里，她都是这样，绝对不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同她在一起永远是件开心的事。无论是大人还是

小孩，是贫还是富，人人都承认这一点。我们平时都是些顽皮、淘气的孩子，但我从不记得我们曾在外祖母的蓝色房间里撒过野，这个房间就像是我们的天堂。我从来没见过她对谁不友好，没见过她生过气或者不耐烦。我甚至想象不出她会这样做。我相信她一定能让男孩子们也像我一样规规矩矩。面对她的亲切和蔼，你不能不乖乖的。我不是一个在品德上无可挑剔的人，但每当我推开她的房门，就置身于一种恬静而亲切的气氛中，这种气氛神秘地拥抱着我，给我注入了一种温馨而舒适的东西，深深地渗透到我的心里……我从未见过外祖母哭，但我常见到她安慰别人，也包括我母亲失去我的小小弟弟的时候。我感觉到她有一种能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的力量，尽管我还不能理解这种力量是什么。但她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拥有这种沉静的力量。外祖母对大自然的乐趣深厚无比，不过这种乐趣就像她整个人一样静谧。她虔诚地汲取一切美，例如她沉浸在一曲优美的音乐中时，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夜晚，她会沉醉于水中反射出的山坡上那点点灯火，或是沉醉于月光辉映下的河流和山峦景色。后来我在不少短诗里发现了这种纯美感的共鸣。她平静而快乐地观赏一切尘世的美，在她看来，尘世的美始终只是神性的显现。我儿时无形中不知不觉地从她那里到底汲取了些什么东西，直到死神把她从我们那里夺走之后很久，我才得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轮廓。我行坚信礼那天，她回忆录前言里的话语涌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话总结了我对她的性格的零星片断的认识：她的平静、令人信赖的谦卑，加上深沉的宗教情怀给她带来的不是听任命运摆布，而是最美丽的内心和谐。

在我们同埃米莉·苏谢告别之前，让我们读一读她的这段话。这段话在这个世界无边的苦难和上帝的爱之间架起了一座信仰的桥梁，一座通过斗争而不断重新获得的桥梁。

我们上次的谈话非常简短，但内涵却非常丰富！它涉及了弥漫于世界和人类心灵中的一切深深的痛苦。最后我要说的只有一件事：没有斗争，没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和平。为什么必须要有这样一场斗争，则是一个巨大的谜，谁也无法解开。不过，为什么那个博爱的造物主能用他的手造出这样一个世界——其整体构建注定要让生活于其中的造物遭受不可名状的痛苦——来，为什么恰恰是上帝亲自给人类吹入灵气而产生的求知精神酿成了人类最深沉的痛苦，这些对我们而言也都是一个难以洞悉的秘密……尽管如此，上帝就是永恒的爱，这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里：每当我们心灵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我们总是举目仰望他，把他视为救赎主；当黑夜过去，黎明到

来，曙光撒在田野上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上帝的赐福。我们常常在黑暗中徒劳地寻求安慰和力量，此时突然沐浴天光，感到伟大的圣父也在关爱着我们，感到下面这些美丽的词句是千真万确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5：6）

## 2

在这对夫妇——尽管他们在很多方面大异其趣，但都品德高尚——幸存的孩子中，这里我们只谈及海伦妮，即马克斯·韦伯的母亲。不过，法伦斯坦四姐妹<sup>①</sup>都有不同寻常的精神和心理素质。她们都遗传了丰富的情感生活，这使她们的生活既丰富又坎坷；她们都承继了勇气，这使她们能够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她们既靠宗教信仰的力量，也靠充沛的精力来主宰人生，靠道德的激情和无私的善良来驾驭日常生活。像生长在同一茎上的花朵一样，她们一生一世都非常亲近。

19 海伦妮·法伦斯坦（Helene Fallenstein）生于1844年，在内卡河畔的住宅里长成了一个颇具典雅风姿的迷人少女。她年幼丧父，儿时曾全无顾忌地跟父亲一起玩耍，对父亲的回忆带着感激和亲切。虽然她年轻时柔弱，常患头痛病，但她自幼就继承了父亲做人的准则，并且终生恪守。她意志坚强，积极主动，有勇敢的道德情操，容易激动，有火焰般的激情，这些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不过，她那羸弱的生活中显得无助的母亲同样给她的性格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海伦妮来说，把母亲超凡脱俗的善良、纯洁和忘我精神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并不难，因为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深沉的宗教情怀和彻底的忘我精神。

海伦妮的姐妹们记忆中有各种各样的逸事，这些逸事颇能反映这个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女孩子的勇气和本能地表现出来的善良。这里是她们回忆的两件事：一个夏日的中午，海伦妮的妈妈在午休，一只老鼠误入了起居室。当时园丁不在，为了不打扰母亲睡觉，海伦妮用手抓住了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动物，灵巧地揪住老鼠的脖子，在外面的井里将它淹死了。还有一次，一个沿街叫卖苹果的妇人来到她家的住宅，就在她们讨价还价

---

<sup>①</sup> 伊达（Ida）是法伦斯坦再婚所生的长女，嫁给了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的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藤（Hermann Baumgarten），这对夫妇的其中一个儿子就是著名的神学家奥托·鲍姆加藤（Otto Baumgarten）。亨里埃特（Henriette）嫁给了海德堡的教会史学家和诗人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埃米莉（Emilie）嫁给了斯特拉斯堡的地质学教授贝内克（E. W. Benecke）。唯一的儿子爱德华·法伦斯坦（Eduard Fallenstein）因在战场上劳累过度于1870年死在法国，过世时还是一名学生。

的时候，这个妇人猝然瘫倒在地。小姑娘们马上看出来，这不是无关紧要的昏厥。她们请来了大夫，他告诉她们说：“这个妇人要死了，必须马上叫一辆马车送她去医院。”小海伦妮眼睛盯着大夫，说道：“如果这个妇人要死了，就不能把她弄走，就让她死在我们家里！”后来妇人果然在她家里逝去。

海伦妮自己——她并未意识到自己心灵的美——有一次也提到过她和姐妹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细腻的情感：“它常给生活带来麻烦，但我喜欢它，并怀着谦卑的感激之情把它看作是上帝赐予的财富。”

生活处处都向这个含苞待放的可爱姑娘绽开笑容。她风姿绰约，美丽而又善良，有一种热烈而敏感的气质。大家都乐于跟她在一起，都喜欢她。但她敏感的良知不让自己因此而志得意满。相反，赞赏她的人越多，她越是扪心自问，看自己是否受之有愧。她在回顾自己成长经历时写道：

看到我周围知识界的情形，加上对母亲无私奉献有越来越多的理解，我一度陷入了自我折磨的痛苦思索，思考那无处不在连人类最高尚的行为中也不能幸免的自私自利的根源和表现。但我不想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这是出于一种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的顾虑，即担心我这样做的动机本身也是要显示自己的有趣和重要。不过，伊达想必在某个时候看出了我的想法，毕竟她自己也有耽于苦思冥想的性格。她的一席话给我指点迷津（在我一生中她屡次给我指点迷津）：“你知道吗，你一门心思留心着那个叫做‘利己主义’的魔鬼，想着它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以至于你错过了通过思考、行动和关心他人来战胜这个魔鬼的最好机会。当你知道自己做了善事、好事和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时，试着每天晚上都想想这一点，并且感谢上帝。”她的话很奏效。

20

后来，当她风华正茂，有幸见爱于众人，因而更增强了自我意识的时候，一个慈母般的朋友为她的心灵指出了方向。

当时我正变得习惯于把生活赐予我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相当肤浅地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加以接受……我们第一次在一个大型的舞会上跳舞时，我告诉格维努斯夫人有多少人邀请我跳舞，那些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对我有多好，而看到比我聪明得多、那么可爱的埃米莉（Emilie H）却被冷落在一旁多么让我生气。——“嗯，孩子，”她说，“就把这看作是敦促你虚心和谦卑的诤告吧。你这么充满生气，如此喜欢聊天，有一张令人喜爱的脸蛋，所以人们对你这么热情和气，相信你有各种各样的资质禀赋，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资质禀赋存在与否。愿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

能激励你去真正做一点事情，以表明你值得这种信任。”

在为自己孩子们写的回忆录里，上了年纪的海伦妮补充道：“即使在今天，当陌生人称赞我的时候，我都感到无地自容。”

弥漫在海伦妮家中的宗教气氛是自由的，完全不受教条束缚，正如当时已在南部流行的新教的自由气氛一样，同德国北部传统的“正教”形成对照。把基督教从必须信奉基督的神性中解放出来，从信奉基督的替人受罪和使徒信条中解放出来，这些似乎正是这个新教圈子里的人视为他们的救赎的东西，视为防止那个时代背叛自己的“特征”和  
21 阻止毁灭社团意识的唯一方式的东西。这种带有“自由倾向”的基督教想要克服“惟其荒诞，故而可信”（credo quia absurdum）的命题，以便调和信仰和理性的对立，在那个时代具有很强烈的斗争精神。

这个运动在海德堡的领导者之一是齐特尔（Karl Zittel）牧师。他温和、开朗、虔诚的性格，让人联想到的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上帝，而是一个博爱的慈父般的上帝。他也不去苦思冥想那些无法知道的东西来折磨自己。当被问及对不朽的看法时，他会爽快地回答：“孩子，我想让别人的回答带给我惊喜。”海伦妮在他的教会里行的坚信礼，此后一生都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因为除了母亲那静水深流的深沉之外，齐特尔纯洁的形象也使宗教的价值永远扎根在她的心中。

齐特尔非教条的教义曾使她得以摆脱理智的挣扎，但这种挣扎又被另一个人引发了。她父亲法轮斯坦的朋友格维努斯住在她家的楼上。父亲去世后，格维努斯便成了她的慈父般的朋友和导师，这是一个受到她们狂热崇拜的人。格维努斯的妻子在海伦妮姐妹眼里也属于高尚的人。这对夫妇膝下无嗣，跟海伦妮特别亲近。“伯母”负责女孩子们的音乐教育，“伯父”格维努斯则引导她们欣赏古典文化。格维努斯跟她们一起读荷马，这位诗人成了海伦妮永恒的财富。“我们学的关于荷马的那些课程又浮现在眼前。我还记得，多少年里我们的脑子里如何塞满了荷马的思想和观念，我们如何把雅典娜或者阿波罗看成是自己理想的化身。我再次清楚地感到，那些时光多么美好，格维努斯教给我们的确实是最精华的东西，因为即使在今天，只要读上一小段荷马，我仍然会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当垂暮之年的海伦妮第一次游览罗马时，她怀着感激的心情将自己对那些废墟的理解全归功于那些课程。

当然，她在青少年时期不得不为自己开阔的精神视野付出昂贵的代价。她思想深邃，不可能感觉不到基督教与古典人生观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震撼。她感到自己尊敬的导师喜爱现世的美，执着于尘世，认为这是在“诱惑”她背离自我。她孩提时代坚定的  
22 信仰崩溃了，经过艰难的挣扎之后，她才感到又重新得到了上帝的庇护。十七岁那年，她就此写道：



我记得自己以前经常同可爱的上帝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我无所不问，且得到了回答。我仍然能够清晰地听到他作答的心灵之声。当时，这给我带来了内心的安宁，这种安宁现在我已感觉不到了。当然，这种不假思索便全盘接受的儿时的信仰不能持久，也不应持久。实际上，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构建自己的宗教信仰。可是，伯父的那些课夺走了我的一切，他要用理性去解释一切，总教导我要用理性构建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用理性是找不到信仰的。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我正在失去的是什麼。我只是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尽管我同格维努斯的关系经常导致我的良知出现严重危机。

不过，同格维努斯给她孱弱的心灵带来的另一种危险和狂飙相比，对付众神在自己心中的争吵简直就算不得什么了。尤其是现在上帝的声音也暗然沉默，所以对危险和风暴的来临就更加感到难以应对。那年她年仅十六，还是一个含苞未放的清纯姑娘，她尊如慈父一般爱戴的导师，多年来一直信任的格维努斯，一天失去了自控。这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再也难以控制的欲火骤然吞噬了这个毫无戒心的女子。恐惧、厌恶、怜悯以及素来对慈父般的朋友和导师充满感激的敬重交织在一起，撕裂着她，把神经脆弱的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她一生都未能忘却这次打击。从那一刻起，她就觉得肉体的激情有一种罪恶感，是低于人性的东西。即使在她年老以后，想起那次的经历，她脸上也会呈现出恐惧的表情。这次事件尤其具有灾难性的是，海伦妮感到这个男人的激情对他妻子极为不公，而海伦妮对他的妻子既敬重又爱戴。可海伦妮现在得跟她保持距离，又不能让她知其就里。起初，这个秘密半点也未泄露，以致格维努斯太太不能理解这个女孩行为的变化，认为海伦妮忘恩负义，长时间对此耿耿于怀。而那个着了魔的男人自己仍感到他有权得到海伦妮的信任，甚至有权控制她的心灵和命运。他期待着海伦妮在短暂分离后又像以前一样无拘无束地与自己相处。他甚至要支配海伦妮的未来，在自己的学生中给她物色了一个丈夫。

不过，事情的发展未如他之所料。海伦妮去柏林探望刚同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藤结婚的姐姐伊达——伊达对她一直极为重要。海伦妮在那里结识了鲍姆加藤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同道，即法学博士马克斯·韦伯<sup>①</sup>。韦伯那年二十四岁，睿智，前程远大。他开朗，和蔼亲切，热爱生活，纯洁得简直像一块白璧，洋溢着热情，因而非常富有吸引力。二人一见倾心。海伦妮那时刚刚十六岁半。尽管大家觉得他们年纪轻，对此有所保留，但他们认识还没几周，就已经情定终身。海伦妮回到父母家时就已经秘密地定了

<sup>①</sup> 由于社会学家、政治家马克斯·韦伯继承了父亲的名字，所以父子二人有着相同的名字。为便于区分，本书中“马克斯·韦伯”、“马克斯”与“韦伯”加下划线时是指父亲马克斯·韦伯，不加时是指儿子马克斯·韦伯。——译者注

婚。这件事似乎是天意。这个年轻人韦伯意识到自己所获珍宝的价值，因而奉献给这个美丽、深情的姑娘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纯洁而有节制的爱，而姑娘也回报以日渐浓厚的温情。未婚夫不仅给她带来了让她这枝花儿得以嫣然盛开的阳光，而且使她摆脱了完全无法应对的极度痛苦的困境。他变成了她的“家”，保护她避开失控的激情酿成的狂飙，她仍然稚嫩的生命根须已经被这场风暴的摧残给松动了。她的爱中含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按她的本性，她会怀着谦卑和牺牲精神对所爱的人倾心以报。这个年轻的姑娘兴高采烈地写道：

啊，马克斯，我最亲爱的、绝无仅有的马克斯，你瞧，每当我像现在这样独自一人，思念着你的爱，想象你真实的样子和你着实可爱的性格的时候，我总有这样的感觉：“我无法理解，无法相信，是梦把我给迷住了。”[这里沙米索（Chamisso）如此美妙而真确的表达确实并非夸张。]然而我又感到，我们注定会相遇，因为只有通过与你牢固和亲密的结合，我才有完全的幸福可言。

24 她那个慈父般的朋友格维努斯对她订婚的反应方式再次给她带来极大的困扰。她婚后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发现他很有些不知所措。接着，他的绝望和愤怒猛烈地喷发，他指责海伦妮忘恩负义，不遵行自己为她制订的婚姻计划，因而欺骗了他。海伦妮感到几乎要崩溃了。

假如现在没有我的马克斯，没有母亲和你们这些兄弟姐妹，我相信自己会跳进内卡河，就此彻底结束我和伯父的关系。你无法想象这件事对我是多么难以忍受，尤其是因为他（按他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肯定会彻底地鄙视我，而且他确实这样做了。虽然你给我的信中谈了他对这件事的整个看法，但他对你不会像我那样使用苛刻的言辞。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匕首一样刺痛了我的心，我至今还能感到刺伤的创痛。但我又没法跟他动怒，毋宁说我对他给我和他自己造成的可怕的痛楚由衷地感到遗憾，因为他当时很动情，哭得跟孩子似的。唉，伊达，看到一个强壮的男人哭泣而又不能安慰他——因为他不想得到我的安慰，令我难受万分。当我离开他时，世界一下子看起来就像一座坟墓。如果后来我没有意识到仍然有那么多人如此爱我，没有意识到我要是同他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想到了马克斯，他充满着爱的宽广胸怀属于我。

处理这种局面韦伯足以胜任，也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同未婚妻一起度过这个重大危机。他的态度激发了海伦妮十足的信心。

从你那里尽可能了解到你和格维努斯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真诚地渴望能够在**所有事情**上都跟你患难与共。你不必担心有什么事情会让我苦恼，也不要觉得我也许会过分自责，把所有这些可悲的结果和痛苦的经历都归咎于自己。当然，如果这整个事件没有使我感到震撼，如果我对这种美好关系的破裂不为整个家庭，为你和我自己，特别是为格维努斯而由衷地感到遗憾，那我对人与人之间最亲近、最亲密的关系就可以说是缺乏任何理解了。格维努斯不仅是你敬重和爱戴的慈父般的朋友，而且是我孩提时代就颇为钦佩的人，我一直自豪地把他看作是我们国家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

海伦妮需要韦伯的保护才不至于受到持久的伤害。她仍然很年轻，也很纤弱，精神受到了剧烈的震撼。她赠给未婚夫的第一张照片上的自己，不是一个年方十六的幸福

25

的未婚妻，而是一个经过痛苦的历练而变得成熟的漂亮女人。韦伯对此写道：“你那张十分可爱的脸看着我的神情这么严肃，假如我不知道个中原因，我几乎要感到担忧了……”

与一个不能自制的男人近距离相处让海伦妮无法忍受，所以订婚后她就不得不离家好几个月。即使回家后，她也无法同格维努斯重新建立一种能够相容的关系。甚至在订婚一年后，她还告诉韦伯说，有一次在音乐会上偶然碰到格维努斯，当后者神秘地走到她身旁时，她仍然感到惊恐。

那时我多么渴望能紧紧握住你那双忠诚可爱的手，或者让你的手臂搂着我，渴望再次获得那种令人陶醉的幸福：在你一腔忠诚的怀抱里，紧贴着你那颗充满温暖和爱抚的心，让我在一切风暴面前感到安全，受到保护，让我感到这就是我的归宿。假如你在那里，我也会乐于向别人炫耀，你是我了不起的马克斯。我为你感到无比骄傲，也因你而感到沾沾自喜。

令人羡慕的爱情给海伦妮带来了改变自身的力量，她甚至把无忧无虑的未婚夫视为一个宗教的坚固堡垒，在那里她可以逃避自己内心的挣扎。她对待一切都很严肃，即便是爱情也无法取代她对上帝的永恒追求。

我内心并不总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风平浪静，在信仰、宗教和坚信上帝的问题上，我仍然可以从你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在这些方面还远远没有获得清晰的认识。在所有这些方面，同格维努斯的交往把我的心给搅乱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夺走了，要重新获得它们非常困难……当我徒劳地试图从这一团迷雾中找到出路的时候，当看起来无法逾越的障碍横亘在我的爱情，即我和你之间，从而使我濒于

绝望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了。我的支撑点在哪里呢？我的确相信上帝万能，相信主的安排，却又不能够放心地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不能够发自肺腑地说，“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可福音》，14：36）。即使是在我们订婚以后，我也还是未能重新信赖上帝。就在这时，你出现了，带着一颗纯洁和虔信的心出现了，虽然你也许并不知道我在这方面的心理状况，但是你说的一些话却把我领上了正路。你全然不知道，你因此而让我感到多么幸福。如果说我现在更接近于重新找到上帝了，这大半要归功于你，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如果就像最近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我发现自己忘记了怎样去探索、去叩问，我最棒的、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你就会帮助我，让我别失去勇气，对吧？我知道你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我继续努力。

# 3

这个年轻人的家庭背景又如何呢？他的家世虽不像海伦妮的那么非同寻常，但也同样弥足珍贵。他的父亲卡尔·奥古斯特·韦伯（Karl August Weber）是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的一个亚麻布经销商。这个家族好几代都属于商业城市贵族，宗族自豪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据说，他们的祖先因为信仰新教而被逐出萨尔茨堡（Salzburg），随后把亚麻布交易引进了新迁居的地方。海伦妮未婚夫的祖父达维德·克里斯蒂安·韦伯（David Christian Weber）是韦伯—莱尔—尼曼公司（Weber, Laer & Niemann）的共同创建人之一，这是让比勒费尔德的亚麻闻名遐迩的第一家大公司。作为这个公司的老板之一的卡尔·奥古斯特·韦伯娶了卢齐厄·维尔曼斯（Lucie Wilmanns）——一个出身望族的名医家的千金。起初，这对夫妇住在一栋具有帝政风格的典雅住宅里。在这栋至今尚存的住宅里，他们过着精神上很充实的生活。后来由于年老的董事们不再能顺应技术革新致使生意衰落，他们的生活也不得不稍微俭省一点。

他们的日常生活按照资产阶级名流的那些约定俗成的规范安排得很和谐，具有某一类小城市舒适生活的特征。这类小城市工业发展前景良好，国家精神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在这里只能激起些许波澜。年轻的未婚妻海伦妮和她的母亲第一次去马克思家拜访时，比勒费尔德在这位姑娘眼里就像“歌德写《赫尔曼和多罗泰》（*Hermann und Dorothea*）时期的一个小镇”。

那时，家庭作坊生产的亚麻布的营销仍然以“早期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挣钱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是成功的标志，而主要是让人过上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符的舒适生

活的手段。因此，工作节奏缓慢。马克斯的父亲已经上了点年纪，但还算不上老，他虽然按长期形成的好习惯清晨六点就起床，但先要在他家的大花园里干几个小时的活，然后常常“从容地”给忙于洗菜的女人们读点什么。他大约十一点才踱着步去办公室，每天照例要在后半下午去会所喝酒，享用一瓶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在孙子马克斯·韦伯的记忆里，他是一个最可爱、最慈祥 and 优雅的老绅士。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马克斯·韦伯把他这种类型记录了下来。马克斯·韦伯的祖母用她那双美丽、聪慧的眼睛观察世界，漂亮的容貌透着一种精神气质。家里具有宗教气氛。尤其是家里的妇人，受在威斯特法伦（Westfalen）流行的正统新教的影响，较那些比较随便一些的男人有更为严格的道德观。

来访的海伦妮和她的母亲（她们本身也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但思想要自由得多，全然不受教条的束缚）注意到，韦伯一家人每天早晚都要聚在一起祷告。埃米莉·法伦斯坦就此说道：“我得说这很合我的意，看到可爱的马克斯带着如此真诚的目光，带着对未来最美好、最神圣的憧憬看着他的海伦妮的时候，我很感动，感到我们两家将永远也不会分离了。”

马克斯去看未婚妻海伦妮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她家的宗教节奏，这样的和谐让埃米莉看到了女儿的幸福最可靠的保障，而她自己一直未能享受到这样的幸福。“我想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不过这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也让我感到更加幸福。这个感觉就是：感谢上帝，我们心灵最深处有着同样的追求！怀着这样的感觉，我放心地把我女儿的幸福托付给你。我知道你们一生都会赞美上帝，会给世人带来快乐。对一个母亲来讲，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海伦妮轻而易举就适应了新家的生活习惯和规矩，打心眼里喜欢未来的公婆，同时也得到了他们的疼爱。从他们那里，她潜心学习资产阶级家庭的一切金科玉律。这些规则在这里比在她海德堡的家里更重要，因为婆婆是一个富有生活经验的家庭主妇，自然她的儿子们要把她捧为自己年轻媳妇的楷模。在那个时代，妻子学会做丈夫习惯了的、夫家特有的烹调和焙烤方式，被认为是婚姻幸福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样的婚姻幸福似乎主要取决于男人所感到的舒适程度。只要能让未来的丈夫日子过得好，海伦妮什么都愿意做。

所有的一切织成了欢乐的和谐，见到这对美丽而又一往情深的年轻夫妇的人，无不相信他们的结合注定会地久天长。而聪明的观察者看到的只是未婚妻过于殷勤和过于顺从，以及这个青年男子过于坦然地接受她的服侍，听任自己被惯得无以复加。敏锐的心理学家如果将海伦妮内心冲突的记载同她丈夫在下面一段话中表现出的人生哲学作一番比较，也许就能注意到，这对夫妇心灵深处的和谐其实终不过是一种幻觉：这是幸福情侣常有的一种典型的自我欺骗，爱神使他们各自的性格、相互之间和整个世界都变得和

谐。“我希望，不管生活中出现什么，你都能奉行我的这项原则：不要有什么真正的烦恼——我们的弱点就在于我们太容易庸人自扰。相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是对的，我们就做什么；要坚信，将要发生的，于己于人都会是最好的。我对此一直坚信不疑，谁都无法改变。”

※ ※ ※

29 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律师受雇于柏林市市政府，同时还编辑一份自由派周刊，并很快就积极参与了政治活动。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摄政王威廉接管政府后，任命的内阁大臣多为自由党人，以表明他对宪法持严肃态度。“自由党的新纪元”看来要开始了，自由党人有理由期望出现一个最终能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伟大时代。但是，在充满希望的开端之后，一切又陷入了停滞状态。选出的人民代表权力很有限，上院仍然是保守派的营垒，争取议会制政体的运动被认为是具有颠覆性的行动而遭到反对。控制财政是最重要的宪法权利问题。1862年春，议会要求拥有更有效的手段来审批和监督政府财政预算。国王的想法与这个要求正好相反，因为威廉一世希望常备军规模扩大一倍。于是出现了一场严重的宪法危机，自由党的部长被解职，地方议会被解散，国王发现自己的政治资本已消耗殆尽。就在这个时候，他起用了自己弃用多年的一个人——俾斯麦（Bismarck）做了首相，俾斯麦公然在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执政长达七年。在俾斯麦的统治下，普鲁士做好了推行军事扩张、强权政治和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准备。整个国家群情激愤。在真正的爱国者看来，俾斯麦是祖国的恶魔，是自由和统一的破坏者。

韦伯经历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期，当时他还是个具有可塑性的年轻人。对他来说，参加任何斗争和活动本身都意味着增加生活的阅历。他同赫尔曼·鲍姆加藤（Hermann Baumgarten）一样，并没有多少民主主义倾向，但他绝对是一个自由派。经历1848年革命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但昔日的激情至今还在他心里燃烧：“那些史无前例的峥嵘岁月虽然动荡不已，但充满了丰富的理想、希望和激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辉煌的印象，这种印象永远不会磨灭。”

此时他加入了立宪党，一个属于自由党右翼的议会党派。这个党的目标是“一个强大的霍亨索伦王朝，同时充分承认对人民应许的权利”。当各地筹备地方议会选举时，他担任了设在柏林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秘书，因而很早就同重要的资深政治家有了接触。

30 你可以想象，我在这里经历着最有趣的时光。我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区都有接触，同不少举国上下最受尊重、最有才能的政治家正在建立密切关系。当我跟那些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们（他们是几十年来为我们争取在宪政体制下生活而奋斗的

著名斗士)交往时,我自己都常常感到诧异。……简而言之,我得说我真的是如鱼得水,所有这些活动(它们并没有对我在市政府的工作造成太大干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 ※ ※

订婚两年后,当这对年轻人得以喜结良缘时,他们的幸福感溢于言表。他们倾心相爱,年轻的妻子心里充溢着感激之情。结婚多年后,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里说:

我姐妹中没有谁像我这样幸运,没有谁像我这样能同最心爱的人灵犀相通——我“犯傻”的时候除外。最近,伊达偶然对我说:“瞧,一个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我差点忍不住要告诉她我的理想是怎样以我从未想到也不敢相信的方式实现的,差点要告诉她,一个像我这样傻傻的小东西居然能拥有像你这样一笔财富!

这时,韦伯已谋得了埃尔富特(Erfurt)市政府的一个职位。外省小城镇闲适的生活和他们不嗜奢华的持家风格,让这对夫妇有足够的闲暇尽情地享受青春和欢乐。他们身边聚集了一些好朋友,这些朋友无一不为海伦妮的妩媚所折服,为马克斯的清新而又朴实无华的生活乐趣所吸引。艾米莉·法伦斯坦来看望她的女儿女婿时,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海伦妮做家庭主妇真可谓得心应手。但她以前办事一直有点太过严肃,在家庭理财方面尤其如此。不过这会改变的。这的确只能归咎于她过于认真,因为她天性务实。”

至于智识兴趣方面的修养,这对年轻的夫妇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与海德堡的活跃气氛相比,埃尔富特的精神生活显得平淡。接受伊达·鲍姆加藤的建议,海伦妮仔仔细细读了非教条的英裔美国神学家帕克(Parker)和钱宁(Channing)的作品。婚后的最初几年,她有时还能吸引丈夫进入她内心生活的深处。1867年,她写信给伊达说:

31

马克斯和我过复活节时读了几篇帕克的演讲,马克斯格外喜欢它们。一篇谈的是基督教教会理想;另一篇讲的是关于永生的信念,这一篇尤其美妙、令人信服;还有一篇讲耶稣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其他一切时代的关系。马克斯总是很忙,还要阅读报刊之类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做别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多么有趣。……埃尔富特在这方面简直如一潭死水。没有人对这类事情感兴趣,或许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除外,但神学家不属于这个圈子。人们对新教代表大会的努

力奋斗一无所知，很多人对此也缺乏兴趣，因为觉得它激进，与他们自己的看法格格不入。我可以告诉你，同这儿相比，你那里和海德堡的所有神职人员都真的让人感到精神愉快。你们那些地方才叫有生活，神职人员都自己做功课，做研究，不像这儿的神职人员，只是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去唤醒那些还在睡梦中的人们。……帕克或许能与这个人物建立起像受洗者约翰同耶稣那样的关系，从而为他铺平道路。

显而易见，这个年方二十三，同她心爱的丈夫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一起过着心满意足的尘世生活的年轻女子，还跟以前一样，有着同样强烈的宗教情怀。她写给自己所信赖的姐姐的下面几行文字表明，尽管沐浴在幸福中，生活在爱慕和赞美的氛围里，她在其他方面也并没有改变。

我想，即使在今天，如果遇到靠坚强的意志本来可以做成的事情，却因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做成而放弃，我也会感到非常沮丧。自结婚以来，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有提高，有些许进步；但总有那么些日子，任凭我有各种各样的良好愿望，一切都显然还是老样子。但我不能让马克斯知道我这种情绪，他虽不嘲笑我，却觉得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也不会承认这些想法是有道理的。

真是奇怪！尽管她有绝好的天资，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得相当出色——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生活也像比她羸弱得多的母亲的生活一样，始终伴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海  
32 伦妮总是用绝对的标准衡量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自己竭尽所能。因此，她对自己总感到不满意，总觉得愧对上帝。她随时准备着为任何纰漏承担责任，对每一个失误都耿耿于怀，尽管个中缘由绝不是道德缺陷，而只是不够精明和胆气不足。

这个赢得了大家喜爱的女人常常引用两句她喜欢的诗来表达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是花枝上一朵小小的玫瑰，要永远感谢上帝；如果你是树干上一块小小的苔藓，也要为此感谢上帝。”被别人视为一朵绚丽玫瑰的海伦妮，在和别人的成就作比较时，把自己看成仅仅是一块不起眼的小小苔藓。她并没有去尽情享受自己的美丽和丰富的爱情，反而带着无可奈何的谦卑，总不放过自己的性格缺陷。

同样令人诧异的是，这位少妇年仅二十四岁时，就表达了她后来一再重复提到的这样一种希冀：“伊达，我真的非常高兴，你和我一样，都认同暮年的魅力。这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可他们却笑话我居然有这样离奇的想法。”

这位沐浴在幸福中、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子，为何常常渴望垂暮之年的清静呢？后来的一些迹象可以让我们推断出个中缘由。她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天生性冷淡，这或许是



因为她的宗教情感令她产生抵触的情绪，也有可能是因为年轻时那场可怕的经历永久性地泯灭了她的激情。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她来说，婚姻中的性生活不是快乐的源泉，而是重大的牺牲，是一种只能用生儿育女来加以辩护的罪愆。正因为如此，她才会身处幸福的青春年华之中，却常常渴望步入老年，以摆脱那种“义务”。不过，垂暮之年于她尚遥遥无期。在此期间，做母亲多次给她带来尘世生活的幸福感。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所赐，每个孩子都为她的爱情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 第2章 父母与少年时代

33 韦伯夫妇的长子在他们的结婚一年后，于1864年4月21日降生。这个孩子承继了父亲的名字。继他之后，家里每隔两年给他添加一个弟弟或妹妹，他一共有七个弟妹。韦伯夫妇的八个孩子中有两个女儿夭折了，另外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顺利长大成人。长子后来回忆道，他在孩提时代就有做“嗣子”的感觉，“长子”的特权意识非常强烈，这种意识很快就转化成了他对弟妹的责任感。

生大儿子着实让海伦妮吃了不少苦头。这个孩子头颅太大，生他时海伦妮发了烧，因而后来不能像对其他几个孩子一样，用母乳喂养这头个孩子。这个孩子只好由另一位做母亲的人——一个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木匠之妻来喂奶。在木工刨台下的洗衣篮里，小马克斯在睡梦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初几周。后来，当他的社会观点和民主思想与家族的政治传统背道而驰的时候，家里人便取笑他说：“马克斯在乳母怀中吃奶时同时汲取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小马克斯的母亲和外祖母都很惊讶，因为这个孩子很早就表现出了自立性，玩耍时非常投入，似乎不需要任何人关照。埃米莉生动地讲述了这个孩子两岁半时的一个故事：

他通常独自玩耍，不过，他有玩具做伴，更确切地说是有玩具的一些零散部分，诸如线团、木片之类的东西做伴，其方式我在别的孩子那里从未见过。比如说今天早上，他先用积木搭建了一个火车站，在站里放上一列车厢里满载乘客和货物的小火车，然后在火车头上嵌放了一条上宽下窄的狭长纸条，代表火车冒的烟。他然后望着那道长长的浓烟自感惊讶，还要我们也对此表示惊讶。尔后，他又借助于一个脚凳和一些纸条，用积木搭了一座飘着很多旗帜的盐井。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创

34

意，其中交织着对皮尔蒙特（Pyrmont）的记忆。他能这样玩上好几个钟头，嘴里还几乎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

这个孩子常走过一座跨越铁路的天桥，桥下正在转轨的火车头吐出一股股白色的烟雾，将他罩住，让他感到很神秘。他对玩火车的游戏着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四岁那年，他随母亲去了趟比利时，途中曾看到一个出轨的火车头，这让他难以忘怀。时隔多年，当他再次路过当年的出事地点时，他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在韦尔维埃（Verviers），我记起了一生中第一次‘令我震惊’的经历，即三十五年前在那里发生的火车出轨一事。令我震惊的不单是事件本身，还因为我看到像火车头这样一个在孩子看来庄严神圣的东西，竟像醉汉一般倒卧在沟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这个世界上伟大和美妙的东西具有无常性。”

不久，小马克斯大病了一场，患了单侧脑膜炎，此后多年他都一直容易痉挛和充血。患病后，他的床两侧加了靠垫。这个纤弱的孩子面临着变为弱智或死亡的威胁，这给海伦妮的幸福蒙上了浓厚的阴影。她后来回顾当年的情形时写道：“一切无忧无虑的享受都因此而消失殆尽。但另一方面，想要不顾其他一切而专心履行做母亲的义务，也让我在心灵最深处感到快乐。”这个年轻的母亲这段时间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个孩子担忧，任何时候她只要离开家里一步，就一定要告诉家人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她本来就是一个极为认真尽责的人，几年里精心照料长子的经历，使她在哺育后面几个孩子时更加呕心沥血，倾尽全力。打这以后，她再也无法理解身为母亲怎么能够在白天把自己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别人照管超过一个小时，晚上就更不用说了。她认为，父母外出旅行不带着孩子是一种轻佻地“试探上帝”的行为。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失去了两个孩子——我们下面很快会谈到这些命中注定的事件。

患病期间，小马克斯的头很明显在长大，而四肢则仍像小姑娘的肢体一般纤弱细小。医生估计可能是脑积水，或者在这弧形的头盖骨里面将来会长出很多东西来。这次患病留下的后遗症使马克斯饱受各种各样的神经性焦虑症的折磨。关于这个四岁的孩子，海伦妮写道：

他的神经异常和神经性焦虑症逐渐有所好转。现在我要是让他去拿点什么东西，他可以独自从花园走到屋里，然后再回来。要在几个星期前，他决计不肯这样做，尤其是要经过一个养着鸡的院落，看到那些鸡他会感到毛骨悚然……他现在同其他小孩也能相处得更好一些。

在博尔库姆岛（Borkum），海伦妮常常吃力地抱着五岁的小韦伯走进海水里，

坚信这样做能使他身心强健。但是小韦伯每次都要发出高声尖叫，以致那些海滨浴场的游客要求海伦妮停止这种疗法。即使长大成人后，韦伯也忘不了这可怕的一幕。



1869年，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老韦伯应聘去柏林担任领取薪俸的市议员，之后很快又作为民族自由党（Die Nationalliberale Partei）议员开始了他的议会生涯。有时他会兼任地方议会和帝国会议员。起初一家人住在出租公寓里，尔后就搬进了夏洛腾堡莱布尼茨街19号一栋漂亮的小别墅。这栋住宅位于城郊，带有一个占地约三分之一公顷的大花园。在这里，孩子们离开了大城市，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成长，几近于乡村生活。花园里有得到悉心照料，长得诱人的蔬菜水果，养着鸡和猫咪，因而成了孩子们快乐的源泉。家庭成员在增加。随着大都市和政治的脉搏而跳动的生活，现在很快汇成了一条宽阔的、湍急的河流，除非具有最坚强的意志力，否则很难在其中找到平静。

海伦妮发现，让丈夫分享自己的精神和宗教关切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这些根本不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的心思都在世俗生活、职位、政治和社交活动上。他整天参加各种会议，为竞选而奔波，常常独自一人去度假旅行，后来带着孩子一起去。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家庭的中心，因而期待在家里得到幸福的爱情、舒适的生活和家人的服侍。

36 海伦妮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家里的摇篮里总是躺着一个“小东西”。每增添一项新的使命，她的体力似乎也随之递增。她不让别人照料自己的婴儿，同时也无微不至地关注着已经上学的孩子们的成长。她不知道将一些重活交给仆人去干，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缺乏干练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也不想这么做：“我不能让别人替我干活。”做年轻的家庭主妇时，海伦妮清晨六点就起床给孩子洗尿布，即便后来年事已高，她也仍然操持着各种各样的家务。大雪堵住了檐槽时，人们甚至可以在屋顶上看到她的身影。家务事她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她的一举一动都透出欢快和优雅的力量，女人的职责让她有一种生命得到升华的感觉。她大步走路的样子显得尤其优美。在家里她简直不是在走，而是楼上楼下忙不迭地跑，服侍丈夫，照顾孩子，集《圣经》中的马大（Martha）和玛利亚（Maria）二姐妹于一身。在城里，她总是不等马车停下来就跳上去，也不等马车停稳就跳下来，这样马车可以利用其惯性，让马匹不用费力地拉动静止的马车。（她希望外甥女们也学她的样，这着实让她们的母亲有些担心。）由于海伦妮自己有充沛的精力，因而她家的佣人在她和善的监督下，鲜有自己负责某事的满足感。

操持家务变得越来越难，因为老韦伯的吃饭时间极其没有规律，他的社交活动不断

增加，频繁地招待议员成了他的职业责任。海伦妮虽有超常的精力，可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她在很多信中反复述说过此事：“每到晚上我就觉得昏头昏脑。”孩子们长到入学年龄后，她常常只能睡上五到六个小时，所以白天常常感到困倦难支。

1875年，海伦妮三十一岁，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她这样描述了自己的一天：

我们6点钟起床，在小马克斯锻炼以后，大约7点过一点用早餐。等到他吃完早餐，送他上学，然后给其他孩子和我的老马克斯的面包抹上黄油，准备好灯盏，把饭食摆上桌，就差不多9点钟了。然后便是给小宝宝洗澡，她6点就被抱过来喂奶。当我忙完下楼来，通常是小马克斯的父亲用早餐的时间。我陪他再喝一杯咖啡，匆匆扫一眼报纸，除此之外我完全没有机会阅读，同时也试图与马克斯聊几句，别的时间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因为他这一段时间会议太多。然后我又回到厨房，或者在屋里忙点别的什么。12点左右喂小宝宝，大一点的小男孩们需要先吃点东西垫垫底，我们的午饭开得晚，要到下午三四点才吃。不过，小马克斯的父亲多数时候都回来得晚得多，他回来后我还要尽量给他做点好东西吃。7点钟孩子们吃晚饭。等到我们吃完晚餐，小马克斯上床睡觉，就得9点钟了。然后我也做不了什么正经事儿了，尤其是我丈夫不在家的时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不禁问自己：“你这一天除了弄吃弄喝，照料婴儿，还做了什么呢？”

几年以后，她对自己带幸存下来的六个孩子的经历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

孩子们都睡了，只有小马克斯还在隔壁房间锻炼，我想利用睡觉前这点安静的时间给你写几个字。莉莉（Lili）这小东西整天让我喘不了一口气，尤其是我每隔两小时就得亲自喂饱她那饥饿的小肚子。一旦吃饱了，她就静静地躺在她的小车里玩自己的小手指头，玩得起劲时还一个劲地将舌头往外伸。她已经能够抓得住东西，也会用手指抓人了。阿图尔（Arthur）最近得意地向我展示了莉莉在他脸上留下的抓痕。这个小胖墩同小妹妹在一起真是逗极了，也温柔极了。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去亲她的小手，唱最可爱的歌给她听。例如，昨天他唱道：“你是我的小心肝，我的宝贝，我的小猫咪，你是我的忠实伙伴。”前天莉莉哭闹时，他想让她安静下来，用一种安慰的声调反复对她说：“好了，我的小妹妹，你是个小乖乖，尽管你这样哭闹，可还是个乖孩子，即便你尿湿了裤子，仍然是个乖孩子。”大约他脑子里想的是：要是他自己像妹妹这样，就不能算是个乖孩子了。梅蒂（Madi）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个大姐姐了。她帮着哄小宝宝睡觉，把包裹婴儿的系带卷得整整齐齐，收拾小妹妹已经穿不下的小上衣和不能再补的小内衣，打算以后“等我自

有了一个真的娃娃”时可以派上用场。小马克斯看起来越来越有些像要上大学的模样了。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他同自己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们中有的还顺便来家里吃个午饭或者下午喝点咖啡。他一周去练两次击剑，虽然我对于这项为决斗做准备的运动不大以为然，但这对他的健康却大有裨益，因为他讨厌其他的体育锻炼，比如游泳、体操和滑冰等。卡尔（Karl）还是那样轻佻浮薄，不过至少做家庭作业时比以前要用心，也更加具有独立性，因而让我的日子过得轻松一点。他仍然能在关键的时刻突然想出些滑稽念头，也能找到借口，让人生再大的气也无从发作。例如，最近我看到他裤子臀部的部位（这个部位不知扯破过多少回了）又给弄破了，终于生了气。他带着满腔义愤说道：“我真的没办法。学校的长凳太破旧，碎木片都扎进了腿里。原因是，成绩差的学生必须贴着长凳很快往后排座位挪，而成绩好的学生却总是可以从容换到前排。我们如果一问三不知，就总会被告知：‘快点，往后挪一排！’裤子就是这样磨破的。你可以到校长那里去，就这件事给他提意见。”由于成绩往后挪是他的一个大问题，我的确有一切理由去抱怨！阿尔弗雷德（Alfred）在家里是最乖的孩子，也最能帮忙。他很善于照料小妹妹，最近有一次他哄她睡着了，为此感到很自豪……

不过，在繁忙的家务事中，海伦妮一天也没停止过对心灵平静的追求。她认为，作为母亲，主要的职责不是照顾好孩子的身体，而是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指导。然而，要从事务缠身的一天中抽出时间来谈何容易，就连享受同孩子们在一起的乐趣都并非易事！

39

唉，我要是能多一点清静的时间来享受抚养孩子的乐趣，那该有多好啊！不过，我现在将竭尽全力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你说的一句话对我颇有启发：不要总为了将来而生活和工作，而要珍惜**当下**。我总是怀抱着希望在那里操劳，期望能够争得一点闲暇时间，去享受同丈夫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乐趣。可是早在圣诞节前的日子里我就已经感到很沮丧，在那段生活缺乏规律、操心事繁多的时间里，我总是期望着圣诞节和假日，届时我将能够再次真正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乐趣。然而……

然而，1876年圣诞刚过，一个极其可爱、年仅四岁的幼女夭折了。海伦妮在十三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中第一次感到悲痛欲绝。

※ ※ ※

海伦妮在婚后最初几年里已经失去过一个幼婴——小安娜。安娜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犹如一片小雪花，很快就融化了，因此在母亲的心灵中留下的痕迹没有那么深。可这

个名叫“小海伦妮”的四岁女儿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了，忍受病痛的那些日子更让她早早地臻于完美。圣诞前夜，这孩子还背诵了一首小诗，嗓音有些沙哑。第二天便出现了恶性白喉的症状。小宝贝遵从主的意旨，即将离开人世，在孩子病床前度过的分分秒秒永远镌刻在了母亲的心里。海伦妮过于虔诚，因而不会抗拒。她选择了顺从，可是，缺少了小女儿的世界在她看来已经改变了模样。“对我来说，春天不再有鲜花盛开，因为我的玫瑰花蕾已经夭折了。”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也遭受着渴望的折磨，渴望跟随孩子一起去那永恒的安息之地。但她承认，为了其他生者的缘故，自己没有权利这样做。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事件也成了她生命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章节。孩子的父亲起初也和孩子的母亲一样深受打击，但很快就撇下了她，让她独自挣扎于生死之间。像无数的男人一样，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他要尽快忘掉个人的悲伤，不愿让自己对生活的享受长期受到干扰。“他并没有和我患难与共。”于是，海伦妮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心灵的结合中出现了一道明显的裂痕，一道再也没能弥合的裂痕。这个在痛苦中挣扎的女人非常无私，不愿意把丈夫拽入自己的悲痛世界之中，同时她也不相信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向他吐露心迹，而是向身在远方的姐妹诉说衷肠。

在老韦伯心里或许早已形成的看法现在浮出了意识的表面：海伦妮清楚地认识到，她的丈夫，那个自己年轻时的恋人，与自己全然不同，他的心灵是由完全不同的质料构成的，不管是她还是命运都无法让他改变。虽然海伦妮一向为人谦恭，甚至谦恭到贬低自己的程度，但她却本能地使用绝对不可更改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感情生活，而她丈夫无法达到她的标准。海伦妮把自己包裹在断念和内心孤独之中，自此开始了与丈夫不可避免的疏离。海伦妮的母亲曾相信这对夫妻在精神上志同道合，结果证明这只是一种错觉——跟当年她自己的婚姻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尤其在海伦妮继承了母亲的遗产之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改善了，老韦伯也像他那个圈子里的人一样，追求舒舒服服地享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享受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追求社会地位等等。他不愿吃苦。然而，他身边的这个女人渐渐地疏远了他，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培养了一些丈夫不感兴趣的爱好。起初，他并未察觉到海伦妮和自己生活在不同的层次上，因为海伦妮一如既往地服侍他，对他仍然表现出爱恋和顺从。

到了迟暮之年，海伦妮感到自责，认为自己没有把丈夫带进她的世界里去。丈夫去世很久以后，她写信给业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说：

两个孩子夭亡时，我只能独自承受一切，部分是因当时情形所致，部分是因为我丈夫的个性充满健康和生活的乐趣，使他不能与我一起分担失去孩子的痛苦。与此同时，我还得努力争取保持对主的信仰，努力保持对一切宗教发展的关切——对

此他不感兴趣。那时我认为，自己独自承受痛苦，不强求他违心地与自己同行，这是一种替人着想的做法，是遵从上帝要求我们不要强人所难的做法，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怯懦的行为，害怕在这些最困难、触及心灵最深处的问题上遭到误解。我没有料到，其结果是我们的内心生活从此开始分道扬镳。虽然发生了这一切，我那时仍然是非常幸福的，以致常常不理解自己周围的人们怎么看起来那么忧郁，那么严肃。在我身上他们都应当能看得出，生活并非如此。

41 海伦妮生命的活力和宗教的谦卑屈从使她得以忍受这一时期的痛苦。毕竟她身边还总有充满希望的新生命绽放——六个身心健康、天资聪颖的孩子，而且她对姐妹的孩子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打心眼里喜爱，这使她的爱心能够不断地推及更广的范围。但是，她明白生活中将会有什么发生。自那以后，她能从每一次死亡事件中悟出某种意义。每当别人的痛苦让她受到震撼时，令她感到宽慰的是，自己的小宝贝已再也不会经历尘世的挣扎了。

当我看到如此可怕的痛苦，看到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在思想感情上不能推己及人而给另一个人酿成更为可怕的痛苦，看到人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如何因此而遭到毁灭，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希望做和应当做的事情如何因此而无法实现时，只要想到那个只是为幸福和欢乐而存在的幼小生命在对生活的理想尚未破灭之前就离开了人世，我便能感到一种真正的宽慰。每当我内心经受忧虑和痛苦的时候，一想到我的小海伦妮那张宁静安详的小脸，我总能感到慰藉。不过，我没有理由抱怨生活在与我为难，唯一可抱怨的是，我没能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没能做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人。现在面对儿子马克斯时，这让我感到特别难为情。

这段话写于1880年，涉及她与长子的关系问题，其中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来追溯一下马克斯的成长经历就会明白。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谈谈马克斯。

※ ※ ※

迁居夏洛腾堡以后，韦伯家中关心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年轻的儿子们从这种政治兴趣中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作为柏林市议员，老韦伯负责市政建设。他努力促成了在柏林沿街种上赏心悦目的树木。在普鲁士议会，他在预算委员会所属的文化部门担任负责人。他口才不佳，因而不是政治领袖人物，但他不失为一个明智、有判断力的政治家。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是他家的常客，有的是作为朋友来访，有的是来参加例行的社交聚会，其中包括品格高尚的贝尼希森（Bennigsen）、头脑机敏的米克尔（Miquel），



以及其他一些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李凯尔特（Rickert）；老派的民主自由主义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卡普（Friedrich Kapp），他的逝世在朋友圈子里留下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空白；财政部长霍布莱希特（Hobrecht）和他的弟弟，后者是一位重要的建筑师，在韦伯负责的部门供职；公使馆参赞埃吉迪（Aegidy），他也是一位教授，在外交部任俾斯麦的秘书；富有创见的文学史家尤利安·施密特（Julian Schmidt），他是韦伯的挚友；学术界的明星狄尔泰（Dilthey）、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西贝尔（Sybel）、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莫姆森（Mommsen）。这个圈子里有几人堪称领导时代思想潮流的顶尖人物。 42

儿子们对父母的挚友，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卡普、尤利安·施密特和埃吉迪怀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样的耳濡目染，他们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虽然他们都还只是半大孩子，但已经被容许在餐后给议员们呈上雪茄，能够听到他们政治辩论中的只言片语。尤其两个年龄最大的孩子——马克斯和阿尔弗雷德，小小年纪就因此而接触了政治问题，并且对政治生活的特征有了直观的了解。除此之外，他们的父亲还每天都讲述一些在议会和民族自由党内发生的事情，讲述关于高层政治领导人特别是俾斯麦的事情，那时民族自由党人对俾斯麦非常崇拜。

年幼的马克斯以这种直接的方式获得了关于当时正在演进中的世界历史的知识，即便在四十年后，他对此仍然记忆犹新。甚至1870年战争的爆发就已经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六岁的孩子是在后来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一个地方——他外祖父、外祖母位于内卡河畔的住宅——经历了这场战争的爆发，那年夏天他父母正在这里度假。做出宣战决定前极度紧张的气氛；天真地相信正义在自己一方；一个好战的民族带着欢快的心情和严峻的态度不惜为获得强国地位而牺牲生命；然后是激荡人心的胜利欢庆，以及终于赢得了帝国统一所带来的充满自豪感的欢欣鼓舞——这孩子将所有这一切都十分用心地铭记在心，这些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

然后马克斯在夏洛腾堡启蒙读书。他小时患病的后遗症虽已不复存在，但小马克斯仍然羸弱瘦小，在所有体育运动方面他都显得拘束和笨拙。他纤细的脖子支撑着一个硕大的梨形脑袋，显得有些吃力。不过，他完成学校的作业则毫不费力，而且还很早就表现出了对思维活动的兴趣和独立的求知欲望。他母亲谈到这个九岁的孩子时说：“马克斯着迷于历史和家谱学。”他的外祖母写道： 43

马克斯已经有比较高远的追求。拉丁语对他很有吸引力，他喜欢那些拉丁词汇，每日不怠。如果谁听他背诵拉丁课文，他会感到很高兴，他从来不会把一个词同另一个词混淆起来。不过他现在觉得书写有些枯燥乏味，没少涂鸦，还弄得满手都是。他似乎不大关心自己的外表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倒是令人高兴的事

情。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他同邻居孩子喧闹嬉耍，玩得两颊泛出红晕。他还在下午找时间练半小时钢琴。他最近才开始跟一个当地的教师学琴，对此很有热情。他的手法娴熟，乐感似乎不错。

这孩子显然并不讨厌写信。父母外出时，会收到他流水账似的汇报。如果他与父亲一起外出旅行，母亲会收到他详尽的旅行记事。那时他就开始以这样的书写方式保留和表达自己的见闻和经历。他这些孩提时代的信件很少提及自己，但写了很多家里的生活和让他贪婪地汲取养分的外面那个美妙的世界。在他的信里，你可以看到他的弟妹们原汁原味的可爱行为和格言警句式的妙语，你可以伴随他们一起经历学校生活，闻到夏日花园里的芬芳气息，看到园里得到精心管理的果实正在成熟，数不清的猫咪在嬉戏玩耍，听到鸡群在咯嗒咯嗒地叫个不停。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写道：

重大新闻！生小猫咪了！！两星期前，那只毛色红黄间杂的猫在策尔贝（Zerbe）的床上（！！）生了四只小猫。接着那只灰猫在通往布卢姆（Blum）小姐阳台的楼梯下面生了四只，其中一只黑色的雄猫作为嘉宾在我们那里落了脚。然后那只“老猫”在爸爸的盥洗室里生了三只：一只黑色的雄猫，一只灰色的雄猫，另一只是灰色的雌猫。红黄毛色的猫生的小猫咪都溺死了。其他的小猫待我们发现时都已长大了，不能再照此办理。所以，我们又多了七只猫！！！！

马克斯

44 在他的信中，你还可以体验在哈韦尔湖畔（Havelsee）的夏日郊游，看到冬天里一个巨大的雪人用煤球嵌成的双眼严肃地凝视着严寒。在他写给一位堂兄（我们下面很快要谈到他）的信中，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些信息：按家里的传统习俗，他把自己描金的坚果和饼干挂到圣诞树上——树梢上端坐着一个旧式的圣婴；海伦妮（对她来说，自从女儿死后，圣诞节就伴随着深深的悲痛）在马不停蹄地奔忙之后，终于在一间光线神奇变暗的屋子里同她的一群孩子坐在关起来的门前，唱起那些古老而又优美的歌谣；然后是孩子们的天堂之门如何打开，幼小的孩子们如何着迷于圣诞树上闪烁的光亮，而后再如何从神圣的奇迹中慢慢回到平淡无奇的自我。马克斯在描述事件经过时，就已经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专门术语：

你寄给克拉拉的玩具娃娃被阿图尔给吞并了，尽管克拉拉一方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但阿图尔在自己和克拉拉之间的大吵大闹中顶住了每一次进攻，现在仍然持有那个娃娃。阿图尔对这个娃娃爱不释手，最后只得带着那个娃娃上床睡觉。克拉

拉虽多次试图夺回娃娃，但都未获成功，他意识到自己的企图是徒劳的。这样一来，依据时效法的规定，那个玩具娃娃可能要归阿图尔所有了。

夏天，父亲常常带着三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子外出旅行，领着他们四处漫游，一览德国的大好河山。老韦伯的一个侄子曾这样谈及他们的旅行：“这算得上一项成就，一项并非每个父亲都有耐心和胆量去获取的成就！用语言简直难以形容这三个调皮鬼能使出什么坏招来，他们每天得有多少顽皮打闹才得以心满意足。”十四岁的马克斯写下的日记体长信可以引领我们作一次从图林根的城镇和森林一直到莱茵河畔的漫游。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这个对自己很少留意的孩子，是如何地陶醉于大自然的美丽，沉溺于能满足他历史想象的一切事物。当八岁的卡尔滑稽稚气的话一出口，我们便可以听到同行的旅伴们开怀大笑的声音；我们还可以感受到马克斯第一次置身于科隆（Köln）大教堂的大厅时，他是何等的肃然起敬。

亲爱的妈妈：

我曾许诺等我们到了埃尔富特（Erfurt）再给你写信，可是我们眼下有富余的时间，所以我就给你谈谈我们的情况，你别见怪。我们乘火车时，卡尔<sup>①</sup>说：45  
“爸，这附近一定有一个叫巴黎的城市，火车站里有关于巴黎的消息。”我们告诉他巴黎在什么位置，然后他说：“那我还是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到过一张巴黎的照片呢。”在克森（Kösen），我们将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去一个名叫“猫咪”的旅店投宿。在那里吃午饭时，一只灰白相间的猫来到桌边。“啊哈，”卡尔说道，“这就是那只‘有名’的猫了，这个旅店就是因为它才叫这个名字。”然后，我们乘渡船去鲁德尔斯堡（Rudelsburg），船驶过清澈的萨勒（Saale）河水面……古老的城堡坐落在凸出的山岩上，俯瞰着萨勒河，显得陡峭而壮观。你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爸爸告诉过我，说你们二人曾到过那个地方。不管怎样，那上面有上好的啤酒和美味的咖啡。从上面俯瞰萨勒河谷，景观虽谈不上阔大，但很秀丽。林木覆盖的山峰此起彼伏，你可以看到葱茏的山峦，看到点缀着小城镇和村落的山谷。就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卡尔突然不见了。我们去找他，发现他正坐在一间屋的窗户边上，俯瞰下面的山谷。他说在看铁路。爸爸问他：“为什么古代的骑士不能建造铁路？”卡尔回答说：“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我们从鲁德尔斯堡往下走，踏上一条小路，路旁是一片庄稼，还有一条深约20英尺<sup>②</sup>的窄沟。我们跳进沟里

① 年仅八岁。

② 1英尺约为0.3048米。——译者注

46

并邀爸爸也跳下来，因为在沟里更容易行走。为了不让大家扫兴，他居然真的跳了下来。可是这条沟很快就越走越窄，变成了一条两边均是岩石的窄窄的峡谷，20英尺高的岩壁陡峭地矗立两旁。最后，一块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岩石挡住了去路，我们便从岩石上面爬了过去。经历了不少攀爬之后，我们终于走出了那条峡谷。“爸爸，”卡尔问道，“你是怎样从岩石上过来的?!”阿尔弗雷德说：“我们真的是让爸爸‘卡’在那里了。”接着我们来到一棵高大的椴树下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树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捕鸟处。克森市政委员会忘了在此放置板凳，谨致歉意。”从那里我们去了一个盐场。当爸爸给卡尔讲解了这个地方，并谈到咸水浴(Soolbäder)时，卡尔说：“喔，对了，这个我知道，咸水浴这个词里有两个连写的字母‘oo’。”接着我们穿过市区，沿着一条漂亮的林间小道上山去凯泽-威廉斯堡，顺便提一句，这个威廉斯堡非常现代化。我们听到教堂响起了钟声，此时卡尔说道：“唉，讨厌的教堂真应该停止把钟敲得叮叮当当响，别弄得火车头还以为是火车站在敲钟，也许会呼啸着冲过来。……”

47

从瑙姆堡(Naumburg)出来，我们乘车沿萨勒河谷而上，到了耶拿(Jena)。你也许知道这里的地形，四面环绕着可以看到有耕种栽培的山峦。从火车上你可以看到左边的狐狸塔(Fuchsturm)拔地而起，城市坐落在右侧。……一进城，我们就看到好几个大学生社团聚集的小酒馆，酒馆上飘扬着各个团体的旗帜。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某个教授的纪念碑，而后是歌德和施莱格尔(Schlegel)兄弟俩住过的房子。最后我们来到学生社团历史上可算顶尖的设施——布格克勒尔(Burgkeller)。姨父鲍姆加藤曾在此酌酒，即便是现在也还可以看到学生带的便帽在晃动，两面学生社团的旗帜在飘扬。……耶拿无疑是一个美丽而友善的地方，像海德堡一样，是一座真正的学生城。我们从城里沿着萨勒河右岸陡峭的山路去狐狸塔，途中穿过一片有的地方很漂亮的松林，路旁是近乎危险的深渊。狐狸塔是一座古城堡遗址，就像很多其他城堡一样，被毁于那场著名的内战。(此处略去马克斯对狐狸塔所做的详细描述。)我们到达施瓦察(Schwarza)时，天气非常好，我们随即便前往施瓦茨堡(Schwarzburg)。最初三刻钟路上艳阳高照，但一路景色倒并不见得漂亮。然而，从布兰肯堡(Blankenburg)开始，路向左一拐，便进入了风景如画的施瓦察河谷，一路的滨江道。我们先去了途中一个叫克莱索帕斯(Chrysopas)的旅店，然后沿施瓦察河谷继续上行，穿过了图林根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之一。路的左右两壁峭拔，但壁上松林密布，左侧的施瓦察河咆哮着奔腾而去。不时可以看到几片岩页挑战似的傲然挺立，指向清丽的森林上空。此外，那里的草莓随处可见。三个小时以后，我们于下午五点抵达施瓦茨堡。你大概知道这个地方的地貌和优美的环境。我们坐在“鹿儿饭店”的阳台上，俯瞰着下面草坪上的鹿群、沉静的树梢和湍急的

施瓦察河，度过了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

1878年8月1日于鲍林泽拉

在归途中，韦伯写道：

我们上午九点离开美因兹（Mainz），乘一艘快船沿古老的父亲河<sup>①</sup>——莱茵河——顺流而下，沿途只在比布黎世（Biebrich）、科布伦次和波恩（Bonn）短暂停靠，下午四点半就到了科隆。……这段行程非常美妙，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只是到了最后，阿尔弗雷德和卡尔才好像感到有些腻味了，于是便开始调皮捣蛋，在船上的椅子上跳上跳下，嬉戏扭打，一会儿坐到船的推进器边上，一会儿到下面去隔着轮罩观看桨轮的转动和它卷起的浪花。（这里略去了对一路航程的叙述。）上面说过，我们在下午四点半抵达科隆。岸边聚集着大批人群。船一靠岸，一大堆仆人和行李搬运工便蜂拥而至，不由分说随手拿起行李就往船下搬。不消说，每个人都在大声嚷着，招呼着自己的行李。“喂，您有什么行李？”一个搬运工问爸爸。“这两个箱子，送到火车总站。”“您先走，我会比您先到那里，年轻人！”不过，我们并没有马上就动身，而是在那里等了好一阵子，至少有一刻钟。这时过来一辆出租马车，车夫座位上堆着三个大箱子，车夫就坐在最上面一个箱子上，看上去很有些大无畏的样子：“当心！”此时放在顶上的箱子已经开始摇晃，有些倾斜了。驾车的那位先生从上面溜下来，双脚仍然不离车夫的座位，他很费了点劲才坐正了身子。从火车站出来我们去了大教堂。跨进那个将来用作正门的入口，我们即刻感受到这座恢宏的建筑对自己心灵产生的真正的彻底的震撼。瞧那惊人的高度，看看那些柱石！你看到这些，这座建筑在你眼里就仿佛是一个巨大而又奇异的形体结构；而当

48

你注视那庄严的哥特式穹隆时，你获得的却是一种难以表述的宁静和安全的感受。当时正是周六祷告时间，所以回廊关闭。我们只好等待将来有适当时机再来了。同样，要详细观赏大教堂也只能有待他日，我们现在只是想走马观花而已。然后我们往顶上去。从教堂顶上才能将整个建筑和雕塑尽收眼底，才能看出整个建筑的基本构思。在顶上，你不仅可以一览周围的乡村，以及数里之外的七峰山（Siebengebirge），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你的目光更会停留在教堂那巨大的双尖塔上。塔身已不再是不成型的建筑，好像两个巨大的问号一样展望着未来，双尖塔除最后小小的四层外业已建成，它们的未来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

<sup>①</sup> 德国人称莱茵河为“父亲河”而不是“母亲河”，意同他们称“祖国”不用类似英语的“motherland”（“mother”意为母亲）而用德语的“Vaterland”（“Vater”意为父亲）。——译者注



在马克斯丰富的少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还是书籍。他很早就开始自己研读书籍，拿到什么读什么，尤其是历史书籍和古典作品。他也读哲学，在中学六七年级时读了斯宾诺莎（Spinoza）和叔本华（Schopenhauer），中学毕业前读的主要是康德（Kant）。十二岁时他就告诉母亲自己借了一本马基雅弗利（Macchiavelli）的《君主论》（*Principe*），接着要读《马基雅弗利辩》（*Antimacchiavell*），还将浏览一下路德（Luther）的著作。同年他问在海德堡的外祖母，他的表兄豪斯拉特（Hausrat）会不会愿意用他收集的蝴蝶标本集来换取自己制作的默罗温格尔（Merowinger）王室或者卡罗林格尔（Karolinger）王室的家谱表。十四岁的马克斯告诉外祖母，他正在忙于制作一张1360年的德意志历史地图：“做这张地图花了我很多精力，因为我首先得为此收集各种各样的家谱、有关领土变迁的历史资料和专业百科的词条。我常常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在百科全书里或其他地方查找关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偏远地方的资料。这张地图已经快要完成了。我想一旦我借助这张地图把握了这段历史，我便会非常喜欢它的。”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十五岁的他写下了很能代表他性格的一段话：“我既不耽于幻想，也不写诗作词，除了读书我还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就博览群书。”大约在这一时期，他就开始做读书笔记了。

1877年年初，这个未满十四周岁的孩子“依据大量的史料”写了（显然是作为迟来的圣诞礼物）两篇讨论历史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德意志的历史嬗变，特别着重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问题》，另一篇是《关于从君士坦丁到民族大迁徙那一段罗马帝国史》，“作者将此献给无足轻重的自我以及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第二篇文章附有一幅君士坦丁堡的素描插图、一张克洛鲁斯·君士坦提乌斯（Konstantius Chlorus）的家谱表以及描画得很精致的“恺撒（Caesar）大帝和奥古斯都（Augustus）大帝”头像，这显然是从他那时正在收集的古罗马钱币上描摹下来的。

两年后，也是在圣诞前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对印欧各民族的民族特性、民族发展和民族历史的观察》的文章。此文已经显现出他（在大约可以称之为“历史哲学”的方面）通过自己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他的目的在于理解文明民族的整个历史，并试图揭示其“发展规律”。

首先，他对最重要的那些民族的“本质特征”和文化水准进行了描述，描述过程中他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加以区别，把“民族情感”视为宗教和民间诗歌的源泉，把“民族精神”视为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认为通过这种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才得以创造出来。为了阐明自己的用意，他对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哲学和宗教进行了比较分析，旁征博引东西方的例子，特别是古希腊的作品。荷马（Homer）和莪相

(Ossian)的对照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这篇文章里，而且在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书信中，都深入比较了二人不同的人生理想和对死亡的态度，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位未来的学者试图揭示从文化起源直到现在的民族政治史的“规律”。他坚信，如自然界一样，民族政治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假如没有外来干扰，正如天体不可能完全离开其运行的轨道一样，各民族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其已经开始的发展进程——如果受到外来干扰，星球也会改变轨道。”他认为，白色人种的两个主要分支闪米特人和印欧人之间无法消除的反感所造成的分裂，是东西方长达数千年的此消彼长的争斗的根源所在。在他看来，这种已经无法解释的反感对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尤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闪米特人和印欧人二者的混合导致了“闪米特化”，亦即雅利安文化的失败。闪米特人的专制主义和宗教狂热不断危及印欧王国，即使是确保了雅利安人在西方长达千年统治的萨拉米(Salamis)之战，也未能将它们永久祛除。由于遭到闪米特影响的不断渗透和包括西方的基督教化在内的其他原因，古典文化毁灭了。由此，马克斯得出了这样一个政治结论：“印欧人既不能容忍精神上的融合，也不能接受闪米特人特有的专制统治的形式。不过，共和制对他们来说也并不可取。唯一对他们有利，因而值得希冀的国家政体形式是宪政。”

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斯对学校的功课不上心，课堂上也只是偶尔听一听老师讲授，例如中学四五年级时，他就在课堂上悄悄地一部一部地读完了40卷的科塔版的《歌德全集》。他总是班里年龄最小、体质最弱的学生。他记得自己曾“懒得出奇”，没有丝毫的责任感，也没有任何抱负。他鄙视任何形式的追名逐利。他对老师并无不恭，但内心里并不尊重他们，常常提一些老师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致使他们对他有些发怵。他在学习上对和他一起玩斯卡特牌和抽烟斗的朋友〔其中包括莫姆森、迪特里奇(W. Dieterici)和科恩(F. Cohn)〕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果他的知识出现了空白，他会刨根问底弄个明白，而后乐于与别人一起分享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正因为他如此够朋友，又没有半点自高自大，他的同伴们都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后来他回忆起自己上学期间的表现时，渐渐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当时在母亲眼里是一个操行上有问题的孩子——他母亲对此笑着加以否认。不过，他母亲在一些书信里表明，她对正处于生长期、早熟的长子越来越内向的性格和他的落落寡合确实感到忧虑。她曾写信给伊达·鲍姆加藤，后者跟她自己已成年的儿子们保持着很亲近的关系，她说：“我真羡慕你，你和奥托(Otto)心心相印，这才促使他给你写下了这样一封信。我的儿子们哪天也会像奥托这样，来寻求母亲的忠告和支持呢？我担心自己在这方面也太像一块‘苔藓’。”<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第1章结尾处的小诗里提到的苔藓和玫瑰。全然不像鲜艳夺目惹人喜爱的玫瑰，寄生于树干上阴暗潮湿之处的苔藓只是无名的低级植物，悄然孤独地存在，无人眷顾。海伦妮这里暗指自己的儿子不会像姐姐的孩子一样寻求自己的帮助。——译者注

那个时期，海伦妮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窥探孩子们的内心世界。1877年夏季和冬季，伊达的长子弗里茨（Fritz）在柏林上大学。海伦妮对这个开朗、热心和招人喜爱的年轻人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贴心，打心里喜欢这个孩子可爱和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弗里茨在海伦妮家随意出入，为人坦率，易于接触，很崇拜姨妈。他的小表弟表妹很快就成了他的追随者。他将来想做教师，海伦妮向他咨询了一些关于自己孩子的事情。这个大学生完全融入了夏洛腾堡这个家庭的生活，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这里的人物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小插曲：

我在夏洛腾堡已经连续住了多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了解了这里的人们。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容易同姨父争吵了。假如他不是我姨父，我也会跟他吵起来的。他是个真正的暴君，不值得海伦妮待他这么好。不过他的思想和情感都很丰富，对周围的人也很关心，我已经欠了他不少人情。当然我同姨妈要处得更好。她对孩子真是太好了，但她总是抱怨自己不如你。她怀疑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就像我们有事总是去找你一样，她自己的孩子遇到事情也会去找她。她说：“即便他们来找我，我也不能像你母亲一样开导他们。我不善言辞。”

在夏洛腾堡，姨父一见面劈头就给我一通教训，说我做事怎么这么不像个教师，竟把外祖父法伦斯坦的生平简介给了小马克斯——主要是因为小马克斯要制作一份大的家谱表。我私下里总是在责备，怎么让小马克斯读了这么多不适合他读的东西，这现在倒成了我自己的毛病了！饭后我们去了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沿着冷杉环抱中一个迷人的湖泊漫步长达四个小时，倾听着美妙的回声。小马克斯和阿尔弗雷德也跟我们去了。小马克斯时不时给我们拿来一块土或一颗松果，阿尔弗雷德天真单纯，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夜幕降临，姨妈用她美丽的嗓音唱起了一支又一支的歌曲。后来圆月当空，星光闪烁，姨父、姨妈和他们的儿子一起欢唱着，高高兴兴地穿过了树林。小马克斯怎么也不肯唱，阿尔弗雷德则唱得很带劲。像他们俩这样有着天壤之别的兄弟，还真不容易找到。回家的路上，小马克斯不无得意地给我讲起了他的斯特拉斯堡之行，阿尔弗雷德则竖起耳朵倾听。看到这兄弟俩，我好不容易才咬住嘴唇不笑出声来。姨父和姨母在我们后面走着，也在偷偷地笑。阿尔弗雷德尤其滑稽，我给他讲的那些狩猎故事，他都信以为真。

弗里茨离开柏林后，十四岁半的马克斯同他保持着通信联系，常常去长信给他讲述家里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海伦妮很感激她这个已成年的外甥把马克斯从自闭中引导出来，期望这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并请求得到弗里茨的同意，让她读到自己儿子给他的信。从这些信件里可以看到马克斯在十五六岁时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库齐乌斯（Curtius）的《希腊史》，莫姆森和特雷席克的著述，一本美国史，黑



恩 (Hehn) 的《人工培植的植物和家畜》。马克斯还不经意地提到了自己的阅读习惯：“我读书进展缓慢，因为我阅读时要做很多笔记。”小说家中他特别喜欢的作家是阿列克西斯 (W. Alexis) 和瓦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

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读司各特的《爱丁堡监狱》(Kerker von Edingburg)<sup>①</sup>。不知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激动人心的小说之一。我总弄不明白，我的同学为什么老是热衷于读集市上销售的各种各样的现代中篇小说，而完全无视过去这类出色的长篇小说。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是，恰恰是那些高级文科中学的高年級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水平远远高出一切合情合理的长篇小说，尽管他们对其中一些作品全然无知。相反，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们只欣赏那些中短篇小说和骇人听闻的故事。我想，前帝国时期罗马贵族的阅读喜好恐怕就是这个样子。我是文科中学六七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我这样说听起来可能有些狂妄放肆。但是这种状况一目了然，我即便会说错什么也顾不得了。当然，例外总是有的。……

马克斯对希腊和拉丁经典作家诸如荷马、希罗多德 (Herodot)、维吉尔 (Vergil)、李维乌斯 (Livius)、西塞罗 (Cicero) 和萨鲁斯特 (Sallust) 的评价，表现出他的早熟、独立思辨能力和惊人的思考力度。他对荷马和莪相所做的比较研究显示了他对诗的敏感和“终极现实”给他的心灵带来的激情。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西塞罗，结果觉得此人“不堪忍受”，因为他大言不惭、言辞空洞无物，而且政治上摇摆不定。他显然觉得学校里所描绘的西塞罗的形象同实际有出入。马克斯读了所有西塞罗自己写的和有关他的著述，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个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那些人物和他们的行为动机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比马克斯年长六岁、正在上大学的弗里茨对这个十四岁半的少年所持的断然批判态度感到不甚满意，“婉转”地向他暗示，他的观点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马克斯谦虚同时又坚定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海伦妮真不知道自己应当为这只振翅欲飞的雏鹰感到高兴，还是应当将这孩子少年老成的博学多识以及雄辩视为狂妄而感到忧虑。她毕竟还很年轻，这些东西已经完全超出了她自己的判断力。因此，当马克斯偶尔写出一封真正带孩子气的书信时（比方说他详细生动地描述德皇威廉在遭遇未遂行刺之后隆重返都柏林的盛况），海伦妮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下面是马克斯书信的若干摘录：

<sup>①</sup> 中文通常译作《中洛辛郡的心脏》。英文书名采自爱丁堡古城的监狱名字，德文译本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你让我给你讲一讲我对不同作家的看法。

至于荷马，我相信你是知道的，在我所读过的所有作家里，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可是为什么喜欢他这个问题则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希腊语言本身婉转悦耳，而特别要归功于所有情节都叙述得极为自然。至少我可以这样说，在读荷马时，我从未感到过有什么悬念，而悬念恰恰是人们喜爱阅读小说和观赏戏剧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戏剧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激发悬念和好奇心——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它就不会对青年和老年人都具有这么重要的教化意义了——但是我觉得，一出戏剧，尤其是悲剧，如果没有悬念，就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在荷马的作品里，这种悬念几乎全无踪影。所以，读荷马的作品时比读小说时更容易放得下。我读小说的时候，读起来就难以释手，总想一口气读下去，一旦停下来就总有一种难受的感觉。相反，在读荷马的作品时，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停下来，把它放在一边，换个时间重新开始读。这是因为荷马的作品不是一个生动的表演，而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因为它并不是要呈现先后发生的事情的情节链，而是描述情节的发生和平静的发展。在荷马的作品中，如果灾难降临，那么人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赫克托尔（Hektor）之死就是实例。而在《埃克哈德》（*Ekkehardt*）、《祖先》（*Die Ahnen*）等多数别的小说中（也许司各特的小说属例外），灾难都是突如其来的。在荷马那里，一切早就被命运不可改变地决定了，读者的紧张情绪和痛苦也因此而大大减缓。

54

我对维吉尔远不如对荷马那么喜欢。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Aeneis*）里试图唤起某种悬念，但你很难感觉到这种悬念的存在，即便感觉到了，也并不令人惬意。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描写狄多（Dido）厄运的第四卷里。在制造悬念上，维吉尔获得了部分成功，但我得到的并不是一种快感，因为这种悬念不是自然地产生于素材本身，而是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当然，小资产阶级的叙事诗——比如说歌德的《赫尔曼和多罗泰》（*Hermann und Dorothea*）——如果没有悬念，就毫无意义，也就不成其为叙事诗，而是田园抒情诗了，而它们恰恰是资产阶级的叙事诗。这种诗的题材通常是有限的，仅限于主人公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与此相反，像《埃涅阿斯纪》那样的英雄史诗，其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赞美主人公。此外，它还应当以出色的细节描写让人感到愉快。因为这个原因，这种诗只能允许有少许的悬念。……

关于希罗多德，我对他这个人和他完全不可思议的勤奋充满敬意。从他的历史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什么地方都去过，而且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这就完全弥补了他的轻信，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不能怪他有这种轻信。希罗多德不是一个批评家，他虽然常常做些评论，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的批评常常比他所批评

55

的理论和观点更为荒谬。他没有进一步深入探究事情的内在原因。在他似乎这样做了的地方，他的讨论大都是自己头脑想象的产物，而且受制于他的宗教虔诚以及由此产生的迷信。当然，他不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历史学家。虽然他殚精竭虑地做研究和做一切事情，但他想要做的主要是展示命运的轨迹和神祇不容改变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地在历史中表现出来，一切都是它们所决定的。他的叙事方式完全是诗意的。他同荷马的风格很接近。他的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他的著作读起来令人很愉快，主要是由于他的语言总是那么优美，那么平静，也由于他在关于波斯战争的著述中时而迸发出来的激情。

李维乌斯生活的时代比希罗多德晚四百年，他犯有与后者一样的错误，却没有后者的长处。他也是个蹩脚的批评家。我发现很难断定他所使用资料的出处以及他是如何使用这些资料的。他未能充分利用当时也许尚存的古代文献。不管怎么样，真要这样做对他来讲也太难了。他全然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勤奋，再加上他缺乏希罗多德的质朴和热忱，所以他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至于西塞罗，我谈不上特别喜欢。例如，我发现他的《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就完全没有一点激情和决断力。迄今我读到的关于西塞罗的书几乎都称赞他，但我实在不明白这种褒扬有什么根据。不错，他的确是个道德纯洁的人，也许完全没有沾染放荡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以及耽于享乐的习气。可关于他的书籍却根本没有涉及这一点，或只是顺便提及而已。他的《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尤其是他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和优柔寡断，给我的印象不佳。国家正面临着危险，危险就体现在喀提林这个人身上，而他面对这样的危险却仍然犹豫不决。他的整个反喀提林演说系列实际上无非是一首冗长的哭诉和哀怨之歌。他竟用如此货色去面对那个最危险的人，那个阴谋篡权的祸首！不过，西塞罗在同一讲演中毕竟谴责了喀提林的道德败坏的劣迹。他是不是相信，如果他哀诉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一个道德沦丧、冷漠无情的人就会倾听他的抱怨，会因为他唱的哀歌而放弃自己的计划？我就不相信。当他对喀提林谈及元老院及公民的忧虑和恐惧的时候，这不恰恰是在为喀提林的计划壮胆吗？然后，他恳请喀提林（这是他演讲的主要内容）看在上帝的份上离开罗马。也许他认为，自己会引起喀提林的关注？不，恰恰相反，如果喀提林看到元老院和执政官摇摆不定，如果他想到西塞罗已经绝望到不得不亲自来乞求他，那么，他和他的同党一定会信心大增。西塞罗只是想要把喀提林一个人逐出罗马，这是何等鼠目寸光的策略！难道他以为，这样一来他就更容易对付其他阴谋家了吗？他就错了！这些阴谋家中有些人具有与喀提林完全不同的能力和才智。西塞罗亲口说过，他了解这些阴谋者，所以错不了。即便如此，对于曼留斯（Mallius）在费苏

56

57

里 (Faisulae)<sup>①</sup> 的暴动，他是知道的。即使他真的把喀提林逐出罗马，那又有什么用处？喀提林会直接投奔曼留斯的阵营，这样一来，国家面临的危险比喀提林留在城里还要大。难道他不能在城里把喀提林拘留起来，然后让人将他“干掉”吗？那些阴谋毕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怀疑他，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么西塞罗犹豫不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要等到没有一个人再能够为喀提林辩护了，他才让后者赴死。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难道西塞罗认为，如果他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喀提林的追随者就会弃他而去，不再为他辩护了吗？在这一点上，西塞罗是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喀提林的追随者一定会与日俱增，这也是西塞罗自己在演说中提到的。总之，我觉得他的《反喀提林第一演说》极为软弱无力，毫无意义，他用以达到目的的策略完全摇摆不定。我觉得他没有足够的毅力和精力，既不机灵，也缺乏伺机而动的能力。假如他在适当的时间逮捕了喀提林并将其处死，西塞罗就可以将曼留斯的暴动扼杀在襁褓中，这样，罗马共和国就可以避免在皮斯托亚 (Pistoja) 发生的那场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的残暴、血腥的内战。你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倘若你能抽得出时间，请来信给我谈谈你的看法和理由。如果我有时扯得有点太远，论辩中有点过于激愤，或者论述不是很清楚，请你原谅，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是以很快的速度、很潦草地写完这封长信的。

1878年9月

58

非常感谢你的前一封来信，你在信中认为我对西塞罗的评价过于轻率，是吧？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是你要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的。关于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你说得确实很对。但我不知道你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把读书的影响用在我身上是不是合适，因为你的信读起来好像是说，我在什么地方弄来一本书，抄袭了里边的内容，或至少是重复了我以前读过的某一本书里的内容。这难道不是你的长篇大论所要表达的要旨吗？你试图尽量以隐晦的形式表达这一要点，因为你以为我会为此而生气——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可以说你错了。尽管我绞尽脑汁在想，但直到现在为止始终无法承认，有哪一本书中或哪一个老师口中说出的哪一句话让我那么着迷。当然，我写得很快，从我笔尖流出的，有的东西确实不是我自己的思想。不过，我们年幼者通常在很大程度上要从你们较年长者（你当然应当被算作较年长者）所积累的财富中受益。不过我不知道我是否从拉丁文教师那里听到过任何一句关于西塞罗的性格和政治观点的重要评论。从书籍中我也没有汲取太多的东西，因

① 这里的人名地名拼写均有误。“Mallius”正确的拼写应当是“Manlius”，“Faisulae”系“Faesulae”之误。——英译注

为我只是最近才到一些重要著作（比如蒙森的《罗马史》）中去查阅那段时期的历史。我承认，一切都可能间接来自书本。如果书籍在人们弄不清楚的问题上不能给他们以启迪和指导，那书籍还有什么用呢？也许我对书籍，即对书中的格言警句和推理很敏感，对此你比我更能加以判断，因为在某些方面了解别人比了解自己要更容易一些。不过，我表达的看法——也许完全不对——并非直接来自任何一本书。除此之外，我对你的批评并无不满，因为我相信，在蒙森的书里确有很相似的东西。总之，我相信，自己关于西塞罗的看法依据的仅仅是那一段罗马史的知识。如果你通读西塞罗的前三次反喀提林演说，读他的每一句话时思考一下，讲演者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就会得出完全一样的结论。我钦佩西塞罗的雄辩，钦佩他演讲中漂亮的起承转合，以及他在语言和哲学方面的重大意义，但在其他方面我一点也不喜欢他。在读了他的《反喀提林第三演说》后就更不喜欢他了。尽管他并非毫无瑕疵，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他道德的纯洁也很值得称道。但把他同卡图卢斯（Catullus）或者加图（Cato）作一比较，得出的结论跟把庞培（Pompeius）或者毕布路斯（Bibulus<sup>①</sup>）同恺撒相比较是一样的。……

1878年10月25日

所幸的是，这种规定的阅读 [维兰德（Wieland）关于事物本性的诗] 并不是我唯一阅读的东西。我至少还读了其他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读起来也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首先是莪相的几篇作品，他最美的几个诗篇，我以前没读过。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莪相，现在已经没有很多人读他了。然而就语言和作诗而言，他的作品可以跻身于最优秀的作品之列。我倾向于将他置于荷马之上，至少与荷马比肩而立，尽管他与荷马相去甚远。他狂放不羁的诗篇一下就能抓住读者。如果读者用心去读，它们就会在他的脑海里久久萦回。下面的诗句就让我一时难以释怀：

59

死亡站在你身后，宛如夜幕降临  
好比渐自增辉的月亮背后  
那阴暗一半。

可惜我对诗通常并不很敏感。尽管如此，我以前读莪相的《芬格尔》（*Fianghal*），现在读他的《塞尔玛之歌》（*Lieder von Selma*）、《卡桑恩》（*Carthoun*）、《奥萨玛》（*Oighthama*）等作品时，仍然能感到从未有过的愉快。诗人让我们乘上急驶的帆船，飞掠过烟雾朦胧的水面，让我们于电闪雷鸣中迷失在怒吼咆哮的森林

① 应为“Bibulus”。——译者注

里，让我们顶着狂风暴雨跃马驰骋在雾气腾腾的荒原上。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荷马作品中那种快乐，只是莪相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而已：荷马带领我们在徐徐和风中，沿着翠木葱茏的海岸，遨游在蔚蓝色的海洋里，或者让我们坐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愉快地享用美餐。两个诗人都从长者的角度谈到过年轻人，但谈论的方式却极不相同。荷马从积极乐观的方面看待年轻人，莪相的看法则更像一个睿智的长者。莪相认为青春只有被看成一个梦才会是幸福的。所以在一首描写战斗的诗里，开头他就以忧郁的心情写道：

我们的青春像猎手的一场梦，  
灌木丛生的山冈上，  
温煦的阳光伴着他入睡，  
咆哮的风暴又将他唤醒。  
火焰般的雷电在空中飞舞，  
树梢在风中飒飒作响！  
他愉快地回想起  
阳光灿烂的日子，  
和静谧中甜蜜的梦。

60 从这首诗里不难看出这位年迈的北国诗人感伤、朦胧和激越的观点，同那位苍老的南方诗人单纯、开朗和宁静的诗作形成了对照。莪相的诗里还有另一处感人的地方，在那里，已届耄耋之年、双目失明的他悲叹自己再也看不见美丽的阳光了。不过，这远不是他真正的悲伤之处。他悲叹更多的是自己再也见不到桀骜不驯的芬格尔了，悲叹自己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臂力，丧失了年轻人的勇气。这同南方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在南方，人们把生命，把享受美丽的阳光看得高于一切。对古希腊人来说，生命的彼岸晦暗阴沉，充满恐怖。死去的英雄的命运就是在阴暗的下界里统治鬼魂。对于居住在意大利的古代印欧人来说，死亡至少并不那么可怕。他们和饲养牲畜的古希腊人不同，习惯于从土地里收获一切美好的东西。然而，对于北欧民族来说，死亡似乎既不带来恐惧，也不引起悲伤。死亡对他们而言好像常常是值得希冀的东西。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位诗人会如此不同地描写战争。在荷马那里，如果逃跑可以保存性命，那就不应当被视为是可耻的；莪相则认为，如果只有逃跑才能避免死亡，那么就应当选择死亡。——亲爱的弗里茨，如果我又在这里喋喋不休，请你原谅。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因为我急匆匆写得太多，一发不可收拾，很容易就拖得过长。……

1879年12月19日

通过阅读这些信件，海伦妮对自己长子的精神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但仍然让她担忧的是，这颗年轻的心并未对她敞开——尤其是他行坚信礼的时期，海伦妮更是加倍努力设法同他的心灵进行交流。学校的课程只是循规蹈矩的说教，像马克斯这样一个如饥似渴的求知者完全学不到什么东西。他并没有表现出不恭，但似乎有些无所谓的样子。一年后，他迷上了一门宗教史课程，教授这门课程的是一位颇受尊敬、“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师。为了研读《旧约全书》原文，马克斯还自发地学习了希伯来语。

在马克斯行坚信礼之前，他的母亲试图用自己的宗教热情感染他。“上个星期天，我有点空闲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让小马克斯给我读里夫（Riff）牧师（一个有独到见解的阿尔萨斯人）一篇题为《礼拜日》的布道演讲。起初他并没有兴趣，说是宁可读一点历史书籍，读点歌德或者但丁，但他后来还是读了，我注意到演讲所具有的现实而又很有力度的风格攫住了他的心灵，引起了他的兴趣，激发了他的思考。”就这样，她带着忧虑的心情竭力想让儿子对自己所熟悉的那个世界感兴趣。但她一定痛苦地感到，自己十五岁的孩子并没有深厚的宗教激情，他甚至在逃避母亲的影响。她感到一筹莫展，为此非常痛苦。

61

越是临近马克斯行坚信礼的时间，我越是看不出马克斯的整个成长阶段对他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影响——那种能够激发他去思考自己应当在神坛前作为自己的信念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的影响。最近，我又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试图引导他说出他在想些什么，谈谈他对于基督教意识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和感受。我跟他谈到，每个人，尤其是有思想的人上了坚信礼课程之后，都得思考并弄清楚诸如灵魂不死的信仰、掌管我们命运的上帝的无限恩惠等问题。起初，他对此显得十分惊讶。我自己内心如此热切地感受着对我来说已经成为最有生命力的信念（虽然这些信念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可是，最亲爱的伊达，我却无法用能够给他留下某种印象的方式将这些信仰向我的孩子表达出来！“小小泉眼亦能止渴”，弗里茨称赞这句俗话并不错，可是泉水得流才行啊！……要让我在这个问题上放弃努力，让别人、让时间或者人生经历去影响马克斯，这令我难以接受。

显然是应海伦妮的请求，比马克斯年长的朋友弗里茨也试图进入马克斯封闭的内心世界。从马克斯的回信可以看出，他了解自己的性格特征，明白自己为什么让母亲这么伤脑筋，这也许让海伦妮稍微放下一点心来。

你问我关于我的坚信礼课程的问题，同时也给我讲了你自己的坚信礼课程给你留下的良好印象。我们这里有一个正当盛年的牧师，但这并不见得对讲授坚信礼课

62

程有什么好处，因为一个老先生也许精力有所不逮，但其威望可以弥补这一点，因为总有那么一些愚蠢的家伙，欲以他们幼稚的举动搅乱课堂而后快。我想他们不敢对一个令人敬畏的老先生这样做。另外还有一件蹊跷的事情，除了几句《圣经》里的句子之外，这个课程几乎完全没有家庭作业，对这些《圣经》里的句子，多数学生也是敷衍了事。对于那些嘲弄宗教的人，你的看法确实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的确相信，一个人如果坦承自己绝对没有什么信念，对于彼岸世界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因为像这样没有任何希望地踏上人生旅程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在走向彻底的陨灭，这种陨灭意味着生命将永远不复存在，这肯定是一种可怕的感觉，让人丧失一切生存希望。当然，每个人都会心存疑问。我认为，恰恰是这种疑问——一旦被解决——能够使一个人的信仰更加坚定。你描写了行坚信礼时感受到的令你震撼的印象。相信我，我明白自己的生命正处于一个多么重要的转折点。不要因为我在给你的信中还未提及或者还没跟你谈过此事，就认为我没把它当回事。我觉得，难得与别人交流感情是我的天性使然，这样做常常让我勉为其难。我通常只是独自享受每一种欢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感情就因此而淡薄。如前所述，我只是很难和别人谈论这类事情。甚至我所思考的东西，也常常不愿给别人讲，以致有被人认为完全没有思想之虞。由于同样的原因，我的社交能力很差，我自己也痛楚地意识到，在同别人的交谈中我显得很笨拙无能。这是我的一种缺陷，到现在为止我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未能弥补。

后来的一份文献（一封谈及马克斯弟弟的坚信礼的信）表明，成年仪式的庄严肃穆打动了（尽管并不是以他母亲所希望的方式）马克斯的心。

63

坚信礼有其特别的地方。这样一种庄严的仪式确实打动了我，因为那时我把这一时刻视为我生命中的一个篇章。至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篇章、它的实质是什么，我都无法做出解释，因为很自然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其他什么显著变化。……因此，要给一个我们这一社会阶层的年轻人讲清楚坚信礼的意义和重要性，并非易事。对我自己来说，这意味着我正式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团体，对于这个团体的理论学说和观念，我早在上坚信礼课程之前就了解了。很自然，人们会去找寻这一仪式的实际意义。然而，一方面，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完全没有资格在这个领域里活动……另一方面，一个人只有通过其他机会才能理解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因此，对于一个将要行坚信礼的人来说，要了解这一天对他所具有的意义，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一个人不能要求太高。



马克斯行坚信礼时接受的经文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几乎找不出任何更好的经文能够表述支配马克斯一生的律法了。

※ ※ ※

海伦妮也努力想让她的几个小儿子在自己生命的那片土壤里扎下根来，徒劳无功的结果让她同样感到痛苦。关于阿尔弗雷德她写道：

我注意到，他感到非常痛苦，急躁而又固执地想要抓住一切机会，以证明每一种别的观念至少同基督教一样有其合理性和真实性。后来他给我谈到斯特劳斯的《耶稣传》（*Das Leben Jesu*）和康德哲学。我站在那里，既担忧又悲哀，感到爱莫能助，因为我在关键的时候拙于言词。尔后，他也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不能理解和帮助他，这真让我难以忍受。……不过，他在其他事情上要容易沟通得多，有时候他会来给我读点什么。唯一不幸的是，我晚上真是困倦得不行。

这个小儿子至少在成长时期遇到困惑时还向妈妈咨询，大儿子则天生就习惯于独自承受一切，让人看不出他内心是否有冲突。看来他越是意识到海伦妮的努力，就越是把自己封闭得更严密。后来他自己说，那时候他的心既叛逆又沮丧。但海伦妮的一颗爱心不会被吓住：

我总是把茶点前后的时间空出来，好让马克斯（除此之外我一天中完全抽不出别的时间来用在他身上）能跟我说说话，或者给我读点什么，以让我能够窥见他的兴趣所在。他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考虑到我们的秉性如此不同，我必须好好想想办法，不让这孩子在心里跟我疏远。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他绝不同我进行理性交流的原则现在似乎有了些许改变。我现在要让他不知不觉地继续这样做下去。

1880年

海伦妮迷人、优雅、充满爱心，尽管她内心很严肃，但富有生命力、幽默感和生活乐趣，并且一心扑在孩子们身上，为什么这样一个女人却不能同自己处于生长期的孩子们相互沟通呢？原因在于，孩子们并没有真正把她看成是自己信得过的益友。她的大儿子马克斯——海伦妮叫他“老大”——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同母亲的关系。照他的说法，他的戒备心态应部分归咎于自己那时潜在的知识傲慢。确实，对于这个早熟、智能优异的孩子，他母亲提供不了什么知识，他的心就像蓓蕾一样把自己紧紧地包裹在其

中。他还不能体会到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此外，海伦妮夫妇二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显然也有失误。二人都还太年轻，过分囿于传统的家长权威，因此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早熟的、天赋高于自己的孩子。恰恰是家里的老大通常要接受父母过多的道德规劝和暴躁的苛责。学生时期的弗里茨·鲍姆加藤曾对家住海德堡的外祖母谈了他对这个家庭各个成员的印象，其中提到小马克斯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谜。外祖母回答说：

65

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夏洛腾堡。海伦妮的确非常可亲可爱。才三岁的时候，她优雅的神态就着实让我着迷。这些年里，她不管在形体还是在精神上都没有改变，倒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更加理智了。我也可以想象，你姨父会怀着由衷的善意、热烈的情绪跟人争论和**管教**孩子——包括你在内。那里的一切都很简单，不过，他们家里不仅是父母，连孩子们也都各不相同。至于小马克斯，我认为他是一个内在情感**强烈**的人，有些**内向**。但他智能很优秀，也有良好的意愿（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惹他生气的话）。我们去年夏天去他家时，到酒窖里去拿佐餐葡萄酒总是他的事，他也愿意干，但当他拿得不太对而遭到斥责时，他就有些愠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有所改变的。他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在埃尔富特我看见他独自一人可以玩上好几个钟头。那时他真是可爱极了。我们每天都去散步，他会想出一些极新颖的主意。我觉得（这是我们私下里说），对这个孩子需要多付出一点**爱**，这样他才能放开自己。

老韦伯要求享有思想上的权威，并不能真正容忍年轻人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争论的时候，他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海伦妮则不同，出了问题她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因此而感到痛苦：“造成我偏头痛的部分原因就是心情沮丧（想着我在做某些事情时选择的方法对不对）和心理疲劳（这使我想起一句诗：‘啊，我厌倦了这样的忙忙碌碌’）。”

关于自己和小儿子的关系，她讲了一段话，从中我们可以揣测到她在什么地方没有做对，而她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得不对：“我总是在问自己，如果我竭力想让他某一方面有所改变，我的方式是不是又不对？他会不会也像马克斯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这就是问题所在。她想让孩子们在这么多方面有所改变，却没有意识到，尽管她自己如此谦卑，却完全是在步自己父亲的后尘，即竭力按自己的模式塑造孩子的心灵。她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是出于她对绝对律令的认识，她认为自己是在按神圣法则行事。

这样，她一方面通过以身作则，一方面直接提出要求，要将一种思维方式和道德情操强加给孩子们，而孩子们在他们那个年纪，又具有他们各自的性格，对此他们既不能

理解，也无法做到。她期待着从这些还十分稚嫩的小树苗上结出某一个品种的果实，而这些树苗也许根本就是另一个品种的果树。此外，她还喜欢对孩子进行道德说教，有时甚至当着陌生人的面对他们加以斥责，生性敏感的长子对此非常反感。加之她对每一个缺点和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都过于在乎，这就更激发了长子同母亲的暗中对立。结果，她自己这个榜样成了一种负担。孩子们暗地里将自己同她这个榜样做了比较，认为她的理想不可企及。这些半大孩子们采用了对立的方式来摆脱自己的自卑感。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就出现了：这位让众人——无论老幼——如此着迷的女性却无法给自己成长中的孩子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无法让青春年少的孩子们向她敞开自己的心扉。尤其不幸的是，从她心中喷涌着的爱无法打破长子的孤独。

不过，马克斯天性中丰富的感情已经不时露出了端倪。他非常疼爱弟弟妹妹，蛮有兴致地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善于给母亲写信谈及他们，知道这些信一定能让她感到高兴。例如，1879年母亲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海德堡度假，马克斯给她来信说：

我现在在这里非常想念克拉拉和阿图尔。有时坐在下面我的房间里，就仿佛听到外面花园里传来他们欢快的喊叫声，但那只是夏洛腾堡大街上的孩子们给我造成的既愉快又难受的错觉。这个家现在好像总那么死寂——仔细想起来，几个肺活量很小的孩子弄出的吵闹声确乎不小。当然，阿尔弗雷德在试图用他自己的公鸭嗓子来弥补这种缺失的喧嚣。其他一切都好。我们去上学，我们也瞎闹腾，生活很有规律——可以说比以前要安静一些。这里变得更加富有田园意味了，如果说夏洛腾堡也蕴藏着诗意和田园意味的话——我倒是宁愿同你们一起在海德堡置身于喧闹和吵嚷之中，而不愿在夏洛腾堡身处诗意的静谧之中。

※ ※ ※

在那些年里，家里这个“老大”还不清楚是要做父亲还是母亲那种类型的人。他已经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旦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总有一天他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母亲身上，基督教福音的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富有奉献精神的爱心和鞠躬尽瘁的精神是她的第二天性，但她同时又坚持令人烦累的英雄主义原则，始终不渝地用道德力量去克服过于繁重的日常劳作，绝不“安于现状”，冷静地赋予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以永恒的意义。她做事情总是热情地投入，总是精神饱满地处理每天的日常家务，兴高采烈地接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她笑得是那么无拘无束！但她每天都潜入心灵的深处，总是停泊在超自然的神灵的港湾。

马克斯的父亲非常正直，在政治上和工作中完全无私忘我，而且精明、温厚、热

心、和蔼可亲（如果事情进展如他所愿的话），但他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满足于现状。他从根本上拒绝承认生活中的严重问题。进入盛年后，他喜欢保持内心生活的闲适安逸，对苦难视而不见，也缺乏同情心。他的自由派政治理想未能付诸实施，那些能够激发他为某一事业献身的新意识形态又无法唤起他的激情。他快乐而且性格开放，迷恋自然，随遇而安；他总感觉自己是一个万事能成的幸运儿，相信每次踏上旅途都会有艳阳高照；他能够而且乐于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他所有这些性格都预示着他会成为正在成长中的儿子们的良友。虽然他把抚养孩子一事基本上交给了他们的母亲，但他常和孩子们一起漫游和旅行，因而给了他们难得的灵感。在旅途中他最可亲可爱——他会为了孩子们而放弃惯常的舒适，与孩子们在一起也让他焕发了青春。

68 这对父母不是正好能以最理想的方式相得益彰吗？由于父亲的秉性得以让儿子免受自身不足所造成的不自在的感受，儿子不是很自然地会偏向父亲吗？当然，韦伯的父亲还不太懂得如何做他早熟的儿子的“良友”，因为他是一个坚持传统家长制的父亲，自身的优越感过于强烈，坚信自己有不可被剥夺的受到尊重和享有权威的权利。他的有些特性，诸如让妻子伺候自己的方式，遭到孩子们的私下非议，尽管他们自己也效仿他。父子之间在感受方式和表达形式方面的差别很早就显现出来了。例如，马克斯十七岁那年第一次随父亲去意大利旅行，在威尼斯（Venedig）他突然要求独自回家，因为他父亲期待着他表现出激动的情绪，对此他觉得不能忍受。不过，这位年轻人那时还是觉得，同母亲相比，自己与父亲在性格上要接近得多。

# 第3章 大学生生活与服兵役时期

## 1

69

1882年年初，马克斯·韦伯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也帮助他的朋友作弊混过了关。学校老师都证实他的知识广博——只可惜这些知识不是通过在学校用功而获得的，但怀疑这个不太好教、内里自傲不恭的年轻人道德上是否成熟。未满十八岁的韦伯上了海德堡大学，他瘦高个儿，四肢纤细，双肩下垂，整个儿一个“肺结核易患者”的样子。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也同样强烈地渴望成为一个健壮有力的“小伙子”。他在一个当时叫做瓦尔德霍恩（Waldhorn）[现在叫舍费尔豪斯（Scheffelhaus）]的旅店里的房间里，紧靠着外祖父家的宅院。在那里，他愉快而毫不伤感地品尝着美和自由。在他给父母的信中，你可以读到柏林式粗俗的幽默和向世界敞开心扉的生活乐趣。

跟他父亲一样，他也选择了法学作为主科和职业训练方向，此外还选了历史、经济学和哲学课程。很快，只要是知名教授开的文科课程他都上。他上了名望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伊马努埃尔·贝克尔（Immanuel Bekker）教授的“罗马法：《学说汇编》（*Pandekten*）和《法学总论》（*Institutionen*）”，自己啃下了《法典大全》——“开始时读起来很吃力”。这位初学者原想在经验—教义学领域内找寻已经得到证明的既定真理，而不是聪明的假设，所以对这位法学者带着批判精神的怀疑颇为反感。

70

贝克尔提出了太多的争议和质疑，而鲜有定论。在每一点上他都得发现，制度的实行在这里完全滞后了，法庭还没有确定的判例，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的看法如何，伊林（Ihering）的观点又是怎样，不一而足，但他却没有提出一个自己的观点，让人在熟悉原始资料之前可以暂时把握住。如果恰恰是在一开始应当做出重要决定的地方，你只是搪塞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白，那么这就使得法律显出不允许有的过于强不稳定性，大大贬低了人们在法学建构方面做出的伟大成绩。

老资格的教授科尼斯（Knies）讲授的经济学课程枯燥无味，韦伯上他的课时起初也受不了。他是通过阅读罗舍尔（Roscher）和科尼斯的著述而掌握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的。相反，埃德曼斯多夫（Erdmannsdorfer）的“中世纪史”和他开的历史研讨课却让他着迷，他很快便接受了在研讨班做一个专题研讨报告的任务。此外，他还读了兰克（Ranke）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和《现代史学批判》（*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这两部著作文风殊异，我起初觉得没法读。要不是我熟悉史实，恐怕就读不懂。他的语言令人联想到《维特》（*Werther*）和《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的语言。”

韦伯在高中就打下了哲学基础，在大学他试图通过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的课程来扩充自己的哲学知识。他早上七点钟就去上菲舍尔的逻辑学课，却发现从中学到的关于黑格尔的概念唯实论知识不足以弥补他一大清早就得起床所花的精力：“我恨这个迫使我六点一刻就得起床的人。”这个青年学生容不得半点让教师自我炫耀的虚荣。直到第二学期上哲学史课程时，韦伯才不光有批评，同时也伴随着欣赏。

韦伯的求知欲并没有妨碍他去体验学生生活的其他方面。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都来邀他加入。但其中学生联谊会很快就让他产生了反感，因为他们许诺要帮助他在“事业上发展”。一开始他来者不拒，接受他们的邀请，同他们一起过得很愉快。上午在逻辑学和法学课之间，他利用“阿雷曼人（Alemanne）社团”（他父亲曾是该社团的成员）的击剑室，“匆忙”地锻炼一下。他保持着同该社团的交往，从那里观察到了一些他日后派上了用场的东西，不过他暂时还没有兴趣加入该团体。

71

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社交机会。邻近的外祖父家里，现在住着豪斯拉特一家。韦伯的这位姨父豪斯特拉虽有些厌世，而且其秉性让他越来越变成了隐士，但他才气横溢且享有盛誉。豪斯特拉对这个聪明的外甥很有兴趣，喜欢给他讲一些不得人心的同事的劣迹或者种种时弊。他的妻子亨里埃特，也就是韦伯的母亲海伦妮的姐姐，也像海伦妮一样具有极其丰富、热情和内涵深邃的性格，她很快就获得了韦伯的爱戴和富于同情心的理解。此外还有豪斯拉特家的孩子——他的表兄弟姐妹和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以及年长韦伯好几岁的奥托·鲍姆加藤（Otto Baumgarten）——伊达的次子，他在海德堡

学神学已经进入最后一个学期。奥托不受神学教条约束，思想非常活跃，做事很有条理，为人处世也很成熟，他很快就把年轻的表弟韦伯吸引进了他感兴趣的宗教领域。韦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甘愿接受了一个年长且学识优于自己的朋友的影响。他们中午一起用餐，晚上一起读神学和哲学著作，诸如洛策（Lotze）的《人类世界》（*Mikokosmos*）、柏拉图的思想、比德曼（Biedermann）的《教义学》（*Dogmatik*）、斯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普弗莱德勒（Pfleiderer）的《圣保罗神学》（*Paulinismus*）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宗教讲演录》（*Reden über Religion*）等等。马克斯去听了奥托的实习布道，甚至还同奥托一起读奥托的同学的讲道。马克斯在家信中谈到了他们共同阅读的经历。

斯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不过是些你自己大约都能弄清楚的东西。他本来就是要写一本代表自由思想家世界观的袖珍百科全书，因此很多地方必定会显得相当浅显。施莱尔马赫的《宗教讲演录》我还没有怎么读透，暂时还谈不上什么印象。毋宁说，它给我留下的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或者说，尽管我大概了解他的意图，但其古法兰克和西塞罗式的风格让我难以理解这部作品。但我仍然急于进入他的主要论点，绝对没有忽视他字里行间透出的极大的宽厚善良。普弗莱德勒的《圣保罗神学》毫无疑问非常有趣，从导言就已经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重要性。

几个星期后，他们放弃了阅读洛策，“对他缺乏科学性、愚蠢地追求诗化、无聊地玩弄情感哲学感到很生气”。于是他们开始读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72“这本书的论证方式非常冷静客观。在经历了洛策的杂乱无章——除了几处非常优美的段落之外，只能用杂乱无章来描述他的体系——之后，这本书让人感到清新。”

法学、经济学、历史、哲学、神学……如此广泛的求知欲使他一天无暇他顾。所以他很快就制定了一天的作息制度。不过，由于他参加学生团体的活动日渐增多，这个制度自然就常被打破。

早上七点的逻辑学课逼迫我起个大早。然后我每天早上都在击剑场地里忙活一个小时，之后认认真真地上完我的课。十二点半我在附近花1马克<sup>①</sup>吃午饭，有时喝四分之一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后常与奥托和旅店老板伊克拉特（Ickrath）先生玩

---

<sup>①</sup> 现在1马克约为4.26元人民币。1882年1马克的价值显然高于现在的1马克，当时一个大学教授一年的工资为5 000~10 000马克。——译者注

斯卡特牌，一直玩到两点——奥托离了斯卡特牌简直就没法生存。尔后我们便回到各自的住所。我把课堂笔记过一遍，然后读斯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们有时去爬山。晚上我们又聚在伊克拉特那里，花80芬尼<sup>①</sup>吃上一顿很不错的晚餐，然后照例一起读洛策的《人类世界》，关于这本书我们进行了最为激烈的争论。

韦伯天生善于模仿人物、事件的特征，并将其编成活灵活现的趣闻逸事，他不时应邀到教授家里做客，这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73 圣灵降临节放假期间，韦伯随表兄奥托去了后者在斯特拉斯堡的家里。那段时间，有一条精神的纽带将他同鲍姆加藤一家连接起来。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讲利夫(Liff)牧师的圣灵降临节布道，他幼年时曾不得不给母亲诵读的就是这位牧师的讲道。这封信表明，奥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使韦伯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当时还不清楚，他是真的受到了宗教的感召，还是只是对宗教这种精神现象怀有炽热的兴趣，但并没有对宗教本身着迷，因而只是带着某种距离感接受这一切。他当时对于基督教“本质”作何理解，可以通过另一份资料看出一点端倪。就在那几周里，住在比勒费尔德的祖母去世了，她的大龄未婚的女儿也因此而落了单，孤独于世。深深感触于姑母的命运，十八岁的韦伯写信给母亲说：

若一个人在安葬另一个人时同时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自己的内在生命也随之埋葬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无限悲哀的场合，除了切切实实让这个人感到你的同情和敬重之外，还能对他说什么呢？况且这个人年龄、阅历和内心修养都远在我之上的姑母，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你只能说希望那人的信仰能够让她节哀，但愿她的希望（不管这希望是什么）给她带来慰藉。你也可以对她响亮地说出这样的良言佳句：“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马太福音》，8：13）我认为这句话代表了基督教的真谛和真正的宽容。这是我给姑母的唯一祝福。我知道，这里面包含了我的一切祝福，因为她心中的信仰本身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能够抵御一切外部的软弱。

※ ※ ※

韦伯在海德堡的第二个学期，奥托已经离开了。于是比较普通的人和比较世俗的

---

① 芬尼为德国货币单位，100芬尼为1马克。——译者注



兴趣便占据了韦伯的闲暇时间。实际上，他似乎转向了他性格中的另一极。他同“阿雷曼人社团”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与他们共进午餐，每周两个晚上参加他们在小酒馆举行的例行酒会。他越来越过着一种典型的大学生生活。第三学期，他参加了例行的大学生决斗比赛，获得了勋带。这时他已经全身心投入到快乐的大学生生活之中，成了一个有趣的伙伴，很快便以酒量海量闻名。在那时并非小事一桩，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灌酒而不失态，这属于有自己服饰佩带的学生社团成员（Kouleurstudent）训练男子汉的一项内容。此外，这学期伙食一周比一周差，也迫使他们喝的啤酒越来越多。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他的体型很快就完全变了样。他来上大学时的愿望圆满实现了！他体态的膨胀比知识的增长还要显著。他那细挑瘦长的身材变得宽厚粗壮，且有肥胖的趋势。当他母亲第一次看到他的这种变化和他脸颊上横着的一条击剑留下的伤疤时，这个精力旺健的女人简直无法表达自己的惊骇，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其他方面，韦伯的变化也不尽如父母之意，尽管他并没有十分荒废自己的学业。学生社团的“义务”、社团的服饰（如红帽和礼服）、小酒馆里饮酒、节庆酒会、击剑旅行以及他旺盛的食欲使他的用度大大超出了家里每月寄来的生活费。这个天生压根儿不会节省用度的学生不得不常常向父亲要额外津贴，这让后者着实烦恼。尽管这样，他还是不得不举债，而这不过是继承父辈的传统而已。一方面，社团成员必须交会费以偿付债务——这些债务产生于“老一辈会员”在社团创立纪念日或类似活动中享受快乐的花费；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社团到处都可以得到信贷，因而借贷几乎成了一种“代表身份的习俗”。午餐费、鞋帽费、车马费通常是在几年之后连本加上高额利息一并偿还。韦伯也是这样，所以即便他后来在大学里已经不再参与学生团体的活动了，他的收支也始终没有平衡过。

不过，参加学生团体的活动不仅改变了他的外形，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内在气质。他那个社团很小，所以每个成员都感到有责任维护社团的声誉。社团成员之间的交往不是热情友好，而是冷若冰霜。友谊被认为是缺乏男人气概的同义词。他们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都密切关注着其他人的举动。他们相互批评，也有摩擦——一切都遵循男子汉理想行事，这个理想最看重的就是行为举止讲究正式和规范。唯一富有诗意的活动是在一起唱那些美妙的校园歌曲和爱国歌曲，这些歌曲的旋律伴随着韦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凡是在这个团体中站得住脚的人都会感到，同团体外的人比起来，自己最安全、最优越，也最自豪。这个团体有一条应对一切局面的法则：“问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坚信，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某种决斗来解决。”后来回顾这段时间对自己的影响时，韦伯断言：“学生社团里和做士官时那些培养‘大胆果敢’精神的例行训练，毫无疑问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消除了我少年时代明显的羞怯和缺乏自信的心态。”

# 2

1883年秋，韦伯搬到斯特拉斯堡以完成服兵役的义务。鲍姆加藤和本内克两家也是他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经历了三个学期的在学生社团的开心、自由的生活之后，这种新的男人的生活方式起初对他自然缺乏吸引力，尤其是勤务和训练让这个十九岁的学生感到很吃力。除了击剑之外，他在体能训练方面都显得有些笨拙。由于他体形过于粗壮，库存的军服里竟然找不出一套合身的军装来，最后他只好将自己硬塞进一套炊事兵上士的制服里。他的脚和脚踝过于纤细，难以支撑他沉重的躯体，坚持不住好几个小时的训练。他母亲具有坚强的性格，要求不仅要从“你应当”，而且要从“你必须”（理由就在于这是一种必须要做的事）的律令中看到积极的一面。她绝不会承认，必须做的事情真的会令人不快。对于母亲提出的一个诱导性的提问，韦伯没好气地回答：“照你坚信的看法，我现在对自己眼下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已经有某种良好的感觉了，但就目前而言，你的看法让我难以相信。不管怎么样，即便你说的那种感觉存在，那也一定是被另外一种感觉给压住了，而造成这另一种感觉的原因就是，我每天得拖着肿胀疼痛的脚踝奔波七个钟头。”

然而，比身体不适更让人感到压抑的，是军营大院里愚蠢至极的操练和不得不忍受的下级军官的凌辱。尤其是，他很快就意识到，继续正常的学习是不可能的了。“我九点钟回家后，现在常常很快就上床睡觉。但是一时又睡不着，因为眼睛并不累，人的脑76力完全没有得到使用。从一早开始，我就有一种逐渐坠入令人极度痴呆麻木的黑夜的感觉，这种感觉逐渐加深，直到一天的任务完成。实际上我感到最难受的就是这种感觉。”他获准去听鲍姆加藤的历史研讨课（这是他唯一获得的批准），这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应当如何对付这种似乎没完没了的生活呢？最初好像除了招魔驱鬼外别无他法。这个要服一年兵役的学生采取了一种奇特然而肯定是相当无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几周他很早就上床睡觉，现在则同难兄难弟一起去小酒馆饮酒，喝到半夜，然后回家，沉沉地睡去。早上空着肚子跑去出操，处于一种神志恍惚的梦幻状态，即所谓的“宿醉”状态，这帮助他“熬过了不是以千计而是以百万计的纯机械动作的重复。只觉得时间飞逝，因为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半点思维活动”。在家里，女房东给他准备了浓浓的黑咖啡，借此他可以暂时恢复常人的状态，直到他被激活的精神力量的残余又被下午的训练吞噬。他父母来信责备他信写得越来越少，他把这归咎于军营生活给他造成的奇特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

这种状况让人的思维能力消失殆尽。上午我们要背上背包，穿上大衣，带上炊具进行五六个小时的野外训练。完了之后，下午我总要躺在床上休息。晚上虽说已经精疲力竭，但仍然能够享受阅读巴克爾（Buckle）、吉本（Gibbon）或比德曼的乐趣。可是，如果我们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进行“操持枪械”的训练和长途行军操练（这现在已经成为常规），再加上集合点名、擦枪、训导以及完全没有必要的各种各样的类似杂务，那么，虽然我的身体不会过于疲劳，但是脑子却完全无能为力了。任何一点思维能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任你给我什么样的奖励，也无法让我振作起来写封信或者做点工作，所以我只是坐在靠背椅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什么也不想。真的是万念皆无，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只是这样坐了一小会儿，可一看表，才发现整整三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脑子居然没有转动一下。

77

不过什么事都是可以学的。挺过了新兵阶段之后，他的身体适应了部队生活，耐力超过了大多数服一年兵役的人。然而，他的体操项目却糟糕透顶。一个来自柏林的军士说：“天哪，这简直就像上万升的普朔尔啤酒（Pilsch）在单杠上晃悠。”但另一方面，他走的正步准确优美，甚至博得了高一级军官的赞赏，他自己也不无自豪感；他在野营训练的行军中也表现突出。不过，他对夜间执勤有很大的怨气：“夜里穿着湿透了的衣服，在大冷天四处巡视，真是不堪忍受。我总有一种似乎在发高烧的感觉，而后感到酸懒无力，去执行任务时，总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坚持下来。”

他一直最反感的就是“极度的浪费时间，把时间用来将思维着的活人训练成以自动化的精确度对指令做出反应的机器”。

那些服一年兵役的志愿兵参与各种各样毫无目的的活动，在那里站三刻钟到一个小时，无所事事地观望——人们把这叫做“军训”！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培养“耐心”。我的天啊！我们在经历了三个月每天数小时的操弄枪械，经历了最令人讨厌的恶棍们不计其数的傲慢凌辱之后，居然还会被怀疑自己遭罪是因为缺乏耐心！对那些服一年兵役的志愿兵，原则上要消灭他们在服役期间从事思维活动的可能性，据说这有利于提高军事素质。

韦伯尽管怒火中烧，但仍然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实际上思维被关闭之后，身体的动作协调更为精确。

不管怎样，韦伯达观且有幽默感，喜欢观察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和新的人物类型，这些都有助于他——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积累经验，假如错过了这个积累经验的机会

78 会，他以后会因为不能满足自己了解现实的渴望而后悔。每一件事情都能给他提供对人的特性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和观念如何塑造这种特性的生动、形象的认识，而且他能从很多东西里提取有趣的逸事素材。那些普鲁士的军士、少尉、波兰新兵和来自工人家庭的服三年兵役的军人的类型，人们在军营里、哨位上和野营训练中的行为表现，所有这一切的特征都被他在信中寥寥几笔勾勒出来，并储存在自己求知欲强烈的脑海里了。

刚训练回来就看到了你的来信，因此，我不想继续写那封八天前开始写，后来一段一段地加，现在已经写了三页的信，而是重新开始写一封。感谢上帝，我今天除了去听姨父的课之外还有空余时间，看来我今天可以写完这封信了。过去的一周半，操练和野营训练项目尤其多。我们举行了好几次每次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野外演习，有时还要到斯特拉斯堡几里之外的地方举行。只要一想到这些演习，我就又感到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如果将其视为换一种训练方式，这种野营训练不啻为一件令人称心愉快的事。可是长时间练下来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作为军事演习和战争本身的预演，这种野营训练在极大程度上要求参加者具有一个士兵所应有的一切素质。野营训练大体上是这样进行的：凌晨，四下里几乎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就戴上钢盔，背上背包、炊具、干粮袋，穿上军大衣，列队开拔。一开始诸事顺利。第一个星期戴着钢盔还很有些不适，现在已经习惯了；那双沉重的军用大皮靴的情形也是一样。现在要是不戴钢盔而是戴着帽子，不穿大皮靴而是穿一般的靴子，你就总会觉得——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好像光着头、只穿着袜子在走路。同样，那个（还未装东西的）军用背包起初也并不起眼。但时间一长，你就会觉得军大衣缠着你的胸，背包像一根香肠一样挂在那里，让你觉得不舒服。如果你的胸膛宽广一点，军大衣就会紧贴着右腋窝，严重阻碍呼吸，同时也弄得左肩上扛枪很困难。然后，你就会开始注意到那两个装满空包弹的沉重的子弹袋，每走一步，子弹袋都会重重地压迫腹股沟区。最后，你会感觉到军用背包的底部的棱角压迫着骶骨一带，行走几个钟头之后，它们便成了令人很难受的累赘。

79

其间也有一些妙趣横生的乐事。例如，在野营训练期间，除自己所在连队的少尉在场，还增添一个从别的连队来的中尉任全连指挥，而两个尉官有些互不待见的时候，这种乐事就会发生。行军时，中尉骑马走在右边，少尉在左边。然后你就听见左边在喊：“走在边儿上的那个一年兵，步子迈大点儿。”右边随即传过声来：“那个一年兵，别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马都快要追不上您了……”左边在叫：“那个一年兵，该死的家伙，您牵拉着脑袋干什么，鼻子都拱到粪堆里去了！”右边又喊：“一年兵韦伯，天打五雷轰的，您这样昂着头干什么，好让太阳把鼻孔晒干还是怎么的！”左边一个责难：“那个一年兵，您的佩刀又挂到前面肚脐上了！让魔鬼大口

把您给吞了吧，把佩刀推回到后面去！”右边一个找茬：“瞧您那一身贼肉，那个一年大兵，您的刺刀挂在屁股后面，活像一头白象长出的尾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你来我往，这两位先生就以这种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开始时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不过现在他们待我们要好多了。

不管怎样，等到终于走出城门后，大家都感到高兴，因为不需要再“齐步走”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舒适地便步行进。大家都没有吃早饭，随后便陆续把吃的东西拿出来。干粮袋里有三明治，旅行袋里有烧酒，子弹袋里只要有空当，便会装有香烟。滑膛枪手们自然也要求有他们的一份，也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多数来自埃尔夫特和施瓦茨堡，此外还有很多波兰人，其中有的直到到了这里之后才被军士们强迫着学了点德语。过一阵子，你就会听到那种比较特别的士兵歌曲，里面总会有押韵的词句，如“Deutscher Rhein”（德国的莱茵河）与“Branntwein”（烧酒）押韵，“Vaterland”（祖国）与“Schnaps zur Hand”（烧酒在手）押韵。

我们终于到达了演习的目的地。经过一番巡视，弄清了敌人的阵地之后，我们便开始前进。走到一定的距离，整个队列就分散成所谓的散兵线，就是一种散兵队形。我们以一种相当灵活轻快的步伐继续前进，直到一声令下：“卧倒！”只听得“吧唧”一声，大家都背着全副装备腹部着地倒下，深深地摔进烂泥里。然后是大量射击空包弹，枪声响成一片。想到德意志帝国必定还有大量剩余钞票来负担如此昂贵的消遣方式，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然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前猛冲一阵，随后又卧倒——自然又正好是扑倒在水坑里、污泥中或者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污秽的东西上面，接着又是哒哒哒的枪声大作。敌人骑兵的进攻被我们漂亮地打退了。绝杀的排枪齐射开始了：“瞄准！放！——啪啪啪！”就在同时，你的两耳被震得几乎要聋了，因为身后的两个蠢笨的新兵正好把枪口架在你的肩上。这时，尉官们可以尽管发布命令，只是他们的命令听起来好像是远处的狗舍混不清的哀鸣。

交替着跑一阵又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一阵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插上刺刀在火力掩护下发起进攻了。伴随着一个鼓手“嘣！嘣！嘣！”单调的鼓点，我们先是慢慢行进，而后越来越快。最后，整个一大群人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发出一阵动物般的嚎叫（那大概意味着“叫好”的欢呼声吧），冲进敌阵。当然，冲锋时常常有人被奔跑的士兵撞倒，手被别人践踏，脑袋被枪管撞击，或者是膝弯处被身后那人的刺刀扎伤。此时，参加演习的军官骑着马在后面怒气冲冲地发出无数简短的命令，自然，没有任何人听得懂他们在嚷些什么，最终这些命令竟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笨拙的咆哮。结果进攻自然是被击退，整个滑稽表演重新开始。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这种享受之后，我们终于开始往回撤——两只耳朵彻底被震聋，一只眼睛被打青，差点没被打破的头嗡嗡作响，双脚起了水泡，拉开了口子的

81

手上鲜血淋漓，被踩得半死的身子到处是肿块，浸泡在臭汗、污水和（赶上幸运的话）粪水中，军装上已经难以分辨哪块是布料哪块是污物，双腿就像河马腿一样，下面部分变得粗壮，脚底下裹着一团已经变硬的黏土。用棍子将身上最脏的东西刮去之后，这一队人就这样被带回城里，出现在斯特拉斯堡的男女居民眼前。

1884年6月2日

在乡下、在美丽的孚日（Vosges）山谷以及阿尔萨斯（Elsaß）北部和洛林（Lothringen）地区的小村庄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给韦伯留下了有趣的印象，让他了解到“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对持拒斥态度的外国民众所产生的影响”：

确实很遗憾，阿尔萨斯人很不愿意与我们普鲁士军队交友，对我们非常冷漠。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儿子在德意志军队里服役的母亲们。例如，有一次行军途中，上尉派我回头去给后面的分队传达信息。我在法耳次堡（Pfalzburg）附近的一个农家等待那支部队的时候，一个农妇给我端来一个盛满咖啡、面包和酒的脸盆。之后她不肯收取分文，泪流满面地对我说，她想，如果她待我好，也许在普鲁士地区也会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在那里当新兵的儿子。上西里西亚（Wasserpöhlen）的波兰人、西里西亚人以及驻扎有阿尔萨斯团队的其他地方的人们，他们会满足这位可怜的妇人的心愿吗？谁知道呢。

韦伯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既能“和善”友好，同时又具有掌控能力，这种才能对他来说很有用。不管在什么地方待，他都能很快给自己的语言添加点当地风味。与农民交往，他就会变成农民，自己并不失体面，别人又能敞开心扉，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82

服兵役的下半年，韦伯担任了班长，增添了一些新的体验。担负了一点责任，有了一点发言权，这给他带来了满足感，但同时也耗费了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的职责基本是“家务”型的（对此他并没有什么天分），诸如不仅要让“波兰邋邋鬼”保持军装的整洁，而且要让他们保持自己身体的清洁。监督下属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他一刻也不得闲：“当了上司你会感觉到自己很重要，可过不了三天，一个认真尽职的班长唯一还能感受到的就只剩下腹痛和食欲不振了。谢天谢地，受这份罪也快要结束了，眼下我纯粹是一台提供服务的机器，不当班时所做的就是吃、喝、睡，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在结束服役终于指日可待，即将重新拾起书本的时候，韦伯再次总结了军事训练的状况和经历：

这种部队生活逐渐变得令人厌恶，太愚蠢了。特别是近几个星期，我简直一点别的事情也做不了。希望我当班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过去四周里，我从早到晚都待在军营里，可还是不能阻止各种各样的失盗事件发生。为了防止事情被汇报上去，招致可能的处分，我不得不自己花钱让人去把失盗的物品补上。……一个人能否做出牺牲，与他是为一个伟大而迷人的理想献身，还是为了肮脏的绑腿布做出牺牲，确实应当没有什么关系。不错，就得用“牺牲”这个词，因为没有任何自我折磨方式比有意识地让自己陷于最为深重的痴呆麻木状态更可鄙的了。不管怎样，当一个人在人性的祭坛上做出这种牺牲的时候，他会很遗憾地看到，自己在做这类事情时比任何军士都要笨拙得多，而且这种牺牲不仅对于自己没有多少价值，对于德国军队也并没有多大价值。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不到多少东西，因为军士们比我们优秀的唯一技能是打人、踢人等等。我们虽然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这些本事，却无用武之地。

1884年5月30日

然而，一旦自己不再是军事训练的对象，而是成了训练的执行人之一，韦伯对军事教育也便有了新的看法。一年后，即1885年年初，当他应召回到斯特拉斯堡进行两个月的军官训练时，他就已经开始喜欢上这件事了：“我的职位的确与前一次完全不同了，如果我在两三周内得到提升（对此我蛮有信心地期待着），那么我就会体验军事事务中令人愉快而且有用的一面。”他天生具有领导气质以及发号施令和教导的能力。此外，他擅长讲故事，富有幽默感，因而在同行军官眼里，他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同事。不久他就写信给家里说：

正如我写信给你们讲过的那样，我自己在这里过得很不错。我对房东夫妇也满意。过去几天的部队生活相当紧张，除此之外现在一切都很好，而且也有趣。正如我说过的，我的上司看起来对我十分满意——谢天谢地，上尉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我的体操，其他项目我还算过得去。年纪较轻的军官们一般来讲人都不错，是很友好的同事。上尉觉得，我应当把这四周的军官训练作为一次愈疗来看待，他说得对，因为我已经比以前瘦多了，皮带都得往里紧上三个扣眼。照我现在苗条的程度，已经不会有人再把我归入胖子一类了。让上尉非常满意的是，现在整个连队列队时可以向我看齐了，因为他说过以前我肚子总是挺在那里碍事，弄得整个连队的队列不像个样子。毫无疑问，我现在可以算是一个好兵了，上尉看来对我非常满意，相信我绝对勤奋。昨天他来回访，不吝辞藻，极力称赞我出色的训练成果。

韦伯从军事训练中获得的最终成果是对这部“机器”的高度赞赏，以及尚武精神和爱国情操，这些让他祈望有朝一日能有机会率领他的连队奔赴沙场。

※ ※ ※

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年，韦伯在精神上极度贫困。这一年开始影响他的内心生活，使其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他同两家学者亲戚——地理学家本内克和历史学家鲍姆加藤——的密切交往是他这一时期的精神食粮，防止了他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空耗在酒馆的无聊生活中。

84

我那时就像是马厩和骑术学校里正在被驯服的一匹马，星期天自然是我这种生活中的亮点。假如没有机会在可爱的亲戚家度过那些下午，真不知道这些星期日会是什么样子！这种“家庭聚会”本身从来不是我之所爱。不过在这里——我一方面被作为儿子看待，另一方面也享受与其他常来拜访的学生一样的待遇——亲戚关系只是一座桥梁，它使得我们可以谈论千万种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其他场合不可能被谈论，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被谈论。

1883年10月22日

两位学者的妻子都是马克斯的母亲的亲姐妹。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海伦妮的姐姐伊达是受到海伦妮信赖的朋友和顾问。海伦妮同伊达情谊深厚，认为伊达比自己优秀，把她视为宗教与道德生活的楷模。埃米莉（Emily Fallenstein）是海伦妮的姐姐中年龄最小的，她是那个多子女家庭里充满生命力的中心，也给她那位品德高尚、听力不济的丈夫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两个家庭的人都心地善良、无私和具有高尚的情操。韦伯的表兄弟姐妹们就是在这样两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跟他们夏天一起在海德堡度假，彼此熟悉。鲍姆加藤家的孩子中，韦伯与弗里茨和奥托早就就是好朋友。奥托早早地就娶了埃米莉·法伦斯坦，妻子的父亲是韦伯外祖父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去了海外。韦伯对奥托的这段婚姻很有兴趣，让他第一次对严重的心理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

埃米莉从哪方面看都不同寻常。她比鲍姆加藤的孩子们年龄都大得多，长得并不漂亮，病怏怏的，患有严重的神经紊乱症，但她虔信宗教，有一种魔力，一种未卜先知的禀赋。此外，她在其他方面也多才多艺，能作诗也会唱歌，判断力敏锐，智力极高，不仅能主宰伊达和她的孩子们，也能主宰那一群常常出入于鲍姆加藤家中的青年才俊。鲍姆加藤兄弟俩都爱上了这个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女子。相反，他们的父亲和其他亲戚则无视姑娘的宗教才华，在她身上看到的主要是一个不祥的患病者。

当二十四岁的奥托急着要与比自己大七岁的女友结婚时，他父亲激烈反对：这个患



有沉重疾病的女子难道不是儿子的克星吗？被儿子视为知己的伊达则不这样看。她相信这姑娘卓越的才能，对伊达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精神契合。她还感到，现在奥托已经处于不可抗拒的命运支配之下，他会宁可离开父母也不放弃这个婚姻。此事造成了一场严重的冲突，在所有当事人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导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一时失和。不过一家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一不可改变的现实，又重归于好：奥托与埃米莉结了婚。

这对夫妇搬到了瓦尔德基尔希（Waldkirch），在一所牧师公寓里宁静度日。一年之后，死亡的降临结束了这段得之不易的婚姻。埃米莉在生孩子时死去，这个孩子原本就没有存活的可能。对年轻的丈夫来说，埃米莉并没有死，只是经历了转形而已。他甚至能够在墓穴还未关闭时与她对话，让其他人都感到战栗。

即便是妻子死亡引发的歇斯底里的情绪消退以后，奥托仍然继续生活在打上了妻子烙印的与妻子的精神联姻之中。此后，在他的一生中，妻子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现实存在。这个年轻、热情、平易近人、性格开朗又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此后鳏居一生，把自己永不枯竭的爱心奉献给了无数“不幸的心灵”。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对别人提供兄弟般的帮助，甚至达到忘我的程度。对他弟弟的孩子们而言，他是第二个父亲。有人把一个生命力健旺的年轻男子与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的婚姻视为不幸，而这个女人的丈夫则把它视为永恒的归宿。到底谁对谁错呢？

韦伯怀着深厚的同情关注着这位朋友的命运。早在从海德堡来此探望时，他就已经获得所有当事人的信任，因为他能设身处地理解每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同凡响的女人也让他十分着迷，但他心里觉得奥托父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所以在去斯特拉斯堡之前，他就已经不仅是鲍姆加藤家儿子们的朋友，而且也是他们父母的朋友了。那位健谈却有些孤独的学者感到有一种需要，把这个外甥作为同龄人，与他倾谈所有的政治事件，把自己对19世纪80年代政治发展常常怀有的激情灌输到了韦伯的脑子里。毫无疑问，他看问题的方式影响了韦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谈谈H. 鲍姆加藤，特别是因为他——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一样——是一个立志无条件寻求真理的学者，同时又是壮怀激烈的政治家。



这个卓越的人（H. 鲍姆加藤）那时已是垂暮之年<sup>①</sup>，人生的斗争和个人忧虑的重压已经让他感到有些疲惫了。对于公共事务，他的兴趣现在主要是做出学术性和批判性的观察，而不是实际参与和施加影响。青壮年时，他曾怀着一腔道德和政治激情，与达

<sup>①</sup> 这里的资料来自他的学生埃里希·马尔克斯（Erich Marcks）写的出色的传记。

尔曼 (Dahlmann)、东克尔 (Dunker<sup>①</sup>)、格维努斯、约理 (Jolly)、西贝尔、特赖奇克等一起为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和强国地位而奋斗。民族斗争点燃了整个一代人烈火般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新德意志的辉煌的梦想得以实现时，鲍姆加藤为之欢呼：“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居然有幸得到上帝的恩惠，得以经历如此伟大、如此震撼人心的事件？”他又带着某种预感补充道：“在我这个年纪，还能从什么地方获得新东西来充实生活的内容呢？”的确，悲剧正在于，对于这一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爱国者来说，在参加了塑造帝国的外在形态之后，他们适时的任务应当是参与帝国的内在发展，然而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俾斯麦一人大权独揽。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自由派人士曾寄希望于他，但他统治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87 鲍姆加藤并没有找到新的参政途径，他却更加敏锐和清楚地看到了伴随着新形势的阴影。他看到了对权力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对国家的神化以及二者带来的后果——军国主义——不仅给德国人的心灵带来了危险，而且还通过普鲁士方式的统治地位在政治领域铸成了致命大错。他得以从近距离观察在对待阿尔萨斯人这个问题上一个接一个的失策，这使他对德意志文化重新赢得这个少数民族的希望破灭。此外，一手遮天的俾斯麦对他自己的宪政理想造成的危害也使他越来越感到不满。年轻一代无条件地膜拜这位天才，愿为他赴汤蹈火。鲍姆加藤从中看到了一种走向极端的危险，这些年轻人也许会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此而丧失对其他价值的判断能力。“这个伟大的人物将会给我们留下巨大的痛苦。”

所有这些观点都在他与自己以前的朋友特赖奇克之间轰动一时的论战中倾泻出来。作为德国南部诸小邦国和自由派理想的辩护士，鲍姆加藤严厉抨击了特赖奇克对普鲁士精神和霍亨索伦王朝一边倒的颂扬。可是，由于特赖奇克的《十九世纪史》——因其对经过 1870 年而变为现实的历史作了“华丽壮观”的描述和热情洋溢的肯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即便是在鲍姆加藤长期的同道中，也很少有人愿意听从他这种逆耳忠言。上了年纪的鲍姆加藤感到孤独，甚至有被唾弃的感觉，为此他深感痛苦。

在那个年代，社会正义和阶级调和的新理想正在部分中产阶级年轻人的头脑中萌生。这种理想让鲍姆加藤的妻子和儿子都感到精神振奋，但鲍姆加藤自己却已经不能接受这类思想了。他年纪越大，罩在公共事务外面的色彩在他看起来就越是黯淡。年轻的侄子韦伯没有鲍姆加藤那种悲观主义，并一直试图让他变得乐观一点。不过，他基本赞同姨父对俾斯麦政策的评价，这与他自己父母传给他的政治信仰倒是不谋而合。所以，他很感激姨父同自己的交谈和提供的信息。这一点也反映在下述事实中：后来他应姨父之邀从柏林开始与后者建立了讨论政治的通信来往，这样的通信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一

① 应为“Duncker”。——译者注

点我们后面将要谈及。

※ ※ ※

那时，鲍姆加藤一家的灵魂是伊达——一位卓越的女性。她那个一心扑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丈夫，是一个基督教徒，这种信仰显然是来自家庭的传承（鲍姆加藤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而不是自己争取来的。不管怎样，随着年事增高，这种信仰在他心中已经不占多少分量了。伊达虽然和他具有同样的知识情趣，但她真正的生活却更具有内在的深度，她能直接面对她的主。她用基督教道德不留情面的标准衡量一切行为，因此对自己从未感到过满足，生活中总是兢兢业业。她越来越摒弃自我满足的学术及其典型的学者，对常见的思想与行动脱节颇为反感。以基督教的博爱理想来衡量，她周围的学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冷酷无情、高傲自大、自私自利；作为一个人来说，这些学者受累于虚荣和嫉妒，常常渺小得可怜。如果知识不能增进智慧和善良，如果精神的翱翔不能带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那么书籍数量的持续增长又有什么价值呢？

88

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气氛浓厚的生活环境中，她试图按照基督教福音书去生活，常常因为无法如愿而深感苦恼。难道真的没有可能按“登山宝训”来统一规范这个世界吗？她时刻萦绕于怀、痛楚地意识到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她不惜付出帮助穷苦人，这让她丈夫深感不安。不过，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十分敬重她，所以妻子多数时间都能够按自己良心的驱使行事。此外，伊达常做一些在别人看来让她自己和她的家庭付出太大的事情。她把一个患猩红热的孩子的妹妹带回家里，结果使自己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她收养了一个失去双亲的亲戚多年，尽管这孩子难以相处的性格给她自己和她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囿于她纤弱的身体中的那颗坚强的心，孤独地同深深的忧郁这个魔鬼进行搏斗，但她没有让别人因此而遭受痛苦，在他们面前她几乎总显得那么愉快和冷静。“克己”是她日日遵循的座右铭。上了年纪之后，她认识到，丈夫生活中遵循的是与自己不同的另一套法则。她采取孤独于心的方式，独自展开内心的搏斗。她与儿子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分享自己的宗教和社会关切。她与妹妹海伦妮在内心深处很相近，两人都继承了至今毫无衰减的父母遗留下来的道德和宗教遗产。不过，在伊达这里，一切都更加严厉，色调也更加暗淡。

鲍姆加藤家里有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年轻的韦伯很快就感到心里涌动着一种愿望，想要去探究这个家庭奉行的人生观，亦即伊达的人生观，因为韦伯的母亲感到这种人生观要绝对优越于自己家里奉行的人生观。海伦妮比她姐姐软弱，而她丈夫比鲍姆加藤在家里更有发言权。韦伯探究的结果是：作为一个虽然严肃，但同时也享受生活乐趣，思想尤为“开放”的年轻人，他感到与鲍姆加藤家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那种极为严格的道德要求有些格格不入。他的看法与父亲相同，认为将一举一动都绳之以道德之

89

法，以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是一种“偏激”的做法。他拒绝接受那种严厉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不能容忍人们笑对自己的弱点，它所奉行的“非好即坏”的两分法似乎有悖于人性。他认为，“过量的道德压力”是任何一种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的天敌。他那时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生活：

我对鲍姆加藤家的人生观有什么可非议的呢？非议肯定是谈不上的，尽管它与眼下我所信奉的某些观念并不很合拍。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看来，这种人生观似乎存在着导致某种“偏激”的危险，即**可能**——但并不一定——妨碍那些受到这种人生观影响的人们去享受生活的乐趣。……这些人的主要特征就是回避现实，鄙视那些正视现实的人。我甚至可以这样说，鲍姆加藤家在与人交往时，不管别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鲍姆加藤家的人都把他们当作**应当是**的那种人来对待，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把他们当作按逻辑推论他们必须是的那种人来对待。

他用奥托的婚姻为自己的判断作了辩解：“我相信，根据这个家庭奉行的精神，事情如此发展是必然的，因此这种精神也像其他任何一种生命观一样，潜藏着自己的危险，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其他生命观也许显得没有这么深刻，没有这么完善，但也并没有潜藏着同样的危险。”

一年后，他的这个清醒的观点依然如旧：

90 每次离开鲍姆加藤家我都有很多收获，尽管我从这些收获中得出的结论与这一家大多数成员的想法很少一致。我对主宰这个家庭的一些基本观点持自觉而又坚定的反对态度。**除非我脱胎换骨，否则我不可能放弃这种态度**，也不能放弃这种态度，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让我相信我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我从未试图隐瞒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而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对我都持和蔼宽容的态度。

不过，尽管他反对自己认为是有悖于生活和脱离现实的严厉要求，但是这个年轻人在鲍姆加藤家中仍有宾至如归之感，而且于不知不觉之间，伊达在他心灵成长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后来他对伊达一直心怀感激，因为后者帮助他理解了自己的母亲。现在母亲的道德情操和要求对他的压力已不复存在，尽管她不能亲自谈论自己，但韦伯与伊达的接触和对伊达性格的理解，现在让他认识到了海伦妮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他认为，伊达日益加深的内心孤独主要是她自己生活中的问题造成的；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为什么母亲海伦妮与父亲老韦伯一起生活内心也注定会变得孤独。

尤其重要的是，在伊达的影响下，他以前依稀可辨的感受现在成了清晰意识：他必须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不在他们表达的不同思想之间，也要在他们代表的不同性格类型之间做出选择。这与其说是一种情感的选择，不如说是一个道德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他自己心灵的发展和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韦伯历来坚决摒弃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自然按照无法避免的法则已将我们塑造成型，因为他坚信，他自己身上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素质，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胜出。例如，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从根本上无视道德的享乐主义者，以为自己作为知识精英有权力肆无忌惮地驱使他人为己所用；或者，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一生中很早就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满足于一个令人轻松愉快的职位，例如做一个小城镇的法官之类。韦伯对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对于那些一直认为韦伯在思想和道德品质上早就定型的人们而言，不得而知。到了二十四岁，韦伯这个人大体上已经完全成型，精神上自足独立，虽然知识和阅历可以使他变得更加渊博和深邃，却不可能把他塑造成另一个人了。

※ ※ ※

伊达去世后，韦伯写给伊达的女儿的一段文字，反映了这个年轻人的心灵成长在哪些方面得益于伊达·鲍姆加藤： 91

你母亲也一直是我的第二母亲。我最亲爱的朋友，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说这句话时我的内心是多么真诚。假如我没有在你们斯特拉斯堡家里获得那些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没有在那里受到塑造一个人的性格的道德的影响，没有这一切对我后来的持续影响，那么我几乎不能想象，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今天生活中一切我爱惜和珍视的东西都会产生动摇。你母亲人格的影响让我开始依稀感到，一个人除了履行外在职业中的职责，还有其他的事情和任务需要完成。直到后来我自己家庭的那个圈子让我醒悟了，我才完全理解了这一点。如果我试图写下自己以及同我亲近的人通过我有多少地方受益于伊达，我真不知道该从何处下笔。她常常对我说，她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她说这话并不是在抱怨，而是意在表明：我的一生是一场坚强不屈的奋斗。她的奋斗并非徒劳，她的儿女们的众多朋友将会证明这一点，这些朋友都感受过她在你们家里营造的那种严肃而纯真的精神氛围。

※ ※ ※

在二十岁那年，韦伯还没有意识到，伊达日益让他心里滋生出一种敬畏——敬畏在某些方面与他自己的秉性相对立的思想 and 道德标准。韦伯在服兵役期间曾有好几周腿鞘

发炎，因而有机会从事一些脑力活动，其间伊达给他弄来不少读物，其中也包括一些宗教读物。韦伯在给母亲的信中详细谈到了这些宗教读物：

92 在军营的病房里和其他一些场合，我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读点哲学，还有一本薄薄的钱宁文集。钱宁的书是好心的姨妈伊达借给我的，令我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的文章思想立足点非常高，可以说他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无懈可击的高度。钱宁对宗教本质的看法（这些看法很难说是基督教的观点）极富创见，多数观点非常出色，他的人格也格外迷人，这一切使得帕克的这位年龄稍长的同代人和同胞比帕克更令人喜爱。不管怎么说，他比后者要广博得多，纵使这仅仅是因为他并不太热心于解决对于帕克来说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宗教哲学问题。因此，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求对伦理和道德问题的解答（对这种解答也有更清晰的认识），去寻找产生这些问题的心理基础。他的论证只需要为数不多的哲学原理。他理论部分的观点相当幼稚，也许可以说具有孩子般的天真。不过，他从中得出的某些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非常清晰，他从观察“人心灵的无限价值”中得出的清晰冷静的理想主义让人耳目一新，而且任何人（包括那些对这种看法极不赞同的人）都能一目了然，因此毫无疑问，他的观点具有普世意义，是建立在人类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就我记忆所及，我这是**第一次对宗教产生了不仅仅是客观研究的兴趣**。我相信，鉴于我了解了这位伟大的宗教人物，不能说我在此完全虚度了光阴。

1884年7月

93 那段时间尚存的资料中，这是唯一一份可以窥探这个年轻人的宗教激情的文献。因此，这里值得简述一下钱宁的几个基本观点，他对伊达和海伦妮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钱宁是19世纪头30年间活跃于美国东部地区的一位牧师，与施莱尔马赫是同代人。他对基督教乃至整个宗教的看法，反映在他的一系列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同时又清晰、透明、平和和宜人的演讲和论文中。同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理论相比，钱宁的看法不受教条的束缚，也不偏向任何一个教派。他认为自己属于“自由心灵的信奉者”，相信理性和启示之间能够达到和谐，相信一种“任何人的理智、良知和爱心都不会反对”的基督教。他认为，宗教和道德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不是在情感的迷狂中，而是在履行简单明确的义务中去寻求上帝。在他看来，“按上帝的意旨舍弃一种欲望比一切欣喜快乐都更为重要”。最高的善莫过于一个神圣的决断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即精神自由。这种自由的实质在于，做感官的主宰，做物质、命运、恐惧和习俗的主宰，不依附于任何权威。

我把这样一颗心称为自由的心灵：它严守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拒绝沦为别人的附庸，不满足于沿袭成规或被动的信仰，它像迎接天使一般接受每一个新的真理，把主宰自我看得比主宰整个世界更为崇高，真诚地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超越时间和死亡的限定，期望永不停息地进步，怀着对不朽的希望去为自己的行动、为承受苦难找寻永不枯竭的力量。<sup>①</sup>

钱宁也讨论了人与国家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也提一提：让形同上帝的人类得到保护和发展是一切社会机构的最终目的；人的精神比国家更伟大、更神圣，绝不能成为国家的牺牲品；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为精神自由服务的；在基督教的个人伦理和国家伦理之间并没有冲突；社会生活应当遵循与个人生活相同的道德法则；不能为了国家本身的目的而肯定国家的权力；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权力斗争是邪恶的；战争应当受到诅咒，等等。

从钱宁的著述中摘出的这些思想，也许就是让韦伯的内心受到触动的自由学说的表述。读康德时，韦伯就已经熟悉了对自由学说严格的逻辑论证。但钱宁信仰的确定性并没有超出概念与理念之间、知性要求与理性要求之间的激烈斗争之外。他在道德方面的崇高要求是对具有自我认知能力的心灵的洞见，而这种洞见只是简单地作为一种终极的、无须逻辑论证的观点提出来的。钱宁把他的道德要求沐浴在直接从心底流出的一股宗教虔诚的暖流之中，这种宗教虔诚把实现道德要求看作是服从一种严格的戒律，看作是灵魂魂向上帝之路，看作是灵魂达到与上帝相似的途径。

94

不管马克斯·韦伯对这些学说曾持何种态度，对他来说，精神和道德自由，在“应该”这个道德律令基础上的人格“自主”，始终是他一生中的一项基本准则，他自觉地遵守这项准则，并不断检视自己对此身体力行的情况，因而而对这项准则的信念不断重新加以肯定。

伴随韦伯终生的另一个信念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目的就在于使独立的人格得到发展。这是康德和青年时代的费希特所表达的信念，钱宁或者是继承了，或者是自己独立导出了这一信念。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韦伯并不认为这是国家和社会组织唯一的目的。因此，韦伯不赞同钱宁的国家观念，尤其反对他的和平主义。1885年12月，他写给海伦妮的信中说：

我星期天是怎么过的？要是起床不是太晚，我会（在开始工作之前）读点钱宁或者斯宾诺莎。关于前者，我所带的一本书并不怎么好。书中有一篇论战争的文

① 引文按德文译出，与钱宁的英文原文略有出入。——译者注

章，在我看来不仅极不现实，纯属理论，而且简直应当受到谴责，因为此文竭力将一切与战争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人与行为看得比刽子手的行当还要等而下之。我一点也看不出，把职业军人同一伙杀人犯等量齐观，带着蔑视的态度公开谴责他们，这能带来什么样的道德升华。假如这样做，绝不可能增加战争中的人性因素。

95

不过，钱宁也为自己准备了一条人们通常选取的退路，他说，为了保护人的道德权益和一般人权，战争作为最后不得已的自卫方式是可以被容许的。但他又认为，战争是否被容许还得由每一个被要求参战的个人的良知来决定。在这里，他想要取证于《新约》中一句意思非常含糊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他认为，如果有人因良心的驱使做了逃兵而被枪决或遭监禁，从早期基督徒殉道的角度出发，甚至可以将此视为“道德”的荣耀。显而易见的是，钱宁对这一类事情绝对无知，他所看到的只是美国雇佣军的处境和在这种处境下民主的美国联邦政府对墨西哥等国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因而，他的推论（如果他相信自己相信，真的会有任何人将其付诸实施）只能被称为极端轻浮之说。

然而，把一种在美国的情境中虽说不见得合理，甚或不见得无害，但还可以理解的学说——然而它毕竟只是一个在这方面远离现实生活的人做出的极端臆测——作为一个有普遍效用的基督教基本观点来看待，这只不过是一个推理上的谬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然而，提出这样的理论并非全然无害，因为它容易在人们的知觉中造成所谓的基督教要求与国家及世界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结果和条件之间的裂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裂痕已经产生了。中世纪整个的灾难就植根于这种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所谓上帝和人类制度之间的鸿沟。

96

上面这些文字说明了一个大学生读了钱宁令他不快的学说后所受到的震动，这些学说认为，新教的道德戒律与使用暴力，尤其与战争，不能相容——战争不仅仅被用来自卫，而且也被建立在权力政治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用来进行扩张。韦伯虽然最近在军训中吃足了苦头，但他认识到了军训的必要性，并且自己也持有某种尚武精神。他既乐于接受在积极的英雄主义道德和爱国主义的牺牲精神中体现出的伟大，也同样乐于接受在博爱的道德精神和为邻人同伴而献身中体现出的伟大。他不仅把在新教意义上个人心灵的完善作为一条无可争议的“法则”，而且也同样把超越个人、存在于此岸世界的世俗文化的实现视为这样一条法则，而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正是这种文化不可或缺的仆人。此外，对他来说，自己祖国的声望和强大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与此价值相比，绝大多数其他的价值都会黯然失色。

不过，那时他还没有认识到不同价值之间的悖论，而且即便他认识到了，也未见得能接受。相反，他认为，钱宁把国家变为个人的仆人，并以基督教的名义信奉严格的和



平主义，由此而得出了不合理的“结论”，从而“构建了”上帝和人类秩序之间的“鸿沟”。三十多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大战期间，韦伯多次就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此时他已经以极敏锐的洞察力对那些根据不同的价值体系提出的道德要求做过深入的思考，从而把每一种调和这些不同“法则”的企图都作为自欺欺人的做法加以否定了：

福音书对战争的态度在关键之处毫不含糊。它反对的不仅仅是战争（对此福音书甚至根本没有特别提及），而且，归根结底还反对人类社会所有的法则——如果这个社会想要成为一个世俗“文化”的世界，即成为一个推崇“造物”的美、尊严、荣誉和伟大的世界的话。任何一个得出不同结论的人……都应当知道，他自己不能脱离此岸世界的法则——这个法则也包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因权力之争而引起战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只能在这类法则的限制之内去满足“时代的要求”。

基于这样的认识，韦伯得出了与钱宁以及后来比钱宁激进得多的托尔斯泰（Tolstói）的观点不同的结论。他从未丧失过对博爱这一福音怀有的深厚敬意，他也接受它对个人生活的要求。但他也同样接受这样一种内在价值：绝不屈从的尊严感、积极的英雄道德、致力于旨在改善现世生活的超个人的文化价值。对他来说，基督教的上帝并不享有对心灵的垄断权，他必须与“诸神”，尤其是祖国和科学真理的要求一起共同主宰心灵：

只要你生活在（基督教意义上的）“现世”之中，就一定会体验到多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斗争。如果单个地看，它们每一个似乎都有约束力。你必须选择自己想要或应当侍奉诸神中的哪一个，选择在什么时候侍奉这一个，在什么时候侍奉那一个神。尔后你总会发现自己处于同这个世界上诸神中的一个或者几个神的冲突之中，尤其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远离了基督教的上帝——至少是远离了“登山宝训”中宣告的那位上帝。

1916年

※ ※ ※

让我们再回到青年韦伯。在斯特拉斯堡那段时间，伊达的影响和他与父母家的距离使韦伯与母亲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海伦妮一直因为她家“老大”不能向她敞开心扉而感到痛苦，所以，当韦伯第一次表达了母亲的人生观以及（远比这重要得多的）母亲的存

在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读者可以想象海伦妮有多么感动：

你还写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在我们智力和情感发展方面“没能够”做点什么，无法在精神上做我们的母亲，对此我必须强调指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不过我也得坦率地承认，我对你产生这样的想法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恰恰是在同我最亲近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不能就各种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同他们进行口头的交流，不能够在同他们的交往中表现出真挚的情感，甚至不能表现出和气——一句话，因为我的“孤僻”和我那种不友好的交往方式。我只能真诚地向你保证，亲爱的母亲，尽管——也许正是因为——你自己并不总是很清楚，你对我们的影响比大多数父母对他们孩子的影响都要大，我现在所说的是经验之谈。我常常表现得不那么友善，不那么和气，原因在于我对自己关注得很多，也许关注得太多了。我内心矛盾，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却既不能坦诚相告，又不能将其彻底地隐藏于心。我的思想曾经常常十分偏执，我现在之所以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看问题，注重一点经验，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别人的思想和品格，并从中获益，这一切主要得归功于你的影响。上大学以来，我虽然做了一些我现在认识到是非常轻率的事情，但没干过什么恶意的蠢事。像我那时如此年轻，现在也仍然年轻的人，常常容易受到诱惑去做那样的蠢事，而我并没有去做，那是因为我想到了你。

98

的确，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曾经耽于学生团体生活，粗俗地放纵自己，豪饮狂酌，花费大大超出日用所需，超出父母的预算。在斯特拉斯堡，他也有一帮酒肉朋友，以粗俗、不负责任和漠然的方式让自己的感官享受得到满足。但令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她不是用语言——因为那时候处于韦伯生命底层的黑暗中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带来的有危险的问题都深深地隐藏着——而只是以自己圣洁的存在，在韦伯的内心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坝，以防止他任凭本能冲动的驱使。韦伯并没有效法别人，他宁可忍受强健的肉体存在激发出的邪恶的精神诱惑给他造成的日益痛苦的折磨，而不愿屈从于人的自然性。

※ ※ ※

在这方面，他得益于自己能够尽情欣赏女性的妩媚所释放的清纯魅力的能力，在这种妩媚中，性感处于休眠状态或被完全转换成了一种心灵的力量。他与男性同龄人之间的友谊带有同事之间友好相处的色彩，没有渗进起伏波动的强烈情感。一个例外是，他在斯特拉斯堡时，曾在一段时间里与两个同是一年兵的年轻人有过深厚的感情。除了与奥托·鲍姆加藤的交往之外，他在朋友中智力总是高人一筹，从来没有要依附于一个领

袖人物的需要，对此他母亲有些担忧。他孑然一身，独自应付一切。不过，谁如果找到他，就会发现他很善解人意，并能换位思考。打小时候起，他对人世间的的事情就不陌生。

除了家庭圈子之外，他不会去别的地方（例如结交女人）寻求情感的满足。他只与通过亲戚关系而变得熟悉、从小就有着无拘无束的亲密关系的那些人保持着友谊。他与不少人——不分老幼——保持着这种自然的关系，而他们的那个大家族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随着儿子们长大成人，同龄的女性亲戚通常持续一周的来访使好客的夏洛腾堡家里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海伦妮让外甥女们沐浴在母爱之中，她们的姨父乐于享受她们青春的朝气，乐于同她们一起欣赏大城市带来的刺激。韦伯家的男孩子们对每一个表姐表妹的独特个性都怀有浓厚的兴趣，与柏林这个大城市里那些通常“缺少芳香”的都市之花相比，这些大都生长在南方的姑娘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对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在这个家里的经历令她们陶醉，这里有乐于享受生活的姨父，有天使般善良和生气勃勃的姨妈，有卓尔不群又英俊潇洒的表兄弟，还有一些颇有名望的朋友。时代的脉搏在这里跳得比别的地方更快，澎湃的心潮几乎难以抑制。年轻的韦伯乐于同每一位姑娘交往，并与其中几个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并没有被这些年轻的生命迷住，或者因此而让自己的学习受到干扰。直到上大学的前一年，他才真正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表妹。

99

鲍姆加藤家也同样因两个漂亮的女儿而增添了不少吸引力。韦伯来到斯特拉斯堡时，鲍姆加藤的十八岁的大女儿埃米已经出落得十分可爱。她非常娇美温柔，同时又聪明而富有生气，椭圆形细长的脸蛋，头上盘着金色的发辫编成的发冠，活脱脱一个年轻的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她在心灵和气质上都具有纯粹的法伦斯坦的特色：不带任何杂念的绝对纯洁、深邃而且无私。但她也从母亲和外婆那里遗传了神经性的疾病，精力衰竭和抑郁症早早就开始给她的青春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在服一年兵役的青年韦伯被她的妩媚、优雅和活泼深深打动，与她建立了亲密的兄妹般的情谊。埃米自己并不知道，她那时是韦伯的守护天使之一。因军事训练的原因，韦伯多次回到斯特拉斯堡，第一次是在1885年年初，然后是1887年。在此期间，韦伯通过与赫尔曼和伊达的通信保持着与鲍姆加藤家的关系。1886年他开始与埃米通信。韦伯第二次军官训练期间，两个年轻人再次相见时，他们之间还有些腼腆的爱慕之情便开始萌芽了。当时韦伯二十三岁，刚刚做了见习律师，第一次感受到了心灵深处性爱的蠢动。

伊达凭着母亲的直觉，也带着矛盾的心情感觉到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她喜欢这个超凡脱俗的外甥，待他如自己儿子一般，她丈夫亦是如此。但是，她担心像这样两个近亲孩子之间的爱情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另外，她娇小的女儿在这个年轻巨人（虽然精细）手中会不会是一件过于纤巧易损的乐器？他会不会让她在精神上感到负担过重？而

100

且，他还很年轻，事业才刚刚起步，婚姻还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因此，为防患于未然，伊达将埃米送到埃米在瓦尔德基尔希的哥哥奥托那里住一段时间。但韦伯也尾随而至，这对年轻人在充满诗意的春天里甜蜜地度过了几天的时光。他们感受到了相互之间的爱恋，但谁也没有说破，没有任何逾越他们之间的清纯距离的举动。只是在分手的时候，青年韦伯有一刻眼眶里噙满了热泪。除此之外，一切都心照不宣。双方的母亲虽有预感，但都保持沉默。

那时，韦伯希望能够熬过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寂寞时光，先在职业上站住脚，然后迎娶埃米。不过，伴随着这个希望的也有疑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缔结这样一个婚姻将会遇到的种种障碍？自己能不能为这样一个羸弱的生命担负起责任？所以他举棋不定，做不了任何决断。接着，笼罩着埃米的阴影越来越浓厚，她的痛苦日渐加深。不过，韦伯仍然暗自希望，命运会出现转机。

# 3

韦伯的服役期结束了。按照父母的愿望，二十岁的韦伯先于1884年秋在柏林继续他的学业，在父母家里住了一年。韦伯在过学生社团生活和服兵役期间花费巨大，在柏林大学就读的目的之一是减少那些巨大的耗费。海伦妮发现儿子在精神上成长进步了，她尤其感到他的情感更丰富也更深刻了——对她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她将此归功于她的两个姐姐的影响。因此，她觉得马克斯在海德堡和斯特拉斯堡那两年的花费并不能算太大：

101

马克斯与亨里埃特以及老家的关系更贴近了，他在你们那里被作为自己的孩子看待，对我来说，这其中的价值无法估量，对此我要一再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现在当我丈夫说让马克斯去海德堡和花费不菲的斯特拉斯堡（韦伯在这两个地方日子过得相当铺张）是一个错误的时候，想到这一点也总让我感到宽慰。不错，他的确肆意挥霍了很多钱，假如他在蒂宾根（Tübingen），很多事情他都不会去做。但是，若论这两年给他的思想和情感所带来的变化，那是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得到的。

海伦妮那颗慈母之心首先要感激的是，儿子现在真的转向了她，并努力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向她吐露心迹。

马克斯很顺利地重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对他这一年里心灵的发展感到十分高兴。他现在比以前善解人意得多，也健谈得多，而且我想他很清楚，他这样做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快乐。早上他去上课之前，只要我抽得出时间，我们就一起读一个小时的钱宁，主要读钱宁关于国民教育和自我修养的讲演。这使我们很感兴趣，让我们着迷，尽管马克斯和我的观点大异其趣，因为我不能同意他的理论，即一部分人的存在确实只是为别人干活，只是机械地挣钱谋生。

海伦妮不能赞同无条件肯定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理所当然地要求大众为其目标做出牺牲的文化。因为在她看来，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非常重要，她非常深切而痛楚地感到，“大众”正是由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单独个人构成的。那些年里，钱宁的学说和伊达的影响或许使她先天的气质和倾向得以发展。她任大城市的贫困叩响她心灵的大门，她注视着那些饱受折磨的人的面孔，在这些脸上看到的东西在她的良心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周围存在着很多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贫穷困苦的生活，而我们对此又无能为力，这常常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以致任何一种享乐、任何一种占有在我看来都像是不正当的。我不能不时常想到我们的母亲，庆幸她没有真正看到紧靠大城市的夏洛腾堡周围我们面对的那种状况和精神污秽。她也许忍受不了这一切。

这种社会责任感现在越来越深地铭刻在她的心中。

海伦妮觉得，她家的“老大”在家里过得很自在。“尽管我们得时常提醒他不要用功过度”，但他的学习（虽然安排得很紧）还不至于使他忙得喘不过气来，他对家里的事也很上心：

他目前集中精力主修法学专业，正在上的课程包括贝塞勒（Beseler）（“他的博学弥补了他讲课枯燥这一缺陷”）的“德国私法”、埃吉迪（Aegidy）的“国际法”、格奈斯特（Gneist）的“德国国家法和普鲁士行政法”以及布龙纳（Brunner）和吉尔克（Gierke）的“德国法律史”。同时，他还去听莫姆森和特雷席克的历史讲座。“谈到学校的课程，我可以立刻向你打保票，就这方面而论，我在这里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勤奋的学生。”

他觉得格奈斯特的讲座特别有价值：“我发现他的讲座是真正的杰作。……课堂上真正令我钦佩的是他在讲课中直接切入当前政治问题的方式，是他以不带任何宣传和鼓

动色彩加以阐述的强烈的自由主义观念，而这样的宣传和鼓动又正是特雷席克在他教授的关于国家和教会的课程中使用的方法。”这位激情澎湃地评点政治的历史学家，在讲坛上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袒露无遗，他的讲座给韦伯留下的印象，影响了后者后来关于大学教师的权利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讨论到。

韦伯在斯特拉斯堡时期结识的那些年轻、清新但显然头脑比较简单的朋友来家里玩儿，海伦妮感到很开心，不过她在给伊达的信中说：

我只是希望能在他们的交往中加进一些有点深度的内容，就像你在跟马克斯接触时所做的那样，这在马克斯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出来。可是除了舍尔哈斯（Schellhass）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这种需求。总的来说，这一点是我对马克斯的社交圈子感到遗憾的地方。他和斯特拉斯堡的两个朋友确实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但那是一种父子般的关系，因为这两个朋友的年龄比马克斯小，论兴趣的广泛更不及他。除了你的奥托之外，他交的朋友都是这样。他不喜欢仰视别人，这的确是他的一大弱点。

103 海伦妮批评儿子缺乏寻求别人支持和引导的愿望是否恰当呢？如果一个年轻的巨人在同龄人中找不到任何一个超越自己的人，因而早早地就有了自满自足的感觉，他自然就不会去找寻这样一个人。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这也许是这个年轻巨人的长处也未可知。此外，那些头脑比较简单的人需要的是韦伯的感情投入而不是思想的投入，因此，与他们交往不啻为一种休息。天生的侠义精神促使他乐于关照弱者。所以，他的弟妹们成了他生命的源头活水。早在十五岁时，只要弟妹不在身边，他就会想念“他们欢快的叫喊声”。现在，可爱的小妹妹克拉拉和莉莉成了他的玩具，给他带来了快乐。他开始毫无节制地溺爱她们，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导她们。他隐于心底里的温情和体贴泉涌般流向她们。海伦妮曾这样写道：“莉莉（四岁）又恢复了她的权利和义务。她接过早上叫大家起床的艰巨任务。她在马克斯床前跳来蹦去，直到他下决心起床才罢休。如果别人没时间顾及她，她会在马克斯那里坐着。”马克斯的专注力非常强，他的弟弟妹妹尽可以在他周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也不会影响他学习。莉莉五岁生日时，他给当时在海德堡的小妹妹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莉莉：

我刚想起来，后天是你的生日，到时你就满五岁了，就长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大莉莉了；你就不会再哭了，会把汤很快地喝下去，不必让妈妈喂你了；到时别人给你讲什么，你都会乖乖地听话，这样，爸爸、妈妈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你，

会因为你而感到快乐；从后天开始，你就会成为一个懂事的大莉莉了。我去拜访了寿星，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请他给我点儿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好让我能有点儿东西送给我的妹妹。比如一个球，一个烟斗；或者给那个金发布娃娃一条新的左腿，给那个叫“宝贝儿”的可怜的布娃娃几缕头发或者一块泡沫，用来把她的小脏脸洗干净；或者给那个新的瓷娃娃一个新的后脑勺，长时间以来她光有脸没有头；或者给我点其他什么好东西。但这位寿星嘲笑我说：“你这个蠢笨的大学生，想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莉莉已经有了一个球，她已经不再喜欢烟斗了，那个布娃娃的左腿还在，会被重新缝上，那个叫‘宝贝儿’的布娃娃是因为被人亲吻才弄脏了脸，这正是这个娃娃的好玩之处，另一个娃娃不需要头的后半部分，因为她已经习惯于这样四处跑动了。况且，莉莉现在在海德堡，那里也有寿星，如果莉莉乖的话，他也会给莉莉送礼物。莉莉不想让你送什么东西给她，她早把你忘了。你自己回你的吸烟室去，点上你的烟斗吧。莉莉已经完全不知道你是谁了，否则，她就会把你一起带到海德堡去了。”

这让我感到很悲伤，于是便坐到沙发上，真的点上了烟斗，心想：现在我倒真得弄清楚，莉莉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记得我了，她是不是不会很快就回来。如果那个寿星什么都不给我，那我能送她点儿什么。要是那样，我就得在一张真正漂亮的信纸上给她写封信，她收到后可以用来折叠成一只小船，放入花园里装有喷泉的池子里。我得非常用心，把信写得干净漂亮，不要留下墨渍斑点，这样即便她再长大一些，也还能够依稀辨读这封信。你瞧，这就是我写的那封信，很遗憾，到底还是给弄上了一点墨渍，不过只是很小的一点。就这样吧，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五岁的你个儿又长了多少，你是不是长得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你是不是仍然想做一个男孩子，但又不想做阿图尔那样的淘气鬼。好了，我得上床睡觉了。

你高个儿的哥哥马克斯

1885年7月25日

对于他的弟弟们，韦伯现在也为母亲分忧。他跟他们一起学习，关心他们在成长期遇到的问题。他同大弟弟阿尔弗雷德尤其亲近。阿尔弗雷德小他四岁，乐意让自己佩服的早熟的哥哥给自己出主意。他们在某些方面相似，在另一些方面则大异其趣。弟弟情感深厚，同时也像哥哥一样很早就竭力为精神生活而奋斗。他兴趣广泛，因自己的诗才而对艺术很敏感，因此要在自己各种不同的天赋中做出选择，对他来说比对马克斯而言更为复杂，为求得自己个性的完整而在内心进行的斗争也更为困难。他一开始学艺术史，而后与马克斯一样学了法律和经济。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他们兄弟之间关系的是一封长信，这是二十岁的大学生马克斯还在斯特拉斯堡时于阿尔弗雷德行坚信礼时写给后

者的。正在服一年兵役的马克斯猜测，比自己更倾向于苦思冥想的弟弟不会满足于母亲和牧师能够给他提供的对这种成人仪式的解释，因而需要得到不同的阐释。马克斯力图帮助弟弟让他那颗为满腹疑团所苦的年轻的心对坚信礼持肯定的态度，这种努力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斯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

作为那个时代和他们那样一个家庭的孩子，海伦妮正长大成人的儿子们觉得难以对行坚信礼这样的仪式有一个确定的看法。他们的理解力都很强，而且深刻，爱动脑筋。在家里，一方面，他们汲取着母亲在心灵挣扎中愈益坚定的对新教的虔诚，感觉到母亲的心里多么渴望将这笔财富传给他们；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受到父亲那种善于为人处世的冷静，他虽然尊重宗教，但宗教对他个人的意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还有他们周围环境的影响：教会在知识分子中和工人阶级的阵营里建立社团的力量被削弱；构建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的基础在逐渐消失；大城市里年轻的中小学生玩世不恭；清醒的理智否认教会的教条，也拒绝牺牲自己的思想；人们还没有找到在无常中表达永恒的新形式。

韦伯的长信看起来写得有些吃力，针对的是弟弟的理智而不是他的感情。他想让弟弟了解的，不是宗教内容对于单个人的价值，而是基督教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力量所具有的普遍的文化意义，这种强大力量塑造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同时，他还想让弟弟认识到，拒不加入这个庞大的兄弟同盟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想法，因为理性面临的是无法解开的谜。

亲爱的弟弟：

我今天写信的目的——（终于有了机会）对你的两封来信表示感谢，二是——这也是主要的目的——作为哥哥和一个基督徒至少要给你写几句，跟你谈谈你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我是想向你表明，我自己是怎样理解这重要的一步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转折点对于迈出这一步的人而言具有什么意义。最后，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你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106

你已经熟悉从远古传下来、为我们的教会所遵从和信奉的基督教学说。你想必也注意到了，对这些学说的真正含义和内在意义的看法因人而异，彼此甚至大相径庭，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开这个宗教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的巨大谜团。与所有的基督徒一样，你现在也要作为基督教团体的成员去对其教义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而且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承担的一项任务。当然，这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在多年的经历中来完成。在你去执行自己首次面临的这项任务时，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对你的良心、你的理智和你的心灵负责。

在我看来，基督教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一视同仁，接受每一个人，不管你是



老还是幼，也不管你幸与不幸；它能够被每一个人理解，而且两千年来也的确得以被所有的人理解——尽管理解的方式不同。基督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伟大的事物得以产生的基础之一。我们国家的诞生，我们国家所有的伟大建树及其建立的伟大的律法和秩序，甚而至于科学和人类大多数伟大的思想，都主要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人类世界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像基督教信仰和仁爱观念那样丰富和激动人类的思想与心灵。你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概况了解越多，对这一点就会看得越清楚。……

你现在作为基督教团体的成员加入的正是这样一个人类大群体。你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并且会——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越来越明白，通过行坚信礼，通过诵读信条，通过表达你希望被这个巨大的世界性兄弟同盟接纳的愿望，你赋予了自己某种权利，也让自己担负了某种义务。作为基督教团体的一员，你承担了权利和义务，要为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并因此而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做出你的那一份努力。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认识到，让自己承担并竭尽全力去履行这样的义务、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我们获得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我们自己的满足和内心的安宁是与努力履行这项义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就越有利。我们越早为自己被置于这个美丽的地球上参与一项伟大的工程而感到快乐，对我们就越有好处。最后，我想向你表达这样的愿望：愿你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将会结出的果实——为父母带来快乐，给自己带来安宁。

107

通过指出基督教的文化意义和每个个体对于超个人的使命所承担的义务，大学生韦伯在这里从“历史”而不是从宗教的角度，对于自身存在的理由——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做了回答。后来在弟弟进入高中最后一年时（1885年），他给后者的一封信中表明，他自己在这期间也懂得了“近在咫尺”的那些极不相同的个人义务所具有的意义：

此外，正是这一时期，即一个人将要把自己存在的中心长久地移出家庭这个圈子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了解和履行我最初面临的那些真正的义务。尽管那些只涉及一个人最狭小圈子内的家庭义务显得如此简单，如此微不足道，但要真正履行好这些义务则很困难。我从自己的经验得知，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犯迷糊，原因在于，这些从外表看来极为细小的义务正因为其细微和显而易见总让人觉得腻烦和讨厌，接受这样的义务显得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个人要是相信他完全没有必要理会这些挑战，那就清楚地表明，他不能履行好这些义务，不能愉快地胜任赋予他的义务。即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我讲过的，一生中的这个阶

段对一个人增长见识也很有帮助，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时期要把事情做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通常直到早就时过境迁之后，人们才会对此有确当的意识和感觉。……

半年以后（1886年春），阿尔弗雷德读了斯特劳斯的《耶稣传》，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怀疑之中，无法自拔，便写信向哥哥求助。尽管当时正是韦伯参加国家见习律师资格考试的前夕，但他仍然详细深入地回信作答，指出斯特劳斯的宗教哲学中那些概念的基础业已被晚近的学术成果超越，力图以此给弟弟提供帮助。这封信是一篇完整的论文，这里只能摘录一部分：

你的来信很有意思，要不是我一直忙于学习，一直等待着笔试最终开始进行，我早就给你回信了。现在我至少又可以安排出晚间一个小时安静的时间来了。

你在信中谈到的的确是各种各样很重要的问题。由于我自己正是在你现在的年龄，并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第一次开始触及这些问题，所以我更有兴趣听你谈论它们。虽然已经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但第一次接触到斯特劳斯的《耶稣传》时，这本书给我留下的不同寻常的印象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本书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渗透着作者真挚和坦率的信念，好像用一把手枪顶着每个读者的胸膛说：“做我的信徒，否则你就是伪君子！”显然，用这种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方式很难彻底解决人类思想史和道德史上的重大问题。尽管如此，有勇气提出这类问题的那些思想先驱的影响还是将长存于世。斯特劳斯的思想也正是如此，这些思想荡涤了很多以前不成熟的思想，厘清了思路；但另一方面，自他以后，学术研究另辟蹊径，绝没有像斯特劳斯所期望的那样，把他的观点作为终极答案，而仅仅是从中获得启发，以探讨更为深刻的新问题。人们确实发现，斯特劳斯的书与其说是提供了一个答案，毋宁说只是提出了一个或者说提出了许多的问题，而且，他的命题的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书中也尚未论及，因此，人们必须启用一些斯特劳斯当时没有用过也不可能使用的概念。

我希望我们很快会有机会当面谈谈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值得花点工夫弄清楚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里始终存在着片面地看问题的危险，即将所有的问题都不加区别地同等对待，然后据此用一个自己目前尚未弄清楚或尚未完全弄清楚的概念来帮助自己对付我们面临的所有难解的谜。斯特劳斯提出的“神话”概念就是实例，我注意到你很喜欢这个概念，也很能理解你为什么喜欢它，因为这个概念似乎提供了一把有助于理解的钥匙，可以用来解释那些让我们的知性概念和逻辑感到头疼的问题。然而，如果你仔细审视一下这个概念，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没有说明任

何问题，丝毫没有使问题变得更清楚，也完全没有解释作为具体个人存在的耶稣和在历史中存在的耶稣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个概念完全不能用来阐释我们这里讨论的人类精神和人类文化的变迁。（这里略去了韦伯对神话本质及其产生的解释，以及关于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如何创立基督教的论述。）

假如一个人以看待赫拉克勒斯（Herakles）和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神话（这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定居民族对自然作诗意观察的产物）的方式，去看待早期的基督教团体（这些团体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组成，他们大多失去了家园，长期在贫困中挣扎）心中的想象，那就无异于不加区别地看待一个报纸编辑（他根据统计数字来描写工人阶级的贫困和酗酒的后果，然后对于这种状况以及对于在他看来应该对此负责的人给予善意的或者是论辩性或讽刺性的评论）和一个此时此刻自己不得不在极度贫困中挣扎，并为萦绕在自己脑际的观察和想象而烦恼的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假如一个幼儿保姆晚上将墨水瓶堵上塞子，在上面放上两根火柴，拼成十字（因为在她看来，撒旦就藏在那黑色的墨汁里，现在就出不来了），我们会取笑她；假如路德在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在瓦尔特堡（Wartburg）将一个墨水瓶砸向邪恶的敌人，人们可能也会笑他——但这里的笑不同于前一种。如果我们想到对巫婆的审判，我们就一点也笑不出来了。所有这些例子似乎都牵扯到同一种东西——迷信，但每一次涉及的都是人的精神的不同侧面，每一次的含义都各不相同。

110

你的信中还提到不少其他可资讨论的问题，例如关于“仅靠经验和知性”而获得的认识的价值问题。毫无疑问，没有谁比古人更倾向于高度评价这种认识的价值和范围了，然而，对于这种认识的条件和真正的基础以及我们获得这种认识的能力，他们从来没有弄清楚过。……现在我们把问题导入了更加深刻的层次，即我们不满于仅仅使用“经验”这个术语，而是要进一步探究经验为什么能给我们真理，分别探究那些能够和不能够给我们真理的经验，探究它们各自的特征和价值。……同样，你提到的宗教问题的“不可理解性”也还远没有定论，因为现在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对这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持什么态度？它在历史上对人类有过什么价值？对我自己又有什么价值？或许正由于它难以理解，所以也许对我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在我看来，对这最后一个问题绝对不应做出肯定的回答，可是它的意义又是什么，作为单个人我们一时难以回答上来。

1886年3月

阿尔弗雷德脱离传统基督教思想的过程和他努力弄清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的诉求，一度造成了他的笛卡儿式的怀疑和对自己的绝望，这时马克斯对他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

度，以图使他改变自己的想法：

111

虽然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讨论那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但你的来信的好些方面仍然让我感到很高兴，尽管信中有的一些东西令我惊诧不已。让我先从令我感到惊诧的东西说起吧。我真的不太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直在竭力让自己相信，似乎（按你自己的说法）你已经完了，你没法不对自己感到绝望。对此我只想问一句：为什么？除了你在理解某些广义的理论观点方面碰到困难外，我看不出别的任何原因，也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因此，我发现你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过分高估了理论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以及理论对于个人的意义。有的人并未遭受永恒的地狱之罪或者类似的惩罚，竟因为理论观点的缘故当真认为自己活不下去了，或者认为生命已经成了负担：如果你仔细推敲一下，就会觉得这十分荒谬。我很清楚，有的人可能会因此而痛苦不堪。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我们的认知工具——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微乎其微的价值以及固有的缺陷还有一点起码的认识，如果他想到这些局限性，那么，当他面对理论——那些关于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之基础的东西的理论——可能出错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会放弃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要是我的话，我会仔细探究一下这种思想，看看其中有没有自我欺骗的成分，看看其中是不是还有一种悲观主义所具有的那种诱惑，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屈服于这种诱惑。这类思想对你异常强大的控制的确使你误入歧途了，我发现你有时候正走在这条歧途上。这的确是一条歧途，因为在这条路上你只会一事无成。不过，除此之外，我的确不能肯定地说，你已经偏离在我看来是正道的路很远了。

从这些在1887年夏天记录下来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推测，二十三岁的韦伯经过努力早已认识到了认知能力的局限，已经暂时定下心来对那些无法探明究竟的东西持一种无声的敬畏态度。然而，不去揭开蒙在神性之上的面纱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求知欲。不过在科学思维中，他把自己局限在能够被体验到的东西上。

## 第4章 崭露头角

# 1

在参加见习律师资格考试之前（1885年至1886年冬），韦伯在哥廷根（Göttingen）度过了最后一个学期。他继续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卡着时间过日子，根据不同的课程把一天精确地划分成若干段。他在自己房间里做晚饭，按他的方式“省钱”——1磅<sup>①</sup>切好的生牛肉和四个煎鸡蛋。一天最后的一个小时他用来跟一个单纯质朴的朋友玩斯卡特牌，这个朋友考试不及格，韦伯正帮他准备补考。至于其他的，不管是冬日窗外的嬉戏欢乐，还是春游的喜悦，都引不起他的兴趣。自停止击剑以后，他就没有从事过任何锻炼身体的活动。即便是在休假的时候——如果他父亲希望同他一起旅游的话——他也没有享受大自然的闲情逸致，而是想通过获得旅行见闻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 112

北海和大自然不会消失，今后还会在那里供人欣赏，而时间却在流逝，我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做些法学理论以外的事情。我并不认为欣赏自然是一种现代发明，我也不缺乏欣赏自然的能力，但我知道还有其他同样堪称极大享受的东西。作为一种享受，它们被我置于自然享受之前，因为我以后应该还有机会享受自然，而且如果

---

<sup>①</sup> 作为德国重量单位，1磅（pfund）等于500克。在英美质量系统中，1磅（pound）约等于454克。——译者注

我确实辛勤工作了，也许还能更尽情地享受自然，而以后我将越来越难找到时间作精神享受了……

113 下决心以苦行僧式的态度对待工作之后，韦伯放弃了很多学术方面的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眼前的目标上。他因此第一次体会到了圆满“履行职责”的满足，对这种状况他调侃道：“总的来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我自己的翻版。”即使是在家度假，他也不让自己分散注意力。海伦妮惊讶于她家的“老大”现在竟如此专注于“眼前的需求”，她从女性的感受出发，认为生活应当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她立刻从儿子的专一中看到一个新的问题：

马克斯现在必须通过见习律师资格考试，他现在正在准备考试，心无旁骛。确实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在这里的一段时间几乎把所有文学的兴趣爱好都抛到了一边。早上，如果等他爸爸下楼用早餐的时间过长，他就会从衣袋里掏出袖珍本的《海事法》或《交易法》聚精会神地读起来，就像读一本小说。明年夏天，他要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想，到那时他的其他兴趣该会又超过这些枯燥无味的法学的东西吧，我对这些东西全无感觉。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他不能像一个政府官员那样注重实用，井井有条。再者，他更感兴趣的一直是法律的历史沿革，而不是它的应用。

114 尽管如此，韦伯仍然是一个社交高手，他喜欢一边品尝美酒，一边进行机敏或者妙趣横生的交谈，他也同样喜爱不嗜奢华而重情谊的聚会。他认为自己绝不是一个想要逃离正常生活的怪人，他不需要通过反对传统行为来了解自己的长处。不过，他不喜欢那些花费大量时间为青年男女安排的节庆活动，尤其是舞会。凡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年轻的巨人而又不因循社会习俗的人，都不会勉强他跳舞，这确实是一项很不适合他参加的活动。不过，海伦妮并不这样认为，关于儿子对舞会的态度她谈过不少，因为这是母子之间经常讨论的话题。她是一个严肃深沉，同时又开放和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儿子年纪轻轻就拒绝做在她看来本来就是年轻人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她认为年轻男子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都有义务给年轻女士带来对她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愉悦。很自然，母亲越是强调参加这项活动的必要性，儿子就越是固执地抵制它。韦伯的这种抵触情绪还一度传染给了他性格各异的弟弟们。年轻人这种形式的聚会显然从未让他有生命得到升华的感觉。他觉得年轻女子最缺乏魅力之时，正是自己不得不将她们拥在怀中的时候。这些女子脱离了日常生活，身着节日盛装并裸着上半身，没有机会进行思想交流或倾心交谈。他对调情也不予接受，而调情正是年轻人

在跳舞这类娱乐活动中无意识地寻求的东西，它能给最平庸的交谈注入神秘的魅力。在哥廷根参加了一场舞会后，韦伯试图说服母亲他厌恶跳舞是有理由的，为此给她幽默地开列了一张清单，详细列出了自己为获得舞会的乐趣所花的时间：

我至今还没有回你的信，原因是我过去一周因为同一件事情损失了很多时间，兹详列如下：(1) 被邀请参加冯·巴尔家 (Karl Ludwig von Bar) 的舞会，为此而烦恼 (15 分钟)；(2) 出去买了一顶高礼帽 (chapeau claue) (半小时和一大笔钱)；(3) 手套忘了，外出买了同样的手套 (半小时，又花了钱)；(4) 穿着打扮，结果不知多少颗衬衣纽扣出了问题，一颗背心的纽扣松脱，甚至阿尔格西吊裤带也断了 (几乎整整 1 个小时!)；(5) 在这之前，缝补了礼服的一只线缝裂开的袖子 (15 分钟)；(6) 出去弄了一下头发，整个店的头膏和香水都涂抹到了我头上 (15 分钟)；(7) 跑到冯·巴尔先生家，以为迟到了 (半小时)；(8) 结果到得太早 (15 分钟)；(9) 聊了半小时，大都是多余的话；(10) 用餐 (75 分钟)；(11) 双脚踢蹬踏跳、闲聊、流汗 (从晚上 10 点到凌晨 3 点，5 小时)；(12) 睡过了头，误了多弗 (Dove) 的课 (1 小时)；(13) 得把误的课补上 (1 小时) ——这加起来大约是 12 小时，整整一天的时间！还没完呢！(14) 去排泄消化物，那是在今天，差点儿把这事儿给忘了。用这段时间，可以读完《德国刑法典》(*Das Reichsstrafgesetzbuch*) 的总则，然后至少可以读到“危害公共福利罪”这一分则了。一个人对舞会和它的好处尽可以有他的看法。如果他喜欢跳舞，又有苗条的身材，那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倒也值，可这两种情况我都谈不上。习惯法汇编《萨克森明镜》(*Der Sachsenspiegel*) 里说得好：“任何人都只受自己生而受制的法律管辖，除此之外，不受其他法律管辖。”但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不再受辖于我们父辈的法律了。罗马法说得更加率直无情：“任何人没有责任做力所能及的事” (*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才可以获准停下来。然而，即使这个限度有时也得不到年轻女士们的尊重——按她们的双脚踢蹬踏跳的能力，说她们是“弱势性别”可真是太不公平了。

115

顺便说一下，舞会上我过得比自己想象的要愉快。我同几个年轻女士的交谈还算差强人意，随着交谈的继续，借助于各位女士从不同角度的点拨，我对几个话题逐渐有了透彻的了解。诸如溜冰场、合唱团、一个助理图书馆员的订婚仪式、沙龙舞、房间里的热度、各种可能的天气等等。总而言之，假如如舞会参加者只需穿着得体就行，而无须穿什么燕尾服，戴大礼帽和白手套，穿黑裤子，无须戴各种各样的饰物，也没有那种机械的谈话方式，假如是这样，那花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时间跳舞我倒并不在意。

为了让母亲不用担心他快要变成隐士了，韦伯紧接着从积极的一面考察了“社交活动”。受邀同一家人共用午餐后，他给母亲写道：

116 要是我对这件事还要发牢骚，那您的责备就肯定有道理了。不过，在我看来，一个所谓的舞会就其价值和精神内容来讲，同这样一个愉快的聚会几乎不能相提并论，甚至都不能跟与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早上一起喝咖啡这种最为平常的相聚相提并论。冯·巴尔先生和太太都非常可爱。冯·巴尔先生极富幽默感，在下午的一段时间里，他详细讨论了政治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这次聚会，就像《教会法大全》(*Corpus juris canonici*)里说的，不拘形式，没有喧嚣 (*sine figura et strpitu*)，也没有“燕尾服和蹬踏踢跳”。我听到了各种各样我怀有一般兴趣和特别兴趣的东西，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甚至还吃了个饱，三小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点上烟斗——在我看来，这样的聚会要大大强似我不得不在那里像袋鼠一样蹦蹦跳跳，为吃上一片肉而费这么老大的劲，强似我不得不溜到门厅去才能享用一只雪茄和一杯啤酒。

一年后，他在柏林做见习律师时，再次严肃地谈到当时典型的城市社交生活。他在写给斯特拉斯堡的女友的信中表达的观点，后来一直未变：

在我们这里，人们把社交生活只看作是一种“职责”，对它尽可能地加以粉饰，这对一切参与者都是有害的。这点从社交聚会的构成就可以看得出来。常言说：做完工作之后，才能好好休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谚语说的只是日常工作，它同样适用于人们毕生的事业。据此，人们认为，社交聚会的主角应该是那些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回首人生事业有成的人。社交生活应当围绕着他们进行。他们应当是中心，别的人都仅仅是陪衬。

可这里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年轻人的兴趣占据了最重大、最广泛的社交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他们转：他们为自己的娱乐兴趣决定了社交组织的范围和类型。既然社交生活不能被这些年轻人看作一天辛勤劳作之后的一种休息手段，那对他们来讲它本身就必定是一种目的，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的建构，他们不管怎样都得尽量加以利用。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你感兴趣的是人本身，那么这种兴趣就不会驱使你离开家庭的怀抱而去参加一个舞会。在家里你有足够的机会对人进行无尽的探索，而在舞会上，你可以与别人有几句肤浅的交谈——几乎总是同样的、俗套的内容，虽然这可能增加你对服饰的了解，但这无论如何不能增加你对人的认识。交谈的这种目的导致人们要努力在交谈中建构某种惯例，而这纯粹是履行一种义务，因为社交礼仪要求有交谈进行。换句话说，这里滋养的是一种傲慢无礼，这



在柏林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尤其是在女士们中间，也就是说，恰恰是在那些被作为珍宝在所有的社交组织里加以炫耀的女士们中间。但是这可以轻易地将两性所处的位置整个加以改变。面对一个颇为挑剔而又精熟于这种机械的交谈方式的姑娘，像我这样的人会感到窘迫……但不会感到拘束，拘束感产生于意识到两性之间社交活动必须遵循的限制。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二十三岁的韦伯怎么会这样强烈地斥责这样一种现象，即节庆活动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年轻人的需求决定的。当今的年轻人滋生了一种因自己“年轻”而产生的优越感，韦伯不太喜欢这些自我欣赏的年轻人，他乐于结交的是那些成熟的人，是那些知识和生活经验的“载体”。他确实曾用调侃的语气谈到过年长的人，但极少对他们言词不恭。与人交往中，骑士般的礼貌和友善的举止是他的性格特征，不过他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在学术或政治讨论中情绪激愤时，他会无所顾忌地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对自己敬重的权威也是如此，这样的坦率表现了他内心十分自信。

※ ※ ※

早在那个时候，韦伯就把妇女甚至年轻姑娘首先作为一个人来看待，其次才将其作为一个异性来看。他期待她们表现出富有生气的优雅和一种对男人的行为举止具有引导作用的矜持。“自古以来，在交谈中按照习俗一般是男子主动发起谈话，女子则设立谈话的界限。因此，一个青年男子能否一劳永逸地学会……遵守这些界限，就完全取决于这位姑娘了。”一个女人只要表现出任何对知识感兴趣的苗头，他都认真对待。如果这种兴趣以优雅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更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对所谓的“柏林时尚”则颇不以为然，这种时尚指的是某种勉强的自信和社交的“惯例”，表现为假聪明或诙谐的争吵，不等姑娘这朵玫瑰花蕾盛开，就夺走了她的芳香。他曾颇有兴致并善意地谈到那时在出现的新型女性，亦即他在柏林遇到的首批女大学生：

118

其中一个读第三学期的新生，另一个是像我一样的高年级学生。两人都学医，那个新生同时还在学自然科学。她的举动中带有某种能量，并不能总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觉。此外，即使谈论一些完全非学术性的话题时，她的表达方式也老是带着书卷气——这在踌躇满志的新生中是常见的。不过，作为高年级学生的我对此倒是很赞许。

1885年12月3日

无疑，韦伯对这种新型女性的认可不是无条件的。女大学生正努力争取得到认可，因此容易表现出斗士那种强硬和紧张的特征。此外，韦伯当时看待这些现象的方法受制于一个青年男子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自身利益，这个青年男子为了自己精神存在的基础而迫切需要女性的关照和帮助。因此，在给女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自己更喜欢传统型女性，而他女朋友本人就是典型的女性特征最迷人的化身：

另一种类型就是称为**学生之母**的女房东，她们实际上对我更有吸引力，而且她们还有另一个长处，即她们不是现代的产物。我在此地的女房东“特妮阿姨”就属于这种类型，而且是其最出色的代表之一。她勾起了很多我对我父亲在哥廷根时期的回忆，奇怪的是，据说那时她的模样就已经长得跟三十年后的今天一模一样。虽然从审美的观点来看，她一直是这样不可救药地惨不忍睹，但我从未得到过像在她家那样美好的住宿。

此外，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女性，也包括已婚妇女的内心自由和独立看作同男子的权利完全一样的“不可剥夺的人权”。他曾以无法察觉的方式试图让母亲更多地认识到，自己有权利——不，应当是有义务——维护自己的权利。1885年夏，他详细讨论了母亲对一位好友的婚姻状况所持的焦虑心情。母亲的好友的丈夫是个出色的男人，但有些病态，他的专横使妻子心底的防线濒于崩溃。在这些文字里，韦伯在字里行间也许希望告诉海伦妮一些他的孝顺不允许他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的事情：

我想象到了X家的状况大致会是那样，我也很了解这个可怜女人的担忧和几乎是受到恐吓的状态。但我并不能完全肯定，假如这个女人能够表现得不那么担忧，并把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以维护和实践，那么她丈夫会不会不再把自己已经逐渐习以为常的对所有人的专横态度看得那么理所当然。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基于他对这类事情的敏锐眼光，她丈夫能洞穿任何暗地里发生的有违他心愿和偏见的事情，对他来说，这些事情就好像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

我无意判断用以下的行为来对付他是否可行，不过一个局外人总会这样想：一种不加掩饰的自主行动或许会让他隐约感觉到，他是在试图压制道德权利，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根本就是在压制人格权。由此他也许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各种各样针对他的阴谋诡计——像他在病态的恍惚中臆想的那样——而只是对个人权利的意识。

后来韦伯时常谈到他在这里所暗示的观点：对一个已婚妇女来讲，如果丈夫想要剥夺她的自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剥削她，让她做超出必要的劳动分工以外的事情，那她就应当坚定不移地给丈夫设立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他觉得，这不仅对已婚妇女，而且对丈夫和婚姻都是必要的。他认为，一个自己的生活得到充分发展的妻子会丰富家庭生活。此外，如果妻子承担了超出自己生来就应当承担的义务，做出牺牲——长期做出这样的牺牲而不暗中反抗是不能的——那她就不能怪罪自己的丈夫。

## 2

1886年5月，韦伯参加了见习律师资格考试，因此朝着自立又迈进了一步。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过的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学生生活了。快完成学业时，他给母亲写信说：“这些岁月将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我感到，这一段日子也该结束了，对此我不能感到遗憾。”尽管如此，当同他在一起的唯一一个海德堡时期的学生社团的朋友——在哥廷根，他就是与这位朋友一起，在用功一整天后，度过了考试前的最后一小时为自己放松的时光——来火车站为他送行，按旧时学生的美好习俗，动情地唱起“我是一个高年级学生，别了”的时候，他的眼里还是噙满了泪花。这是在告别青春。前面还有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伸向远方。他的目标——卓有成效地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和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还不明朗。

韦伯回到了父母家，因为还没有收入，所以在家住了七年，一直住到结婚。他还得经历漫长的六年职业预备阶段才能达到他所有的目标。现在，他打算读法学博士学位，那时柏林对这一学位的要求很高。因此，韦伯在做见习律师的同时，还在继续他的学业，在戈德斯密德和迈岑（Meitzen）的研究班里学习。

他题献给戈德斯密德的长篇博士论文《论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涉足法律和经济史的边缘地带。这篇论文给他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已经堪称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了，韦伯后来甚至将其成果吸收进了他的最后一部社会学著作。

为此我得通读数百部意大利和西班牙语的成文法汇编。首先我对这两种语言的掌握得达到一定程度，能让我勉强读懂用这两种语言写的书。西班牙语还真费了我一些时间。此外，大多数文献是用讨厌的古老方言写成的，令人奇怪的是，那些人自己竟能弄清楚那些难懂的文字！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如果我得到的结果显得内

容单薄，那主要不是我的过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市议员们得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没把我要找的那些东西写入成文法里。

121 韦伯的博士学位毕业考试很庄重，是一场真正的博士论文答辩。应试者要参加七门法学科目的考试，此外还包括对应试者提出的三个论点进行公开答辩，韦伯的朋友应邀持对立观点参加抗辩。韦伯邀请了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 Mommsen）、奥托·鲍姆加藤和瓦尔特·洛茨（Walter Lotz）参加，洛茨对这次考试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的辩论完成之后，按惯例，马克斯·韦伯在驳倒所有对手，论文答辩成功之后，需要用拉丁文问听众中是否有人敢于向他的论点提出挑战。这时一位老先生站起来，他瘦骨嶙峋，像只蜘蛛，一头平滑的漂亮白发，其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特奥多尔·莫姆森。那是我第一次在那种场合见到他，聆听他讲话。关于第二个论点，他指出，应试者关于殖民地和城镇概念的论断令他有些意外，他自己一生都在探讨这些问题，要求应试者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看法。于是，莫姆森和年轻的韦伯之间开始了一番详细的讨论。莫姆森最后说，他对韦伯论点的正确性仍然没有完全相信，但不想阻碍应试者的考试进程，因而不再坚持抗辩。他说，年轻一代常常会提出新的观念，老一辈不能马上接受，今天也许就是实例。“但哪一天我不得不走进坟墓的时候，我最希望把下面这句话赠给非常令我尊重的马克斯·韦伯：‘孩子，这是我的长矛，我的手臂已拿不动它了。’”莫姆森以这一席话结束了令听众全神贯注的公开答辩，之后马克斯·韦伯在庄重的气氛中获得了博士学位。

第一篇论文一完成，韦伯就马上开始准备教授资格论文。“我最敬重、最和蔼可亲的老师之一，著名的农业史学家迈岑正紧紧盯着我对罗马土地分配和永佃权的研究——我确信，对这个问题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这些研究后来扩展成了一部关于罗马帝国农业史的论著，为此他和莫姆森有过激烈的文字交锋和频繁的口头论战。

122 这项研究使韦伯于1892年在柏林获得了教授罗马法、德国法和商法的资格。他几乎没有给自己任何喘息的时间。大约就在那段时间，他接受了“社会政策学会”（Der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的委托，研究易北河东岸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项研究横跨经济和法律两个领域。不过，在讨论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韦伯思想发展的另一个方面。除了他的学术关切之外，韦伯还对政治事件有强烈的兴趣。他在1884年至1892年之间与赫尔曼·鲍姆加藤的一系列通信保留了他对政治事件的反应。我们先来看看编织他人生的这些经纬线。



韦伯的政治判断的基础是他父亲所持有的民族自由党立场，不过，这中间很快就渗入了韦伯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因素。

让我们先来看看韦伯发表过看法的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sup>①</sup> 这些事件发生在俾斯麦的影响之下，他那时正日益专断地控制着民族的命运。伟大的自由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由主义的左翼，即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领导下的进步党，多数时候只是在野党；而贝尼希森和米克尔领导下的民族进步党人对首相原则上持“既不追随他，也不同他斗，而是要影响他”的态度。他们使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得逞，还支持他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此法的目的在于压制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人大众的政治崛起。这些行为意味着他们为了站到俾斯麦一边而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

尽管如此，俾斯麦仍然看他们不顺眼。当他在同天主教会的斗争中不再需要他们时，便试图在他们中间进一步制造分裂以削弱其力量：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引起的激烈争吵让俾斯麦达到了目的。贝尼希森赞同俾斯麦的保护主义政策，但不支持弗兰肯施泰因（Franckenstein）条款。这样一来，包括特赖奇克在内的他的一些追随者便转向右翼，加入了自由保守党。尤其是福肯贝克（Forckenbeck）、李凯尔特、拉斯克尔（Lasker）和巴姆贝格尔（Bamberger）领导下的“脱离派”转向左翼，很快（1884年）同“进步党”联合组成了德国自由党。这个新政党是在野党，拒绝保护关税和延长反社会主义者的法案，反对俾斯麦结束“文化斗争”的方式，这种结束方式的目的是要使中央党顺从他。于是，俾斯麦希望看到的自由主义的分崩离析就这样变成了现实。他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要么选择中央党和极端保守派，要么选择民族自由党人和自由保守党人来协助推行自己的政策。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两派之间挑拨。实力遭到削弱的天主教中央党试图保持原来的民族自由党的方针：有选择性地支持俾斯麦和代表温和的自由派原则。该党还准备参与依据1881年关于国家社会职责的“德皇诏书”提出的社会政策，只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它拒绝附和俾斯麦。贝尼希森隐退了几年。

俾斯麦独断专行，身边只能容得下宠臣和驯服工具。民族自由党人越来越受制于他的政治观点，原来的个人主义自由派理想在党内渐渐淡薄，他们把这面旗帜传给了德国自由党，而自由党则把希望寄托于改朝换代，宰相易人。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与他们的议会制政府的梦想相反，俾斯麦使用圆滑的伎俩强行推出了一个新型的君主

---

<sup>①</sup> 这里采用了昂肯（Hermann Oncken）的《鲁道夫·冯·贝尼希森》（*Rudolf von Bennigsen*）和舒尔特斯（Schultheß）的《历史年表》（*Geschichtskalender*）两本著述中的材料。

立宪制国家。”<sup>①</sup>因此，他们与俾斯麦的政策走得越来越近，同意延长反社会主义者的法案，支持他转向社会政策，保留关税法，并因感到普法战争的威胁而同意扩军。简而言之，他们成了俾斯麦要他们成为的政党：同温和的保守派一起成为政府控制下的“第二个”政党。自由主义的理想对他们而言已无关宏旨。自由党人曾把希望寄托在普皇弗里德里希三世身上，可是他在位不久便驾崩，正如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所抱怨的：“随着他的逝世，与他父亲的秉性形成反差的互补色也随之消失了。”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政治统治。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中，只有善于随机应变的米克尔做了大臣。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流露出对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垂青。极端保守派和高教会派人士——施托克尔（Stöcker）和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试图将威廉二世诱入他们的阵营。但俾斯麦的反作用力更强。威廉二世宣布他希望继续推行现行的政策，并表示支持俾斯麦的政党联盟政策。

※ ※ ※

国会议员老马克斯·韦伯是贝尼希森的追随者之一，所以严格遵循中间路线。他痛惜左翼的分裂，视其为自由主义的灾难，并致力于德国各党的统一。儿子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观点从根本上讲与父亲显然是一致的，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同政党路线捆绑在一起。他既没有向自由派一面倒——因为在他看来，稳固地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是其他一切的必要基础，也不同意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的人格权来赞美国家理念。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先了解、观察、评估和理解各种潮流趋势。他写给赫尔曼·鲍姆加藤的叙述中没有流露出丝毫一面倒的党派偏见和年轻人的固执。相反，这些叙述反映出他力求按照事件本身的特点去理解它们，客观地把握它们，公平对待政治活动的各种动机。他姨父鲍姆加藤对俾斯麦时代的看法除了失望就是批判，他试图引导姨父作一些不那么消极的评价。

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对于“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民族自由党对延长这项法令负有责任——发表的看法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典型的观望态度：

如果要为它辩护，恐怕就必须采用这样一种也许并非全无道理的观点：没有这项法令，公共生活所取得的很多成就——尤其是言论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毕竟，社会民主党那种煽动的方式将会深深危及社会生活中一些基本的机制。那么，现在是应当对那些被视为公众自由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作一般性的限制呢，还是尝试一下具有压制性的“非常法”这把双

① 转引自昂肯的《鲁道夫·冯·贝尼希森》，第2卷，576页。

刀剑呢？孰优孰劣呢？这样的尝试或许是有道理的。私底下说，有时我觉得，人人享有普世的平等权利应比什么都重要。归根结底，与其束缚一部分人，还不如封住所有人的嘴。真正铸成大错的是俾斯麦专制政治那包藏祸心的礼物——普选权，这才是彻头彻尾的屠夫，谋杀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

韦伯的正义感促使他反对非常法，这项法令旨在阻挠越来越令人不快的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那个政治上权利均等的象征——这显然是因为俾斯麦的最初计划是想要利用帝国的普选权钳制自由主义。整个形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同这个统治着德国的铁腕人物持续不断的冲突。韦伯早年对俾斯麦的评价一直到三十年后仍然一脉相承：承认并钦佩他无与伦比的政治天才以及旨在让德国变成强国和走向统一的政策，但反对盲目的忠诚和把他奉若神明。在韦伯看来，那句强加于同时代很多人的口号“俾斯麦我们信得过”（Bismarck sans phrase）不只是迷惑政治判断的手法，而且也意味着崇尚军事上和其他方面的肆无忌惮，意味着内心的鄙俗和浅薄。同时，父亲在议会的具体经历也使韦伯很早就确信，这位神人（俾斯麦）不仅犯了政治错误，而且具有人格的弱点，为此，他不仅要自食其果，还会让这个国家付出代价。

年轻的韦伯最不能赞同的是俾斯麦待人的方式——为了维护自己事实上拥有的绝对权力，俾斯麦不能容忍身边有独立思考的重要政治家存在，所以他在自己的官员中挑拨离间，使他们的道德品质因此而遭到损毁，这样，像贝尼希森那样正直的人就不可能接任要职。这些正直的人必须得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同事对自己的信任已经被暗地里戕害到这种程度，以至上任的第一天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足以把他们从现任职务上又拉下马来，而局外人却不知道是谁在幕后操纵。“越来越显而易见，俾斯麦多么成功地剪除了所有真正独立的重要政治同仁以及可能的继任者，或者让他们完全靠边站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大批以前持不同见解者现在都唯他马首是瞻，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126

不管当时还是后来，韦伯一直认为，俾斯麦的为人处世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对权力的贪得无厌，这导致了他身边容不得重要人物，由此把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因而让国家习惯于处在他的政治监护之下。不过，韦伯并不认为俾斯麦应当为这种局面——其灾难性后果在德皇更替的关键时期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承担全部责任，他也责备这个国家容忍了一个铁腕人物的专横统治。“俾斯麦导致我们中间的独立见解受到可怕的戕杀，这当然是当前局势中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但我们自己难道不应该为此至少受到和俾斯麦同样多的责难吗？”

从年轻时起韦伯就一直认为，促进政治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国民教育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再对特赖奇克的教学方法发难。受这位卓越导师（特赖奇

127

克)影响的人们相信,那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应当被视为政治教育的工具,因此,同研究过去的历史不同,研究这些历史不需要有学术的客观性。特赖奇克正是据此而行。他把听他课的学生们导入政治之中,给他们灌输对俾斯麦和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的激情,在他们中间煽动反犹情绪。二十三岁的韦伯既厌恶“保守派的反犹宣战”,也讨厌霍亨索伦王朝的神话。他谴责“施加这种个人影响对学生们尚不成熟的看法,对他们的判断力和正义感所产生的肯定是令人不快的后果”。韦伯认为,“当一个人应当去找寻自己的观点时”,以这种方式影响年轻人有害无益。大概首先是这种在特赖奇克的课上获得的印象使他确信,把对政治问题的价值判断强加于成长中的年轻人,从而有意识地塑造他们,这种方式在讲台上不应有一席之地。如果一个教师试图在教室里以鼓动家或者“先知”的身份去影响具有可塑性的年轻人,那他就是在滥用自己的权威。不过,韦伯也试图公正地对待这样一位情感热烈的历史学家,像对待俾斯麦一样,把他的影响不仅仅归咎于他,也归咎于他处的环境。为了让鲍姆加藤理解特赖奇克的“理想主义”,韦伯寄给他一本小小的诗集,在上面写道:

假如我的同龄人不崇拜军国主义的肆无忌惮和其他形式的恣意妄为,不信奉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化,不以市侩的眼光蔑视那些希望不诉之于人性之恶(尤其是残暴)而达到目标的努力——假如在我的同龄人中这些风气不盛行,那么,无数通常很明显的偏激行为,热衷于搞一言堂,嗜好今天被称为“现实政治”的东西(这种嗜好源于成功所唤起的震撼印象),如此等等就不会是学生们在特赖奇克的课堂上仅有的收获,他们就会对这些事情保留自己的看法,或者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令人反感的漫无节制的行为。不过,在这一切之中,有时甚至在这些极端的政治激情和片面性中,他们也能认识到特赖奇克对一种理想基础伟大而充满激情的追求,并且会将其中的一些东西承继下来。无疑,按现在的风气,严肃、认真的工作以及只为探求真理而不计得失的工作并不受人尊重;相反,甚至在交谈中都让人无法忍受的那种粗鄙的夜郎自大,以及对一切非“机会主义”的观点所作的幼稚可笑的判断则风靡一时。

1887年

128

这个年轻人一贯按他毕生坚守的唯一前提来判断政治事件:思想自由在他看来就是至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为了其他利益而牺牲个人获得这种至善的机会,即便是政治权力的利益也不行。一个人只有出于良心,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投机,才有权反对别人真诚秉持的不同信仰。基于这一看法,他不赞成这个时期正在进行的“文化斗争”,他后来也据此反对旨在使波兰德意志化的普鲁士语言政策。不过,当俾斯麦遽然而且彻



底地屈从于罗马教廷，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结束了“文化斗争”时，韦伯却不能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这难道不是等于承认对基督教教徒行了不义吗？

关于教会政策的法案通过了。俾斯麦在那个场合发表的讲演中的某些部分，确实具有某种世界历史的意义。这件事情就要被了结了，结果要好于多数人的预料。尽管如此，这种无声无息的“和平”仍然是可悲的。如果人们今天说我们当初仅仅是为了“政治”原因而发动了这场斗争，那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承认了一种非正义，而且是严重的非正义。如果我们确实是出于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良心进行了这场斗争，那么，我们就像天主教徒所说的，的确确实因为外在原因而强暴了天主教教信众的良心。对多数天主教徒来说，这确实事关良心，而这件事情并不像在辩驳时一直向他们指出的那样，是一场良心与良心的博弈。我们**没有按良心行事**，因而在道德上也是失败者。这是我们输得最惨的地方，因为这使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够以获得胜利所要求的那种方式重新进行这种斗争了。

1887年

尽管如此，韦伯仍然不能同意那个时期自由主义左翼的政策，虽说这一派代表着古典自由派的人格理想，比右翼更有活力。他对分裂感到遗憾，认为自由思想党长期一贯地反对俾斯麦——尤其是在审批财政预算问题上——是徒劳的，对自由主义有害无益。“对这样一个党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它多年来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了每一项帝国的财政支出要求，现在资金筹措齐了，他们还是拒绝，拒绝的原因很明确：需要支出的理由不足——真是一种可笑的尴尬境地。”（1887年，关于财政议案问题）

129

而且，自由思想党缺乏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想到这些人有朝一日可能会接任俾斯麦的位置，就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他批评左翼不应指望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在位期间辞职，这让他从中得出结论：左翼领导层缺乏敏锐的政治判断力。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放弃任何跟这些人合作制定未来建设性政策的想法，而这将使自由主义阵营的分裂永久化，使自由主义遭受损害的表演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种损害一方面来自刻板、狂热的鼓动家，另一方面来自盲目的俾斯麦信徒。同时人们又不得不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左翼的部分以前的团结因素将会回到积极的合作中来。

1888年



1888年的事件——老皇帝驾崩，尤其是德皇弗里德里希的悲剧——使年轻的韦伯深受震撼：“我一刻不停地想着公共事务。”他深切地同情那位不幸的皇后，她不管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是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都不受欢迎。在同俾斯麦的一次冲突中，她招来了保守舆论的敌视。从人性角度说，这次冲突绝不是她的耻辱，冲突的结果是她不得不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

弗里德里希在位时间短暂，随后威廉二世登基，这时候，韦伯特别希望看到这位年轻的君主能摆脱高教会派和封建势力的影响，韦伯认为保住俾斯麦的权力、地位是同这种影响抗衡的唯一手段：

其他迹象也表明，俾斯麦对他的影响已越来越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以至于遏制那些真正的反动倾向——王储威廉二世也许已经受到了这些倾向的影响——从根本上讲将取决于俾斯麦还将活多长时间。因为毫无疑问，俾斯麦并不喜欢这些倾向，他了解这些倾向的危险。他的政策唯一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想利用这些倾向，而如果他自己不为它们所利用又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1888年4月30日

此外，在韦伯看来，对国家的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

一旦局势恢复正常，俾斯麦会不会马上感到该是考虑继任人的时候了，会不会同真正具有政治素质的人恢复关系？如果他不这样做，极端的反对势力和（假如普鲁士容克<sup>①</sup>与教皇极权主义者沆瀣一气，接过帝国的大旗）德国中部民族势力的衰落就会造成严重危机。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

韦伯很快就看到了威廉二世的权力欲，特别是威廉二世很快就显露出要在公众中树立威望的需求可能带来的危险。1889年年底，韦伯对此作了如下表述：“这些布朗热-波拿巴似的宣言于今已不受欢迎了。就像一个人坐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疑惑下一次转轨会不会出差错。”一年半以后俾斯麦倒台，韦伯写道：

这一事态发展的好处在于，这不仅仅是一个恺撒（德皇）和平地承继另一个恺

<sup>①</sup> “容克”为德语“Junker”一词的音译，泛指普鲁士的贵族和大地主。——译者注

撒（俾斯麦）的问题，而是他们两人陷于冲突之中，这就使得人们不可能放弃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就德皇而言，谈及这样的放弃几无可能。……即使是那些对他最有好感的人，也毫不固执己见；至此为止，还没有出现像对教义一般的对他个人的狂热支持，而这种支持一直是俾斯麦追随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这个**角度看，这倒是德皇的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即他不让任何一派得到完全的满足——对不同派别都相继偶有伤害。

1891年

一年以后（1892年），在韦伯看来，就连这位君主间接获得的这一点优点也被其政策的种种失误抵消了。以下的判断仍然是不刊之论，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更证实了其正确性。

对德皇极为不利的看法越来越得人心。显然，他只是从一个有创意的中尉的角度来处理政务的。无可否认，他在本职工作中很勤奋，恪尽职守。然而，他有时刚愎自用，受一种离奇的权力意识驱使，这就给最高的权力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而这必然对整个行政机构造成影响。例如，人品极受尊敬的卡普里维（Capri-vi）遭他贬抑，简直就像一幅漫画表现的那样，现在几乎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帝国政府的权威了。目前我们在外交上似乎是靠了奇迹才得以避免真正严峻的局面，但毫无疑问，欧洲政治已不再随柏林的指挥棒转了。

131

1892年

# 3

尽管阴霾日益从外交和内政的地平线升起，但是韦伯还是不能同意赫尔曼·鲍姆加藤那种老年人的悲观主义。因为韦伯还年轻，他能够透过帝国政治逝去的辉煌，看到那些富有成果的全新使命在萌芽生发，指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在见习律师（从1886年起）期间，韦伯同一个年轻人的圈子有了交往，这些人中有经济学家，有对社会福利感兴趣、抱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官员，有些是“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学生，这些学生对社会理念感兴趣。他们不再靠父辈的政治遗产过活，一个产生新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目标的春天到来了。

在韦伯看来，他们不是“令人讨厌”的反犹主义者、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臆想中的

现实主义者和具有绅士派头的空谈家：

132

他们的基础与 19 世纪 70 年代的民族自由党的基础有很大的区别，但同后者一样没有渗透着阶级的欲求和高教会派倾向，完全没有任何野心和其他利己的嫌疑。简而言之，我没有理由对他们的精神自由提出质疑。他们对 1867 年到 1877 年这个时期的看法也同以前惯常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中多数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政治家，因此毫不奇怪，国家对所谓社会问题的干预对他们比对其他人而言更为重要，对其他人来讲，这种干预在目前的状况下似乎理由不够充分。

这种社会和社会政治关切的觉醒——它在 1887 年的一封信中就已初现端倪——使韦伯脱离了他父亲的民族自由派政治，这种政治日益被大工业企业家用来为自己的经济要求服务。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国家的社会职责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自由主义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至少没有得到我们现在看来是正常的关注；即使是现在，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立法仍然采取一种——通常确实是有理由的——完全消极的狐疑态度，而不是采取行动，对立法做出修改以消除对此所持的严重保留态度。自由主义者总的来说并不只是关注立法项目——我觉得这不无道理，这就导致了这些政治家把民族自由党时代仅仅看成一个向国家更为伟大的使命过渡的时期……

1888 年 4 月 30 日

韦伯第一次参加投票并没有垂青于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而是把选票投给了自由保守党。这也许是因为他期待保守党对代表社会关切有更多的理解。同时，该党对权力政治问题的态度对韦伯也有吸引力。不过，他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党派的坚定支持者。后来，他常常提到自己的第一次投票，但从未谈及这样投票的动机。

“代际转变”已经发生。文化的太阳在继续运行，为年轻一代照亮了他们的父辈没有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不同的灵感去行动和探索。“新的冲动觉醒了……”

※ ※ ※

133

韦伯的这些兴趣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特性：这些兴趣既受到了民族政治理想的影响，也受到刚刚唤起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影响。关于经济、技术和国家机构，他首先探讨的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适于支撑起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同这个问题

一起，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要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确保德国人——不管是农民还是产业工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民族强盛的基础——过上有尊严的、快乐的和健康的生活呢？

韦伯对于民族强国的激情显然是出于不受任何反思影响的天生直觉：一个强大的民族是一个强有力的个人的躯体的延伸，肯定这个民族就是肯定自身。他心中萌生的社会关切因为他自己亲近的人（他母亲、伊达·鲍姆加藤和奥托）由衷地珍视社会关怀而变得更加强烈。

韦伯参加了由奥托·鲍姆加藤创办的一个新杂志的工作，该杂志致力于教士的社会启蒙。教士应该同热心于社会问题的政治家和官员们建立联系以增进两个不同领域的相互了解。韦伯还努力吸引赫尔曼·鲍姆加藤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在给赫尔曼的信中韦伯写道：

如果神学家——就像在这件事情上一样——感到有义务用其他世俗之人使用的语言，相当冷静客观地说话，那么，这对他们肯定有益，会有助于他们的职业受到尊敬。另一方面，世俗之人，尤其是年轻官员和那些热心于社会政策的人，则在非常严重的程度上习惯于以一种传统和肤浅的方式对教会表示尊重。与此相应，他们——除了那些漠不关心此事的人之外——严重怀疑神职人员的具体办事能力。即便我们仅仅从热心于社会问题的年轻政治家对价值的社会尺度所做的判断来考虑，仅仅从他们对天主教教会（与新教相比较）的能力所做的判断来考虑，我觉得，让这些圈子里的人习惯于同已经被他们一笔勾销的僧侣们合作的想法也是有所裨益的。

1891年

※ ※ ※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就已经出现了；甚至可以说，现代产业阶级的实际问题已经进入到明智的人们的意识和心里。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资产阶级小团体就已经再次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关注社会问题，否则将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初创阶段的喜好炫耀财富、大工业发展所创造的新财富以及任凭自己的攫取冲动肆虐，这一切把有产者同广大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划分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界限分明。天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为无产者锻造了精神武器，供他们用来同现存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将千百万人束缚在机器上，给这千百万人提供的回报仅能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存——作斗争。社会民主党——它代表那些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这些人能够“失去的只是锁链”——动摇了使这种状况

134

神圣化的财产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同时，它试图用新的价值标准让大众摆脱教会的符咒，因为教会让有产者感到心安理得，将无产者导向来世，为国家扮演了“黑衫警察”的角色。

经济学领域的不少学者，如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施莫勒（Schmoller）、勃伦塔诺（Brentano）、克纳普（Knapp）和其他一些人，以及像格奈斯特这样的法学教师，都认识到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批判是有道理的。其中几人把阶级冲突激化也部分归咎于自由贸易学说主张的自由放任，以及赞同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的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他们要求经济重新接受道德理想的导向，要求国家对自由劳动契约加以管理控制。这些被反对派戏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的人通过他们的课堂讲授和著述对学生产生了影响。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对国家产生影响，他们创建了“社会政策学会”（1873年），一些商人、工业家和官员也加入了这个学会。

135 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参加了在埃森纳赫（Eisenach）举办的筹建讨论会，讨论会的兴趣集中在劳工问题上。古斯塔夫·施莫勒草拟了一份纲领，学会虽作了很多补充，但原则上予以采纳。施莫勒信奉的国家观“既迥异于自然法主张的对个人任意加以赞美，也同主张国家拥有吞噬一切的权力那种专制理论相去甚远”。他承认技术的辉煌进步及其带来的经济成就，但也看到了财富和收入上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严重弊端及其对道德文明的影响。他认为，产生这些弊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分工和立法方面的进步总是关注生产的增长，而忽略了它们对人造成的影响。按他的说法，学会不想搞社会平均化，拒绝社会主义的实验，承认现存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但要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而斗争。

这批人首先要求国家对劳动契约加以管理，公布工厂法，控制银行和商业，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培训和住房等等。学会将学者和做实际工作的人聚集一堂，使科学工作服务于生活。为此目的，他们组织了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共同探讨；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材料应用作口头讨论的基础。学会在成立的头十年里，曾直接向立法者提交过自己的议案。那时学会的会议充满了活跃的宣传气氛，旨在让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社会政策。不过，俾斯麦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社会政策，致使学会对国家机器产生直接影响的前景变得黯淡，学会从此便放弃了鼓动宣传，以学术性的讨论代替了具有宣传性质的讨论，把重心移向了对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严格的科学探讨上。

韦伯是在这个阶段加入学会的，他后来一直保留着会籍。当时，农业问题是当务之急，因为大地主——这个阶级直到那时一直声称自己负有保护国家的特殊使命——这时要求国家给他们提供特殊保护，采用提高粮食关税、禁止迁移等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136 大约在1890—1891年，韦伯受托于学会，着手研究农业工人的状况。他组织了一

次调查，为此韦伯设计了一份发给地主的问卷。收集上来的材料分发给几个热心于社会问题的年轻政治家。韦伯自己承担了最重要的部分：《德国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的状况》（*Die Lage der Landarbeiter im ostelbischen Deutschland*）。韦伯在一年时间内，在教授刚开的法学课程的同时，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了这部内容丰富、长达九百页的政治经济学处女作。这部作品立刻为这位年轻学者在自己专业之外的学科里赢得了声誉，从此他便被视为农业问题专家。

在1893年年初学会举行的大会上，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农业史方面的扛鼎人物之一克纳普就这项调查的结果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一部关于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状况的专著终于经马克斯·韦伯博士之手写成了，其思想之丰富和见解之深刻令所有读者都感到惊讶。这部论著首先让我感到，我们的专业知识已经过时，我们必须从头学起。”

这个场合是韦伯第一次面对众多的学者和热心于社会问题的政治家讲话。他无须任何讲稿，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sup>①</sup>农业工人的状况概述如下：土地贵族开始感到劳动力短缺。身体最强壮、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农业人口——他们自古以来就为土地贵族做手工劳役和使役牲畜的劳役来换取实物工资——背井离乡，移居海外或者去充塞大城市。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俄国人涌入德国东部边境地区，这些地区以前俾斯麦只对季节工开放，而对移民是关闭的。而俾斯麦的继任者则无力抵挡土地贵族的压力。现在外国人（起初是作为季节工）可以畅通无阻地涌入。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滞留不走，以这种方式占据了德国东部边境地区，这些地区是几百年前德国从这些民族手中夺过来的。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危险在哪里？怎样应对这种危险？这些问题不仅应当引起当事人的关注，也必须引起政治家的关注。

首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呢？调查结果表明，德国东部农村地区人口减少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旧的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因大规模农业经营而解体。地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不再给予佃农旧时享有的权益和实物工资，而是代之以货币工资。他们的经营是为了销售，这样他们就从家长制的领主阶级变成了商业型的企业主阶级，由此毁灭了旧时同自己的工人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对弱势的农业工人来说，土地的收成中不再有他的份，他也没有希望通过拥有自己的土地而获得独立，于是他就离开了主人，不再受其雇佣。他们离开并非出于物质上的原因，因为离去的正是那些工资最高的人，而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那就是自由。“他们的幻想表明了，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理想，而且这种理想比生计问题更为强而有力。”如果主人对个体的农业工人承担的个人责任不复存在，那么，农业工人对主人的个人附属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结果是，土地贵族对廉价和驯服的劳动力产生了兴趣。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被弄进了这个国

<sup>①</sup> 参见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444f.

家，而在德国东部地区这恰恰意味着一场严重的民族危机。外国人的移入增强了当地居民迁出的冲动。此外，德国农村人口的营养与文化水准也被降到了较为低下的东方文明的水平。

138 韦伯从一个政治家的严厉观点来看待他所阐明的整个过程。“在此我把农业工人的问题只是作为一个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来看待，也就是说，它既无关乎农业工人日子过得好坏，也无关乎怎样为大地主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他认为，农业政策不能由农业生产的利益来决定，而必须由国家利益来决定，即保持密集、强壮和忠于自己家乡的农村人口，以此为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后备军，并以和平的方式保卫德国东部边境地区。因此，德国应当重新关闭边境，阻止大地主侵占耕地，系统地进行殖民。“我们希望用心理的而不是法律的纽带将小农维系在祖国的土地上。我要坦率地说，我们希望利用他们对土地的渴求把他们拴在故乡，为了确保德国的未来，即使我们得将整整一代人夯进土地里，我们也要肩负起这个责任。”

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带着一种特有的无奈心态看待当前的使命：

我不知道我的同辈在这一刻是否像我一样强烈地感觉到，从大众一直到最高层，妨碍着民族的就是效仿前人这样一个毒咒。我们面临的任务与父辈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再去恢复激励着前辈们的那种天真无邪、充满激情的精力……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诉诸整个民族沸腾的激情，那时他们面临的是缔造民族统一和自由宪法的使命。

不过，他的眼前也浮现出民族的未来，为了这个未来，值得去从事那些同父辈的工作相比显得渺小得多的国内政治任务。

有朝一日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说：此时此刻，普鲁士国家适时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使命。我们当然会对未来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未来将会兑现我们正在开出的汇票。我们希望，在垂暮之年，我们将被赐予年轻时未能获得的东西：用冷静的目光去展望民族的未来，在国家和民众稳固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去完成我们那时将面临的**文化使命**。

“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撒迦利亚书》，14：7）——这是一个具有政治直觉和敏锐判断力的年轻人所抱的希望，那时他对身负重任的民族领导人的行为举止就已经深感忧虑了。——然而，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刻，他将面临最黑暗的日子。





社会政策学会促进韦伯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扩展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与此同时，另一个相邻的领域也激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关切。受讲坛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启迪，并同他们密切合作，一批新教神学家接过了社会政策学会所放弃的社会宣传鼓动活动。像天主教会一样，新教教会也意识到，仅仅靠慈善活动来帮助无产阶级摆脱苦难是不够的。同时，它也看到了自身存在的危机。社会民主党可怕的增长几乎促成了一场精神上的“颠覆”，导致了人民大众摒弃基督教，并且把自己从传统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种危险帮助他们睁开了双眼：他们认识到了机器时代造成的影响，面对他们以前没能或不愿看到的现象而感到震撼。他们以新的眼光去研究《圣经》，发现有些社会主义的要求可以从基督教教义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139

有几个神职人员与讲坛社会主义者一起创建了一个协会，要求教会“坚决支持第四等级的合理要求”，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支持劳工，进而推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政策”。施托克尔呼吁牧师研究社会问题，在一个基督教社会党内联合起来。这个圈子里的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适于基督教的经济形式。这位宫廷牧师是位天才的鼓动家，他提醒基督教国家不要忘了自己的义务，敦促有产者满足无产者的合理要求。他在君主政体—基督教原则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工人政党，希望以此把民众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夺过来。结果是徒劳的。他的党在工人中未获成功，因而变成了一个“小人物”的政党，符合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强烈的保守色彩。这个党把矛头尖锐地指向犹太人和与教会疏远的自由主义者，因而也限制了对资产阶级的影响。它还因俾斯麦的政党联盟政策从外部遭到扼杀。教会当局警告他们，不要将宗教和政治搅和在一起。然而，让教会更靠近人们的生活，让保守圈子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努力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施托克尔于是在外交政策上寻求能够产生影响的领域。1890年，他组织召开了第一届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大会旨在为具有不同倾向的神学家、关心社会问题的官员、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提供一个超党派的聚会场所和论坛，以共同探讨紧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第一次大会于1890年圣灵神降临周召开。应邀与会者包括具有各种政治和宗教倾向、“维护国家和亲教会”的人士。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名流，特别是神学家，包括不少教会显要，出席了大会。1890年2月4日的皇帝敕令要求更多地立法以保护工人阶级，这个敕令对右派是一个安抚，让他们觉得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并非误入歧途。此外，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即将被废除，必须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出现革命的危险。为此，高教会高层如施托克尔、纳图西乌斯（Nathusius）、克雷默（Kremer）和德吕安德尔（Dryander），思想自由且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神学家如卡夫坦（Kaftan）、冯·佐登 140

(von Soden)、冯·哈纳克 (von Harnack)，以及一些年轻人像拉德 (Rade)、鲍姆加藤、格尔 (Göhre) 和博努斯 (Bonus) 达成了一致。一些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也参加了代表大会。右翼人士里，年迈的冯·博德尔施文格 (von Bodelschwingh) 牧师的纯洁的形象令人动容。他朴素的宗教虔诚和情同手足的爱心让人呼吸到真正的耶稣使徒的精神空气。正统派和自由派权威就神学问题和教会政策的论战起初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人们主要使用“迦南的语言”，避免任何偏激的言词。他们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党，指责他们从牧羊人手中夺走了羊群，要把它们带往没有信仰、敌视权威的沙漠。不过，这些与会者倒是真诚地表达了乐于相助之意，愿意比以前更为深入地探索社会民主党崛起的必然缘由。

代表大会认为，对于宗教和经济危机，大家都难辞其咎，决定要努力“使各阶级意识到对其他阶级负有的社会责任，并履行这些责任，特别要让雇主承认劳动在道德上具有平等的价值”。格雷想要通过亲身体验来了解工业无产阶级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  
141 特意去一个工厂当了几个月的工人，然后发表了一篇颇具轰动效应的印象记。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是工人的新“宗教”——唯物史观。大会宣称，克服唯物史观是教会最重要的社会使命；同时还决定，不能够也不允许以教会的名义反对工人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追求经济目标。

海伦妮·韦伯及其长子马克思也在听众中。马克思写道：“听那些常常有些幼稚但大多有独到见解的牧师们相互争吵，总给我母亲带来很多乐趣。这些牧师相信慈爱的上帝有更高明的见解，以轻易得令人羡慕的方式对付让我们绞尽脑汁的经济问题，同时又无肤浅之虞，你别说，这还真让人有点耳目一新之感。”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正统的红衣主教会议成员开始抨击格雷的文章，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韦伯在《基督教世界》(Die Christliche Welt) 杂志上为格雷辩护道：“格雷的研究在年轻的神学家与关心社会问题的政治家以及未来的官员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我——而且不仅仅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证明这一点……”同时，针对工人要从教会信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精神诉求，韦伯驳斥了在年长的神学家中仍然流行的专制主义观点：“现代工人要求的不是宽容、善意的理解和做善事；他们要求承认他们有权跟所谓有教养的人们一样，用同样的方法去思考同样的事情。”“他们的思想已经从传统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了，我们不仅应当理解和宽容地看待这一点，而且要予以重视，承认它的合理性。”

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还有弗里德里希·瑙曼，他当时是位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的传教团的牧师，已经以“穷人的牧师”和年轻一代基督教社会运动的领袖而闻名。在那个圈子里，他是激愤的狂飙突进式的人物，他对社会问题的热忱转变了那些比较学者型和头脑冷静的人从容不迫的神学诡辩，促使他们无条件承认社会困境和基督徒的义务。

142 起初，瑙曼只是把自己看作无产阶级的辩护士。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具有

真诚的宗教情怀，但不受教条束缚，对教会政治漠不关心。他不谋求个人或党派的权力，只是希望帮助无产者获得他们的现世权利，同时带给他们新的希望和信仰。只是由于他的宗教信仰的原因，他才没有加入社会民主党。他希望一个富有生气、不断发展的基督教从精神上战胜马克思主义，希望基督教社会时代能够取代社会民主主义。“对我们来说，基督教社会运动正处在发展过程之中，是一首激昂的春之歌，充溢在我们的心头。”在具体事务上，他和施托克尔一样抱着这样的希望：有可能开展一场解脱了国际关系的羁绊、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并驾齐驱和有同样良好组织的基督教运动。耶稣应当作为大众的一员而复活，基督教的信念应当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瑙曼把社会主义称为世俗的千年至福说，虽然人的罪过阻止了它的实现，但是，“基督教徒必须相信，自己创造现世幸福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否则，他们的工作就没有什么道德和热情可言”。他在福音中虽然找不到关于理想经济制度的教导，但却得到一些指南：“根据《新约》，消除贫困是基督教的当务之急。”对于这样的阐释和论点，神学权威摇着头表示怀疑，但瑙曼的思想对年轻人特别具有吸引力。他们同他一起拒绝接受长者试图掩饰阶级差别的那种训导方式。“我们希望用福音的灿烂之光照亮我们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借着这光亮找寻改善这种状况和弥补我们的道德缺陷的途径。”站在瑙曼一边的有神学家奥托·鲍姆加藤，奥托当时是《福音派社会时事问题》的编辑；有马丁·拉德，他的《基督教世界》周刊透出不受教条束缚的宗教虔诚；有保罗·格雷，他第一个通过亲身体会了解了无产阶级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外环境；还有其他一些人——一个由热情和纯洁的人们组成的圈子，因一个崇高的愿望而聚集在一起。

瑙曼和格雷曾希望，工人能以一个政党的形式联合起来，与自由民主党并存，可是像施托克尔的遭遇一样，事实证明他们的希望无法实现。不过，相较于以往的思潮，瑙曼和他的朋友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思维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影响，因为瑙曼的影响不是论战型的，而完全是实证型的。他不仅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先知，而且有着“神助般的清醒”，总试图根据事情本身的可能性来把握和处理具体事务。他是个思想家，不懈地追求对现时的客观认识，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总是在经过科学训练的人那里寻求忠告和指点。 143

瑙曼和韦伯相识于最早的几次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他们的相识很快发展成了友谊，这对瑙曼来说变得尤其重要。他在这位年轻人身上感受到了自己所缺乏的天生的政治敏锐性，并很快选择以这位年轻的专家作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获得知识的源头活水和指路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一致认定，机器和工业主义是一个大国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的必要条件。他们不想让历史的车轮倒转，而是希望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同它的弊病作斗争。此外，二人都认为易北河东岸省份里大地主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是民族和社会的灾难。

瑙曼从韦伯那里接受的主要是后者关于国家实力的判断。在韦伯的影响下，瑙曼认

识到，保持和提高德国的强国地位是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而且要让大众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二人政治活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根据实力国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勤劳的人民，他们政治上完全成熟，既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能够为民族的命运承担一份责任。瑙曼后来为此而使用了一个简明的表达形式——“民主和帝制”，他希望威廉二世下决心成为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皇帝”。

按照格雷和韦伯（他们二人也已经成了朋友）的建议，第五次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计划讨论农业问题。朋友们一起再次对农业工人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上次社会政策学会的问卷是寄给雇主的，这次不同，他们把问卷寄给了乡村牧师，这些人比较客观。此外，这种方式也意在唤起乡村牧师对社会活动的兴趣。

这次调查的目的不仅要探究农业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要探究他们的精神、道德和宗教状况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像上次一样，他们汇集了大量的材料，格雷和韦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五次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1894年）上就此作了报告。结果与上次调查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补充。

韦伯研究这个课题时使用的观点中有一点颇令人感兴趣：他用具体材料阐明了经济史观的局限性。“工资钢铁定律”在农村并不适用，工资低和生活费用高以及工人生活水平低和土地质量高并存不悖（反之亦然）。决定农业工人命运和基本状况的关键因素，不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一般经济状况，而是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分层；在农村地区，这种分层不是取决于技术和经济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口的聚合方式、企业和土地的分配以及劳动契约的法律形态。

韦伯的论述背后的潜台词仍然是个人命运要严格服从民族利益。为此，他在这个讲台上表明自己不同意瑙曼的看法，明确驳斥了想要和能够为大众创造幸福的观念：

我们搞社会政治不是要为人们创造幸福。……昨天晚上，我们在瑙曼牧师的致词中可以听出为人们造福的无限渴望，这无疑让我们大家都为之动容。但是，从悲观的立场出发，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得出了一个在我看来要比这重要得无可比拟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在任何社会立法过程中都必须摒弃创造实在的幸福感的想法。我们希冀的是别的东西，也只能希冀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在我们看来在人身上有价值的东西，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强烈的上进心以及对人类精神和道德价值的努力追求，即使这种上进心和追求还只是以最原始的形态出现，我们也应当加以保护和支持。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这样的方式来创造人的外部条件，其目的并不是要让人们感到愉快，而是要在不可避免的生存竞争的艰难困苦中让他们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东西——身体素质和精神素养——得到保护，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希望维护这些素质。

## 第 5 章 家中生活与个人发展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韦伯其他方面的发展，回到 1886 年，首先看看他生活的家庭的状况。 146

海伦妮在母亲逝世后得到了一笔在当时算得上可观的遗产，从外表上看，她家的生活方式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活谈不上奢华——由于一大家子花销太大，这本来也不可能——但位于莱布尼茨大街上那栋朴素的别墅在 1885 年进行了第二次扩建，增加了几间客厅。这使他们感到有义务在家里安排更多的社交活动，这样新朋老友得以来去自如，由此丰富了韦伯家大多数家庭成员的生活，尤其是海伦妮的生活，因为只有当她同别人分享的时候，她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

她最乐此不疲的是看到星期天她家满屋满院都是跟她儿子同龄的年轻人，因此她敞开自家的大门，欢迎各种各样尚未成家的人。她把那些在柏林上学的年轻姑娘称为自己的“周日女儿”：

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有时间并且也乐意在这样的日子对尽可能多的人敞开自家的大门。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这远胜于他们不加鉴别地阅读和谈论那些报纸塞进他们年轻的头脑里的胡言乱语。这样他们就会不时地听到一些有思想的东西。据我多次反复观察，让大家感到舒适满意并不费事，提供一点冷餐肉、茶水和啤酒之类即可。

在这样的周日，年轻的朋友们无论男女，都可以随意来她家，他们通常于下午聚集在餐桌边。这些周日的聚会伴随着儿子们成长，成了一笔十分可贵的财富。 147

人们聚集在这位举止优雅、充满活力的女性身边，她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兴致

盎然。她的眼里透出纯洁的善良和同情心。她从不寻求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交往，她最关爱的是那些弱者。如果聚会规模小，他们就会在下午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演奏音乐或朗诵。她自己或她家“老大”能使那些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比如弗里茨·罗伊特（Fritz Reuter）的作品——变得富有生命力，而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学细胞”的人。不过，多数时间聚会者会就政治、社会和人的话题热烈地交换看法，很快那位见习律师（虽非所愿）就成了年轻人的精神中心。当然，到了晚上消耗的就不再是“一点肉”，而是大堆的烤肉和连接起来得以英里记的香肠了。为了不占用仆人的休息时间，海伦妮通常亲自同自己庇护下的年轻女士一起张罗一切，她们在大厨房里兴高采烈地忙个不停。韦伯自己这样叙述了他父母不在时周日是怎么过的：

这两个星期天家里都很热闹。头一个周日就我和奥托（鲍姆加藤）一起吃午饭。下午第一个到来的是瓦尔特·洛茨博士，他像往常一样给我带来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接着到来的是哈根（Hagen）和卡尔·莫姆森。我们把时间合理分配在打台球和玩斯卡特牌上，一个下午就这样消耗掉了。晚饭后，让莫姆森颇感痛苦的是，我们转而开始了关于罢工、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施托克尔和其他政治问题的热烈讨论，反对帝国的人占了令人震惊的多数。这场讨论持续的时间很长，以致奥托差点没赶上最后一班火车，其他人差点没误了末班有轨马车。

148

第二个星期天则过得比较按部就班，纳瑟（Nasse）和洛茨从中午一直到下午都在。纳瑟巧妙地将话题引到了银行和货币问题上，这些话题是洛茨的专业领域，与纳瑟无关，于是纳瑟得以满足自己的所好：舒舒服服地躺在阳台躺椅上听别人讲话。他真是怪人，尽管他只听得一知半解，但仍乐在其中。傍晚时分，格雷贝尔（Greber）、霍迈尔（Homeyer），当然还有卡尔·莫姆森和我们一起玩斯卡特牌——这牌可是非玩儿不可，因为纳瑟是专门冲这个来的。此外，奥托也来了，他刚从汉堡和基尔归来。有六个倒霉的东非男护士从意大利南部给他（这个食人者口中的食物）写来一封可怜至极的信，说他们的钱全花光了，想请他（因为他们自己实在难为情！）代他们向维歇恩（Wichern）先生说情，给他们一些整个世界都在渴求的东西。如果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你主动替别人付了酒钱，这就是下场！……年轻人中间似乎存在着骇人听闻的困惑和令人恐惧的愚蠢。如果他们在非洲继续这样干，大约很快就会像《飞页》（*Fliegende Blätter*）杂志中那幅漂亮的插图里画的那样，成为某个黑人酋长的食物冷藏室里的“传教士冷餐肉”。

在海伦妮的儿子们后来带回家来的年轻人中，也包括卡尔·黑尔费里希（Karl

Helffferich)。那时，把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政治经济学家和海伦妮的儿子们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他们对银行和证券政策的共同兴趣。他们把黑尔费里希介绍给了“政治科学学会”，这是一个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感兴趣的年轻人的圈子，他们定期在每个星期四聚会。

※ ※ ※

如前所述，海伦妮的这种无拘无束的殷勤好客的行为对她来说是一种需要，这样做在她就像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不过，社交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他们为年长的社会名流举行正式社交聚会的义务，这类场合要求按照社交礼仪细心地将长长的菜单上的食品和饮料依序呈上。这给海伦妮增添了新的负担，使她的闲暇时间更不如前：“要是哪怕能有一次感觉到我一天的事情已经忙完了一半，那该有多好啊！要是我能自己静静地读读书，写写东西，做点什么事情，同时又不至于因此而对别人有所妨碍，那该有多好！可是我甚至连非做不可的事情都做不完……”况且，把钱花在美酒佳肴这样的奢侈消费上，而不能为那些贫困者留出至少同样数目的钱，这样做对吗？不过，她没有勇气跟丈夫谈论这个问题，也确实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实上，她丈夫已经开始认为，她越来越渴望将她自己的财富慷慨地同别人分享是一种怪癖，他将此归咎于伊达的影响。 149

因此，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让海伦妮也有权支配她自己的财产。相反，他有那个时代大丈夫的典型需求：独自决定家庭支出，而且不让妻子和孩子们知道家里的总收入是多少。他那一代人为家长制的权力需求进行辩护的理由是，女人反正根本就不懂理财，管理财务也不符合她们的“天性”。所以，因循着这样的传统，海伦妮四十多岁了还既没有一笔确定的持家费用，也没有供自己个人使用的专用款项。相反，她不得不拿着从来就不准确的记账簿，去一笔一笔地要家庭和自己需要的费用。因此，她总是受到控制，而且常常受到责难。在这类场合同样司空见惯的是，她丈夫常对大笔开支感到惊讶，尽管他自己根本就无法判断这些费用有无必要。自从家庭收入大半来自自己的财产以后，她便越来越感到这种状况不合逻辑，感到心情郁闷。

假如海伦妮能适时鼓起勇气，甘愿冒与丈夫发生争执的危险，迫使这种成规得到改变，也许情况会有所好转。一向很勇敢的她，在这件事情上却太过软弱——为此她后来也自责；但这件事毕竟只关系到她自身的利益，而且她即便在那时也还没有摆脱上帝所愿的从属和迁就。虽然她并未掩饰这种状况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她丈夫却视若无睹，因为他认为，作为一家之长，他有责任让家产不受损失，并管束他那不善理财又过于慷慨的妻子。他压根儿就没有做善事的天性，对自己享受殷实之士的奢侈挥霍的生活感到心安理得。 150

假如海伦妮同丈夫作斗争而不是逆来顺受，不管从哪方面来讲情况都不至于这么糟，可是等到海伦妮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因为现在她常常感到压力太大，不得不靠已成年的儿子来缓解这种压力。可这样做又无意中使儿子跟父亲反目。同时儿子也意识到，把母亲的痛苦都归咎于父亲并不合理。由于海伦妮常常不顺心，所以渐渐失去了自己在家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她感到为自己的舒适生活做得太多，而“为他人做得不够”，因此总是于心不安。于是她开始尽量在自己身上节省开支，除了日常家务，她还做一些过去需要雇人做的事情，用这样的“工资收入”攒下私房钱来接济穷人。夜里躺在床上，想到大城市里数十万人尚无温暖的栖身之所，她感到浑身难受。每当丈夫送她比较大的礼物时，她都宁愿把买礼物的钱用来救济穷人。简而言之，她越是觉得自己的慈善活动受到限制，她天性中乐于解囊布施的愿望就变得愈加强烈。她对同胞兄弟怀着古道热肠，假如能够放弃一切奢华，她不会感到那是一种牺牲，反而会觉得是令人解脱的恩惠。她现在也像姐姐伊达一样，对于福音书的教诲与社会中上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和谐，总感到有如芒刺在身。所有让她深受触动的人和事，现在在她那个社会圈子里汇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社会关怀的激流。

151 长期以来，海伦妮一直关注着年轻的神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探究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大众背离基督教的原因。现在年轻一代和她的儿子们也看到并明确表述了所有这些问题！她为此感到高兴，打心眼里希望年轻人认识到原因后也能找到补救的办法，她愿意为此而倾其所有。这种把她同奥托·鲍姆加藤、格雷、瑞曼和拉德联系在一起 的宗教和社会关怀，是她刚刚进入晚年的生命的源头活水。但她丈夫却不与这些年轻人 为伍，他一如既往，是个中产阶级中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

在我们家里，恰恰是对这一类事情的兴趣特别难以表达。老一代的自由思想通常容不得异议，凡是与这种思维模式不合的东西，不仅会招致反感，而且会引起某种恐慌，于是内心就会产生冲突和压制冲突的企图。我们的自由主义者生来就惧怕“穿黑衫的人”，使他们怀疑每一个牧师都至少具有成为伪善者的潜质。

海伦妮愿意接受的其他现代思潮，也遭到老韦伯的拒绝。随同社会问题一起，女权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容再被忽视的是，成千上万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姑娘已不再确信，自己生活的幸福和人生的实现得从男人手上获得。青年男子为谋求好的职业所需的职业培训时间——包括服义务兵役的时间——长得没有尽头，从而把结婚年龄推迟到三十开外了。年轻姑娘们不得不因此等很长时间，终身未嫁的女人与日俱增。对这些女子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她们不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愉快的工作来充实自己，她们的生活就会是空洞的，就不会获得独立！



海伦妮自己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她是最早一批理解当时年轻姑娘们痛苦的内心挣扎的人。她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千千万万的姑娘正面临着毫无结果地忍受痛苦和生命凋零的危险，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是她们处于像住在雇主家中的年轻女佣一般的依附状态，以及在等待男人中虚度岁月。她一旦了解到妇女们正在为获得更高的精神修养和更广泛的影响而共同奋斗，便立即受到触动并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当时的妇女联合行动还如雏鸟刚开始怯生生地扇动嫩翅，但她立刻给予了支持。让她熟悉这一切的是一位朋友，即议员里希特的夫人，里希特夫人纤巧的身躯里蕴藏着一颗伟大的自由心。

里希特夫人前几天给我寄来了准许女教师上大学的备忘录和请愿书，尽管我丈夫不想与此有任何瓜葛，我还是在上面签了名……主张教育要更加注重独立思考，应视学生的天赋和爱好专注于少数几个专业的动议，在我看来很有道理。 152

她自己作为母亲的经历还让她看到了女性教育问题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她一直在监护指导自己学龄子女的精神方面的发展。大的几个儿子天赋过人，早就不需要她指导了。现在，她感到最小的儿子和女儿们成长迅速，也很快就会无须她来指导了。

我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关心阿图尔的功课，让他别像卡尔那样懒散。现在，克拉拉也越来越需要我来管，每天都让我痛楚地感到，自己所学的知识中实用的东西太少了。不管是语法、正字法还是历史，我都拿不准。要依着我，女孩子们应当参加毕业考试。我丈夫对此完全没有兴趣。

1888年

我们前面谈到过，她的大儿子马克斯在做见习律师时就产生了那样的社会关切，成了在所有社会问题上都能给母亲提供咨询的专家。很快，阿尔弗雷德也给她带来了同样的快乐。

大约在那个时候，她和另一个年轻的神学家弗格特（Voigt）有了密切的交往，这位神学家来家里给老三卡尔做了一年的辅导教师。从他那里海伦妮得到了自己的儿子们不愿给她的东西，即让她洞悉处于挣扎中的、极为纯洁的年轻心灵。她现在得以影响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因其宗教禀赋在性格特质上跟海伦妮十分相近，因而海伦妮对其影响程度胜过她自己的孩子。海伦妮第一次能够与一个心灵相通的人共度每天的时光。她也跟他一起谈论自己对卡尔的担忧，在试了其他办法都不奏效之后，正是为了引导卡尔他才到家里来的。

在成长发育时期，第三个儿子卡尔与哥哥们有显著的区别。他天赋甚高，长得英俊

153

可爱，从小就有很强的表现力，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是一个善于取悦世人、富有吸引力的轻浮子弟。他在学校表现懒惰，容易被那些吊儿郎当的同学引入歧途。总之，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异数。母亲已经视他为“浪子”，带着既担心又怜爱的心情关注着他。同以前一样，每一次在孩子的问题上未能如愿以偿，海伦妮总觉得是自己的失败，而这实际上是因为别人的品性和不可避免的环境影响造成的结果。这位年轻的神学家很机智地驯服了这匹幼驹，为此海伦妮对他非常感激。但是，同这位心灵相通的年轻人在家里交往所带来的喜悦为时不长。海伦妮的丈夫按其本性不可能希望看到自己的妻子——他深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并想要继续控制她——对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不可能希望看到她同任何自己没有兴趣的人密切来往。他不等这年轻人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将他辞退了。海伦妮认为这件事无论是对这个青年还是对儿子都不公平，对此她长期无法释怀。

※ ※ ※

就这样，这个有三个成年的儿子（每个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朋友圈子）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家庭，生活异常丰富多彩，但奏出的乐章并不和谐，要让具有不同气质、有着不同追求的家庭成员和谐一致必然会越来越困难。固然，外人仍然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他们看到的只是幽默诙谐和蓬勃朝气，只是充盈着这个家庭圈子的重要的兴趣爱好以及海伦妮包容一切的善良。为了让海伦妮高兴，一家人晚上常常聚集在按“早期德国样式”布置的房间里一起阅读。他们友善相处，自我节制，常常相互取笑逗乐。但整个基调很暗淡，海伦妮那颗慈爱的心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她没能创造一个充满同情和好感的氛围，从而弥合父亲和成年的儿子们内心的分歧，以达到消除所有不和谐的目的。真正的悲剧在于她自己和她的婚姻带给她的痛苦——这已经瞒不过她的几个大孩子了——最终成了一切问题的焦点。她对这一切看得比以前更重，因为她已经再也没有用之不竭的精力去对付这些矛盾了。

154

在银婚纪念日那天——对许许多多的婚姻来说，这一天便是迈向生命之秋的艰难过渡期——尽管有六个生气勃勃、才华出众的孩子聚集在他们夫妇身边，海伦妮仍然隐隐感到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笼罩着这个日子。当然，无数前来庆贺的朋友得到的印象是，这对伉俪的婚姻完美幸福，生活充裕丰富。不过，最让海伦妮高兴的是，她的姐妹们赠送了一幅画，画中可以看到月光下迷人的景色衬托出海德堡旧宅阳台上已故父母的身影。她家的“老大”一早就把这幅画挂在海伦妮的房间里。只要当日——她为这一天的庆典和来客操持奔忙着——的热闹喧嚣能让她有片刻忙里偷闲的工夫，她就会溜进自己的房间，满足一下对远方的亲人、对逝去的青春和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渴望。



对于大儿子来说，所有这一切以及他自己当时不甚满意的生活方式所意味的内容，可以在他给密友埃米·鲍姆加藤的信中见出些端倪。做见习律师那些年头，那些单调机械的工作——简单的文书工作——占用了他很多时间。法庭大量使用年轻人做书记员，韦伯本能地厌恶此事。这期间，他的字迹越来越潦草，变得有如象形文字般难以辨认，有时弄得只好重新讯问证人，所以很快让人觉得应当给他另派任务。然而，新的工作也很少能让他满意。为什么呢？后来回顾此事时他解释说：

担任见习律师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堪回首。令人难受的事情莫过于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你的精力只能用上半或一半都用不到，同时你的工作时间又让你不可能找到别的什么固定职业，而且对此你又无可奈何，也就是说，你无法通过更加努力工作而把这四年的沙漠朝圣旅行缩短哪怕是一分钟。这让你感觉到，仿佛有铅一般的重量拽着你，把你拉向精神萎靡和怠惰的卧榻。……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同千千万万对“职业”的概念一无所知的人们相比，我算是极为幸运的了，可我当时确实羡慕每一个诚实谋生的体力劳动者。

155

韦伯通过勤奋紧张地继续自己的学业才得以逃离这一时期精神的荒原，才得以避免流于怠惰。他最初的目标是在法学院读博士学位，当时柏林大学对此要求很高。对于这个大脑在不停工作的人，唯一较长的休假机会就是反复参加每次为期约两个月的军官训练。这样，他习惯于伏案工作的硕重的身体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令人吃惊的是，尽管韦伯缺乏锻炼，他却能受得了各种劳顿。起初，军训还让他能够同德国南部他已经很熟悉的亲戚家有愉快接触的机会。可是，当他所在的团在1888年移驻波兹南（Posen）后，这个让他得到情感满足的源泉就枯竭了。然而，新的环境满足了他进行观察和亲身体会的需求。他满怀兴致地对社会状况进行了观察，认识到在东部边境地区，普鲁士精神在这里跟在阿尔萨斯一样很难将外国人同德意志文化融合在一起，很难使“道德”的征服与政治征服并驾齐驱。1888年一次军训结束时，韦伯参观了一个普鲁士移民安置委员会的种植园，“那里人们正尝试在国家出资购买的原贵族土地上建立德国农庄”。从那时起他就感到，通过移民政策征服东部地区是政治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最后几次军训期间，韦伯有一次从施里姆（Schrimm）给海伦妮写信说：

终于有这么一次公务结束得这么早，校样也完成了不少，所以今天有时间给你

156

写信。从整个服兵役的情况来看，自从我上次应召服役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勤务工作量，尤其是军官的勤务工作量大大增加。我们这里唯一的远距离活动就是去射击场——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sup>①</sup>，我每天都得步行一个来回，这就把我的勤务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再次提前满足了我今后十年对散步的兴趣。

除此之外，我对服役的条件倒没什么好抱怨的。我遇到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连长，最主要的是他没有神经质。因为我是连里年龄最大的军官，所以这个上尉显然认为不宜——像时常发生的那样——给我分配比其他现役军官的工作更差、更缺乏独立性的工作。这些现役军官本身实际上都是相当易于相处的人，尽管我不能否认，与跟他们的交往相比我更喜欢我们“周四晚上的聚会”。当然，他们人数不多，我们十个人在军官食堂里用餐。这可比在波兹南的大食堂要舒服多了，那种食堂给人宴飨的感觉，实际上不过是寻常的大家同桌就餐而已。晚上我待在家的时间比我原来预想的要多。可是，这时常引得一两个或好几个人常来寒舍造访，结果是不比去饭馆吃晚饭来得更经济和更省时间。

当然，这里每天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截然不同。我现在起床的时间大约是我在柏林的最后几周里上床睡觉的时间。总的来讲，我不能说我军训期间要比平时睡得更多。这里要做的事情一点不累人，即便是大型野外演习和行军也没觉得吃力，尽管我觉得“在沙滩上跋涉”没什么乐趣可言。到现在为止我确实不能说我体重减轻了。相反，我的食量增长了大约四倍，所以我让军官食堂亏大了，也许他们很快会把我算作两个人。他们试图尽可能严格地执行罚款制度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这个制度建立在不成文的、十分复杂的法规上，而这个法规不用说外行，就连法学家也弄不清楚，可它却被同桌就餐者作为道德法庭来使用。由于收益用于为大家购买波列酒喝，所以这个陪审员的小金库颇注重财政收支，这方面的花费几乎是这里生活中最高昂的。除此之外，这里实际上要比斯特拉斯堡和波兹南便宜得多，尽管花钱不多，伙食却不比那两个地方的差，更重要的是分量一样足。

157

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完全可以忍受，其实可以说是非常舒适的。尤其是配有勤务兵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娇纵——让我都快忘了怎样穿衣脱衣，除非万不得已，已不知怎样挪动地方了。特别是我那个勤务兵，一个来自柏林的非常聪明伶俐的雕刻家（他这样称呼自己），不用我吩咐，就会把我生活所需的一切照料得十分出色，甚至将我的手稿、校样和文件都放置得整整齐齐——这我自己在家里一直没法做到。他还在我规定的范围内，神奇地变换着花样给我弄来各种各样的香肠和其他家常的美味食物。这样我就无须为必需的生活琐事而烦恼，就可以把公务之余的时间投入

<sup>①</sup> 1英里约为1.6093千米。——译者注

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确实做到了，尽管做得远没有我原打算的那么多，因为这些时间段老要受到公务的干扰。例如，今天我休息的时间是：11：00—13：00，13：00—15：00，17：00—18：30，19：30以后，按照这个时间表我做不了多少事情，尤其是考虑到次日5：30又要开始工作。《罗马农业史》的校样我总是立即着手处理，手稿完成得很快，不过由于我对注释部分做了大量改动，这样一来工作量不小。

我已经无法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写成这本书了。此外，我虽然抽时间进行了一点商法史的研究，但还没着手写一部真正的**专著**以获取在大学教授商法的资格，这样一部专著的内容得超出对戈尔德施密特的批评所提出的反驳。我倒是愿意在什么地方对奥尔登贝格（Oldenberg）的书写篇评论，这花不了太多时间，只要能想出一个适当的切入点，就可以在几小时内写完。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写评论的最佳方式就是躺在沙发上充分利用闲情逸致。不过，假如我现在躺在沙发上，肯定会睡过去的。

……最后两天里，我的活动安排包括花一个小时（！）讲授“祖国的历史”，一个小时（！）讲授哈布斯堡王朝。遗憾的是，六位亲王尚未成婚，否则六位王妃讲起来可为一个小时的课程提供丰富的材料，其丰富性不亚于一个小时的“祖国的历史”的材料……

158

## ※ ※ ※

在家里，韦伯这个见习律师除了法律事务外，在书本里扎得越来越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学术兴趣日渐浓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要尽快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陷于日常节奏由一家之长来决定的家庭生活之中，在经济上又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在思想上与他自己越来越陌生的父亲，这一切给他带来不断增长的压力，像一片乌云笼罩着他的生活。虽然他的幽默感和青春的蓬勃朝气能够不时冲破乌云，放射出光芒，然而终究无法完全驱散阴霾。由于韦伯性格内向，从不想通过袒露心迹，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来使自己内心得到解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更不可能了。他把一切都埋在自己心里，即使是他的女友也只得到一点暗示，而且是当女友问及他在父母家的情形时，他才作了这样的暗示。他现在比以前更喜欢一人独处：“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在哲学的孤独中沉思，这个房间就是我自己的家。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随意安排一天的事情，不会打扰别人，而且总有这样的感觉，仿佛能多做不少事情，也多出不少时间。所以我的命运的确是没有没什么可抱怨的，相反，我真不希望这种孤独过早结束。”

韦伯充分理解海伦妮的处境，对她抱有深深的关切和同情。韦伯的一位来访的表妹写道：“马克思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长女’。”尽管他们母子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对实际问题的兴趣毕竟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韦伯新近对工人阶级的状况给予的关注，不是像母亲那样产生于慈悲的情怀，而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他的兴趣在于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不过所有这些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除阶级差别，更为公平地分配社会责任和财富。很快他对被禁锢在毫无乐趣可言的机械劳动中的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命运也产生了热情的关怀。

这位二十三岁的见习律师同母亲一样对十七岁的卡尔深感忧虑，煞费苦心地思索着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对付这个聪颖而讨人喜欢却淘气的弟弟，应当建议母亲做些什么。回想他自己对母亲的态度，他觉得她的殷勤示爱 and 道德规劝都不合适。他的建议是对这个年轻人“加以限制”，但要少进行说教。母亲不在家时，他亲自照管了弟弟相当长一段时间，试图向母亲暗示采用一种更加间接的教育方式。他给女友的一封信反映了他的想法，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母亲、弟弟和他自己：

卡尔的问题很棘手。不幸的是，基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非常了解这个年轻人的整个秉性，尤其是他的轻浮放荡，了解一个人如何陷进去，进而越陷越深。对此我恐怕比我母亲更为了解。她总是认为，她可以并且应该以自己对这个令人担忧的孩子的一腔厚爱而使他不至堕落，保护他不让他内心变得苍凉和贫乏。我坚信这对一个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相信，一旦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自己对此也有亲身感受。如果我愿意，我甚至可以说出我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经历的。但这种方式也并非完全没有危险，这要取决于把锚抛在什么样的土地上。

照我看，卡尔的精神生活仍然是只图一时之快。在家里看到母亲一直为他忧虑，对他充满爱心，他乐于见此，我相信他一时也确实真心感激，有时还会把这种感激之情在他的行动中以着实令人喜爱的方式（诸如献殷勤等等）表现出来。可他一到学校，又碰到同样一帮轻浮、自命不凡的男孩子，他们由于轻率鲁莽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最坏的事情）。这些人已经把他看作自己一伙，现如今，要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也需要有相当大的道德勇气了。另一方面，他给自己找了一个简单的理由：那么多人都在干的事情，对他不可能是什么坏事。如果别人能做那些愚蠢讨厌的恶作剧，同时又希望并且能够相安于世，那他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他就跟他们一起干，不仅如此，为了得到他们的宠信，他比那些人干得有过的而无不及。我觉得，他常常是在家里做出了最好的打算，因而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好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此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种快感；而在学校里，他又产生了某种英雄气概，一种获得解放的非常特殊的感受。这样，他利用家里和学校一时的

情景来获得一时的快感，并忐忑不安地防止心里出现可能破坏这种瞬间享受的想法。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整个琐碎细节，谁知道未成年的人中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高？问题正在于，如果你对这个年龄段的人诉诸良心发现，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我相信这不会成功，犹如沙滩上的建筑，缺乏稳固的基础。至少就卡尔来说，唯一的结果就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承担责任，对于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我觉得我们应当做的只是让他不要完全丧失信心，让他继续感觉到别人在关心他，把他看作自己人，想要帮助他。除此之外，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对他干的每一件坏事都得表示反感，可能的话用严峻的方式表达这种反感，让他清楚地知道，他这样做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卡尔还太不成熟——他恐怕需要多年才能成熟起来——不能够真正懂得母亲对他的爱和关怀的价值，所以他虽然利用这种爱带来的好处，却通常把它视为令人不快的东西推到一边，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出明显的粗鲁，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这就使得他以后也不能获得他现在所缺乏的理解力。

这跟说真话和在教育中如何对待说真话的问题是一个道理。我既不赞成长期不信任一个人，致使他变成一个说谎者，也反对给予这个人配得到的信任，以致诱使他利用这种信任进行欺骗，进而直接导致他变得习惯于以背信弃义取代说谎，前者永远是卑鄙的行径，而后者有时或许只是出于轻率。我母亲现在很难相信，自己在目前这个阶段无法打开这个年轻人的心扉。她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我知道这种感觉长期让她十分痛苦，而我觉得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因为她的影响所具有的意义不可低估，这种影响虽然奏效慢，但效力经久不衰。不过，就我们的教育和生活方式而言，做母亲的难处在于，她的影响发生的作用起初不会或可能不会显而易见，所以，要克服她那种感觉谈何容易。

161

1887年

※ ※ ※

韦伯这个做哥哥的很欢迎年轻的神学家弗格特参与对卡尔的教育，因为这减轻了母亲的负担。这位谦虚的年轻人也懂得怎样得体地适应这个复杂的家庭环境，韦伯为他所吸引，对他过早离去感到遗憾。而这位年轻人也非常信任比自己年龄大不了多少的见习律师，在自己内心发生冲突时便找他咨询。这个家庭的氛围有时也许动摇了他建立在信仰教义基础上的精神世界。不管怎样，这种氛围迫使他不得不同海伦妮较为自由的观念打交道，遇到这种情况他也会去找韦伯。让海伦妮感到高兴的是，儿子充分理解这个受

她保护的人，由此她感到自己和儿子之间有了一条新的纽带，这条纽带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162

我们俩的观点现在要比以前契合得多了，他的言谈非常宽容，非常清楚。但最让我高兴的是，弗格特在离开前的那些日子里，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疑虑——不管是回复别人的祷告，还是教会的戒律，抑或是《使徒信经》——直截了当地跟马克斯谈：“见习律师先生，您给我谈谈这是怎么回事。您对那个问题怎么看？”有一次他甚至这样说道：“马克斯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有关人的一切没有他不懂的。”

在韦伯给女友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个年轻人相互交谈的余韵。这封信更能反映写信人自己的特征，而不是他所写对象的特征。它表现出韦伯很早就能够同情并设身处地地了解一个甚至与自己的性格大相径庭的人。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韦伯对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探寻求索的年轻人心怀尊重的谨慎态度。他对这个比自己年轻的人负有的责任感使他不会去指任何信念——除非他自己能够提出更好的信念来。韦伯小心地避免把自己的判断强加于这个年轻人，同时也很注意不要把他推到过早下结论的处境中。他只是希望帮助这个年轻人对各种思维及信仰的可能性认识得更清楚，并引导他自己做出选择。

163

弗格特先生四月初真的离开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我为母亲感到遗憾，因为他们俩在一些我们不大关注的问题上，尤其是有关教会问题的看法上志趣相投。其次，这对我们大家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少见的行为得体、真诚努力的人，既落落大方，也没有空洞的言辞，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对付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的方式。虽然我们俩很可能会走上非常不同的道路，但跟他谈论诸多事情常常令我感到愉快。我并不想隐瞒，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一个年龄比我小的人对我的信任令我感到荣幸。我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当一个人内心尚处于怀疑阶段，并正在逐渐形成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时，他是不愿意相信别人的……尤其不愿相信那些与自己秉性相近的人。对此我感到更为荣幸的是，我由此获得了某种责任感，因为所有的观察都表明，正是在一个人真诚地努力想要自立的时候，他的精神在某个方面就奇异地变得容易被操纵，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被人引导。这样，他就很容易被某种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来自有经验还是没有经验的人——引入某一条道路，而正是因为他真心诚意地努力想获得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所以便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结果就容易在对问题还没有一个整体把握的情况下做出对他整



个精神生活的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选择，而他全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做出这样的选择。尽管我并不知道一个神学家会如何评价我对弗格特先生种类繁多的问题给予的回答——有的问题乍听起来让人吃惊，例如“您对洗礼怎么看？”或者“假如您是牧师，您会背诵教义吗？”——但我仍然每次都尽可能向他指出，**从哪些不同观点出发**可以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至于我自己的看法，我总是直言不讳；另一方面，即使在我们最为详尽的讨论中，我也避免直截了当地问他对某个重要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我的理由是，因为我知道——这同样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一个人处在弗格特所处的发展阶段时，在他尚未对某个观点形成自己的看法之前，由于受到刺激和诱发便谈及这个观点，并对其发表看法，在这种时候，他就往往——因为一个人会很自然地感到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自己说过的话——不再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继续追求真理，而是不自觉地只是为自己说过的话找理由进行辩护。这样一来，他常常只是凭一时感觉所说的话，就变成了自己的桎梏。……

1887年

※ ※ ※

所以，每一个面对深刻的问题而感到严重困惑并对韦伯敞开心扉的人，都会得到他同情的关注。他乐于帮助比自己年轻的人厘清思想，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从不吝惜时间。如果说他的这种能力在给女友的信中已经有所体现，那么我们对他在那个时期对自己做出的评价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例如，他关于歌德的看法就带有那个时期（1887年）的特征，那时他二十三岁。

164

您这么喜欢迈宁根剧团演出的《奥尔良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演出肯定很精彩——我非常高兴。我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而今欣赏席勒的戏剧并不时髦。过分独尊歌德败坏的恰恰是那些常弄文学的人们对席勒的鉴赏力，使他们以很不公正的态度对待除了歌德之外的所有人，让我常常很生气（例如对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同龄人）。如果人们今天告诉我说，歌德对于诗的见解如何包罗万象，我们如何可以在其中找到人类生活的一切内容，巨细无遗，如果而后我却发现有一个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几乎没有被歌德触及，那这一切对我有什么用呢？因为一般说来，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并非只是注重如何过得称心如意，只是注重去发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地方。他们面对的也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个问题：选择哪一条路能够通向幸福和内心满足，选择哪一条路则无法达到这个

目的？不过，这是一个——如果你对事情清醒和仔细地加以观察——深刻的问题，一个我们可以从歌德的著述 [包括《浮士德》(Faust)] 中把握到的最深刻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包括最为困难的道德问题，都可以从这一点出发加以阐明。

因为你瞧，颇为奇特的是，对歌德来说，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除非既丑陋又卑劣，否则歌德就不会觉得它没有价值。相反，如果这个东西以某种美感形式出现——如在小说《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中——或以非凡的伟大出现 (如他同拿破仑的邂逅)，那他对此就没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对他来说，形式就是一切，这也适用于他的作品；也就是说，我说的“形式”指的不仅是诗歌的美，而且也包括对事物进行思考的形式。因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驾驭形式，所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个艺术家就是借助于形式来按自己的意愿塑造对象。不过作为诗人和作家，我认为还是有人可以与他比肩的……

1887年

165 思想业已成熟的韦伯钦佩歌德的才能，认识到了决定歌德一生的主要不是对幸福的需求，而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为以完美的方式充分发挥自己的巨大创造力而进行的斗争，并虔诚地追求与宇宙万物法则的同一。不过，后来他也拒绝把歌德尊为一个无法企及、超脱于道德判断的星宿。他从来不认为歌德代表了人类的全貌——他觉得歌德缺乏英雄气质。当天资平庸的年轻人恣意用歌德的榜样来为自己追求幸福找托词的时候，韦伯就会以嘲讽的口吻奉劝他们：你必须是歌德，才能像歌德那样生活。他拒绝接受一种特殊的“天才道德”。虽然他认为没有必要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富有创造力的人物，但如果有这样的讨论出现，他会坚持如下立场：对张三李四是“罪孽”的东西，对歌德也一定同样是罪孽。在他看来区别仅仅在于，罪孽对整个人格所造成的影响在天才和一般人那里会不尽相同。他承认，负疚感和罪孽可能成为取得创造性成就以及发展丰富和独立性格的基础——尤其是在一个人认识和感受到负疚感之后。不过，他坚持认为，即便是对“超人”，原则上也要用普遍有效的准则来衡量——他也用同样的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 ※ ※

从另一封信可以看出，韦伯的世界观当时受到康德的影响——这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始于在文科中学的最后几年对斯宾诺莎的全盘接受：“多年前我就着实为所有那些概念的混乱绞尽了脑汁，而又没得到什么结果（这一点我现在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有时还是要情不自禁地去费脑筋。”

这一次作哲学思辨的缘由很简单：他的表妹对于一个她不喜欢的年轻人颇有微词，这给韦伯提供了机会，用生动的方式向她阐明一个行动者的责任和他与生俱来的限制中“自由和必然”的学说。他在法庭上的工作让他每天都要对生来就有反社会倾向的人的行为做出判断，这自然会促使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166

是谁把诱人犯罪的思想播撒在罪犯的心灵中的呢？肯定不是他自己。他的行动是环境使然，是他自身固有而非自己造成的条件使然。事情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换言之，你不能要他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他并不是自由的。像任何自然的产物一样，人的内心要经历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人的理智<sup>①</sup>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能像另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被那个人称为“善”的东西一样被看作是“自然的”，因而是正当的……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推理，不是吗？用理智来看也完全正确。但我们首先必须检视一下人的理智，看看它是否有权力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看看它是否有可能用自己的概念深入到这些问题的核心，看看它是不是自以为是，而实际是在做一件由于缺乏相应的概念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在我看来，最后一种情况应当属实。因为很容易看出，靠我们所信赖的理解力我们没法弄清楚“善和恶”具有什么意义，否则那些顶聪明的人就一定是对此知道得最多的人了。遗憾的是，谁都知道实际情形并非总是如此。此外，假如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靠人的理智，世界在道德领域就必定会不断有新发现和新发明，这些发现和发明就会像人的理智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发现和发明一样伟大，而且会拥有同样的速度，而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最后一点：没有人能够用理智所使用的概念和定义向我解释清楚“善”与“恶”的区别在哪里，因为理智缺乏这方面的概念。……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不是建立在知性概念上，既不能靠理智来建构，也不能靠理智来辩驳。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这只是我们年轻时被培养成的陈腐偏见，那也是不对的。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把握道德判断的能力，亦即**进行道德分辨的能力**，道德判断就不能被培养出来，而这样一种能力又正是以善恶之对立为基础的。因此必须把这种对立作为前提，教育才有可能。这种对立是与生俱来的，教育虽然可以发展它，使它变得更为尖锐，赋予它实际的内容，但不能创造它。167

---

① 德文“Verstand”指一种认识功能，在中文里有很多译法。一般译作理解力、知解力、理智、悟性、领会、领悟等。在黑格爾的作品中通常译作“理智”，在康德的作品中通常译作“知性”，以区别于“理性”（Vernunft）。韦伯在这里表述的观点受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不过，他并没有严格按照康德的原意使用这个词，而是指人的理解力和聪明才智，因此这里依上下文译作“理智”或“理解力”。——译者注

韦伯作这些分析时还谈到了道德、美学和审美判断的特性，然后又回到责任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仅仅说环境使某人变得如何如何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给理智提供了依据，好让它自己相信那个人的道德状况的发展。……但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道德判断。当然，这样做有可能会阻止我们去“谴责”那个人，在这一点上我承认你是对的（不过这仅仅是因为我反对一切谴责）。但是，这样做根本没有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是非判断，也没有对他的作为要负的责任做出判断。对此我不能求助于自己的理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理智所面对的是一团解不开的谜。……在此我们达到了理解力的极限，踏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用心智中一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对事物做出判断。谁都知道，虽然这些判断并不依靠知性概念，却像任何一个逻辑推理一样确凿和明晰。……

※ ※ ※

168

随着岁月的流逝，海伦妮越来越觉得她家“老大”过分沉溺于书本。她因为各种各样的忧虑而感到心理负担很重，因此显然渴望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给自己更有力的支持。她向跟自己和韦伯都很亲近的外甥女吐露了心迹，后者随之向韦伯提出了忠告。韦伯的回答表明，他明白自己作为儿子的义务，也乐于履行这种义务，但由于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而感到难以如愿。他感到自己陷入了通常只有女儿才会经历的严重的责任冲突，而且尽力对女友说明，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他生活的这个阶段，他作为儿子仍然是父母及弟妹生活中的一部分，仅这一点就意味着他在达到自己目标的道路上面临着一个障碍：

在别的地方我能做完的事情，在家里我只能完成一半。我常常遗憾地看到，我母亲显然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觉得我现在只关心那些恐怕只有天知道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觉得我置身于这个家庭之外。而实际情况则是，我工作进度很慢，也许以前有不少事情没有照顾到……这根本就是哪一项义务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我觉得我的义务首先应当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学点东西。考虑到在其他阶层很少有我这个年龄层的人除日常劳作之外还有闲暇考虑别的事情，我就更觉得我应当这样做；相对而言，我一天的劳作确实不能算太多，我也不像他们那样为了生计问题而劳作。

1887年

但是，他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使他无视母亲的处境和她的那些要求的正当性。他只是

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完全满足这些要求。那条把他同家里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他无法扯断，为了母亲的缘故也不愿扯断的纽带——一年一年地将他拴得越来越紧。

我可以向你保证，想到在我母亲这里住着，而又不能做到人们有理由期待我做的事情，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受，对我的工作也绝无裨益。你现在告诉我应当如何做和我怎样改变自己的做法，你很可能是对的……但要我改变自己的做法谈何容易。难道你真的不相信我还得做**大量工作**才能有所成就吗？

你说我不应该急于求成。可是我并没有操之过急。今年夏天我经历了最为奇特的事情。家里人去海德堡，似乎是为了把我放在重炮射程范围内进行狂轰滥炸：事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进行我的博士考试。我很清楚，父亲对我没能早点完成博士学位暗地里有几分失望。我不愿意在这方面被人认为无能，你说是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通常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这里要经常和母亲一起做点什么对我来讲尤其困难，因为我们俩都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可是到了晚上，她通常已经疲惫不堪了（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觉得她是勉强支撑着在听我讲话，而且这样做只是为了迎合我。

169

这样，在母亲有难处时，他虽然给她以支持——每当她向韦伯倾诉自己的苦恼和问题时，她发现他总是乐于提供帮助——但由于工作非常紧张，他无力为母亲营造一种让她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支持和感受到温暖的精神气氛。尽管他内心里向着海伦妮，但他并没有将她生活中所有不如意的事情都归咎于父亲。海伦妮年纪越来越大，平时又总是过分使用自己的精力，所以对日常婚姻生活中的摩擦越来越不能灵活应对。

假如我母亲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对某些事情过于小题大做，那么这一切——我要反复强调这一点——都不至于这么严重。仅举一例说明：我父亲一向乐观，他的情绪常常会由于外界一点微乎其微的原因而陡变。与早些年不同，这种情绪变化现在常常给母亲留下深深的痛苦印象，即便造成这种印象的烦恼转瞬即逝，她也难以将它很快忘掉。我在家里的身份是儿子，你也许会承认，除了以间接的方式介入，否则就与我做儿子的身份不符，也不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好处。

他还从更一般的原因来解释海伦妮感情上的脆弱，把这看成是一个精微敏感的女性心灵所经历的典型命运，这种女人生活的重心是要处理复杂的心灵体验，而一个典型的男人的生活重心则与此不同，他的职业工作每天都要求他处理更加困难棘手的问题。

170

人们日常工作的性质特点各不相同，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忙于处理大量变化无穷的人际关系的话，你就会亲身感受到，这些人际关系在文件和档案卷宗里获得了幽灵般的奇特生命，看上去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剪影在幕布上表演舞蹈。你会注意到，这里关涉的是这样一些人的存在：他们每天都在幕后为你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显然，正是同这些幻影以及外在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兴趣或利益打交道，我们才难以理解那些职业上得更多同内心打交道的人们，他们很容易对别人一时的即兴之言耿耿于怀，因而在心里留下长久挥之不去的印象——其实别人这种一时的冲动并不值得这般难以释怀。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我觉得自己有权随心所欲地指责别人。



对母亲内心生活设身处地的感受，还有女朋友的命运都使韦伯对女性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加深了理解：她们为他人服务的生活并没有体现为具体的成就，而是消失在流水年华之中。那些年间，韦伯的女友更为频繁、更为严重地身受抑郁症和体力衰竭的缠绕，这也因此加重了他自己的生活的负担。就像海伦妮和伊达一样，她生性乐于侍奉和帮助别人，所以疾病给她带来的束缚就更让她感到痛苦。

171

在他们共同度过了那个美好的春天仅一年后，她就决定放弃自己心里暗恋着的这个男人。他到底是不是还爱着她呢？他如兄长般亲切的书信并没有给她以明确无疑的回答。不过，即便他仍旧爱着她，即便她自己会恢复健康，可是她能够胜任做他的终身伴侣吗？对此她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她无论如何不想拴住他或者让他觉得自己在等着他。她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两个年轻人数年中没有做出任何再相见的尝试。书信来往越来越少，女友的相貌变得模糊了。可是在韦伯心里他并没有同她分手，毕竟还有希望，也许哪一天她会健康地从面纱后面走出来，以她旧日的妩媚，投给他充满生命力的微笑。他对这件事没有做出决断。由于那时人们对此类疾病的性质知之甚少，所以他暗自感到内疚，觉得是自己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因失恋而日渐衰弱。岁月的流逝让他日益坚信，如果他不能治愈女友的病，不能让她得到幸福，那他自己就没有权利享受完整的幸福人生。从他心灵深处逐渐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自己天生不能使一个女人幸福。

他们之间的友谊仍在继续。他在显然已经稀少的书信中一再试图恢复她的自信心，让她感觉到她自己对他和别人所具有的意义：

亲爱的埃米（Emmy），不要太苛求自己。你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我还很清楚

地记得，你总觉得自己为别人做得不够。不过，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虽然方式不同，但你在这一点上跟我母亲十分相似，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当我们面对很多事情，心灵需要得到保护的时候，当我们因想到她而获得了这种保护的时候，她自己爱的奉献以间接的方式对我们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埃米认为自己无力为家里做出应有的贡献，并为此而自责，韦伯不能接受她的这种自我折磨，并把她的沮丧解释为妇女的特殊命运使然：

这几乎让我想到了我母亲不时会有的一些想法。正是在这些想法中我一再得到这样一种认识：由世界秩序强加于女性的义务十分难，难就难在，这些义务并非集中体现在个别问题上，尤其不是集中在表面上看来意义重大，因而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决定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上，而是集中在那些从根本上说必须通过不断战胜自我才能解决完成的问题上。成功地履行这些义务常常不是以具体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它们结出的果实是在日常生活中看似自然的过程中成熟的。

几年后，他对新一代年轻姑娘的内心苦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而找到了更为精确的方式表达女性命运的特质：

这让我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自然把男人的生活建构得多么容易。即便是在最不能令人满意的职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工作中明摆在那里的成绩。一个女人则不然，不管她是母亲、女儿还是姊妹，她都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存在对别人有任何实际意义。实际上，她通常一定会觉得，自己对别人来说不过是徒增忧虑和麻烦。有人心甘情愿地关心照顾我们，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由此表现出与我们情同手足的感情，我们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对于丰富我们的心灵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可是我们确实有为这种心灵感受寻求外在表达的需要，恰恰是在外在表达方面自然给了我们男人不公平的优势。当然，这样的外在优势是以更大的内在贫困为代价的。 172

韦伯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自己感到颇为疏远的父亲，从下面几行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状况给这个年轻人造成的心理负担有多重。囿于儿子应尽的孝道，他对自己所处状况的感受表达得很有节制：

你知道吗，当一个人逐渐脱离学生生活，但还得等待数年才得以自立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几乎每天都得忍受这样的感觉。我不能让自己相信这种感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说，经济自立是其获得幸福的基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追求的目标。我自己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而且现今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我比别人更需要做到这一点，所以我非常不情愿再浪费更多的时间了。

1887年

※ ※ ※

173 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条捷径让韦伯获得他所企望的自立吗？韦伯从小就感到自己有能力在多个领域里施展才华，他的老师们也都预言他会有远大的前程，这样一个各方面都极有天赋的人才，有必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耗费在漫无边际的法律生涯上吗？为什么不转而从其他某项更加自由的职业呢？他的老师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未来的学者，他们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职业更适于这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了。特别是赫尔曼·鲍姆加藤，他在韦伯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就建议他应当争取获得大学任教资格。但韦伯自己却犹豫不决，他显然不敢从自己已经走上的那条职业道路上岔开去，因为即便是做了讲师，他也很可能得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经济自立”。

尤为重要的是，他生活中的兴趣爱好明显地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思考和冥想。学术工作——比如说法学领域的学术工作——作为一种副业虽然对他有吸引力，但不能作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为他对政治和社会的兴趣同样强烈，作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韦伯渴望肩负重大责任，渴望“生活的洪流和行动的狂飙”。即使是在后来，他也羡慕那些把人的生命攥在自己手里长达数小时的船长。在法学方面的训练接近尾声时，他为柏林一位著名的律师作了几个月代理，这项工作要求同时具有机敏、决断力和随时投入斗争的直觉，为此他感到很有满足感，所以他打算即使在获得大学任教资格后也仍然要同时开业做律师。当他的姨夫敦促他获取大学任教资格时，他在回信中说：

有时候……实际利益——对其加以规范是法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提供了在我看来不能用学术的方法加以把握的多种组合。与这种印象相比，纯学术活动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所以，仅仅为了学术本身而做学问的冲动在我已大为减弱了。

尽管如此，韦伯在做见习律师期间还是决定在从事法律事务的同时也争取学术方面



的职业，其主要原因显然是出自一种新的看法，即认为这条途径可以让他尽快达到目标。

自从我确信自己在法律事务中能够做出在学术生涯中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我就清楚地意识到，假如在目前的情况下从事法律事务不会让我距离自己的目标（经济自立）越走越远，假如我没有希望在另一条职业道路上更快地达到自己的目标，那我是绝不会放弃法律事务的。鉴于目前的状况，我觉得自己至少必须尝试放弃从事法律事务。看起来这完全不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但我认为它是有道理的。174 然而事实仍然是，我常常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并完成家里赋予我的其他义务。即使我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也必须努力去履行这些义务。

在获取大学任教资格前，他做过一次很严肃的努力，试图摆脱自己所处的境况。他申请了不来梅市（Bremen）法律顾问的职位，还特地到那个城市去拜访了当地名流。结果，一个当地人被优先录用。他后来给反对他走这一步的姨夫写信说：

我十分渴望获得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职位，这个渴望原本这次可以得到满足，由此这件事也就定下来了。我承认，虽然学术职业在其他方面对我颇有吸引力，但我不愿从一个处于试用期、无报酬的见习律师和陪审推事过渡到去做一个同样是处于试用期的、无报酬的大学编外讲师。我相信，对我的学术工作来讲，一个能让我在经济上自立的职位虽然给我的外在安宁要少一些，但可以给我多得无可比拟的内在安宁去从事学术研究。

他获得了教授罗马法、德国法和商法的资格，并于1892年春开始授课，由此暂时决定了他的职业取向。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法学方面的职业，他仍考虑自己开业做律师或者做一个知名律师的合伙人。然而，他却被推到了另一条职业道路上：他所敬重的商法教授戈尔德施密特患了重病，而且一病不起。他委托韦伯在第二个学期为他代课。这位年轻的讲师现在得在大课上讲授商法和交易法。权势显赫的阿尔特霍夫（Althoff）当时控制着整个高校系统，他垂青于韦伯，想让他成为那位名教授的接班人。阿尔特霍夫首先在1893年给韦伯提了副教授，想以此将韦伯留在柏林。突然之间，韦伯通向辉煌职业前程的路坦荡如砥。可是他的兴趣却已经大幅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

因此，他不想把自己拴在法学教职上，而且已经有人跟他接触，讨论给他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教职的事宜。在二十九岁那年，韦伯已经很接近自己的目标了。他的三部著作作为他赢得了学界声誉。在基督教社会党圈子里他被视为未来的政治家。即便在此时，175

他仍然写道：

我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把我的学术活动视为业余爱好，尽管我知道，由于劳动分工的原因，一个人除非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否则他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我希望我的大学教职在教学方面（一种对我而言不可或缺的从事实践活动的感觉）能给我带来满足，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在在这方面有无才具。……

担任讲师的第一个学期开学之初，他给赫尔曼·鲍姆加藤写了最后一封信（在后者逝世之前），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年里他马不停蹄地工作的强度：

我已多时没有来信了，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因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不得不自食其果。我排的课程包括一个小班讲座、一个大课和一门研讨班课程，并已开始授课了。我还参加了社会政策协会的一项调查：调查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状况。我还在普鲁士高等法院做一位律师的代理人，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分别在法庭和办公室工作。这一切给了我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我忙得不亦乐乎。此外，我还得写几篇书评，随信附上为朋友格雷的杂志写的一篇（供牧师阅读的）文章。你对此可能会有兴趣。现在我正在经历刚做讲师的过程，我不得不说，一堂接着一堂地备课比我原来想象的工作量要大得多。我相信，假以时日，尤其是那些研讨班课程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和喜悦感。……另外，我必须做好准备同我现在和未来的批评者作斗争，尤其是莫姆森，他在《赫耳墨斯》（*Hermes*）杂志里对我这个人表现得很友善，但对我的书持否定的态度，对他的批评我需要加以深入辩驳。这样一来，我想今年夏天我会很忙碌，特别是考虑到我还答应了奥托要写一部关于东部地区农业工人和大地主的“蓝皮书”。

176

韦伯事业的长足进步始终是在家庭环境和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压力下取得的。从他给女友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最近这些年——回想起这些年令人难受的枯燥乏味的生活，我就发怵——我完全陷入了一种带有苦涩滋味的听天由命的心境，只有早年那些丰富多彩的美好回忆给我的书斋生活投下了一抹多愁善感的余晖，除此之外，我完全埋头于（我称为机械惯性的）责任性职业工作中——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使我母亲非常苦恼。

韦伯所说的这一切都表明，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勉强被推向了这样一个目标。当自己在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时，他却说：“我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任何人——如果他对学术职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没有先入之见——只要看到他健壮的体魄，一定会同意他的说法。设想这样一个人以伏案笔耕终其一生，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毫无疑问，他的求知欲以及向人传授知识的愿望和能力是天生的，而且很强烈，在儿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不知餍足的思考力不断需要新的养分。不过，他秉性中还有其他活跃的力量也需要得到满足。对他来说，认识现实和通过理智把握现实仅仅是通过行动来直接改变现实的第一步，因为他似乎生来就更像是一个斗士和统治者而不是一个思想家。问题在于，能否为此找到适当的形式，在于他的时代是否提供了适当的条件让这些力量能够得以发挥。他自己也曾想过以后成为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 ※ ※

韦伯隐藏在心中的温柔，以及他受到压抑的对基本幸福和对女性魅力的欲求在当时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他和妹妹们迷人而充满深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富于情感的自然本性能够自由地展现，不受良心冲突的抑制。年龄最小的妹妹莉莉是一个有着一头淡淡金发的尤物，如小精灵一般，窈窕妩媚，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聪明的、有自己的想法和早熟多思的小学生了。七岁那年她就向母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上帝为什么也造了坏人？”这让颇感惊讶的母亲难以给她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幸亏她的求知欲后来也转向了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她哥哥这样写道：

我们的小妹最近向我提了一些内容丰富的问题。一个小女孩到多少岁才会变成少女？她要变成少女还得等很长时间。她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我实在感到窘迫，不知道现在应当到哪里去找材料来每天晚上在她睡觉时讲给她听，因为世界史上确乎没有发生多少事情。

这位身宽体硕、留着胡须的兄长被弟妹们毫不客气地称作“胖墩儿”，他晚上常常被莉莉招到自己床边，帮她把金色的头发编成小辫，回答她的问题，一点一点地给她讲述整个世界史。他讲得最多的要算腓特烈大帝，她怎么听也听不够。

年龄稍长一些的克拉拉现在已经上完学，已经长成一个含苞待放的“年轻姑娘”，她梳着长长的褐色发辫，出落得绝对风姿绰约、生动活泼。她享受着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生活乐趣，具有天生的自信，让人感到她到哪里去都能找到幸福，这种性格特别让他哥哥喜欢。这个无拘无束的年轻姑娘此时想到的只是生活，只是茁壮成长——她“本

身就意味着快乐和幸福”，她让韦伯得以摆脱严峻的生活带来的所有重累，这对他来说既有裨益也有必要。他可以同她相互调侃，宠她惯她，同时对她加以调教。

178

我的大妹妹现在面临着结束学业的重要时刻，下一步她要去黑森州的一个林务官家里学习家政，这家是别人介绍给我们的。她就要扬满风帆驶向生活了，虽然她还有些棱角需要磨光，所幸的是她无拘无束。也许最让我喜欢的就是她了，因为在 她身上我重新认识到了一些我记得自己——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总是很不完善的——在她那个年龄时也曾具有的一些特征。

不过，兄长的教育主要是无限度的溺爱。他满足了妹妹所有的愿望，让海伦妮看着都不免有些忧虑。他用自己挣来的第一笔薪水给妹妹买了大量的礼物，而她的愿望是没有止境的。他还给了她一些其他的東西，对此克拉拉自己这样写道：

他那么热爱大自然，我们去徒步旅行时他那么善于讲故事，给我们以教诲，使远足变得那么美妙！他那么欣赏音乐！他让我了解了瓦格纳（R. Wagner）所有的歌剧，没有他敏锐精微的鉴赏力和他的理解力，我不可能对这些歌剧了解这么多。他凭着绝妙的乐感和记忆力把握歌剧的动机。回想起观看歌剧的那些夜晚，我至今仍然感到愉快，我们手拉着手穿过动物园往家走，他一路上总用口哨吹着所有的主旋律。

他还不时让这个小女孩窥见他的内心世界，告诉她因为埃米的原因，他认为自己不当结婚。此外，他还感到，没有哪个女人会爱他，他的天性使他不可能让任何女人得到幸福。兄妹俩描绘了一幅将来共同生活的情景。“你想象一下，跟我在一起会是个什么样子？快说说看！我可以猜想得到，但我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像我这样一只老熊，最好还是在自己的笼子里独自徘徊吧。”

在颇为重要的1892—1893年间（这期间韦伯赢得了自己的学术声誉，职业上获得了独立，并且结了婚），他妹妹在寄宿，他给她寄去了很多好东西，给她写了充满深情和逗乐的信，并要求她也给他写信。

我会乐于给你讲更多的事情，可是讲了之后你也会常常给我写信吗？即便你讲的只是一些废话，也要经常写！不过我是了解你的！你呢，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爱，一丁点儿忠诚，却有很多的虚伪。……因为工作太忙，我已经回绝了所有的舞会邀

请；只有等到明年冬天我才能再陪着我那可爱的丑丫头去舞会了。不过，唉，唉！“我在这儿听见的是啥？我在那儿听见的是啥？是谁在拉手风琴吗？”那些男性“后生”想要同你这块寄宿家庭的煎饼一同去溜冰吗？可别带着未来的妹夫到我这里来，否则，我会妒火中烧，那他小命可就难保了。 179

当妹妹用蹩脚的法语给家里写信汇报她在瑞士的学习成果时，韦伯有意把德语和法语杂糅在一起，对她加以责备。这封有趣的信中同时也包括了关于他即将做出的职业选择的重要信息，这是给正在看望妹妹的父亲看的。

亲爱的小妹妹：

谢谢你最近的来信。不过，真要命，你说的是哪家的法语啊，怎么这么糟糕？我的天哪，这好像是沃韦（Vevey）地区农民使用的方言，就是我们所说的既土气又拙劣的语言。假如我在马尔堡（Marburg）做了教授，你会不想活了吗？至于我呢，我可绝不会这样做。不过——你可以告诉爸爸，但是要悄悄地说，因为这非常机密——我就要在柏林做副教授了，应邀讲授商法。枢密顾问阿尔特霍夫和埃克（Eck）告诉我（这你也可以告诉爸爸），早的话这也许就是今年夏天的事，可能在七月底，至迟不会晚于冬季学期。系里的教授似乎也都无异议。你可看到这等好事了吧？以后你对我得比以前更尊重些，但永远不要惧怕。我呢，会善体下情，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待你。你想要接过我的房间吧？我会很高兴地让给你，因为我会拥有一栋自己的别墅，至少得雇两三个佣人。……

克拉拉恰似一泓清新的泉水，让置身在自己的书本世界中的韦伯从她那里感到神清气爽。他对这位姑娘意味着什么？她那时是如何看待他的呢？克拉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他和我一起经历了一切，包括我所有的友情，也包括我们做的一切小小的蠢事儿！他对这一切多么有兴致，又多么善解人意！在我的眼里，马克斯简直就是家里的灵魂。不管什么事，大家总去找他，他也总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供帮助。这个年轻时便鹤立鸡群的人尽管有些过于谦虚，但是总能设法为我们年轻人的周日聚会增添一点儿特色——这真让人开心。他循循善诱的本领可谓无与伦比。在那个时候，他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很愚蠢）时就总是追根溯源地娓娓道来，提供真正让人增长见识的透彻答案，同时又不让提问的人有自己无知的感觉。现在每当我看到他在不同的圈子里，看到那个圈子里的人要不了多久实际上就都会只倾听他一 180

个人讲话的时候，我就总是不由得想到以前的情景。他思路清晰，专注力很强，能够同家人一起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在他们的热烈交谈、高声朗读和类似的喧嚣中不受干扰地做自己的工作。他甚至还能跟上我们的谈话，不时以妙趣横生的插话为谈话增添风趣。对母亲来讲，他一定是一个令她喜爱的长子，即便在那时对她也有无穷的价值。

的确，有这个儿子在身边对海伦妮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她仍然非常渴望他离开这个家，渴望他结婚。虽然他从未吐露过自己的隐衷，但海伦妮能觉察到压在他心上的重负和他如此埋头工作的原因。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是如何凭借理智和意志力让自己免受任何一种激情的驱使的，也看到了他因此而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防护墙，在这堵墙的后面，他又不得不去抑制不时会带着毁灭性的火焰从他身上喷发出来的恶魔般的激情。他对自己和别人——虽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都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如果发现“心胸狭隘的人”，他有可能会暴怒，除非爱情使他变得温和。

## 第6章 婚姻

# 1

1892年春，老马克斯·韦伯的侄外孙女玛丽安妮（Marianne）来到柏林，以求获得独立的职业工作所需的职业训练。玛丽安妮的外祖父卡尔·达维德·韦伯（Karl David Weber）是柏林市议会议员马克斯·韦伯的兄长，所以她的母亲就是老马克斯的孩子们的堂姐。机器织布的发明导致比勒费尔德生意衰落，于是卡尔·韦伯便把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亚麻布的销售转移到了乡下，落脚在托伊托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边上一个宁静而美丽的村庄。奥灵豪森（Oerlinghausen）坐落在山峦上一片平坦的地方，顺着壁垒一般的滕斯贝格（Tönsberg）北坡伸展开去。从山脊上眺望，一幅极其动人的德国风景画尽收眼底，堪称无与伦比。东西两面，缓缓呈弧线形的山坡上林木覆盖，像一道道宽厚的城墙伸进田野。南面那一片宽阔寂寥、松林密布的原野是森纳（Senne），那里让人迷醉的蓝色在地平线的衬托下似融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向北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致：高低起伏的威斯特法伦平原缓缓上升，形成一座座山峦。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是镶嵌在林地和橡树园之间一片片精心耕作的田地。树梢掩映中可以看到让人倍感亲切的威斯特法伦那些村外散居的农舍的双坡屋顶，宛如一幅活泼泼的生活画卷。

机器生产的现代技术导致了比勒费尔德那个实业家族的衰落，在这里，这个家族的一个精力充沛的儿子卡尔·韦伯白手起家，重新做起了生意。他让森纳地区那些只会向沙地要土豆和荞麦的贫穷小农坐到了织布机旁，给他们提供纱线。在经销靠家庭的辛勤

182

劳动生产的亚麻布时，他在同行里率先采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他的父辈们认为这种方式“有失体统”，因而避而不用）：他自己带着样品四处推销，而不是坐待批发商登门采购。这在比勒费尔德的同行中引起了诸多不快，不过这些人后来也都仿效他的做法。他的侄子马克斯后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他的新型经营方式和他的性格特征，将其作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楷模。

通过巨大的努力，卡尔·韦伯逐渐积累下了殷实的财富，赢得了著名实业家甚至天才实业家的声誉。他生活简朴，其爱好和休闲方式就是狩猎、精心照管自己的山林花园。他有一个大家庭，自己就是这个家庭的元老，儿孙们都尊他为家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服从他的权威。在村子里他也俨然是个国王，这不仅因为他比别人富有，给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更主要的是他有一种令人敬畏的高贵气质。他同村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待下属既有主子的威严，又平易近人，他与同僚非常客气，对女性则具有骑士风度。所以，人们敬重他，暗地里也有些惧怕他。随着他的年事增高，人们更给他罩上了一圈神话的光环。他正当盛年时失去了自己深深爱着的有思想、有修养的妻子，从此便鳏居一生。他的长女安娜（Anna）十八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同样很年轻的医生爱德华·施尼特格尔（Eduard Schnitger），他刚从莱姆戈（Lemgo）搬来。对这个贫穷的年轻人来说，被这个富有的家庭接纳是一项莫大的荣耀。可他的幸福只是昙花一现。安娜生第二个孩子时死于产褥热，爱德华自己在行医时让妻子染上了病菌。

安娜的爱情和精神力量几乎还没有机会得到发展，这样一笔无法弥补的财富便随着这位天才少妇的消殒而丧失了。整个村子都在哀悼她的去世。结婚后不久，尽管她还很年轻，但她充满生机和温暖的生活已经蒙上了一层悲哀的阴影。她丈夫已经显露出某种神秘的精神病征兆。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他的乖戾是由这种疾病引起的，所以其后果就更为严重。安娜死后，厄运仍在继续。爱德华虽勉力继续行医，但无论他走到哪里，被迫害妄想症引发的愤怒就追随他到哪里。有时他会把最亲近的亲人看作是一切恐惧和对其折磨的原因。整个家庭同时也因安娜的去世而陷入了绝望之中。

183

爱德华很快就把幼小的女儿托付给了自己年迈的母亲，爱德华的母亲是利珀（Lippe）地区莱姆戈小城一个文科中学校长的遗孀，城里那些山墙型房屋见证着这个城市不同寻常的过去。生活的重担一个接一个地压在了爱德华母亲的肩上。她在极度贫困、疾病缠身和各种艰难困苦中终于拉扯大了六个孩子，可是有三个儿子患了严重的精神病。只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未曾染疾，他们都聪明而且勇敢。两个女儿以教书为职业，同年迈的母亲一起分担厄运带来的重负。在这种处境中，她们得益于以幽默、慷慨和勤俭的态度对待生活，得益于不可动摇的谦卑的虔诚，这样的虔诚态度使她们能够把所有这些灾难都视为上帝的“考验”，解释为显示她们为上帝特殊子民的征兆。她们在生活中不断挣扎，饱受艰辛，但并没有愤世嫉俗。她们的生活局促而艰难，但每一个春



天都会给她们重新带来一次百花吐艳，带来别人对他们的爱和敬重。

玛丽安妮就是在这样几位女性的照料下成长起来的。她的姑姑很严格，要求很高，而且由于生活的忧虑而愁眉不展，总是承载着过重的负担。但玛丽安妮对她们温暖的爱心满怀感激之情：这些女性能够笑对自己的艰难困苦，玛丽安妮在她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静穆的伟大。玛丽安妮备尝各种艰难苦楚：在窄小的家里，两个叔叔精神病发作，女人们的哀苦和焦虑、莫名的恐惧、可怕的声音和图像都在她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然而，青春年少时的生活之乐让她暂时得以承受所有困苦，使她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是世界毕竟是清新而美丽的，而且充满了爱。此外，她的家族中还有一个住在奥灵豪森据说很富有的外公，因为这一层关系，她也属于望族之后。她相信，终有一天那扇通往更加丰富、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大门会向她敞开。只是到了孩提时代结束的时候，过去的经历成了这个姑娘的心理负担。她很快成熟起来，养成了善于思考和勇于斗争的性格。她很容易感受一切欢乐，渴望生活，但对痛苦也同样敏感。

玛丽安妮满十六岁后，外公卡尔·韦伯认为，该是让外孙女离开小城市生活的时候了。他要让她花几年时间到大点的城市里有声誉的学校去接受与她身份相称的教育。玛丽安妮很爱学习，也学到了很多。她有一种精神上的渴求，也颇有抱负，耳闻目睹了真正的艺术，拿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她快满十九岁离开汉诺威（Hannover）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变成一个很有教养的文化人了，对小城镇局促的氛围已经有了疏离感。那里的环境也不再适合她居住。祖母过世时，家里没有人想把她留在那里，因为他们不知道拿什么来满足她的生活欲望。她以前的中学女同学因为虚度青春年华尚未脱离痛苦的挣扎，现在又要在无法满足女性对幸福的渴望中渐渐消耗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小城镇的社会中，能够获得婚姻幸福的女性可谓寥寥无几。因为许多青年男子离开了此地，而且往往一去不复返，即便回来，也是携妻而归；姑娘们则留在家守着年迈的父母。只有意志最坚强的女性才会挣脱束缚，像她们的兄弟一样到外面去寻找自己满意的工作。莱姆戈这个昔日汉莎同盟的城镇，如今宛如被现代社会遗弃的美人，城镇里的生活像一个死寂的小池塘，没有源头活水，从水底的污泥中不时泛出死水酵成的气泡——贫嘴恶舌的流言和阴险狡黠的诡计。

玛丽安妮现在已经无家可归。她无法同父亲爱德华一起过他那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生活。奥灵豪森外祖父那边想让她在那里安下身来。安娜的妹妹阿尔魏因（Alwine）怀着关爱之心把玛丽安妮接到了她家。她是个热情而又深邃的女人，养育了许多孩子，丈夫已经成了她父亲公司的合伙人。他们想让玛丽安妮在这个非常和睦的家庭里当个帮手，为她将来当个好妻子和一个称职的母亲做准备。她现在似乎正处在结婚生子的黄金年龄。尽管像她这样对精神生活要求甚高的女子要在农村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君并非易事，

但她总有一天会找到这样一个人的。可是，玛丽安妮生性与众不同，她从骨子里反对姑娘们安于这种世代相传的命运。这个家里实际上并不需要她帮忙，少量的家务对她来讲也无足轻重。她不善于做这类事情，帮忙伺候别人对她来说有些勉为其难。

185 男人干事业，女人只能持家带孩子，这种和谐却平淡的乡村生活无法满足玛丽安妮的精神追求和对生活的渴望。在这里她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感到自己朝气蓬勃的生命注定要停滞了。日子过得不像是江河奔流，却似蜗牛爬行。百无聊赖的生活几乎使她病倒了，她感到非常不幸，但同时也为此感到内疚。家里人感觉到她有一种越来越不舒服的疏离感，很想帮助她，可不知道该怎么帮才好。遗憾的是，这个姑娘完全不属于被男人视为神圣的那种理想的女性，这种理想塑造了她那个圈子里的所有女性。很显然，她在城里学校度过的那些日子——那里高度条理化的工作和丰富的启迪——也使她感到乡村生活索然无味！

现在该怎么办？找工作？这确实没有什么必要。一个女人除非是贫穷或者不得不放弃结婚的希望，否则有无职业对她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卡尔·韦伯的外孙女不需要也不可以去干活挣钱，否则，“这个社会”会怎么想！玛丽安妮自己也茫然无助。像忙得不可开交的姑姑一样去做教师，甚或去做一名护士吗？这对她并没有吸引力，也确实没什么必要。上大学吗？她从远处听说有几个进取心强的女性在瑞士学医，但那只是凤毛麟角。况且，一想到这个行业的职业要求她就发怵。她虽然勇敢，但也很敏感，天生就不具有英雄气质。

玛丽安妮二十一岁那年，住在柏林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的一家人十分同情她的处境，邀请她冬天去他们那里住几个星期。这让她得以充分呼吸这个家庭的精神空气，用大城市的文化宝藏来充实自己。柏林快速的生活节奏让她热血沸腾，这才是生活！各种印象纷至沓来，令她应接不暇。做陪审推事的马克斯带她去参加了第一次舞会，热情地履行做表叔的义务。她头一次结识了一群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子。其中她的三位已长大成人的表兄弟<sup>①</sup>在她看来最魁伟，对她最为重要。两个年龄小一点的表兄弟非常英俊，但做陪审推事的马克斯则不然。马克斯完全不重仪表，身材肥胖，梨形的脑袋上有击剑受伤留下的疤痕，头发剪得很短。他那优雅的曲线形的嘴唇与硕大而不成形的鼻子形成了奇异的对照，黑色的双眼常常隐藏在相互重叠的浓眉之中。

的确，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既不英俊，也缺乏青春的朝气，但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男子汉。他虽然粗壮，但举手投足却透出一种隐秘的优雅。他的步履那么轻快，双手那么富有表现力，两眼不时闪现出亲切、愤怒或滑稽打趣的目光。间

---

<sup>①</sup> 按辈分，马克斯和他的弟弟应当跟玛丽安妮的母亲一辈，是玛丽安妮的表叔，而不是表兄弟。此处照原文译出。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或他也会一改自己奇特的超然态度，表现出令人畅快的幽默感、富有同情心的理解态度和骑士般的亲切感。

对这位姑娘来说，比这些年轻人和令人陶醉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海伦妮的母爱。当然，海伦妮虽然也给这位新来的侄女<sup>①</sup>指出要在“最小的事上忠心”（《路加福音》，16：10），以及帮助和侍奉别人的价值，但同时也承认她有外出工作和离家自立的权利。姑娘头一次感到，有个性不但没有被认为是缺乏女性特征和自私的表现，而且还得到了肯定。她带着严肃的决心回到奥灵豪森，想到将来某个时候可以去找寻自己的生活道路，心也就踏实了。此时她还没有得到爱神的眷顾。不过，在家里，在宁静的乡村生活中，那个引人注目的表兄的形象出现在她心中，不知不觉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他表现出朴实无华的气质，没有任何矫饰，几近于平淡，根本没有什么“不可抗拒的魅力”，但却能激发她的想象。她几乎无法测度他的智识，对他的命运和前程也一无所知，但尽管相距千里之遥，她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人格的力量和他的心灵。

又是一年过去了，除了有过无数的讨论商量，其他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作为一家之长的外祖父便同意玛丽安妮按自己订立的目标过活，去施展她并不出色的绘画才能。1892年春她动身去了柏林。在柏林，她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讲究效率的工作，而且还有夏洛腾堡的那一家人。这是一笔她只有通过内在和外在的辛勤努力才能获得的财富，而她总是有机会去获得这些财富的。她那颗正处于发展期尚未定型的心极少能尽兴地享受当下。她自己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付，她还没有忘掉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不幸和家庭遭受的痛苦，因此她对别人的痛苦很敏感。她尤其理解海伦妮，能够预感到海伦妮的命运，感受到她那别人难以企及的善良和纯洁，由衷地爱她敬重她。尽管玛丽安妮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这个尘世之人与海伦妮这位圣女的资质秉性截然不同，但她心甘情愿地接受后者的教诲，而且永远会这样做。“同您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向全人类敞开心扉！”海伦妮的女儿们都还过于年幼，而且做母亲的也不能拿家庭问题让她们分忧。因此，在海伦妮预感到玛丽安妮会成为她未来的儿媳之前，玛丽安妮就已经成了她的知己。

一年半以后，当玛丽安妮再见到那位陪审推事时，她立刻明白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也知道，如果有人觉察到她在恋爱，她就不可能再待在他身边。她也听说了关于羸弱可爱的埃米的事情，关于她令人困扰的病症，以及她同海伦妮的关系有多密切。其余的她都猜到了。这个秘密一点儿也没妨碍她。眼下她想要的只有爱，她只想靠近自己所爱的人。

1892年秋，韦伯专程去了南方与分别五年的女友相见，此时埃米已经把一个漂亮

<sup>①</sup> 按辈分，玛丽安妮应当是海伦妮的堂外孙女。此处照原文译出。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的疗养地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她越来越善于应付自己的疾病了，现在还能帮助和支持其他病人。当韦伯把这事告诉玛丽安妮的时候，玛丽安妮感到韦伯去探望埃米是为了弄清楚他自己和埃米彼此的关系到底如何。玛丽安妮觉得韦伯已经了却了这段旧情，但她也禁不住想，这件事为什么偏巧发生在这个时候。现在她的情感色彩变得更分明了，并开始盼望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

不过，实现这个愿望得走过一条濒临深渊的道路。陪审推事马克斯的一位得到海伦妮母亲般关照的朋友追求玛丽安妮。可这姑娘浑浑噩噩，竟然没有注意到他的示爱。她只是感到表兄的态度有了变化，重新退隐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海伦妮热切地希望这位年轻的朋友能与玛丽安妮结成连理，认为俩人都会因此而感到幸福美满。海伦妮的“眼睛迷糊了”（《路加福音》，24：16）。让她更加迷糊的是，她一如既往，仍然希望马克斯同埃米结为伉俪。毕竟，她的儿子去探望了埃米，又有消息说埃米正在慢慢康复。他们也没有问问玛丽安妮自己的意见就把她许配给了别人。接下来的是令人绝望的迷惘。海伦妮觉得自己对那个年轻的朋友负有责任，她对年轻人的负疚感折磨着她，使她濒于精神崩溃。这样的情况要求大家都得放弃，这似乎是唯一体面和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韦伯给玛丽安妮写了封信，这封信比其他任何文献都更能够体现出韦伯年轻时代的命运和他那时的性格特征：

玛丽安妮，读这封信时你得头脑冷静、心态平和，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些也许你始料未及的事情。我想，你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走上了绝路，我会把你放逐到那个听天由命的冷寂港湾去，我自己就在那里抛锚停泊了多年，但事情并非如此。

188

首先，如果说我们彼此有些许的了解的话，我就无须告诉你，我**绝对不敢**像送一件免费赠品一样去向一位姑娘求爱。如果我没有完全和无条件地倾心爱她，没有这种无法抑制的神圣冲动的驱使，那我自己就没有权利去要求或接受她的爱。我告诉你这一点是为了让你不要误解我下面要说的话。现在你就听我说吧。

正如你自己也意识到的，我认识你的时间其实很短，因为我现在才明白，你在很多方面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而你并不了解我，也不可能了解我。你没有看到我是多么艰难地试图压抑——有时并不见得成功——本能赋予我的那种不可抗拒的激情。不过，你可以去问我母亲。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对我的爱——对这种爱我只能沉默以对，因为我无以为报——是建筑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我在道德方面曾经是令她担忧的孩子。多年来我从未想到过，一个内心丰富的姑娘能够同我这样一个性格枯燥乏味的人走到一起，所以我过去表现得漠然无情，即便在同你打交道时我也坚持着自己的这种看法。

看到我的朋友对你的爱慕日渐加深，并觉得看到了你做出回应的苗头，我无法

解释为什么，一看到你，一想到我将目睹你跟他或者跟另一个男人共度一生，我就——不止一次了——有一种朦胧的沉重心情，好似一种悲哀的感觉。我把这看作是一个人看到别人的幸福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自私情感，因此我把它给压下去了。但实际上这是另一种情感。你知道那是什么。可是这个字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因为对于过去我得偿付双重的债务，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偿付得起。虽然你对这两种债务都知晓，可我还是得说出来。

首先是最近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两个人——不过责任全在我一个人——对我朋友的人生幸福所造成的伤害远比你现在所能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那纯洁的形象横亘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他知道我写给你的这封信的内容，他具有男子气概，而且富有理性。但我不知道，假如你作为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出现在他面前，他是否能够或什么时候才能够带着同你一样的喜悦，而**不是带着忍痛割爱的感受**，无拘无束地正视你的眼睛。只要他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永远不能把自己的人生幸福建立在他失意的颓唐之上，因为过去的阴影将会投射在我能奉献给妻子的感情上。

189

但我还必须谈谈更为棘手的一件事。

从我母亲那里你已经知道，六年前我同一个姑娘那颗纯洁无辜的心（我现在觉得是）十分贴近，这个姑娘同你在有些方面相似，在另一些方面则不同。可是你却不了解，那时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我同姑娘打交道时压在自己肩上的责任到底有多重，这一点我自己也是后来才认识到的，这个责任要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一世。我直到后来才认识到，**她**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处境。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拿不准我们的关系是否已经结束。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今年秋天我去了趟斯图加特（Stuttgart）。我见到了她，样貌依然，可是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她的形象从我内心深处抹掉了。因为向我走来的已经不是萦绕于我心间的那个人了，她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分手了，我想是永远分手了。

圣诞期间，我听说医生找不到她这沉疴宿疾的原因何在，便得出结论说她**仍然**在暗恋着我。我徒劳地在**我**心里找寻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终极答案：在我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她克服对我的感情（如果这感情存在的话）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她心里唤起了希望呢？现在又有消息说，她已经开始康复，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而我却更加困惑了：使她变得更加坚强的到底是希望还是放弃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不能接受她冷漠地放弃或是无可奈何的感受。如果我将要为另一个姑娘而活着，我也不能让她觉得，对于她而言我已经死去。这就是为什么当另一位姑娘——如果这位姑娘不顾偏见，不顾我做单调乏味的见习律师期间不堪造就的前景，不顾我的弱点——赐给我幸福生活的时候，我要正视她的双眼，看看她的心是否能与我的心一

起跳动。可是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我不知道。

190

现在我要问你：最近这些天你在心里是不是已经断绝了同我的关系？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要这样做？还是说你正在这样做？如果还没有，那就太迟了，那我们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我会拼命追求，不会放过你。我告诉你，我要走一条我必须得走，而你也知道的路。在这条路上，你将与我同行。这条路通向哪里，有多遥远，它能否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结为连理，我都不知道。即使现在我知道你多么优秀，多么坚强，你这个高傲的姑娘，但你仍然可能会屈服，因为你如果同我一起走这条路，就不仅要肩负你自己的重担，还要加上我的那一副，你还不习惯于走这样的道路。因此，这对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个考验。

不过，我相信我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澎湃的激情似海潮高涨，环绕我们的是一片黑暗——跟我来吧，我品格高尚的同伴，走出那听天由命的寂静港湾，驶向浩瀚的大海，在那里人们在灵魂的搏斗中成长，一切无常的东西都将从他们身上消逝。但是要记住，面对脚下波涛汹涌的大海，水手必须得头脑清醒。我们不能容忍自己带着幻想沉溺于模糊不清和神秘的心灵感受中。因为当情绪高涨时，你必须加以抑制，这样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去驾驶你生命的航船。

如果你跟我走，就不必给我回信了。当我再见到你时，我会默默地握住你的手，不会在你面前低垂双目，你也不应当这样做。

再见。生活对你而言殊为不易，你这个遭人误解的孩子。现在我只想对你说，我要感谢你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丰富内容，我的心与你同在。这里我想再重复一遍：跟我来吧，我知道你会的。

玛丽安妮读到这封信时，被一种不可名状和永恒的东西震撼了。她再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了。从这一刻起，她的一生就是对这一时刻的馈赠感恩戴德。唉！从狂喜中平静下来后的等待多么难熬啊，因为现在放弃转化成了希望。伊达和海伦妮也通了信。这件事发生后几个月——这段时间显得很漫长，马克斯和玛丽安妮得以订婚。海伦妮心里仍然很难过，不过她能够忍受这新的现实，因为她在心里早已把这个姑娘看作是自己的女儿了。于是她开始默默而无私地期待着孩子们的未来。

191

当马克斯去他们俩的一个共同亲戚家看望未婚妻时，海伦妮让他带去了如下的祝福与问候：

即将启程的马克斯给你带来了由衷的问候。我怀着欣喜和感激的心情让我的“老大”离去。我知道我并没有失去他，他带回给我的将是双倍的财富，所以分别时我不像有些可怜的母亲那样难过。我过去耽误了或者是做错了的事情——对此你

知道，马克斯也明白——你们俩要通过相互勉励和共同担当一起去完成。亲爱的孩子，有一件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鉴：要同甘共苦。一人遇到难处，另一个人就要相助，不要因为爱或者畏首畏尾而变得过于谨小慎微或顾这顾那，这是上帝的旨意。马克斯知道，他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因为我的缘故，他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的。上帝保佑你们！爱是永恒的。

你的母亲

他们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幸福依然笼罩在过去种种痛苦的阴影中，这包括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痛苦。这对未婚夫妇不能够也不可以摆脱掉任何东西。他们做年轻人的时间还很长，得慢慢学会怎样做年轻人。尤其是马克斯，各种各样的内疚、断念和压抑感在他身上结成了一层硬壳，只能靠泉涌而至的新生活慢慢地将其剥去。对此他做得一丝不苟。订婚后韦伯很快就去了斯特拉斯堡同伊达倾谈，对韦伯来说，伊达就是他的第二个母亲。原来伊达这许多年来也为了埃米而徘徊于希望与恐惧之间。马克斯再次意识到了他作为年轻人的全部责任：他让一个纤弱可爱的姑娘痛苦地等待着从未对她说出的、决定命运的那个字眼。他在这次动情的旅行中给未婚妻写信说：

旅途中我发现一直揣在大衣口袋里的《明希豪生》（*Münchhausen*）第二卷，所以没有按原计划撰写那个什么评论，而是读了金发姑娘莉斯贝特（Lisbeth）的故事。阅读时我想到了我那个有着一头褐发的威斯特法伦姑娘，我明白了，你在某些方面就是莉斯贝特；但我更清楚，我跟那个奥斯瓦尔德（Oswald）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你给自己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光棍啊，我的孩子。我有时候仍然感到十分压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鉴赏力出现严重偏差时选中的对象，而这种偏差在一个明媚的日子将会消失。不过，听我继续讲。在海德堡，我乘车路过贝内克家时，他们认出了我。我去他们家吃了晚饭，这些心地异常善良的人带着他们惯常的真挚动人的快乐接待了我。只有埃米的朋友多拉（Dora）显得仍然为最近的事感到压抑，她很真诚，但有些沉默寡言。

我的眼前也浮现出了过去的情景。沿着内卡河畔往回走时，一种久违了的柔情向我袭来。奔流不息的内卡河河面上，月光被水波揉碎，变成数不尽的粼粼波光。黑黝黝的城堡俯瞰着内卡河，月光映照着城堡的背面，它的正面轮廓就像未来一样纠结而又模糊不清。从床上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那个黑幽幽的庞然大物矗立在月光中，有些瘆人。可当我早上醒来时，看到的却是绿色环抱中一个欢快的报春使者。这里很热，斯特拉斯堡之旅几乎可以说是一次夏季旅行。姨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

我，晚饭后我们坐在花园里聊了好几个小时，无所不谈。主要话题不出我所料，随后我会再给你写信谈及此事，因为我们还没谈完。我的责任感并未减弱，看来这种责任感会伴随我一生。但你不用担心，我的孩子，我早就已经消化了这种责任感，它再也不会让我情绪激动了，尽管最近这些日子在各种压力下我确实有点激动。我知道自己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我没有做过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今年夏天你一定要在斯图加特认识一下姨妈和埃米。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知道为了你会乐于此行。……

我一生中还从未感到像现在这么疲惫不堪，我想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我在斯特拉斯堡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不习惯于静静地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同姨妈交流思想，这种交流并不是为了达到某个实际的目的，而是从感情出发讨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大大有悖于我的习性，在我的信中想必已经感到了这使我疲惫不堪。尽管如此，但是这对我对她均有益处。虽然我现在有一种仿佛刚刚经历过身心受到磨难的感觉，可是，亲爱的，当我再次拥抱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已经在消化过去强加于我的那些事情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尔后，你就再也不会觉得，我的孩子，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了，就像你在上封信里写的那样。我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你知道我过去的事情，了解我心里对过去是怎么想的，你也知道，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既真诚又自然的关系，以此来尽可能地避免把我们的幸福建立在别人默默忍受着的痛苦的无奈之上。

193

埃米得知韦伯订婚的消息后，给他写了一封真诚和带有兄妹情谊的信。韦伯回信说：

亲爱的埃米：

昨天读了你为我的生日写的那封亲切的来信，我感到了一种非常纯净的快乐，多少年来我读信时极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你的信表明我们依然亲密如故，表明我将会继续拥有你这个我一直痛苦地感到缺少的同龄姊妹。你知道，我一直用你来衡量所有我遇到的女人，不管是妇女还是年轻姑娘。对于我这个生性粗糙的人来说，幸运的是，我从内心里感到有必要透过你的眼睛去看异性。对那个我现在要为她的幸福负起责任的人，我也是这么做的，相信我以后也还会这样做。我们俩去年秋天匆匆见过一面，未及细聊。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能下决心对别人的生活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我想你从我最近这些年——回想起这些年令人难受的枯燥乏味的生活，我就害怕——给你的信中已经意识到，我完全陷入了一种带有苦涩滋味的听天由命的心境，只有早年那些丰富多彩的美好回忆给我的书斋生活投



下了一抹多愁善感的余晖，除此之外，我完全埋头于（我称为机械惯性的）责任性的职业工作中——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使我母亲非常苦恼。

194

我不知道你母亲在你那里做短暂停留时给你讲了多少我订婚前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因为我的听天由命的态度也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由于我不相信一个天资聪颖的姑娘会对我产生好感，所以我以为我的玛丽安妮是对我的一个挚友产生了这种感情，我的这位朋友对她可谓一往情深。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不得不将当时我还不理解的情感压抑下去。我朋友的追求得到了我的鼓励，结果酿成了一个让我母亲和玛丽安妮都受到很大冲击的悲剧，正是这个悲剧告诉我，我的眼睛一直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模糊不清的状态中。

我是一个异常喜欢思索的人，在很多方面，我这个身为未婚夫的人超出了我的实际年龄。我的未婚妻——她在经历了过去和最近这些事件之后理解了这一点，正如你也会理解这一点一样——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必须宽容一点才行。但是，毫无疑问，世界在我看来与去年秋天已大不相同，因为我现在面对的是纯属作为人而需要面对的艰难而伟大的任务，尽管这项任务从外表看来不如人生职场上的目标对男人来得那么堂皇，但它值得我们努力。尤其是去年秋天，在奥蒂利恩豪斯疗养院（Ottilienhaus）逗留期间（可惜为时太短），我领略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外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物和事件中蕴含着丰富充实和静穆的伟大。除了“人尽其才”的义务，我对男人从事的职业所具有的价值从来就没有超出过肤浅的恭维，所以我热切渴望被赋予这种属于日常生活范畴和纯粹作为人应当承担的任务。按生活做出的安排，对我们男人来说——与你们不一样——这只有在自己家里才有可能。

如果我们能够经常互通音信，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我不想敦促你花太多的精力去写更多的信，因为你仍然需要节省你的体力。再见！致以兄弟的爱和友谊。

195

你的马克斯

结婚前不久，韦伯又给埃米写道：

亲爱的埃米：

要不是因为一直期望亲自来为你信中表示的好意向你道谢，我早就回复你那封让我深受感动的来信了。可现在这次预计的行程不得不推迟到我的新婚旅行之时，所以我此刻给你写这封信。现在你了解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接受新的使命之前我**必须**与你坦诚相见，把一切都跟你讲清楚。我一度认为，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属于哪一个女人，也不可能同哪一个姑娘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你知道，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是，我多年来始终拿不准你对我到底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或你将

来的态度会怎么样。如果不弄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永远不可能摆脱这种深深的无可奈何的想法。现在，我们已经弄清楚了过去，我认识到了我给自己制造的一切幻觉、我所犯的错误以及我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我几乎可以确信，我们两人都不会反对我们翻过过去这一章。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将过去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因为通过这段过去我认识到了，有的感情虽然会发生变化，但在生活中永远不会腐坏变质。最近几年中，我常常感到百无聊赖，一直觉得前途渺茫，正是我母亲和你的形象让我拥有和保持了足够的力量，让自己好好干下去。如果说我现在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担同一个女人——她把自己一生的幸福托付给了我——结合而带来的重大的责任的话，这也应当感谢你。我和我未来的妻子怀着由衷的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与你再次相见。

就写到这里吧。你知道我对你的衷心祝福。亲爱的，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对我与你的友谊感到非常自豪），心中会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感、感激之情、由衷的喜悦以及友谊等各种情感的独特交织，我一生中想到别人时，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知道，这在今后也不会改变。别为“周日穿什么衣服”而犯愁。我的未婚妻也不顾我的竭力反对，要我穿上节日盛装。一如既往，向你致以兄弟的爱。

你的马克斯

196

以这样的方式，韦伯在迈进新生活的门槛的时候，揭开了罩在过去之上的面纱，由此把现在和未来同永恒过去微妙地联系起来。他让自己青年时代的女友确信，她曾经拥有过他的爱，而且他将一如既往，珍惜同她的友谊。韦伯希望她也不要忘却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的希望并未落空。

韦伯去世后，埃米的下面一段话表达了这段经历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那些年里，我一直不确定马克斯对我的感情是否超出了真诚的友谊，超出了兄弟姊妹之间的情谊。1887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参加军官培训时，他的一切举动在我看来似乎都超越了那个范围。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幸福的回忆，是我青年时代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在那时我就已经产生了疑虑，但我依然兴高采烈，颇有些飘飘然的感觉。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总是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他使我有幸体验过一次这种最美好的感情，在生活的巅峰做短暂的漫步。

埃米自己早已在为他人的奉献中找到了内心生活的重心。

## 2

眼下的生活渐渐地要求得到应有的重视。韦伯和玛丽安妮这对未婚夫妇相互交往的乐趣与日俱增，妙趣横生的幽默和插科打诨伴随着这种严肃的交往。订婚本来仍应保密，可是韦伯写道：“这里的蠢蛋一个个都带着意味深长的眼光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如此喜形于色。”他迫不及待地要建立自己的家庭。整整一个夏天，弗赖堡（Freiburg）大学那个政治经济学的教席一直悬而未决，一时还定不下来。不管怎样，即便是继续做一个有望接替戈德斯密德教席的讲师，他也仍然打算结婚。他在父母家里默默忍受的一切，现在都决堤似的喷涌出来。

每天一早，看着你的花冠和我的绿色缎带，我就觉得仿佛是在一家旅馆或一个我不应再待的什么地方醒来。我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进展，我感到自己完全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你在我的信中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思维陷入了极端的惰性。原因很简单：多年来，我一直因为自己未能谋得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位而感到无尽的苦恼。我对“职业”这个概念从来没有任何敬重，因为我觉得自己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胜任相当多的职位。唯一能够吸引我的就是挣得自己的收入，而未能做到这一点使我待在父母家里等于是受罪。不过，现在可算是快熬出头了，可熬出头的方式与我——我曾认为自己是个四处漂泊的单身汉——所有的期望都不一样。目前所得的结果只是迫不及待地巴望着最终达到那个目标。 197

当然，两个年轻人还得为结婚做准备。首先，玛丽安妮得学会烧菜做饭，否则就不可能将丈夫的身体健康托付给她。家人担心她能否担负起“亚麻家族的圣事”，是否具有贤妻良母的美德，能否处理好日常事务。韦伯自己倒没有这么担心，他期待着她的个性、她的内心自由和独立精神得到发展。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玛丽安妮不能一开始就谦卑地把他作为一颗“高高在上的耀眼明星”加以仰视，而是应当骄傲地与他比肩而立。

随信附上两封表姐妹的来信。除埃米之外，她们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了。……信中那首诗显然是这位敏感的姑娘——她以独特的优雅对自己的情感生活应对自如——写给你看的，这首诗同我们的谈话（你了解谈话的内容）有关。不过，我认

为她说你“贬低自我”这一感觉是不对的。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你的实际，我的孩子，你说的是吗？你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对吗？我们自由和平等地站在一起。

198 不过，韦伯自己也认为，确保妻子具有平等意识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在家务方面找到一块他自己无法插手、属于她控制的领域。当她从接受家政训练的地方给他写信索取知识性读物时（她毕竟还处于求知的初始阶段），这尤其让海伦妮感到震惊。海伦妮认为未婚妻在闲暇时缝制自己的嫁妆更加合乎情理——即便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让自己静下心来，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海伦妮自己在订婚阶段就是这样做的，她认为现在这仍然还应是对未来的夫妻生活的必要准备。韦伯受到母亲这种担忧的影响，给玛丽安妮写信说：

我还要把倍倍尔（Bebel）的书给你寄来吗？如果你想要，我马上寄给你，因为我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你的庇护人。要不，我们将来什么时候一起来读？你现在还需要更多地阅读书籍吗？我给你准备了保尔森（Paulsen）的《哲学导论》。这是他让人交给我的，写得不错，也不难懂，我晚上睡觉时常常翻阅一下。不过，现在你首先得注意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必须变得强壮一些，要多注重外在的东西，而不是内心世界（包括你的和我的内心世界），不能带着蔑视“专职家庭主妇”的态度去思考问题。我这是为你好：你得有自己的拿手好戏（*pièce de résistance*），因为你必须得有一个你能掌控的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里（不像在思想领域）没法同你竞争。你简直不能相信我有多么轻视所谓的“精神方面的训练”。令我敬佩的是自然无羁而又强烈奔放的感受和实践活动——大概我自己在这方面不足吧——我感觉自己需要有什么东西令我敬佩。

你瞧，我又在对你进行说教了，不过你别认为这是件坏事。你知道，我完全了解你的个性，不是吗？我只是希望你自己有一个我不能染指的领域，有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范围，而且你并不将此仅仅看作一个无法逃避的不幸领域，因为——我得不厌其烦地重复——跟我一起生活绝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而且，我们自己最独特的兴趣领域越是相符和一致，你在我这里的独立性就越少，你就越容易受到伤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过，当然啰，不能有人为的自我限制。

199 我的“说教”没有让你感到更为震惊吧？没有那就更好。我说自己不尊重“精神方面的训练”，意思只是说，如果一个人将满足求知欲视为生活的真正内容，视为“使人成为人的关键”，而把他所面临的经济使命仅仅视为生活中无法避免的负担，那么这对他并不是一件幸事。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或者说女性是不是本能地在她的实际工作的位置上寻求生活的重心，从情感上说会给夫妻关系带来巨大的

差别。

至于我，我一直向往着经济独立和在实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可是环境不允许我做到这一点。照我的经验，学术上最有用的**新思想**，总是在我叼着雪茄躺在沙发上，沉醉于思索时出现在脑际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的结果。我把这种最狭义和真正的精神生产仅看作是业余时间的产物，看作生活的副产品。即便是现在，对于学术职业我喜欢的始终是实用—教学方面，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方面。我们在威斯特法伦的亲戚们婚姻生活中的巨大幸福也同样根植于男人们拥有从事**实际工作**的职业，在这种事业中他们感到充实和满足。最令我感到厌恶的莫过于“精神”和学术职业中的傲慢了。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当我说你跟我一起生活绝不会很容易时，我只是想说，恰恰是我的职责领域不允许我像前面提到的那种从事实际工作的职业一样，给我们的家庭带回那种自然而然的幸福。因此，给你带来困难的正是你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天真**和实际——恕我这样说。

我的孩子，我的“说教”真的让你重新考虑你自己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考虑我是不是没有看到你身上的某些东西吗？如果是这样，那我最好还是闭嘴得了。你知道，一个人的心是不管质量问题的，也不可教。不过**理智**告诉我，假如你不把重点放在纯粹的精神—哲学领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是有一个我无法踏入的实际活动领域作为基础，那么，你将来就会有一个更加稳固、对你来讲也更为易得的地位。我几乎有些担心，你会把我讲的这些话理解为我是在撤回或淡化我以前对你的期望，即在讨论和分享精神关切方面，你应当向 I 提出尽可能高的要求。

200

相反，我的孩子，实际情况是，为了让这样一种“精神”领域的共同生活不致危及你的地位，我绝对不能产生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感觉：由于我在这方面做过更长时间的努力，在这个领域自然就掌握了更加丰富的资源，所以你在各个方面都得依赖于我。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情形很容易发生，除非我感到你在你自己的实践领域同样有一个独立和由你控制并且能够满足你的**实践**兴趣的活动领域，就像我在我的教职或者其他我注定会从事的职业中所做的一样。我的心说：“我觉得你似乎就是特地为了我而降生于世的。”可我的脑子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是不是也同样是为了你而降生于世的呢？正是在这方面，我认为你低估了同我相处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活动领域，这个领域对你有很高的价值，能使你不受我情绪波动的影响。

不过，玛丽安妮还是按自己的心愿去做了，尽管她并不知道，后来家务对她的要求不高，而她婚姻的幸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独立的精神生活。

韦伯在那个阶段仍然要承担巨大的工作负荷：教学、为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做新一轮农业工人的状况调查、准备一门秋天为牧师开设的有关农业政策的课程、一大堆待写的书评等等。因此，当夏天家里照例人去宅空时，他感到很高兴：

201

我希望很快就能独自一人在家。这样的独处每次都对我产生了颇为奇特的效果。对工作的厌倦情绪困扰了我几个月，现在一下子消失了。今天我读了100页生理心理学、100页认识论、一本意大利法学著作，全然没有感到脑子里像色拉一样的杂乱。很长时间以来，我的学思第一次如此健旺。这是不是说明，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已经不再适于待在父母家里了呢？我确实需要这种精神上的振奋，因为六个月来我已拖欠了约30篇书评。我收到了一些不客气的来信，虽然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信，但我仍然感到恼火，因为我知道实际上这些人是有道理的。

结婚前玛丽安妮在夏洛腾堡住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她开始热心地协助韦伯摘录、整理调查资料。这种工作适合她做，最主要的是，这也是她与处于工作重压下的丈夫共同分享的一种方式。如果她要在精神上做到同韦伯心心相通，不至于在学术研究领域拜倒在这个不知履足的竞争者面前，那么尽快熟悉学术研究在她看来似是明智之举。海伦妮是喜忧参半。距离婚期仅有六个星期，这个姑娘却双手沾满了墨水？！玛丽安妮最终能不能满足于处理家庭主妇的日常事务，满足于“为别人拿东放西，打杂效力”呢？妻子的职责会不会被她视为自己做出的重大牺牲？玛丽安妮的想法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 ※ ※

早秋时节，一个盛大的家庭婚礼在奥灵豪森举行。作为一个兴旺大家族的可爱而又风姿优雅的女主人，维娜（Wina）——新娘在她这里曾经度过了颇为艰辛的少女时代——为自己美丽的乡村居所能迎接如此众多的重要来宾而感到高兴。自订婚以后，奥灵豪森的家人就对玛丽安妮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很喜欢海伦妮和她的一家，那位大学讲师已经被他们尊为“有前途”的重要人物。谁曾想到这个性格乖僻的姑娘竟能有幸抓到这么一个阍呢？

恢宏大气而又充满诗意的山水景色，以及艺术性地点缀其中的漂亮庭园，平时总沉浸在静谧的梦幻之中，此时恰到好处地装扮了这个喜庆的婚礼。奥托·鲍姆加藤在乡村教堂里为这对新人举行了结婚仪式，爱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7）。那些理解此意的成熟的人都深为感动。新娘父亲一方的亲戚参加了婚礼，他们后来与这个如此快乐和如此丰富的生命再也没有过很亲密的联系了。参加婚礼

的有玛丽安妮腼腆而孤独的父亲爱德华：由于心地善良、对人性有独到认识的女婿懂得怎样赢得他的充分信任，因而他的脸上也闪烁着骄傲与幸福。商贾们带着各自的一大家子人来参加婚礼，他们是一群十分从容的人，个个恪尽职守，遵守高尚的商业道德，兼有职业工作上的勤奋和良好的道德修养。来宾中还有夏洛腾堡的一家人，他们给乡村的田园生活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带来了兴奋和更多的精神内涵。维娜用鲜花装点了这个喜庆的节日，海伦妮则带来了许多优美的诗歌。这些女性无私的善举和来宾的温文尔雅使各种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为这一天共同奏出了和谐之音。

不过，这期间也穿插着酣畅的幽默。一位当地的正统牧师批评了那位主持新人婚礼的牧师同行的“自由思想”，并在婚宴上作了一番对十字架的信仰表白——让那些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小团体”的人感到非常满意。另一方面，鲍姆加藤则称赞新郎的朋友是“上帝喜爱的快乐食客”。对海伦妮和这对年轻夫妇来说，痛苦经历的洗礼为这一天的幸福增添了庄严和神圣性。

# 第7章 青年教师与政治家 (1893年秋—1897年)

## 1

203 年轻的妻子在蜜月旅行途中写道：“我们相处得实在太好了。”不过，几次关键时刻都让她感到，丈夫神经很敏感。她应当决定他们继续旅行的路线，可是几条诱人但都不熟悉的不同路线摆在面前，她却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一条。韦伯还真的生了气。在那些带有根本性的事情上，他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现在生平第一次要求妻子就一个拿不准的实际问题为自己做出决定。这样的情形后来也发生过，而且常常都是在重大问题上，比如说应当接受还是拒绝一个教职之类的事情。

这第一次夫妻双双出游只给了韦伯短暂的喘息时间。刚搬进自己的新居，他给牧师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就开始了，这是由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办的，韦伯参加执教。他讲授农业政策，因为这是令他最感兴趣的题目。他家里很快就有外地来的客人留宿。热情好客是年轻的丈夫不可或缺的需求，终于能让朋友们围坐在自己家中的桌旁，给他带来了满足感。

然而，年轻的妻子能不能胜任操持这样一个家庭的家务呢？所有的家人都有些惴惴不安，等着看家务事中会出现多少纰漏，几乎每天用餐时间都会有人来窥探一下。可是有什么意外也没发生。相反——真出人意料——玛丽安妮就像其他年轻妻子一样，以满足家里对她的所有要求为荣，并且总有办法。此外，受到命运的眷顾，她有一个东普鲁士姑娘陪伴着她，对这个姑娘来说，谦恭地侍奉他人是上帝所定的一种生存方式，她以这

204



样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忠心耿耿地陪伴着这对夫妇，直到二十三年后去世。海伦妮曾暗地里担心儿媳的“学徒”期会出现严重的麻烦和一大堆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感到玛丽安妮在尽力而为，也就放下心来。玛丽安妮在给海伦妮的信中说：“瞧，你觉得我过去一年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对吧？可是，是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把这些东西教给我的呢？我无法用语言表达你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过对此你自己很清楚。”

这对年轻夫妇仍然生活在夏洛腾堡家里和过去的岁月投下的阴影之中。他们与海伦妮的关系尤为密切，并分担她由于长年过度操劳而加重的多种难处。韦伯的父亲已经离任，这个仍然浑身是劲的人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待着。海伦妮对自己的生活有何感受，她与这对年轻夫妇心灵相通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都表达在她的一首温情脉脉的即兴诗里：

春天，我的孩子们，也来到了你们的心中，  
生命之树开满了花朵，结满了果实。  
看着它生长，我心里暗自欢喜，因为我知道，  
经历过苦痛洗礼的存在，将不会被生活的风暴摧折。  
你俩在我心中的意义，你们并不完全知晓……  
然而，我生活的力量和勇气，只能来自他人的幸福。

享受当下的精神放松、无忧无虑地陶醉于自己的幸福——这样的生活很少眷顾这对年轻人。在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生活中，他们的生活主要是为了“工作”和“他人”。不过，眼下他们还并不期待过另一种生活——就像一艘货轮需要压载才能在新的航线上安全行驶。他们两人都知道，自己必须学会平静安稳地生活、简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不过，酣畅的幽默、愉快的舒适感以及相互逗乐带来的乐趣，给严肃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灿烂的阳光。下引的一封信表明，有时候韦伯会用滑稽和粗犷的幽默来对付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处境。这封信是他结婚半年后从波兹南写给妻子的，他当时不得不在那里服两个月的兵役：

我今天无法逃脱“被邀请”的命运，也就是说，几个现役的战友按惯例有义务

205

现在我这里居住条件好多了。首先，你可以发现这地方生了火；其次，有了酒精炉（一马克一个）和装可可的罐子（早上我得制止我的勤务兵用他那一副脏兮兮的爪子从罐子里舀可可）；在我的卧室里，你还可以看到玻璃柜里放着一排瓶装的格赖策尔（Grätzer）啤酒和各种精美食物，从熏鹅（！）到普通的重炮型马肉香肠，应有尽有。今天刚洗过俄国蒸汽浴，我这具像卡拉蒂雅（Galathee）——那个原是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女人叫什么来着？在这个猪圈里我的古典细胞已经丧失殆尽了——一样被重新赋予生命的僵尸甚至穿上了一件亚麻衬衫，不过这只能在星期天穿穿而已。当然了，这个营房里又老又脏的两脚动物，想起来自己是个人，还娶了个极为俊俏可人的小女人，因此必须设法同一般的猪猡有所不同，至少在放大镜下面要分辨得出区别来。真正惨不忍睹的是睡觉的床：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却得不到一个柔软的枕头。<sup>①</sup>在这些实在太短、太窄的木匣子里，我找不到足够的地方让我疲乏的头，尤其是我那疲惫的细小臀部适得其所。我这个房间的前任房客——一位现役战友，臀部的生长发育似乎十分寒碜，在多年服役期间，他在床垫上睡成了一个锐角形的坑。我至今还未能成功地将其转换成钝角，钝角更适合我的体形。

1894年3月11日于波兹南

206

韦伯在波兹南受苦受累的同时，家里却有一件让大家开心的喜事：他十八岁的妹妹克拉拉与一位著名学者的儿子——医生恩斯特·莫姆森（Ernst Mommsen）博士订了婚。两家有着多年的交情，特奥多尔·莫姆森对海伦妮的魅力尤为折服，对年轻的学者和政治家马克斯也寄予了厚望。他喜欢与马克斯辩论，即便是激烈争论之后也不会对后者心存芥蒂。他其中一个儿子卡尔是马克斯学生时代的朋友。

就思想传统而言，两家人也像这对年轻夫妇一样投契。年事已高的学者为新获得这么一个清新秀美、充溢着生命乐趣的女儿感到神清气爽；海伦妮则从恩斯特高尚的心灵和善解人意中获益。韦伯对妹妹的幸福感同身受，觉得这是他妹妹唯一应有的归宿。她的秉性与哥哥全然不同，生来就完全是享受现世幸福的，韦伯尤其喜欢她的活力和无拘无束的自然。韦伯感谢命运的安排，让妹妹能够享受与自己不同的青春——没有精神上的压力，没有心灵的挣扎和纠结：

要是我还没有革掉叫喊的习惯，今天早上接到你那封可爱的来信，得知关于这个童话般幸福的好消息时，我一定会大叫起来。唯一让我难受的是，出门在外，无

<sup>①</sup> 德文有一句谚语，“Ein gutes Gewissen ist ein sanftes Ruhekissen”，直译为“清白的良心就是一个柔软的枕头”，也可以译为“问心无愧，睡觉安稳”，与中文谚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韦伯此处诙谐地借用了这个谚语。——译者注

法见到我那个已经秘密订婚成了待嫁新娘的小宝贝——事情似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不是吗？有时候我会担心你是在蒙我，或担心这件事会化为乌有。性情如此开朗的人刚刚脱离少女时代就找到了生活所能赐予她们的最大幸福，我居然能够看到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是令人欣慰。一个姑娘日后将会有很多的生活体验，会经历很多失望，为什么要在青春年少时因此而丧失生活乐趣呢？我今天不可能就这一切多写，首先我必须看到你再次来信中白纸黑字写着，这一切不是迟来的狂欢节之夜的嬉戏。要我想象我们的小克拉拉做“特奥多尔伯伯”（不知道现在应当怎么称呼他了）的儿媳，一时还超乎我的理解力。

考虑到最近我脑子里想过的那些事情，这一至今仍然让人难以置信的绝佳幸事 207  
不啻为一种世间罕见的安慰。那个小丫头！她给我写了一张非常可爱的小明信片，她似乎已经以自己那种清纯自然的方式适应了新的角色了。有些人需要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中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方能经受风霜雨雪，真正成长起来，这个生命力尚未受任何羁绊的孩子也属于这种人。我仔细想来，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还想不出有什么人比他更适合做克拉拉的丈夫。当然，他很可能是个惧内的男人，不过，他也确实需要惧内才行。

人们对这个联姻的种种希望均如愿以偿。这个新建立的家庭和谐兴旺，过着美满丰富的生活。正如她哥哥所预料的，克拉拉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热心的、精力充沛的和聪慧的女人，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能愉快地胜任，她用自己永不枯竭的旺盛精力和蓬勃朝气，让丈夫、孩子和众多的朋友们总感到幸福愉快。她的生命之树长得越来越枝繁叶茂，开满了花朵，结满了果实。

※ ※ ※

韦伯在柏林的生活方式有时确实让女人们担忧。他真的绝对有必要如此超负荷地工作吗？他每周大约19个小时的讲座和讨论课本身就够紧张了，更何况这个给他的著名导师代课的年轻教授很快还必须参加由国家举行的律师资格考试。此外，他还有大量自己承担的任务！一件事情刚刚做完，他不知疲倦的大脑紧接着就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工作。与妻子一起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几近于无。两个月军训占用的时间现在也得加以填补。室外大自然已经披绿，春意盎然，但年轻的妻子却难得有机会将丈夫从书桌旁引开，走出大门。其实阳台就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了，在那里他可以很容易另外安放一张桌子，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看到一片蓝天以及一些色彩缤纷的花朵。不过，除此之外， 208  
他只能浏览到大城市草木稀疏的庭院、城市铁路的路堤以及堤后白色的石灰窑。夫妻能够一起到动物园散步就已经算是一种恩赐了。年轻的妻子写信告诉海伦妮：“你试想，

马克斯居然花了一小时跟我一起在动物园散步。对他来说，这真的是做出了牺牲，不过事后他还是对此感到高兴。其他一切都如我所料。他工作上忙得不可开交，且静得出奇，我觉得不应当去打扰他。不过，因为我完全理解他和他的秉性，所以耐心等待着将来更愉快的日子对我来说并不是件难事。”

几个月后，妻子在给他的信中表示担心他过度劳累，担心他的生活方式不健康。韦伯给她作了详细的解释，让她放心。从韦伯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尽管他有过人的工作能力，但他仍然不时感到神经非常紧张，心里并没有觉得十分踏实：

总的来说，我的身体状况比前几年好得多。我本来已经不再指望身体会有这样的好转了——除非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在我们订婚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好转——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忧心忡忡。遭受多年令人作呕的折磨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平衡，这时候我就担心会患上严重的抑郁症。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觉得原因就在于，我不停地工作，没有让神经系统 and 大脑得到休息。完全撇开我天性需要工作不提，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不情愿有意识地真正停下工作来休息一下的原因。我觉得，只要我还不能断定康复期已经完全结束，我就不能冒险让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我现在正带着一种真正的新的幸福感在享受这样的神经松弛——重新变得衰弱。

209

他继续弓满弦绷地工作。对牧师所做的问卷调查材料仍需整理，而这个项目首先得有易北河以东各农业地区人口流动的大量统计数字支持。与此同时，他又接受了一个紧迫的新课题：对证券交易制度的专题研究。他在这个领域也成了专家。议会正计划进行“证券交易改革”，一份官方调查报告业已公布，韦伯开始着手为戈尔德施密特的商业法杂志撰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讨论期货交易问题。同时，他还应瑙曼的请求，为哥廷根的《工人文库》（*Arbeiterbibliothek*）撰写《证券交易和银行业务初级读本》（*Eine Börsen-und Bankfibel für 10 Pfennige*）。这个生动浅显的读本让外行也能够理解经济运作中的关键机构。他在书中阐明的一个观点是，即便是纯粹的投机交易，也不仅仅是服务于私人团体的利益，它在价格平衡和商品分配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有益的功能。

和在农业问题上一样，他在这方面感兴趣的是政治问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银行和商业大亨聚集资本，因为这种资本积累意味着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储备力量。出于道德动机以立法形式来压制某种形式的投机交易，尤其是在大庄园主的强烈要求下压制谷物期货交易，结果只能是将这些物品的市场转移到国外，以削弱德国为代价去增强别国的财力。

是由柏林的证券交易所还是由巴黎的证券交易所为那些需要资金的外国列

强——诸如意大利和俄国——提供更好的债券销路，这从政治上讲并非无足轻重；是由国内或者国外商人控制市场，这对于国内经济利益而言也并非无关痛痒。……

只要各国之间还在为民族生存和经济实力而进行无情的、不可避免的经济斗争（即使他们在军事上和平相处），那些纯理论和道德要求的实施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理由是：在经济领域也不能有**单方面的**裁军。一个强势的证券交易所根本不可能是一个“道德文化”俱乐部，大银行的资本也跟枪炮一样不是什么“福利机构”。对于追求**尘世**目标的经济政策来说，证券交易所和银行只能是那场经济斗争中的**权力手段**。如果这种经济政策同时也能满足人们对这些机构提出的“道德”要求，那么它会乐于去满足这些要求，**但归根结底**，这种经济政策有义务防范那些宣扬经济和平的狂热分子或脱离现实的使徒们让自己的国家解除武装。<sup>①</sup> 210

两年以后的1896年秋天，韦伯和一位较年长的同行莱克希斯（Lexis）应邀参加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咨询活动，该委员会的任务在于弄清新法律所产生的影响。韦伯受托在联邦参议院报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是那些为控制德国而相互竞争的资本巨头和政治显要：一方是大工业和金融业的代表，另一方则是大庄园主的代表。同这类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让韦伯很感兴趣，因为几年来他心里一直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和他们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作斗争。

会议在联邦参议院的会议厅举行。证券交易所那帮人占据了厅里的主桌，这是普鲁士人通常就座的地方。大庄园主的代表坐的席位属于几个中等大小的州。受这两拨人鄙视，我的同行和我则坐在离得很远的一个角落里，面前放着属于罗伊斯家族（Reuß）长系和幼系的书写夹。文雅型的大庄园主代表如卡尼茨伯爵（Kanitz）和施威林伯爵（Schwerin）沉默不语，而那些举止粗野的人已经开始在那里喋喋不休了。……

会议现在变得更为热烈，也更加有趣。让那些大庄园主代表大为恼火的是，我也被选进了一个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中我当与卡尼茨伯爵和一些证券交易所的人就德国谷物交易的未来进行商讨。这些先生们之间已经有过一些激烈的交锋了。我也同这帮情急拼命的头顾争论过多次，不过语气到现在为止还算客气，不至于担心人们很快会成双成对地相互射杀。不过好像命中注定，到现在为止那些阔佬们似乎对我颇有好感，至少那位商务枢密顾问跟我握手时总是握得那么有力，让我不禁纳闷，我怎么没有在我的书写夹下面发现几十万马克——这书写夹平时为罗伊斯家族长系所用。

1896年11月20日

①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第256页起。



211 弗赖堡大学文理学院要重启一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聘请韦伯的商谈，巴登（Baden）州政府决定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给这位法学学者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教席——不管从哪方面看，这或许都是件好事。与这件事相关联，韦伯与分管普鲁士教育的负责人阿尔特霍夫有过一段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交往，此人像个“开明君主”一样控制着普鲁士的大学。由于这件事和其他类似事件导致了韦伯后来公开批评“阿尔特霍夫制度”，因而有些情况在此应当有所交代。

阿尔特霍夫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讲师很感兴趣，想把他留在普鲁士，指定他为戈尔德施密特的继任人，但他不知道柏林大学的教员是否愿意推荐这样一位年轻学者作为那位年轻的学界泰斗的继任人。于是他利用人性的弱点玩弄了一些巧妙的伎俩，给韦伯以各种各样的许诺，试图把他留在普鲁士。他同时还告诉巴登州负责教育的同行，说在柏林韦伯期待在法学领域有一个辉煌的前程，所以韦伯只是把弗赖堡大学作为一个“跳板”而已。

然而，韦伯告诉阿尔特霍夫，他绝不允许别人把他强加给柏林大学或其他任何一个大学的院系。对此阿尔特霍夫评论道：“这个韦伯在个人问题上表现得过于敏感。”有一天，阿尔特霍夫向时为预算委员会成员的韦伯的父亲谈及此事，父子俩情绪都很激动，显然因为他们觉得阿尔特霍夫想要搞一桩“肮脏的交易”。巴登州的教育部部长请求阿尔特霍夫提供有关韦伯的情况，并告诉后者，巴登州破例设置教席的建议引发了一些疑虑，阿尔特霍夫把这封密件出示给韦伯，并评论道：“如果一个州的教育部部长如此明显地表现出小家子气（animus non possidendi），我是决计不会到那个州去的。”然而，除非阿尔特霍夫明确表示要韦伯留下来，否则韦伯就要保留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了。阿尔特霍夫给了韦伯一个书面许诺，把他推荐给柏林大学的有关院系，但对这位讲师不承担任何义务。韦伯表示同意。可是，当他回到家里打开信封看时，注意到一项条款，要求他必须拒绝所有可能收到的聘任。韦伯立即提出了异议，并随即得到了回复，称那项条款是一个错误，已经撤销。寄回的这份文件的落款日期被提前了，看起来就像这份文件在韦伯提出异议之前就已经写成了。不过，韦伯始终相信事情并非如此。

212

诸如此类的事情更加深了韦伯对阿尔特霍夫的印象，韦伯认为这个重要人物就像俾斯麦一样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利用别人对自己的信赖和道德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又对这些人完全嗤之以鼻。这种把人的品格作为棋子玩弄的做法——不管它要达到的目的多么值得肯定——在韦伯看来是应予谴责的，对此他决不姑息。

韦伯之所以倾向于接受弗赖堡的延聘，原因之一是要摆脱这个独断专行的人物。此外，对他有吸引力的因素还包括南方，尤其是新的研究领域。虽然他必须付出最艰苦的

努力才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感到满意，但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跟他的愿望是一致的。与法学相比，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年轻”，富有弹性。其次，它处于其他好几门学科的边沿，与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哲学问题直接相关。最后，就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取向而论，这门学科比研究法学思想中更为规范化的问题更富有成效。韦伯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尽管他内心不无矛盾，因为这一离别意味着他远离了政治生活的中心，也远离了母亲。他知道，这次离别让他母亲和妻子这两个女人都很难受。

对我接受弗赖堡大学教职的种种疑虑又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离开柏林是让自己“退了休”似的。的确，如果你在柏林住了这么长时间，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他们做了安排，让我在弗赖堡不会有与世隔绝的感觉。现在又“准备启程”了，我对自己说，首先，以后再离别可能比现在离别更让我们难受；其次，弗赖堡的教职职责更明确，也许更符合我的兴趣，虽然你丈夫一开始大概会相当勤奋地忙于工作，但他心里更加满足，因此也会更愉快，也不那么“易激惹”还相信，将来这对我母亲来说也更有价值：她将会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到南方来，在我们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而不是像现如今在柏林这样，她常来我们家，可总是匆匆忙忙的，很少有不受打扰的时候： 213

在结婚一周年的时候，韦伯送给妻子几乎是全套的马克斯·克林格尔（Max Klinger）的蚀刻画作为告别柏林的礼物，这些画的象征意义那时深深地打动了夫妇二人。在题为《死亡》的组画中，有一幅把死亡描绘成救世主，在这幅画上，韦伯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我一度希望，得到命运的眷顾  
于青春鼎盛之时，赐我英年早逝。  
如今我已不再期待早逝，因为我发现尘世间  
有种东西可以让青春在心中永驻。  
亲爱的，当有一天我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  
快乐地漫步在通向死亡的冥途，  
一起走进那未知的国度。

# 2

1894 年秋，韦伯一家迁居弗赖堡。他现在很高兴地期待着进入新的学术领域。一切新的和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对他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给他留下了不少晦暗记忆的柏林生活一时似乎也成了过去。不过，这里等待着他的工作比他想象的还要繁重，同他以前承担过的工作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开玩笑的口吻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自己讲的政治经济学大课。

214 他立即开始了每周 12 小时的讲座，加上两个研究班的课程。第二个学期，他的朋友和同事格哈特·舒尔策-格费尔尼茨（G. v. Schulze-Gävernitz）休假，韦伯又觉得有义务为同事代一部分课。他称自己是一头被迫猎的野兽。很快他身边就聚集了一批学生，他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小心谨慎地将他们带入学术研究的领域。此外，出版社在敦促他继续撰写关于证券交易的文章。收回的农业工人状况的问卷调查在等着他，他要让助手将数千份问卷的结果统计出来。资料越来越浩繁，其实他的兴趣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因为他确信自己以前的看法将会得到证实。更重要的是，他还有更迫切需要做的工作。他计划撰写的新作毫无进展。那些很有价值的统计资料一部分给了学生们使用，另一部分他用在了自己后来撰写的关于农业政策的论文中。有的资料随即被作为实例用在了他的就职演讲中，关于这次演讲我们后面将会谈到。

除了其他的活动，韦伯还在学术和政治团体的一些特殊场合做演讲，包括在泛德同盟——他自己是该分会会员——地方分会讲波兰问题，外地也来邀请他去演讲。他的演讲才能已得到公认。抵挡不住邀请的诱惑，他不仅间或做单场演讲，而且还做系列讲座，例如应瑙曼之邀去法兰克福福音派工人协会做了关于“经济学的民族基础”的系列讲演。有时候，他在大学上完课就赶往法兰克福，晚上演讲，夜里赶回家，当他凌晨坐在书桌边准备第二天的教程时，太阳都已经升起来了。

他的工作精力好像增加了一倍，而且什么工作都能胜任。他通常工作到凌晨一点，然后就寝，很快就进入深度睡眠。每当妻子规劝他时，他总是回答说：“如果我不工作到一点，就不能做教授。”到 1896 年年初，第三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在新的学科领域里已经驾轻就熟，而且感到特别健康。复活节休假期间，他到柏林去了一阵子，在那里参加了社会政策协会的理事会议，去图书馆做了自己的工作，看望了朋友。一学期上了三门大课之后，这样的纷乱繁忙对他来说不啻为休息：“柏林的空气居然很适合我，我的神经系统更有效率了。过去几天很‘辛苦劳累’，但我仍然



感到精神焕发。”（1896年3月）

※ ※ ※

尽管很“忙碌”，韦伯在家里仍然享受着家庭生活的轻快旋律。那只当初是为了满足女管家的情感需要而领养的普通小狗，现在也成了他很感兴趣的玩物。当妻子外出旅行时，关于这只毛茸茸的小狗的消息总出现在信中：

布尔塔（Bertha）刚出门，并示意我她要带着小狗穆尔克斯（Murcks）一起出去，这显然是要让我从阳台上看到下面这一幕。那情形真的是很滑稽。布尔塔给小狗拴上一根蓝色的带子，它愤怒地冲着她狂吠，赖在地上不走，然后像着了魔似的飞奔，弄得布尔塔不得不一颠一颠地跟着跑，最后只好放开它。然后它又拖着系在身上的带子，跟在布尔塔后面奔跑。不过，训练它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随意挑选自己的房间。这毛病可能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从外表上看，这对夫妇的生活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很典型的，可他们却又明显地“与众不同”。例如，他们的社会观念和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对他们周围的人来说还有些陌生。他们家里墙上挂的克林格尔的蚀刻画，其中有裸露的人体。试想，如果你头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晨光熹微中在林中池塘边沉思的小夏娃，你在沙发上能坐得住吗？你能够盯着一幅艺术家自己取名为《然而……》（*Und dennoch*）<sup>①</sup>的画（画中一裸体男子站在暗黑的大地上，伸开双手祈求天光）看而不觉得难为情吗？此外，年轻的妻子言行举止都随兴所至，表达出一些完全不同寻常的看法。而且，她还从事社会工作，特别是——这尤其令人惊诧不已！——学术活动。不久，她甚至作为第一个女性去听哲学讲座并上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研讨班课程。这的确非常惹人注目，并招来了许多猜测，激发了关于女人应当、可以和能够做什么的争论。如果妻子除了家务和丈夫之外还有其他让她上心的兴趣，那么这种婚姻能够幸福吗？人们对这种违反常规的行为从根本讲应当持何种态度呢？

海伦妮去弗赖堡看望孩子时，听闻了不少人们的想法。虽然她自己原来对这个家庭的幸福持有的忧虑已经在消除，现在其他方面的事情又让她重新担忧起来。这对年轻夫妇激起别人的反感，这合适吗？他们外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最好还是随大流，是否至少应当把克林格尔的画从墙上取下来？这个问题让她很感焦虑。可是孩子们却一笑置之，

<sup>①</sup> 这里作者记忆似有误，克林格尔的画名应是“Und Doch”，而不是“Und dennoch”。——译者注

确信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做法。他们一点也不想惹人注目，不想触怒任何人，但也不愿对小城镇那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做出让步。

216

不过，周围的人们很快就习惯了韦伯夫妇。他们结识了一些很要好的朋友，其中有的也跟他们一样并不墨守成规。从一开始他们就与有很多孩子的弗里茨·鲍姆加藤（Fritz Baumgarten）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弗里茨是这里一所高中的优秀教师，娶了一位有着十分虔诚的宗教信仰、意志坚定却时常患病的女子。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韦伯夫妇钦佩他们能凭着爱情的力量去承受生活的重负。鲍姆加藤一家是连接过去的一座桥梁：伊达常来弗赖堡住在她的孩子们家里，同韦伯夫妇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在哲学家里尔（A. Riehl）家里，韦伯夫妇融入了一个颇有精神修养的社交圈子，一位杰出的女性用她罕见的优雅和她的维也纳传统赋予了这个圈子以高雅的艺术趣味。在同龄人中，韦伯夫妇与年轻的哲学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和他的妻子索菲（Sophie）建立了学术上情投意合、为他们一生所珍视的友谊。韦伯和李凯尔特双方的父母早就有密切的政治和社会交往。两个做儿子的几乎同龄，孩提时代就相识，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韦伯多年前就研读过李凯尔特早年关于认识论的著述《定义学说论》（*Zur Lehre von der Definition*）和《认识的对象》（*Der 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很佩服他思想的敏锐和洞察力。里尔接受普鲁士一所大学的聘任后，韦伯驳倒了一些教师中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确保了李凯尔特获得里尔走后空出的教席。韦伯自己虽然没有时间继续深入钻研认识论问题了，可他的妻子却开始通过对于存在和世界的意义进行思考来系统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她成了李凯尔特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并随时向自己的丈夫通报自己都学了些什么东西。“马克斯、小狗穆尔克斯和《认识的对象》是我的所爱。”两位妻子也结下了十分亲密的友谊。在雕塑家索菲的身上，玛丽安妮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新型的女性：一颗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柔软的心，一颗艺术家火热的心，一个以同样的激情从事艺术创造和做妻子与母亲的女人。

217

这个朋友圈子还包括韦伯的朋友和同事格哈特·舒尔策-格费尔尼茨、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胡戈·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以及学识渊博的语文学家戈特弗里德·拜斯特（Gottfried Baist）。弗里德是一个独特而又有些怪癖的人，你只有在交谈中通过发问才能了解到他惊人的学识，因为他无论是在著述里还是在流畅的演讲中都不能使自己的学识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韦伯觉得新的同事们“非常友善”，因而闲暇时乐意同他们交往。惯常的晚间聚会是考验这个新家庭的重要时机。韦伯的学生也常在他家用餐。周六晚上，一拨单身的同事聚集在他家自由地交换思想——这种方式最符合所有参与者的心意。韦伯也在家庭以外寻找社交场合来放松自己。每周例行的玩保龄球的夜晚，韦伯讲的逸闻趣事总能逗乐大家，他的酒量也像他其他的成就一样令人惊讶。大家都喜欢与他相处，只是年轻的妻子们在抱怨，说她们的丈夫现在回家比以前晚多了。夏

天，韦伯夫妇常同几个朋友一起（拜斯特是常客）做每周一次的徒步漫游，去一个乡村旅店，在那里享用鱒鱼和马克格雷夫葡萄酒（Markgräfler）。一次，韦伯夫妇为著名学者冯·克里斯（v. Kries）——他拒绝了另外一所大学的聘请——在“莱姆施托伦”（Leimstollen）举办了一次宴会，人们都开怀畅饮金黄色的葡萄酒。夜阑酒酣时，韦伯打赌说他的体重有100公斤，每少一磅他愿受罚一杯酒。在一片哄闹声中他去称了体重，结果赌输了，只好认罚。回家的路上，所有赴宴的人都上了马车，只有韦伯一人稳稳当当地跟在马车后面步行。

在招待同一位学者的另一次酒宴上，韦伯跟一个学生比赛喝啤酒，看谁能先喝完四大杯啤酒，结果韦伯得胜，让这帮学生也大为震惊，心想：难道日耳曼森林中的英雄又复活了，只不过这个和平的时代给他的是笔而不是长矛？要不，他或许曾经是一个身先士卒、带领随从奔赴战场的公爵？不管怎样，他的整个外表看起来都不像一个教授。他的年龄跟有的学生差不多，每次研讨课结束后他都跟学生坐下“喝一杯”，此时学生们不仅可以欣赏他的学识，而且可以享受他编造故事的艺术。在这种场合下，他什么题目都谈，绝不摆架子，尽管如此，每个人仍然感觉到与他之间有差距，没有人想到要与他保持零距离。 218

闲暇时间里，韦伯是一个很好的同伴：他谦虚朴实、不苛求于人，因而没有人会感到有任何压力。可是另一方面，作为系里的同事，他又常常让人感到不愉快，因为他不能容忍同行的“人情世故”，如果这种“人情世故”——比如在延聘教授的事情上——与纯客观地待人处世发生冲突的话。设若有人在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时需要他帮助，例如李凯尔特受聘一事，他会义无反顾地鼎力相助，一点不讲情面。由于他不怕得罪人，所以同事也乐于找他去处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同时我也有各种各样令人烦恼的事情。我好像着了魔似的，要四处赶去扮演刽子手的角色。我们这里有个同事有些思想不正派的一般问题，需加以惩戒，因为别人都讨厌干这事，所以采取行动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高耸严峻的黑森林构成了这种忙碌生活的背景。韦伯夫妇要经常一起散步当然是不可能的，韦伯只是在工作间隙匆匆登一下城堡山。因此，偶尔能够远足漫游一下就更是弥足珍贵了。他喜爱冷杉密布的森林和林前山冈上那些洒满阳光的葡萄园，这里古老的文化遗迹随处可见。很快，大城市在他看来似乎变成了石牢，他不希望再回去了。

第二学期结束时，韦伯婚后第一次给自己放了一次比较长的假。他与妻子一道去领略了苏格兰高地的孤独，去游览了爱尔兰的西海岸。他们终于有了机会痛痛快快地舒一口气，恢复一下元气。韦伯只有在旅行观光时才能彻底放松自己。之后他就会完全恢复

青春，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万物的美，总觉得不能够尽兴地把这个世界都融于心里。他在一个地方一般待不过三天。他的所见所闻给他已有的知识增添了色彩，赋予了形态。

219

他们夫妇乘坐一辆精巧的两轮出租马车驶过伦敦的柏油大道，以向他俩第一次共同旅行时参观过的历史遗迹匆匆致敬。然后，他们完全放松地坐到“苏格兰飞人号”特快列车舒适的皮椅上旅行，车窗外掠过一幅幅郁郁葱葱的画面。韦伯手指着孤独地散落在这一地区的古老教堂，原属于这些教堂的村庄已不复存在，数百年来土地主一直在侵占这些农田。他在思考着德国东部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即使在灰蒙蒙的北部城市爱丁堡（Edinburg）也有很多史迹可寻。城堡周围那些冷峭的灰色城墙尤其埋藏着令人悲怆的记忆。高地的荒野紧逼着城市，让这座城市的现实存在似乎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游客在这里只做短暂停留，然后在城外点缀着湖泊的寂寞山地找到令自己赏心悦目的所在：保持着原生态的、与世隔离的大自然——她崇高而又可爱，伤感而又明快。薄薄的云雾几乎每天都给这大自然裹上一层冷峻的严肃感，但同时又赋予她天然无染的清新，几乎每天都有阳光穿透氤氲，带来五彩缤纷的色彩变化。

韦伯心情愉快地给海伦妮写信描述了他的旅途见闻。海伦妮从信中得到的印象是，她的孩子们如今在一起确实很富有青春气息。下面是信中的几段叙述：

220

傍晚时分，我们去了众多小湖泊中的一个，沿着湖边散步。开始时还有太阳，可是——就像在这个国家所常见的那样——转眼之间，就见几片云彩相互追逐着飘过铜绿色的圆形山顶奔我们而来，接着就像有谁在天上挤海绵似的下起雨来。然而，至少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为这里景致的一部分了。你在外行走时几乎不会注意到雨已经下了五分钟了。你每天都可以经历各种天气的变化——几乎是有规律的。不管你走到哪里或者在哪里驻足，除了几处牧羊人的住处之外，根本见不着人影，这种空旷无人与自然的庄严肃穆交互作用，颇让人感慨，尽管这里的景色装点自己的材料——尤其是色彩——是如此简单朴素。这里实际上只有两种基本的色调，即绿色和青灰色，但这两种色调具有无数的组合：那些呈褐绿、黄绿和青绿色的是草地和蕨类植物，这种植物覆盖着总是潮湿的山岩，一直铺展到圆形山顶，只是间或为石楠树所阻断；褐灰色的是小河，它们像猫一样箭也似的奔流过草地；铅灰色的是湖泊，看上去湖水掀不起大浪；此外还有被阳光穿透的那变幻不定、轻柔而又浓密的雾霭。

而这一切都不过是那浩茫而又美妙的孤独的点缀而已，这孤独主宰了我们的感受，似乎给自然景色打上了它的烙印。这里压根儿就没有森林，而且除了洛蒙德湖和特罗萨克斯（Trossachs）的某些部分之外，连树都不怎么见得着，这也是人们

得到那种孤寂印象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平坦的乡村里的这种孤寂——它一直伸展到城门边上——在这里给人的感受与它在英格兰给人的感受不一样。在英格兰，从伦敦到爱丁堡的整个旅程中也同样见不到一个农庄，只能偶尔见到庄园宅第里的一座城堡，离城堡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可以看到佃农住所和单家独户的农家建筑，不时还可见到13世纪和14世纪的教堂，夹杂在十几个工棚之间，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矗立在50户到60户农舍之间。就其会众的数量而言，这些教堂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了，就像结核病人穿的外衣一样。在英格兰，你会觉得那里可以容纳数十万农民，而苏格兰本来就是适于养牛和——更适于——放羊的牧场。

今天早上，我们乘坐四轮大马车翻山越岭来到卡特琳湖（Loch Katrine）畔的特罗萨克斯——这里唯一值得一提的森林。很奇怪，冬青栎、栗子树、落叶松及针叶植物的树叶看起来都是一色的青灰。这些树屈曲盘旋的虬枝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茂密的矮树林的主要部分。自然，在路上又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持续了15分钟，然后在去洛蒙德湖的路上又下了一场。不过，我们抵达洛蒙德湖畔后，太阳就出来了，下午甚而出现了这儿少有的奇观：明媚的阳光和几乎是碧蓝的天空，伴之以这里常见的和煦、湿润而又清新的温暖，令人感觉十分舒坦。在我们的车行途中，当我们在湖边漫步时，洛蒙德湖向我们展示了她全部的瑰丽。

顺便提一下，在大不列颠，世界也只不过是村庄而已。你能相信，我们在这里还能碰到柏林来的熟人吗？在驶往卡特琳湖的船上，在那些有着线条分明的英国嘴唇、急匆匆登船的人群中，我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同事，也就是吉尔克（Gierke）那张日耳曼吟游诗人的面孔。然后我们一起乘船到洛蒙德湖才分手。与同胞碰面确实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平常我们在这里已经入乡随俗，适应了轻声说话的习惯，通常就好像没有看到身边的人，只是在别人发问时才非常客气地给以简洁的回答。不管吃什么，都不让自己放开了吃，吃的时候嘴张得越小越好，即便是饥肠辘辘，也要有意把调羹在汤里慢慢拨弄着，好像我们对盘中的食物全不在意。

一旦身边有德国人在，我们（还在等四轮大马车时）便开怀大笑起来，引得周围所有的英国人都急急地赶过来看这些野蛮人，在马车上我还偶然听见有人在说“这些德国佬真快活”。分手之前，我们一起吃了午餐，这顿饭足以让餐馆的侍者难以忘怀。吉尔克一开始的吃相就如同在德国的托伊托堡森林里一样，我也跟着这样吃起来。看到我们总是把所有端上来的食物都一扫而光，错愕不已的侍者最后给我们上了超常分量的烤牛肉、三文鱼等，恐怕是担心若不如此我们就要吃人了。三个侍者站在桌旁，惊恐地盯着他们的食物只剩下了残骸。当汽船终于打铃招呼我们上

船，因而也让我们停止用餐时，这些侍者显然长舒了一口气。此外，我们还喝了不知道多少杯水，也让侍者吃惊——吉尔克（他会让所有禁酒的旅店都感到不安）喝这么多是出于信念，而我跟着喝这么多则是为了同他竞争。

1895年8月14日于洛蒙德湖畔的卢斯小镇（Luss on Loch Lomond）

222 乘车来马里湖畔的盖尔洛赫（Gairloch）的旅途展示了苏格兰北部真正的高地与中部和南部很典型的不同特征。那种绝对孤寂的特征在这里更为凸显。在南部地区，似乎有一种绿色的（苏格兰高地人穿的）彩格披肩铺展在玄武岩山峦那些锋利的岩脊上，而这里的山峦要陡峭得多，以至于初春融化的积雪——至少在山尖——撕掉了去年夏天生长的所有的草和石楠属植被。山坡上布满了常常是奇峻怪异的山石，其间不是南方那种黄褐和灰绿两色相间的大片平地，而是色彩斑斓的石楠植物，各有各的颜色，从紫色到黄绿色都挤在十分狭小的空间里，各种色彩相互交融，给人一种呈褐色的明丽的总体色彩印象。从山间峡谷望去，可以看到绵延数英里的旷野，泥炭沼泽交错其间，尽管绝对单调，却像大海一样给人以变幻多姿的感觉。

马车顺着陡峭的上坡路走了足足一小时后，长达数英里的马里湖峡谷便豁然展现在眼前，我们立刻意识到，就连玛丽安妮对孤寂的需求也一定能在这里严肃的孤寂中得到满足。又行了数小时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八间分散在周围的小房屋组成的村庄和一个猎人的居所。除此之外，这里给人的感觉是方圆数英里渺无人烟。湖边狭窄的马路修建在玄武岩上，马车驶过时，发出一种奇特的嗡嗡声，似远处的钟声一般，这声音也许是由于湖水将路底下的岩石冲刷出裂缝造成的。下午和傍晚的太阳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你可以程度不同地感觉到，有一层薄薄的雾霭织成的轻纱总是将整个山水从头到尾包裹起来，阳光穿透这层轻纱后变成了灰白色，有时几乎成了绿色，只有夕阳西下时才变成蔷薇色。阳光所到之处，湿润的岩脊均泛出奇特的银白色。

在这片山岩遍布的荒野中，我们骤然来到迷人的马里湖旅店。它坐落在湖边一块洼地中，其间有一片绿色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一栋用碎石砌成的小建筑立在中间，旁边排列着一栋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楼里有一些十分舒适的小房间，面朝绿草坪的庭院，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在几乎全是处在荒郊野地中的这种朴素的文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见过三次了，这才是苏格兰真正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其原因显然在于，在德国，这种乡村旅店部分衍生于城市和乡村小客栈，部分衍生于商旅小客栈，后来终于与国际文化接轨，而这里的旅店则是由土地

拥有者的狩猎居所发展而成的。德国的那些旅店是提高了档次，旅店的客人由俗而雅，而在这里住的客人最早都是属于社会最上层的人，后来才逐渐由上而下扩展到较低的社会阶层。即便是现在，英国的旅游手册还列着哪个旅店属于哪个伯爵或公爵。土地拥有者开办旅店，然后将其出租：他们拥有并出租停泊汽船的码头，在苏格兰北部，他们还出租航行于各湖泊中的汽船。他们的狩猎场都用栅栏围着，例如，我们住地对面就是这样——一个狩猎场，那是罗斯伯爵的领地，占地数英里，取名“鹿林”，不过在德国人看来，这里并没有树，所以也不成其为林。除了一位饮威士忌的浑身珠光宝气的妇人，这里的游客（约14人到16人）都是上等的雅士，让人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十分得体。不过，晚餐的气氛一点也不显得拘束，人们的交谈也很热烈（当然不是同我们交谈，我们完全被视为陌生的另类动物而被弃置一边了），上了些年纪的旅店承租老板在桌边招呼着，举止十分得体，很令人惬意，他对狩猎也兴趣盎然。

1895年8月17日于马里湖（Loch Maree）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已经到了可以说是最西北的地方了，再往西就得去爱尔兰旅行了——我想，玛丽安妮或许还真想去爱尔兰旅行一趟。从斯托诺韦出发，我们乘马车在一条横穿这个岛屿的路上走了两个小时，这条路比我们迄今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荒凉，一眼望去，目光所及只有一片褐色的沼泽。然后，正当我们感到有些沉闷压抑时，几个白点连同大海一起映入了眼帘。其中一个白点原来是一个两层楼高的禁酒旅店。我们住进了其中一间，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其中画着一个火车头。

起初，巴瓦斯（Barvas）看起来好像只有前面提到的那种色彩鲜亮的房子。除此之外，能看到的就只有路旁田鼠掘出的大土丘了。近看时才知道，这些土丘原来是上百个地洞，每一个洞里住着一户人家。地面上只见一堵约一米高的沙石砌成的墙，顶是泥炭做成的，上面盖着用绳索编成的网，压着石头以防风暴，有一个排烟孔。里面住的是不懂英文的盖尔人（Galisch），他们在这里挖泥炭。与此形成几乎是奇特的对比的是，每家每户都有一匹马和一辆马车，这是他们唯一的家产，用来将泥炭运到斯托诺韦去。谢天谢地，我们真的到达了文明的终点，来到了“灰褐色”的沥青小棚屋。在通向湖边的沼泽地上，放养着无数处于半野生状态的牛群。小棚屋旁边可见到马匹，沼泽地上放养着羊群，棚屋周围种有燕麦。

在满意地注意到了这种天堂似的文明前状态之后，我们在旅店里得到了一个算是很干净的小房间，房间在底层，在屋里我的头撞着了天花板。饭菜的花样已经缩水到只剩下大块烤羊排和一种紫色的糊状的东西做成的奇特的布丁了，但这并不妨

碍他们按照英国大饭店的方式将这些佳肴呈献给客人：五六种醋、调味汁、大盘小碟、巨大的金属盖子，以及一整套迂腐而多余的言行，这一通折腾，会让饥肠辘辘的人禁不住怒火中烧。这也同样没有妨碍人们把这里的其他设施——诸如在这个国家以 W. C.（厕所）缩写的设施——装扮得冠带齐全。简而言之，英格兰旅馆文明的光芒也照射到了这一穴居人地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便动身去找寻那个据说是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澡的海滩。唉，找了 45 分钟，找得我骂声不断，玛丽安妮也泄了气，在我旁边快步跟着。结果那个海滩压根儿就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找到的海滩到处是岩石，根本就去不了。这时下起雨来，我们在风吹集成的那些沙丘中迷了路，待我们回到“家”时，已淋得浑身湿透，没有一块干处，身上溅满了沼泽地的泥浆，散发着被洞穴里冒出的烟熏过的味道。人们训导我们说，那个海滩在更靠北边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急急忙忙地动身去找——结果更糟。首先，我们发现的只是一片高耸的岩石海岸，大海壮丽的汹涌波涛愤怒地冲刷着岩壁上无数的缝隙，但因为我们在怒气冲冲地寻找一小片海滩，所以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番景致。其次，我们也不可能静静地欣赏这样的景致，因为两头撒野的健犊正冲我们飞跑过来，把我们撞翻在地，险些撂下海岸，幸亏那地方在岩礁前面有一块沙地斜坡。经历了这种“享乐”之后，我们在巴法斯已经受够了。傍晚时分，我们便乘马车穿过雾气笼罩的荒野回到了斯托诺韦，连德鲁伊特（Druid）柱石和其他名胜都未及观赏。接着我们又继续前往斯特姆费里（Stromferry），走了整整一夜，在那里我们才终于又回到了人类文明，清洗了这次费阿刻斯（Phäaken）之旅留在身上的所有污垢。总之，我们在 24 小时内乘了两次马车、两次汽船、一次火车，在五家旅店歇过脚。……

225

斯凯岛（Skye）有完备的旅游设施和旅馆。起初我们在波特里（Portree）度过了一个极为枯燥乏味的星期天，观赏了那里的六个教堂，听着这些教堂里的钟声一个接着一个地敲响。幸亏下起雨来。周一和周二我们去登了几次山。最美的一次是去岛南端的库楚林山（Cuchullin Hills）。我们先坐马车，而后骑了几个小时的马，最后是徒步行走在陡峭的高山小径上。起初斯凯岛上几乎每天下雨，我对这种没完没了的淋浴似的天气心中很有几分愤懑，但你不能在这里让下雨妨碍自己做事。而后的天气变得非常美妙，也就是说，很适合这里的山水景致：阳光不断穿透环绕着参差耸立的山顶而奔涌的云层，不时会有一方编织精美的白色面纱从黑色的悬崖沉入峡谷，飘向我们，原来那是一场短促的阵雨，宛如一喷壶的水底朝天倾倒下来。

从旅店上山进入库楚林的路绝对是难于上青天。我还没见过这样难走的路：得走过湍急的溪流、齐脚深的沼泽、被水冲刷得光圆的卵石、又湿又滑的草地、刀刀



般锋利光滑的岩石——刃口或朝上或朝下。可以说，这样的路人类几乎无法通行，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马怎么就能够应付这样的路。我骑着一匹健壮的小马驹，双脚几乎着地，活像那位犹太人最早的祖先雅各（Jakob）。玛丽安妮兴高采烈，骑在一匹长腿的马上。我们还有一个向导，如此一行就像圣家庭在逃亡埃及的路上。马的四蹄很快就没入水中，趟过数米宽的小溪，溪中布满了岩石和卵石。马一会儿踩进沼泽地里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一会儿任卵石在它们蹄下滑动，时而好像在垂直地爬上坡，时而又同样垂直地走下坡。起初觉得它们每走一步都会有一条腿夹在乱石中，不过我们很快就绝对有了安全感。当然，我的骑术几乎荡然无存了。即便是我那匹马“查理”在平地上缓缓地开始走起来时，我也得频频猛地拉缰勒马。我身体的某些部位也受了点损伤，以至于我现在还喜欢坐在柔软的地方。结果倒是玛丽安妮更能应付这样的旅行。她很适应这次旅行，这真是太好了：她睡得很死，足足睡了10个小时。这一切与我们上次令人紧张不安的、匆匆忙忙的蜜月旅行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这种全面放松的感觉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从未经历过。

226

从山顶俯瞰，目光越过岩石耸立、荒无人烟的峡谷，可以看到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个湖，湖的远处有一个出口，通向布满岩礁的海湾，流向波光粼粼的大海。云层聚集在山巅和我们的头顶上，所以看下面的景色时有一种剧院的幕布没有拉上去的感觉。有些岩石的形状让人难以置信，在这些参差交错、呈锯齿形的山峰之间，出现了一些钟罩型的山顶，看上去就像泉水般向上涌出的玄武岩突然间凝固了一样。

1895年8月22日于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n）的斯托诺韦

※ ※ ※

仅凭我们在此短暂逗留所获得的印象，就足以证明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不愧是英伦诸岛中最美丽的岛屿。在这里，苏格兰那种光秃秃的圆形山顶——虽说不像（比如说）斯凯岛的山那么凌厉险峻——第一次有了远古林木这样绝妙的植被作为补充。基拉尼位于爱尔兰的最西南端，是该国最先接触到墨西哥湾流的地方，所以这里各种各样的植物在野外生长繁茂，就像（比如说）意大利科莫湖（Comersee）湖畔的夏洛塔别墅（Villa Carlotta）的花园里的植物一样。旅馆的庭园是我迄今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这是一个英式公园，天鹅绒般的大草坪上间或分布着形状精美、孑然独立的树木，还有花坛和游乐场地。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路，人们都在草坪上行走。

从列车车窗望出去，你就能看出，爱尔兰同英格兰和苏格兰形成了很奇特的对

照。苏格兰到处是壮阔的荒原，那里的高地人迹罕至。在爱尔兰，每次举目望出车窗外，你都能看到人类劳作的痕迹：整个土地上几乎毫无例外地散布着个体小农场，其原因应当在农业发展的历史中寻找。这里几乎见不到村庄。在英格兰，地主“圈地”使农民的土地“被剥夺”而造成了村庄的消失；而在爱尔兰，这些村庄压根儿就不存在。每个农场都有一块界定明确的、由自己耕作的土地。始于17世纪初的发展——这意味着为英格兰的土地主没收土地——使这里以前的土地拥有者变成了小土地承租人，他们住在那种典型的一门二窗，刷着白漆，多半是稻草屋顶的小房屋里。

所有的土地都圈成一块一块地在他们中间分配。在北部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和阿尔斯特（Ulster）周围，圈地用的多是活的树篱；在西部的戈尔韦（Galway）郡和康诺特（Connaught）郡，地里石头多得出奇，每年犁出来的石头都堆在地界边，然后用石头砌成石墙，并不用灰浆砌合。车行数小时，你可以看到整个土地被划分得像成斜角的棋盘，一直延伸到那些不太高的山丘上。尤其是那些数不清的石堆，让我们领略了这里非常别致的景观。除了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和其他少数几个地点，这里完全见不到树林。

……在与爱尔兰人的几次交谈中今天是最愉快的一次。他们都承认自己是热忱的自治论者，并不讳言这是因为他们都——正确地——把地主视为一切罪恶之源，希望削弱地主的影响。当然，现在这里的农业状况让人难以置信。在几个山区小租赁牧场所能得到的具体数字表明，这要归咎于只能被称为无耻的高利贷租金。人们带着一种奇怪的无可奈何淡淡地说，这地方现在“非常平静”，就连在过去十几年间用枪口阻止人们续签到期租赁合同的走私团伙，暂时也无事可干了。人们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被赶走的承租人，他们有的沦为乞丐，有的靠卖茶点糊口。而在肯梅尔（Kenmare）伯爵——这一带一切都归他所有——领地的山里狩猎费就得1 000英镑，他的家产每年的进项是60 000英镑。所有过路、过桥、使用码头等的人都得付费给这些巧取豪夺的贵族，他们只有在收取租金（每年两次）和狩猎（几个星期）期间才会出现在自己漂亮的城堡里，其余时间都在英国挥霍钱财。

显然，这里没有什么比这种状况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了。上次选举的结果对地方自治不利，显然再次驱使大批人口移居海外，例如我们的马车夫就正打算移居美国。他问我是否相信爱尔兰总有一天会获得自治，他自己则不信于此。我说我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并且也理解为什么有人反对自治，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国家就会落入天主教僧侣之手，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他们。尽管我们的马车夫取笑那些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但他却是教士们坚定的社会支持者，照他的说法，教士本是乡下人，所以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这些例外的情形真是够可悲的。英俊小伙子们带着

忧郁的面孔和无奈的诙谐戏谑的神情，只是更加佐证了类型法则。那些受到陈旧的家庭宅第里——那里挤着16户人家（!）——可怕的道德状况和数百年压迫影响的人们，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自己的本质特征。

这个国家的遗迹令人惊奇，至少部分如此。尤其是玛丽安妮，她一看到断壁残垣就像着了魔似的。虽然我还有点编故事的技巧，但要不断编造出新的历史谎言，以勉强满足她详细了解这些废墟原居住者历史的愿望，仍然让我感到难堪。此外，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像爱尔兰这样拥有这么多的历史遗迹，只是其中很多已经不再能激发浪漫情怀了。那是一些散布于全国各地、为后来成为地主的古老氏族首领所拥有的石头大宅，以及17世纪地主的宅第。现在这些住宅均被遗弃了，十个地主中有九个都住在英格兰，他们的宅第被用作了采石场。尽管这些宅第的过去毫无诗意，但这并不妨碍常青藤把它们装扮得美丽宜人。另一类废墟是大量的修道院，我们今天就看到了其中两座最漂亮的，它们都是克伦威尔（Cromwell）建造的，他的名字在这里所有的断壁残垣上随处可见。

1895年9月7日于爱尔兰的基拉尼（Killarney）

# 3

韦伯到弗赖堡大学后的第二学期一开始，就照当时的惯例，为众多的听众做了公开的求职讲演，讲演的题目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Nationalstaat und Volkswirtschaftspolitik”）。<sup>①</sup>听众和讲演者自己情绪都很激动，因为这个讲演既提供了知识，也表明了信仰。韦伯的运思激起了热烈的讨论：“我就职讲演中极为尖锐的看法让人感到惊骇。天主教教徒大概会感到最为满意，因为我对‘道德文化’扎扎实实地端了一脚。”

这次讲演对不少年轻人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讲演发表后，在长一辈人中，尤其是对弗里德里希·瑙曼和他的部分追随者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韦伯再次讨论了易北河东岸地区的农业问题，像以前一样对普鲁士政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把对具体问题的阐述与经济政策应当遵循的价值标准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当时在“讲坛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有没有一种具有

<sup>①</sup> 参见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S. 7f. *Drei-Masken*, 1920.

自身规律的标准可以用来评判和塑造经济生活的形态——比方说商品生产中的技术完善理想，或者是商品分配中的社会公正理想？韦伯对此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并非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具体经验。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经济斗争之所以让人感到震撼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技术的进步，较为低级的一类人（波兰临时季节工人）迫使较为高级的一类人（德国本土农民）离开了家园。因此，“我们不应耽于乐观的企盼，以为只要获得了经济文化最大限度的发展就大功告成，以为自然选择与和平的经济竞争会帮助高度发展的一类人取得胜利。”有人也许认为，是不是可以把提高人生的“快乐指数”，把世界的幸福作为价值标准呢？这同样遭到了韦伯的否定。

230

单是令人沮丧的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就足以让我们难以成为幸福主义者，使我们无法去臆想和相信和平与人类幸福孕育在未来的襁褓之中，无法去臆想和相信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之外还能够世俗生活中赢得其他什么自由行动的空间。

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在通向人类历史那未知将来的门楣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sup>①</sup>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从这个学科自身的材料中获得自己的理想，它是同历史悠久的一般人类理想类型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门科学，探讨的首先是生长于特定经济和社会生存境况中的人的素质问题。不过，一旦它做出价值判断，它就会“受制于我们在自己的本质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人类的特性……”

假如我们若干世纪后能够走出坟墓，我们在自己后裔的面容上将要找寻的正是我们自己的本质所留下的久远的痕迹。即使是我们最高的终极世俗理想也可能会改变，也不能永恒。我们不能指望将这些理想强加给未来。但我们可以期望，未来将以我们的方式来认识他们**自己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我们期望靠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存方式而成为自己后裔的祖先。因此，德国经济政策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民族的权力利益在任何涉及这个问题的地方，都是终极和决定性的利益，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

就这一点而论，韦伯称自己是“经济民族主义者”，把经济政策视为民族国家的仆人。他最终用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来衡量各阶级对政治领导的意义，从而得出了悲观的

---

① 此为但丁《神曲》中写在地狱之门的门楣上的铭文。——译者注

结论：一个社会阶层只有把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才适于充当领导阶级。自从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变成了企业主阶级之后，这个阶级就己不再适合充当领导阶级了，它以牺牲其他阶级为代价去要求得到国家的支持。至于资产阶级，俾斯麦专制政治的烈焰目前已将这个阶级缓慢发展起来的政治判断力焚毁殆尽。工人阶级也还没有踏上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道路。“这个阶级既没有迸发出一星点喀提林式的付诸行动的能量火花，自然也没有一丝一毫洋溢在法国国民公会大厅里的那种澎湃的民族激情。”因此，假如德国想要继续维持其民族强国的地位，要确保德国的优等民族性的未来，在各个阶级中都还有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做。

这个民族的国民大众蒙受的深重苦难让新一代人更为敏感的社会良心感到沉重，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必须坦白地承认：今天让我们的心情更感沉重的是意识到我们对历史所肩负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注定看不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能否取得成果，看不到我们的后代能否认我们是他们的先辈。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时代的遗腹子，我们将无法祛除缚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诅咒，除非我们能够改变这种命运，做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先驱。

※ ※ ※

大约就在那时，瑙曼试图进一步将韦伯吸引到他的兴趣领域中去。1894年年初《扶助》（*Hilfe*）杂志创刊。韦伯被列为撰稿人之一。萨尔地区（Saargebiet）的开明“君主”、大企业家冯·施图姆（von Stumm）男爵对这份饶有特色的周刊宣战，在德意志帝国议会发表的一次重要讲演中<sup>①</sup>宣称，瑙曼和那些热衷于社会活动的牧师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危险。施图姆对君主产生了重大影响。“监狱法议案”<sup>②</sup>——解决工资纠纷的强制措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切促使马克斯·韦伯采取行动。他拔剑出鞘，草拟了一份反对强制性法令的宣言，发表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并在《十字架报》（*Kreuzzeitung*）上撰文抨击施图姆和大庄园主的代表。后面这家保守派的报纸是根据高层的风向来决定是否采用他的文章的。

在此期间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十字架报》将我的文章搁置了一周半之后还

① 讲演的时间为1895年1月9日。

② 玛丽安妮·韦伯在这里将1898年的《监狱法议案》与1895年的《颠覆法议案》搞混了，后者才是针对革命活动的法案。——参见英译注

232

是发表了。哈默施泰因的确让人难以置信。显然，他把皇帝对大庄园主态度的转变归咎于施图姆，只要看起来大庄园主也在皇帝垂青之列，他就不会去触碰这个权倾天下的人物，就会认为接受我的文章“眼下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可现在他却从抽屉里把它拿了出来，冲皇帝掷去！……现在也请你关注一下《邮报》，只要它一张嘴，我就立即扑上去卡住它的喉咙。

1895年7月22日致阿尔弗雷德·韦伯

1895年圣灵降临节，韦伯夫妇再次参加了在埃尔富特举行的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这次讨论的焦点是妇女问题，伊丽莎白·格瑙克-屈内（Elisabeth Gnauck-Kühne）的发言毫无疑问最为尖锐，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它极大地鼓舞了妇女们传播自己理想的激情。

瑙曼已经在筹划创立一个政治组织。他为这次大会写下了关于基督教社会纲领的若干想法，这些想法带有反资本主义的情绪。里面没有民族主义和立宪要求，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政治要求，而只是反映了对弱势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怀。<sup>①</sup> 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韦伯提请瑙曼注意民族政治思想的重要性。韦伯的就职演说旋即被发表，它使瑙曼的思想和他的部分追随者产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政治评论家文克（Wenck）写道：

这些思想给年轻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尤其是瑙曼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视野。在此之前，他们的出发点一直是基督教信念。他们同情弱势群体，由此而想他们之所想……民族观念只是因为其道德价值并作为对祖国的热爱的表现——这种热爱集中体现在对君主以及后来对君主制度的态度上——才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现在，民族观念已经作为一种关乎政治权力的因素进入了他们的思想领域，并很快完全充满了他们的脑海。

瑙曼本人在《扶助》杂志七月号上撰文谈及了韦伯的思想：

233

难道他说得不对吗？如果哥萨克人入侵，再好的社会政策又有什么用？凡是推行国内政策的人，都必须首先保证人民、国家和边境的安全，必须为民族权力而操心。在这方面持社会民主思想的人存在着最大的弱点。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执政、能够推行比以前更好的全方位政策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样的民族社会主义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

<sup>①</sup> 参见 Martin Wenck, *Di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en*. Hilfe-Verlag, 1905. S. 32f.

文克就此评论道：“从这一时刻起，基督教社会主义开始了向民族社会主义的演进。”瑙曼现在开始筹建一份日报和一个政治组织，旨在为建立一个民族社会党做准备。

韦伯从一开始就对这项计划加以劝阻。虽然他和瑙曼及其身边最亲密的同道如格尔、拉德、鲍姆加藤等私交甚笃，虽然他非常喜爱他们朝气蓬勃的激情，但他一开始就觉得这项政治计划注定会失败。这些人多数天生缺乏政治直觉，他们的追随者中大多将会继续坚持以道德和宗教理念为指导。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圈子的人缺乏统一的经济关注焦点。瑙曼希望能成功地让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来，而韦伯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更为可取的做法是放弃组建自己的政党，以便能更为自由地向资产阶级灌输社会意识，同时也更为自由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使他们能理解民族政治。他虽然劝阻，但并不想退出朋友们的共同努力，所以参加了报纸的筹备委员会。

1896年秋，瑙曼来到弗赖堡商谈各项事宜。韦伯夫人有这样的描述：“瑙曼借助于事先做好的笔记提问，马克斯的回答则‘自他富饶的智慧中流出’。我自己是个听众，把家务事放在一边，坐在隔壁房间像被钉在那里似的，倾听他们讲话。瑙曼十分客观求实的精神、极为清醒的头脑和虚心受教的态度再度让我感到钦佩。”这之后不久，报纸发行了，协会也成立了。协会是1896年11月在埃尔富特成立的。虽然韦伯当时正被招到柏林出席证券委员会的咨询会，但仍然拨冗参加了协会的成立活动。这次代表大会给韦伯留下的印象更加深了他的疑虑。在他看来，宗教人士、教授、官员与手工业者和少数工人的混合体几乎不可能达成政治共识。瑙曼的表现也是一个令人生气的开端：

234

瑙曼星期一在埃尔富特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他弃而不用（事先准备好的）纲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草案，其中删去了妇女问题和反对大地主的立场。结果遭到了我对瑙曼及全“党”的严厉抨击，指出他们这样做会变成“政治傀儡”，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以目前的方式对待波兰问题，那么我既不会订阅也不会支持《时代报》(Die Zeit)，而且会竭尽全力反对它。牧师们——他们占与会人数的四分之三——的发言，以及那些政治上像小孩一般幼稚的人企图阻挡德国发展的滑稽表演，真是可怜之至。哦，对了，我从报上读到，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建“党”的决定，而是成立了一个“协会”。至于这个协会能有什么作为，我们拭目以待。我相信它不会有什么作为。

正如韦伯所担心的那样，这些人的理想，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的理想差异甚巨，要加以整合谈何容易。他们争吵了数日，还是未能就纲领应先谈及民族观念还是社会观念

达成一致意见。要弄清楚基督教和政治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就更加困难了。韦伯本人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瑙曼的纲领<sup>①</sup>：

235

韦伯认为瑙曼希望知识阶层参与。然而，尽管瑙曼表达了各种民族主义的观点，但他在这里想要建立的却是一个劳苦大众的政党，是那些遭遇困境的人的政党，是所有那些没有任何财产但却想要获得财产的人的政党。通过划分劳动和财产之间的界线，这个纲领使所有已经拥有财产的上升阶层（包括工人阶级中正在上升的阶层）自然而然地成了民族社会运动的反对者。从经济角度讲，只有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才属于民族社会党人。这样一个弱者的政党绝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这种悲天悯人的观念将民族社会党人变成了政治玩偶，这些人一见到经济上的悲惨状况就受不了，就会盲目地做出忽左忽右的反应，一会儿反对大庄园主，一会儿又反对股市交易和大工业。他们之所以会在政治上态度暧昧，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在最初的纲领草案中所持的反对大地主的立场。然而他们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要么支持资产阶级，要么支持农村的封建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资产阶级，其结果是为这个阶级的反击铺平了道路。这里存在着重蹈覆辙的危险。

因此，他们决定要成为一个倡导公民自由的新型民族政党，采取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立场。因为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民主，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自己投票选出的德国领导交给这种民主，因为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民族权力和经济权力方面的利益在他们的领导下可以得到保障。当然，民族权力方面的利益必须以最有力的措施始终不渝地加以保护——例如，也得反映在处理波兰问题上。因为民族的观点与悲天悯人的观点也有矛盾。谁要推行现世政策，谁就必须抛弃幻想，认清人与人之间永远会有斗争这一基本事实。

文克在报道中补充说：“这个毫无疑问很精彩的讲演只获得了寥寥无几的掌声，说明那时占压倒性多数的人是多么坚持悲天悯人的观点。”

即便是瑙曼也认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目前仍然是社会改革的手段。不过，与此相反，韦伯则认为社会和政治的正义是为了维护民族国家。尽管存在着这种根本性的分歧，韦伯仍然加入了民族社会协会，一直尽力支持瑙曼，而瑙曼的其他同事〔如保罗·格尔和毛雷恩布雷希尔（Maurenbrecher）〕则很快转向了左派，背弃了他。瑙曼第一次竞选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时就是由海伦妮·韦伯和伊达·鲍姆加藤资助的，当时二人均已寡居。

<sup>①</sup> 参见 Martin Wenck, *Di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en*. Hilfe-Verlag, 1905, S. 63.



韦伯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日报发行一年后就因资金短缺而停刊。第一次竞争议会席位的选战虽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在所有的选区都未达到竞选目标。新的组织不想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与社会民主党也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这个组织因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而吸引了一些中产阶级中的重要和睿智人士，但在大众中却无人问津，所以未能成为一部政治“机器”。经过五年的不断努力之后，第二次竞选还是只有一个候选人成功当选，瑙曼再次落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独自存在的运动寿终正寝了：“巨浪将我们吞没了。”正如韦伯五年前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瑙曼促成了这个团体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自由思想同盟”的合并，组成了自由派的“选举协会”，从而加入了资产阶级的阵营。

## ※ ※ ※

在上面追溯的这些年代中，韦伯的生活轨迹无疑是在朝着实际政治活动的方向移动。他的民族激情过于强烈，所以仅仅诉诸笔端不可能让他获得持续的满足。他好斗的本性和雄辩的才具也促使他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文字评论。即使他现在已不再怀疑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天赋，但他仍然不能确定这项工作是不是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勃伦塔诺说过：“如果说我在学术生涯中取得了自己并不曾追求也不要求有占有权的‘成功’的话，那么我想说，我对此不怎么在乎，尤其是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即我现在的这个职业对我是不是合适。”

不过，他往后推迟了自己参加实际政治的所有尝试。他那时本来是可以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1897年年初，他应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州（那是施图姆男爵的地盘）的一个自由政治团体之邀发表了讲演。之后不久，有人推举他成为那个选区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韦伯拒绝了邀请，因为他正再次期待着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聘请他继任宿老克尼斯的教席。韦伯当时认为政治活动与新的教职难以兼容。 237

在现存的政党中，他要找到一个能够适合自己的党团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一时还不能把国家社会党作为参政的活动舞台认真加以考虑。他与左翼自由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民主理想，但觉得他们缺乏从事民族政治的伟大情怀，就这一点而论，他认为他们只是些“庸人”。他与民族自由党人持有共同的个人主义观念，也和他们一样承认工业资本主义是民族经济不可或缺的组织力量。然而，民族自由党人缺乏社会与民主思想，缺乏对社会政治的洞察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把他与保守派和泛日耳曼同盟联系在一起的是民族激情，但是这一派人却以牺牲德意志精神和其他德国同胞的利益为代价，支持大庄园主的经济政策。1899年4月，他写信宣布退出泛日耳曼同盟：

我谨以此函向您——我不知道这样一份声明应当寄给谁——宣布我退出“泛日

耳曼同盟”的决定。退出的原因在于，我不赞成同盟在波兰农业工人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对于一些不管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的事情（常常是一些琐事），同盟通常总是以同样的热情来讨论和争辩。可是在一个关系到德国人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同盟却仅仅在罕见的场合空洞地表达了一下愿望而已。它积极主张驱逐丹麦人和捷克人，但从未以同样的态度主张将波兰人完全——当然只能逐步实施——逐出德国；而驱逐丹麦人和捷克人从民族政治的观点来看完全无足轻重，政府只是利用它来欺骗公众舆论而已。同盟默许了柯尼斯堡（Königsberger）农业委员会提出的让波兰人移民德国的无耻要求，默许了大庄园主在州议会上提出的帮助促成输入波兰人的要求，以及政府对此的承诺——如果俄国人同意的话（！）。同盟把农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同盟中很多保守派成员代表了这种利益——凌驾于关系到德国人生死存亡的利益之上。

238

我退出同盟是为了获得自由，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公开陈述这些问题。在同盟内部，我在柏林、弗赖堡等地的讲演中都为我的这个观点做了辩护，以至于这都快成了我的“癖好”了，但对同盟所持的态度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努力，尤其是因为——正如您所知——我的声音在这类问题上根本就无足轻重。我被认为是“容克地主的敌人”。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对同盟的努力抱有深切的同情，也不会削弱我个人对同盟领导层作为个人的由衷敬意。

1899年4月22日

## 第8章 精神崩溃

# 1

就在韦伯在弗赖堡各个方面都能够应付裕如，开始在那里扎下根来的时候，他应聘去了海德堡。这之前不久，韦伯曾谢绝了默通基金会（Mertonsche Stiftung）让他领导和组建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尽管能够自由支配数百万资金来促进学术发展对他颇有吸引力。离开弗赖堡和那里的朋友们令他依依不舍，与那些朋友在一起他感到像在明媚的夏日里那样心情畅快。尽管如此，选择的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海德堡，因为故乡温馨的气息充溢着这座内卡河畔的城市，对童年和大学最初几年快乐生活的愉快记忆吸引着他。此外，在海德堡他会感到在政治上不像在弗赖堡那样“与世隔绝”，海德堡大学自古以来就享有思想特别活跃的盛誉。

韦伯是怀着感激之情告别弗赖堡的。不管从哪方面说，他生活的这一篇章都很美妙。在这里他摆脱了过去的阴影，感到自己的精力日渐旺盛，并以这样的精力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他变得愉快而安闲随意。他与朋友们——特别是与李凯尔特一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与两年前离开柏林时相比，韦伯夫妇在感情和心灵上都更加能够相互适应。海德堡是韦伯母亲的故乡，为他们所喜爱，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对他们颇具吸引力。韦伯答应妻子要更多地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由于他现在没有什么任务缠身，所以立即践约：深居简出，按时就寝。

韦伯现在成了他以前的老师们的同事，因为学术天空中那些明星如库诺·菲舍尔、

240

伊马努埃尔·贝克尔、埃德曼斯多夫等虽已年迈，在海德堡却仍然很活跃。学者圈子里的社交生活仍然受年事已高但思想健旺的这一辈枢密顾问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享用美食佳肴便是这种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在弗赖堡，老一辈学者鉴于年轻学者经济条件不甚宽裕，因而请客吃饭从简；与此相反，在海德堡最有影响的学者圈子里，“宴客”仍然像宗教仪式般神圣。人们告诉韦伯，接受法学院资深教授伊·贝克尔的邀请乃是一种“义务”，必要时甚至得取消授课。韦伯对这一礼节表示反对，参加了几次这样的宴客——即便是在初夏，外面撒满极其美丽怡人的阳光，聚会的房间也要关上窗户点上蜡烛——之后，韦伯夫妇决定，至少他们自己要停止履行这项“义务”，只参加在同龄人中间以弗赖堡的宴客方式举行的那种不事奢华的聚会。

他们的新生活很快就变得丰富愉快。这里诱人的景色不是黑森林高耸的山峰，而是奥登瓦尔德地区缓缓延伸的丘陵以及南方生长茂密的植被，让人感到舒心而放松。银色的河流在这里汇入宽广而欢快的莱茵河河谷，惹人注目地将这闲适的一隅与更为广袤的整体连接起来。韦伯夫妇的圈子里增添了一些出类拔萃的新朋友，如历史学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保罗·亨泽尔（Paul Hensel）、卡尔·诺伊曼（Karl Neumann），尤其是和韦伯同龄的神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他成了韦伯夫妇的挚友。特勒尔奇思想自由广博，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加上他思维形象生动，富有幽默感和率直的热情，这一切使他成了韦伯的同道，与他的学术和思想交流让人感到心情愉快又受益匪浅。当然，韦伯和特勒尔奇在一些问题上——尤其是在政治上——意见并不一致。特勒尔奇那时的观点还属于老一辈的“民族自由派”，对于他强烈的资产阶级本能来说，社会和民主理想显得陌生。他并不相信韦伯正在追求的一些东西：既不相信工人阶级在精神和政治上的进步，也不相信女性的思想发展。他们的性情也各异。特勒尔奇只满足于在神学领域为思想自由和宽容而斗争。在其他方面，他并不是一个斗士，而是倾向于和解、平衡和接受人性的弱点。

241

※ ※ ※

在海德堡，职业工作中也有各种各样紧迫的事宜亟待处理。韦伯的前任克尼斯年老退了休。教学上出现师资不足的状况，那段时间里韦伯成了他那个学科里唯一的正教授。韦伯立即对这种状况提出了批评，指出这与一个名校不相称，因此他敦促学校增设一个教席。由于名宿克尼斯对上研究班课程不屑一顾，而韦伯对这类课程则极为重视，因此韦伯得开设新的研究班课程并置备相关的藏书。

不过，这件事情很适于韦伯干，因为他对自己这门学科已经驾轻就熟，自己也乐于将那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政治经济学、农业政策和劳工问题的大型讲座组织得条理清晰而又严谨。他总是精心备课，但上起课来并不照本宣科，而是即兴发挥。严谨的

概念架构蕴藏于丰富的历史知识之中。他的思想的敏锐深刻十分罕见，而他同样罕见的表述才能更为他的思想锦上添花。所以，他能够通过大量的实例和直接的授课方式将最为抽象的思想讲得明白易懂。每一堂课都仿佛是从他精神作坊里刚生产出来的新产品。他发给上政治经济学理论大课的学生一本印刷的大纲，并有意将此扩充为教科书。

正如韦伯所期望的，他的妻子自己现在也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她去听韦伯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此外还听哲学讲座，专心致志地完成保罗·亨泽尔的研究班课程的作业。另外，她还接任了一个新建协会的领导，这个协会的宗旨是要传播现代女性的理想。韦伯很高兴看到妻子具有行动的渴望，很快他自己变得比妻子更加女权主义。他热心关注公众舆论的动向，尽力相助，并拔剑出鞘，随时准备反击守旧派的攻击。他同海德堡大学的一位权威人士就女权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这是新协会组织的一次令人兴奋的活动。其中一次辩论（最初几次辩论中的一次）之后，玛丽安妮这样写道：

马克斯大约一刻钟的讲演控制了整个辩论的气氛。他很讲究策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做得好像只是要进一步解释我们未能真正理解的“同事先生”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阐述了自己的立场，简要地阐述了整个女权问题，表达了妇女的心声，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些感受，**妇女们**当时还不能够清楚地加以表达。他还对那些因循守旧的妇女提出了有力的劝诫，说她们对新女性表现出的不宽容使她们对整个妇女运动的反对比男人还要激烈得多。他把这些妇女比作一群母鸡，她们毫不留情地用嘴啄一只误入她们院子里的陌生母鸡。简而言之，他的讲演非常精彩，我想妇女们都恨不得排队向他致谢。 242

那时第一批女学生——尽管还只是凤毛麟角——进入了大学课堂。她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女人的命运，还有不分性别的人的命运。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兴奋地意识到，自己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先驱，每个人都感到有义务去克服阻力。这种新女性受到尖刻的嘲笑和严厉的道德谴责，境况窘迫。她们直到后来才慢慢赢得宽容和承认。

在那些因其迷人的个性而获得韦伯认可的年轻姑娘中，有一个是韦伯的学生，叫埃尔泽·冯·利希特霍芬（Else von Richthofen），她是韦伯的第一个女学生，与玛丽安妮一起师从于韦伯。她年轻姣美，却想要成为一个工厂监察员。这是妇女们计划想要获得的职业之一，因为她们确信，她们作为女工的维护者可以完成必要的社会使命。两位志同道合的女性很快成了挚友。韦伯也热切地关心这个女学生的成长。他说服了富于远见的巴登州工厂督察将来让自己的女学生在他麾下供职。她后来果然如愿以偿，这个年轻女博士富有魅力的性格以及她以优异成绩完成的博士学业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作为第一位女公职人员，她以勇气和谨慎履行了艰难的职责，增强了妇女运动的信念。



243 这样，新的生活很快就繁花盛开。韦伯感到比以前更安全感，更富有活力。然而，1897年初夏，暴风雨骤然而至，在所有受到影响的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自从韦伯夫妇离开柏林后，海伦妮每年必定要在孩子们那里清清静静地待上几周，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然而，享受这种愉快的假期从来就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她丈夫仍然无法接受妻子和别人分享自己不感兴趣的爱好，无法接受妻子与别人发展一种他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的亲密关系。他无法战胜自己的下述想法：现在已经上了年纪的海伦妮依然“属于”他，他自己的兴趣和愿望应当优先于妻子和其他任何人的兴趣和愿望，他有权决定海伦妮什么时间休假和休假时间的长短。在海德堡的孩子们对这样的做法不买账。那一年协调各方的意愿尤其困难。海伦妮自己没有毅力做到从心所欲，无力应付家庭的不和谐。在事关自己的愿望时，她从来不知道自己应该对丈夫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几方的约定未能遵守，接下来的是气氛紧张的通信协商，最后是老马克斯陪同妻子一起去了海德堡，这样一来，海伦妮在孩子们那里不受干扰的休假看来就会缩短，或干脆给搅黄了。

于是，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灾难终于爆发了，儿子再也按捺不住压在心头的怒火。火山喷发，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儿子对父亲进行了审判，当着两位女性的面跟父亲算账。没有人劝阻他。他问心无愧，爆发出来他心里会感觉好受一些，而这一通爆发终结了以前那种客客气气地处理家庭纠纷的做法。事情关系到母亲的自由，她是弱者，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强暴她的心灵。“我们要求，妈妈应当有权每年在自己认为方便的时候来我们这里，清清静静地独自待上四到五周。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我们同父亲的家庭关系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形式上保持这种关系就没有任何价值。”

244 老韦伯的气质不同，属于另一代人。他不能也不愿意认识到并承认（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妥。这样一种激烈的方式也不适于说服他这样做。他坚持己见，因此儿子也不让步。父亲不明理，韦伯就不会软下来。他们终于不欢而散。对海伦妮来说，随之而来的是在被责难和自责中痛苦度日。幻觉的面纱被揭掉了，长期被掩盖着的真实露出了严酷的面容：婚姻破裂，基础坍塌。丈夫的遭遇让海伦妮难以承受，她觉得自己对此也负有责任。不过，即便是她也感到这场酝酿已久的危机无法避免。

但她仍然抱着希望，希望丈夫日后能够理解，希望有可能重建他们夫妻之间的共同生活，这种生活始于年轻时灿烂星空下幸福愉快的倾心相爱，而后哺育了天资聪颖、茁壮成长的孩子们，现在却置身在婚姻破裂、真相大白这块赤裸裸的岩石上。唉，生命的春夏两季早已过去，可是他们难道就没有可能在生命之秋更加明智，本着自由和互助互爱的精神携起手来，重新结合在一起吗？下面一段文字表达了海伦妮强烈的愿望和怜悯

大度的爱情，感人至深：

上帝将会而且一定得给他和我以力量，让我们承受并改善这种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我销毁了你们那些好心但只为我一人着想的来信。这也是为什么我恳求你们，以你们对我全部的爱，让我走自己的路，**请**你们帮助我努力祛除自己心头的怨恨。你们瞧，我在圣坛前并没有**白白**发誓：不管在欢乐还是痛苦的时刻，都要坚守忠贞和爱情。那并不是做表面文章，在他给我带来痛苦时，这仍然有效——毕竟我也给他造成了痛苦。我不能像伊达那样拆毁桥梁，我必须搭建桥梁，即便在这一生中一切都会不断被拆毁。我要在信念的鼓舞下，怀着永不放弃的希望去建造。不这样做我就没法活下去——尽管我知道自己常常很脆弱，常常做错事。瞧，我已经无法阻止让你们这些大孩子经受疏离和怨恨，马克斯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疏离和怨恨，并将此归咎于我。他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了。可是还有年纪小一些的孩子，我要努力让他们少受家庭不和的影响。那么要放弃吗？不，我不能也不会放弃。假如我这样做，那对他真正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一旦他重新相信我，他就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学会包容我心灵中激励着我而且不能被扼杀的东西。不过，我必须做出建设性的努力，即便这仅仅是为了让他相信，基督教意味着坚持宽容一切和寄希望于一切的爱心，让他相信，他必须认识到我有这样的爱心。因此，就让我去建造吧，请用你们宽容的爱帮助我吧！

245

但是，命运却有自己的安排。这位正走向衰老的男人未能突破自己秉性的设防。几周后海伦妮回到家里时，老韦伯不理睬她。他这样做的结果与他自己心里或许暗自期望得到的结果恰恰相反：平时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海伦妮总是自责，这次她面对难以忍受的局面却没有服软，反而更加坚定了终于得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奋斗的意识。丈夫和一个朋友外出旅行，她仍然怀抱着希望，希望过一段时间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的丈夫。

然而没过多久，送回家的却只是丈夫的遗体。胃出血猝然结束了他的生命。据悉，他强健的身体中早已隐藏着病源，这对他倒是一种解脱。他是个天性喜好快乐和享受的男人，自己总是感到很“幸运”，也能够将日渐增长的矛盾置诸脑后，最后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必然会从心理上将他摧毁的现实，除非他谦恭地反省并从中吸取教训。而今要这样做已经为时过晚。在自己的尘世生命中，他没有得到“死而复生”的机会。

八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灵柩停放在花园的草坪上。海伦妮和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灵柩旁。对于这个残酷的悲剧性结局，年幼的孩子只有朦胧的感受，而年长的孩子则知道得一清二楚。大儿子韦伯并没有经历自责的震撼。即使现在站在这副棺木旁回想起

来，七周前所发生的争执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直到多年后，韦伯才冷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内疚——让他感到歉疚的是冲突的方式，而不是争执的内容。他的态度也让海伦妮感到放心。后来韦伯在给最小的弟弟的信中写道：

那时当事各方无疑都有很多做得不妥的地方，当然，尤其是我。不过，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论，妈妈只能按照**她的**本性和良知行事。如果说她有错，那她就错在没有按自己的本性和良知果断地采取行动——假如她这样做了，父亲（他毕竟很依恋她）就会习惯于她不同的秉性和她自己特别的（宗教和社会方面的）兴趣，而他自己并没有这些兴趣。然而，她所需要的是他内心的赞同。她**未能**如愿以偿，由于她生性不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所以内心十分痛苦，最终与他彻底疏远了，其疏离的深度是他始料未及的，直到最后他才认识到这一点。他自己不了解她，也不了解自己的长处。如果他下定决心，照“善己善人”的格言给她完全的行动自由，他本来可以过得幸福无比。

在母亲七十岁生日时，韦伯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以超然、冷静的态度阐释了她这段婚姻的命运和父亲的个性，我们在后面会谈到这封信。

## 2

父亲下葬后不久，大约在夏末，韦伯夫妇去西班牙作了一次旅行。韦伯在精神和心理上都需要放松，而这只能在新印象的魅力中才能做到。与往常一样，这些旅行印象被详细地记录在他给母亲的书信中。一开始让韦伯夫妇着迷的是比利牛斯山脉（Pyrenäen）的崇高和那里清冽而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面对这超凡脱俗的自然景观，呼吸着这令人陶醉、轻漫缥缈的空气，一切人世间的纷扰都不再令人生畏了。接着他们又迷上了西班牙北部那奇特的新世界，可在那里他们每天都得应对令人不快的意外。韦伯容易被激怒，缺乏效率的交通工具常常让他大为光火。不过，和先前一样，韦伯这次也渴望获得一些新的印象，而且相当能变通，要去发现那个陌生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不过，他自己将这种不断追寻新印象的躁动解释为神经衰弱的征兆：

你说得对，在通常情况下，让众多印象在我们眼前掠过对我们并无裨益。但是，假如我不能工作，我不可能待在一个地方。我们自然没有兴致像平时那样自在



地欣赏大自然。但我们可以直接接受那些令人震撼的丰富的印象，以便先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完全恢复，然后才有能力将所经历过的一切客观地加以处理。我相信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到了。

回程旅途中，韦伯未得到放松的肌体便反应不适，开始发烧，他感到心神不安。回家之事不能耽搁。回家的路上，他仍然感到不适。可是他的身体必须得恢复才行，因为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组织的讲座让他去上课：“我们虽然回了家，但仍然每天都在路上奔波。下午3点去卡尔斯鲁厄，晚上赶回来。今天甚至要到凌晨3点才回得了家，因为马克斯讲演后接着还要进行讨论。等到这些日子过去之后，待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休假旅行中恢复过来时，我会为他感到高兴。”

不过，新学期开始时，一切都显得很正常：“马克斯的情况现在又有所好转，生活比较注意，不时散散步，晚上时常早早就上床，觉睡得很多。”韦伯恪尽职守，授课精益求精，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旦碰到热衷于学术的学生，他便如此倾心，以致将自己的著述往后推延。他还抽时间到外地，诸如曼海姆（Mannheim）、法兰克福、特拉斯堡，做了一系列的讲演。

然而，在期末他正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时，一只魔掌从他生命的下意识区域向他伸来。一天晚上，一个学生的考试结束后——这种考试总是让他筋疲力尽，他突然感到全身软弱无力，还伴随着剧烈的头痛和强烈的紧张感。学期结束了，但他的身体状况却未见改善。韦伯感到心神不安，于是去看了医生。医生对于这位健壮男子的身体不适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将这归咎于长期劳累过度和情绪激动，建议他去旅行。韦伯夫妇去日内瓦湖畔度过了几周时间。那年日内瓦的春天来得晚。天很冷，褐色的山坡仍然是一片死寂，让人无法贴近大地。韦伯常常徒步漫游，以图通过让身体疲乏来使神经放松。从他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新学期开始时，他与其说感到疲惫，不如说觉得恢复了精力： 248

那段休假逗留的确大有裨益。我又开始奋力工作之后，注意到了它的效果。我想几周之后，余下的病症也会消失殆尽。这显然是康复的征兆，因为除了某些部位的脑神经紧张和轻微的充血之外，我近来感觉精神和身体都特别好，尤其是现在……当然，我们大家都仍然是神经质的怪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在那些可能让人感到压抑的一切都逐渐被理解消化之后，现在我的心情不错，对此并不担忧。

1898年4月14日于格里昂（Glion）

然而，经过几周脑力劳动之后，他开始失眠（睡眠通常是他忙碌一天之后恢复精力的源泉），功能性障碍开始出现，韦伯感觉自己生病了。圣灵降临节那个周末，为躲避自己通常乐于接待的朋友来访，他独自一人去奥登瓦尔德作徒步漫游。那天，五月的明媚春光罩上了一层黑色的轻纱。他感到精疲力竭，健壮的身体虚弱了，泪如泉涌。韦伯觉得自己现在处在了一个转折点。长时期的身体透支现在遭到报复。医生对他的病情并未加以重视，只是嘱咐他采用凉水疗法。结果让他更加兴奋，以致彻底失眠。

医生建议他暑假期间去疗养院住一段时间。韦伯带着童稚无猜的心态遵从一切医嘱，在博登湖（Bodensee）畔一个拥挤嘈杂的疗养院待了几个月。在那里他接受了当时的常规治疗，以及各种各样并不常见的身体训练。他积极配合一切治疗，以一种客观的好奇心观察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他唯一渴望得到的治疗结果——平时夜里能够休息好，身体能够得到放松——未能如愿以偿，于是他暗地里一心想要停职休长假。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确实不能去要求给自己开休假的假条”。

249 秋天，他的状况似乎大有好转。他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看起来身体健壮有力，精神上同以前也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人会认为他有病。可是几周以后，他的神经又崩溃了，教学——他的每一堂课都是自由的创造活动——变成了一种折磨。他现在做好了长期患病的准备：“从理论上讲，我已经完全接受了得长期同这种疾病打交道的想法——这种疾病本身也肯定经过了多年的酝酿。”不过，他仍然有不少储备的力量，也许他已经在想着自己已经快要饮尽杯中的苦水了。难道这种疾病就不能像一片积聚已久的云彩那样，当云层最终消散的时候，不就意味着自己从神秘危险的敌对势力中获得解放吗？难道这病就不能是为将来生命力量更为和谐所做的铺垫吗？带着这样的心情，他在给妻子（他不得不与她分别几个星期）的信中写道：

这样一种病也有它非常好的地方，例如，对我来说，它以我从未知晓的深度向我重新展示了我妈妈总觉得我身上缺乏的那种生活中纯粹人性的一面。也许我可以引用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n）的一句话：“一只冰凉的手放开了我。”因为在过去的年月里，我身体中的疾病表现在，我拼命地攫住学术工作，像是攫住一道符咒，而我却说不出这道符咒是要防什么病消什么灾。现在回想起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也知道，不管患病也罢，健康也罢，我都不能再像这样走下去了。需要屈从于工作压力的那种感觉已经不复存在。首先，我要同我的“宝贝儿”充分享受充满人情味的生活，要尽我之所能让她过得幸福。我并不相信，这样做我在精神上感觉枯燥的那些工作就会比以前完成得少。当然，这要取决于我的身体状况，而要让身体真正持久地恢复好转无论如何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休息。不过，你说得完全正确，亲爱的，以前我根本不会同别人如此亲密无间（比如这段

时间跟你在一起的生活)地共同生活。

的确,这段时间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特别的收获。妻子本人受神经衰弱之苦,从小就习惯了体谅患有神经性疾病的人,因此她完全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谅丈夫的处境,尽量让自己所做的一切有益于丈夫的健康。如果说以前韦伯的高度自信和不求助于的人生态度有时令玛丽安妮不禁自问,韦伯是不是需要她,那么现在她对此已不再怀疑。对妻子来说,从现在裂开的那一道黑暗的缝隙中,涌出的是巨大的幸福:一向自强的丈夫现在却时刻需要她的照料,需要她在身边,她现在可以服侍他了。他们的共同生活充满了挚爱和亲密,即便是患病的韦伯也感受到一种新的幸福。 250

你近日写道,最近这段时间在某些方面是美好的,尤其是因为我们如此亲密地在一起生活,这一点确凿无疑。这对我来说(尽管我所经历的一切令我备受折磨)尤其美好,并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认识到,对自己所爱的人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就像我对你抱有的感激之情一样——竟是如此美好。

※ ※ ※

然而,那时韦伯才刚刚开始他的地狱之行。针对他健壮的体魄进行的代谢疗法效果甚佳。韦伯开始授课时情绪不错。几个星期后,病情再次发作,到了圣诞节,他已经疲惫不堪,装饰圣诞树时连手背和腰都不听使唤了。韦伯将他的课推迟到节日之后再继续,然后强撑着熬到学期结束。

马克斯把这星期的课也取消了,然后希望能够坚持熬过本学期剩下的三个星期。目前我们更为担心的是下一步,而不是更远的将来,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疾病的反复在假期能够完全被战胜。眼下主要的问题是大脑疲乏,这让马克斯觉得只要一做费脑子的事情,就不仅会给他造成一时的伤害,而且会有害于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尤其是,一讲话他马上就会觉得不舒服。

这是一段充满忧虑的时间,但我们不会屈服。马克斯虽然有时会发火,会急躁,但总的来说是带着坚忍克己的斯多葛式客观态度忍受病痛,或者说将其视为命运的安排。我们也有幽默感,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总是很快乐。只是别人不要问我们太多的问题,不要良言相劝。我倒是蛮好的——他需要我,这始终是一个新的幸福之源。

251 像韦伯这样一个病人，任何一种思维活动对他都有如砒霜，他又是怎样挨过这些百无聊赖的日子的呢？他不习惯于做任何实用的事情，也没有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做的一切就都与思考有关。如今这台受大脑指挥、没日没夜地运转着的宝贵的机器完全瘫痪了，这让他如何能够忍受呢？

糟糕的是，他完全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手工活”或其他什么虽然机械但仍然有趣的事情给他做。我曾想到过劝他学点雕刻，可眼下他对我只是一笑置之。他连续数小时（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麻木不仁”地坐在那里，只是漫无目的地修剪着自己的指甲，看着总让我非常难过。但他却声称这对他很有好处。这个只精于一技的男人，一旦脑子失灵就无所适从。即使能让他厨房帮帮忙也好啊！

他们的确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海伦妮给他寄来了蜡和马克斯儿时捏制的小人。玛丽安妮给他弄来了一些黏土，很高兴看着他脾性蛮好地摆弄着玩：“好几次他都很投入地在那里捏着，我对他的才能不胜惊讶。我相信他很有艺术天分。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他的才能荒废，才着实让人扼腕叹息。即便是捏黏土，他现在捏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他做起来感到很吃力。”

海伦妮生日的时候，收到了韦伯的第一件雕塑作品——“卢塞恩垂死的狮子”的仿制品。这会不会是一种无意识的象征呢？韦伯还附上了下面一段话：“鉴于我们家的分工颠倒过来了，这一次，谨以我在相当疲惫时做成的手工作品，向你致以我们衷心的祝福。也许你可以拿它作镇纸用吧。”但后来手工活也被弃置一旁，原因是他做起来感到疲乏。妻子做了最后的努力，给他弄来了一盒石块做的积木。朋友告诉他说，这种玩具很令人兴奋。为了让妻子高兴，患病的韦伯很顺从地搭建这些石块。可是很快他的手开始颤抖，堆积石块时感到腰酸背疼。结果还是于事无补，他们必须放弃以这样的方式来让他消遣。于是，他便只是坐在家里靠“花园”的窗前，望着窗外含苞待放的栗树的树梢。“你在想什么呢？”——“假如有可能的话，我倒是愿意什么都不想。”

252 “神灵仍然在云雾中。”马克斯的情况还算过得去。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很容易被激惹，任何体力和脑力的劳顿都会诱发强烈的反应。即便是读报都会刺激他，因此只能把一些快讯读给他听。他非常容易受到刺激。以前他在极度紧张地工作一天后睡得很沉，完全不受嘈杂声响的干扰，可现在下午和晚上哪怕是一点轻微的响声都会折磨他：“小猫咪现在也惹他烦恼，因为它有时中午和一大清早会喵喵地叫，这让韦伯气急败坏。贝尔塔（Berta）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夫，不再需要四足小动物了，我们便把小猫咪送了人。”由于病情在假期里未见好转，所以韦伯最终决定要求在1899年夏季学期里不再

开讲座而只继续一门研讨课。像上学期最后几周的那种日子，他根本无法再撑下来了。

有望减轻工作量对韦伯在心理上有时有暂时的缓解作用，去医生那里看病也获得了相同的效果。韦伯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当然，他也有让母亲高兴的用意）：

如果当局批准我病休，下学期我就会相当清静。考虑到我现在就已经好多了——就像去年秋天一样——我相信我的病情届时将会大有好转。我又做了一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全面检查，结果与以前一样，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现在终于能够很准确地知道，什么对我的身体有益，什么对它有害。基于上述原因，我将能够合理安排我的工作时间。我只是希望现在你们可以相信，如果我在某个过于疲劳的阶段拒绝了一切所谓的“建议”，如果我现在休了假，其原因并不在于我精神上的麻木。我不能讲话纯粹是因为生理障碍——神经系统失灵，我看着讲义不明白里面讲的是什么。现在，就像每次病情大为好转时一样，我心情再好不过了——近来我一直是这种心情。

从这封信里的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海伦妮难以设身处地地理解韦伯这种令人不解的病症。她自己的坚强意志不断以无情的方式将自己推向极致，靠这样的意志她战胜了一切心灵和肉体的挑战。儿子难道就不能这样做吗？当然，生活并没有要求她从事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可是，如果一个人四肢健全，难道他真的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吗？或者至少无视个别病状而去求得更大程度上的平衡吗？韦伯现在尽管瘦削一些，脸色显得苍白，但整个人从根本上来讲没什么变化，体力上也仍然具有生命的原始活力。有时候，你可以把一切都视为一个邪恶的幽灵，只要你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就能够让它来得快也去得快。海伦妮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行动者，平生最恨任何情况下的等待和观望，可是对这样一种疾病她却只能等待，这让她十分痛苦。她去看儿子时，感到她对儿子的高要求——虽然她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对他与其说有益，不如说是有害的。对于韦伯敏感的自尊心而言，目前这种状况下最不堪忍受的就是，人们带着鼓励的口吻向他暗示，说他看起来不像一个重病患者，或者是朋友称赞说他看起来气色不错。

253

海伦妮和韦伯的兄弟姐妹不时从外地给韦伯提出一些他难以接受的建议和计划。对此，玛丽安妮写道：

我对你们充满爱心的计划表现得太不冷静，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更深一层的原因可能在于，有时候我好像觉得，你们认为马克斯的状况必须靠毅力、靠超越自己才能改善。有人认为他看起来有点意志薄弱，这事我也得替他辩护。你们瞧，尽

管他在同事和学生面前一定感到很难为情，但他还是在五周前就完全放弃了研讨课，就是现在还每周取消两堂讲座课。这些都表明，他现在感觉每一种脑力劳动对他都伤害很大。每次在他脑力劳动之后你只要瞧瞧他，就可以断定，他的这种感受是有客观根据的。由于他感到目前完全不能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这几周对他来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几乎难以承受。你们绝对不能把马克思想象成一个平常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和毫无兴趣的人，他只是在学期中间有意对自己加以限制，因为他的神经太容易兴奋。你们也绝对不要把我们家里的气氛想象得灰暗和沮丧。不，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们还是一直很快活。

然而，又经受了几个月的痛苦折磨之后，“眼下我们只是谦卑的小民，只能考虑怎样用微薄之力恪尽职守，怎样不失体面地挨过眼下命运蹇舛的日子”。从韦伯若干年后写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忍受痛苦的：“‘逆境教人祈祷’——历来如此吗？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要对此提出异议，尽管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即实际情况常常是如此——只可惜太经常了，有损于人的尊严。” [摘自 1908 年 4 月 5 日韦伯致福斯勒 (K. Vogler) 的信，信中讨论了后者关于但丁的著述。]



1899 年夏季学期，这也是韦伯患病的第二年，他获准不上讲座课，但仍然上一门研讨课并指导学生的论文。他和玛丽安妮的假期是在艾伯湖 (Eibsee) 畔度过的，从那里又取道费恩隘口 (Fernpaß) 去了威尼斯。从梦魇般的工作重负中解脱出来，以及旅途中美好的新感受，再次给他带来了成效。可是到了秋天，在韦伯重新担任一小部分教学工作之后，病情很快又复发，而且比之前任何一次都严重。患者现在已不再怀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即便是职责范围内最轻松的工作都会使他的痛苦加深，会给他的精神造成危害。这促使他改弦易辙，采取新的对策。圣诞节到来时，韦伯提出了辞职申请。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单从实际生活的角度考虑，他没有了工资收入，仅靠家里的补贴，如何能够撑过韦伯患病的岁月呢？

巴登州教育当局——教育部长诺克 (Nokk) 和主管部门负责人阿恩斯贝格尔 (Arnsberger) ——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们想要减轻这个患病者的负担，同时从长计议，保留他的职位。系里也不愿放他走。因此他的申请被拒，但他可以带薪休长假。为此，韦伯早就提出申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学教席应当立即设立。在新同事到来之前，韦伯继续指导学生的论文，他的休假实际上是从 1900 年秋天开始的。

刚才阿恩斯贝格尔自来拜访了我们，教育部的人完全没有真正理解韦伯辞呈

中的微妙之处，结果却以为韦伯想另谋他就，所以才要辞职!! 阿恩斯贝格尔得知事情并非如此之后说，“当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他走。我像（《圣经》中的）撒拉（Sara）一般站在门后，对我来说，这位善良的老先生表现出的友善就如天使带来的福音。”马克斯的举止当然很“高尚”，但是感谢上帝，他并没有在道德上唱高调！他的休假时间据他的需要而定，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休多长时间。我们的釜底之薪现在毕竟没有被完全抽掉，我相信，这对于马克斯日后重振旗鼓的重要性，他自己现在还无法估量。

这种慷慨宽厚的安排暂时让韦伯夫妇如释重负，使他们眼下可以不必为未来担忧。可是，韦伯私下里则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有复职的那一天。他竭尽全力为新的教席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过去两周日子不好过，每说一句话都很费劲。建议已经拟好，马克斯最后还是让系里同意了他的想法。不过他费了很多口舌，为此他不得不卧床八天……”

当局拒绝聘任维尔纳·佐姆巴特（Werner Sombart）——韦伯离开弗赖堡时就曾建议由他接替自己在那里的职位，但批准了聘用卡尔·拉特根（Karl Rathgen）。

现在韦伯的这一负担也摆脱了，但他的身体状况未见好转。做任何一点事情都让他受不了：不管是阅读、写作、说话、行走还是睡觉，都觉得难受。他的整个脑子和部分身体功能不听使唤。如果他强迫它们运转，就有陷入一片混乱的危险，这种感觉就好像要掉进一个湍急的漩涡，会使脑子陷入一片黑暗。“他的情况有些微好转，但我不知道让他指导学生的论文会不会有损他的健康。因此，我下了决心，一旦看到他病情加重，便先带他去附近的一所疗养院。”

到七月初，他们就非这样做不可了。夫妇俩决定长期离开这个让他饱受折磨的地方，放弃那里的家。韦伯先是去了劳赫山（Rauhe Alb）的乌拉赫（Urach）镇上一所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小型疗养院，独自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他的情况糟糕到了极点。 256

马克斯有点害怕一人独处，一想到得给我写信就感到毛骨悚然，所以我得给他准备写好了地址，他只需填上几个字就可以寄出的明信片。从下面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状况。几天前，一位同事来信打听某博士的情况。这位博士是马克斯的学生，想要获得大学任教资格，但因他是犹太人而遇到了麻烦。马克斯对他一直很感兴趣，心里一直很惦记他申请任教资格一事，这个可怜的人为这事正处于一个可怕的困境。下午，我把来信给马克斯看了，他花了15分钟时间给我口述了四页纸的内容，可是之后他因这事而变得异常亢奋和激动（我以前从未见他如此过），说即使在这里也不让他得到清静。他的激愤冲着我来这还是第一次。他责怪我没有尽到让他得到清静的责任，让他病情的恢复倒退了好几个星期；他说他**绝对不能**受

到干扰，即使这会让别人“抱怨”；他说自己也面临着某种危险。总之，他简直气得要发疯了。我只好向他对天发誓，保证今后几个星期不会再给他看任何会令他想到工作的信件。我会自己处理一切事情，把来信退还给人家——“即便他们会认为我疯了”。

# 3

就这样他们现在撤营迁居了——谁也不知道这会持续多长时间。他们毕竟深陷于痛苦和悲愁之中，有时会无法抗拒那个令人战栗的念头：结局也许是他们一起沉沦。当然，大多数时候他们仍坚信，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会跟从前一样。玛丽安妮怀着信心和希望，相信丈夫的创造力并没有被摧毁，在她看来，即使健康状况很糟，自己的丈夫也仍然是原来那个独立自主的人——一个被缚的巨人，恶神们因心怀嫉妒而折磨他。

在那段困难的时期，支撑着玛丽安妮的是撰写自己第一篇论文的努力和热情。韦伯对此感到高兴，他对任何表现出妻子自己独立生活的迹象都很欣赏。他总是创造条件让妻子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即使像现在这样处于最艰难的日子（他自己几乎离不开她），他仍然劝她参加妇女大会，因为他觉得她会从中得到快乐。他从来不曾做过自私自利的奴隶。

韦伯夫妇离开海德堡时，他的学生们对他所表达的爱和敬重给他们的离别带来了渗透着忧伤的快乐。

昨天的事情还真不少。12点左右莱奥·韦格纳（Leo Wegener）来，身穿大礼服、白马甲，转交给我你的学生们给你的赠礼，还极为庄重地致词，甚为动情，令他自己都差点哭了出来。这些人的确非常感人。埃尔泽说，他们仔细斟酌一切，推敲每一个字句，这种热忱着实令人动容。赠礼是一幅用漂亮的棕色皮革装帧的相当大的乌贼墨画，系慕尼黑（München）一位女艺术家创作。画中一个在奋力攀登陡峭山岩的男子正将火把撒向大地，火把拂过脚下长满荆棘的岩石，岩石上刻着你的学生们的名字。远处的背景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献词写道：“献给我们非常敬爱的教授和导师！祝您旅途愉快！为了学术的荣耀和发展，为了给您满怀感激之情的学生们带来由衷的喜悦，我们——不仅仅是签名者，也包括所有受您影响而使自己受益终生的人——祝您早日愉快归来！”



※ ※ ※

在施瓦本（Schwaben）地区一个叫乌拉赫的森林小镇上，韦伯在善良质朴的人们中间度过了几个月单调而清静的生活。他会时不时地尝试着在劳赫山高原上将散步时间延长一些，结果发现强度大一些的活动总是造成亢奋，所以后来他宁愿又静静地躺在院子里。他的生活现在局限于一个最小的圈子里：他得回避所有的问题，即使是亲朋好友来访也会让他觉得吃力。有时候，大自然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从而带给他愉快，尤其是当他乘着马车，能够轻轻松松地观赏流动变换的景色之时。多年后旧地重游时，这地方勾起了他的回忆：

看到诺伊芬（Neuffen）附近的劳赫山以及远处的乌拉赫峡谷，我想到了我可爱的姑娘那时在她十分古怪的丈夫身上倾注的很多很多的爱；想到了在你生日那天我们乘马车去诺伊芬，那是在经历了沉郁晦暗的九个月后，我们第一次感到多少有些欢乐的日子；想到了各种各样令人难忘的事情——尤其是我的娇妻（她现在还跟那时一样，仍然那么热情，那么青春焕发），那时她是我同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

※ ※ ※

韦伯感到自己病得不轻，有一点他是确信不疑的：过去几个月的折磨不能再重演了！在这几个月里，剩下那一点学校的工作弄得他筋疲力尽，而这点工作要是搁在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印象令他恨不能立即与过去一刀两断，以便有朝一日重新开始：

我也同医生就我的前景作了相当深入的交谈，对此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定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几乎不可能从事任何有**固定工作时间的**正常工作，而不冒立刻重新回到去年春天那种人间地狱般生活的危险。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只想着海德堡的那个教职。我这个人不受虚荣心所累，“淡泊名利”——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一个大学教师更容易替换的了。假如条件允许我当时完全辞职，从心理上讲这也许是上策；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等到风向重新变得适于航行时，自由地将我的小船慢慢地驶向大海，而不是必须带着我的希望抛锚停泊在海德堡。不过，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相比，我们的命运不知要好多少。

到了秋天，韦伯的一个表弟因严重心理变态也住进了同一家疗养院。这个身材纤细而聪明的年轻人经历了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病程”，其性质当时还不完全清楚，一般人无法理解。人们要求他（虽然没有明说）要有“意志力”，这让他十分痛苦。他的思维非常清晰，行动则受到严重阻碍。被困在无形却无法穿透的玻璃墙后面，他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有没有可能将他从这座牢狱里解救出来，让他回到有意义的生活中来呢？医生并没有完全绝望，医治这样的疾病是一项富有吸引力的挑战。

当十一月给美丽的秋色罩上灰蒙蒙的面纱时，韦伯便向往着明媚而充满乐趣的南方。可韦伯夫妇不忍撇下这个年轻人，让他独自在死水微澜的环境中度过孤寂的冬天；也许大家在一起比一人独处要容易承受一些。当他们邀请表弟同行时，他那一向愁云惨淡的面容第一次露出了愉快的神情。于是他们一行三人前往科西嘉（Korsika），目的地是阿雅克肖（Ajaccio），别人向他们推荐说这里的天气特别暖和。初到这里他们觉得很不错，确实找到了南方的明净，找到了万里无云、统领着大海的蓝天。晴朗的夜空里，大颗大颗的行星将明亮的星辉洒遍海湾。此外，橄榄树、桉树和仙人掌在白雪覆盖的山峦映衬下呈现出典雅的墨绿色。覆盖着山坡的灌木林将整个岛屿包裹起来，飘满了薰衣草和麝香草散发的馨香。漂亮的饭店面对着南边群山环抱的海湾，布尔战争（Burenkrieg）使英国人不能到此光顾，所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客人。这倒给他们带来了宁静。

风光和气候对马克斯颇有裨益，帮助他忘却了自己的不适。上午他几乎总是躺在山脚下的橄榄树下。下午，如果他能走动的话，我们便一同散步。前天我们又乘马车愉快地沿着海湾游历了一番。他现在尝试着不服用安眠药，也不用溴化钾镇静剂，所以睡得不安稳，但是比在乌拉赫做同样的尝试时要好。他现在比以前要愉快健谈得多，这一点奥托也注意到了，因此尤其让我高兴。不过除了《法兰克福报》和《费加罗报》（*Figaro*）之外，他的脑子仍然拒绝接受其他任何精神食粮。

韦伯喜欢这里的新鲜感受，怀着感激之情汲取着这里温柔而又灿烂的美。心情好的时候，他可以忘掉自己和自己的苦恼。可是，那位年轻的患者情形就不一样了。无情的命运使他的疾病在这里无法收到什么好的疗效。他只能很艰难地从自我中暂时解脱一下。他被一种尖锐地意识到的绝望攫住，即使面对着这么多新的事物和感受，他的情绪变化也只是昙花一现，紧接着麻木不仁和迷迷糊糊的表情很快又重新挂在他的脸上。只要他在外面散步的时间比说定的稍微长一点，韦伯夫妇就会担心——他们对他未来的命运有预感——他或许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假如是这样，他们（为他而计）并不会感到惋惜，可是他们得为他的父母着想！

这个医治无望的年轻人以这种方式流露出的多愁善感，不久便像植物的粉霉病一样

传染了韦伯，对韦伯的生命观产生了影响。韦伯会不会也受到了这种绝望感的威胁呢？这个年轻人很敏感，有事一定不能让他有所察觉，否则就毁了他。让他独自一人回国也不可能，所以这样的局面必须得忍受下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玛丽安妮将全副精力用在他身上，以此尽可能不让韦伯与他见面。结果韦伯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人独处。

此时，这个空荡荡的漂亮饭店又关了门，于是他们搬进了配有家具的出租房，可是台球桌和报纸都没有了。漫长的雨季开始了，几乎走不出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寂寥的日子单调乏味地流逝。这里没有漂亮的咖啡厅，没有商店的橱窗，没有音乐，既没有什么可看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体验到了，有文化修养的人在生活中多么需要外界的刺激。很多时候，韦伯只是独自在沙发上半睡半醒地躺着。不过，他既没有感到沮丧，也没有不耐烦，因为他虽然身处文化的荒原，但他感到病情有所好转。体内的反叛者好像投降了，报告病情好转的使者在向他致意。

三月份他们去了罗马，受他们保护的这个年轻人也同行，正是准备这次旅行支撑着他度过了这好几个月的日子。韦伯想要将自己的病痛和尘世的困扰一并淹没在震撼心灵的旅行见闻这个汪洋大海之中。在罗马，他可以超越眼下的疾患，与所有时代的永恒价值融为一体；他可以直观地切实体验自己在书本中已经熟悉的过去的辉煌，将自我扩展为盛入历史的容器。这个伟大城市古老的一砖一石都激发了韦伯对历史的畅想，都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比任何治疗都有效。但是，另一位病人的存在抑制了韦伯高涨的激情，因为这位年轻人虽有兴趣，但却无法像韦伯一样振奋起来。

因此，韦伯觉得这个年轻人与他们在一起是一种令他难以承受的压力，如果他最终不能得到解脱，那么整个罗马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就收不到任何疗效。这对韦伯夫妇和这位年轻人都至关重要，但还不能让奥托有所察觉。他们最终还是分了手，并没有搅扰病人。离开时年轻人充满了信心，回家后一度生存能力还有所增强。然而，在多次努力寻求生命的意义归于失败之后，奥托在几年后以极大的毅力打破了躯壳的牢笼。韦伯用下述文字向年轻人的父母表明，他们儿子的命运是幸福的： 261

亲爱的姨父：

你们知道，这个生命的结束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灵。在阿雅克肖的时候，每次奥托在外面没有按时回来，我们就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担心**不是因为他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的责任。与古代更为自由和更为伟大的情感方式相反，我们对生命表现得无知的日常道德要把尘世的生命打上商品的印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放弃，即便是继续活下去在精神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日常道德的迷惘。他虽然为无法治愈的病体所禁锢，但仍然——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发展出了细腻的感受和对自己清醒的认识，以及深藏于心底的那种很少有健

康人能够达到的令人骄傲而又崇高的高度。只有像我们这样近距离观察过他，爱上了他的人，同时自己也知道什么是病魔缠身的人，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点，并对此做出判断。他的生活内容如此贫乏，而且他自己非常清楚，这种生活内容在自己命中注定的生活轨道上会变得**愈加**贫乏，而他的心——那颗被禁锢在（无处不在阻碍着他的）病患的牢狱中，却又那么**奇妙地**享有自由的心——又是如此丰富，如此细腻入微。

当时我们不得不中断与他在一起朝夕相处的生活，这是我一生中最痛楚的记忆之一。那时我越来越害怕，极度敏感的他会察觉到我忍耐与别人为伴的能力和玛丽安妮的精力都已达到了极限。就在最近我们还在谈论，是不是应该向你们建议，让他和我们一起去美国，或者送他到这里上大学。也许他的生命会因此而延长……不过我几乎相信，现在所发生的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你们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因为，考虑到他将会面对的命运，现在他**先于你们**进入那不可知的国度是正确的选择，否则，有一天你们不得不将他遗留在这个世界上，任他孤独无助地走向黑暗的命运之途。

262

生命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却并不见得比从前更为沉重。当时那位希腊母亲唯一的幸福就是：她风华正茂的儿子们的死亡就是她祈祷的应验。生活赋予了你们这么多的孩子最为丰富的使命！而对于这个孩子，你们自己所祈祷的也只能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希腊母亲的那种幸福了。他满足了生活对他的要求：丰富的内心生活，自我的精神升华，以坚强的意志隐忍着，而并不怨天尤人。命运没有赋予他任何外在使命，也剥夺了他赋予自己这种使命的一切机会。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结束了已经不值得自己再留恋的生命，这样做并不是怯懦的逃避。同你们一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会怀着尊敬和爱戴的心情怀念他。

## 4

这个年轻人的问题解决之后，韦伯迫切感到需要马上离开罗马一段较长的时间，以获取一些别的观感来将过去几周的痛苦压下去。夫妇二人去了意大利南部，包括那不勒斯及其周围地区、索伦托（Sorrent）、庞培（Pompeji）、卡普里岛（Kapri）和帕埃斯图姆（Pästum）。韦伯在索伦托十分安静地待了好些天。在一个铺着彩色石板、俯瞰着大海的山岩平台上，他纵情观赏着蓝色的海湾、伊斯基亚岛（Ischia）的轮廓和点缀着白

色小屋的雾气腾腾的维苏威火山（Vesuvius）。

沉浸在这般壮丽的景观之中，韦伯重新恢复了心理平衡：“对于马克斯来说，疗效最好的东西莫过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快乐和观赏到尽可能多的美景。我常想，假如我们两年前就做了这样的旅行，假如他当时就休了假，他的病可能会好得快一些。这让医生给耽误了，那时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情况好转之后，他便沉湎于庞培和帕埃斯图姆的美景，在取道春意盎然的罗马大平原前往萨莱诺（Salerno）的路途上，韦伯注意到古罗马的耕地划分仍然保留着。“我们在庞培待了两天，马克斯在那里做了一些就他的健康状况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天中他两次花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观光游览，而且总是兴致勃勃，非常愉快。”

在那不勒斯（Neapel），他们住在远离城区的波西利波（Posillipp），直接俯瞰着大海。这一地区景色诱人，轮廓清晰，海水湛蓝透明，这一切都让马克斯浑然忘我。他的观感越是奇异独特，他就越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乡，对他就越有益处：“马克斯的心里没有萌生一丝一毫怀念过去和思念家乡的情愫，这表明他仍然多么需要休息。不过，他仍然有足够的精力去欣赏每日所获的观感。”之后，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共同去探索那些几千年里重叠交错的历史遗迹。所有的废墟在夏日的光照里流光溢影，每一座穹顶，每一面外墙都沐浴其中，因其而大为增色。即便在夜里，闪亮的群星后面，天空仍然是蓝色的。初夏的微热真是怡人。他们常常躺在“博格塞别墅”（Villa Borghese）花园的绿草坪上，开心地看年轻的僧侣们脱去宽松的长袍，像俗人一样在那里打球活动肢体。大自然和生物界的一切都让他们高兴，只有他们的同类才时常来打搅他们宝贵的夜间休息：“争得清静和睡眠有时真的比为某种世界观而奋斗还要困难。一个人要是清清静静地睡上七个小时，试看他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来！”

263

盛夏，他们夫妇逃往瑞士，逃往格林德瓦尔德（Grindelwald）避暑，同时也是为了看看高原的空气怎样。起初的效果很差。在南方已被控制住病魔奋力要挣脱自己的锁链：失眠、亢奋、烦躁和其他种种折磨人的病状又出现了。刚刚赢得但在上面还立脚不稳的地面又重新摇晃起来，病情的反复让病人十分沮丧。妻子离开几周后回到他身旁，发现他又回到了和一年以前差不多的状况。难道一切都不可信了吗？难道每一次愚蠢的偶然事件都会让人们一切重新产生怀疑吗？不过，韦伯的弟弟来看望他时得到的印象要乐观一些。

阿尔弗雷德的印象是马克斯的病情有所好转，这是否属实呢？我当然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就在今天马克斯再次告诉我，说他仍然感到疲惫，非常疲惫，说假如我们让他产生自己有了能力工作的想法，那对他**不会**有什么益处，他感觉自己并不具有这样的工作能力。他仍然很容易被激怒，会突然大发脾气，主观臆断，不过

一旦你心平气和地解释自己的观点，他就会回到客观地看问题的态度上。

264 他不稳定的身体机制后来终于适应了高原气候。在策尔马特（Zermatt），望着冰雪覆盖的巨峰，韦伯对病情好转又有了信心。他有时可以勉力读点东西了。

秋天，韦伯夫妇第三次回到罗马，这次打算在那里度过整个冬天。一户和蔼可亲的意大利人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受干扰的隐居处。他们过着独处的生活。当海伦妮来看望自己的孩子们的时候，发现儿子的病情确实大有好转。她又可以同韦伯交流了，后者很高兴，在这位乐于接受各种事物的女性那里，他又获得了一面能反映出一切伟大事物的新的镜子。

过去几年里，母亲总是不得不克制自己。令韦伯感到高兴的是，现在自己可以向她表明一切，解释一切。海伦妮感到很愉快，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罗马，虽然她已经五十七岁了，外表看起来俨然一个老妪，但她的感受和心灵依然年轻。她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摆脱过去的一切，全身心投入到体验伟大的新事物中。所有的东西对她都有吸引力：无论是古典艺术品自足的完美还是早期基督教圣迹的内在激情，也无论是异教徒的万神庙还是地下墓穴，抑或是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古罗马广场，我们得注意不要让她捡太多细碎的大理石作为“纪念品”放进自己的手提袋里，或者至少不要让“家里的老大”看见，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而韦伯是一个遵章守纪的人。在罗马的几周时间是海伦妮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对孩子们来说，对家乡最为亲切的感受莫过于母亲这颗无私的爱心了。母亲走后，玛丽安妮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马克斯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不过他对你很有些意见，因为你说这次来感到融入了我们的家庭，而以前觉得更像个“闯入的外人”。他觉得这完全是“瞎说”，不过，这终究让他感到有些悲哀，因为他自己如此拙于向你表达他对你有多么的爱。你有那样的感觉，他的悲哀便更加深了——“主教如是说”<sup>①</sup>。最亲爱的母亲，我清楚地知道，你前几次来的确有那种悲凉的感受，不过那也许是因为马克斯的健康状况令人绝望，而你又感到无力相助，对吗？马克斯的自我封闭只是对易激惹的本能防御而已。

265 海伦妮来后不久，马克斯就重新开始读一本真正的书——一部艺术史。他从艺术家协会图书馆一卷又一卷地弄来阅读。海伦妮和玛丽安妮暗地里用手肘轻推对方：“瞧，

<sup>①</sup> “So sagt der Patriarch” 是莱辛剧作《智者纳旦》中僧侣一再重复的一句话。主教指剧中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参见英译注

他在读书了！”当着韦伯的面她们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后，她们才敢向韦伯暗示他病情有所好转。韦伯说：“谁知道这能持续多久呢？”“我完全不读专业书籍。”不过，他的接受能力保持下去了，患病三年半之后，这标志着病情有了真正的好转。在这之前，他确信自己从今往后不能再重履旧职了；现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会觉得，适时恢复健康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不管怎样，他不想操之过急，因而只想在夏季学期安排一门讲座课和一门研讨课。海伦妮和玛丽安妮也增强了信心。

迄今为止马克斯的状况一直不错。他的阅读量非常大，大部头的书一本接一本本地读，现在读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他阅读这些书的速度总是非常惊人。如果我不督促他出去走走，他也许会一直埋头读书；他在如饥似渴地享受阅读的乐趣。……这整个时间里，一种巨大的感激之情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当然，这种感情也时常为胆怯和生存的焦虑所干扰。夜里，我的心就在害怕与希望之间来回跳动。有时候希望也会信马由缰地奔驰，我须得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对近期内发生的情况做好心理准备。我在精神上还必须学会如何在生活中摆脱持续不断的沉重心理负担。不过，假使马克斯逐渐恢复工作能力，我每天都会唱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圣经·诗篇》，16）即便在回首过去的痛苦时，我心存的也只有感激。

现在又发生了另一件未曾料到的事情：几天前，马克斯写信给拉特根，请他在（1902年）夏季学期暂时给自己安排一门两个小时的政策讲座课程和一门研讨班课程。为了避免草率从事而于心不安，也为了能在聘任自己的后继者时提供参考意见，他想把回程日期推迟到三月。要让他再提出休假申请似乎完全没有可能了。他问我：“你心里有什么看法？”我说：“什么也没有，因为我并没有处在你的位置，不过最近我倒又是燃起了希望，觉得你将来总有一天会恢复工作能力的。”然后我们给拉特根和舍尔哈斯（Schellhass）写了两封长信。于是我们再次将决定往后推迟。由于燃起的希望很难控制，也由于我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所以我有时对此又感到后悔。不过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念念不忘教授职位是愚蠢的，只要马克斯病情好转，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266

韦伯的病情持续好转。他又敢于跟人交谈了，有时还能脱离蛰居生活，跟别人进行思想交流。他去历史研究所见了年轻时的朋友舍尔哈斯教授，同青年历史学家哈勒尔（Haller）进行了学术讨论。

马克斯的情况很好！我每天都默默地满怀感激之情。昨天他同哈勒尔博士交谈

了约三个小时。他2:30就去了历史研究所，直到6:30才回来。他现在还在读康拉德（Conrad）编的年鉴，以及西默尔〔（George）Simmel〕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在适当的时候，我也许会告诉他，依他目前的健康状况，再次提出休假申请并不会显得厚颜无耻。虽然我暂时并不指望能说服他，然而，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的病情持续好转，对这个问题他心里会发生什么变化。你和舍尔哈斯担心，马克斯将来要是做了编外讲师会因为失去影响力而痛苦，对此我不敢苟同。我相信，他已经考虑过了离职带来的一切后果，并且接受了这些后果。他的秉性对于他处理这类事情大有帮助。对于同事，他感到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承认和容忍他们的个性特征。在涉及同事的问题上，他非常客观。我一直很**钦佩**他这一点，也**钦佩**他几乎没有凸显自己的需要。

267 康复已经在向他招手。看来问题只在于赢得时间，因为——玛丽安妮暗地里这样认为——韦伯应当回到讲坛，回到学生中间。像他这样一个通过生动的语言及其人格在其他方面所直接放射出的光芒来培养和引导年轻人的天才，荒废了实在是说不过去！不错，他们仍然有理由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新年伊始便出现了好转的吉兆。然而，康复并不会一帆风顺。康复过程中，康复者必须得常常停下来歇息。妻子暗地里总是有些焦急，不知他能否及时达成他的目标。

“三天前，聪颖睿智的哈勒尔博士来看望了他。马克斯谈到了一些最困难的问题，谈了足足两个小时。他旁征博引，生动形象，谈锋之健，思维之敏锐一如往日。当然了，那天晚上他难以平静，服用了安眠药曲砒那（Trional）。”现在他常去历史研究所与舍尔哈斯和哈勒尔闲谈聊天，对“生活”的需求也逐渐在增长。只是任何带有强制性的事情都像以前那样让他难以忍受，甚至一篇需要彻底改写的学生作业，都会让他再次确信，眼下任何一种职责都会给他带来无能为力的感受，都会给他增加过量的负担。“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书为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绝对不会去读这些书的。也就是说，马克斯潜心阅读的书是一种什锦美味的混合，是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历史著作、寺院的法规和经济，还有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卢梭（Rousseau）的《爱弥儿》、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泰纳（Taine）全集以及英国作家的作品。”

在罗马度过的这个与世隔绝的冬天里，他们生活中最感兴奋的就是弗里德里希·瑙曼的来访，瑙曼带来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和一股温暖清新的气息。

猜猜看，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意外惊喜！前天，神采奕奕的**瑙曼**现身于我们这宁静的隐居处——惊喜中我差点要拥抱他！他从巴勒莫（Palermo）来，在这里只



待几天，我们共度了许多时光。前天下午，我们和他一起去了平乔山（Pincio）；昨天上午，我们环城游览了三个小时。马克斯滔滔不绝地讲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过到中午就精疲力竭了，所以我一人陪瑙曼乘车前往阿皮亚大道（Via Appia）。我们带他游览了所有的地方，不过我们两人有同感：瑙曼对历史的兴趣远不如我们浓厚。他现在的感受太过“现代”，有太强的社会和经济倾向，这也许只是因为他静不下心来。他也不可能有马克斯那样的历史想象力。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石制纪念碑给他的最初印象不过是些空洞破碎的蜗牛壳，他更需要的是自然景观所具有的直接魅力和人们真实生活的鲜活印象。假如他要长期待在罗马，也不会像马克斯那样受益良多。因此，在罗马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欣赏的主要是当下以及瑙曼的性格。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内心的宁静和客观精神让人心情舒畅；他自然率真的友善，他富有幽默感的同情心令人着迷；他品评别人时的温厚和宽阔胸襟让人感到惭愧。试想一下，为了能够如约在星期天准时给妻子发电报，他竟通宵旅行赶到热那亚（Genua）！

268

可是，在这几个情绪高昂的美好日子过去之后，那只黑手把这个挣扎中的人重新推回了病患状态：“上周，我们的灵魂又开始在尘土中爬行。马克斯接连好几天夜里睡不好觉，人整个垮掉了，这使他非常苦闷。我暗地里急得不行。这也许就是瑙曼来访的代价吧。这个星期他又好起来了。我们肯定还会常常经历这样的困扰，不过我不知道常有这种经历会不会让人习惯。”

# 5

1902年复活节，韦伯离开罗马返回家乡，因为在离开将近两年患病四年之后，海德堡的生活现在又得重新开始了。韦伯并没有康复，所以感到无法去上排好的课，但他比以前大有好转，已经适应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恢复了精神生活。他首先将这归功于罗马那座不朽的城市所拥有的阳光和辉煌，罗马为他提供了那些沐浴在历史中的时光，使他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感到贫乏的生活有了价值。离开南方对他来说犹如告别第二故乡，当漫长的冬天沉重地压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侧时，他心中常常充满了对这第二故乡难以抑制的渴望。他先去佛罗伦萨（Florenz）待了些时日，从那里再次提出了辞职请求。

马克斯现在真的请求免去他的正教授职位，在编制中只挂一个教授头衔。这就意味着州教育部没有义务付他退休金。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我自己也不希望他因再次提出休假申请而感到良心不安。但是我并没有感受到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带来的满足感。当他给我口授辞职申请时，我心里再次感到一阵不太理智也不太体面的愠怒，泪水也流了出来，这让马克斯感到很有些恼怒。我当然感到羞愧，但并没有到无地自容的地步。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点没有“英雄气概”。

不错，韦伯只是经历了地狱中的最下面几层而已。他在这段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祝贺母亲的生日（当时她正为幼子订婚而兴高采烈），这在他母亲和他自己看来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了。“一切都非常好。我甚至给母亲写了八页纸的长信，尽管写起来有些吃力！”信中写道：

我想，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在你生日的时候亲自提笔给你写信了。这次，我的后背也不会允许我写得太多。不过，在春意盎然的今天，我的状况毕竟大不同于前两次万木吐绿的时候了，所以我又可以作为生日祝贺者勉力给你写信道贺。希望你现在已经从最近几周的兴奋中多少平静下来了，希望你自己的生命迈入新的一年时能比先前更加自信地向前看。两个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的人在一起会出现一些内在矛盾，而且这些矛盾现在仍然表现得很突出，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事关阿图尔，他面临着得往前大步跨越很多年的重任，这样你首先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等待，这对于你的心灵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母亲们除了要承受别的一切之外，还要面临这样的命运：当孩子们自立的冲动觉醒，同时又缺乏自信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冲动最初纯粹是负面地冲着父母，尤其是冲着母亲而来的。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想阿图尔现在差不多也处于这种状况。也许你的新儿媳受到这样一个人生发展阶段的影响，现在——按照你来信所描述的她的性格——也还不可能像她日后自己所希望做到的那么坦率。

你暂时还无须为我们做出任何经济方面的安排，我们的家中用度坚持到明年秋天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我的身体持续好转，到那时我也许已经有了挣钱的机会和可能性了。如何去挣钱呢？这我现在还的确不知道，目前我也并不关心此事。也许可以做写文章之类的工作挣钱吧。你谈及德尔布吕克（Delbrück）的一席话表明，他的杂志境况不佳。像办杂志这样的事以后倒是可以考虑，也许可以和阿尔弗雷德一起办。但是目前我的工作能力还太不稳定，政治局势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我们只能等等看。即便现在可以在政治上做点什么，我也无法去做，因为在这方面我还有太多的东西要补上。除了指导研讨课之外，我已经辞去了我的职位。如

果再等下去，他们会以为我冬天就可以开设大讲座课了。这肯定不行，因为高声讲话正是我无法做到的。至于他们现在会不会给我名誉教授或类似的头衔，对我来说实在并不重要。

.....

大约三周后我要去博洛尼亚（Bologna），然后前往米兰（Mailand）和卢加诺（Lugano）。锡耶纳（Siena）等地就准备割爱了，因为不顺路，得增加额外的开支。我想要节省点费用，给玛丽安妮买一件小艺术品。毕竟谁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来这里。只有在佛罗伦萨这里，你才会注意到，罗马真的是一个非常丑陋的小城镇。然而，我可以在罗马生活一辈子，但在佛罗伦萨却难以做到。历史的想象力是关键，没有这种想象力，就别到罗马去。你应当感谢格维努斯和海德堡传统悠久的氛围给了你这种历史想象力。我的后背现在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它已经很久没有坚持过这么长时间了。盼望在你生命中新的一年能再次见到你，希望在这一年里你的日子过得更加美好、更加丰富。

1902年4月14日于佛罗伦萨

韦伯在自己三十八岁生日那天回到了家——像一只铩羽而归的雄鹰。同事和朋友都觉得他的病情大有好转，相信他不久就会完全康复。故乡温馨的气氛环绕着他。

“斯泰尔的海因里希归来了！”<sup>①</sup>他是星期六晚上到的，取道弗赖堡，在那里拜访了鲍姆加藤一家、李凯尔特一家和拜斯特。回来时由于已经找不到出租马车，我们只得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回到我们的住处。这里刚刚装修停当，装饰和照明都焕然一新。我注意到，韦伯看到自己家里干净舒适，感到很高兴。他觉得住宅很漂亮，“把玩”着自己的东西，舒舒服服地坐到书桌前。朋友们来来往往，看到他生气勃勃都很高兴。

之后不久，玛丽安妮写道：“迪特里希·舍费尔（Dietrich Schäfer）刚才来这里告诉我，当局想说服马克斯撤回他的辞职申请！他们想无论如何都要留住他。”这样一来，他们又重新开始了在放弃与希望之间摇摆。在巨大的压力下，韦伯——虽不情愿，但心存感激——再次接受了一项临时安排。他教授一门研讨课，此外还参加对博士生的考试。他闭门谢客，但老朋友仍然来访，特别是特勒尔奇、亨泽尔、耶利内克和瑙曼。只

<sup>①</sup> “Der Heini von Steier is wieder im Land!” 是一首名为《乡村舞蹈》的七节诗歌中重复出现的首句诗。“Heini”指具有传奇色彩的宫廷抒情诗人海因里希·冯·阿福特丁根（Heinrich von Aferdingen）。——参见英译注

是他的妻子得注意，不能让他们之间的热烈交谈持续的时间太长。

星期六下午，他通常与一个人数不少而且不断增加的圈子里的人聚会，并且不知不觉地又成了聚会的中心。这些聚会夏天在施蒂夫斯米勒（Stiftsmühle）旅店，冬天在舍费尔豪斯（Scheffelhaus）饭馆举行。这类在中性地点举行的聚会是他在多年里唯一参加的社会活动。如果他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一天过得愉快，那么他已经恢复的身体状况就可以保持下去；相反，任何带强制性的东西，或者涉及任何得限期完成的职责所带来的压力都有使他的病情逆转的危险。他的身体在患病以前一直盲目地服从他精神上的高要求，看来从今以后他的身体再也不会忍受任何强制性了。



韦伯最小的妹妹莉莉——她已经出落为一个漂亮而聪明的姑娘——计划在那年七月结婚。她是建筑师赫尔曼·舍费尔的未婚妻。赫尔曼·舍费尔的父亲是卓越的哥特式建筑师卡尔·舍费尔，他那时正在计划重建海德堡城堡的奥托·海因里希宫，有可能的话甚至重建整个城堡，这项计划引起了轰动。海伦妮一心想让“她家老大”参加莉莉的婚礼，暗地里希望他能在婚宴上发表一番他的那种情感丰富的演说，以这种方式再一次向这位年轻女子——海伦妮正在努力争取赢得这个女子心灵的皈依——灌输她自己的思想。在通常情况下，类似的事情对韦伯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现在却变成了他难以承受的要求。

272

昨天我小心翼翼地向他暗示，看他到底能不能去参加婚宴，在那里待上半个小时。他一听便非常激动地说：“绝对不可能！”他说当着自己还并不熟悉的人发表祝酒词，单是这种想法就会让他三个晚上睡不安稳；说他不理解我们怎么能期望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只会去教堂，也许会在闹婚之夜待半个小时，迎接客人，别的是决计不行了。

与其去那里把自己晾在一大群带着同情和问询目光的人面前，他还不如待在家里！但是，他得让母亲知道自己有良好的意愿。对海伦妮来说，这次婚礼是她生命中又一个转折点：她要告别自己娇柔的幼女了，这姑娘尚未向母亲吐露心迹，现在就要嫁入一个陌生的家庭了；海伦妮自己还要告别那幢宽大的漂亮住宅，将它换成小一点的房子。韦伯在柏林身体状况很差，以致无法参加结婚庆典。他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病人。这是一段悲哀的日子，这段日子产生的副作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几个月后玛丽安妮写道：

到现在为止马克斯的情况确实还可以，他每天大约工作四个小时。在海因里

希·布劳恩（Heinrich Braun）的鼓动下，他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评洛特马（Lothmar）的《劳务合同》（*Arbeitsvertrag*），这可以被视为他恢复工作能力最初的微弱征兆。由于其法学特征，这本书与韦伯的兴趣爱好相去甚远。他之所以同意写此书评，只是出于帮忙而已。不过，他现在或许暗地里感到高兴，因为他——尽管对写这篇书评并无兴趣——四年半以来第一次以写作的形式表现了自己生命的存在。他还在大张的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不想告诉别人他写的是是什么，大概是关于科尼斯的一篇方法论的论文——不管自己愿意与否，他都不得不同意为了一本纪念文集写这篇文章。

1902年10月10日

## 6

韦伯的著述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与以前截然不同。产生于这个阶段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一篇题为《罗舍尔和科尼斯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问题》（“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写作动因有一部分来自外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计划在校庆之际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向韦伯催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韦伯肯定不会在他的工作能力虽在恢复但还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一开始就涉足这个困难的领域。当然，他对这些问题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了。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关于《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一书也许给了他一些启发，该书第二卷大约就是在那时出版的。半年前韦伯在佛罗伦萨读到这部著作时，曾给妻子写信说：“我读完了李凯尔特。他非常出色。我发现书中大多数内容也是我自己思考过的东西，尽管我还没有从逻辑上将我的思考组织起来。对于书中使用的术语我有所保留。”

273

然而这是何等的不幸！对他那个学科以及历史的思维方式所做的艰辛研究，越做越大，但又必须按时交稿。这很快成了他的负担和对他的折磨，因为他的工作能力还不稳定，只有在精神好的日子，他的脑子才能应付思考逻辑问题所需要的高度集中。

我们的天空又乌云密布。差不多有两个星期了，马克斯一直很疲劳，睡眠不佳。尽管所有的思想在他脑子里已经考虑成熟，但他仍然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工作。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工作能量只能坚持四周，然后必须休息四周，不做

任何事情，变换环境，以这样的方式为接下来的四周聚集力量。每次这样做都足以令人感到绝望。人们一直认为，一个人最终总应当有权利要求得到相对稳定的工作能力，或者能够迫使上苍赋予自己这种能力。然而，一次又一次，他反复听到的只是：忍耐。

能否从一天中争得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又成了关键问题。他很容易满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也是有意义的。他在一张小卡片上用意大利语写着：“下雨对我很有好处：我睡了觉（睡得不算好，也不算多，但睡得很沉），能工作（做得不多，但能做一点），所以情况不错。”可是三天以后他又写道：“这场倒霉的考试又让我一夜没睡好。圣诞节前还有三场这样的考试！这让人还怎么工作！现在天气很好，像在里维埃拉（Riviera）一样暖和。遗憾的是我不能出门散散步。昨天在舍费尔豪斯饭馆与特勒尔奇、兰茨贝格（Landsberg）、希斯（His）、福斯勒教授及其迷人的妻子相聚，不过我们的交谈对我并无裨益。”

274 韦伯无法践诺。这对他是一个新的精神负担，加上冬日的阴暗，这些就构成了他生活中又一个低潮。一切又变成了折磨。他渴望去南方，在那里他没有什么必须承担的义务，无须与任何人作比较，也无须与他自己以前的能力作对比，那里的日光和温暖能使无聊的日子变得可以忍受。

马克斯的健康状况每天都在波动。与很长时间以来的状态相比，他的情绪和总的感受要差多了。他上午总是工作一两个小时，但是毫无乐趣，然后下午只能躺在沙发上打盹儿。他每天都在抱怨，说他五个星期之前——在目前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没能当即抽身离开，因此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我现在掰着指头计算着天数，看看距离他启程旅行还有多少天，但愿在此之前他的健康状况不要继续恶化了。

与此同时，他再次表达了让他最感痛苦不堪的是什么东西。始终是同一件事情，即“尸位素餐”所造成的心理压力：领着薪水，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有所作为。同时他还感到，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都认为，只有有职业的人才算是完整的人。此外还有前些年种种不愉快的回忆，他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医生在内，总是认为他必须靠意志战胜疾病，这对他的自尊心是最可怕的打击。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什么可谈的呢？真的没有了，最亲爱的妈妈……在舍费尔豪斯我碰到了一些熟人，但是如果马克斯不在那里，对我而言就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使他们的生活和马克斯（近五年来所过的，现在又开始过）的生活形成的可怕对照在我眼前变得更加清晰。继而是人们表示同情的问询。我请求他们别再问了。

这样，在充满希望的一年开始时，升起的太阳又被大片的乌云给遮住了。韦伯逃到了南方。在奈尔维（Nervi），海岸岩石平台俯瞰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待在平台上打发时光，即使是阴天，他也在那里沐浴着温暖的空气度日，折磨着他的痛苦消失了：

尽管我的工作能力与在海德堡时相比只有些微好转，但我完全可以忍受我的身体状况了。这说明我来得太晚了。我在这里濒临大海，总是置身户外，这多少算是一种生活，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真的算不上生活。现在我暂时什么也不做。希望回家时至少能把这该死的研究的剩余部分弄出个提纲来。

1903年1月3日于奈尔维

有时候，他把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的辞职——归咎于这篇他尚不知何时才能完成的难产的论文。“假如我今年冬天没有写这篇论文，而是安安心心准备我的课程，那么夏天我也许就可以上这门课了。” 275

三月初，他又逃到了罗马，但这次罗马对他似乎已不再具有疗效，也不再有能让他振作的功用了。韦伯对那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再也找不到任何新鲜东西来有效地转移他的注意力，令感官感到震撼的效果也减弱了。他又失却了一个希望。假如他能去另一个世界——比如说君士坦丁堡，也许还有希望！但是他无力支付去那里的路费。海伦妮——她不知提出过多少充满爱心的建议——倒是想要资助他。可是，既然三月的罗马都不能让他们夫妇感到满意，那么他们就应当去非洲的比斯卡拉绿洲（Oase Biskra），在那里他们必定能找到充足的阳光！

不过，韦伯也许觉得，他此时确实没有可能摆脱自己。自从他感到并不一定要工作之后，心理上的压力也没有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必须停止“扮演教授的角色”，甚至连玛丽安妮也相信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到了命运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个最后的决定过一段时间之后将会让我们两人都得到解脱，会给马克斯带来更加稳定的力量。然而，几年来，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无数的失望在我心里形成的印象还非常鲜活，因而我现在还不能相信会有一个新的未来。”

当然，玛丽安妮心中暗藏着的希望仍然使她不时怀疑这个最后的决定是否有必要：

马克斯在史学家代表大会上只听了个别的学术报告，并没有参加讨论。但是，最近几天常有各种各样从外地来的人来看望他，他同这些人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谈，其辨析的机智一直令我惊讶不已。你在这种场合下听他谈话，不禁会自问：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连小小的一堂课都教不了呢？我们到这里的第二天早上，卡尔斯鲁厄文化和教育部部长伯姆（Böhm）一大早就来拜访，非常客气也非常急切地恳

请韦伯不要迈出那一步，但马克斯仍然坚持初衷。因而双方约定，马克斯十月辞职，然后做兼职教授，教授小型讲座课。马克斯认为，除非在系里有一席之地和投票权，否则这个头衔和任教聘书对他就没有什么意义。然而，这项动议只能由系里而不是由政府提出来。伯姆随后在给系里的提议中加上了一段可以作下述解释的文字：系里应当给马克斯提供一席之地和投票权。可是传达这份文件的系主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并没有理解这一段。这样一来，虽然程序是对的，但马克斯所期望得到的解决方式却未能如愿以偿。对此他很有些激动，连那个头衔和任教委任也不想拿了。

他并没有这样做。不过，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他留下了苦涩的滋味，因为他感到，这样一来，他同自己的过去和同系里同事们之间的断离比自己原想的还要大。

从外表上看，我们过得平静而且快活。至于马克斯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能完全肯定，最好也不要去看他，因为我们现在尽量少谈自己的事务。在我看来，与过去五年里所遭受的痛苦相比，放弃这种身外之物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在放弃这根长长的链条上，这毕竟只不过是最后一环而已。不过我相信，在接受既成事实的同时，他心里也滋生了一种比以前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不要丧失重新与自己的职业接上轨的机会，并且怀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他止步的地方重新开始。他问自己也问我，他现在应当只专注于写作计划还是整理讲义。我倾向于后者，这主要是因为，要不这样做的话，过去若干年巨量的工作就什么也保留不下来，这会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

※ ※ ※

韦伯正值盛年，却被逐出了自己的王国。他的职业生涯已成为过去，这是他人生的低谷。可是在他的心底，他傲然挺立于命运之上。他对这件事看得并不很重：“我根本没有把我的辞职看成是一个具有悲剧性的事件，因为几年来我一直确信有必要这样做。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没有哪位医生能够坦率地让玛丽安妮也确信有这种必要性。我的工作能力还没有恢复，除此之外都还过得去。”只有当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紧迫的学术工作（这仍然时常发生）时，他才感到恼怒和悲伤。除此之外，他并不抱怨，而是感到安慰——有点无可奈何的安慰：“我不做，别人会去做”；或者怀抱希望的安慰：“终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突破口，由此重新扶摇直上。”

韦伯辞职的消息传开后，一位素昧平生的柏林医生给他写了下面一封信：



非常尊敬的教授先生：

我从今天的报上得知，您因健康状况不佳而不得不辞去教学工作。这个消息令我深感遗憾，因为我自豪地承认，我是曾有幸坐在您面前凝神静听您讲话的那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群体无疑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大约十年前，您给这里的弗里德里希韦尔德（Friedrichswerder）高级文科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做过两个系列讲座，一次讲德国法律史，另一次讲德国的宪政生活。我就是其中一名高年级学生。我可以说，有多少人听讲座，就有多少讲演人的崇拜者。您不仅用我们不常听到的“先生们”称呼我们，让我们感到愉快，而且以丰富的知识和我们那时从未见过的雄辩让我们感到惊讶，令我们着迷。自那之后不久，得知您应聘去了弗赖堡，我们都为老师的升迁而感到由衷的欢欣，并预言您的事业将会有一个辉煌的前程。因此，如果我当时的同学们得知，您这么年轻就放弃了您的学术职业，得知您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放弃了它，那么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抱憾不已。我同时以个人和我同学的名义向您表达我们的祝愿，祝愿您自己选择的赋闲能让您的健康得到恢复；恳请您将此祝愿视为我永恒的感激之情，以此报答您做的那些讲座——它们不仅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而且让我们摆脱了中学生生活的单调。

# 第9章 新阶段

## 1

278

韦伯去职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立竿见影。离职——这是他等待和暗自企盼了好几年的结果——现在具有了重要意义。本来他希望以后能以比较自由灵活的形式继续以前在学校的工作，这种动机现在也已经不存在了：“我的印象是，在这里重新执教对马克斯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因为他们在系里没有给他保留一席之地，没有授予他做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此外，那部计划之外的研究方法论的著述（《罗舍尔和科尼斯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问题》）也是个拖累。这项研究让韦伯第一次离开具体材料的陈述而进入包罗万象的逻辑问题，迫使他批判性地检视部分已经陈旧的现存思想体系。这项研究本身并不让人振奋，因为从中不能产生对现实的新洞见。

韦伯眼下除了希望能够安静地做学术研究之外，对生活别无他求。只要能让头脑中积累的（也包括在艰难痛苦的岁月中积累的）东西见诸文字，他的一天就充满了意义。然而，如果他的头脑不听使唤，在北方常常是阴沉沉的天空下生活就会成为一种累赘。这段时间，神经系统造成的不适，对环境的不满，以及渴望温暖的气候和明朗的天空，这些因素仍然经常会交互作用，促成他打算永远离开德国的迫切愿望。

最近几周，一切的一切，甚而至于你都惹他生气，这是他又将感觉很难受的征

兆。谈到你，我每次都激烈地反驳他，说他关于你再也不想来看我们的想法是一种病态。他对某某先生的不满其实并不是那么严重，尽管听到马克斯责骂他时你可能会那样认为。所幸的是，那对夫妇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他几乎从不对我发火，可是总是在我面前发泄对别人的怨气，这倒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发泄后，他感觉好一些，又不伤害我，而且这样也不至于伤害到别人。

尽管他不时会有这种暴怒的情绪，但在静下心来沉思的时候，他从不抱怨自己的命运，从来没有真正对自己绝望过。也许他始终觉得，自己身上保护着创造性胚胎的核心和本质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被触碰到，疾病并没有穿透这个保护层。同时，个人生活的安全感、妻子同他患难与共的坚定信念都对他有所帮助：妻子始终把他看成是健康和完整的人，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她也能感觉到丈夫的魅力。当玛丽安妮的父亲大约在这段时间去世的时候，韦伯写信给她：“回顾你父亲艰难的一生，我们得永远记住，我们丰富的生活是何等美好，即使我的状况比现在更糟，我们的生活仍然是美好的。”

秋天，当韦伯的同事们聚集在汉堡（Hamburg）开社会政策协会的代表大会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又允许他去参加会议了。当然，这位青春年少时就在这样的聚会上崭露头角的人物，现在只不过是个听众罢了。不过，他与老友故交相谈甚欢，而且实在是非常享受富有实质内容的相聚，以至于他会后又同佐姆巴特和勃伦塔诺等几个朋友一起前往赫耳果兰岛（Helgoland）继续他们的热烈交谈——这是一种精神透支，韦伯自然为此又付出了失眠的代价。一位淳朴的渔夫多次载着这些学者们在去岛上的海浪中颠簸，他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但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他们表达了钦佩和赞许。

玛丽安妮比韦伯更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当她看到韦伯沉默不语地坐在一群人中间——以前他曾以自己雄辩的口才征服过这个群体——的时候，一阵阵剧痛就会在她心中产生：

不过，现在我心中仍然燃烧着一种渴望，渴望我的那颗星能够再次闪耀，为我们带来欢乐，给别人带来裨益！哦，上帝，看着别人都在工作，在创造，而他却被排斥在外，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我不知道，不过我倾向于认为，最近他与自己熟悉的那个圈子里的人接触也许让他对此有所感触。或许他的疾病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他不会产生这类有时候震撼我心灵的想法。

事情整个给颠倒过来了！妻子现在得时不时地公开发表演讲，她做起来很有些吃力，而她丈夫满腹经纶，却无从发挥！

最近我第一次出席了民族社会党的集会，大会的议程关涉教育问题，好歹我得——第一次在男性听众面前——陈述我们这个运动的观点。事后我感觉，这不啻为命运的嘲弄：我这个可怜的小女子深夜1点钟还在参加政治集会，而我们家的“老大”10点钟就必须上床睡觉了！

那年秋天夫妇俩庆祝结婚十周年的时候，他们这样总结了自己的个人生活：

**韦伯：**现在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十年能够像过去十年一样，给我们带来同样丰富的内心生活。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内心生活无限丰富。今天，我们仍然像当年一样彼此都有新鲜之感，不同的是，我们怀着更大的信心找到了通向对方心灵的途径。今天我怀着感激之情回顾过去那些复杂、紧张且不无内在危险的岁月，感谢命运引导我走过了我所走的道路。相比之下，其他一切事情，不管是烦恼还是障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无关宏旨。……

1903年9月19日

**玛丽安妮：**我们回顾过去充满着爱、经历了共同成长而又命运多舛的十年。假如过去五年里我们没有如此不可分割地相依为命，也许我们的共同生活就不会如此深刻，如此丰富。我常常感觉，似乎命运让我们流落到一个孤岛上，在那里，生物界其他所有的声音都被永不停息的汹涌浪涛淹没了。我们的朋友，甚至最亲近的人对我们又能有何帮助！我们必须自己承受，独自抵抗。我相信，假如不是这样，也许我们就不能这样如胶似漆地生活在一起，在其他夫妻中这样的不解之缘也许不太常见。这样的关系是我生活中的希望之一，是我最大的希望。当然，我绝对没有想到必须以你的疾患为代价来满足这种愿望，也觉得绝对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们的爱情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的意志也去接受这样一种命运的考验。这没有使我们变得渺小和可怜，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怀着希望、期待以及我们的爱情来承受这样的命运。

281

## 2

韦伯的大脑对自己的身体这个叛逆的臣民控制起来还很困难。目前他一次只能连续工作几个星期，然后做一次短暂的旅行以摆脱无法工作那段时期的沮丧。1903年，这

种旅行有不下六次。1903年年初玛丽安妮等去里维埃拉见了韦伯，三月和四月是在意大利与他相见。他六月去了斯赫维宁根（Scheveningen），八月到奥斯坦德（Ostende），九月前往汉堡和赫耳果兰岛，十月再到荷兰。新鲜的东西总能给他带来自由，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是已经熟悉的东西无法做到的。夏天待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韦伯大约感觉没有平时那么精疲力竭，他不仅沉溺于新的感受，而且感觉需要把他的见闻和经历用文字简要地记录下来。他以这样的方式汲取的东西，几乎都在他的著述中留下了痕迹。汹涌澎湃的大海，被暴风雨击打着或者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大海，海牙（Haag）那静静地沉浸在梦幻中的珍珠母光泽和这里辉煌的艺术作品，这一切都让他的心灵沉浸在美的永恒之中。不过，人们富于变化的行为也同样让他着迷。住在社会主义者开办的奥斯坦德“人民旅馆”里，韦伯得以与通常难以接触到的各色人等——包括工人、手工业者和商人——近距离接触。他观察他们时不带有任何学者的傲慢，毫不费力地与他们交往，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并了解了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韦伯几乎每天从瓦塞康特（Wasserkante）来信，他这样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有这种需要：

我写这么多信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我知道，我离家在外时，你仍然感到有些不适应。日后等你习惯了，在你丈夫离开时在他身后伸伸舌头，那时你也就不会感到如此不适应了。其次，一个变得迂腐的书呆子已经忘记了如何作直观的感受，只会通过讨论和阐释的方式来把握自己所获得的印象，所以若不以某种方式用语言表达出来，他就不能享受他变得迟钝僵化的脑子还允许他享受的艺术和自然。我十分羡慕那些在这方面比我强的人，这尤其是因为**任何形式的陪伴**（只有少数几个人属例外）都会败坏我的兴致。所以，当我的小媳妇不在身边时，我就只能自言自语，就像中国和印度戏剧里的人物，以独白的方式向自己和观众讲清楚剧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82

韦伯书信中的几个段落可以说明他在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是如何经历的：

我装了一肚子的茶水、香肠、奶酪、一个水果、一个蛋卷、一个甜卷和一块蜂蜜蛋糕之后，美美地睡了一觉，状态还不错。如果到海边的饭馆吃饭，这里的生活开销要比博尔库姆岛（Borkum）差不多高1.5倍，在这里花一荷兰盾<sup>①</sup>相当于在那里花一马克。不过现在我总是（就像昨天晚上一样）花10分钱<sup>②</sup>去海牙，我在那

① 现在1荷兰盾约为3.7916元人民币。——译者注

② 1荷兰盾=100分。——译者注

里发现了一个上佳的素食馆，就是各个城市里当地素食主义者协会开办的那种餐馆：不提供酒水，不收小费。花 50 分到 60 分你吃到的是芦笋、大黄和甜橙，这帮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骗取他们难以糊口的工资的……

斯赫维宁根以它自己的方式显得壮观，其海滨设施的豪华程度无疑是最上乘的。在一座远远地伸进海中的建筑上（里面有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演出杂耍、音乐及舞蹈的剧院），坐在外面，吹着强劲的海风，放眼无边无际、布满沙丘的海滩，望着夜晚灯火通明的海滨，加上渔火点点，真是美不胜收。沙丘后面有数以千计的供出租的三层小楼房，都是投机性的风险项目。还有浓密而美丽的斯赫维宁根树林，乘有轨马车 10 分钟就可以到达。不过，这里的人对金钱的追逐丝毫不亚于那不勒斯人。

这里到海牙毕竟得花 20 分钟到 25 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住在海牙，也许你有时候就下不了决心到这里来，要不然我倒是宁愿住在城里。这个城市静得出奇，一切都很小巧，博物馆、公共建筑等都是三层楼房。初来乍到的人会觉得自已必须得小心翼翼，不要碰倒或踩坏什么东西——就像从巨人国回来的格列佛（Gulliver）一样。我们的巨人国就是那些庞大的公寓楼，这儿极少见。这里有美丽宁静的池塘，天鹅戏水池中，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菩提树、山毛榉或者栗树。这里洁净如洗：今天他们正在刷洗房屋外面，但凡够得着的地方都得打扫。这一切都具有使人平心静气的效用。

1903 年 6 月 6 日于斯赫维宁根

海牙的一切都具有旧式的资产阶级情调，一切都光洁明亮，人人日子都过得不错，极不雅致，穿着俗气。最恶心的就是女人们穿的民族服装：整个头顶和后脑勺都被塞进了古老的荷兰白色头巾中，看起来就像蜘蛛的后半身。头巾的前面用两个大别针别在非常整齐地分开的头发上，别针上有稍稍弯曲的镀金的金属商标，看起来像蜗牛的两只触角。女人们走起路来步态极其懒散拖沓。男人们则是长着水手面孔的乡巴佬，就好像他们在大海上面对着凛冽的东北风吹了 30 年似的。现在天空一直是灰蒙蒙的，使得风景和城市显得有些萧索。要是太阳出来，这里一定是令人快乐的。

1903 年 6 月 7 日

海牙的美术馆规模小有它的好处，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你喜欢的东西。迄今为止我发现的最美的艺术品是伦勃朗（Rembrandt）的（弹竖琴的）《扫罗王与大卫》（*Saul and David*）。国王在画的上方，被画成了一个衣着毫无品位的苏丹人，

大卫被画成了一个熟食店里真正的“时髦人物”——以这样的方式来画两个显而易见的犹太人，让观者只注意到人物和色彩感染力，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弹琴者的全神贯注令人直接联想到乔尔乔内（Giorgione）的《田园合奏》（*Konzert*）的表达方式：画中仅能见到的国王的一只眼睛（他正在擦拭眼泪，将面部其余部分挡住了）以恐怖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是多么渴望在竖琴的音乐之中忘掉自己的颓势，而这种渴望却未能如愿以偿。这幅画丝毫也不能传达出这种意味。与这幅画相比，其他那些“着意用光”的画都不足挂齿，甚至那幅卓越的《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也表明，这位画家更像是技艺高超的肖像画家和艺匠，而不是像这幅画所要表明的，他是一个富有情感的艺术家的。

284

1903年6月8日

我忍不住买了一幅伦勃朗那幅画作的复制品，尽管只有对见过原作的人它才能传达出这幅画的内涵。国王的那只眼睛在原作中的效果更为强烈。伦勃朗作这幅画时，正是在他失去了妻子萨斯奇雅（Saskia）并丧失了财产和画作宣告破产的时刻，但同时也是他的艺术才能达到顶峰的时期，是他孤独地同儿子以及忠诚的亨德里姬亚（Hendrikkia）一起住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感到自己老之将至的时期。

昨天这里有一场风暴从北方强势袭来。沙丘细软的沙粒被风暴卷着越过海滩，刮进了所有的大街小巷；桅杆和灯塔笼罩在蓝色的雾霭之中，海面上漂浮着一层白色的雾气，阳光穿透雾气，就像穿透一层乳白色的玻璃，将绿黄色的光洒向单调而灰蒙蒙的浩瀚大海。如果撇开飞扬的尘土不计，这一派景色还是非常美丽的。今天，风从陆地吹向海洋，天空在这里就算是极蓝的了。若非在盛夏，这里总有雾霭，使阳光照耀下的树林和绿荫覆盖的城区即使在大白天也有一种梦幻般的黄昏感觉。唯有人们显得极为清醒的样子和他们极端注重现世生活的举止可以消除这种情调。

1903年6月9日

食物相当不错，而且非常丰盛：他们要节省的只是桌布、餐巾和毛巾而已。除此之外，一切都相当干净，4.5法郎的食宿费（包括啤酒）确实很值。与我同桌就餐的全是从各个国家和地区（英国、荷兰、比利时、威斯特法伦和奥地利）来的德国人：有的受过一点古典教育，有的则完全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他们都是些商人和编辑；此外也有从比利时来的弗莱芒工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都很得体，至少不亚于艾伯湖畔的那些游阿尔卑斯山的德国游客。这里的多数人都很客气，不那么傲慢

自大。他们的交谈多是些平常的话题，但无拘无束……

1903年8月21日于奥斯坦德（人民旅馆）

285 我的伙伴都是些很善良的人，他们连一只猫都不会伤害，更不用说一位王侯了。这些人极有礼貌和教养，远比在海外常见的德国人强。在这里，在异国他乡，让人体验到一种特别的民族气息——与瓦隆人和法国人有严格的区别。谈到**妇女**，他们持有绝对的父权制观点。关于夫妻**忠诚**问题的讨论很有趣：妻子的权利被认为是拥有男人的身体，也就是拥有男人的身体功能。至于妻子（根据“天赋的权利”）对男人的身体是否享有绝对的垄断权，或者她是否可以接受，只要男人（在旅行中）没有把自己的身子弄得**疲弱**，没有因此“弱化”她的权利（非常粗俗的玩笑），他们就可以随便使用自己的身体对于这些问题，他们的看法则见仁见智。已婚男人赞成比较严格的观点。

1903年8月23日

昨天我和伙伴中一个很可爱的人作了一次长谈，他是来自巴黎的一个专门缝制订做男装的裁缝师（裁剪师）。从伦敦来的另外两个同伴——一个裁缝，一个鞋匠——总令我不禁想起了上了年纪的吕梅林（Rümelin）将人们划分成鞋匠和裁缝两类的分类。（你还记得在弗赖堡时我们是如何这样来划分人群的吗？）这种分类法在这里也正合适。我现在一天只花4法郎，中午有三菜一汤，晚上有热餐肉食和甜点，房间大而且便利。有时候人们确实用餐刀吃饭，不过除此之外，就像我所说过的，他们**非常**有教养：他们散步的时候和我一样都很优雅，而且要比**我**——在我穿着我们的裁缝西斯托老爹（Papa Sisto）的艺术作品时——优雅得多。

1903年8月24日

昨天我的窗前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红旗，响彻着“工人马赛曲”等等，震天动地。布鲁塞尔（Brüssel）工会音乐协会的人挤满了这栋房子。顺便提一下，他们的业余演奏极为出色，还被邀请在疗养院大厅里演出。在同人们的交谈中你可以了解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关于巴黎缝制定做女装的裁剪问题等。很奇怪的是，**所有**最好的生意和店铺都掌握在德国人（奥地利人）手中，**几乎**所有的熟练工人都是德国人。同样，**伦敦**专门定做鞋的商店里那些技艺高超的制鞋人（工人）也半数是德国人。关于后者，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英国工人的妻子既酗酒又不善持家，而且在生活中挥霍浪费，所以她们的孩子必须过早地跟着赚钱，不能学到一点正经的手艺，因而只能进工厂干活儿。……今天我这里的巴黎小裁缝带着我的旅行指南和一



本关于布鲁日（Brügge）的书去了那个城市游览。我相信，在这里的防波堤上所能看到的那些炫耀者，十之八九不会觉得值得这么去做。一天只花4法郎的食宿费，我现在被看作他们的“伙伴”，尽管他们当然知道，我并非他们的“伙伴”，也知道我是谁。

1903年8月25日

昨天我认识了安赛尔（Anseele），他是比利时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之一，是该党最杰出的组织者。他带着300个系着红色小领结、帽子上插着红色羽毛的孩子来到这里。该党每年都为孩子们置办装束，送他们去瑞士或者去海边度假旅游。晚上他们唱起了最可爱的歌曲。这些人身上洋溢着巨大的激情。你问到女人的问题，这里也有一些女人，但都无足轻重。法国人对她们很客气，德国人对她们则带有父权思想。我这些同伴们对女性投票权等问题没有兴趣。

1903年8月28日

“同伴们”显然都乐意与我在一起，非常真诚地与我道别。当然，他们在与人交往时绝对平等相待，因为他们虽然对“学问”几乎是迷信般地膜拜，但觉得做“教授”的人不过是父母有钱，让他们去学了点什么东西而已。另外，就智力而论，他们的平均水平并不低于我那些同事的平均水平。同我一起乘车到米德尔堡（Middelburg）的一个来自多特蒙德（Dortmund）的讼棍，以前是个屠夫的伙计，他就是一个极聪明的家伙。

1903年8月29日于多姆堡（Domburg）

我今天出去散步，走了很长时间，在沙丘后面茂密的橡树林里你可以走好几个小时。散步是很不错，不过弄得我有些疲乏。这里很美，古老的菩提树和橡树透过窗户窥视着房间里的一切，窃窃私语；沙丘后面咆哮的大海在索要着在产权上早就属于她的土地。

1903年8月31日于多姆堡

当阳光偶尔穿透云层时，秋天的大海也很美，披上了一层灰白的褐色，像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树木还没怎么染上秋色，草地现在大都浸泡在水中，无数大大小小的风车正在把水抽进运河里去，像聋哑人一般在空中“喋喋不休”地打着手势，感到自己颇为重要，不可或缺。今天真是出奇地美：气候温暖，海风劲吹，海浪汹涌澎湃。海滩被密集的沙尘笼罩着，这些沙尘吹进了离海滩很远的大街，拍打在人

的脸上，弄得人脸像煮熟的虾一样红红的，着实生痛。人们躺在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玄武岩防波堤黑色的岩石上，在那里任由细细的水雾淹没。

1903年10月13日于斯赫维宁根

这里让我们添加一点韦伯后来在荷兰逗留时的印象记略：

一切依旧。天空灰暗，下了点儿雨，相当暖和。我坐在海滩的沙滩躺椅中，吃着奶酪、水果和点心，懒洋洋地躺着舒展四肢，读点梅特林克（Maeterlink），如他的《卑微者的财富》（*Der Schatz der Armen*）。回头我把这本书寄给你。眼下我只能等待，看看神经是否正在开始松弛下来。这也许不太容易，因为风有点太大了。夜间睡眠的时间还凑合（服用了大量的溴化钾镇静剂），质量不是太好。晚上人们在屋外和隔壁聊天聊到很晚，房东一家的举止则非常有礼貌，他们与我仅有一扇玻璃门之隔，这扇门几乎有这个房间的一堵墙那么宽。早上，挂在我床上方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从7点开始就怯生生地啁啾，祈求着外面的光线。等我把窗帘一拉开，它便心满意足地、欢快地鸣啭起来。厕所在屋外露天地里，去那里要穿过厨房，考虑到老渔夫高大的身躯，这个办事儿的地方小得简直不可思议。

1907年7月27日于斯赫维宁根

288 为你庆生，我昨天乘坐一艘非常漂亮的汽船从阿姆斯特丹前往阿尔克马尔（Alkmaar）。我在“荷兰北方大运河”（Noord Hollandsche Canaal）上待了三个小时，起初看到的是两岸无数的小房屋（鳞次栉比，绵延数里，这些房屋都有袖珍型的花园，袖珍型的窗台上放着花）、静静的小运河、游廊、袖珍的船，然后通过船闸进入了广阔无垠的荷兰北部牧场。放眼望去，一片黄绿色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其中例外是无数的风车，其中有的是用来昼夜不停地抽地面上的水，这些地面不仅低于海平面，甚至低于护堤中的运河。另一个例外是在绿荫掩映中那些富有浪漫情调的单家独户的漂亮农家院落，树木保护着农舍，抵御着强风可怕的暴力。两天前我从自己钟爱的莱顿（Leiden）——因为那里的图书馆关闭——乘汽船去了卡德威克（Kadwijk），想要逐渐了解所有的海滨浴场。

返程途中参观了位于来因斯堡（Schijnsburg）<sup>①</sup>的斯宾诺莎（Spinoza）故居。故居有两个小房间，每间大小同我们的盥洗室差不多。其中一间稍大，另一间是复

<sup>①</sup> “Schijnsburg” 应为 “Rijnsburg”。韦伯信中的荷兰文拼写不时有误，英译本逐一做了纠正。——译者注

式阁楼房间。它们是一个微型住房的两间，像在别的地方一样，这类微型房屋在这个城市也大都建在运河两岸浓密的绿荫之中。这个地方很迷人。昨天我还去参观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居住区的伦勃朗故居。我在莱顿的素食旅店住了一夜，这个旅店有些旧式旅店的感觉，带一个大洗澡间，价格着实便宜。

1907年8月3日于湖畔的埃格蒙德（Egmond am See）

最近几天我还要去游览几次荷兰北部，以求真正了解这个美丽的小国。这里有一种奇特的宁静，历史似乎在这里沉睡着。很多东西仍然跟阿尔特·范·德·内尔（Jan van der Neer）三百年前画的差不多：风车、小砖房、运河、树丛，还有那一望无际的青青牧场在暮色苍茫中散发出香气。

1907年8月10日于埃格蒙德

今天乘马车去了阿尔克马尔——一个运河穿流过的很有魅力的小城市。城里有碧绿的市内通航运河、微型房屋、一座像画一般的教堂和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市立物品重量检验处。然后我又去了贝姆斯特（Beemster）的圩田，这是奥登巴内佛（Oldenbarnevelts）在17世纪初开拓的，长宽各为5英里，低于海平面6米，以前用50座风车，现在只用3部蒸汽发动机不停地将地里的水抽干。这是一片极其肥沃的草原，牛在这里是造物的主宰。现在我又要乘车去须德海（Zuidersee）古老的海滨小城霍恩（Hoorn）参加一个教会的仪式，晚上回来。

1907年8月12日于尼德尔-贝姆斯特

这个岛像一个扁平的盘子一样漂浮在须德海上。小小的房屋都挤在沙洲上，小运河四通八达，将各处连接在一起。房子里面刚粉刷一新，四面墙上装饰着彩色的陶盘，床架像抽屉一样镶嵌在墙里。到处是水和草地。女人淡黄色的头发像稻草一样干枯，从紧扣在头上的头罩的前端和旁边支棱着伸出来。她们身穿色彩鲜艳的紧身胸衣，男人们穿的则是不成形的灯笼裤。

289

1907年8月20日于马肯（Marken）

# 3

可是在家里，在日常生活中，难道就没有一股清新的风吹来，为韦伯张满风帆，助

他开始新的航程吗？家人设想了种种计划。海伦妮很想给孩子们在内卡河畔买一栋绿荫中的漂亮住宅，给他们在海德堡的生活带来一些光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热忱地关注着这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直到它因价格问题破碎成了水雾。鉴于韦伯需要改变环境，他也不愿被拴在一个固定的住处。大约就在这时（1903年），弗里德里希·瑙曼在选举中第二次失利，之后他解散了民族社会党。朋友们有没有可能一起在新的基础上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如说，创办一份政治期刊或者参加某个现有期刊的编辑工作呢？可是韦伯对亲友们这方面的提议作了下述答复：

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就越是觉得，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失败之后，要创办一份新的政治期刊不管是从内在还是外在条件上讲都同样不可能。让我参与此事根本不行。我如何担负得起这个责任呢？现在要让我不断去同这些深深触动我心灵的政治问题打交道，我的身体最多只能支撑几个月。更为重要的考虑是，如果想在政治问题上不弄砸，需要绝对冷静的头脑，而我现在根本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决定同佐姆巴特一起参加布劳恩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如果雅菲 [Edgar) Jaffé] 买下这家刊物的话——编辑部。出版人似乎希望看到这样的组合。因为我正好在这里，即使我工作精力有限，也可以帮帮雅菲。

1903年7月17日

所以，韦伯觉得自己不能承受参与政治活动带来的刺激。然而，他却考虑了年轻的同事和朋友埃德加·雅菲的一项提议，雅菲大约在这段时间与埃尔泽·冯·里希特霍芬结了婚。雅菲打算买下海因里希·布劳恩的学术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并争取佐姆巴特和韦伯一起来当编辑。雅菲这样做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善意的想法，那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方式让韦伯发挥作用。韦伯确实可以大胆尝试这件事情。起初，韦伯在这件事情上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我能不能参与，这还确实是个问题。我不愿让别人干工作，用我的名字去招摇，然而我又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地做一定数量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方式，让我也有可能正式参与进去。就工作的内容而言，我或许可以尽力而为，也就是说，只为这份杂志写稿……”

韦伯知道，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倾注学术热忱。他不能忍受只在那里装点门面，而让别人在后面做实际工作：“只是时而做个顾问的事我是不干的。”此外，他容易激动，当遇到他的意愿不可避免地受到别人的意愿钳制的时候，他不容易保持冷静。然而，朋友们让他消除了这些顾虑。这个时期的工作也好像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因为它需要的不是一个评头论足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超然于只提出赞成和反对意见的思想家。这项工作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这给他仍然不稳定的精力的起伏波动提供了灵活变通的

余地。

现在他又重新与一大批学者和关心社会问题的政治家建立了联系。他开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寻求新的撰稿人，留住以前的撰稿人，并奉送多种多样的约稿建议。编辑们并没有局限于向自己那个领域的同行索稿，他们也把眼光放到了相关领域的学者身上。韦伯为改版后的杂志首期拟写的引言指出，为了拓展以前的刊载范围（即对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状况作学术探索，对立法过程作批判考察），本刊“必须把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历史和理论认识作为自己关注的问题，因而要保持同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这些学科包括一般的政治学、社会伦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通常被统称为社会学的研究”。

上一辈最优秀的学者们渴求弄清楚的是社会现实，随着人们的哲学兴趣普遍地重新觉醒，继之而来的还有人们对社会理论的渴求。尽量满足这种渴求将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既要考虑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来讨论社会问题，也要考虑我们专业领域的、在狭义上被称为‘理论’的研究形式——构建清晰的概念……因此，我们要时刻关注对认识论的批判和对方法论的研究。” 291

由此他们给这份杂志的内容设立了一个广泛的刊载范围，除了社会领域的经验科学及其理论之外，科学哲学和对社会现象的哲学阐释也拥有一席之地。

大约在1903年圣诞节时，韦伯的妻子写道：

今年我们将再次在没有恐惧和担忧的沉重压力下过节，不过也没有过去几年中怀有的微弱希望。总的来说，马克思现在的心情比较轻松，承受冬天的能力比去年好多了（不过，到现在为止，今年冬天一直非常温和），所以我只能赞同他的观点和做法，并感到庆幸，我们至少从外表上看起来已经战胜了告别过去所带来的影响。

韦伯现在感觉有一种要为杂志写东西的义务和冲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波动，他还是很快完成了各项写作计划。1903年夏天，那篇令他自己“唏嘘不已的论文”的第一部分（《罗舍尔和科尼斯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问题》）终于脱稿，发表在《施莫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ücher*）上。1904年年初，他给改版后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首期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se”）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作为在方法论领域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章发表的。“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几近完成，但他现在睡眠相当不足。他又开始每天晚上吃一块卡门贝软质乳酪，需要服用安眠药，不过，对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他感到很满足。”（1903年1月30日）

292

歇息了一段时间之后，马克斯开始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第二期撰写另一篇文章，又回到了他以前所关注的农业政策问题和具体的立法问题——《从农业统计和社会政策的观点看普鲁士信托遗赠问题》（“Agrarstatistische und sozial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zur Fideikommißfrage in Preußen”）：“马克斯休息了几天之后又开始非常勤奋起来，对各种各样的农业统计资料做了大量的计算，我必须不断提醒他别连续工作时间太长。他现在又能比我工作更长时间了。”这篇论文发表于初夏。同时他还在准备一部更为重要的著述，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的秋季号上。这样，韦伯在1904年的9个月中成功地完成了属于不同领域的三篇重量级的论文，此外还做了一次重要讲演，关于这次讲演后面马上会谈到。

一年之前还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压力渐渐消失了——透过漂浮的云层，人们不时可以看到一片天空，在这片天空中那颗富有创造力的星辰又开始闪烁发光了。

## 4

1904年盛夏，又一次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工作间隙，不过这次是因为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前弗赖堡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哈佛大学做了多年教授的明斯特贝格（Münsterberg）借圣路易斯（St. Louis）世界博览会之机，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世界学术大会。他此举的主旨在于编织一条美国与德国之间的精神纽带。各个领域的德国学者都得到了邀请，包括韦伯和他在海德堡的朋友，如特勒尔奇、亨泽尔和其他一些人。每个人都要在圣路易斯做一个学术报告，酬金相当可观。对新大陆的憧憬对韦伯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于是他克服了一切阻碍和疑虑，决定偕妻子花几个月时间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293

单是这个打算和计划就像吹来了一股清风。韦伯夫妇于8月底登船启程，与他们做伴的有恩斯特·特勒尔奇，他说话妙趣横生，十分幽默。悠闲的航程为他们，尤其为韦伯接受新感受做了适宜的准备。浩瀚的大洋里蔚蓝色的海浪热情地摇着他进入梦乡，而他平时是很难入睡的。他深深地呼吸着大海的空气，享受着令人轻松的悠闲自在；观赏着白云、波涛和海风追逐嬉戏，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总给他带来新鲜的印象。在这座浮动的城市里，精微的技术懂得怎样满足人们的一切舒适之需。微咸的空气宜人清新，的确让他心情舒畅。丰富可口的食物又唤醒了他身上那个“快乐的食客”。他不晕船，所以也没有因此而感到扫兴，可担忧的至多不过是玛丽安妮担心他身体发胖而已。她在旅行途中给海伦妮写信说：

我们三人都没有晕船。不过，我们注意到特勒尔奇有点禁欲苦行的倾向。只有马克斯每天都高高兴兴地把菜单上的食物通吃一遍。我无可奈何，只好眼看着他好看的身材消失了。他的情况确实不错，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标志之一就是他从不下时长惊人的晚餐，而且餐后通常还喜欢去吸烟室聊天。在那里，我常常跟一位和蔼的政府枢密顾问官和几个高级工程师聚在舒适的一隅。总的来讲，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像远航那样是专为无所事事的人设计的，绝对让人心满意足，完全无须用脑。人们都变成了破折号或者浑身上下只有消化器官的水母。不过马克斯也时常传播几条社会政策原理，为这几位善良的人提供一些“观点”，从中我一再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斯不仅惊人地博学，而且还能将他所有的学识传授给别人，让人能够理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教师。

九月的一个清晨，他们的航船驶入了纽约港。这是何等美妙的一幕！摩天大楼耸入蓝天，身上泛着铜绿的自由女神像伸开恢宏的手臂，高擎着光芒四射的火炬，每天都向成千上万可怜的到达者——在欧洲受压迫的阶级和种族——致意，带给他们希望——一个由冒险精神和获得幸福的机会所铸成的未来。韦伯几乎等不及办登岸手续和海关检查。从船上下来后，他便大步流星地往前冲，把同行的人都甩在后面，就像一只获得自由的雄鹰，终于可以扇动它的翅膀了。

他们随即前往位于曼哈顿岛商业区的一栋21层的饭店。在曼哈顿，“傲慢”的住宅大厦鳞次栉比，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创造出了它最为鲜明的象征。这里的大街上车水马龙，马车喧腾着疾驰而过，你几乎可以闻到干燥的马粪味儿。我的上帝，这跟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多么不同啊！一切都让你感到令人震惊地陌生：这是那些商务旅行者的大军营，里面冷漠无情，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号码而已。电梯将他们载到像教堂尖顶那么高的地方，带进一个房间里，房间的特色是空空荡荡，有一部电话和两个巨大无比的痰盂。从窗外望出去，让人感到战栗和眩晕：街道躺在深渊底层，对面那些30多层的大厦在取笑着它们矮小的同伴！住在里边的人不就像是被关在一个与可爱的大地隔绝的监狱塔楼里吗？毫无疑问，一个人在这里面无论是患病还是死亡，都没有人会不在乎！

陷入这样一种冷漠、缺乏人情味儿的住宿处（这对德国人定义中的安逸舒适不啻为一种嘲弄），大多数新到这里的德国人开始时都感到极不舒服。外面的喧嚣嘈杂让人无法持有一种享受的态度，而且韦伯一行的工作与这种喧嚣嘈杂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更让他们感到怅然若失。韦伯的同事中有几位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神经功能障碍，但他却没有受到这种干扰：“此外，马克斯的身体自患病以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尤其是在走动方面。”对新世界的强烈兴趣让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这里缺乏他习以为常的舒适

的生活。如果有人对此大惊小怪，他会感到生气。他想要欣赏和理解一切，汲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只有当他感到无聊或者觉得无谓地浪费了时间的时候，这头狮子才暗地里在自己的笼子里发怒，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让他忍住怒火不喷发出来。例如，那次他乘有轨电车在纽约转了好几个钟头，这是在一位好客的美国同事保护性拘留似的陪同下进行的，在车上除了楼房的底部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除此之外，他起初总是拒绝所有那些因为自己不熟悉而对新事物所做的批评。他站在新事物的一面，为了对新事物公平，他仿佛要移情其中。到纽约三天以后，玛丽安妮写道：

当然，对于应当怎样看待世界上这片有 500 万人密集聚居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至少我还没有）：它到底是伟大，是了不起，还是粗俗、丑陋和野蛮？最明显地感到兴奋的莫过于马克斯，他在旅行的时候总是如此。由于他的气质，也许还由于他渊博的知识和浓厚的学术兴趣，他开始时总觉得从根本上来讲一切都很美，都比德国要强。后来他才开始进行批评。

295

对此，韦伯说：“我倒谈不上特别‘兴奋’，只是对于同行的德国同事感到生气，他们刚到纽约才一天半就开始抱怨美国。”

他给海伦妮的长信保存了他所有重要的印象，下面几段摘引最能表现韦伯接受事物的方式。

在纽约我最强烈的印象一个是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另一个是布鲁克林的大墓地——去墓地需乘高架火车过桥。桥上的对比令人难以置信。布鲁克林大桥上，中间有一条凸起的人行道。傍晚 6 点从人行道上走过时，两旁每隔 25 分钟就有一辆高架火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再靠外边的两侧就是有轨电车道，相距不过几米远，车上挤得爆满，有些人拉着扶手吊挂在车身两旁。呼啸声和吱吱声不绝于耳，隆隆行进火车声中夹杂着桥下很深处大型轮渡的汽笛鸣叫。此外还可以看到位于曼哈顿岛（纽约城就位在这个岛上）南端那个资本堡垒的雄姿。放眼望去只见高楼林立，就像在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的旧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到处缭绕着运货升降机吐出的淡淡的蒸汽云雾。这的确是一种独特的感受，尤其是再加上宽阔的外港、自由女神像和远处大海的景观，感受就更为独特。我并不认为那些“摩天大楼”“丑陋”：把我们那些外观单调无味的简陋出租公寓叠加 10 倍也就是那个样子，给人的印象就像一块有道道纹理的岩石，石上有一个贼窝。这肯定谈不上“美”，但也不能说它是“美”的反面，毋宁说它在美丑的彼岸。如果你离得稍远一点看，它是此地现实生活的象征，我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为恰当的象征了。



人所创造的东西那么伟大，而人本身却显得那么渺小！傍晚，空前的人流从商业区涌向大桥，让人感到震撼：对个体心灵的无限价值和対不朽的信仰都变得荒诞不经了。

关于这个人群的家庭生活，韦伯一行起初并没有看到多少。只有在一大片住宅区里的一小栋独户住宅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它的简约清雅同那个商业世界的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里的所见让他们有回到家中之感。这是一个美国教授宁静的小书斋：“我从长烟斗吐出一口烟来，就能让整个房间暗黑好半天。”

296

在这个巨大的人群中，任何一点个人主义的冲动都价格不菲，不管是住还是吃，都是如此。哥伦比亚大学德国语言文学教授赫维（Hervay）的住宅也不例外，那真的小得跟玩具房屋似的。房间一丁点儿大，盥洗、沐浴和如厕都在同一个房间里（这里几乎都这样），不可能招待多于四个以上的来客（令人羡慕！）；去市心路上得花一个小时。他们客气得几乎有些过头，他和太太都酷爱“德国”习俗。关于他的太太，我想玛丽安妮会告诉你。至于他，他自豪地告诉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德语系每年要举行两次“德语学生聚会”，内容包括击剑、唱歌和大口喝从啤酒桶直接放出来的啤酒，参加者有八名德语系教师，有研究生和本科生（一年级新生除外）。然后，他又（以他惯常的风格）告诉我们，把啤酒搬进美国大学的教学楼，这还是第一次。在这里，人们竟把向学生介绍德国文化“精神”看得如此严肃。

这次韦伯夫妇在纽约只待几天，他们打算旅行结束时再来多待一些时间。他们先是沿着树木茂密的哈德逊河（Hudson River）两岸向西去尼亚加拉（Niagara）大瀑布。到处你都可以发现“世界之最”，这话果然不假：人的创造所具有的规模不过是对空前辽阔、近乎硕大无朋的大自然的恰当表达。这里的这条壮丽的河流如此宽广，以至于你只能依稀望见遥远的对岸。然后映入眼帘的是几乎还未经任何人工雕琢的广袤的大草原，接下来便是瀑布奇观——它不是在一个浪漫的岩石峡谷中色彩斑斓地闪烁着的可爱的水花飞溅，而仿佛是被缚的大洋从牢笼中挣脱出来，发狂似的纵身跳进深渊。韦伯观赏着这极为壮丽的景观，它的轰鸣声令人只有无语的沉默。不过他只用了寥寥几行激情的文字描写这种景观，因为在这里他更为关注的是人类的双手所创造的东西，以及人们怎样生活：

297

我在这里给你写信，特勒尔奇和亨泽尔则去了两大瀑布之间的那个绿岛，那里密集的绿色之中有无数安静的去处，给人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深深的静寂那样一种独特感觉。尽管自然景色（虽然遭到了可耻的损毁）非常美丽壮观，但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前天我们去参观的工业小城北托纳旺达（Nord-Tonawanda），从这里去半个小时就可到达。在那里我们拜访了豪普特（Haupt）牧师，他是哈勒（Halle）大学

康拉德（Konrad）教授的女婿。

旅行者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因与纽约形成对比而令人惊讶的小城市，尤其是他们在这里一天之内能够从美籍德国人那里了解到的美国人的生活特征，要比通常也许得花好几个星期才能了解到的还要多。

仅仅是这个小城市的外观就同纽约的摩天大楼形成了极为独特的鲜明对照。这里全是一两层的小木屋，排列在用木板斜交着建成的人行道边上。每家都有廊虎、鲜花和小院子，沿街种着树，外表上看起来这家人友善和朴实，里面非常狭小。这些房屋就像服装一样，先在大型锯木厂和工厂里预制好，然后运到这里拼装。房屋大小不一，当然房间的格局都差不多，售价在1 000~3 000美元之间。房间非常小，6个人加上桌椅几乎就得把最大的房间给撑破，伸手就能够着天花板。用漂亮的美国硬木镶板和门框以及单色的墙纸装饰起来的房间让人感觉很舒适。厨房总靠着餐室，厕所、盥洗池（大家共用一个）和浴缸紧紧地挤在同一个房间里，窗户都非常小。牧师的住房也比其他房子大不了多少，它紧挨着木质结构的小教堂，教堂（带有厨房和餐室，以备经常举行的会众节庆活动之用）里布置得令人非常愉快和舒适。

298 韦伯他们在这里还了解到了社会特权阶层内部生活态度的反差。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知识分子俭朴知足而又负担沉重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没有国家的资助，工资靠工人社区自愿捐助，就这样维持着一种文化生活。家里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大多没有雇人帮忙做家务，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做饭、打扫卫生、洗涤和缝制所有的衣服，丈夫帮着做各种各样的重活儿。可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很活跃。韦伯一行惊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国家将来也会迫使知识分子阶层长期以这种方式生活。

下一站是芝加哥（Chikago），这个巨型城市比纽约更能集中体现美国精神。韦伯一行在这里看到了更加鲜明的对照：好摆阔气的新富在用大理石和黄铜建造的豪华建筑里自我炫耀；在昏暗模糊的窗玻璃里，在望不到尽头的凄凉大街上，那些肮脏而黑暗的房屋走廊里凝固着破败和贫穷；包括所有的种族，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混杂在一起的人群总在不停地忙碌着；人们一刻不停地追逐着金钱；对人力的挥霍滥用每天都在漫不经心地对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造成威胁；没完没了的建造和拆除，被挖得乱糟糟的大街到处污秽不堪，一切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喊，震耳欲聋；浓密的烟雾笼罩了一切，给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草茎都染上了一抹黑色。蓝色的天空、金色的阳光和星辰的银辉都难得一见。韦伯写道：

芝加哥是最不可思议的城市之一。湖畔有几个舒适美丽的别墅区，房屋大多是用石头建造的，建筑风格显得非常笨重和压抑。紧靠后面的是老旧的小木屋，跟赫耳果兰岛上的那种一模一样。再往后就是工人居住的廉价公寓，污秽不堪的街道路面没有铺砌过，别墅区外的公路也修得很糟糕。城里的摩天大楼之间的大街上的状况也让人毛骨悚然。这里的人烧烟煤。当干燥的热风从西南的沙漠刮过大街时，特别是当深黄色的太阳落山时，这个城市看上去有些怪异。在晴朗的大白天里，你也只能看出三条街远。一切都笼罩在阴霾和烟雾之中，整个湖面都被一片连天的紫色烟幕遮盖住了，小汽船从烟幕中突然出现，离去的船帆很快便消失在烟幕之中。

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人际荒漠。经霍尔斯特德大街（Halsted Street）（我想这条街足有20英里长）出城，就上了望不到尽头的路途，经过一些有希腊字[如“Xenodochien”（旅馆）]招牌的街区，然后经过一些有中国小酒馆、波兰广告和德国啤酒吧的街区，最后就可到达屠宰场（Stock yards）。从阿莫尔公司（Armour u. Co.）的钟楼望去，看到的无非是畜群和看不到头的粪便，听到的无非是牲畜不绝于耳的叫声。不过，在四周的地平线上（这座城市绵延数英里，直到消失在许许多多的郊区中），可以看到教堂、小礼拜堂、备有起吊设备的粮仓、冒着烟的烟囱（这里每一个大饭店都有自己的蒸汽升降机）和各式各样的房屋。它们大多都很小，每栋最多住两家人（因此城市面积巨大）。房屋的清洁程度因房主的民族性而各不相同。

299

屠宰场里曾发生过大乱：有过一场失败的罢工，很多意大利人和黑人被认为是罢工的破坏者。每天都有枪击发生，双方的死亡人数达数十人；因为一个乘客是“非工会成员”，一辆有轨电车被推翻，十几名妇女被压死；高架铁路受到了被炸的威胁，有一节车厢确实脱轨掉进了河里。紧靠着我们住的旅馆，一个卖雪茄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离这里几条街的地方，三个黑人黄昏时分抢劫了一辆电车，如此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怪异的文化繁荣。

这里有疯狂的民族大杂烩：希腊人在大街小巷给美国佬擦皮靴，一次5美分；德国人在美国人的餐厅酒店里做服务员，爱尔兰人负责他们的政治，意大利人做的则是最脏的掘土工作。除了别墅区外，整个巨大的城市（比伦敦的规模还要大！）就像一个剥了皮的人，你可以看到他的内脏如何运作，因为你什么都可以看到。例如，晚上在城里一条小街上，妓女们被放在有电灯照明的橱窗里，旁边有明码标价！这里和纽约一样，一个独具特色的现象是保存了德国犹太人的文化。剧院里用意第绪语演出《威尼斯商人》（不过，有理的是夏洛克一方）和他们自己的犹太剧作，我们打算到纽约去看。……

不管在哪里，极大的工作强度都很引人注目。最为显著的是那个一片“血海”的屠宰场，那里每天都要宰杀数千头牛和猪。从毫无疑问的牛进入屠宰房（一进来

300

就遭到铁锤猛击而重重地仆倒在地，然后很快被铁钳夹住，吊起来，开始经历屠宰过程）那一瞬间开始，它就处在不停顿的流水作业之中，经过一个个工人的手被摘取内脏、被剥皮等等，这些工人总是（按照工作节奏不同）被束缚在机器上，由机器把宰杀的牛送到他们跟前。在满是蒸汽、粪便、血水和兽皮的环境中，你看到的是十分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效率。我花了50美分让一个小男孩儿带着在这里步履蹒跚地四处观看，因为要小心别栽进那些污秽的东西里去。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头猪怎样从猪圈出来，最后被做成香肠、装进罐头里。

工人们下午5点下班，常常得在路上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家。电车公司已经破产。这家公司多年来——遵循惯例——一直是由一位“破产管理人”在管理，这位管理人并没有兴趣加速资产清理进程，因此也没有购置新车。旧车隔三差五就出问题。每年都有400人在事故中丧生或致残。依照法律，公司赔偿每个死者5000美元（付给死者的配偶或者继承人），赔偿每个受伤者10000美元（付给受伤的人，如果公司没有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的话）。公司计算过了，400笔赔偿费要比落实要求的预防措施花钱少，因此也就不采取这些措施了。

韦伯夫妇感觉，自己似乎到了这里才从半睡眠的梦境中被摇醒：“瞧，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现实。”可是在这个冷漠地吞噬一切个体的庞然大物的面孔上，引起震撼的不仅是它雄奇的野性，还有它温柔的特征，如爱的能力、善、正义以及追求美和精神生活的坚韧毅力。广告牌上正好有一则广告宣称：“基督在芝加哥。”这是不是一种无耻的嘲弄呢？不是！这个永恒的圣灵确实也来到了这里。例如，在一位勇敢地坚守自己信仰的女性的工作中，你可以感觉到基督的存在。在一个工人住宅区的那些令人绝望的街道上，简·亚当斯（Jane Adams<sup>①</sup>）创办了著名的睦邻之家（Settlement）。在那里，这位优雅、高尚的温柔女性与大批热情的助手一起，给从世界各地被抛到一起的无产者提供一切他们自己无法为自己提供的东西。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这是一个美、欢乐、精神升华、锻炼身体的所在，是提供关怀和帮助的所在。人们看到、赞赏并相信这位“芝加哥的天使”。

301

此外还有别的一些绿洲——大学，它们是离大城市很远的一些富有魅力的建筑群，坐落在被精心打理过的绿草坪上，在古树的绿荫掩映之中。它们是一些独立的世界，充满了诗意，洋溢着精神生活的青春活力。在这里，生命中一切温柔、美丽和深刻的东西都将被注入这些来自美国广泛社会阶层的年轻人心中。韦伯写道：“当我们回忆青春的时候，这个时期是它的全部魅力所在。丰富的体育活动、颇有吸引力的社交活动、无穷

① 当为“Jane Addams”之误。——参见英译注

无尽的思想启迪和经久不渝的友谊都是这个时期的收获。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的教育远比我们那里重视让学生习惯于工作。”在这里，他立刻发现了让他极为感兴趣的東西：宗教精神在组织方面的能量所留下的清晰痕迹。多数大学最初都为清教各派所建，早年移居美国的清教徒先驱们的某些传统至今仍然依稀可辨。这种传统让年轻人信守贞洁的理想，禁止开淫秽的玩笑，并培养年轻男人对女性要有某种程度的骑士精神，这种骑士精神今天已经不为一般的德国人所了解了。

在费城（Philadelphia）附近的贵格会哈弗福德学院（Quaker-college Haverford）里，宗教精神仍然很浓厚，不过即便在这里也融入了一些其他的思想成分。韦伯为他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述去查了该学院的图书馆，获得了难忘的印象：

即使是这些贵格会教徒，唯一还算得上“正统”的也仅仅是他们不相信一位论。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旧习俗都已经消失了。他们的板球队被认为全美第一，这些顽皮的年轻人非常富有。在一个学生宿舍里，我发现交叉放着的轻剑和一块写着德文“吸烟车厢”字样的标牌，显然是从德国火车上的吸烟车厢里弄来的。

不过，这里的礼拜仍然是独特的。这般的寂静：在完全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祭坛等等）的房间里，听到的只是壁炉中噼啪作响的声音和有意压低的咳嗽声（天气很冷）。终于有对“圣灵感悟”的人站起来讲话，讲的内容听其自便。多数时候，讲话的人是由会众指定的“长者”，或男或女，都坐在稍微高出一点的靠背长椅上。遗憾的是，这次讲话的人不是（如我们所期望的）一位女性（据说一位年逾古稀的女性贵格会教徒是最出色的讲演者），而是学院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一位有能力但有点枯燥乏味的语文学者。他的讲演起初相当乏味，后来则很精彩，将《新约》给基督徒的各种名称从实用的角度作了阐释，准备得很仔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是另一位“长者”的即席祈祷，长时间沉默，然后结束。没有唱歌，没有管风琴演奏。

302

除此之外，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当然只有稳固的组织框架尚存，原初的创造精神已不复存在，这就产生了被韦伯夫妇称为英裔美国人生活中的伪善现象：

如果你看看最早的卫理公会办的芝加哥大学的章程，你会感到难以置信。学生必须参加五分之三的每日礼拜，或者多上一个小时的课以代替三个小时的礼拜。如果他的“礼拜堂出勤记录”（!!）超过要求的时间，将会记入下一个学年，超过多少时间，届时他就可以少参加多少时间。如果“礼拜堂出勤记录”连续两年达不到要求，他就会被开除。然而，这里的“礼拜”颇有些奇特。例如，内容关于哈纳克的《教义史》的课程有时可以计入礼拜时间。最后，下一个赛季的橄榄球、棒球、

板球等的赛程都公布在那里，就像以前德国乡村公布收获时期的工作一样，整个被弄得混乱不堪。很难说眼下人们漠不关心的程度有多深，但这种程度有所加深——尤其因为德国人的原因——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相较于我们的新教，这里的教会团体的权力仍然很大。



他们继续旅行，穿过酷热的大平原前往圣路易斯。在那里他们一行受到了一个德裔美国家庭的热情款待。这一家的主人移民美国时是威斯特法伦一个贫穷的农家孩子，现在通过自我奋斗而变得富裕，但绝不是暴发户。他们都很欣赏他高贵的举止和他的修养，把他视为被民主制度垂青的那种类型的人，这种民主制度既不问一个人的出身，也不问其文凭，而是从根本上为所有具有毅力和能力的人提供了晋升士绅（Kaloikagathoi）阶层的可能性。

303 在博览会非常精彩和包罗万象的巨型展出中，韦伯夫妇尤其喜爱“德国馆”，馆的正面有一只巨大的雄鹰张开着双翅，远远看去就可以让人认出是德国馆来。这里，室内装潢和家具陈设艺术以及整个艺术表现所取得的成就汇聚一处，这是韦伯夫妇前所未见的，而且它们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中也无可匹敌。“德国所有的工艺品都很美，而且它们被非常巧妙地组合成了一个整体，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参展的国家，这是大家都欣然认可的。”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下层一直到其领导阶层都常常十分粗俗，却在造型艺术上达到了完美，堪称西方世界之师！看到这些成就，韦伯可以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而对这个民族的短处，他的洞见中交织着爱和痛楚。

对于玛丽安妮来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安排她丈夫要做的演讲“德国农业状况的过去与现在”（“Deutsche Agrarverhältnisse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你们可以想象，当我看到他六年半以来第一次又站到了聚精会神的听众面前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讲得非常精彩，很平静但非常有力。演讲不管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很出色，很多政治上的论点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可惜听众很少，国外来的人所做的演讲都没有多少听众，除非你有哈纳克那样的世界声誉。不过，所有的同行都来了，由此他建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联系。感谢上帝，演讲之后的日子并没有特别糟糕。演讲的第二天他甚至与当地政府的代表共进了午餐，而后再与州长共进晚餐，事后他当然是着实大骂了一通。

韦伯打破了沉默的咒语，这也许会对他的康复起到重要作用吧。

从圣路易斯他想继续往南方的州去，想到那里去看看他那些同祖国和朋友断了联系的表兄弟们：他们是韦伯的外祖父法伦斯坦第一任妻子的孙子，他们的父亲还是半大孩子的时候，摆脱了家庭的暴政，偷偷逃到了海外。不过还有其他很多韦伯怀有炽热兴趣的事情。首先是那些欧洲无法为他提供的东西——文明征服蛮荒：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和发展中的州俄克拉何马（Oklahoma），这块地方不久前还是印第安人保留地。这里还可以观察到智力上的“优等”种族对“劣等”种族非暴力的征服和同化，观察到印第安人部落财产向私有财产的转化，以及殖民者对原始森林的征服。韦伯住宿的人家有一半印第安血统。韦伯一直在观察、倾听，并将自己融入周围的环境之中，所以他到处都能深入到事物的核心中去： 304

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印第安人古老的诗意与最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交织在一起。从塔尔萨（Tulsa）到迈克亚历斯特（McAlester）的新建铁路最初一个小时沿着加拿大河（Canadian River）延伸，穿过一片名副其实的原始森林——只是你绝不能把它想象成满是巨大树干的“寂静的森林”。树林密不透风，要不是偶有几处缝隙能望出去，你甚至完全不会注意到火车就在距离加拿大河几米远的地方行驶。呈黑色的树木——因为这里已经基本可以说是南方气候（极少下雪）——上爬满了攀援植物，一直缠绕到树梢。其间有静静流淌的呈黄色的林间小溪和细小的河流，都被完全覆盖在绿荫之中。最具有《皮袜子故事集》（*Lederstrumpf-Poesie*）中那种诗意的是像加拿大河这样比较大的河流，它们完全处于野生状态，有巨大的沙洲，岸边是浓密的深绿。河水顺着弯道和支流翻滚奔流，给人一种神秘的独特感受，不知道这河水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河面上空荡荡的，我只看到一只印第安人的小渔船。

不过，即使是在原始森林中穿行的那一个小时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中虽然有时可以看到由一座座真正的古老（用粗糙的树干建成的）小木屋组成的群落——那些五彩缤纷的披巾和晾在外面的衣裳，一看便知是印第安人的群落——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由工厂生产的相当现代的小木屋，价格在500美元以上，建造在石头地基上。周围有很大的空地，种着玉米和棉花。人们将树的底部涂上焦油，然后点燃。这些树慢慢死去，将灰白和冒着烟的枝丫纠缠着伸向天空。这幅景象配上夹杂在这些树木中间的新长出的青苗，给人一种奇怪然而绝不是亲切的感受。出了原始森林，接下来就是连绵不断的大草原（部分是牧场，部分同样是棉花地）和玉米地。

突然你就开始闻到石油味，看到像埃菲尔铁塔一样矗立在森林中的钻井架，接着便来到一个“城镇”。这样一个城镇确实是离奇得很：这里有工人的营地，尤其

305

是铺轨工人的营地（很多铁路正在修建中）；街道完全没有铺砌，通常每年夏天两次用石油浇在路面上以防尘土飞扬，因此散发着石油味；至少有四五个分属于不同教派的木质结构的教堂。“大街”上的木屋有碍交通，它们下面安装了轮子，可以移动。房主一旦有了钱，就会将其卖掉，另建新房，旧房则被拉走，被新来的人买下，然后搬进去住。此外还有纵横交错的电话和电报线（这在美国随处可见），以及处于建设中的电气铁路——因为这个“城镇”还要向远方无尽地拓展。

我们乘一辆由一匹大马拉的小型马车转了一圈，看了四所不同教派办的学校以及公立学校（免费）——义务教育已指日可待；看了一个旅馆，旅馆房间比较简单，但（尽管价格低廉）走道里却都铺着地毯，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还遇到了一些采访者，他们希望听到人们说他们的国家多么伟大；如此等等。这真是一幅迷人（并非美学意义上的迷人）的发展画卷，等到明年这个地方就会具有俄克拉何马市的特征，也就是说，具有所有西部城市的特征。移民来自北部和东部，多数是穷光蛋，可他们用不了几年就能真的变成富人。所以这里有一种异常“繁荣”的景象，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土地投机生意仍然十分兴旺。有两个房地产商、一个做柏油生意的人和两个推销商来跟我攀谈。

306

这里有一种神奇的忙碌景象，尽管散发着石油味，弥漫着烟雾，尽管有随地吐痰的“美国佬”和无数窄轨小铁路上火车可怕的喧嚣吵嚷，我仍然不禁感觉其中蕴含着极大的魅力。我也无法否认，总的来说我觉得与这里的人相处令人愉快。所有的官员接待我时当然都只穿着衬衣，我们一起把脚翘在窗台上。“律师们”给人一种冒失的印象，毫无拘束，举止自然大方，又始终保持着对对方的尊重。他们问我的问题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比如：“你们在德国是怎么对付黑人的？”这种问题甚至都算不上最离奇的。但是人们也讲些逸闻趣事，我相信，自我上大学的最初几个学期之后，再也没有像在这里同这些人在一起时这么快乐过。他们像小孩一般幼稚，但什么场合都能应付，尽管饮酒在这里遭到绝对禁止，而且禁酒令确实有效。这里比在芝加哥有更多的“文明”。如果你认为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那就大错特错了。礼貌表现在人们讲话（当然非常简短）的语调和姿态上，他们的幽默堪称有趣之至。可惜的是，一年之后，这个地方看起来也会像俄克拉何马市一样，也就是说，像所有其他美国城市一样。一切妨碍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都将以疯狂的速度被碾碎。

其中一次给韦伯带来极大快乐的独特经历，是乘马车去一个坐落在加拿大河河畔的吉布森堡（Fort Gibson）俱乐部会所，途中越过了种种障碍，顺着原始森林中的空地穿行。



吉布森堡是森林中一个诱人的去处，坐落在河岸上一个相当高的地方。像美国其他的俱乐部会所一样，这个会所中有一种我们德国人不熟悉的无拘无束的愉快气氛。两个分别叫“贝希大婶”和“汤姆大叔”的上了年纪的黑人被雇为用人。这里有床位，人们在盛夏酷暑之际可来此过夜，有简单的农家菜（包括生西红柿、火腿、鸡蛋、野生蜂蜜和牛奶），最重要的是几乎总有一群快乐的人做伴。

这个（无党派）俱乐部由大约40人组成，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职业。会员空缺通过选举填补，每个会员每年的会费大约是75美元。这笔会费用来支付酒吧、黄昏小酌以及聚会（这里指男人的聚会，而女士们有她们自己的“招待会”）的费用。成为俱乐部会员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它标志着会员享有某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俱乐部是一种翻译成美语的“飨宴”（Symposion），因为活动只涉及闲谈聊天和玩笑娱乐，或许有点体育活动——但是在格兰德河（Grand River）没有这种机会，也有专事体育活动的俱乐部。

整个行程令人非常愉快。不过，像在这条“道路”（在土地测绘当局的段管线上这条道路被标成直线）上的这种笞刑，我的臀部还从来没有受过。到处是“窟窿”已不足以描述这条像山谷一样起伏的路，在这条路上，马车摔陷进去，又被拖出来。水洼、泥潭、树干——马匹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用山胡桃木制成的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车轮也完好无损。我们的马车驶过一座长长的铁路桥，冒着火车拿我们开心，将我们置于它前面的排障器上的危险；然后在河的另一处，我们乘着一个像木筏一样的渡船过了河。我们还走过了一派荒野景象的垦殖地带：烧焦了的树干，垦殖者的营地，有时还有东西装的高高的马车——它们属于正在搬迁的小租赁人，用粗糙的树干建成的古老木屋，正在建造中的现代工厂厂房，挤满了黑人的棚屋……这一切全都散布在广袤的草原上和河边茂密的森林中，然后突然会冒出一个像吉布森堡这样的正在崛起的“城镇”，那里有上百所散布得很宽的小房屋，但也有发电厂、电话网等等。接着又是绝对的荒僻之地。我们有两次撞到了牛，还有一次撞到了一头吓人的得克萨斯黑猪。很多次我们不得不在深更半夜叫醒农夫（他们的帐篷大开着，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鼾声）<sup>①</sup>，向他们打听方向。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被叫醒的人依然那么客气。总之，这是一次奇特的驱车漫游——先是在黑暗中，然后是在月光下行进。

今天我看到成群结队的印第安人来领钱，纯种的印第安人面带一种奇特的倦

① 关于打鼾：待在马斯科吉（Muskogee）旅店的时候，我房间门上电铃旁边的价格表上写着：“Frog in your throat? ——10美分”[这应是当时推销止咳糖的一则广告。英语“Frog in your throat”直译是“喉咙里有青蛙”，通常指患感冒或咽喉等时喉咙的感受，包括喉咙痒、声音嘶哑等。韦伯在这里显然是指打鼾。——译者注]。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对打鼾做过如此精彩的表达和如此应得的治疗。

容，而在他们中的其他人身上，则可以看出他们有聪明的头脑。他们的装束一般都是欧式的。我还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了解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想，我的彻罗基族印第安人（Cherokee）东道主会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上抨击美国新近的印第安人政策，他谈及这项政策时两眼直冒火花。不过，关于这次“古老的浪漫国度”之行就谈这么多吧。等我下次再来的时候，最后残存的一点“浪漫”遗风都将不复存在了。

※ ※ ※

新奥尔良（New Orleans）是他们穿越原始森林的长途旅行的最南端，他们一行希望在这里找到最早的法国文化根基的特性。他们发现，即便在十月那里的热带酷暑也足以让人瘫掉，连黑人都受不了。干枯、沾满灰色尘土的草木忍受着煎熬，极度的忧郁感笼罩着一切。“我们很高兴两天半之后就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地方。”感谢上帝，他们又开始往北走了。

308 他们逗留的第一站是一个叫塔斯基吉（Tuskegee）的小城，去看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创建的著名黑人教育机构。他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也许是整个旅行中最令他们感动的见闻。在这里你可以抓住渗透在美国人一切生活中的全国性重大问题（白种人与他们以前的奴隶之间的矛盾）的核心。首先，韦伯一行感受到了那些数量日益增多的混血儿的悲剧，这些人的肤色从深褐到乳白各不相同，他们凭自己的出身和才能属于主人的种族，然而，他们似乎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被这个群体排斥在外。从法律上讲，如今已经没有奴隶了，但是南方各州的白人主子却通过在社会上抵制奴隶的子孙辈的方式来进行报复。南方的白人主子使用这些奴隶的后代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然而，只要谁将一个混血儿作为客人招待，他就永远告别了自己那个种族。

因此，黑人领袖不得不进行反击：在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中间唤起种族自豪感，并力图使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这是要将“文化”传授给一个处于一种隔离状态的种族，这个种族实际上似乎已经被放逐到了人类世界的边缘。怀着立足于常识的理想主义，黑人领袖力图通过“牙刷福音”（das Evangelium der Zahnbürste）和训练他们做各种各样合理的工作来做到这一点。这些人希望，将来有一天即使是白人也一定会对他们表示敬重。但是白人想要通过排斥抵制来防止自己这个种族的退化。世界这一角的对立简直是闻所未闻，不可调和！而我们国家的国民生活与此相比显得多么狭隘！美国报纸正带着嘲讽和取乐的口吻报道利普（Lippe）公国继位之争的全过程。韦伯写道：

在塔斯基吉，任何人都不能只从事脑力劳动。这里的目的是对农民进行训练，明确表达的理想是“征服土地”。在教师和学生中间都产生了极大的激情，尤其是对无数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黑人血统（你要不是美国人根本就看不出他们不是白种人）的黑人来说，塔斯基吉是唯一可以呼吸到社会自由空气的地方。法律禁止这些黑人与白人通婚，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与白人交往，他们有指定的车厢、候车室、旅馆和公园 [例如在诺克斯维尔 (Knoxville)]。我们在种植园和产棉地带的黑人棚屋里碰到的半猿人提供了一个可怕的反差。不过，一旦你看穿了南方白人诱人的外表，就会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提供了同样可怕的反差。对于布克·华盛顿和他所做的工作，他们每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从极端憎恶黑人教育（认为它夺走了种植园主的“人手”）到在南方白人中并不少见的看法 [即认为他是历史上除了华盛顿 (Washington) 和杰斐逊 (Jefferson) 之外最伟大的美国人]，应有尽有。但南方白人毫无例外地认为，白人与黑人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交往”是不可能的，甚至（或者尤其）是同受过教育的、通常有百分之九十白人血统的黑人上层阶级的交往也没有可能。然而，白人正在为本来是用来“保护自己种族”而实行的隔离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南方，唯一怀有激情的是黑人中的上层阶级，在白人当中，只有对北方人漫无目的而又软弱无力的憎恨。

我与大约上百个不同党派、不同社会阶层的南方白人交谈过，据此看来，这些人将会面临的问题绝对没有什么解决希望。事实上，这个弗里茨大叔就是那些勇敢、自豪但没有头脑，在今天的生存斗争中遭到失败的人群中的一个。他从未拥有过奴隶，而且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是他却为奴隶主而斗争，因为按照他的杰斐逊-考尔豪恩理论 (Jefferson-Calhoun'schen Theorie)，他所在的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享有退出联邦的法定权利。他养的马总是太多，人家出最高的价他也不卖，因为如果他卖掉的话，他的邻居就会拥有一匹更漂亮的马。他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如果他不信此教，他妻子就会每天都让他感到恐惧，让他感到自己会受到下地獄的惩罚。

韦伯夫妇见到了 G. F. 法伦斯坦的后裔，他们过着简单、缺少文化内涵的生活。他们没有继承美国人的精神遗产，相反，是抱着对它的反感长大的。他们中的一个起初当矿工，继而做小学教师，现在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跟一个精明的爱尔兰人合伙并为后者工作，他毕竟还算是逐渐成为一个体面人。法伦斯坦的另外两个儿子则只不过在北卡罗来纳 (North Carolina) 和弗吉尼亚两州交界处的蓝岭山脉 (Blue Ridge Mountains) 边缘自己开垦了几座小山丘，在一个蹂躏得光秃秃的小山坡上建了几座朴素的农舍而已，这些农舍全然没有德国农舍所特有的那种舒适，没有鲜花装饰。拖着一

310 大帮孩子，怀着一种自己并未意识到的乡愁，他们在争取着另一种方式的生活。韦伯写道：

我们摸黑到了芒特艾里（Mount Airy）。吉姆和他的大儿子赶着一辆马车来接我们，然后我们的马车在一条糟糕透顶的山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夜一片漆黑，月亮才刚刚开始露头，我们穿过灌木林，跨越河流浅滩，在山谷中上上下下颠簸。有一次，我们的马车碾过了横躺在路上的一根粗大的树干，马车嘎吱嘎吱的像要散架，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所有的肋骨都折了。但是马一直很镇定，吉姆也不慌张。吉姆的妻子接待了我们。天气因初霜而寒冷，壁炉的火光照着我们，烘烤着我们。整个家里没有一片纸，既没有供书写的纸（吉姆去了芒特艾里才在那里写信），也没有文明人通常作其他用途的纸。但有一口井，水冰凉，两层小木屋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的床倒是很舒适。

让玛丽安妮给你讲述他们每个人的情况吧，我多讲一点外部的情形和事情的经过。杰斐逊和詹姆斯两兄弟的房屋分别坐落在两个相当陡的小山坡上，中间隔着一条小溪，两栋房屋相对而立，相互呼叫都能听见。山坡下面的低洼地很肥沃，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地里种上了烟草、玉米和小麦。山坡上牛在吃草，除了烟草，这些牛是他们唯一可以卖钱的产品了。玉米用来自己吃或者喂牛。用餐的习惯在哪里都一样，食物非常丰盛、非常好，但很单调：烧煮的牛肉、猪肉末、水果罐头、“热卷”（高温烘烤出来的玉米点心）、果酱、咖啡和牛奶，一日三餐顿顿如此。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旁边拿着一个巨大的赶苍蝇的拂尘挥舞着，杰斐逊和詹姆斯将我们的盘子盛得满满的，女人们站在旁边给我们倒咖啡和牛奶。年长的人吃完之后，第二拨才就座，有时还有第三拨（小孩子们），那个黑人最后一人单吃（他住在一个小木棚里，有一点儿地，都是詹姆斯给他的）。詹姆斯一家要做简短的餐前祈祷；杰斐逊家则没有这项仪式，他家除了一个女儿之外都不去教堂。饭后大家坐在壁炉旁（他们觉得坐在外面不舒服），人人嘴里都嚼着烟草。杰斐逊将一口口褐色的液体瞄准火堆吐过去，越过或穿过坐在壁炉与他之间的那些人的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只有对“务农”深恶痛绝的杰斐逊大部分时间里都情绪消沉。

311

出乎意料的是，即便在这里，韦伯所得到的见闻也给他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民主社会新旧两种不同的分层方式。他看到了以其原始形态展现出来的各宗教教派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日益被各种形式的教团和俱乐部取代。他的观察结果特别反映在他的论文《教会与教派》（“Kirchen und Sekten”）中：

星期天早上我同詹姆斯、弗兰克和贝蒂去了教堂。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来詹姆斯家吃午饭，与教会毫无关系的杰斐逊一家也在。下午大家都去参加了浸礼会的一次洗礼仪式。八个人（三个女性，几个还未完全成年的孩子，两个男子）在大自然中被浸入山涧溪流中冰冷的水里——按照严格的浸礼会教义，这是唯一有效的洗礼方式。身穿黑色西装的牧师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受洗者们身着最好的“装束”依次走进溪流中，把手伸给牧师，在各种经文誓言口诵完之后，将双膝弯曲，由牧师的手扶着向后仰，直到脸浸入水中，然后笑着扑哧扑哧地走出水面，上岸接受“祝贺”，浑身透湿地乘马车回家或者——如果家远的话——在一个小木棚里换衣服。他们甚至在隆冬时节也举行这样的仪式，为此他们要在冰上凿一个窟窿。詹姆斯认为，“信仰”能防止他们着凉。杰斐逊认为这一切都是胡闹，说他曾问过一个受洗者：“难道你没感觉到很冷吗？”那人回答说：“我心里想着某个很热的地方（当然是鬼话），先生，所以也就不在乎水冷了。”贝蒂是个虔诚的教徒，杰斐逊说：“几乎就像她妈一样狂热。”跟其他人一样，杰斐逊由于他母亲可怕的严厉而断绝了与教会所有的联系。

人们对教会的兴趣总的来讲是在减弱的，也就是说，以前卫理公会的信仰复兴布道会和小组忏悔（所有人在其邻居们的陪伴下所做的每周忏悔）都在衰落——那个年轻牧师也承认这一点。布道不错，全是实际的东西，讲得很有激情。谁要是感觉受到了“感召”，便走上前去，跪在圣坛前。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夫非常激动地高声为大家祷告，但是他尖声的歌唱可怕得难以形容，不断将我们带回到我们身处的那个粮仓的凡俗之中。当然，教士的长袍是没有的，牧师穿着便装西服布道，全然像一个政治演说家，圣坛（桌子）上放着他的帽子。诗意就在我们周围色彩斑斓的森林中的寂静里，就在后来的洗礼中，也在那个具有威斯特法伦—荷尔斯斯泰因特征的老农的严肃里。这些教派以前的社会功能也减弱了：虽然在介绍时每个人，包括牧师，都被称作“兄弟”，可是詹姆斯隶属于一个“教团”（他是否值得信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参加教团者需由五个成员提议才能被选进去，如果品行不端就会被开除。这个“教团”意味着参加者会拥有健康保险、丧葬基金和寡妇救济基金，其成员有义务相互帮助和向并非因自己的过失而陷入经济困难的成员提供贷款——无端拒绝履行此义务者要遭受被开除的惩罚。

312

这曾经是美国教派最重要的功能。在这里，蓬勃发展的俱乐部和教团取代了正在衰落的教派组织。差不多每个农民以及很多的中小商人都在扣眼上佩戴一种“标记”，就像法国人佩戴小的红色缎带一样。这主要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它是一种一目了然的身份证明，证明某人已经经过某个特定团体对其品行进行的审查（这不禁让人想到对我们的预备役军官的审查），经过投票，他可以作为“君子”被承

认和接纳。这与一百五十年前老的教派（浸礼会、贵格会、卫理公会等）为其成员颁发“介绍信”（用来出示给其他城市的“兄弟”）有相同的效用。

313 韦伯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一切。他很兴奋，毫不费力地用自己精神财富中能让这些纯朴简单的人们高兴起来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发掘出了他们生活经验中的宝藏。即使在这里，他也同人们平起平坐，做他们的“兄弟”。每个人都感觉得到了他的理解和尊重。玛丽安妮只能听到他们在玉米秆之间进行的谈话的只言片语，“因为我不得不同女人们一起待在屋里，只能偶尔去听听马克斯在男人们中间神奇地引发的阵阵笑声”。自然，他很快就用他漂亮的黑人英语和他的故事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们常常用宽大的手掌拍着他的膝盖，称他为快活的壮实伙计。眼看着客人很快将不得不离去，这些朴实善良的人感觉很悲伤。为了使道别轻松一些，我们答应他们很快会再回来——而这个诺言是无法兑现的。

※ ※ ※

然后韦伯夫妇又回到了东部各州的文化中心，匆匆浏览了费城、华盛顿、巴尔的摩和波士顿以及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丰富的内容几乎让人难以消化。玛丽安妮常常感到吸收的东西过多，寻思着这些陌生东西与她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她不能够具体地将它们与自己的生活圈子挂起钩来。相反，韦伯的接受能力仍然很强，也能够将一切通过自己的精神锻造变成有用的东西。

在华盛顿，他们有机会到佛农山庄（Mount Vernon）——那位伟大的国民领袖的诞生地——进行了一次富有情趣的郊游。那是个阴天，他们的船在宽阔的波多马克河（Potomac）上行走，河水带有灰黑的色调，岸边坡上的树林已经染上了秋色。他们顺着斜坡而上，来到几栋白色的小木房前，毕德麦耶尔（Biedermeier）式的简朴让人感觉它们像是歌德时代的遗迹，给人带来家一样的亲切感。到处都能感到深沉的孤独和寂静，一种“逝者已去”的寂静，一种完成了使命之后的崇高的伤感。那个业已逝去的波澜壮阔的生命只向那些自己身上也潜藏着这种生命的人们显示。回到山坡下就又回到了生活的喧嚣，仿佛生活对每个人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他们还观察到了一些很奇特的事情，例如黑人的礼拜仪式，而且是上层社会的黑人的礼拜仪式。

每个人都穿着丝绸的服装，有非常优雅的黑人女士，还有聪明文雅的黑人男士和黑白混血儿。牧师出门去了，先是一个普通信徒，然后是一个外来客人替代了他。不可思议的是，随着布道者声调越来越急促，最后变得很激动，一种低沉的呻吟便开始了。这种声音起初让人想到令人难堪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叫声，然后是一种

耳语般的附和声。布道者每一句话的最后几个字都被重复，先是轻声地，然后是尖叫着重复，以“对，对”或“不，不”回应牧师的呼告，其实这个牧师并不比芒特艾里那个年轻牧师激动，与斯特克尔（Stöcker）相比那就差得远了去了。我们确实感觉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怪异感。同时，在后面我们坐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人面带微笑，看到黑白混血儿的女孩儿在咯咯地笑。本来我们想象中都是一个样子的黑人社会阶层中，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314

推动这种富有竞争性的生活的东西多么不同啊！韦伯夫妇还看到了更多令人惊讶的东西。

动身去波士顿差点儿成了问题。原因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橄榄球队要前往波士顿与哈佛大学比赛，全校2000名学生都来火车站送行，数百人还要乘10个小时的车一同前往。所以那天晚上火车站好几个小时都进不去。那些淘气的家伙不让任何人进去。大伙儿都误了火车，一位女士被踩成了重伤。在波士顿，我们在马车上看到了下面发生的这一切：老校友们耗资50万美元建了一座石头砌成的巨大的圆形体育场，像罗马圆形竞技场那么大，可以容纳4万人。每一次进攻打完后，不管哪个球队得手（因为整个波士顿和相当一部分的费城人都在），得手的球队总要雷鸣般地欢唱。市政厅和全城都挂满了旗子。后来哈佛输了球，随之而来的便是极度沮丧。波士顿的各大报纸用半个版面报道东亚战争，用三个版面报道总统选举，却用了八个版面来报道这场比赛，然后是没完没了地采访22个参赛球员中的每一个小伙子。费城则张灯结彩，人们自然都一致认为，这次胜利远比被踩伤的女士重要得多。简直不可思议。

在优雅的波士顿（这里的建筑因年代久远而变暗），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他们感觉又踏上了熟悉的土地。在这里，殖民地生活中一切狂野的冒险精神似乎都在稳固的英国古老传统中平静下来，那些已经成熟了的东西构成了有益的和谐。这在哈佛大学漂亮的建筑群中升华成了不朽的美。的确，在这个师生们共同进行精神探索的环境中（在这里，不是国家，而是私人赞助者试图自豪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一个德国学者也可能很快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值得钦佩的是，胡戈·明斯特贝格——他杰出的才干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眼下正在这里为威廉时代各种各样的德国著名来访学者提供建议，热情接待他们——始终感到自己首先是个德国人！

315

旅行结束之前，他们在纽约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除了其他事情，韦伯想要仔细看看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深化一下他所获得的各种印象。他见了一些好客的人，有

了更多的闲暇去了解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们。

这些天我们过得很奢侈，见的生人比我们在海德堡一年时间里见的还要多。马克斯居然挺住了这一切，真是不错！当他不得不穿上晚礼服和干净衬衫时，他有时候也会发点牢骚，不过他确实是尽量去参加午餐和晚餐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花半个下午着装打扮，从擦靴子到挑选合适的领带，当然，这是个很放松的过程。

韦伯夫妇在这里所认识的美国人中，毫无疑问又是一位女性——一位叫弗洛伦斯·凯莉（Florence Kelley）的企业督察员——堪称最为杰出的人物。从这个激情满怀的社会主义者那里，韦伯夫妇又了解了这个世界上大量极端丑恶的现象。

在各邦州政策自主的体制下，社会立法简直毫无希望。很多工人领袖十分腐败——他们煽动罢工，然后从工厂主那里拿钱，再去平息罢工（我自己手里就有一封别人写给这样一个恶棍的介绍信）。在芝加哥，尽管有情绪激昂的宣传鼓动，但仍然未能立法保护妇女以规避某些行业风险，直到一家公司成立，生产出了相关的防护装置，然后贿赂各州议员，用法律形式规定使用这些设施，这个问题才得以了结！如此等等。不过，美国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只有黑人问题和可怕的移民问题是两块巨大的乌云。

316 “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因为在这里，朝气蓬勃和充满自信的向善的力量一点不弱于恶势力。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表征是犹太人居住区。这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来自东欧的那些可怜的犹太移民既侍奉他们父辈的上帝，同时又经营自己的生意。他们的一个巨大成果就是，他们利用私人捐款为新移民建立起一个犹太教育和扶助机构。它不到几年就已经磨损的石头门槛就是明证，证明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被社会遗弃的孩子在这里进进出出。

在这里你能想象得到的东西应有尽有：图书馆、浴室和体育馆，音乐课、绘画课、烹饪课和缝纫技艺课，还开设了手工艺和科技方面的课程以及舞蹈课，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剧场，孩子们在这里演出以培养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孩子们和各俱乐部都有绝对的自治权，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也不让外人进去看，这的确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化的一种手段。年轻人在生存斗争中摆脱权威的努力在这里结出了果实。来这里的时候，他们是那些严格遵守各种宗教礼仪的乞丐的孩子；离开这个培训机构的



时候，他们已经成了“绅士”，向南方的黑人猛扑过去，对他们进行可怕的高利贷盘剥。



现在该是告别的时候了。一年将尽，白昼渐短，旅途中的韦伯夫妇希望回家过圣诞节。他们再次从布鲁克林大桥上饱览了纽约的景观。在初冬时分的夕阳晚照中，这种景观比在夏天时更加壮观：天空呈暗红色，随着暮色降临而渐渐变成淡紫色。曼哈顿岛前端成群的摩天大楼像一座座轮廓奇异的高山耸入云霄，在万盏灯火的照耀下，就好像置身于这些岩石筑成的大厦中的精神汇聚成了一股滚烫的液体黄金，缓缓流淌着。他们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在犹太人居住区度过的。

我们先去了一个犹太人的剧院，然后跟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布劳斯坦（Blaustein）博士以及剧作《真正的力量》（*Die emtje Kraft*）的作者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布劳斯坦是移民接待中心的主任，是一个最为纯净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相貌让人难以置信的典型的犹太人。《真正的力量》这出戏我们是昨天晚上看的。语言有三分之二听不懂——走调走得可怕的德语，夹杂着希伯来语和一些俄语词。剧中的悲情时刻，你可以听到“生活多么悲惨”之类的句子。尽管大部分的对白我们都听不懂，但是演技可以说非常精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剧情，尤其是这个并非没有瑕疵的剧本中的几个人物类型（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犹太法学“学者”）让犹太演员们——在美国最出色的犹太演员——以自嘲的方式演绝了。……

韦伯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乘坐的船已经以单调的节奏开始在大海上颠簸了。生活的喧嚣在冬日的雾霭之中沉寂了下来。他怀着感激之情回望着海岸，那里赐给了他一段如此幸福的时光。他的妻子有时感觉，她带回家的似乎是一个恢复了健康的人，是一个重新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积蓄了力量的人。韦伯自己做了这样的总结：

当然，这次旅行中我所获得的“学术”成果和旅行的花费不能说相称。我为我们的杂志物色了数量可观的一批有趣的撰稿人，我现在比以前更能够理解关于美国的统计数字和政府报告。我自己将写几篇关于黑人文学以及类似的东西——也许还有一些小事情——的评论，但是就我的文化史研究而言，我看到的有限，多限于我有东西一定得看的地方，尤其是我必须使用的图书馆，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一些小教派那里和大学里。鉴于这样的情况，只有从拓展学术视野（以及改善我的健康状况）这个广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状况下的旅行才是值得的。当然，这方面的成果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得出来。不管怎么说，我能像这样完成这次旅行已经确实不错了——若在一年前这根本就不可能……让大脑兴奋，使用大脑，同时又不造成精神疲劳，这是唯一的治疗良方。

# 第 10 章 著述的新阶段

## 1

本章将尝试着为那些对学术领域不熟悉的读者叙述一下韦伯的某些思想，或许以此能够让他们对韦伯的精神世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对他的人格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他的学术工作无法估量，谁要想把握其中的内容，就得顺着他的思路，自己花力气去理解那些艰深的著述。这里介绍的内容从根本上讲产生于韦伯的科学认识和人生信念的交汇处，在这里，他的思辨能力和行动能力二者难以分开，二者结合的产物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教师和政治家的人格特征。不过这也仅仅是一只从喷泉中汲取泉水的杯子：水来自喷泉，但并不具备喷泉的本质。

※ ※ ※

在他著述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斯·韦伯认识和表述的冲动针对的主要是现实本身的某些方面，也就是说，针对的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史和经济史中的事件。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我们看到的作者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他对材料的占有如饥似渴，永不知足。他深深地动情于在当代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的那些生命的沉浮，从而使那些生命在他那里重新被反射出来。

他也同样强烈地关注自己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看到，他发现德国农业

319 人口的支配关系和财产关系发生了带来严重后果的转变。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纳入民族国家理想的架构之中，在这些理想的指导下去判断现实存在，并根据这种判断确立政治目标。研究者和政治家这两种身份在他身上相得益彰。引导他选取材料的出发点首先是政治热情，然后是对劳动阶层的正义感，再则是这样的信念：问题并不在于人类的幸福，自由与人类尊严才是终极的最高价值，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实现自由和人类尊严。他早年掌握的大量材料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生动素材，用以阐明科学和理论上的因果关系或者实用和政治上的内在关联。

1902年，在经历了以后还将长期面对的严重危机之后，韦伯的创造性冲动转向了完全不同的学术领域。他从一个大学教师和政治家的活跃生活领域被放逐到了寂静的书斋里进行思辨。他现在作为思想家暂时退隐到了现实之后，专注于对思维的思考，专注于他那个学科的逻辑和认识论问题——到底是外部原因还是内在需要使然呢？毫无疑问，部分动因来自外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为庆祝学校振兴而准备出版一个纪念文集，以让韦伯感到义不容辞的方式邀请他为此撰稿。他于1902年年初开始撰写第一篇关于方法论的论文，题为《罗舍尔和科尼斯及国民经济学的基础》（“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sup>①</sup>。这篇论文在他的笔下一发而不可收，它要求很大的思维强度，使这位当时疾病缠身的学者备受折磨，尤其是事实证明按原来约稿的目的不可能完成这篇论文。像其他多篇有关逻辑的论文一样，他最终根本就没有完成这篇文章，因为别的研究课题紧催着他。他的康复进程很缓慢，工作能力多年来一直不稳定，他自己觉得总需要有新鲜的强烈刺激来克服潜伏的障碍。只要能够让他工作，至于干什么或者干成什么样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

320 当然，韦伯对哲学和逻辑问题的兴趣并非始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的整个发育成长期间，这种兴趣就已经贯穿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了。在他自己的学术领域，理论对他的吸引力不亚于历史。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课就有一个精确的概念架构。他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中第一次就哲学问题表明了他的看法。

这次演讲使用的事实部分的材料就是围绕着探讨（作为一门学说的）经济政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分类的。在这个学术领域里，理论问题诸如“过去怎样”和“现在如何”直接服务于像“什么应当存在”和“什么应当发生”这样的其他理论问题。就这个学术领域而言，对自己的主导思想具有明晰的认识尤为重要，因为在这里，一个学者对如何建构社会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论点和意见影响到立法、财产制度、对劳动阶层所处状况的评估等等，他的思想对构建这个世界负有一定的责任。

<sup>①</sup> 韦伯最初将著述定名为《罗舍尔和科尼斯及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后来仅完成了第一部分，发表时题为《罗舍尔和科尼斯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问题》。——译者注

当时，社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这样的学术倾向：名宿们，尤其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基者们，都把通过财富增长来提高快乐指数（即不惜一切代价促进商品经济生产）作为不言而喻的目标。于是，在这类理想的保护下，“力量的自由发挥”便酿成了肆无忌惮的营利冲动，压榨无产者变得显而易见。这个时候，大多数年轻学者便转向了不同的方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变成了“讲坛社会主义者”。商品的合理分配，即实现一种道德上的应然，现在被看成是经济政策的目标。

韦伯在就职演讲中主要想阐明，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材料领域推导出独立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应用到我们这门科学材料里的东西，只是古老的人类理想的普遍类型。”他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信念：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既不是生产技术方面的理想，也不是幸福论的理想，甚至也不是道德理想，而是“民族”理想。这是他首次讨论一个专门学科的主导思想，他的分析自然还不是围绕着逻辑问题展开的，而是围绕着一个以唯意志论的方式指向（构建生活）的学说的取向问题而展开的，他试图阐明一种能够影响经济和政治行动的思想。这都是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321

韦伯在著述的新阶段写的第一篇论文，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对人们的取向的思考，而是对科学真理的思考——一个与现实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课题。从那以后，韦伯对逻辑问题的研究就从未完全停止过，一直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然而，就在发表了《罗舍尔和科尼斯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问题》之后，他又把它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因为在清静的书斋中，他产生了研究世界史的强烈愿望，这主要是一种想要尽可能多地把握和书写世界史上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冲动。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里应当首先介绍一下韦伯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由此找到一座通向他的精神人格的桥梁，进而可以从根本上理解这位认知者和渴望者。

韦伯在1903年到1918年间发表的关于文化科学的逻辑的论文，其肇因大多是批判和论战性的。他通过揭示和批判谬误来发展自己的观点。即使在这里，他也得益于自己充满现实感的清晰思维。艰涩的逻辑分析总是通过生动形象的例子加以阐释。这获得了无心插柳的效果，使这些通常读起来很困难（长长的主从复合句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的著述有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吸引力。例如，韦伯用歌德给施泰因（Stein）夫人的信件来说明，同一种文化现象从许多极其不同的观点来看能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者用玩斯卡特牌的程序来解释“规则”这个概念完全不同的词的意义；或者用非常具体的事例，例如用母亲打了孩子一个耳光，事后解释为什么打这个例子来说明，甚至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认识，也不是自己经历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思维规则而形成的认识。

韦伯一点也不关心对他的思想做系统的总结，因为他不想做一个专业的逻辑学家。 322  
尽管他高度评价方法论的洞见，然而他重视的并不是方法论洞见本身，而是将它们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用来阐明认识具体问题的可能性。他完全不重视用什么样的形式

来表述自己的丰富思想这个问题。他的研究一旦展开，他脑子里储存的大量材料便泉涌而出，常常很难将其强行塞入明晰的句式里去。而且他想要很快写完，想要尽可能简短地表达自己，因为现实中总有新的问题簇拥到他跟前。推理思维不允许同时表达几条相关的思路，对他来说这是个多么大的限制啊！因此，他不得不将很多东西匆匆塞进长长的套叠句中，如果塞不下，就把它放在脚注里。就让读者像他自己一样“好好地”去烦劳这些东西吧！

有时候，韦伯这个即兴演说的大师（他能把最遥远的东西拉到眼前，好像自己曾亲眼见过似的）好像以简单的方式就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不费什么力气，似乎不用什么技巧，完全不讲究修辞——不过，他倒是有绝妙的嗓音。有时候，他仿佛是有意忽略自己学术著作的风格，以此来反时代之潮流，即过分重视形式的价值，浪费时间去努力赋予学术创造以艺术品的特征的做法。韦伯在这种风格美学中看到的是一种受不同法则支配的精神领域的混合体，他尤其厌恶很容易出现在文章里那种“缺乏朴实”的表达方式，以及追逐“个性特色”的做法。他经常引用《浮士德》中的一句话：“无需什么技巧，清晰的头脑和感觉自会明畅达意。”语言风格应当适应表达的内容，而不应该华而不实，偏离学术目的；思想家自身在学术领域不能有意识地凸显自己，而应当隐身于学术内容之后。



323 韦伯碰到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中心问题是自然科学与所谓的人文科学之间的重大争论。在狄尔泰、温德尔班德（Windelband）、西默尔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带领下，大多数同时代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个争论还扩展到了经验科学领域。由于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确信，摆脱一切形而上学，摆脱一切个别的偶然性，“理性”地认识一切现实是可能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可能而且必须统治整个科学领域，只有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有资格被称为有效的真理；这种方法所不能涵盖者，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属于“艺术”。作为方法和世界观的“自然主义”要求独领所有生活和思想领域。“人文科学”的自我辩护则主要集中在证明自己的特性和独立性，而且把这种特性和独立性建立在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不同这个基础之上。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方法的争论尤为激烈，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以显而易见的方式依赖于自然进程，所以这种对象似乎处于自然和精神的交界处，将它归于“自然”或“自由”的范畴都有同样充分的理由。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就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古典”学派的领袖人物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认为将认识对象划分为“精神”和“自然”在逻辑上讲

不通，因而将其弃置一旁，代之以观点的区别，现实中同样的东西可以用这些观点进行逻辑处理。但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政治经济学归入了自然科学。他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定为发现经济生活的规律，坚信这种规律无异于自然规律。同时，一种以抽象概念和原理构成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现实可以在脑子里推导出来）似乎成了在现实中和精神上把握社会进程的唯一手段。

较为年轻的“历史学派”所持的观点则与此相反，这个学派是在古斯塔夫·施莫勒的领导下从“古典学派”分离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同历史研究一样，在于生动地再现具体现实的特质。这个问题由于下述原因更加复杂了：虽然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大师级人物如罗舍尔和科尼斯是历史学派的支持者，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发现“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例如，罗舍尔就假定不同的民族中发生的事情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民族”视为一个统一的族类，并像生物学对人进行分类一样将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不同的年龄段，谈到民族的青年、成年、老年和死亡。不能用这种公式解释的，即具体的人的行动及其影响，便被归于因无法解释的原因而打破了自然规律的“自由意志”，或者归因于历史中神的主宰这样一种神秘因素。 324

在自己那个学术领域对问题的讨论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时，韦伯开始了自己的逻辑学研究，将此作为学术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的过程。这项研究所要求的思想工具是由同时代的逻辑学和认识论，特别是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科学学说提供的，其中把实用的价值评估与理论上的“价值关系”分开这一点对韦伯而言尤其重要。他在讨论罗舍尔和科尼斯的文章里说，自己想要验证一下，看看李凯尔特的概念是否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然而，他自己关于方法论的思想很快就促使他超越了这个目标。他为了切实弄清楚科学的进程，处处都离不开对逻辑问题的探讨。因此他在讨论中涉及了狄尔泰、冯特（Wundt）、西默尔、明斯特贝格、戈特（Gottl）、冯·克里斯、埃德华·迈尔（Eduard Meyer）、施塔姆勒（Stammler）以及其他人的著述。韦伯从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逻辑中接受了一个后来用他自己的社会学方法加以补充的学说：不同科学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取决于各自认知材料的区别，还取决于对材料的不同兴趣，取决于对问题的提法。

这样，各种自然科学是以“一般化”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它们感兴趣的是现象的共性和同质的东西，并用一个由普遍性的概念和法则构成的网络涵盖这些方面。相反， 325  
“个性化”的历史以及相关学科关注的是具体事件和对象的特性，是那些具有“意蕴和意义”的文化事件的特性。这些通过人的行动来决定事件就是历史科学和各种特别的法则科学（Gesetzwissenschaft）研究的对象，李凯尔特把这类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将其称为文化科学。

各种社会科学就属于这种文化科学，因为它们所研究的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人类行为

中的某些方面。其认知目标与自然科学不同，并不是一个由普遍性的概念和法则构成的体系，而是具体现象和关系的特性，不过社会科学也同样得使用事件的概念与规则作为认知手段。虽然任何对象本身都既可以作一般化也可以作个别化的处理，但外在自然还是更宜于使用前一种观察方式，而人类行为则更适合使用后一种方式。此外，人的行动可以通过一种特有的（不适用于自然现象的）精神活动的过程去了解，也就是通过再体验的方式去理解，由此使得对意义相互关联的阐释成为可能。

韦伯为社会科学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理解的学说。这个学说始于狄尔泰和西默尔，明斯特贝格对此做了研究，韦伯的同事戈特试图将其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韦伯起初与明斯特贝格和西默尔展开了一场论争<sup>①</sup>，并在论争中形成了自己的学说，这个学说后来在一篇特别的论文<sup>②</sup>和他的主要著作的方法论导论中<sup>③</sup>提了出来。按照韦伯的观点，“理解”（*verstehen*）和“阐释”（*erklären*）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认识手段。

326 在这里进一步讨论韦伯确立这个观点的逻辑分析就会扯得太远了。涉及这个理解学说的还有关于人类行为的“意义”（*Sinn*）以及阐释这种意义的学说。我们把那些能够通过理解加以把握（伴之以一种得到“证实”的感觉）的事物视为有意义的事物。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历史的文化科学所探寻的“意义”存在于经验范畴之内。这是一种行动者主观上意指的意义（*subjectiv gemeinte Sinn*），而不是客观上“正确”或者在形而上学中可以证明为“真”的意义。正确理解他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这一学说，由此清楚地认识信仰与知识以及可以证实和无法证实之间的“微细界限”，这对于韦伯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引入对事件的意义客观的阐释（就像在西默尔对文化现象很有见地的分析中不时可以看到的那样），就超越了经验科学的领域，模糊了其结论所具有的纯理论的真实效度。

谁要是在可以证实和无法证实之间划一条分明的分界线，那么他最急切关注的就会是文化科学中的“真”的内涵。因为归根结底，文化科学的立足点是无法证实的东西，即价值理念，因而在经验上是与主观的和可变化的前提联系在一起的。说这个前提是主观的，因为你不能通过逻辑论证强迫人承认那些在现实中流行的、使一种现象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性的价值；说这前提是可变化的，是因为只要“精神生活的僵化还没有使人类放弃对永远不可穷尽的生活不断地提出新问题的习惯”，价值理念就会随着文化特征的变化而逐渐变化。

韦伯教导说，经验科学中“真”的内涵（其出发点在科学范畴之外）是通过这样的

① 参见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71ff.

② *Dortselbst*, 403ff.

③ *Dortselbst*, 524ff.



方式获得的：将最初通过“理解”或“直觉”所把握到的种种联系绳之以严格的思维规则，特别是因果归因（kausaler Zurechnung）的规则。对于事件发生过程的因果联系必须在逻辑上给予充分的解释：“只有从因果关系上得到解释的东西，才是经过科学处理的东西。”依据生理学家冯·科尼斯精辟的学说，韦伯分析了对具体事件的有效历史认识据以形成的复杂逻辑运作，并得出结论：尽管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科学的出发点和认识目的不同，但都使用同样类型的逻辑工具。因为历史科学也不仅要力图考察事件之间的具体关系，而且要考察因果关系的法则。此外，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自然科学诉诸我们能用“规则”来将各种事情加以分类的能力，诉诸我们能把现象作为类概念（Gattungsbegriff）的“范例”来归类的能力——自然科学是要加以解释和从概念上加以理解；文化科学是从概念上理解（begreifen），是加以解释和对意义的理解（verstehen）。<sup>①</sup>当然，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科学“从概念上理解”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它探求事件发生的规则，建构普遍概念，以更好地理解 and 解释具体事件。

关于文化科学的普遍概念的学说是韦伯的历史逻辑中独具特色的地方。他在几乎所有的逻辑学著述中，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致力于阐明这种学说的特殊性，后来他用此学说建立了他的社会学。他力图证明，这些学科的理论思想建构并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的那样——自然科学的类概念，它具有不同的使命，是在对现实进行个性化的处理中获得的。韦伯把在所有历史中使用的那种普遍概念称作“理想类型”（Idealtyp），这是一个格奥尔格·耶利内克在其《普通政治学》一书中在同样的意义上已经使用过的表达方式。“理想类型”的意思是，将历史生活中某些事件和关系统一在一个由想象的关系组成的、自身不包含矛盾的世界中。“像这样一个想象的世界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乌托邦。”

诸如经济交换、经济人、手工业、资本主义、教会、教派、基督教、中世纪城市经济等都是些建构，其中某些现实的因素“在思维中得到升华”，以此来认识和阐明具体的现象和事件，那些由思维归总在一起的因素在这些具体的现象和事件中发挥作用。

理想类型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要给这种描述提供直观的表达手段。……它不是一种假说，但要给假说的建构指出方向。它不是历史现实，也不是将现实置放其中的模式，而是一种**限界概念**（Grenzbegriff），据此对现实做出**估量**，以清楚说明现实内容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现实与之进行**比较**。

---

<sup>①</sup> 德文中“begreifen”和“verstehen”意思都是“理解”。韦伯使用“begreifen”强调“从概念上理解”，而用“verstehen”强调“同情的理解”，对“意义的理解”、“领悟”、“领会”等。——译者注

因此，与类概念不同，理想类型是一种认识手段，而不是认识的目的，因为“文化这条永远向前奔流不息的长河”总会给青春常在的历史学科提供提出问题的新方式，所以新的理想类型必须不断重新建构，现存的理想类型必须不断重新加以修正。历史认识有必要处于不停的流变中。所以，将历史一劳永逸地纳入一个封闭的概念（从这些概念中当推导出现实）体系中是没有意义的。

韦伯还看到了历史逻辑中下面这样一个新的难题：被融合在理想类型的概念之中的，不仅有现象的某些方面，还有在一个时期内以分散的方式流行的理念。历史研究所使用的概念如基督教、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帝国主义等都是理想类型，有些像一个经济时代基本元素的组合。然而，因为人们常常不仅把实然之物，而且把应然之物（即那些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考虑进这些理想类型中去，因而使用这些类型就变得更为困难了。可是，一旦在使用一个概念时带入了这种超科学的因素，这个概念便失去了认识价值，因为这样一来，理论上的“价值关系”与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就会不知不觉地搅和在一起，理想类型就会从逻辑辅助手段变成被用来衡量具体现象所具有的超科学意义的理想。其结果是产生一种主观与客观、信仰与知识之间逻辑上含混的相互重叠，从而损害历史叙述的认识价值。

※ ※ ※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韦伯一直在研究的一些问题面前：科学中可以证实和无法证实的、认识与评价、理论上的“价值关系”与实践中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的研究涉及探求可以证实的科学本质和界限问题。它能够不仅教导我们如何思考，而且教导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吗？它能够以客观有效而又令人信服的方式确定存在的意义吗？

329 这个问题渗透在他的整个方法论研究之中，后来他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aolog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sup>①</sup>一文里进一步对此作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最初是韦伯在1913年为社会政策协会写的，然后加以扩充后发表于《逻各斯》（*Logos*）杂志上，最后，在对学学生发表的讲演《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sup>②</sup>中又用一般的术语再次进行了论述。韦伯对那些问题的态度应当在这里加以讨论，因为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从传记角度来讲也非常重要，事实上，这把我们直接带到了他的精神人格的核心。不管是作为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的思想家，还是作为一名恪尽职守的教师，

① 参见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451ff.

② *Dortselbst*, 524ff.

抑或是作为一个意识到自己能够以卓越的雄辩和鼓动才能迫使人们信服他、最能够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他都对那些问题抱有同样的兴趣。

从韦伯的态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身上业已达到超越个人层面的冲突：作为行动者和思想者这两种同样强烈的本质倾向之间的冲突，以及他追求不带偏见、普遍有效和理智地把握世界的才智与他同样卓越的树立信念并义无反顾地为这些信念而奋斗的能力之间的冲突。他的逻辑研究表明，文化科学虽然立足于无法证实的前提，却仍然能够提供有效的认识。这里的问题是，就其取向而言，是由价值关系决定如何应对另一种超科学的因素，即“实际的”价值判断呢？<sup>①</sup>

当一个人“根据高度个人化的情感、愿望或者意识到的某种特定义务而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时，价值判断就产生了。换句话说，“实际的”价值判断就是对一种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做出可以接受还是应当摒弃、值得希冀还是不值得希冀、是好还是坏的判断。因此，在被视为“重要”，因而“值得知道的”那些事件和现象的理论价值关系中，研究者在观察和认知对象时与对象保持着距离，所以能够改变对于这个对象的观点；而在实际的价值判断中，个人本性中主动和受意愿驱使的一面，以及关注自身利益和理想的一面就会凸显出来，冲破对现实保持的思辨关系，限制自己的视野，有可能因为情感而模糊意识的明镜，由此削弱思维中的真理内涵。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以世界法官的态度来研究他们的对象，对事件的描述中渗透着个人的评论。事实很快就表明，他们的标准受时代的制约，有效期甚短。 330

社会科学尤其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研究者的视线为维持现状的愿望所模糊。因为作为由一定的人群组成的统治机构，国家期待着这些研究者为国家在经济和政治行为提供指南，为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提供支持。由于研究者自己属于统治阶层，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领取薪俸，因而他们的兴趣当然附着于给他们提供了特权的制度。显然，他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将对实际情况的认识与受特定的现实利益影响而做出的价值判断混淆。韦伯观察到，在他那个领域里，学者们常常是不自觉地既作为真理的奴仆又作为现存制度的奴仆在讲话，因而在“字里行间”代表了一种打上了自己那个阶层利益的烙印的政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卡尔·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说法也不无道理。

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将理论的价值关系和实际的价值判断、认识与意愿这两种精神功能区分开来呢？很多人一再对此持否定态度，韦伯自己也知道，他提出的是一个研究者的理想，完全实现这种理想与完整的人格相抵触；他知道，即使在认识过程中，也很难将思维着的人和行动着的人区分开来。但是，研究者应当认可这样一种理想，并尽

<sup>①</sup> 韦伯的理论涉及的仅仅是伦理—政治的价值判断，与审美的价值判断无涉。

331

可能地接近这一理想。因为就像一个神秘主义者想要“得到”上帝，首先要遏制自己意志的冲动；一个思想家如果要成为真理的代言人，就先得放弃自己在事件中的实际利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就应当让自己和别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什么时候是一个思维着的研究者，什么时候是一个受意愿驱使的研究者；他的论证在什么地方诉诸理性，在什么地方诉诸感情”。

因此，尤其重要的是，在学术研究中要避免暗地里将客观的判断和个人的判断混杂在一起，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思考者提供的是客观真理，其实他提出的只是信念而已。不过，他绝不当避免坚持自己的理想。相反，“无原则与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他的知识对建构生活特别有用，因此对政治路线负有责任——肩负着双重任务：为真理而弘扬真理和“用明确和自觉选择的信念指导自己的行动”。

这些既是对研究者也是对大学教师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对教社会科学的教师，韦伯甚至得出了更为具体的结论。如前所述，还是一名青年学生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应允许拥有学术权威和职务尊严的教授在高高的讲坛上将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强加给对此既不能抗拒也不能加以辩驳的学生们。尤其是使用教职在教室里培养政治观点，韦伯认为是绝对应当受到谴责的。在特雷席克的课堂上，他带着抗议的心情目睹了施加煽动性影响对青年学生的心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在他看来，暗度陈仓则更加糟糕。因此，他做出了如下判断：

332

在那些认为在经验范畴的讨论中不应当放弃做出实际评价的学者中，恰恰是那些最富有激情的人——如特雷席克，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蒙森——实际上是我们最能够忍受的。因为正是他们强调情感的强烈程度至少使学生自己能够揣测到教师的评价所具有的主观性，揣测到这种主观性可能会使教师的论断黯然失色，因而学生们会自己去作教师因其性情而无法做到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也使韦伯对于把科学的表述与个人的价值判断掺和在在一起的做法感到疑虑。他们让学生习惯于引起轰动的东西，并因此而败坏他们求实的兴致。大学教师在教室里唯一有充分理由奉行的教学理想，就是培养学生学术上的正直诚实和实事求是的客观性。与事实无关的东西不应当进入课堂，“尤其是爱和恨”之类的东西。学生应当在课堂上从教师那里学习如何满足于直接完成自己所接受的任务。因此，教师应当消失在教授的内容之后，抑制“他情不自禁地表现个人的好恶和其他感受”的需求。

韦伯认为，每个人都想要做一个“有个性的人”并且加以炫耀的做法是一种时代病，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表现，尤其不应在年轻人中间提倡。“新一代人需要重新习惯于

这样的思想：不能有意识地想要做一个有个性的人；（也许）唯一能够成为有个性人的方式就是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一项‘事业’，不管这项事业和由此产生的‘时代要求’是什么。”韦伯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只要他以科学的名义讲话，他就要抑制自己的性情——一种在意愿的领域每时每刻都强迫他选择与拒绝、要求与判断、爱与恨的性情。在工作中，他个人完全置身于事业之后。尽管如此，在他的样貌中得以透出的光芒，仍然具有神秘的吸引力。事实上，也许正是因为他强有力地抑制自己的信念和隐藏自己的总体个性，所以他才具有这么大的魅力。

韦伯认为，通过政治、道德或者其他“实际的”文化理想去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不是大学的任务，他的这种观点逆时代潮流而动，这个潮流产生于正在成熟的一代所具有的特别的内在“需要”。一方面，社会主义通过政治宣传，特别是通过卡尔·马克思给人深刻印象、对心灵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阐释，动摇了包裹着资产阶级存在的舒适外壳。社会主义要求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通过从精神上把大众从基督教会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削弱现存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古典贵族人生理想的名义下摧毁了仍然建立在基督教思想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律法，因此而具有毁灭性的作用。一切传统的价值观、理想、概念、思维方式（在它们似乎不容置疑的指引下，人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感觉自己有明确的方向）现在都受到了质疑，都被认为是随波逐流的大众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偏见，而这些偏见归根结底证实了大众自己的平庸。马克思借着民主理想的名义追求革命；相反，尼采则要求少数人的统治，要培养一种强有力的贵族式的人物类型，这种人物由于他们的自我肯定而将会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充分的满足。虽然这两位思想家的主导思想南辕北辙，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力求瓦解从“基督教文明”这个五花八门和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中产生的价值观念。那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究竟应当遵循哪一种思想呢？

333

伟大的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新宣言（其中不少内容都可以追溯到尼采的思想）也否定机器时代、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切统治力量。这个宣言诉诸少数精神贵族，内容涉及存在的方式以及对待生活的贵族式的一般态度，但没有提出行为准则和具体而又有实在内容的新目标。它所具有的影响力仅限于一个很小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只有社会主义拥有一个涵盖面广泛的集体主义理想，一种面向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新信仰。谁要是抛弃了旧的神祇，又没有转向社会主义或者艺术家贵族主义，就会感到处于“自由的真空”之中。多少世纪以来主宰着个人生活的所有集体观念，诸如基督教、产生于基督教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唯心主义哲学，充满道德感的职业观、科学、国家、民族、家庭——一切直到世纪之交仍然维系和支撑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东西现在都受到质疑。这是一种让多数正在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定型的年轻人难以应对的状况。他们感觉被上帝遗弃了，却又找不到自己想遵循的法则。像父辈的智慧和自

334

已有把握的直觉这样的遗产对他们已经不再灵验，一切指导行动的准则都极不稳定，年轻人的心灵因此而受到震撼。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大学同时作为精神生活中心和教育机构而存在，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提供精神生活中使用的工具，还应当担负起其他的一些任务，诸如培养完整的人格，传授信念和思想品质，教给他们对生活中所有重大问题做出实际判断的立场，重建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发表关于世界观的宣言。不仅神学和哲学应当担负起这些任务，其他的文化科学学科似乎也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更应致力于培养政治意志。有了一种能做出价值判断的意识和一种世界观（至于什么样的世界观尚待确定），支离破碎的专业知识就会重新整合为统一的知识。所以，人们认为，学生在大学教师身上应当找到的不仅是一个教师，也是一个为自己的意愿指明目标，为自己的个人发展指明方向的导师。

一旦出现这样的倾向，韦伯（他自己还是一名大学青年教师的时候，就被他的学生尊为导师了，尽管他自己并不愿意，也不知情）就强烈地加以反对。因为使一个人成为杰出学者和教师的特质，并不说明他有能力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上做学生的导师。至于他是不是这样一个导师，他在讲坛上的作为完全不能提供任何证明。

335

但愿一个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年轻人提供咨询并且享有他们的信赖的教授，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如果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涉足世界观和党派观点之争，那就让他到外面生活的集市上去——新闻界、集会、协会以及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他在自己的听众和那些持有异议者不得不保持缄默的地方展示他作为信仰者的勇气，这就实在过于取巧了。

对韦伯而言，在教室里暗示某种世界观的做法与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教化一样令人反感。在一个具有共同信仰的时代，这也许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恰恰是缺乏一个统一取向背景下的一致性。而在这时候将主观的智识强加给年轻人，只会增加他们心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在各式各样的预言中，在这个意义上染上了个人色彩的教授的预言是唯一完全不能忍受的。”

这一切首先是针对经验科学中的专业学者而言的。<sup>①</sup> 价值和价值评估对他而言不是用来加以宣告的对象，而（当然是）认识和学说的对象。他可以让作为认知者和作为行动的人都直接面对价值，并为其指出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他应做的仅此而已。对于价值本身做出价值判断，或者在不同的价值之间选择用什么样的价值来做人生

① 对于神学家、美学家、道德学家和法学家，意义则不尽相同。

的指南，也就是说，关于一个人应当实现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决定，应当由个人自己做出。“科学的论辩不是要强迫任何人在价值领域做出决定。”做出这样的决定所借助的不是知性，而是其他手段，任何人都不应当剥夺个人做出这个决定的权利。

这表现了韦伯如何把经验科学的任务与“教条式”科学的任务区别开来。他对哲学的任务怎么看呢？哲学是不是就有资格在讲坛上发布“宣言”呢？韦伯对这个问题没有贸然做出判断：“对此我一无所知。”从根本上说，他将科学的与超科学的哲学区分开来。逻辑学、认识论以及确定各种评估意义的价值学说处于分界线的这一面；处于另一面的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它试图解释存在的超经验的意义，试图提供一个统一和客观的  
336  
世界观。对于确实得到公认的那些价值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它们永恒的客观效力，我们无法知道，只能表示相信。谁要是否认科学真理的价值，或者否认艺术真理、民族情感或者宗教的价值，你是无法用逻辑的手段来说服他的。对于实际行动提供普遍有效的指导就更不可能了，单是下述一点就可以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不可能将文化价值等同于道德律令。虽然思辨哲学按其方法而论是一种科学，但它没有科学可以把握的对象。

这里我们到达了这样一个点，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一条窄窄的缝隙窥见韦伯的伦理世界观。他看到可能的理想分化成了具有极大张力的对立的两极。一方面，即使文化价值与所有的道德都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些价值也不会被放弃。反之，一种拒绝所有文化价值而又不具有内在矛盾的道德（如托尔斯泰的道德）是可能的。在某些价值领域，价值只能由在道德上负“疚”的人来实现。在政治行动领域尤其如此（对此我们后面还会谈到）<sup>①</sup>，但这不是唯一的领域。

然而，规范伦理学即使是在它自己的领域里，也面临着自己无法决定的问题，而只有依据前述那些超越道德的价值才有可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决定。例如，它无法解决单是道德行动自身内含的价值——“纯粹意志”或者意愿——是否就能成为这个行动自身足够的理由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是否也必须考虑对于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承担责任的问题。有谁胆敢对“登山宝训”中的道德观点，诸如“勿抗恶”的箴言，或者“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戒律“科学地”进行反驳呢？然而很显然，从尘世的观点来看，这里面含有一个让人丧失尊严的戒律。一个人必须在这种伦理所主张的宗教尊严和男人的尊严之间做出选择，后者倡导与此完全不同的伦理：“抗恶，否则让恶占了上风你也难辞其咎。”归根结底，对单个人来讲，二者之中一个是魔鬼，另一个是  
337  
上帝；而个人必须做出决定，指出对他自己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不管在哪里，价值最终都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东西，而始终关系到不可调和的生死之争，就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20章。

像‘上帝’和‘魔鬼’之争一样。”

韦伯在这里心中想到的主要是什么，反映在《中间插入的反思》（“Zwischenbetrachtung”）一文中<sup>①</sup>，这是他加进自己的宗教社会学著作中的一节。<sup>②</sup> 在这里，韦伯借助于对历史所做的概括性考察指出，如果将产生于宗教和产生于世俗取向的各种理想和生命学说前后一贯地想到底，并有意识地将其选择作为生活指南的话，那么经过理性思考而升华了的对世界的宗教解释（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救赎的宗教”），就必定会而且实际上已经与所有独自发展起来的世俗价值领域不可避免地处于日益紧张的关系中。

不过，这样的情形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大多数人甚至对这种事态不忍一睹，他们都按照非常矛盾的理想和原则去生活。日常生活的浅薄正在于，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得过且过的人对于这些作为死对头的价值观念的相互掺和不了解，更主要的是他并不想了解；他宁可逃避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做出选择，逃避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最终决定哪一种价值是由上帝主宰，哪一种价值是由魔鬼主宰。尽管行动者随时准备妥协和调整的态度不可避免，但是能够彻底看清楚自身构造的思维还必须穿透一个行动者的保护层，行动者用这个保护层来防止被难以忍受的洞察力看透。

338 这样，韦伯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很多人——例如大多数现代基督徒——所不愿看到的东西。每一种救赎宗教核心的伦理要求都是把友爱作为无私奉献的那些团体的力量，并且干脆作为人类团结的力量。这种友爱与各种各样的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行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后者关注的是始终在不断丰富和扩展的文化财富。此外，友爱与生活中非理性的力量——经济、政治制度、艺术和性爱——的关系甚至更加紧张，因为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向缺乏友爱的行为，导向隐藏在心里的无情无爱，导向完全无法在伦理上加以规范的人际关系，导向人们拒绝做上帝的奴仆。不过，最根本的、人们最清楚的紧张关系存在于救赎宗教和思维认知领域之间，尽管宗教本身不断同理智主义建立新的联盟。因为向前推进的经验知识与宗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相冲突：宗教主张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一个在道德上以有意义的方式建构的宇宙；而经验知识通过把世界变成一种因果机制而最终完成了对世界的祛魅。

这样，基于宗教和基于经验科学而最终形成的世界观便处在了对立的两极。宗教并不要求对存在者或者对规范的有效性具有终极的学术知识，而是要求通过对意义的把握（不是通过知性，而是通过启示）而对世界有一个终极的态度。与此相反，科学在哲学（和神学）为阐明终极意义以及如何把握这种意义的不同态度所做的一切努力中，看到的无非是力求摆脱理智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的一种学术努力。最后，救赎宗教不仅与世俗

① 这里的“中间”意指这篇论文写于“中国宗教”和“印度宗教”两项研究之间。——译者注

② 参见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536ff.



文化中个别的价值领域关系紧张，而且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否定。它们所否定的是一个没有让合理平衡的道德要求得到满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仅注定要遭受不应遭受的苦难和毫无意义的死亡，而且他们简直就是为犯罪创造出来的。下面的观点将这个世界道德的贬值推向了极致：一切最高的文化价值都承载着具体的负罪感，因为这些价值都以与友爱的要求相悖的存在方式为前提。沉重的宗教负罪感似乎是一切文化、一个文化世界中的一切行动乃至一切有形式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韦伯明确解释说，这些阐述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哲学，而是要揭开掩盖着事实的面纱，进而揭示经过透彻思考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思想上构建生活制度的冲突类型，仅仅说明某些冲突在某些地方具有内在可能性和‘适宜性’，而不是说，那种认为这些冲突已经被‘扬弃’的观点不可能存在。”这可以被理解为，从经验认识的观点看，虽然在价值领域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冲突，因而排除了形成统一世界观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推测和信仰通过其他——虽然是无法证实的——解释来超越这种多元性。在1909年2月19日的一封信中有下面一段话，从中也许可以看出韦伯自己对那些可能性的看法：“虽然我在宗教方面绝对不合调（unmusikalisch），而且既没有需要也没有能力在自己心中建造一座具有宗教特征的心灵建筑，但是，经过仔细的自我省视之后我可以这样说，我既不反宗教，也不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irreligiös）。”

339

韦伯坚持认为，对那些事实真相做清醒的经验观察会导致对“多神”的承认，并将此作为唯一对自己适用的形而上学：

这就跟在诸神和魔鬼还没有丧失其魅力的古老世界里一样，只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言说罢了。那时古希腊人向阿佛洛狄特（Aphrodite）献祭，然后向阿波罗（Apollo）献祭，尤其是每个人都向他那个城邦的神祇献祭。今天的情形就像当年的古希腊一样，虽然这些行为的魅力已不在，神秘性也已消失，但它们今天仍然具有内在的真实性。主宰这些神祇和他们的争斗的是命运，但肯定不是科学。

※ ※ ※

韦伯反对把这种观点解释为“相对主义”，认为这种解释是“最粗暴的误解”。因为在他看来，不言而喻的是，具体理想的绝对性是无法证实的；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他相信具体理想的绝对性，并且要求他自己为其实现而努力。关于应然的本质问题，人们可以有不尽相同但同样言之成理的见解，但是他坚信，只有选择和承认理想、使命和义务才能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尊严。我们的命运注定要我们知道，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研究——无论我们的研究多么出色——之中推导出它

340 们的意义，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它们的意义。即使理性之光不停地向前推进，认识的王国也仍然将会被包裹在无法解释的神秘之中。所以，“世界观”永远不会是逐渐递增的经验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最令我们激动不已的最高理想只有在同其他理想的斗争中才能在所有的时代都发挥效力。正像我们视自己的理想为神圣一样，其他人也把他们的理想看得同样神圣。

谁要是接受不了这种见解，就不要去向科学求教，因为如果科学忠实于自己的话，就不会给他提供答案。他应当去求教于先知或者救世主，信奉并追随先知或救世主。他应当知道，这样他就免不了会牺牲理智 [“吾之信彼，非因其悖理，因其绝对悖理也” (Credo non quod sed quia absurdum)] ——这是每一个实证宗教人士的关键特征。

## 2

一如前述，韦伯对文化逻辑问题的研究只是作为他新的著述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大概是在1903年的下半年，他在完成了关于罗舍尔和科尼斯的论文的第一部分之后，紧接着便开始了他的至此最为著名的著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部分完成于美国之行前的1904年初夏；第二部分发表于一年之后，反映了他所获得的新见闻。这些见闻之所以让韦伯如此激动，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美国仍然到处可以观察到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现存的痕迹，能够观察到以“理想类型”的纯粹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本身。很可能他早就有写这部论著的想法，至少在他开始恢复时就有了。在罗马逗留时，他埋头研究中世纪修道院和教团的历史及章程也许就是为此做准备。

341 这部论著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历史研究系列的第一部，这个系列研究把宗教意识和日常经济生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现象放在一起，此外还对宗教与社会生活的所有重要的结构形态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考察。这些论文全都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上。作为杂志的编者之一，韦伯感到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不断地为其供稿。同时，他总是急于发表他的东西，这样一份如此不苛求的出版物最方便不过了。因此，他第二阶段的著述生前从未成书。这样，他新放射出的光芒起初只是在狭窄的学术圈子里照耀。不过，正是他的第一篇引起一系列争论的宗教社会学的论文，远远超出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的读者圈。刊载这篇论文的几期很快售罄。尽管如此，但由于

韦伯不想为结集出书而耽误时间，因而这篇论文在十几年间竟无处可寻。此事后面还会谈及。直到他去世前一年，韦伯才应多人敦请，决定收获自己的部分学术成果。他仅有时间修订收集在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卷中的论文，但生前未能看到这一卷出版。

不过，上面提到那些并不是韦伯唯一研究的问题。他重新获得的创造力总是分布在若干条并行流淌的河流之中，别人的要求和外界的刺激有时还轻而易举地硬将这种创造力引入旁边的支流。他的确对一切都有兴趣，对知识的渴求无边无际。我们已经讨论过他的逻辑学的著述，但他同时兼顾着自己以前的学术研究。以前对国家政策尤其是对农业政策的兴趣，任何时候都可能重新被激发出来。1903年秋，他本来已经打算进行两项别的研究，就在这时一项旨在扩展和建立遗产信托的新法案出台了。体现在法案中的意识形态包括通过支持土地贵族来保存贵族传统和精神。这呼唤着身为斗士的韦伯起而反对隐藏着物质和政治上的阶级利益的保守浪漫主义。他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了在柏林和弗赖堡时整理出的农业统计资料，写成了一篇将严密的科学论证和犀利的论辩融于一体的檄文，把法案批驳得体无完肤。他的笔又变成了投枪。他指出，拟议中的立法将加速土地和资本在少数人手里集中，激化农村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赶走自由的德国农民，而将斯拉夫族的外国人引进这个国家。他揭露了隐藏在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真正动机，指出王朝和统治阶层的兴趣在于扩大顺从国家权威的领主和廷臣这个社会阶层。国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试图通过法律来满足自己的某些虚荣心，也就是满足资产阶级的资本占有者对营利“高尚化”和“贵族”生活方式的追求。韦伯的论述激起了强烈的愤怒，但也产生了效果。议案的审议被推迟，最后不了了之。这项法案最终没有变成法律。

342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又一次强烈地激发了韦伯对政治的兴趣。他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了俄语，急切地阅读多份俄语报纸，关注着每天的事态，并同一位在俄国教授宪法的教授基斯提亚科夫斯基（Th. Kistiakowski）进行了热烈的口头探讨，后者是为革命做了准备工作的立宪民主党（Kadetten）精神领袖之一，当时逃亡到了海德堡。“解放同盟”起草民主宪法的信息刺激得韦伯要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上就此发表几篇“评论”。然而，这些评论很快就扩展成了两期小字号的专刊，成了俄国解放斗争的编年史一样的历史日志。

韦伯将自己完全移入俄国人民的心灵和文化之中，几个月里屏息凝神地密切注视着俄国戏剧性的事态发展。也许这件事关系到这个庞大的国家转入欧洲发展轨道的问题，因而是建立一种绝对自由的文化的最后机会之一。也许在“经济和思想‘革命’、大为人所诟病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同样大为人所诟病的‘主观主义’都还未被削弱”的现在，为广大民众中的那些由于这些原因，而且仅仅由于这些原因，而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的人去获取“不可转让的个人权利”那一刻已经到来了。如果世界在经济上和

343 精神上都“满足”了，那么他们与这些权利就永远无缘了。让韦伯最受触动的是俄国的事件对德国发展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这个仅仅因为其规模就对它的西方邻国造成沉重压力的东方巨人，是不是有可能用西欧的自由理念加以塑造，从而使王朝的权力欲不再靠沙皇制度来支撑？在那里有没有可能通过俄国“知识界”的牺牲而催生一部宪法，能为韦伯自己国家的自由潮流引来一股活水？

韦伯很快认识到，从专制制度中争取到的形式徒具自由的外表，而不是自由本身。这个“警察国家”以真正亚细亚的诡计打破了自己设置的限制。有能力解决重大问题的政治家掌不了权：“虽然俄国的局势在呼唤一位政治家，但是个人化的政权怀有的王朝野心在俄国像在其他地方，例如像在德国一样，容不得伟大的改革家。”革命毫无结果，新的灾祸将会来临。

所有经济方面的征兆都预示着越来越缺乏自由的倾向，在按工业化方式组织起来的生活中，新隶属关系的架构到处都已经完成了：

面对这种状况，那些一直害怕在未来的世界里“民主”和“个人主义”太多，而“权威”、“贵族政治”以及对职权的尊重不足的人，终于可以放下心来。民主的个人主义之树不会长到天一般高，这一点已经被安排妥帖了。所有的经验都表明，历史无情地创造了新的“贵族统治”和“权威”；任何人只要认为为了自己——或者为了“人民”——有这个必要，都可以依附于它们。



344 韦伯接着写了几篇关于逻辑学的论文。但在1908年秋，他则倾力为《简明政治科学词典》撰写了一篇题为《古代农业状况》（“Agrarverhältnisse des Altertums”）的历史社会学长文。但是它的长度——136页，小字体两栏对开——完全超出了这部汇编的篇幅，简约的题目只体现了文章的一小部分内容。实际上，文章提供的是一种古代社会学，即对古代社会生活所有最重要的结构形态所做的历史分析和概念梳理。他将浩繁的资料以最简洁、最精确的形式浓缩在这篇长文中。导言提出了古代政治世界的经济理论，这个世界不同组织阶段的特征是借理想类型来把握的。韦伯阐明了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由基本的地理条件——水土分布——决定，以及古代文化的特征是如何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与中世纪和现代的内陆文化不同，古代文化是一种海岸与河岸文化。在扼要叙述了古代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古以色列的结构形式之后，他详细分析了古代西方社会——希腊、希腊化时代、罗马以及罗马帝国时代。他把所有的重要社会现象都加以比较和对照，并将此与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现象加以对比，以一种现象阐释另一种

现象，将典型和个别区分开来，指出同名事物之间的差异，并借助精确的“理想类型”指明历史学家将现代现象移植进过去而出现阐释谬误的地方。

大约在同一时间，即1908—1909年间，韦伯再一次回到自己狭义的专业领域，做了非常深入的专题研究。起因是一项由社会政策协会筹划，主要由韦伯的弟弟和同事阿尔弗雷德·韦伯发起的关于“选择与适应”——大工业中工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命运——的调查。和对农业工人的调查一样，这也是在通过艰难的单项研究而获得的原始资料基础上，对现代大众生活中仍然不为人知的领域所做的集体研究。

这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现代大工业造就了什么样的人，它会给这些人带来什么样的职业命运或者其他命运？换句话说，对于很大一部分迫不得已而被束缚在机器上的现代人来说，机器对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有什么影响？不同的工业流程会造就什么样的心理特质？研究项目的标题中使用的概念“选择”和“适应”表达的是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观点，即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知识也将会是富有成果的。因此，马克斯·韦伯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可能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新洞见的研究对象，还有方法问题。毕竟，集体研究（部分将由学术研究的新手，即不同系科的博士生承担）的结果，将取决于选择正确的途径和富有成果的观点。

345

所以，他给协会写了一份内容全面的概要，阐述了这项研究计划的重大目标，同时也提供了关于正确的科学步骤的详细指导说明。他甚至还提到，寄出问卷时应随信附上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回邮信封。这里让人感受到一个教师的热忱：他对于为别人排忧解难和帮助别人为学术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这两个方面怀有同样强烈的兴趣。然而，他提供的指导说明只是他自己那时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结果。韦伯检视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拟议中的研究项目，并提供了一个自己的专题研究的范例。

这些研究成果以《论工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学》（“Zur Psychophysik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为题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上作为系列文章发表。这项具体研究的素材是由奥灵豪森的纺织厂提供的，这个纺织厂也为他的许多其他著述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素材。1908年夏天，他在亲戚家住了数周，埋头于工厂的工资簿和织机记录，勤奋地做出了纺织工人每小时、每天和每周的生产效率的曲线图，以期发现造成生产效率波动的心理物理上的原因。然而，这些辛苦的考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对科学程序只具“说明”意义。他的主要意图是要厘清方法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自然科学中的遗传学说以及心理物理学的实验能否用于社会科学分析的问题。为此韦伯详细研究了最重要的心理物理学文献，特别钻研了克勒佩林（Krapelin）及其门徒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他们使用的方法和概念，然后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从“原则”上讲是可能的，他们的心理物理概念对拟议中的调查研究也有用处，但是，不管是实验室的“精确”实验，还是遗传理论不确定的结果，都不能用来对群集现象做社会科

346

学的分析。

在澄清了这一切之后，韦伯又回到了他的普通社会学研究，并且有了双重的课题。他要继续写宗教社会学的论文，同时应出版商保罗·西贝克（Paul Siebeck）之邀，准备编撰一部大型《政治经济学大纲》。他草拟了计划，找到了撰稿人，并考虑自己除了组织工作之外还要撰写最重要的章节。宗教社会学的著述和新的研究将部分使用同样的材料，并与后者齐头并进。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著述。

按照韦伯自己的说法，这些著述旨在为了解现代西方人的特性，为认识西方人的发展和文化做出贡献。起初他计划从宗教改革开始回溯，以分析中世纪和早期基督教同社会和经济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但在恩斯特·特勒尔奇开始对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进行研究（他的第一篇论文于1908年年初发表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之后，韦伯猜想他们二人的研究领域会过于接近，所以一时便转向了别的研究课题。当他（大约在1911年）重新回到宗教社会学研究时，他的兴趣转向了东方——中国、日本、印度，然后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想仔细研究一下世界五大宗教与经济伦理的关系。最后以对早期基督教的分析作结，又回到计划的起点。在第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中，韦伯明确表示只是想要阐明一种因果序列：意识中的宗教内容对日常经济生活的影响。现在他将研究课题扩展了，还要进一步研究另一个序列，即不同文化圈的物质、经济和地理环境对其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他把这个系列称作“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正如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一样，这里的“经济伦理”不是指伦理学理论和神学理论，而是指产生于宗教的实际的行为冲动。

347

这些关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著述并不是要在某一方面提出任何定论，因为韦伯在中国、日本和印度问题上依赖于翻译资料；关于犹太教，他看到的文献几乎无法驾驭。所以他（在此之前，他所有的专业研究都立足于对原始资料做仔细的研究）对这些关于亚洲的著述并没有什么奢望，但仍然希望通过他对问题的提法而使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事实呈现出新的面目；他尤其希望把学术分析从那些很自然地影响了几乎所有宗教史专门研究的宗教和道德价值判断中解放出来，以此为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铺平道路。

由于不可能对宗教和经济之间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各项细节加以研究，所以，韦伯在每一项研究中都强调某些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中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这些社会阶层对相关宗教的实践伦理影响最大，并赋予这种宗教以经济伦理上的重要特征。例如，在中国，这意味着领取国家俸禄的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与儒教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印度，是早期印度教与婆罗门这一有教养的文人世袭种姓之间的关系。早期的佛教靠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传播，早期的伊斯兰教靠征服世界的斗士传播，流亡之后的犹太教通过市民中的“贱民”得以流传，基督教则是通过游动工匠和城邦市民而得以流传。

不过，韦伯在这里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一种宗教内容所具有的特征反映

了信奉那种宗教的社会阶层的物质需求或其社会状况的“功能”。无论受经济和政治决定的社会因素对宗教伦理有多么深刻的影响，某种宗教伦理的特征都主要来自宗教的源头，来自宗教的福音传播与应许的内容，以及信奉者的宗教需求。因果序列到处都在起作用：“直接支配着人的行动的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由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则常常作为扳道工而决定着受利益的不断变化驱使的行动走上哪一条轨道。”过去，巫术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产生于信奉这些力量的强制性观念，在各处都是塑造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力量。各处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对神灵和魔鬼的原始信仰逐渐升华成救赎宗教，即升华成一种宗教虔诚，这种宗教虔诚否定现存的世界，力图从苦难和罪孽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能够在现世或来世中得到实现。 348

人一旦从眼前想开去，他心中就会生出一种需求，要求世界的建构应当是或者能够是一个安排得富有意义的宇宙；他就会探询关于幸福与功德之间的关系，找寻能满足理性要求的对苦难、罪孽和死亡的合理解释，从而创造一种“神义论”。换句话说，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经过了思维的加工，理性化过程消解了巫术观念，越来越让世界“祛魅”和祛神。宗教由巫术变成了学说。在原始的世界观瓦解之后，现在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对世界的理性统治，一是神秘体验。但是，不仅宗教自身打上了思想不断发展的烙印，理性化的过程也在多条轨道上运行，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攫住了所有文明的产物，包括经济、国家、律法、科学和艺术。

尤其是西方文明，它的所有形态都受到了一种条理化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发端于希腊文化，在宗教改革时期又融入了具有特定目标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样一种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理性主义的融合，使现代文明有别于古代文明，这两者的特征又使现代西方文明有别于亚洲文明。当然，东方也经历了理性化过程，然而它所有的理性化过程，不管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是艺术的，都没有走上西方特有的道路。

对韦伯来说，认识到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和它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是他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349 据此，他起初研究宗教与经济关系的课题扩展成了更为广泛的对整个西方文明特征的研究：为什么产生可检验性真理的理性科学只存在于西方？为什么只有西方才有和声音乐，才有采用理性建构的建筑与造型艺术？为什么只有西方才有等级制国家，才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官员组织、专家、议会、政党体制，以及作为具有理性的宪法和理性的律法的政治建制的国家？为什么只有西方出现了现代生活中最能够决定命运的力量——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这一切都只存在于西方？这些问题现在不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进入他的研究，迫使他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实际上是超越任何专业学术领域，以认识尘世的现实。

他还发现，同现代西方教会的产生一样，现代西方国家的产生是法学家所为——法

学上的理性主义是罗马人的一项特殊成就；西方科学所具有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资产阶级的“企业资本主义”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得测度技术方面的因素——诸如精确计算等等——成为可能。他最令人惊讶的结论之一是：正是科学共同决定了西方艺术，至少是建筑艺术、造型艺术以及音乐的特征。他的同时代人都诋毁理性主义，很多艺术家甚至将其视为自己创造力的阻碍，所以这个发现尤其让韦伯感到激动。他现在打算写一部艺术社会学，作为这项工作的第一步，他在完成其他项目的同时，于1909年前后着手进行音乐的理性和社会学基础的研究。这项研究把他带进了人类学最生僻的领域，带入了最困难的乐律计算和象征性意义的研究。

350 然而，在这项研究提纲拟定以后，他又迫使自己回到了已经开始并答应完成的项目。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新论文系列，他大约在1913年就完成了主要部分，不过它们直到1915年才开始发表。韦伯起初希望再增添一些学术参考书目并对几个部分做些增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他的应征服役使他未能如愿。不过，最终他还是开始陆续发表这个论文系列，首先发表的是关于儒教和道教的部分，并加上了一篇历史哲学的导言。他1915年从部队退役，之后又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关于中国的部分在1919年第二次印行时他仔细做了修订。

※ ※ ※

下面我们回头再更深入地讨论一下韦伯宗教社会学方面的第一部论著。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这是严重的神经疾病迫使韦伯悲剧性地丧失了生命活力之后，让他这颗学术之星重新闪耀的第一部著述；另一个原因是，这部论著与他最根本的人格有不解之缘，并以难以确定的方式打上了他人格的烙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部论著也堪称范例。它的成果之一——这一点为所有后来的研究所证实——就是以实证方法克服了“唯物”史观。韦伯十分钦佩卡尔·马克思的天才构建，认为探询事件的经济和技术缘由极富成效，确实是特别富有新意的启发式原则，这个原则为知识的求索进入整个人迹未至的领域指明了方向。但是，他不仅拒绝把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拒绝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为因果阐释中的公分母。

351 不抱任何偏见的研究早就教导韦伯，每一种文化生活现象也为经济因素所决定，但并非仅仅为经济因素所决定。早在1892—1893年间，他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在探寻德国东部农民离弃土地外流的原因时，就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观点：与“生计问题”一样，意识形态的冲动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与神学家格雷共同进行第二次农业工人状况调查时，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在调查农业人口的经济状况时，同时探究道德和宗教状况以及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显然，他很早就在关注着理想的力量所具有的建构世界的意义这个问题。也许他探索知识的取向——坚持不懈地对宗教进行分析研究——是他母系家



族真诚的宗教虔诚在他身上的传承形式。

当然，他现在不是要用唯心论的历史建构来取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建构——二者同样是可能的，但“对于求真来说，二者同样几无用途”——而是要阐明在每一种重要现象中存在的各种形塑力量之间始终变化着的交互作用。这部论著在方法论上也很有意思，原因之一就在于，韦伯在这部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他同时在自己的逻辑研究中加以分析的、以文化社会学的方式探求真理的研究方法。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他如何建构了诸如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其对立面“传统主义”等等具有核心意义的理想类型概念。这些概念不是被定义，而是被“构建”的，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来自演绎，而是源于现实的特征是逐渐地从历史研究中显现出来的：起初以抽象概念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在叙述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丰富而又形象生动的内涵。韦伯进而小心谨慎地努力寻求直观地获得的相互关联中的因果关系。他无意“炫耀”思想的富有，而是想尽可能提供得到验证的真理，所以他让那些天才的构想经受严格的逻辑修正。

这篇论文——在主体部分和注释中——形式上的畸形和一以贯之的二元论运思方式，或许从根本上说是由此决定的。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出自为期刊节省篇幅的考虑。读者必须在阅读上面正文中令人惊异的综合分析时，同时阅读下面注释中极为小心谨慎的学术论证。每一个论点都附有资料出处。最重要的细节，包括一篇关于现代职业概念起源的文字学论文，都可以在小号字体印出的注释中找到。在第二版中，其他都没有变动，但“脚注的肿瘤”又长大了很多，因为收入了韦伯与他的批评者如勃伦塔诺和佐姆巴特的论辩；他对这些人还没有——像对拉赫法尔（Rachfahl）那样——专门进行过反驳。韦伯的观点过于出人意料，他仔细的修正起初还未完全被人消化吸收，这成了一些争论的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些争论表明，这样一部著述确实需要提供完整的学术参考资料和所有资料的出处。

352

最后，韦伯认为，认知与评价在历史叙述的范围内可以分而论之。任何没有被韦伯这个逻辑论证说服的人，如果钻研一下这部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方法的论著，也许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在整个论著中，韦伯都避免对他所分析的不同宗教和伦理建构的价值做出判断；他没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在“众神”之间论资排辈。每当他强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时，例如在结尾处，他都要立即指出，自己现在已经离开了科学的地界。不同形式的天主教和新教充满意义的内容得到了一个对这些内容不抱任何偏见的求真者同样公允的对待（后来他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亚洲的宗教）。也许可以说，韦伯对人类精神所有的表现形式从原则上讲不是以“不愠怒不偏袒”（sine ira et studio）的态度，而是以同样的爱去理解。这当然是一种思想者不涉及利害计较的爱，这个思想者放弃了自己对这些精神内容中其中一种的占有。

他始终保留了对福音书和真正的基督教宗教虔诚的敬意。在他看来，耶稣的寓言、

登山宝训、保罗的使徒书，《旧约全书》中尤其是寓言书和《约伯记》都是富有宗教情感和深度的无可比拟的文献。不过，成年后，他就不再受宗教内容的束缚，因此能够作为思想家带着同样的兴趣转向每一种宗教体系。尽管有这样一种“超然于外”的态度（或许正因为如此），但他的第一篇社会宗教学论文以及后来著述中的某些部分所具有的质朴、缺乏艺术性的思想表达方式仍然具有震撼的效果。这不仅缘于其学术内容，也缘于消失在内容之后的思想家的人格。你可以感受到他深深地为“激荡胸怀”的人类命运的历程所动。他尤其感到震撼的是，一种理念在尘世间的传播中不管在哪里最终都总会走向自己原来意义的反面，并因此而自我毁灭。人们也相信，在韦伯为我们描述的那些勇敢的清教主义的伟大人物身上，似乎可以看到韦伯自己的某些特征。因此，在这里要强调这篇著述中的几个论点。

※ ※ ※

贪婪、拜金以及肆无忌惮的营利冲动无时无刻不在。蔑视一切准则规范以图占有超出生活之必需的商品——冒险家的资本主义、投机者的资本主义、牟取暴利者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资本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使用货币这种经济体系的固有现象。但是，肯定为赚钱而赚钱，将此视为永久性的道德义务，而不将其看成是冒险，这种观点并非天经地义，而是从一个特定时代开始的，而且只存在于某些社会阶层，只存在于西方。这种观念出现之前，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必须接受某种生活方式的教育，必须学会把理性的和有条理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道德义务。

这是如何产生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韦伯用大胆而谨慎的运思所进行的探讨，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研究目标——这个目标只是渐渐地显露自身的面目——进行的，直到最后发现通向这个目标的所有线索为止。这里，我们将抄最近的一条路到达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部分地概述一下韦伯带领我们走过的那个广博而丰富的精神世界。他首先阐明的是一些显而易见的现今的东西。他依据一个学生收集的教派统计资料指出，在德国，参加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天主教信众远远少于新教信众，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外在条件，而是内在的、心理的原因，即这两个教派由于他们各自的宗教环境而培养出来的精神特征，尤其是他们不同的职业观。我们早就知道，带有加尔文（Calvin）和浸礼会倾向的新教徒身上一直有一种奇特的组合，即兼有深厚的宗教虔诚和卓有成效的强烈商业意识这两种特征。为了发现这些突出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研究者从现在和众所周知的东西一步一步地回溯到过去，一直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和中世纪时代的宗教思想世界。

韦伯的分析始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他将此视为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文献之一。其中提出了一个有信誉的贤人的理

想典范：对这样一个人来说，通过不知疲倦地劳动、节俭和放弃享受来增加自己的财产是一种义务；他把自己获得的财富作为个人勤奋的标志而加以珍视。这种对宗教表现得无动于衷的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会被视为绝对有失体统而被嗤之以鼻，而在富兰克林的家乡，它早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在那里之前就受到了普遍欢迎。今天，这种观念仍然体现在把劳动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把生意视为目的本身的现代企业家身上。

这个类型的人具有纯粹的道德和入世取向，他们的先辈就是宗教改革时期那些一心向着上帝、内心虔诚和非常严厉的人物：路德、加尔文、班扬（Bunyan）、贝克斯特（Baxter）、克伦威尔（Cromwell）以及清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他们正是那些把自己同上帝的关系，把灵魂的救赎和将来在彼岸的命运尊为至上的人们。他们的身后是加尔文那个“隐匿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他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知，他不再是福音书中那个慈父，而是一个我们无从得知的神秘的上帝，他所要的只是他自己的荣耀。这与产生了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何相干呢？将否定现世和否定世俗荣耀的精神与这个“魔鬼”放在一起，岂不是过于唐突了吗？然而，论证的链条被一环扣着一环地连接了起来，直到我们到达那个就其本身固有的规律而言是永远敌对的力量相互连接起来的地方。

我们看到，把营利活动视为一种有约束力的“职业”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在赋予现代企业家以道德的尊严。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古代和中世纪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职业概念。韦伯的文字学分析表明，这是路德的创造。路德在翻译《圣经》时创造了这个概念，而且并不是依据原文的精神，而是按照自己的精神创造的。这位宗教改革者想要以此表达尽尘世义务的尊严，与天主教遁世的禁欲主义理想形成对照。这个词给日常劳动赋予了道德活动最高尚的内容。这是路德影响最大的成就之一，因为所有的新教团体都接受了他新创的意义。

355

尽管如此，但是创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并不是路德教派。这种“精神”的摇篮是加尔文那可怕的先定论（Gnadenwahllehre）学说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学说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是与所有尘世的活动相抵触的。深不可测的上帝暗中做了决定，先定了一些人将得永生，另一些人则万劫不复。不管是功劳还是过失，也不管是圣事还是善举，都不能改变先定的命运，它的意义是无法得知的秘密。每一个相信此说的人都会怀着敬畏和战栗叩问，自己是属于被救赎的招选者还是被诅咒的沉沦者。上帝已经做了选择。对此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作为，只能猜测自己属于哪一种人。唯一能够确切知道自己先定命运的方法就是经受考验（Bewährung）——经受职业的考验，为上帝的荣耀而永不停息地工作并获得成功。

这就是给那些全新的宗教类型如“清教”、贵格会、孟诺派、浸礼会等打上了烙印

的基本思想。这种新型的人感觉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感觉自己处在可怕的孤独中，一切救赎的魔力都被夺走了。教会、牧师和圣事都不能在自己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上给自己任何帮助。因此，他不屈从于任何世俗的权威，带着怀疑和保留的心态避开别人。深陷于内心孤独的他与那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上帝交流，感到自己与上帝之间有一条无比巨大的鸿沟。他是上帝的工具，而不是上帝的载体；上帝要求他的是行动，而不是情感和情绪。上帝要求他按照自己的律令理性地建构世界。清教徒回避一切感官文化和感官享乐。他们着眼于彼岸，对自己的灵魂得救满怀恐惧，把尘世的活动视为在侍奉上帝的。由于他们怀疑任何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情感关系都是对生物的神化，所以其社交能力就更被推向了物质：他们热忱而又成功地安排世俗生活。

356 这种纪律严明和避免单纯享乐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上帝所愿，而且是上帝所成的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必须表现出上帝选民的神圣性。一般天主教教徒的不完善可以由教会提供赦免手段加以弥补。即使路德也没有去触动人的本能行动不受拘束和单纯的情感生活问题。加尔文教徒则不然，对一个加尔文教教徒来说，只能是非此即彼：要么是上帝的意旨，要么是创造物的虚荣。他只能通过系统的自律以克服非理性的冲动，通过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和“现世的禁欲”来确保未来的天堂之福。这是清教“圣徒”具有决定意义的理想。他和僧侣不同，他生活在尘世，但他又跟僧侣一样，不属于尘世。路德认为遁世的禁欲主义有违《圣经》，是虚伪的，因而予以否定。所以，那个时代严肃而又富有激情、忠心信奉上帝的人认为是奉命在尘世实现他们的禁欲主义理想。有必要经受考验的思想成了禁欲主义积极的动力。这种思想把信仰和道德结合起来，因而对日常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人，这类人只知道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是上帝的意旨，要么是创造物的虚荣，他只有永不停息地工作才能在尘世中实现自我。

不过，我们至此仍然未看到，诸如作为道德义务的职业工作和通过尘世禁欲而证明自己享有神恩这一类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悖论的张力达到了极限。对于虔诚的清教徒而言，财富意味着危险，追求财富毫无意义。但是，财富是有条理的经济活动和节制享乐的必然结果，因而是经受考验的标志，甚至可以说是享受神恩的标志。只有躺在财富中睡大觉才应当受到指责。只有行动才能为上帝争得荣耀，浪费时间是最严重的罪过，以牺牲职业为代价、不诉诸行动的沉思冥想毫无价值。贝克斯特要求他的虔诚信徒“在你的职业中勤奋工作”，“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肉体的享乐，你们可以劳动致富”。

357 这样，一切都在这里最终完成了循环：一个人只要把有条理的不倦劳动视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同时又杜绝坐享自己的成功，那他就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大部分所得不断用于新的经济活动。这个人必定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于是我们便有了头脑清醒的和靠自己力量而成功的资产者，他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让他的行为无可指责。追求盈

利的桎梏解除了，获取物品摆脱了传统的顾虑，其结果只能是，通过强制节省和财富积累而形成资本。上帝显然在亲自保佑圣徒的所为。然而，上帝要求他们对自己托付给他们的每一分钱负责。“一个人对自己的财产负有义务，这一观念对于生活产生了令人战栗的影响。”

由此开始了理念的悲剧。像中世纪的僧侣团体一样，清教主义也无法抵挡自己挣得的财富的诱惑。伟大的宗教生活方式被自己带来的后果摧毁。职业观念和禁欲主义的教育只有当其宗教之根渐渐死去之后才会充分发挥效用。富兰克林所要求的那种现代经济人，即“用资产阶级的义这种硬木雕出的”人，便站在了那一系列人物的末端：他没有了宗教热忱，而是充满了清醒的职业美德；他不再寻求上帝的天国，而是关注现世生活。作为以往宗教的继承人，他拥有的是资产阶级特有的职业伦理，赚起钱来问心无愧。禁欲主义的劳动教育提供了自觉和认真的工人供他使用，使他恣意利用工人为其效劳的意愿合法化了。

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帮助建立起来的这个拥有现代经济秩序的世界，今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所有个人的生活方式。“清教徒想要做职业人，而我们则是不得不做。……对于现世财物的关切本应只是其圣徒肩上披着的薄薄的斗篷，随时可以扔掉。然而，厄运却让这件斗篷变成了一所钢铁般坚硬的房屋。”今天，宗教精神已经逃出了这间房屋。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呢？谁知道呢？这件斗篷遮盖着这个惊人发展的未来，韦伯曾在最后一瞬间伸手去够了够这件斗篷，但没有冒昧地将它撩开。

# 第 11 章 拓展

## 1

358

我们前面谈到韦伯从美国回来，现在接着讲述他生命的历程。这次去往遥远国度的旅行并没有让他身体彻底康复：“显然，我们两人都还没有完全重获神经系统的平衡。这也许表明赴美旅行并没有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休息调养。不管怎样，马克斯睡觉又不规律了，他责骂自己缺乏工作能力。假如他对这里比较平静的生活比对美国那种喧闹忙碌的生活更难以忍受，这倒真有些奇了。”不过，尽管有新的波动，韦伯总算已经习惯了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这头病狮偶尔也会在晚上离开自己的窝。当民族社会党海德堡分部由戴斯曼（A. Deißmann）牵头举行“美国之夜”活动时——除恩斯特·特勒尔奇外，玛丽安妮也在晚会上作了报告——韦伯也受到诱惑参加了晚会，他在讨论时的即席发言比两位主讲的报告加起来还要长。积蓄在他心里的诸多印象喷涌而出。

他也同意在新近由戴斯曼组织的一个神学沙龙上做一个报告，这个沙龙聚集了一个由重要学者组成的小圈子，诸如温德尔班德、耶利内克、戈特海因（Gothein）、特勒尔奇、诺伊曼、多马策夫斯基（Domaszewski）、迪特里希（A. Dieterich）、拉特根、杜恩（v. Duhn）等人。韦伯很珍惜这种思想交流的机会，在这种交流中他可以为他人所激发，从而使自己的知识经过重塑而不断更新。当然了，即便是这种社交义务也让他不得安稳：“明天是星期天，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飨宴’（Eranos）——有 10 位先生参加的学术沙龙。马克斯负责讲‘新教禁欲主义’，而我则负责‘勃艮第火腿’。为马克斯着

想，我希望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因为他最近感觉不好。”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现在很快进入尾声。三月底，他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二部分。韦伯写信给李凯尔特说：“我还在工作——尽管得忍受可怕的折磨，但每天可以设法工作几个小时。六月或七月，您会收到一篇也许您会感兴趣的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即作为现代职业文明基础的新教禁欲主义——一种现代经济的‘精神’构建。”（1905年4月2日） 359

这篇论文诞生后，难得的是，韦伯并没有精疲力竭。对这一重大成功之作默然于心的幸福感同时融入了对明媚的春天充满感激的喜悦之情。韦伯可以连续工作了，不需要中间休息。在母亲过生日时，他去信说：“在过去几个月大量的清教研究之后，我现在又回到了几部未完成的著述，它们更侧重于哲学。不过，脑子仍然不愿意好好配合。这里已充满了春天的温暖，洒满了明媚的春光。希望你那里也是如此——不管是外在的气候，还是内在的情绪。”

的确，太阳的魔力再度施惠于大地，让人对温暖而强健的生命感充满了信心。以前那些艰难地拼凑在一起的精神财富的碎片现在似乎生长在一起了。

我们这里一切均好。阳光照拂的春天和美妙无比的绿芽——尤其是公园栗树上满树的像绿色的小星星一样的绿芽——让我们心旷神怡，心存感激。马克斯出去得更为频繁了，他搭乘自己喜爱的山地火车到处走；傍晚我们就在施蒂克花园公园的凳子上静静坐着。这个时候，我真想翩翩起舞，跟小鸟一起欢唱，歌唱生活总会不断地焕发青春，歌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尤其是我拥有他。

他们学会了怀着感激之情享受每一个美好的时刻，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因为在经历过这种充满蓬勃力量的时光之后，随之而来的很快就是无法解释的挫折——就像大起大落的波浪式运动一样。

这一年的下半年，俄国革命让韦伯着了迷。他中断了自己的学术工作，很快学了一些俄语（一大早就在床上开始学），达到了可以勉强读报的程度，并高度紧张地关注着那里发生的事件。他用自己的笔追踪这些事件，将此记录在日志中。最让他动心的问题是俄国的解放斗争对德国人民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他的第一本书《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势》（*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ßland*）完成于1905年年末，因为最后一个季度他的情况十分不错。 360

马克斯的工作能力很强，工作很勤奋。只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如此奉献和耗费自己的精力，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最后却都埋葬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

库》杂志里，很少有人读。让我感到更惊讶的是，他仍然没有重新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冲动——不管是写关于时事政治的文章，还是做某种形式的报告。我相信，假如他内心受到驱动，他是可以做的，但他拒绝了所有的请求。

尽管在别人看来他写作的速度和数量惊人，但他仍然跟以前一样始终生活在不稳定之中，因此他拒绝接受任何有具体时间限制的工作。他那个领域里的名宿们试图敦促他去另一所著名的大学就职，但都毫无结果。尤其为韦伯所敬重的勃伦塔诺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韦伯对此回复说：

您极为友善地再次谈到了我迁往**慕尼黑**一事。对此我只能说，我现在还无力这样做。我也谢绝了施莫勒让我去柏林的类似提议，因为我还完全不能够做固定的工作。我可以承受相当艰难的智力劳动，这毫无问题，但是讲话这样的**体力**劳动却造成我失眠，因此让我很快就丧失工作能力。我肯定还需要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才能认真考虑去另一个地方任教的问题。您是知道的，若能与您共事，我将视之为莫大的荣幸。从客观上说，值得考虑的倒是，如果在柏林有一个持我这样观点的人同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绝对缺乏原则的风气相抗衡，这在目前状况下是不是并不更重要。

1906年2月28日

361 尽管韦伯迫不得已离开了大学，但他对大学的浓厚兴趣一如既往。现在碰到延聘教授事宜时，同事和系里的教师们常来向他咨询，年轻教师常把他作为自己职业利益的辩护者。碰到这种情况，他便不惜精力和时间，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极为认真地考察审视，看看什么是客观上值得期望的，什么是公正的。他对人有很深刻的了解，对事物有透彻的认识；他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常常既坚定又考虑周全，举止得体，颇有外交家的风度。但是，如果碰到心胸狭隘、虚荣和其他有碍于事的“人性弱点”，他就会让他的同事感到不舒服，他就会拔剑出鞘，试图通过施加强大的道德压力去克服阻力——这样的做法有时并不见效。

在这类事情上，常常让韦伯感到激愤的是一些教授广为人知的倾向，即在聘用人的问题上，他们更愿意聘用平庸但易于相处的同事，而不是有鲜明个性的优秀学者。他从中看到了一种特殊职业病的表现：教授的虚荣。他也同样憎恶反犹主义，因为反犹主义阻止了像格奥尔格·西默尔这样杰出的学者进入他们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由于海德堡大学未能聘用这位哲学家以填补威廉·温德尔班德的遗缺，韦伯一直不能原谅那些参与选聘的人。最后，他还憎恨在政治上受到制约和表现出怯懦，这在阻止聘用带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学者问题上得到了反映。



一个让韦伯长期耿耿于怀的典型事例是，由于这个原因，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被德国大学拒之门外。米歇尔斯别无选择，只好在国外谋取教职。针对这种状况，韦伯指出：“如果将其与意大利、法国，甚至至于眼下俄国的情形相比，这都堪称文明国家的耻辱。此外，我确信，德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多数人——不管他们个人属于哪一个政党——都会赞同我这种说法。”

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在第一届高校教师年会上提出这件事时，一些教授声称，米歇尔斯之所以没有得到在大学任教的资格，决定性的因素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个人的原因，即他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受洗。为此，马克斯·韦伯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所谓的学术自由”的文章，文中提到：

只要这种观念盛行，我就不可能表现得好像我们有“学术自由”这样的东西。……只要宗教团体有意识地 and 公开地允许人们利用他们的圣事作为职业晋升的阶梯——就像大学学生团体的饰带和预备役军官的委任状一样——他们就理应受到自己常常抱怨的那种蔑视。

1908年9月

韦伯的原则之一是，在一切与“价值”有关的学科中，尤其是在哲学、历史和政治学中，只要有可能，代表不同倾向的人就应当并肩工作。他设想的大学，不能是一个“教会”，也不能是一个“教派”或维护国家的机构，而是精神自由和精神角力的场所。

※ ※ ※

1906年年初发生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变化：韦伯夫妇从那条狭窄而丑陋的主街搬到了内卡河南岸——海德堡的里维埃拉。为了这项重大举措，他们卖掉了原版的马克斯·克林格尔蚀刻画。尽管他们仍然喜爱这些画作，不过现在对它们已经烂熟于心了，所以卖掉倒也不甚觉得可惜。让韦伯感到满意的是，波兹南的腓特烈大帝博物馆（Kaiser Friedrich-Museum）收藏了这些作品，从而使这些画作能够有助于传播德国文化。朴素的古式家具也取代了以前那些笨重的现代文艺复兴样式的橡木家具，这些家具带有雕画过的圆柱形的腿和隆起的雕刻图案。海伦妮提供了资助，因为她随时都准备着给孩子们带来欢乐。

玛丽安妮一直想有一个在美感上无懈可击的生活空间，如今夙愿得偿，快活得像个孩子：“我简直高兴死了，心怀感激地围着金牛犊起舞，就这件事而言，这肯定没有什么错。”韦伯却完全不在乎外在的装饰，至于他的书桌、书架安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他觉得无所谓；他能工作时，目不窥园。他不需要有一个井井有条的环境，所以他

对市区的住宅也感到满意。实际上，为了享受变化的魅力，他甚至很乐意将工作时的禁欲主义与休闲区分开来，主要在旅途中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不过他也感到高兴，因为妻子现在有了她的“首饰盒”。此外，刚刚给自己披上了嫩绿新装的山坡、欢快地闪耀着波光的河流，也都让他感到另一种快乐。他们第一次能够从家里整天瞥见外面那个含苞待放的世界。房屋边上的桃树和李树鲜花盛开。韦伯写信给海伦妮说：

春天终于到来了。我们现在正享受着新居，享受着从新居看出去的一派佳景：城堡、山峦和乡村气息，包括母鸡下蛋后的咯咯叫声、果园和园艺。我们心里想着：你那里是不是也跟这里差不多呢？你的生日时，你是否也像我们一样，欢快地让你的房间熠熠生辉呢？……每天在12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就像上帝造出我时那样——总叼着长烟斗坐在阳台上（“日光浴”）。至于有多大的成效，还有待观察。

但是，这次他在自己十分喜爱的盛夏季节，又遭到了病魔的严重折磨。他原本必须得离开一段时间，但是对俄国革命的研究使他不能成行，这项研究现在每天都让他非常生气。内容广泛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增刊第二期印刷的速度比写作进度还要慢。照韦伯的看法，这样一来，这篇东西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他做这样极不寻常的苦差事只是为了这件事本身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的缘故，并且自己掏腰包支付因他的字迹和大量插入使得印刷难度增大的印刷费。尽管如此，“机器”仍然跟不上步伐，似乎在进行消极抵抗，这跟其他阻碍“研究目标”的抵抗一样，使韦伯暴怒。他下决心要辞去《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编辑一职：

过去9个月里，我把所有的时间全都花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上了，花在了那些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视为学术成就的事情上——这种日子我是决计不愿再过了。“机器”运作的方式迫使我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校对，也就是说，我一天到晚都在空等着做校对而不能干别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的结果是：一月份的增刊花掉了857马克，这使我们可以估计到八月份那一期要花多少钱，八月这一期的厚度是一月份增刊的两倍。我不在乎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经济能力因而可以无所谓，而是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然而，我**绝对不能**把“机器”对待我的这种方式看得无所谓。无论是雅菲还是西贝克对此都无能为力，因此局面不可能得到改变。所以，我不适合待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我都快要气病了。当然，在您和雅菲找到合作伙伴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1906年8月20日致佐姆巴特

跟往常一样，韦伯遇到冲突时总是孤注一掷，随时都准备不顾外在的利益切断与任何团体的关系。这不仅发生在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上，而且发生在并主要发生在当别人将怨气撒在他身上或者别人求助于他的骑士精神的时候。这种时候——如有必要——他也会置个人关系于不顾。有时候，他可能在倾听乙方意见之前，就站在甲方一面，因而犯错误。另一方面，如果让他确信，若他对某件事情置之不理会让别人蒙受损失，那么他也会乐意接受别人的劝慰。上面提到的他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之间的争执就是这样解决的。

## ※ ※ ※

不过，现在正是旅行的大好时光。1906年秋，韦伯与母亲和妻子一起去西西里（Sizilien）旅行——又一个陌生而美妙的世界，即便将它与意大利相比也令人颇感新鲜。沿着一条弥漫着柠檬树的芬芳、点缀着葡萄园的海岸，他们一行先去了陶尔米纳（Taormina）。宽阔的河床干枯了，里面没有水流，只有石头，透露了岛内的荒凉。然而，在烤得干枯了的山坡旁边，大海闪耀着深蓝、紫色和绿色的光芒，像一颗颗闪烁的珠宝饰物。翻卷的浪花围绕着笼罩在神秘烟云中的利帕里岛（Lipari）欢跳着。

埃特纳火山（Ätna）高耸出海面，长满橄榄树和杏仁树的山坡上的道路越是往上伸展，山就越显得峻峭挺拔。宽阔的山脚地带到处是葡萄藤和生长繁茂的常青植物；山上的植被则比较朴素，主要由阔叶林和松树组成。最后，埃特纳火山将所有人类栖居之所置于身后，变成了一个远离一切尘世之美的隐士，将头包裹在常年积雪那无实体的单一世界之中。在那高处它似乎属于无限，而不属于这个世界。变幻的光线美妙地反映了它的不可企及。一场雷雨把它笼罩在乌云之中，而后乌云中又闪现出紫色。然而在充满希望的清晨，白色的峰顶映照着玫瑰色的晨曦，粉红的色彩辉映着正在苏醒的苍穹那一片嫩绿。你瞧那冷峻的山峰上空飘浮的烟雾！不，这神奇的造型并不属于天空。地下的烈焰所具有的强力在坚固的结构中翻滚激荡，那不可遏制的原始能量每天都有可能从山尖喷涌而出，无情地摧毁紧贴着它的一切生命。

陶尔米纳那个半圆形的剧场将壮美的景色与希腊精神融为了一体。在这里，韦伯大声朗读着《奥德赛》，沉浸在古希腊的氛围里，与荷马一起眺望着被染成紫红色的大海。然后他们去了锡拉丘兹（Syracuse），这里一度是有着极为繁忙生活的中心，是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分支栖息点，如今则见不到一棵树，成了银灰色的岩石高原，高原的山洞里又住进了羊倌和他的羊群。早上，羊倌在阴暗的洞穴狭窄的出口处逮住一只又一只羊挤奶，活像波吕斐摩斯（Polyphem）。在明亮的天空下——耀眼的光线毫不留情地照得德国的北方人睁不开眼——他们感到了逝者如斯的无限伤感。没有一块林荫地可以让他们停下来歇歇脚，恢复一下体力。

然而，大海仍然一如既往地欢快地冲击着岩石，冲刷出多彩的新洞穴。韦伯夫妇乘一叶小舟在水晶般透明但波动着的水里荡漾，那水清澈得可以将水底的珍奇一览无余。强烈的日照让人疲惫，他们便静静地坐在一个古代采石厂（Latomien）休息，这里宽阔的迷宫当初是由大批雅典囚犯在地底挖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一生在这里服劳役，毫无幸福可言。现在，他们的苦痛转化成了美：一个满是花圃和树丛的下沉式花园，令人陶醉。高高的石墙上爬满了郁郁葱葱的攀援植物；寂静中似有远离尘嚣的窃窃私语，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围绕着香气馥郁的常春藤花朵飞舞。环绕着这个下沉式花园上面一圈的边缘的是柏树，它们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峭拔挺立；呈拱形的面包树搭起了凉棚；此外还有西亚涅（Cyane）泉。他们驾着小船沿着蜿蜒曲折的河流溯源而上。越往上走，水就变得越蓝，水面也更狭窄，岸边的纸沙草从相互依偎在一起，把世界都给遮蔽了。然后狭窄的水面突然开阔起来，形成了一个深蓝色的圆形，清澈的水直接从地底深处喷涌而出。

366

前往吉尔真蒂（Girgenti）的旅途经过了光秃秃的山地。秋天，黄色硫黄黏土山丘没有草皮覆盖，暴雨的水流将其冲刷出深深的沟壑。这里曾经麦浪滚滚，林木荫蔽，而今潜伏着的是可怕的死寂荒芜。在荒凉的山顶上，破败的住宅颜色灰黄，像黏土一样贴在山上。让人心生疑虑的是，在这个无情地烘烤着一切的天底下，人们如何忍受饥渴的折磨？吉尔真蒂也位于陡峭的山上，但古罗马修建的设施仍然在给他们提供水源，巨柱仙人掌像篱笆一样保护着园圃。山下朝海的一面，在巨大的神庙遗址尚存的地方，古老的橄榄树、杏仁树和面包树像从铺满细碎雪花的地面上拔地而起——整个地面长满了盛开着白花的植物。

喧嚣的巴勒莫把我们逝去的这个伟大梦幻王国又拉回到了现在。这里美丽的海湾敞开胸怀，展示了它的宽阔；一目了然的山峰充当了角上的支柱，它们清晰的轮廓诱出了天空和大海丰富的色调变化。在明亮的中午时分，呈现出的是带乳白的蓝色；而当热风催雨之时，颜色又变成浓重的深蓝和暗紫色，这时山峰便黑黝黝地耸立在变成绿色的大海上；晚上则是带紫红色调的红色。有时在傍晚时分，鲜红的太阳落入大海，它离别的一吻染红了整个天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吻以微妙的色调变化保留了这一刻的欢乐。

在这里，他们一行看到了诺曼一拜占庭时期的艺术作品。寺院的十字形回廊让他们心醉神迷，这里有很精巧地制作成旋转型的大理石圆柱，圆柱的螺旋形花纹和柱头是用不褪色、不脱落的金色和斑斓的马赛克装饰起来的。同样让他们着迷的还有衬托着金色背景的小教堂所具有的东方式的辉煌，那里传说中朴素的人物形象周围环绕着很多精美细致的装饰物。在这个熠熠生辉的圣殿里，穿着白色锦缎的教士们施展着古老的魔术。海伦妮并不认为跪拜和连祷仅仅是做给人看的东西，她新教的灵魂在战栗。不过，当基

督神像那安宁而沉思的眼睛从蒙雷阿莱（Monreale）半圆形后殿金色背景中凝视着她的时候，与上帝的亲近让她感到震撼。这至高无上的庄严一瞥并非渴望占有这个世界，却让世界倾倒，使世界永远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然而，他们要看的不仅是永恒的画作，他们也关注他们脚下同时代人生活的起伏波动。他们看不够那些小人物的营生，这可以透过那些没有窗户的住宅永远敞开着的的大门看到，也可以在大街上随处看到。在狭窄的街道上，日常生活在这里完全以“古典”的方式展现，甚至那前所未见的污垢在他们看来也带有远古的气息。他们很高兴看到维系着大群无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那种亲切温存。海伦妮注意到，甚至小男孩都被他们的父亲作为同伴相待。在这里，她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德国北方的大城市看不到367的情景：那些家庭虽然很贫穷，但却享受着天真的幸福之感。当然，韦伯一行不可能与这些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合群，这些人懵懂地享受着他们短暂的生命，他们渴求的显然仅仅是快乐。他们随遇而安，“他们不想超越自己”，似乎不想奋斗，也不想追求。不，德国北方人几乎总是在希冀，总感到有义务做什么事情，韦伯一行在这里不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 ※ ※

那么，当这些人没有生活在自己无意识的隐秘区域的时候，他们希冀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作品吗？然而工作归根结底并不是意愿的产物，而是必须而为之，是自然禀赋的发挥。不，只要他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会感受到在自己的行动中和外部世界中实现“道德律令”的特殊重要性——生命的取向虽然并不遵循成文的戒律，却遵循世界道德秩序的理念，遵循“使命”。道德理想具有高于一切的绝对尊严，道德理想也是一种规范，一种人们即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应该服从的规范。人的尊严要求通过道德义务和他们为此做出的牺牲来获得。对于生活中某些特定的领域，道德要求并不是一种谁都可以用随便什么内容来填充的一般形式。在具体道德行动的可能性没有穷尽的决疑法中，我们毕竟可以想出某些行为方式来，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就是说不管它们的动机如何——都会符合规范或者与规范相抵牾。如所有的文化理想一样，部分道德理想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可能会产生变化。在实际的行动过程中，每一步所包含的意义都可能只有在之前和之后的行动中才能被理解，就像作曲中一个和弦的存在得依赖于前后相继的音。即使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也仍然存在着为一切指明方向的永恒的星斗。

只有在韦伯夫妇受定然律令（kategorischen Impertiv）影响的家乡，他们才把这种观点视为一个有意识的人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特征。与这个北边的世界相比，沐浴在阳光里，享受着生活乐趣的南方就像是孩子的天堂。他们不能想象过一种成熟的生活而不辛勤地完成新的使命，不去克服艰难困苦。368



韦伯拜访了他在都灵（Turin）的年轻朋友和同事米歇尔斯，以此结束了这次旅行。他在那里给母亲写信说：

在都灵，我的身体和脑子居然能够承受社交活动、看戏（!）、讨论、四处奔波等等活动，这才让我注意到，这次旅行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之前我从未敢有此奢望。……我衷心希望你身心无恙（我们不能不为此而担忧），希望同像我这样一个易于变得性情乖戾的人一起做这样一次相当忙乱的旅行，没有让你的心过于劳损。在一个像西西里这样陌生的地方，美需要去找寻，这就得费时费力和花钱，而且对你来讲非常辛苦。不过，我希望你留下了一些值得留念的印象。西西里的所见所闻有的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与大多数时候一样，只有在回忆中我才会真正完全享受这次旅行。当一个人正在获得那些非同寻常的印象时，这些印象会让他哑然无语。亲爱的母亲，我想再说一遍，你在心灵上和物质上为我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莫大的恩惠，是一个比你所想象和比我们在旅途中所能表达的还要大的恩惠。



虽然有一段长时间的休息放松，但是1907年的冬天和第二年早春韦伯的生活还是再度笼罩在阴霾中。韦伯没有精力从事比较大的项目，感觉出不了东西，觉得这是多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唉，这是一个多么多么漫长的冬天啊！有时候，他非常厌倦生活，“我们还得在德国度过这么多悲哀的冬天，想起来真可怕”，将来我们至少应该让我们生命的秋天沐浴在南方的阳光里。

369 大约在这个时候，险恶的政治局势也令人不快，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种政治局势让韦伯感到极为不安。由于自己的创造女神拒绝惠顾，韦伯通读了妻子关于婚姻的书，她为此辛勤耕耘了多年，现在终于接近尾声了。

三月，韦伯夫妇又逃往意大利，这次去了科莫湖（Comer See）。他们住在一个叫“塞贝罗尼别墅”的酒店里，这是一个由一栋古老宅邸改建的酒店，坐落在一个林木覆盖的小山上，俯瞰着夹在湖中一个三角地带的贝拉吉奥（Bellagio）。这是一个绝佳的住宿处，集德国春天葱郁的林木和南方的华丽景象于一身。环顾小山周围，地球上最美丽的景色让人应接不暇。北面，阿尔卑斯山白雪覆盖的峰巅隐约可见；南面，环湖的山峦飘忽在蓝色的薄雾之中，不过其轮廓仍然清晰地空中显现了出来，每一块岩石的边缘

都清晰可见。近处的山坡上，粉红色的桃花点缀着灰绿色的橄榄树丛。湖畔天堂般的珍奇花园里，山茶、石榴和杜鹃花沉醉于园中。每一个港湾都有一个白色的城镇熠熠生辉。

然而，病魔并不肯善罢甘休。甚至到了五月，韦伯的病情仍旧很糟糕，以致他妻子——长期的折磨让她难以忍受——又去找新的医生咨询。直到夏天，韦伯才又开始著述，而且写了一篇很难的东西：与施塔姆勒关于逻辑问题的论辩，第一部分发表在七月号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上。“李凯尔特认为这篇论文非常艰涩，他对我说：‘很遗憾，你把自己整个哲学都堆放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里，其文体风格让读者很难从中获取什么东西。’你瞧，大家都这么说。”

夏天带来了诸多重大变化。马克斯的弟弟兼同事阿尔弗雷德一直在布拉格（Prag）任教，现在受到海德堡大学聘请。阿尔弗雷德不舍得离开奥地利（Österreich），因而踌躇不决。马克斯则感到高兴。兄弟俩曾经十分亲密，政治上他们属于同一阵营。

另一件事情是，住在奥灵豪森的家族元老和亚麻布公司的创办人、享有高寿的卡尔·韦伯去世了。老年智慧早已将这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变得非常温和善，以至于所有对他的畏惧都转化成了爱戴。他慷慨地让孩子们分享他的财富。他建立了一个兴旺的商业王朝——儿子、女婿和三个孙子已经和他一起共同管理公司的业务。年轻人将家庭作坊式的织造工场变成了工厂企业，对此这位创始人并非没有异议，他起初惧怕这种新的企业形式。生意扩展了，但他们这个工作团队的和谐得以保留下来。 370

海伦妮和她的孩子们始终惊叹于这样一个奇迹：三代人竟能配合得如此默契，儿子们因其更为全面的训练而超过了父亲，他们有很多做决定的自由，但仍然十分孝顺，尊重父亲的权威。这与曾经发生在海伦妮自己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的事情是多么不同啊！现在死亡用它温柔的手摘下了熟过头的果实，离别的痛楚中也同样有祝福：一棵老树倒下了，年轻的树能够伸展枝叶，得到更多的光线。

那位退職教授马克斯现在也摆脱了经济上的顾虑。祖父安葬后，马克斯去荷兰待了几周，然后又回到奥灵豪森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考虑了社会政策协会的那项共同计划，他与阿尔弗雷德曾口头讨论过这一计划。马克斯写信给阿尔弗雷德说：

我打算建议社会政策协会让一系列调查开始进行。给它一个时髦的标签，我们也许可以把标题叫作“现代大工业中的脑力劳动状况”。我想到的内容包括：涉及**熟练劳动**的范围和类型的个别工业的内在结构、劳工的稳定性、**职业机会**、**职业变动**等等。从这个“形态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工业所实行的心理物理选择及其在个别工业中的倾向；反过来，也可以了解人们通过遗传或者后天培养

而获得的心理物理特质对这种选择的制约。<sup>①</sup>

正如前面谈到过的，这个计划涉及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那篇论文的中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那篇文章里，马克斯追溯了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那些类型如何通过精神因素而得以形成，现在他要研究的则是这些类型对劳动的技术形式的依赖性。马克斯试图找到合作者，并为他们写好了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说明。这些研究和马克斯自己研究的第一部分发表于1908年。

371 这一年里，韦伯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即便在冬天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1908年秋天，他采纳了出版商的建议，在做专题调查的同时，开始为《简明政治科学词典》撰写一篇题为《古代农业状况》的历史社会学论文。<sup>②</sup>三个月内，他就完成了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著述，从法律、经济和社会学的不同角度梳理了海量的历史资料。这篇论文——仅就其长度而言就已经超出了汇编的篇幅——也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韦伯就像那些中世纪服务于上帝的画家一样，把自己的画作藏在晦暗的教堂高高的墙上和穹顶上，并不在乎世人是否看得见。

## 2

现在韦伯又开始写出重要的著述了。韦伯有理由感到满意，让自己喘口气。他和玛丽安妮早就有一种需求，即享受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织成私人生活的每一根线都更加牢固了。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焕然一新——尤其是因为我们亲密地相互分享着对方的生活。当然，从外表来看，一切都按部就班。马克斯仍然在给自己那篇重要的论文润色，身旁筑起了堆满了书的书车屏障。”

韦伯很少让自己被诱出家门，但他一直喜欢令人兴奋的来访者。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访，来访的学者主要是特勒尔奇、耶利内克、戈特海因、福斯勒和拉斯克（Lask）。还有介于学术和艺术领域之间的来访者，如雅菲夫妇、A. F. 施密特夫、格鲁勒（Gruhle）、托布勒（Tobler）等等。朋友们多半是下午来，有时也有晚上来的。马克斯晚上9点便告退，但在这之前他要讲很多的话。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344~345页（指德文原书页码，即本译著边码。——译者注）。

<sup>②</sup> 参见本书第10章第343~344页（指德文原书页码，即本译著边码。——译者注）。



年龄较大的学者来每次都会有重要的学术交谈。在雪茄的烟雾笼罩中，精神的火花相互碰撞——那些经过长期训练而获得的知识以富有个性色彩的方式，像充满生命活力的激流一样喷涌而出，然后汇合到一处，产生新的洞见，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场面。

韦伯也同样珍视高雅的闲聊或者与女性朋友饮茶时热情洋溢的交谈。他对个人经历和生活细节的兴趣像对学术知识一样浓厚，他常说：“要是没有你们这些妇人，生活将会是多么无聊啊！你们生活中总有些新鲜的事情发生。”后来埃德加和埃尔泽·雅菲夫妇离开了他们早年在海德堡的至交好友圈子，迁居至慕尼黑，这对韦伯夫妇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过，韦伯与埃德加·雅菲因《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的工作关系继续保持着联系。他以前的学生埃尔泽女士，现在正值女性最迷人的时期，其优雅和智慧让她总能成为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中心人物，她后来一直仍同海德堡的朋友们心灵上息息相通。 372

李凯尔特学生和挚友、哲学家埃米尔·拉斯克早就属于那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圈子的年轻学者，他也是韦伯夫妇非常忠诚的朋友。他敏锐的思维和他的机智幽默相映成趣，常常以一种获得解脱的方式冲破他秉性中的忧郁的严肃。作为在韦伯之前去世的朋友之一，后面还要谈到他。他将音乐家米娜·托布勒介绍给了韦伯夫妇。托布勒不仅以自己世俗生活经历中的艺术个性，而且以她高尚的艺术为韦伯夫妇的生活增添了新的音符。在他们长期的友谊中，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音乐修养方面，她都丰富了韦伯夫妇的生活。

然后，多才多艺的施密特-诺尔（A. F. Schmid-Noerr）及其夫人克拉拉·施密特-龙贝格（Klare Schmid-Romberg）赠送给他们的是带有原创性的审美刺激。施密特-龙贝格曾做过演员，对各种艺术训练如数家珍，身上散发出一股学术领域之外的那个世界的气息。同诗人、哲学家和优秀的艺术鉴赏家施密特一起，韦伯夫妇主要沉醉于中世纪早期富有情趣的宗教雕塑。而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业余艺术爱好者的格鲁勒则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了最现代的艺术所具有的奇特性。

一段时间以后，韦伯夫妇与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阿图尔·萨尔茨（Arthur Salz），尤其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Gertrud Jaspers）建立了友谊。年轻人对韦伯感到敬畏，总保持着怀有敬意的距离。韦伯是通过妻子才知道这一点的，他笑着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仍然感到高兴。学期结束后，住在海德堡以外的朋友也频繁造访，其中包括同事维尔纳·佐姆巴特、罗伯特·米歇尔斯、保罗·亨泽尔——保罗现在在埃尔兰根（Erlangen）任哲学教授，尤其是格奥尔格·西默尔，他征服了每一个人的心，他不仅思想丰富、口才了得，而且心地善良、热情、充满真挚的人道主义精神。 373

在韦伯家里或长或短逗留过，丰富了韦伯夫妇的生活的重要女性客人包括玛丽·鲍

姆 (Marie Baum)、格特鲁德·博伊默尔 (Gertrud Bäumer)、格特鲁德·西默尔 (Gertrud Simmel)。那些到韦伯这里来寻求启示的年轻人——未来的学者——中，常来的有保罗·赫尼希斯海姆 (Paul Honigsheim) 和卡尔·勒文施泰因 (Karl Löwenstein)。此外，亲戚们——尤其是海伦妮——也常来待上个把星期。现在韦伯又重新打开了他知识的宝库，门庭若市的情形有时成了困扰。不过，与不同年龄和不同兴趣爱好的各色人等交流也丰富了韦伯夫妇的生活。

大约在这段时间，各种各样新的思想之光投向了海德堡精神生活中由教授组成的圈子的核心，出现了这么一批年轻人：他们没有正式职位，处于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希望有朝一日进入学术圈子的核心，或者能够生活在一种可赋予学术研究以内在价值的学术气氛中。现代潮流也从外面涌进了这座好客的小城。在老一辈稳固地确立了的建构旁边，年轻人要建立一种超越传统习俗的另样的生活方式。之前只存在于慕尼黑艺术家圈子中的那种社交自由，也开始在这里得到发展。在精神的灵感方面与浪漫派接近的一种新类型的人，再次对“资产阶级”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以个人自由的名义为建构生活新的和旧的理想而奋斗。他们怀疑普遍行为规范的有效性，寻找一种“个人的律法”或者干脆否定任何“律法”，以便只让感情来主宰始终处于流变中的生活。

374 冲击传统价值尺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躁动的性解放出来，因为正是在性这个问题上，“律法”和“义务”要求人们做出有切肤之痛的牺牲。如果规范如此经常地扼杀美好鲜活的生命，压抑本能的冲动，尤其是拒绝让这么多女性生命开花结果，那么，这样的规范还有什么价值呢？律法、义务、禁欲主义，这一切观念难道不都是产生于过了时的基督教将性恶魔化的做法吗？与其在道德领域那条谨慎的荒芜小道上蹑手蹑脚地行走，不如完全让自己的本性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任随炽热的生命之流奔腾，然后承担责任。

韦伯夫妇具有坚定的信念，感到自己对于普遍的道德文明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们还比较年轻，能够带着强烈的兴趣关注年轻人的斗争，能够让年轻人质疑自己关于理想和价值所持的立场。正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到达安全的港湾，所以才不愿持不理不睬的态度。他们认为，婚姻只要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在相信婚姻自身的永恒价值的基础上，它就属于必须始终被捍卫的“绝对”理想。对于性爱带给我们的极大幸福，我们应当以准备承担严肃的责任来回报：夫妻共同生活的责任、夫妻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对孩子的责任。夫妻之间必须给予对方促进内在发展的思想自由和独立，让对方去探索生存的丰富内容。

韦伯夫妇认为，相互占有的要求并不合理，而在性爱方面的忠诚和专一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婚姻不仅是一种“理想”——一个人不能随意解除实现这一“理想”的义务——而且是两性结合的道德准则，它所要求的牺牲你必须得牺牲。谁要是不努力这样

去做，或者背离此道，他就会负疚，对那些实实在在的人负疚，或者是有悖于主导一切社会伦理的最高理念。本能冲动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既可以是宝贵的心灵价值的载体，也可以是它的阻碍。如果它彻底逃避道德的模塑，那它就会变成阻碍！因此，感官享受不能是目的本身，即便它作为以审美形式得到升华的性爱的形式出现，也并非目的本身。在这个领域里，“无关宏旨”（Adiaphora）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没有比两性关系后果更重要的了。“美妙的瞬间”是负有义务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在这个领域的行为对他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了。

谁要是在这里免除自己的“义务”，就会冒变得轻浮甚至野蛮的危险。当然，对一个人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并不是“犯下的过失”本身，而是对这过失所采取的态度。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自己负疚，并不低估它，严肃对待它，那么，他就可能超越它。对一种文明来说，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践行规范，而在于每个人都承认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因为只有那些屈从于本能，对道德区分丧失了敏感性的人，才会走向为人类所不齿的深渊，在那里，指引他的永恒的北斗星消失了。

375

关于这些理想——它们是韦伯早在斯特拉斯堡时就已经有意识地选择的遗产——自世纪之交就有公开的激烈争论。它们一方面重新得到深化和巩固，另一方面则遭到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婚姻理论、尼采、艾伦·凯（Ellen Key）、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其他人为消除这些理想的趋向提供了精神武器。双方都在同某些严重的劣迹作斗争。教育者、学者、神职人员、医生、理想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都致力于祛除笼罩着婚姻的阴影——卖淫及其毁灭性后果。尤其是，一些勇敢的女性不顾自身所招致的很多敌意，开始向国家容许的恶习宣战，向由妇女单方面承担卖淫的耻辱后果这一事实，亦即双重道德标准宣战。

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也要求男人对自己要更严格一些，要将婚姻重新神圣化：婚前保持贞洁，早婚或让离婚变得更容易。此外，他们甚而要求进行婚姻改革，要求男女平等和保护未婚母亲。其中大多数实际的要求也引起了“自然主义者”的共鸣，他们之中医生居多。但他们拒绝在道德上过于严厉，认为这办不到，而且有悖于人的本性。他们认为，人的生命如此短暂，为何要杜绝受本能驱使去获取青春期的幸福，因而让自己忍受折磨呢？最好是两害相权，弃重（卖淫）取轻：让社会承认“一时”的自由关系，赋予这种作为婚姻必要补充的关系以积极的价值。

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律法”，所以世界上才有违法行为。如果让本能的冲动得以不受阻碍地自由释放，那么，它们就不会成为魔鬼。只有适度的道德要求——让准则适应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程度——能够填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如果一个健康、声誉好的年轻姑娘手上无须戴戒指就可以委身于一个男子，那么晚婚的有害结果就可以得以避免。这样，青年男子就无须在妓院里放浪形骸，女子青春的花朵也不会凋谢而不结果

376 实。伴随着各种义务的婚姻标志着自由发展阶段的合理结束。

这种“新道德”的女信徒们在男女青年学生中做演讲时，把贞节调侃为“僧侣道德”，把婚姻讽刺为国家为了保护私有财产而设立的强制机制。她们要求“自由恋爱”和非婚生育的权利。那些刚刚挣脱家庭羁绊的女性青年正在竭力寻求新的福音，很多人便带着感激之情欢迎这些观点。韦伯对这个运动评论道：“这帮专事保护母亲的人完全是一群稀里糊涂的无赖。在听了某小姐的一番废话之后，我撤销了我的支持。赤裸裸的享乐主义以及把一种只能让男人受益的伦理作为女人的目标……这纯粹是胡言乱语。”

但是，关于幸福的新伦理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韦伯夫妇在无数私下里的交谈中，不得不对此表明立场。虽然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对具体的命运做决疑判断则让他们的心灵很受触动。现在他们在公共论坛和写作中也对这些问题做了探讨。玛丽安妮对此有所畏缩，也有些担忧，但她身处妇女运动的行列中，而且还写过一本书，其中反驳了社会主义的婚姻发展理论。在阿道夫·哈纳克的敦促下，她在出席福音派代表大会（1907年圣灵节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老朋友圈子中做了一个题为“性伦理的基本问题”的演讲。韦伯支持她的行动。她所代表的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伦理信念，这些信念通过同那些新观念和各種个人感受的多次辩难驳疑而在决疑法意义上变得更加精致。

我们将不会再像清教和“资产阶级道德”那样，把一个人全部的伦理价值与他对性道德理想的态度等同起来，也不会把没有达到这些道德理想的人贴上“不道德”的标签。我们认识到，人的高贵产生于他多种多样的素质和行动方式，如果一个人通过严肃的努力仍然达不到理想的高度，则这种高贵并不会必然遭到损毁。

377 演讲中的这些话包含着新的个人体验，包含着那些重大事件，以及同那些有探索精神的年轻人多次论辩的结果。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心理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才情出众，颇具魅力。他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了大师的观点，从中得出了激进的结论，宣扬一种性共产主义。与此相比，所谓的“新伦理”就显得无伤大雅了。他的学说可概述如下：性爱对丰富生命内容具有莫大的价值，因此必须让它摆脱一切外部因素和律法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将它与日常生活搅在一起。如果婚姻一时还得继续为供养妇女和孩子而存在，那么，爱情就应在婚姻这个领域之外去迷醉狂欢。夫妻双方不管对方的性欲冲动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都应当不怀嫉妒地让对方去满足自己的性要求。嫉妒是一种不健康的東西。就像一个人有几个朋友，他也可以同时有几个性伴侣，并且对每一个伴侣都保持“忠诚”。然而，相信对一个人的感情会天长地久只是幻想，因此，性关系中的专一也不过是谎言。如果只与同一个人发生关系，爱的力量就必然会减弱。爱的力量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性强烈要求得到多方面的满足。一夫一妻制对性

的羁绊“压抑”了本能冲动，有损心理健康。因此，我们要砸碎束缚人们不断体验新刺激的锁链。爱的自由结合将拯救这个世界。

弗洛伊德的这个学生获得了成功，他所传播的信息赢得了追随者。在他的影响下，不仅男人们，连女人们也大胆地置自己和配偶的心灵于不顾。让韦伯夫妇感到震惊的是，这种现象发生在那些很有品位和修养的人追求更高的性道德的时候，这远比在公共领域里那些不带个人色彩的论争更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些观点逐渐产生的影响深深地触动了韦伯夫妇的心灵，他们对这个理论所感到的惊骇和厌恶令他们痛心疾首，对那些为这种误导人的学说提供了土壤的命运悲剧感到深深地同情。假如这只是未得到幸福婚姻眷顾的那些孤独的人为自己制造代用品，那么这也许只是“可饶恕的罪过”；但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亵渎一夫一妻制——是一种严重的和具有毁灭性的过错，是“扼杀神圣”！这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韦伯夫妇还是从追随者的处境出发来试图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行动。他们懂得，在某几种情况下，人们接受这种危险理论是为了找寻“最有效”的途径去摆脱最难解决的冲突；懂得破裂的婚姻之所以得以维持，不仅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也是出于对配偶忠诚的友谊。他们看到了美和心灵力量的绽放，这种力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抑制了性竞争者之间所怀有的天然敌意。的确，韦伯夫妇必须佩服那些人的勇气，他们冒险去犯罪，而后又能不受罪孽影响。

378

最终这是不是说，理解一切意味着宽恕一切呢？如此这般设身处地地深入这些历险过程是危险的，自己的理想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丧失。那么，关于性真理的终极标准到底在哪里呢？这肯定不能从逻辑上可以证明的“律法”中引导出来。韦伯夫妇一刻也不曾相信过性自由可以让人变得高尚。尽管如此，是不是还需要积累一些关于性自由对那些有修养的人产生影响的经验知识呢？他们与精神病学的“道德”的追随者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论辩。有节制的学术争论背后隐藏着的是争夺理想和心灵的斗争。韦伯深入研究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认识到了这些学说的重要性，但不能同意弗洛伊德的门徒所做的阐释。这种阐释危害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在这个领域里，并不存在逻辑上让人不得不信服的论点，只有正确的东西本身具有的内在证据以及个人的选择。这种理想与理想之间、理想与命运之间以及知识与幻想之间的论辩在韦伯的一封信里保留了下来。韦伯收到了一篇投到《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的论文，论文的立论基础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韦伯以下述理由拒绝了这篇论文：

在此谨退还某博士 [格罗斯]<sup>①</sup> 的论文，我建议《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

① 中括号内的说明是译者根据本书“人名缩写和真实姓名密钥”提供的真实姓名所加。全书同。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379

不要发表此文。同时我想说，我做好了自已的意见被否决的准备。我自己**绝对不可能**同意将它发表！最简单的处理办法也许就是由我把这事告诉某博士自己，并说明原因。不过，这有什么益处（cui bono）呢？我清楚地知道，不管我如何解释，在这件事情上，就像在其他所有我们意见相左的事情上一样，他恐怕都**必定会**认为（仅就我坚持使用的术语而言——尽管我是“有意”为之）我墨守成规，都必定会觉得，我的“伦理”与“传统”伦理或者“传统”伦理的某些原则如出一辙。但我还是无法改变自已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即使**是对待像某博士这样一个人，我高度赞赏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因为不这样的话我就得进行大量的口头或书面的论辩，可惜我力不从心。在此我不得不做好冒犯各位的准备。

今天我们大家都有共识，宁可让人说“我们是理论上的道德怪物”，也不愿别人说“我们纯粹是浑浑噩噩之徒”。这后一点适用于某博士。就我所知，**凡是**他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所发表的言论，都无一例外地侈谈“世界观”。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道学家”，而不是“**自然科学家**”。因为诚实的缘故，我不得不这样说，即使有被认为不仅是道德上而且是学术上的伪君子之嫌。当然，我得——至少简短地——说出我的理由。

380

不可否认，这些年里，弗洛伊德的理论（通过阅读他的主要著作我现在也有所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现在——根据我一个外行的印象——还绝对没有定型。一些重要概念——例如精神发泄（Abreagierens）等——就在最近还不幸被歪曲和冲淡到了模糊不清的地步 [恕我在此顺便提一下，在《宗教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psychologie*）上——请注意！其中有一些令人作呕的大杂烩，把“神圣的上帝”和各种倒人胃口的色情东西都搅在一起了]。不过，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思想有可能会成为解释很多文化史，尤其是**宗教史**和道德史现象的源泉，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从文化史家的观点来看，这些思想远没有像怀有可以理解的热情和探索精神的弗洛伊德及其弟子们认为的那样具有那么普遍的意义。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将是，创造一种具有一定范围的**精确决疑论**和一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目前还不存在——尽管有各种声称它存在的说法——也许二三十年后将会出现。你只要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在这十多年里的一切变化，看看他的材料至今仍然少得可怜也就够了；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

然而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的门生，尤其是某博士，没有去从事这种必然是特殊的专业学术工作，而是转向形而上学的思辨，更为糟糕的是，转向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很幼稚的问题：“这能吃吗？”也就是说，能不能由此编造出一个实用的“世界观”来呢？这当然算不得什么罪过。直到现在为止，**每一种新的科学和技术发现**

都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发现者——不管他发现的是浓缩肉汁还是自然科学中最为抽象的东西——都感到自己有义务去发现新的价值，成为“伦理”改革家，就好像（举例来说）今天摄影的发明者感到有义务成为绘画的改革家一样。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中去清洗这种显然不可避免的婴儿尿布。

它们的确是“婴儿尿布”。要不然我们怎么称呼下述这样一种“道德”呢？这种道德用某博士先生的术语来说过于“怯懦”，因而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种道德的“理想”就是做一个非常平庸、健康和**显摆自己胆量**的人；这种道德相信，可以通过证明践行某些“规范”对人可爱的神经没有“益处”从而证明这些规范值得怀疑。尽管我这种解释自然会招致强烈的抗议，不过我还是要说，这种“新”学说的**道德内容仅此而已**。它后面除了下面这种市侩气息外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抑制**每一个**充满情感的愿望和冲动都导致“压抑”（其措辞至少包含了这种愚蠢的断言），如果这样的“压抑”是绝对的恶（据说是因为它会导致内心不真实，会导致“迷误和怯懦”，而实际上是因为从**神经保健专家**的观点来看，它有带来歇斯底里、强迫症和恐惧症的危险），那么，这种神经伦理就必须向（比如说）正在为自由而战的布尔人高声喊，赶紧逃命吧，否则你就会“压抑”你的恐惧感，也许会有安德烈耶夫（L. Andrejew）所描绘的“红笑”。以“技术”术语来表达就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懦夫”**，通过逃之夭夭，你会让你的怯懦感得到“发泄”，这样，你在某博士先生超现代的神经学意义上就不再是“懦夫”了；也就是说，“压抑”那些感受，使它们成为“无意识”，这对你有害无益，所以是不道德的。 381

这种伦理必定会对那些因变故太快而感觉受嫉妒心侵袭的丈夫或妻子——或者丈夫或妻子各自的情人——说：让嫉妒心情**发泄**出来吧，用奥赛罗（Othello）的方式，或者用决斗的方式，又或者用任何一种你喜欢的庸俗方式让其发泄；（从“新”的性道德观点出发），你与其同这种嫉妒心作斗争，因此而制造一种“幻觉”，还不如做一个“卑鄙”之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道德都要有勇气向我建议，让我为自己**所有的**欲望和生命的本能冲动（不管它们有多么卑鄙下流）的“发泄”——这就是说，给这种冲动提供**任何一种适当形式的满足**——大开绿灯，因为倘不如此，我那可爱的神经就有可能受到损害。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货真价实的医学上的庸人的立场！

我对某博士先生的“理论”是否有失公允呢？不过，在他论文的第九页，我发现明明白白地写着谈及**牺牲**的句子，这种牺牲是由“顺应”（也就是为了遵守规范而对愿望加以抑制）**造成的**——这些“牺牲”指的正是对**健康**的牺牲。换句话说，他指望我在按照人的尊严行动之前，会卑鄙地计算一下，“这要付出什么代价”；他

还指望我在决定自己行为的道德价值是否值得所付出的代价时，把神经科医生作为权威。无疑，这里有一个可笑的论断：这些“代价”（可能出现的对健康有影响的“压抑”）的出现只是相信**绝对价值**的结果。但是，最让我怀疑的是，某博士“相信**绝对价值**”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显然，这不是一两封信或者一两次谈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只要一种想要成为“理想主义”伦理的相对主义伦理指望一个具体的人去**希冀**一种只对他自己有效（可以说在**具体**的意义上只对他自己有效）的价值，只在当下、在**此种**情况下有效的价值，也就是说**希冀**一种“相对”的和“主观”的价值，那么，这种伦理就会导致毫厘不差的**同样的**“健康学”后果；除非这种“相对主义”意味着，只要个人追求他的“相对理想”需要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只要这种理想也许会“让他受不了”，他就应当放弃它。然而，**这**或许会是一种卑劣的小商贩理想主义，对此，我至少是像某博士先生——他无疑在自己的实践中不会接受——一样，也不能接受。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伦理”（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按下述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英雄伦理”，这种伦理提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除了在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外一般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在这个人无限的**追求**中被视为路标；另一类是“常人伦理”，这种伦理提出的要求并不很高，以至于一个人的日常“天性”也可以作为最高要求被接受。在我看来，只有第一类伦理，即“英雄伦理”可以称为“理想主义”，属于这类伦理的既包括早期尚未分裂的基督教的伦理学，也包括康德的伦理学。

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对个体常人的“天性”——按照他们的理想来衡量——非常悲观的判断，以至于弗洛伊德从无意识王国中揭示出来的东西（天知道）也并不能为其增添**任何**“可怕”的东西。但只要“精神病学的伦理”提出的只是这样一个要求：“对你自己承认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过什么样的愿望”，那么，这种伦理实际上就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伦理要求来。毕竟忏悔神父以及旧时的牧师通过访谈对信徒灵魂提供帮助的任务在这个方面也都无非是如此，而弗洛伊德的治疗方式不过是使用不同的技巧来表达**忏悔**而已。只是这里的目的同旧时特策尔（Tetzl）发放赦罪券的目的比较起来与“伦理”相去**更远**一些。谁要是自欺，想要自欺，忘记了如何回忆起自己生命中感到羞耻的事情，忘记了如何回忆起那些如果自己愿意，是在很大程度上清楚记起来的事情，那么，即使他在弗洛伊德供病人接受治疗的沙发上躺上几个月，让弗洛伊德把那些“幼儿期”或者其他被“压抑”的羞于见人的经历带回到意识中来，从**道德**上讲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弗洛伊德的治疗法也许有**健康方面**的价值，可是我不知道从道德上讲在下述情形中我能获得什么。譬如



说，女仆和我在性行为上不检点（这是弗洛伊德的例子），或者说一个我“压抑”下去并已经“遗忘”了的肮脏的冲动又回到了意识的层面。因为我承认这一切，同时并没有感到我在做任何“可怕”的事情，没有感到自己过去和现在对所有关于“人”的事情有什么陌生。从根本上讲，我没有了解到任何新的东西。

不过这有点离题了，我说这些只是要表明，像这样一个绝对律令——要了解你自己和你自己行为的历史**真实**，就到弗洛伊德这儿来，或者到他的学生们这儿来吧，否则你就是一个懦夫——不仅暴露了精神病学家和“职业心灵顾问”幼稚的“狭隘爱国主义”，而且由于它不幸与纯粹“健康方面”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因而丧失了所有的道德价值。除了这种在精神病学家的帮助下“认识自我的义务”之外，正如我所说的，我从这一通篇谈论道德的论文里读不出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要求来。**哪里**有关于新的相对主义的同时也是理想的（注意！）价值（批判“旧的”和“可疑的”价值应当以此为基础进行）**内容**的蛛丝马迹呢？去找这种价值只是白费力气，而这是有它的道理的：任何描述这种价值的尝试都会使其露怯而招致批评，都会表明问题只是被推延，并没有得到解决。一种要求做出“牺牲”、不排除**责任**的理想主义伦理绝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然而，如果不是基于自己的理想，而是立足于别的观点来批判一种伦理，那是行不通的；否则，你就会进入鄙俗的“计算代价”的领域，然后就像我说过的那样，“理想”就不可避免地会变为通常的炫耀健康，个人也就成为医生控制下的掌握长寿法的庸人。

假如某博士读到我上面的这些文字（我希望别给他看，不过这事听凭你们做主。问题在于，他有幽默感吗？对此我很怀疑！道学家都缺乏幽默感），他肯定会发现我把他的观点可怕地庸俗化了。不错！我的确有意将它们用我们可爱的“庸俗”德语加以转述。而他的观点所产生的“庸俗”效果，责任却在他，因为这正是他把医学研究同非常迷惘的改革家的热情搅在一起的结果。整篇论文的失败就在于，它充斥着价值判断，而我对不符合清醒、客观标准和不遵守“价值中立”的所谓自然科学成就没有丝毫敬意。……

**专业**是一种技能，并传授技巧方法。可是只要出现关于价值的争论，问题就进入了一个脱离了任何一种“科学”的完全不同的精神层面；更确切地说，就是对**问题的提法**完全不同了。**没有任何**专门的学科，没有哪一种科学知识，能够提供一种世界观，不管它多么重要——弗洛伊德的发现如果最终能够经受住考验的话，我当然会把它算作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反过来说，在一份专业的学术杂志上不能发表一篇力图进行说教的论文——而且是拙劣的说教。

1907年9月13日



然而，人们很快意识到，用精神病学的洞见来构建某种救世预言只是一种幻想。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那些在灰心失意的阴影下正在凋谢的生命之花拼命地趋向阳光，不能阻止由于不幸的婚姻而受到强暴的性爱去砸碎它的锁链！事情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为了不被自我折磨摧毁，那些受到影响的人起初接受了弗洛伊德门徒的某些颠覆了迄今为止一切观念的思想。尽管这一切在韦伯夫妇看来是一种迷惑人心的东西，但他们却不能愤而回避，因为牵涉进去的是一些非常高尚和非常可爱的人，他们想要竭力帮助这些人。同时，他们也想要学会理解这个非资产阶级的奇特的冒险世界，并在思想上与之论辩。

与这种思潮的接触触发了韦伯对道德决疑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从以下这封信的节选中可见一斑：

385

为了写出下面的内容我又服用了安眠药。我觉得，某先生和某太太的状况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些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不真诚的基础之上的——想要同传统的虚伪作斗争！但是我觉得你不能袖手旁观。我估计，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立场，你和他们的关系就会出现危机，因为你的立场不可能和我的有什么区别，即使形式上要温和一些。

.....

通过性生活的历险来获取深度是一件很成问题的事情。一个怀有强烈而隐秘的爱慕之情的女人总**显得**“更具有深度”，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让这些人卷进去的确实是一个严重自我欺骗的强大罗网，美的升华只是导致在这些人那里将事实的真相掩盖起来。难道某博士并没有感官的需求，而只是出于“仁爱”才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吗？这是一派胡言。在这方面只要稍有心理体验的人，只需听听出自未能尽情发泄的性欲的那些肮脏言论，就可以知道他干的是什么营生。对此不能用狂热所提供的抗衡力量来欺骗人。两种毒药在这里势均力敌……所谓的“牺牲”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牺牲”仅表明丧失了对差别的敏感性，它们是——每一个精神病医师都必定会确认——心理疾病的一个重要症状。“理论”或者“意志”还从来没有在性欲上克服过真正的生理反感。

有一些“死罪”是人鲜有获得赦免的。不过，K的女朋友<sup>①</sup>的情况还不至于

---

<sup>①</sup> 这里K指Ernst Frick，K的女朋友（K. s Freundin）指Frieda Gross。参见本书“人名缩写和真实姓名密钥”。——译者注

此。指导她在道德上具有明确行动方向的根基已经毁掉，丧失了根基的她现在需要竭尽全力让自己幸免于难，继续保持“修养”，消除自己的过失所带来的影响。这无疑使她变得高尚——这就像每一个努力使自己变得比自己的罪过更为强大的人，要比一个无可指责的“正直的人”更为纯洁。可是，归根结底，不管她自己承认与否，她的行为仍然是针对她丈夫的放任不羁而要维护自己的自尊。显然，她别无选择。即使她声称自己和丈夫本身都没有性欲要求，难道没有性爱冲动而委身就不算“肮脏”吗？你瞧，理论在任何地方都会进入分数运算。……

一个此前严格遵守伦理原则的年轻朋友，通过自由的性关系从艰难的生活中获得了暂时的解脱，由此他改信了这样一种观点：性行为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它危害了别的价值时，才应当受到限制。他认为，采取“僧侣的”观点是过分强调了对性行为的限制。对此，韦伯评论道： 386

我倒是乐意对B的名言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问题是，他在跟一个想象中的对手斗剑。谁应当是那个“僧侣”呢？他自己以前一直是这样一个“僧侣”吗？问题正在于，性行为是在什么时候以牺牲别的价值为代价而让自己“往前挤”的呢？这一定总是在一个人不能完全控制自己行动的时候。毫无疑问，当一个人能把“未得到满足”的性关系只是作为“肮脏”的关系来看待的时候，这种情形也会出现。不过，首先，任何对冲动“本身”的观察都是“抽象”的。冲动毕竟永远不可能“自身”独立存在，而总是在与一个具体的人的关系中存在，并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尊严或者丧失尊严。

当时，脑子里满是婚姻问题的年轻人不断被这样一些问题困扰着：道德“理想”是否也是“行动”的准绳？道德规范是否可以以及为什么可以“无条件”地适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是由内容决定的规范，还是仅仅由形式决定的规范？它们适用于具体的行动吗？假如那些规范让我们鲜活的生活凋零枯萎，我们是否仍然应当践行这些规范？禁止常人做的事情，是不是“神”就可以做？应当如何反击那些不仅对性道德规范而且对一般“道德法则”的尊严所发起的攻击呢？“旧伦理”的支持者试图用逻辑公理来捍卫这些道德规范和法则。玛丽安妮描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辩：

E现在对“道德法则”十分痴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谈。一般来说，他只把逻辑上可以推导出的东西作为具有客观约束力的东西。他认为， he 可以从同一性原理，即从理性生物与自身的同一性中导出道德规范——不管是形式、内容还是逻辑

的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情感，包括爱情，绝对不应该被视为在道德上对婚姻起建设性作用的因素：因为情感是非理性的，所以它作为道德动机并不重要。他还试图从道德法则的概念中导出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在我看来他的这项努力完全失败了。我们其他人的观点是，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无法在逻辑上加以证明，其尊严不能从逻辑推演中导出，而应当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在实践中被“发现”，然后获得其内在证据的有效性。B宣布说，他对此感到很满意，认为这说明了他是正确的：如果它们无法加以证实，我们也就无须相信它们具有普遍有效性，无须再用它们来折磨自己！

韦伯使用一个有趣的类比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几张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寄出的明信片上，他草草地写下了下面的内容：

真的，我也相信，你们讨论了这么多的“道德法则”只包含相对的内容。当有人在蒙特卡洛赢了钱时，“我曾多么轻蔑地加以痛斥”；如今我自己也赢了1 000法郎（在15分钟之内！），我感到有点难为情。但是如果B可以踏进“非逻辑”的领域，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进入绝对“非理性”的领域呢？毕竟，我这一个冬天的辛苦劳累也值1 000法郎了，然而正是在这个臭名昭著的赌场我才弄到了这些钱。

实际上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的确，周围的人都粗俗。赌场10点开张，排着队等待入场的职业赌徒们一开门便飞奔到他们的赌桌前，以占到一个座位。各色人等迥异：有冷静沉默且精于计算者，他们有一套“统计”数字，每次听到要他们下注的声音，就按事先的计划赌一个数字系列，然后紧闭着嘴唇不动声色地将赢来的钱放入口袋，或者看着自己的赌注被钱耙刮走，只有眼睛里的血丝和笨拙而又急促的动作透露出他们紧张的心情；他们身旁有静悄悄的狂热赌徒，这些男男女女的可怜鬼脸色蜡黄，衣着寒碜，微微颤抖的手里攥着个笔记本，带着压抑的绝望关注着他们赌下的那5法郎的命运；最后还有那些肥胖的诡诈之人，长着双下巴，脖子上堆着赘肉，长长的髭须，下颌突出，眼睛从肥胖的眼袋中透射出渴求，关注着自己赌注的成败。这些是坐客中的几个主要类型。他们后面站着并非常客的观众，他们也要试试自己的运气，最终几乎每次都输掉。

这也是我的经历。我收不住手，又试了几次，1 000法郎就又给输掉了！真可气！不对，这倒蛮好！我也许毕竟还是有些难堪。当然，现在有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激动——不过这样反倒更好。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去赌？不过，只有庸人和没有活力的人才这样想！日耳曼人是有赌博传统的！一个有活力的人不能够消

极被动。

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着：“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活力，所以‘道德法则’并未受到损害，我的钱包和赌资也同样没有受到影响：我乘有轨电车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的钱安然地躺在旅店老板的保险柜里。”

韦伯的妻子装着好像没有看到最后一张明信片，赦免了他“背离道德法则”之过。韦伯一时并没有领会这个玩笑，感到有点吃惊：

你从我的明信片中读出了什么东西？难道我把别人的钱拿去赌输了吗？真不好意思！如果要输钱，那最好也是输自己的钱！当然，我压根儿就没有输钱，也没有赢钱。亲爱的，我们“朝夕相处”了差不多十五年后，你现在终于相信我能干出点漂亮事情来了。我终于发现了这一点，真令人高兴。瞧瞧，瞧瞧！我会用别的事情来考验你。可惜你并不相信我会到“非逻辑”的领域里驻足，我不能以此来考验你……

※ ※ ※

1908年年初，韦伯夫妇分别了较长一段时间，所以上面摘引的内容是在信件中写下的。韦伯在匆忙完成了古代农业史研究之后，又必须到南方去放松好几个星期。这次他主要是在温暖的普罗旺斯（Provence）乡间的薰衣草海岸度过的。然后他和海伦妮在佛罗伦萨尽兴地参观了很多地方。玛丽安妮也感到精疲力竭，去了别的地方补充精力。他们还从来没有相距如此遥远地分开过，不过每天都有鸿雁传书跨越空间，这些信件反映了那些让年轻人感到兴奋的问题的讨论。韦伯对妻子感到担忧，从遥远的地方给她接连不断地送来温暖的关怀。在分别的这段时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日。这种机会打开了心灵的宝库，深藏其中的珍奇异宝放射出了光芒。爱情结合的永恒的内涵成功地渗透了日常生活。

389

这里的春天和我们那里不同，当你穿过这些灌木丛和松林的时候，就会有此感觉。很多暗绿、灰绿、橄榄绿和灰色的色调构成了万物的底色，像给打了蜡似的减弱了万物的色彩，让带有淡淡伤感的晚秋色调也进入了春天，就像庆祝银婚时的婚礼花环戴在一个具有成熟美的额头上。然而，在一个不再年轻、受到约束和遇到障碍的躯体中，那个年轻的灵魂和那颗欢乐的心并非就没有价值，而且与那些除了年轻之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没有头脑的莽撞冲劲比起来，也许更有价值……我们永远不会不幸福，只是间或要受点苦罢了。你也受了很多的苦，我的孩子，这我是知道

的，现在则真正了解了。命运的确乖戾，可命运的权力也有它的限度，它对常驻我们心灵的青春就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不愿意，它不能使这青春生锈。

1908年4月于拉旺杜（Lavandou）

玛丽安妮在回信中写道：

感谢你寄来美丽的南方春天的风景画！你的心灵如此丰富，即便你的精神力量受到束缚，你仍然能够享受它！我们别的人几乎都得依靠借来的光源行走，而你自己就能射出这样的光。这里几乎看不到花木含苞，在幽暗的冷杉林中分不清现在是春天还是秋天伊始。只要我们能够心存感激，怀着强烈的生活欲望，愉快地享受命运赐予我们的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是春天还是秋天又有什么关系呢？

玛丽安妮还从那里给海伦妮寄来了生日贺信：

得悉你们俩正好在给你庆生的这一天团聚，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真希望能与你们在一起。可是因为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在心里亲吻你，最亲爱的妈妈，随信寄上我恒久而常新的爱和感激之情，以及对你以伟大的生命、心灵和爱的力量不断赠送给我们和很多很多其他人的一切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钦佩。但愿我们——你的孩子们，也能学会像你一样，在常常是坎坷的漫长人生中让青春常驻。

下面是韦伯自比萨（Pisa）的来信：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是如何怀着对“文化”的渴求从科西嘉来到这里，坐在绿色草坪上一个静谧的墙角，陶醉于这个独特的小地方那种大理石般的美妙吗？我们悠闲地在大教堂里和教堂周围坐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让自己沉浸在那个僻静的墓地的整个氛围之中，墓地带有——一个宁静的野生芳草园，位于回廊里带了几何形漂亮窗花格的窗户之间。当然，这在意大利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世纪创造出来的最早的艺术品，而且又如此引人注目，这一点仍然是一个永恒的奇迹和世界历史中的幸事，对此我们直到今天都得心存感激。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儿童般的快乐，它们的艺术均衡和谐显得多么自然率真，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

遗憾的是现在下着倾盆大雨。即便如此，我们昨天还是先在大教堂前饶有兴味地观看了那些置身于车马喧闹（还记得吗？）声中的人，然后下午去参观了美第奇

家族的墓，这里深深的忧郁和对从生活中得到解脱而长眠不醒的渴望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更具有震撼力……

1908年4月19日于佛罗伦萨

这些大公文信笺确实不适合用来写信告诉你，你那封可爱的生日短信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快乐，**尽管**在信里你与我一起在共建“巴别塔”，我的好姑娘。因为正如我以前或许说过的，我从中看到的每次都只是你那么深厚的爱情。我将会容忍羞辱，也肯定会容忍我亲爱的小姑娘所持的“不加批评”的态度。我不能确定，自己一直持有的批判态度是不是源于一个比较软弱的心灵。但是我知道，在所有的批判中，我始终渴望那个超越一切批评的温暖的太阳。与你在一起的生活就像春天里太阳洒下的柔和的阳光和它的温暖，这颗太阳——就像托尔斯泰带着过于强烈的乌托邦思想所期望的那种抽象的**仁爱**力量——悄然、坚定而（因其永恒而能够）耐心地消融着生活中所有的冰块，融化着所有的积雪层，而我激情的狂飙只能将树上的雪花和冰凌摇落下来而已。今天没有你在真的是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情。昨天我还在跟妈妈讲，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分开。明年我们一定得一起做点类似的事情。

391

1908年4月21日于佛罗伦萨

※ ※ ※

在家里，韦伯夫妇还同现代思潮折腾了很长时间。韦伯对不受规范约束的性欲对整个人格的影响很感兴趣，因为归根结底后者才是重要的。通过带着同情之心去观察奋斗中的人的具体命运，他对个体行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上引书信段落反映了这样一个人的态度：他虽然在道德上并不狭隘僵化，但也保留了对别人的行为——以疏离的态度——按照普遍的标准去衡量和加以判断的权利。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有权利这样做的时候，韦伯常常强调，一个人要是不疾恶如仇，就不能真正热爱善和伟大；通常对别人做出的趣味判断远比道德判断更加“不友好”，“因为前者无法申诉，所以人们置身于这类判断之外，而人们总是服从于道德，因此与被判断的对象保持着内在的共同性”。

他对在性爱领域中处于善恶彼岸的人的本质的看法虽然并未改变自己对规范的坚持——他对这些规范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持不可动摇的信念，但却改变了他对于抛弃了规范的人所持的态度。他现在较少关注他们受激情支配的行动，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们作为整体的存在。只要是在他能够肯定后者的地方，他现在都更关心对它的保护和促进它的发展，而不是去衡量人们的行动与“道德律令”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道德价值并非独立存在于世上。它们如果要求牺牲，就可以让负疚的人变得渺小。在无过失的行动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它们可能导致无法解决的冲突。然后，（从伦理上说）人们的行动必须使牵涉其中的人尽可能地减少在人的尊严、向善的能力、爱的能力、履行义务的能力和人格价值方面的损失，而这通常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392

他在交谈中发表的看法也集中体现了自己的新见解，譬如说，道德上有不同的层次之分。如果道德上最高的层次在具体情形中无法达到，就必须努力达到第二或第三层次。至于这第二或第三层次到底是什么，在理论上无法确定，而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确定。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从外部——通过习俗——强加给人们的牺牲，给那些觉得生活对自己很严厉的人在心灵上造成极大的伤害，使他们变得渺小、伪善和愤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若犯过失反而更好。

但是，当韦伯不仅看到了那些在新的自由中成功的强者，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在性爱博弈中深受其害的失败者时，他的看法又有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的要求，也有很多东西遭到否定。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孩子的缘故，韦伯觉得各种冒险中“甜蜜的轻率行为”似乎与继续保持婚姻是可以相容的。但是，如果这种轻率的游戏变得非常严肃且充满巨大的激情，而且要求同婚姻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他就会带着惊异预料到弱者道德的崩溃。

韦伯自己对新观点和别人命运的分析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的道德理想仍然是性关系中最高的形式，但这不能强加给所有类型的人。我们不可能建立起明确的道德原则，使之适用于人们坠入婚姻生活之外以及与婚姻生活并行的多种具体情境。但是，承认在一切人际关系中负有的责任和道德努力的严肃性，这些原则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而且，那些在强大生命力的诱惑下犯有过错的人，不应当从中制造出“理论”和推导出“权利”来。

393

韦伯认为这样一个核心要求非常重要：即使本性和命运迫使我们做出了违反道德的行为，一个人仍然应当谦卑地遵从超越个人的规范，把自己的行动与这个规范之间的差距作为过失加以承认。对此，他写道：

让我感到不悦的是，当一个人遭遇巨大的激情这样的命运时，这个人从中给自己弄出使他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动的“权利”来，而不是干脆“人性地”应对这样的命运，将它作为一个人必须得应对而通常——正因为他是人——又对付不了的“命运”。因此就出现了总是要在“权利”并不存在的地方需要得到权利的状况。这一点我不能接受，其他一切都必须得到“理解”。



常常让玛丽安妮受到触动的是，韦伯坚决拒绝让那些苦苦挣扎的人和误入迷途者将自己抬高到白璧无瑕的地位。当然，他并不十分在意自己有时表现出的粗暴生硬和火爆脾气，这种脾性让那些不熟悉他的人望而生畏，但是他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给一个脆弱的姑娘无意中带来过痛苦。他现在也把自己对父亲怀有敌意的爆发视为无法弥补的过失。最为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接近别人——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本着这种精神，他给一个在他那里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并为韦伯的宽厚所感动的年轻朋友写道：

相信我，如果一个人自己知道什么是“负疚”，那我在道德上不去追究他是它的道理的！毕竟，并非每一种“过失”都必须在我们这里讨论的特殊领域内。我自己也有极端的“过失”让我负疚于心——这当然不可能没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但是，并不像你所说的，是一道永远不可能再弥合的道德裂缝。只有意志非常薄弱的人才这样想。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问题在于帮助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逐渐获得一种人们能够达到的明确的理解，即理解生活是怎样同我们游戏的。这一天将会到来，我们会获得成功。此外，过失也许能成为力量的源泉，也许不能，这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对待它。假如只有“无过失的一生”（integer vitae）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不包括其（恰当理解的）反面，那就糟糕了。要是这样，我无论如何都必须放弃做这样的完人。

在给海伦妮的信中，玛丽安妮这样总结了这一段时间的经历：

394

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也经历了心灵的挣扎和内心的冲突，有时耗费了我们很多的精力。因为让人感到震撼的是，那些拥有高贵的心灵、向善的意志以及怀有强烈的拳拳慈母心的人，反对我们相信自己的理想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普遍有效性。不过我相信，本着这种想要去理解的愿望——因为我们必须去爱——我们的心灵也有收获，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人性和谦虚。我对于命运充满无限的感激，是命运通过一个出类拔萃的伟人——我爱他胜过一切——赐予了我极为丰富的礼物，满足了我心灵最深处的需要，从而使我免于陷入罪孽之中。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理想，然而，我缺乏在公共场合为之努力的勇气和兴趣。

## 第 12 章 历经世事与论辩诉讼

# 1

395

1908 年的夏天和秋天，韦伯的健康状况很好，能够同时在几个不同的领域从事几项大的研究计划，并且又骑马挎枪投入了论战。他在《法兰克福报》上就“X [Ludwig Bernhard] 事件”发表了一篇关于高校政治的文章，还完成了一篇反驳某政治杂志一个著名编辑的回应文章。

396

事情的肇端是这样的：一个普鲁士政府部门越过院系，直接将一名有才华的年轻政治经济学家调往柏林，期待他做在政治上受政府欢迎的工作。这激起了韦伯从几个方面对其进行谴责。他谴责政府通过蔑视大学院系而要在年轻学者中培养出一种“商人”类型，也就是说，诱使年轻人通过为国家效力而走一条学术生涯的捷径。他谴责那个在其他方面受到他尊重的讲师屈从于这种诱惑，写道：“当写下这些文字的作者像这位讲师今天这么年轻的时候，那些被教育部聘为教授的人，在被聘之前首先要证实，自己是否得到了院系，或至少得到了将与之共事的优秀同行们学术上的信任，那时这被视为学术职业操守中最基本的义务。”与此相关，韦伯还批评了柏林大学政治系在另一件事情上的做法。该系刚制定了一项限制重新审定讲师资格的规定，并用这个自己制造的障碍阻止像维尔纳·佐姆巴特这样公认的杰出学者和教师进入该系。韦伯从中看到了对主观看法的让步，认为这“偏离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重要学者这一原则——这种态度最终的报应就是削弱院系里的道德权威……”韦伯有力但很冷静的批评并非没有效果。那位年轻的

学者让系里决定自己的去留，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告诉韦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另一方面，韦伯对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做法提出的批评惹得系里一位教授发表了一些言论，结果遭到了韦伯最激烈的严厉反驳。那位学者声称，韦伯对该系的批评是出于私利，即出于为自己的朋友佐姆巴特做的考虑。在这个批评中，韦伯不仅看到批评者无法容忍地违犯了公开辩论应遵守的严格的客观性，而且看出了其中的言外之意，即韦伯逾越了他自己最为重要的规范之一。他对此的反应是极为愤怒，但他将满腔怒火包裹在冷嘲热讽之中：

假如某先生一本正经地呈现给公众的解释——我的客观论述是出自个人动机——是由一个别的什么人提出来的话，我自然会只是将其视为并且称为卑鄙行为。只不过这类事情在这位先生那里不能被看得**这么认真**——不过我得说：可惜！这几乎谈不上是对论敌有意识和故意的侮辱，而是表现出他的感受缺乏一定的教养……他缺乏职业记者的责任感，所以，如果他做了那些职业记者绝对不能做的事情，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 ※ ※

1908年夏末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精神景观：国际哲学家代表大会。韦伯见到了从其他地方来的各种各样的学者，思想深邃而滞重的社会学家特尼厄斯（F. Tönnies）在大会期间一直住在韦伯家里。海德堡一派兴高采烈的气象。虽然其他地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并未出席大会，但在较年轻一些的学者中倒是明星闪耀：特勒尔奇、拉斯克、德里施（Driesch）、福斯勒等。老一辈的重量级人物的代表是伊维廉·温德尔班德和黑格尔学派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拉松（Lasson）。外行人感到自己更像是置身于一个大型的公共庆典，而不是一个“学术团体”中。看到这一群贤毕集的场面真让人兴奋！可是以这种方式来促进真理发展看来是不可能的。人们获得的印象是，哲学这门学科，虽然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但并没有统一、全面和令人信服的真理。几乎所有这些学者都在相互争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同一个词有着无数不同的内涵，如自然、精神、真理、理念、自由、上帝，没有一个词具有明确的意义，就连“哲学”这个概念也有多重含义。与会者看来须在开会之前就相互交换术语词典才行。所以，他们在讨论中谈不到一起去，鲜有成果，因为从根本上讲，谁也不想向别人学习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已经坐稳了某一个绝对真理的御座。对外行来说，那肯定不会有令人信服的结果。这不是在建造巴别塔吗？这些哲学家不正是在使用完全不合适的工具试图揭示世界的秘密吗？然而，这些求索和辩难，这些将现象精神化的努力，这些永不停息的动念正是一种伟大，

一种海潮般的伟大，它永远不能够达到目的，因为它自身就蕴含着目的。

※ ※ ※

让我们转入另一个领域，这里的问题涉及行动着的人，他们倾向于直接和实际地面对世界。

1908年秋天，韦伯夫妇又在奥灵豪森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和谐和充满感情的家庭生活中享受了生命的美。韦伯在那里继续进行工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学调查。在这期间，他已经仔细研究了专业文献，尤其是克勒佩林及其学生的著述，想看看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是否适用于这类研究。现在他又开始重新在家庭纺织厂找寻原始资料了。398 辛苦的计算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的情绪很好。

温煦的阳光所具有的魅力和成熟季节的芬芳弥漫在美丽的德国乡村。为辛勤劳动后的一天舒心提神，韦伯或乘马车一路游玩着驶往森纳——那里有的地方红色的石楠花还点缀着森纳的严肃，或沿着绵延的滕斯贝格山山脊散步。他还喜欢去探访临近的库普夫哈默尔（Kupferhammer），那里有大工业企业家卡尔·默勒（Karl Möller）建造在贫瘠的荒原中的富庶的庄园。他的夫人赫尔塔是奥灵豪森人，是卡尔·韦伯的女儿。父辈时就已经建造起来的大工厂里一个巨大的烟囱傲视着宁静的美丽大庭园，似乎它是统治这里的君王。然而，主宰这里的不仅仅是运转不息的机器。这里中上层的人具有很高的修养。赫尔塔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有美丽的容貌，内心充满了精神和艺术内容以及永不停息的追求。庄园的主人其实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企业家，从他繁忙的生活中拨冗关照他的工人福利和教育。他是一个真正正直的人，清教伦理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眼睛里闪烁着善良，然而，他超然、矜持、始终保持着自制和庄重的举止风度总是影响着周围的人。在韦伯看来，他这种举止风度如奥灵豪森的长老一样，体现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代表了他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里发现的那些严肃稳重的人物的后裔。

学者韦伯很高兴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他对这个家庭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有兴趣，他和女人们——她们是辛勤劳作的男人们的心灵中心——一起深切关注她们所有孩子的前程。他既获得也付出，完全脱去了知识分子的习性，去接近与他秉性完全不同的人的心灵。他的形象表达能力使他能够将学术知识有效地传达给没有学术训练的人们。

这一时期最美好的事情是，马克斯几乎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管是讲故事，还是分发更有实质内容的精神食粮，他都同样不知疲倦，同大家一直待到晚上10点钟左右。一家人总是聚在他身旁，好像围聚着一个集智者、圣人和滑稽演员于一身的人。很难说出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晚上，要是格奥尔格也打开话匣子，399

那大家就会笑作一团。所有军营里和学生时代那些旧的逸闻趣事又复活了，一点也没有失去光彩。其中有时候甚至还会冒出些我还不知道的新鲜东西。马克斯的叙事技巧之流畅犹如水库的蓄水滔滔不绝地涌出。他上午工作，下午口授，简而言之，“生活”得俨然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们为这些开心的日子感到高兴，尽管心里清楚，乌云、阴雨和严寒还会回来。与这些善良和幸福的人们在一起总令人十分兴奋。秋天的阳光照射着美丽的庭园，清晨在草坪晶莹的露珠上熠熠发光。

几年后，当死神夺去了这个圈子里的男主人之一——维纳的丈夫布鲁诺·米勒的生命时，韦伯描绘了米勒的高大形象，其方式也可以让我们了解韦伯，因为他在描述米勒的个性特征的同时，也描述了纯粹和高尚的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个阶级——撇开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不论——是自己国家的宝贵财富，并骄傲地把自己视为这个阶级的一分子。

亲爱的维纳：

我同时收到了布鲁诺昨天写给我的公函以及这个令人震惊的、绝对意想不到的噩耗。此时我简直难以想象，当我们下次跨进你们家门的时候，我们再也无法感受到那个谦虚、自豪、让人喜爱不尽的主人朴实的自信和高贵的善良了。对于一个处在成功的巅峰的人，一个知道有蓬勃发展的未来，知道年轻一代站在老一辈的肩上，因此又可以继续创造新生活的人来说，在没有衰老、疾病、退化和孤独的状态中死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一生中无须品尝太多的不幸、误解、失望、忧虑、艰难和内心冲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生命是美好的。因为他自己忠实可靠的本性，因为时刻不离他左右、在他身边滋生的无尽的爱，这些幽灵对他都退避三舍。能想到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也是美好的事情：这个人能够对自己说，在他的一生中，事无巨细，他从来不曾背弃过**真正的骑士精神，真正的资产阶级骑士精神**，这种精神使他早在三十五年以前还是个小伙子第一次来我父母家的时候就征服了大家的心，也许还赢得了你。

400

他属于这样一种人，我们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敢跟这种人或者在有他在场的时候——即使是在极为简短的交谈中——哪怕仅仅是触及任何意义上肮脏的和不正经的东西，甚或只是动一下这方面的念头。这样一种心灵、身体和精神上的纯洁氛围正是来自他那里，即使他总是完全有意识地、过分地力图让自己退居次要的地位。你要是想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装腔作势和空洞的言辞，通过虚假的激情和满足虚荣心的自我表演来打动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碰到他那审慎、冷静但极其自信的目光，这一切行为都会消散于无形。

他以这种方式给予他周围的人，尤其是给予你们的孩子的东西当然无法计算出来，但无疑是多得不可计量的。他是如何赢得人们对他的无条件的尊重和总让我印象如此深刻的那种自由而自然地表达的崇敬的呢？他们的崇敬表现得是那么从容而顺理成章，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给每个人带来了快乐。他并不是通过“言辞”做到的。不，他因其朴实的性格恰恰并不着意于培养自己在书写和演讲中的表达能力，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此过于鄙夷的缘故；他只是无声无息地为自己的事业和应尽的义务而生活。他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言辞”才产生了影响，才使人们与他交往，才能够确立自己的人格特征。人们亲近他，是因为他让人感到十分安全、完全受到保护，极少有人能唤起这样的感觉，而这正是人们能够找到的最高、最终极的东西，归根结底，言辞——即便是最好、最精微的言辞——最终不也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吗？在他那里，言辞并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他是一个人们信得过的人，甚至在他开口之前人们就绝对信任他，没有任何词句能够进一步增强这种信赖感。

401

很难估量通过这种宛如天赐、无法替代的品格他对于你们，也对于那个让人感到自豪的企业（这个企业没有他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不管是在外在意义还是在内在意义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格奥尔格有一次告诉我说，一个生意上的老朋友向他表达了凝聚着他深厚友谊的希望：“总而言之，要像您父亲一样，这是我对您的全部期望所在。”人们必定会羡慕这样一个父亲，也同样会羡慕得到这份期盼的儿子，他有充分的理由得到这样的期望。布鲁诺不可动摇的自信对于他父亲涵盖一切、令人惊奇的“伟大”（我们必须得用“伟大”这个词），对于他儿子卡尔出色而令人折服的充沛精力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他带着自己白璧无瑕的纯洁性格，从上一代德国资产阶级——这一代人的性格和价值要远远高出外人的估计——进入了当代，进入了新一代，这一代人必须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很多方面必定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别无选择。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历。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信心，相信这些年轻人将会以自己的方式变得同样有价值，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内心充满矛盾斗争的生活环境中仍然表现得令人尊敬，在他们生命的黄昏也能像米勒和你一样，用清亮愉快的双眸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么，我们就不会忘记，除了幸运地来自你——亲爱的维纳——的爱和温柔的理解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之外，你丈夫纯洁的心灵中深深的挚诚和真实同样为此做出了贡献，人们将为此永远怀念他，我们应当将此作为一种恩赐而感到高兴。谨以我发自内心的忠诚，在我的心里紧握你们——你、威廉和孩子们——的手，但愿我很快能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也许就在几天后，也许时间再长一点，但等这沉痛损失的第一波震撼过去之后。

## 2

我们现在来回溯一下这些年里发生的其他事件。

自1905年起，政治的天空中就开始积聚起危险的云层：摩洛哥问题。德国危机四伏。为了促进自己的贸易“开放”政策，德国干涉了法国在摩洛哥的政策。德皇出访丹吉尔（Tanger）和他对摩洛哥苏丹的谈话减少了战争威胁，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会议解除了这种威胁。德国获得了成功，没有退让，但是付出了何等代价啊！法国对德国的干涉耿耿于怀，将意大利拉到了自己一边。英国主要关注德国不断增强的舰队实力，将其视为德国针对英国海上霸权而采取的措施。自此，德国便被视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好战国家；当它拒绝参加海牙会议的裁军问题讨论时，便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爱德华国王（Edward）的孤立政策奏效了。英国、法国和俄国达成了共识，意大利和奥地利陷入了紧张气氛之中。1906年年底，“人治”的危险和险恶局势问题在议院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之后，德皇又一次在公开演讲中断然拒绝了人们在政治上向他提出的警告，发表了富有挑衅性的声明：“我不会容忍悲观论者。谁要是不能胜任工作，就应当辞职，去找一个更好的国家。”总理为君主的行为开脱，称此举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总理说，德国没有一个议会制政府，德国人民不想有一个影子国王。1907年，摩洛哥出现了新的动乱，德国再次干涉了法国的政策。但是法国与英国和意大利达成了共识，德国外交上的失败显而易见。尽管如此，局势还是出现了暂时的缓和，爱德华和威廉互访，德皇和沙皇有过一次会晤。然而，就在同时，英国和俄国就他们在亚洲的利益达成了一致。然后当巴尔干冲突开始的时候，德国和英国重新陷入对立状态。中欧列强试图支持土耳其反抗英国和俄国，争取独立的斗争。

战争的威胁再一次降临，这一次是土耳其革命缓解了紧张局势。然而，此后不久，奥地利对巴尔干的领土要求又成了新的严重危机的导火索。塞尔维亚（Serbien）试图与俄国建立密切关系，诉诸斯拉夫人团结一致的情感。德国和奥地利陷于孤立境地。

德国国家这艘航船就这样在公海上颠簸起伏。人们靠一时的成功过日子，而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却缺乏将这艘航船驶出危险水域或找到强大支持者所需要的那种成竹在胸的远见。自1906年年底开始，德国的国内政治也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央党拒绝为平息西南非洲土著暴动拨款，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这就构成了解散帝国议会的契机。韦伯对这些事态发展的态度反映在他写给弗里德里希·瑙曼的一封非常激愤的信里：

亲爱的朋友：

我既没有合法权利，通常也没有一丁点儿想要干预您政治抉择的愿望——您也会对这样的做法反感。然而，请允许我表达我的一点点**看法**。您毕竟会听到很多别的意见，然后您自己可以做出决定。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我在您的编辑委员会里拥有“一个席位和表决权”，现在必须对编辑委员会拟定的“口号”（这个“口号”必须由助手发出）进行表决，这个“口号”在帝国议会**被极为轻率地解散之后** [拟定]——解散帝国议会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它想以“欢呼叫好”的方式欢庆“国内的胜利”来掩饰对外政策方面的奇耻大辱）而施行纯粹的“强权政治”的结果。<sup>①</sup>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对此发表看法，那么我就会说，绝不能使用这种极为轻率的构想——支持**德皇**反对“垂涎权力的中央党”。这样做必定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国外（意大利、美国……整个世界！）现在受到蔑视的程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是咎由自取！因为我们拥护**这样一个人统治下的这样一个政府**——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头等重要的权力因素。每一个阅读了几个月国外媒体报道的人都必定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陷于“孤立”，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在进行统治，**而我们却予以容忍，加以粉饰**。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维护任何意义上的民主和民族政治理想的政党可以为这个政权承担责任，这个政权的继续存在对我们整个国际地位的威胁要大于任何形式的殖民地问题。中央党之所以应当受到责备和驳斥，**不是因为它质疑“德皇的指挥权”**或者类似的问题，**更不是因为它寻求与其议会席位相应的权力**，寻求对殖民地管理问题的**控制**，寻求议会“平行政府”等等，而是因为它作为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大党，助长并支持了**伪立宪主义制度**。具体地说，例如，在这件事情上，中央党**没有把由议会控制殖民地管理作为接受殖民地预算的条件**，而是继续充当幕后跑腿的“**议会赞助人**”角色——一种陪衬，就是这样，十年以来，各大党，包括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都被纳入了伪立宪主义“人治”制度的轨道。因此，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反对中央党”，因为它是一个**伪立宪主义政党**，因为它一直追求现在仍然追求的不是代表人民与王权**抗衡**的真正权力，而是从王权手中得到一点个人的好处。我们**支持**议会**对行政管理进行强有力和公开地控制**，然后这种控制将会把“平行政府”的垃圾从隐秘的角落中扫出去。

但是，千万不要把任何“**信任票**”投给**德皇**和他从政的方式！而且不要不露声色地，而要**大张旗鼓地**拒绝投这样的信任票。支持民族自由主义者中的反对派力量

404

① 原文中这个从句不完整，译者根据句意加了“拟定”二字。——译者注



（“青年自由主义者”），支持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工会力量，同他们一起**反对**伪立宪主义的中央党，同时也要**反对**王朝在国内政治中的权力欲，反对王朝推行说大话以寻求威望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推行寻求实际利益的清醒政策！

如前所述，假如我有权利参与意见的话，我就会这样投票。我很理解为什么您希望保护皇帝的个人威望。然而在今天，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外交事务中，这都已经不是一项基于现实的政策了。因为他的威望已不复存在。坦率地说，我和其他很多人已不可能再让这种徒有其表的威望再延续几年了，尤其是，这样做毫无意义。如果您觉得这仍然可行，那就别理会我说的这番话。原谅我多有打扰。一如既往，致以衷心的友好问候。

您的马克斯·韦伯

1906年12月14日

以殖民地问题为中心进行的竞选对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打击。资产阶级欣喜若狂。然而，韦伯在给勃伦塔诺的信中对此做出了如下评论： 405

议会的竞选结果糟糕透顶！农业方面的**右翼**势力增强，反对派有可能与中央党联合构成多数以反对民族自由党和整个左翼！唯一的希望是瑙曼以及将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再做牛皮大王，转而从事实际政治。不过，他们会这样做吗？

1907年2月6日

现在，比洛（Bülow）将资产阶级左翼同右翼党派撮合成了一个民族阵线。左翼自由主义各派团结起来，旧的自由思想党（Freisinnige Partei）也第一次表示支持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政策。一个新的民族自由主义的“民族—社会”时代似乎开始了。然而，当瑙曼和当时他那个圈子的人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有力度的社会政策，尤其是选举法改革）时，这种撮合的牵强性立即就暴露出来了：右翼竭尽全力反对放弃传统的特权。即使在自由主义阵营里，资产阶级和旧自由思想党中对资本主义感兴趣的领导人也在阻碍实现民主的理想。自由思想党的大佬们让瑙曼的日子很难过。很清楚，他不适于同他周围这些人共事，不可能在与这些人打交道中推行自己的政策。对这个等待了多年，终于等到让自己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大门敞开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当1908年他那个圈子里的一些人，尤其是左翼领导人，又从自由思想人民党（Freisinnige Volkspartei）中分裂出去时，瑙曼陷入了严重的冲突中。他没有追随自己的朋友，因为他不想毁掉如此艰难地建立起来的左翼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韦伯写信给他说：

过去几天里您的日子一定很难过，我写这几句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表达我由衷的同情。客观地说，自您去年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之后，您就**不可能**推行任何别的政策了。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尽管他——像我一样——期望有别的可能性存在。完全撇开所有纯粹现时政治的考虑不说，您对并不太重要的同盟参加者如“自由思想人民党”保持忠诚和信赖，这也是正确的做法。**这样**的事情也存在于政治生活中，并且会产生影响，尽管像巴尔特（Barth）、格拉赫（Gerlach）那些逃走的人也许看不到这一点。毕竟议席——因为这件事情也许会让您失去您的议席——并不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您才有这样的意识去强行推进——即使将会以您的议席为代价——有**可能**促进自由进步（结社法）和民族进步（有利于德国提升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的证券交易法）的东西。

您所处的境况现在要灵活多了。当然，如果比洛**一如既往**，那么，把您自己同这个议会党团绑在一起，然后让一切事情都取决于这个党团，这几乎不可能是您的意图。或许可以用普鲁士的**选举制度改革**来反对帝国财政改革——这个口号是我得到的印象；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口号没有在法兰克福被提出来。难道您不想利用中央党提出的“宽容提案”来实现以下要求吗？（1）废除一切强制性的宗教课程；（2）废除**所有教会享有的特权**（令其只享受社团法定的待遇）！难道不应该至少将**第一项**纳入“基本法”吗？在这个领域里必须以民主方式击败中央党。

在波兰问题上我同您的意见有点**不同**。**强制使用一种语言**在我看来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或没有意义的。可是我觉得土地征用应当立即与这样一个口号联系起来：**在各地**都要用每年征用来大庄园安置农民！用舒尔策的旧口号来说就是“土地归于民”，不过最好不要用这样的表述。现行法律针对**波兰人**毫无意义，只有不加限制的征用权在那里才可能会有意义：手上有了这个武器，就可以给波兰人提供承认他们“文化自主权”的民族和解。请您原谅一个外行提供的这些“价值有限的东西”，我写下的这些话不是要在您面前好为人师，而是要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忠诚的马克斯·韦伯

1908年4月26日

1908年11月5日，普鲁士邦议会选举后，韦伯写道：

亲爱的朋友：

现在选举结束了，结盟各党派的集团政策的未来有些清晰了。虽然我们不管是否能赢得普鲁士选举制度的改革都必须继续保持我们真诚的努力，但显然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期待了。这无疑意味着集团政策对您来说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如果这

个选举制度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话，一切别的东西就都只是小打小闹，没有任何价值。现在怎么办呢？这个冬天您除了自己以前推行过的政策之外，不可能推行别的政策。必须反复强调的是，有关社团权利的联邦条例仅仅意味着，让普鲁士邦议会不可能做更坏的事情。

然而，现在这已经成为过去了。未来又如何呢？如果您将您的组织<sup>①</sup>与自由思想人民党合并的话，巴登州将会（按照我的判断，并且我不得不这样期待）走它自己的路。在这里，情形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大家确信，您不能够像影响自由思想联合会（Freisinnige Vereinigung）那样影响自由思想人民党。（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而后者则是一群庸俗的人和利益集团。）如有可能，保留离开联合会向左转的选择，也就是说，做好准备，以便能够做得有理有节；日后将有必要这样做。自由思想人民党正在不可遏制地滑向右翼。不过，四年后，在所有的州，包括巴登州和整个帝国，到处都会是**教士统治**。这一点现在就可以断定。这将标志着开拓“自由之路”这项艰苦工作的开始。您不能在政治上偃旗息鼓！请别回我的信，您现在没有时间。改日再谈。致以衷心的问候——对您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

1908年秋，正当巴尔干危机发酵，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德皇威廉又做出了一个政治上不明智的举动，令他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在一份英文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访谈。他善意的企图是要打消英国对他的不信任。他宣称，虽然德国公众舆论反英，但与此相反，他自己对英国的态度却是友好的，所以他拒绝了法国在布尔战争之初与德国建立反英同盟的提议。他说他甚至还向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转达了他自己拟订的对布尔人作战的计划，英军统帅使用的作战计划与他自己拟订的计划不谋而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408

这真像是魔鬼在插手此事！此时主管控制此类事件恶果的人都正好在度假。德皇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愤怒的狂潮席卷了国内外。在国际上，人们回想起了克吕格尔电报（Krügertelegramm），指责德国政治家的谎言、欺骗行为。英国把德皇这样透露秘密视为他欲从中渔利而有失体面的做法。德国国内则呼吁采取保护性措施以防止这种一人独大的政权的越轨行为。议会中发生了情绪空前激昂的辩论。议员们谈到了德国的政治悲剧，提议改变宪法，向议会制政体过渡：部长负责制和议会参与总理的任命。然而，帝国议会并不齐心，尤其是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反对这些做法。他们与其让自己的特权因人民的权利增大而受到限制，不如要一个上帝所赐予的做蠢事而不得不依赖其圣骑士的君主。当德皇向比洛私下保证要有更多的克制时，资产阶级阵营里

① 这里大概是指自由德国全国联合会（Nationalverein für das liberale Deutschland）。

进行彻底改革的动力也就减弱了。

韦伯感到愤怒，不仅因为这件事证实了他以前所有的担忧，而且因为他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软弱无力：“一个完全下不了决心把君主赶下台，或者至少对其加以严格限制的民族等于宣判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无能。”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只有扩大议会权限才能防止更大的灾难发生；但是他也预见到，普鲁士的保守派也会为了帝国而阻止一切这样的努力。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于1908年11月12日写信给瑙曼说：

409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让国人知道，保守党要对这种“人治”的延续负责。人们对德皇的“冲动”以及他个性的其他方面谈得太多了。问题是出在政治结构上。这方面我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好转。比洛什么也无法承诺，因为在关键问题上他的权力有限。把任何一个皇帝放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他都会去追求同样的虚荣。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三世（在关键问题上）也是这么做的，或者也会这么做，也许他们的做法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只是威廉一世惧怕俾斯麦，尤其是他对形势并不了解，或者说，直到他已经无法改变事件的结果的时候，他才了解到“既成事实”，如1879年与奥地利结盟一事。现在我们获得的唯一成果是，将来我们将不再能够了解那个人所惹出的一切事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一个半瓶子醋的外行在操纵政治。除腓特烈大帝之外的合法统治者无一例外都是半瓶子醋的外行，而这正中保守党下怀。不管是战争中的最高指挥权还是和平时期的政治领导均是被这种人掌握着。结果是，只要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世界政策”（Weltpolitik）就没有指望。

410

政治上的“浪漫派”，特别是对一切“保守”的东西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乌合之众，自然要将保守派的声明这种卑鄙的伎俩作为“男子汉行为”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加以赞扬！好像这一伙人还真得冒什么风险似的！面对这种宣传鼓动的成就——既朝上也向下的宣传——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浪漫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相当危险，我是刚刚才看出这一点来的。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像《前进报》（Vorwärts）在抵制啤酒运动期间所做的那样——这家报纸每天印着著名的“别喝联营经销的啤酒”（Ringbier）这样的口号——在每份独立的报纸每期头版上方印上这样的话：“保守派不想废除人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推行世界政策、海军政策以及任何瑞士和丹麦也无法推行的政策的原因。英国国王有雄心和权力，德国皇帝有的只是虚荣和满足于权力的假象。这是制度而不是个人造成的结果。（英国人曾这样表述过二者的对照：一个是靠影响力的王国，一个是靠天赋特权的王国。）从历史角度看，“影子皇帝”不是英国国王，而是德国皇帝。……霍亨索伦王朝只知道操练军士型的权力：发布命令、听从指挥、立正和吹牛皮。这就是

保守党所希冀的。至于希冀于此的原因，尽人皆知。

1908年11月12日

※ ※ ※

1908年年底，一场新的严重危机震撼了德国国内政治舞台。保守党和中央党就帝国财政改革和普鲁士选举法问题达成了共识，保守—自由派联盟瓦解了，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Hollweg）这个“披着哲学家外衣的总理”取代了比洛的位置。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民主改革夭折了。好斗的保守党领袖和农场主甚至斗胆向普选宣战，从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自由派左翼与进步人民党结成了同盟。瑙曼提出的口号是：“从巴瑟尔曼（Bassermann）到倍倍尔（Bebel）。”可是社会民主党拒绝参加。普鲁士的宪法依然如故：依然是一块农业—保守派的盾牌，保护他们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整个帝国的统治。德皇很快克服了对自己的言辞产生的后果感到的震撼。在一次公开致词中他引用了自己君权神授的说法。韦伯早就确信这位君主冥顽不化，只是期待通过扩大议会的权力及时对他的权限加以限制，以防止更多的灾难发生。在这一时刻，似乎连瑙曼也未充分领悟政治机构对于民族未来的意义，这促使韦伯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在您的两篇十分杰出的文章和其他一些精彩论断发表之后，我对于德皇只有很少的东西需要补充。也许现在我要说的始终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要旨：不能过高估计个人素质的重要性，责任在于制度（当然不仅仅限于在法律上正式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你们自己缺乏热情——二者都是俾斯麦主义和因此而变得更为严重的政治不成熟的产物。实际的结果也许是这样的：实力得到增强的将不是议会，而是联邦参议院。因此我只能一再重复：联邦参议院的议会化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也许只能有待于遥远的将来。 411

您的来信几乎让我完全失去了信心。您可以从现在——在 H v. H. d. L. [Ernst von Heydebrand und der Lasa] 先生在这件事情上公然“扮演”人民代表的反对派角色的时候——开始永远等下去。这些先生确实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说：“这事不应提交到人民代表那里去。”这难道还不够吗？难道您不相信自己能够向人们表明，让每个人相信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后果，对“世界政策”又意味着什么吗？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您已经丧失了勇气，认了命，听任自己受 D [Delbrück] 从政方式的影响。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让我们大家如此沮丧的地方。因为对于民族的政治教育最为有害的东西，莫过于系统而又如此廉价地诋毁人们对机构变革（我们需要这些变革就如同需要面包一样）的重要性所抱的一切希望——

而这样的行动由于一张永远是自信自足的笑脸而让人印象深刻。待德皇下次再创新“绩”的时候再见吧！

1908年11月18日

※ ※ ※

在这一段让人极度兴奋的时期，韦伯忍不住又去参加了一个政治集会。他妻子于1908年12月9日写道：

八天前一次重要的政治经历让我们与阿尔弗雷德团结在一起。耶利内克在这里就德皇与帝国做了一个颇有见地的演讲。联系到德皇最近一些引起轰动的言论，他建议促进议会制政府。马克思与我们一同出席演讲为耶利内克助兴，不过他向我们保证他会保持沉默。可是当戈特海因发表带着民族自由派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带着保守派色彩的讲话时，韦伯兄弟被激怒了。马克思压抑着激情和愤怒，做了两次发言。尽管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比他更加倾向于右翼，但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被韦伯的讲话吸引住了。讲演结束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现在被半个海德堡引为趣谈。一个小市民离开会议厅时问另一个人：“这个马克思·韦伯到底是谁呀？”回答是：“喔，那是玛丽安妮的男人。”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同时也荒诞和可悲吗？要是他感觉有必要更加经常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就好了。如果这能给他带来乐趣的话，他的健康状况现在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但是，相对于他的学术研究而言，他显然觉得这样做不值。

412

不，韦伯对于表现自我和个人成就完全无所谓，因此不会受到引诱而将自己尚不稳定的精力浪费在做精彩的即兴演讲上，这样的演讲并不能改变现实政治的进程。他的神经无疑不可能胜任议会和政党活动对身体持续不断的要求。所以，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他只能作为瑙曼的长期顾问，通过影响自己好友的政治判断来为危难中的国家服务。可是，他的影响一再被证明不起什么作用。德国是一个具有雄厚武装力量的、经济繁荣的强大帝国。其精神领袖阶层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他们的文化意义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境况不错。他们喜爱自己的安宁，只要他们感到自己的优越地位没有受到威胁，就会在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和对现任政府的批评之间寻求平衡。他们也看到了人们犯下的那些严重的错误，但他们只是感到一时不快而已，似乎觉得没有理由多虑。他们怀疑韦伯对政治方向不断提出严厉批评是不是他患病的结果。所以令韦伯感到恼火的是，即便是君主最危险的出轨行为和严重的危机也不能让这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受到强烈震撼而放弃自己旁观者的角色。他当时希望做的事情是将知名大学的教师们联合起来，

共同进行公开抗议。然而，这不啻为白日做梦。

李凯尔特寄给韦伯一篇弗赖堡大学一位宪法教授写的文章，该文反对议会制政府，堪称一篇说明韦伯的同行在政治上冥顽不化的范文。韦伯在给李凯尔特回信中写道：

非常感谢您寄来 Sch [Richard Schmidt] 用玩具小号吹奏出的政治音乐。那声音真是可怕，令人恶心！您大概听说了，我出于健康原因应当节食，所以您想以最友好的方式助我一臂之力！这就是德国人，他们把这称作“政治”：他们跟“自己”的皇帝闹别扭，然后后者忏悔一下（安排在普鲁士忏悔日和祈祷日前夜，以使一切 413 在和谐气氛中进行），人们便又带着骄傲的神情看着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可千万别搞什么议会制政府！至于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没有章法的胡言乱语，只要一方面的政策，另一方面看看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政策就足够了。那就是他们称之为“政治”思维的东西。

1908年11月21日

几年后，另外一个机会也表明了韦伯对同行的政治态度持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他因此而感到多么痛苦。在弗赖堡大学新校园建成典礼（1911年秋）的晚宴上，当时的副校长用激烈的言辞对和平主义的“傻瓜”和“和平的梦呓”做了价值判断。此举让一位因口才而已经有些名气的将军颇感激动，遂抛出了一些激烈的言论。比如，他说，和平主义的男子虽然穿着裤子，但裤子里面并没有内容，因此他们想要让人们都成为政治上的阉人。《法兰克福报》对这个偶然事件发表了颇为不敬的评论。由于评论也将矛头指向了副校长，于是不少弗赖堡大学最知名的教授发表了一个义愤填膺的联合声明，谴责该报损害民族信念和伦理信念，声称：“大学教师和教授有正当的权利和美好的义务，在同学生一起举行的节庆聚会上，以年轻人必定会期待于我们的令我们自豪的、绝对的坦诚来表明我们的爱国理想。”该报的一位编辑 H. S. [Heinrich Simon] 博士请韦伯私下做个鉴定，看看这种严厉的指责有没有道理。下面韦伯回信（此信也寄给了弗赖堡大学的教授们）的摘录具有政治和人性方面的意义：

在一个不冒任何真正风险的场合谈论“令我们自豪的坦诚”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而预言对一个在大学宴会上发表的讲话进行批评会使我们的“道德力量”瘫痪，给人一种“目光狭隘”的讨厌感觉。《法兰克福报》一直有富于幽默感的传统，我觉得它不会把那种场合下的言辞过于当真。

如果现在大批大学教师能够容忍这个声明作者的这种疏忽，以便在自己情感的 414 法庭面前显得自己是个好同事，那么从根本上说，原因或许在于我们富于戏剧性的

摩洛哥政策没有得到好好清算，因此在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阶层中激起了达到极点的愤怒。我自己也希望扩充军备——这一愿望比《法兰克福报》所强调的更为强烈，同时伴之以一种既清醒又果决的外交政策。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根据对局势的判断不能不预料到，那个头顶皇冠的半吊子——他不管是在外交方面还是在荣誉的浴血战场上都将把一切弄糟——会插手我们军队的指挥，那么，即便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军备力量，也不能有意识地去冒一场欧洲战争的风险。各种根植于一个早就在政治上变得有害无益的传统之上的情感因素，正在阻止我们将本身是正当的愤怒指向正确的目标。结果，这种愤怒就在完全不恰当的时机，朝着错误的方向——在这个事情上指向了《法兰克福报》——令人意想不到地爆发了。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声明也是下述现象的一种表现：这个民族外交的软弱无能和内政的软弱无能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解释。

之后，弗赖堡大学的几个同事试图让韦伯相信报纸对副校长的攻击不公正，并且为他们“声明”的动机进行辩解。对此，韦伯回答说：

附上的这封信也许足以表明我的下述看法：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我对与此有关的先生们的动机，以及对于《法兰克福报》那位确实不合格的记者的判断都很不公正。可是，人们终于习惯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政治失败的正当愤怒从弗赖堡开始被误导而偏离了唯一正确的目标。例如，在著名的1908年“11月的日子”，正当进一步修改帝国宪法的问题被提交讨论之时，弗赖堡人关心的却是在这些提案背后放冷箭黑枪，因为他们担心议会权力的某种增长，担心因此而造成的议会责任感的增长。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上一封信的结论不能被看成只是轻率的评论。

415

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将军，如果想要知道的话，都知道上面提到的情形确实是存在的。至于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通常对人们表达的这种担忧私下给予的秘密回答——“在紧急情况下别担心这样的干预，殿下闻不惯火药味，会把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在我军遭到失败的时候，我倒是乐于信其为真，但在胜利在望、需要耐心的时候，我是不信的。我们最严重的危险——尤其是在我们对国际事务所采取的立场方面——正是君主政体在政治上危险的过分越权，而不是少数几个和平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不管有什么危险，最终也许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义无反顾地把这一点说出来。可是届时到哪里去找那些在那份声明上签过名的大多数先生们呢？

不过，下面我还想就那件事情本身的客观情况说几句。显然，假如接下来没有那位之前曾多次在公共场合发表激烈言辞的将军讲话，单单是F. [Earnst Fabricius] 教授的发言本身很难在报刊上引起讨论。报纸的批评针对的是那位将军的讲



话，而F.教授自然也被牵扯进去了。在我看来，一个饶舌的将军与一位饶舌的君主一样，是令人讨厌的。可是眼下尤其让我受不了的是，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军事当局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做法——将那些毫无顾忌地表达了自己政治信念的后备役军官逐出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将军像他那样讲话，那就有点放肆了。在我收到的信中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客人（也就是那位将军）辩护。事实上，那篇声明虽然只提到了副校长，但确实同时也在为那位将军辩护。

现在请允许我向同行们提出下面的问题。假如我接受了弗赖堡大学的善意邀请，那么在那位将军讲话之后，我无论如何也会竭尽全力争得发言机会，只是想要说明一点：只要军事当局想要将麾下军官——他们像我一样，每年都要收到当局的战备动员令——在政治上打上阉人的标签，那么我就不会给任何将军以权利，使他们将这种表达用在别人身上。如果我这样做了，照你们的看法，后果将会怎样呢？或许我也能够享受客人的权利？现在你们也许会这么想，然而凭我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如此完全不讲礼节，狂妄地滋扰这样一个美好的节庆，并伤害神圣的民族感情，我将会激发一片愤怒的叫喊声。此外还会有好友私下里良言相劝，说我也许是对的，可为什么总是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生出事端来呢？对此我会回答说：因为那些与此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他们说话比我更有分量——不会，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除非事情关系到所谓的民族宣言，否则他们是不会行动起来的。这些宣言虽然对参与者而言无疑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却不能使持不同意见者信服，对后者来说，它们就像“启蒙运动”这个词所表达的那些陈旧的启蒙运动的理想一样，只是一些陈词滥调。

我还想让诸位进一步考虑，把对某种政治理想（不管这种理想多么崇高）的批评说成是损害道德力量，无论如何都必定会激起正当的抗议。从“道德”上讲，和平主义者无疑“超越”了我们。我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也许在很多方面这篇演说都还不太成熟），就已经以毫无保留的方式支持了民族理想在所有实际政策领域（包括社会政策）的独立，而当时我同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还陷在所谓的社会王国的骗局中。可是，我即便在那时也特别有意识地强调，政治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职业。

我仍然认为我的同行们发表像现在这样行文的这个声明不是一件好事。众所周知，在学生的酒宴上，佩戴色标的学生组织和学生联谊会的学生们总是占据着支配地位，即使他们在人数上居于少数时也是如此。那种让人联想到《花园凉亭》（*Gartenlaube*）杂志的爱国主义政治，如今充斥着所有这类学生组织的正式刊物，完全是一种内容贫乏、空洞无物和纯粹动物学的民族主义。面对所有重大的文化问题，这种爱国主义政治照我看来必定会导向缺乏原则性，它与我们在同事M先生

那里认识到并赞赏的对民族理想的意义的理解有天壤之别。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理想，在这方面的精神视野相当狭隘，这就导致了这个圈子里的人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对像那位将军在宴会上所说的那类言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的做法，以廉价的方式来消除自己对民族文化感到的内疚。在我看来，这样的演讲以及那个将其目的仅仅局限于保护那一个人的集体声明（众所周知，集体声明在教授中极为罕见），都扩大了我们大部分学生中所谓的民族情感的空洞与我们民族文化的需求之丰富之间的鸿沟。毫无疑问，这完全有悖于声明的作者和签名者的意图。

1911年11月15日

在给 S. [Simmon] 博士的第二封信中，下面的几句话很有意义：

我不想让人对我个人的观点有任何疑问：对于那些和平主义至上的人，我个人的看法与 F. 教授的观点别无二致，甚至比他更为严厉——除非他们不仅仅将列夫·托尔斯泰得出的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甜点来享受，而是在各个方面，至少在国内政策方面将其付诸实施。谁要是在外交政策上把战争视为万恶之首，那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不会为革命而感到欢欣鼓舞，在他的个人生活中被别人打了一巴掌后必定会下决心将另一边脸凑上去。只有这一点可能会给人深刻印象，其他一切在我看来也不过是自相矛盾，是一场令人伤感的骗局……

# 3

418 让我们再回到 1909 年。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个人事务上，韦伯都重新变得生气勃勃，他的生活现在越来越丰富多彩。由奥拓·克勒布斯（Otto Klebs）和阿尔弗雷德·韦伯新近建立的一个叫“两面神”（Janus）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聚会小团体，将年轻学者和他们的夫人汇集在一起，举行既有思想也有雅兴的聚会。先是听取来自极不相同的学科领域的学术发言，之后是热烈的讨论。结果并不那么重要，谁对谁错也不是关注的重点，大家通过交流和相互激励而使各自的思想更精彩，妻子们的在场为这种聚会增添了一种特别的人情味。

马克斯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最近他连续两个晚上外出，星期六在昂肯（Oncken）家参加“两面神”聚会。昂肯在美国待过很长时间，做了一个关于卡尔·舒尔

茨 (Karl Schurz) 的漂亮生动的演讲, 之后我们这位去过美国的人当然又讲了有半个钟头。星期一是马克斯那个学术性特别强的“飨宴”团体在戈特海因家聚会。戈特海因联系到西默尔谈了历史心理学的可能性问题。对此马克斯又有很多话要说, 他直到十二点半才回家。

可是, 这种紧张的活动安排等于是向病魔挑战。大约在年初, 完成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工作之后, 不可预料的神经性躁动再次出乎意料地将韦伯置于缱绻之中; 身体状况好的时间持续得越长, 他就越是难以忍受这种羁绊。火山在摇撼着地面, 一连几个月他的整个精神生活都处于危机之中。这次即便是春天在南方的逗留都无法驱逐病魔。

同时他手头有很多工作, 现在都陷入了停顿。直到夏天, 他仍然必须将思维的机器停下来, 让黑森林高山地带乡村的绵绵细雨来抑制他的神经激惹。

这里雨下个不停, 天气冷得够呛。尽管开着中央供暖, 但我仍然觉得不可能获得今年我身体必需的那么多热量。一小时舒适的雨中林间散步很宜人, 但付出的代价是我夜间四分之三的睡眠。这个森林的美只是美在冷杉高地撩起了它们的裙衫, 其黑色尊严得到了树底下蕨类植物和欧洲越橘亮丽生命回应的地方。冷杉通常只是树中的老处女, 其裙衫或垂着, 或微微翘起, 一株株踮着脚尖站立在山腰上。新绽出的绿色嫩芽看起来像钢琴上一个个纤细的手指, 为春天敲打出了一些音响。419  
冬天, 当它们披上面纱的时候, 那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是现在淫雨绵绵, 没有松香的气味, 没有多少景致。如果我感到房间里太冷, 就常常坐在车夫的房间里。各种各样的人在他房间里出入。昨天那里有一个友好的熟练磨坊工, 失业了, 我同他很谈得来。或者我去上了年纪的店老板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那里, 她们正在缝嫁妆。这一家子总共有 16 个孩子!

1909 年 6 月 25 日于鲁斯坦

※ ※ ※

到了盛夏, 韦伯再次克服了令人担忧的神经性疾病的危机, 创造力的提高弥补了前一段时间学术上的荒芜。这年秋天他又开始忙碌起来。社会政策协会在维也纳召开大会, 旨在展示学会与多瑙河畔的君主国结成的文化共同体以及与奥地利学者的同心协力。在这个十分好客的城市里, 这次相聚尤其具有节日气氛。韦伯夫妇参加了大会。420  
一批重要学者每天都要相聚, 包括克纳普、勃伦塔诺、冯·舒尔策-格费尔尼茨、佐姆巴特、阿尔弗雷德·韦伯、奥伊伦堡 (Eulenburg)、冯·戈特等等。璠曼也在其中。学者

们相互启发。韦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他就像一股被拦阻的思想激流，不会停止挟带着一切向前奔流。我们总是跟知识渊博的学者们在一起。男人们一天从早到晚一直在讨论。大会期间，总可以看到马克斯坐在某个角落里与某个人在交谈，内容是准备一个新的重大集体研究项目。然后他在讨论中大约要讲一个小时。我坐在克纳普身边，这个人内心永远是那么年轻。他很受感动，悄声对我说：“他看起来真不错！他的情绪如此高涨，我们感到很高兴。不过，他这是在耗损自己的精力！”很遗憾，我错过了阿尔弗雷德的讲演。老一代人对此感到错愕，而年轻人则感到兴奋。他们喜欢他的热烈和激情，在这一点上兄弟俩十分接近。我们与瑙曼一起在布尔格剧院（Burgtheater）观看了《浮士德》的演出，参加了宴会，席间佐姆巴特在优美的祝酒词中盛赞了维也纳，然后我们在卢多·马里茨·哈特曼（Ludo Maritz Hartmann）家里一直待到深夜才归。

为现代社会问题找寻理论和实际解决办法的斗争也具有高度紧张的戏剧性。在这一次大会上已经有三代学者同堂。其中讲坛社会主义的宿老如瓦格纳、施莫勒、克纳普和勃伦塔诺仍然健在。然后是他们以前的学生如赫克内尔（Herkner）、拉特根、菲利波维奇（Philippovich）、佐姆巴特、舒尔策-格费尔尼茨、奥伊伦堡、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第三代学者已经出现了。年轻一代看很多东西自然与老一辈的眼光不同，他们尤其反对古斯塔夫·冯·施莫勒的政治一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努力促进更为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和民主进程。有时候气氛相当紧张。但是，他们都在共同寻求个别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都有让理想旨趣超越物质利益的意志，这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在社会政策方面，这次争论的问题集中在到底哪一条通向社会平等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统治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增强国家的权力，扩展国家和社区的经济活动，还是使一切机构，不管是企业还是议会，都实现民主化。热烈激昂的老一辈斗士阿道夫·瓦格纳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向，而其他人士，尤其是韦伯兄弟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看到的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个人受国家“机器”的奴役。对他们来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标准是这样一个问题：改革提倡的是什么样的人格类型——是自由和对自己负责的人，还是在政治和心灵上缺乏独立的人，这种人为了外在的安全会屈从于权威和上司。阿尔弗雷德·韦伯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见解，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官僚机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官员和公务员，这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卑微的职位而不得不放弃独立的政治判断。从技术上说，官僚机构对完成某些任务而言是必要的，然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其加以美化会造就奴性心灵。

马克斯·韦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并从政治上补充了一点，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德意

志国家这艘航船灾难性的摇摆不定深感忧虑。下面是韦伯即席发言的一些摘录，从中可以看出他即兴演说的某些特点： 421

世界上没有任何机器能够像人这部机器（官僚机构）运转得如此精确。从技术和客观的角度看，它无与伦比。然而，除了技术标准之外还有别的标准存在。它在管理和政治领域造成了什么后果？每一个去适应这部机器的人，都会成为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就像在大工业企业里一样。他会越来越调整自己的感觉，让自己习惯于做这样一个齿轮，并自问：自己这个小齿轮有没有可能变成大一点的齿轮。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天除了教授外没别人（假如这样的情形发生，人们必定得逃到沙漠里去），这种想法令人恐惧；然而，假如世界上只有这些小小的齿轮存在，也就是说，全是些紧抱着自己那个卑微的职位不放，并且努力争取往高一点的职位上爬的人，这种情境会更加恐怖。

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人们对官僚化的激情足以让人感到绝望！这就好比在政治领域，一个打杂的女佣人——反正德国人最善于同她这种智力水准的人相处——被允许完全独自掌控一切；好比我们有意识地执意要成为不仅需要秩序而且只需要秩序的人。如果这种秩序有一刻的不稳定，这些人就会紧张，就会害怕；如果他们被迫脱离对这种秩序的绝对适应，就会感到一筹莫展。

问题是，我们有什么东西能与这样一部机器抗衡，以使我们残存的一点人性能够幸免于这种对心灵的分割，幸免于官僚制生活理想的垄断。……如果国家本身变得越来越像企业主，比如说，它通过接管矿山，加入煤矿辛迪加而进入煤矿开采业，那么，在同布隆希尔德（Brunhild）的关系中，国家通过如此拥抱重工业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西格弗里德（Siegfried），而是国王贡特（Gunther）。国家就会总是从企业主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相反，成为一个关心社会福利的企业……

我所反对的只是不加批判地美化官僚制度。这种做法最根本的动因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感：相信德国官员们很高的道德标准无所不能。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地位和文化发展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类问题，在这些方面，这部机器的“道德”质量今天所起的作用肯定越来越小。无疑，就伦理促进这部机器运转的精确度而言，它对机器的机械作用是有价值的。……可是那些“腐败”的法国官员，那些腐败的美国官员，那些遭到不少唾骂的萎靡不振的英国政府——这些具有如此官员和如此政府的国家表现如何呢？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表现又怎样？到底是**我们**，还是别人在外交领域做出了成绩？ 422

尽管那些实行民主治理的国家有一些无疑是腐败透顶的官员，可是那些比我们有良好道德的官僚机构在国际上取得了大得多的成就。如果问题最终涉及一个民族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最终的价值——那么我要问：是

哪一种组织形式当今最为“有效”？是私人资本的扩张加上比较容易腐败的纯事务性官员呢，还是通过有良好道德素养、以专制主义的方式加以美化的德国官员来实施国家控制呢？尽管我对德国官僚机构道德上正确的机制怀有深深的敬意，可是我暂时还不能承认，它今天仍然表现出有能力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做出像外国官僚做出的那么大的贡献，这些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外国官僚在道德上远不如他们，而且还追求为我们很多人所极为诟病的私人资本的营利。

423

社会政策方面的主题引发了很多判断和对最终的实际要求进行的反思，除此之外，这个圈子也第一次讨论了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关于国民经济生产力本质的问题。菲利波维奇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促使佐姆巴特和韦伯要求在专业学术方面的发现与对认识到的那些关系做道德—政治方面的判断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分。佐姆巴特试图表明，主要发言人构建的国民经济生产力的概念充斥着主观价值判断。他创造了下面这个精彩的句子：“在我们能够科学地证明到底是金发女郎还是褐发女郎更漂亮之前，我们不能对此进行讨论。”

马克思·韦伯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的议论，压抑着的激情使他的发言带有几分庄严：

我之所以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将应然与实然掺杂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低估了应然问题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我不能容忍将重要性足以震撼世界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能够打动心灵的最高问题——在这里被转换成一个生产的技术—经济问题，使之变成了专业学术讨论的对象。我们不知道有任何理想是能够以**科学方式**加以证明的。的确，在一个主观主义文化盛行的时代，从自己的心中获得这种理想如今是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向人们许诺这么一个乐园和通往这个乐园的康庄大道——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来世，也不管是在思想中还是在行动中。**我们的心灵不会像那些梦想着这种乐园的人的心灵那么平静**，这就是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

这次大会以后，关于价值判断的讨论在这个圈子里并没有停止，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委员会专门为此召开的会议上，它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澄清。为此，韦伯为协会递交了一份打印出来的意见，这篇文章后来在形式上稍作修改后发表于《逻各斯》杂志。<sup>①</sup>

---

<sup>①</sup> 参见《社会学和经济学价值中立的意义》（“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olog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收在《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一书中。



同年（1909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出版商保罗·西贝克开始吸引韦伯对一部大型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的兴趣。这部百科全书打算用来代替舍恩贝格的《手册》（Das Schönbergsche, *Handbuch*）：他们一直未找到愿意承担这本手册的修订工作的知名学者。韦伯同意做这件事，拟定了提纲，找了撰稿人，承担了非常辛苦的组织工作。他要将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这部书将以所有撰稿人集体编撰的形式出版。韦伯又爆发了巨大的热情，因为这部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他自己撰写——计划尽可能在两年之内完成。

424

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这个集体项目也表明，让脑力劳动者——学者——服从富有成效的合作所必须满足的要求是多么困难。说定了的承诺未得到遵守，重要撰稿人不得因病而退出，一些人拖延交稿时间长达几年，这使那些按时交稿的人眼看着自己的手稿沉积过时而很不愉快。有几个韦伯尤其重视的知名学者最后交来的稿件内容出乎意料地贫乏，而编辑又无法拒绝；原定的计划不得不推迟。简言之，韦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忍受了无数的烦恼，为了弥补这部书的贬值，他对自己撰写的那部分设立了越来越宽泛的目标。在给合作者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由于人们不是把时间花在自己承诺过但尚未交付的稿件上，而是毫不犹豫地去**做其他事情**，去写大部头著述，因而造成了很严重的和（我不应讳言）非常有**道理**的不满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觉得，这绝对不符合信守合同的义务。……稿件交得参差不齐，尤其是好几篇特别重要的稿件几乎完全没有着落，这些还造成了其他令人非常不快的后果。因为有几篇文章完全无法找到别的人来写，所以我觉得，为了填补相关的空缺，也为了增加它的特色，我应当在“经济与社会”部分承担重要得多的工作，提供相当广泛的社会学的讨论，这是一项我通常是绝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接受的项目。我这样做同时也牺牲了对我来说远为重要的其他研究工作。

在完成其他工作的同时，韦伯现在将自己的知识涌进这个容器里。他终于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大项目上。

1914年，这部书的前两部分面世，晚于原计划三年。韦伯在发表时附上的序言中阐述了该书的编纂目的、系统结构方面的特征，以及它的主导思想：

425

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将经济发展作为生活**普遍理性化**的一种特殊现象来加以研究。无论是在学术方法还是在政治观点上，撰稿人都属于极不相同的阵

管，因此我们放弃了在方法论和实际立场方面寻求统一。对问题从各个方面加以考察弥补了这一不足。……作为这一版的编辑，马克斯·韦伯教授对此书的构想布局以及材料安排方面的不足承担全部责任。

世界大战再次让这部书的出版搁浅，接下来的一卷一直拖到1918年才得以面世。韦伯自己为这本书撰写的那一部分——《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扩充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该卷篇幅超过800页，直到他去世后才以大开本小号字体出版。他生前只看到概念体系部分出版，未能对其余部分做最后润色，所以这部分只是未完成的书稿。我们后面还要谈及这一点。

## 4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些韦伯的生活经历。在1909年与1910年相交的那个冬天，韦伯尤其活跃——这次居然是在冬天。例如，他参加了社会政策协会在柏林召开的理事会议，在那里同无数的人进行了交谈，与西默尔、佐姆巴特和其他人一起讨论了成立社会学学会的问题，这个学会可以在纯学术探讨方面弥补老社会政策协会之不足。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年轻一代学者早就感到有必要就现代社会问题不仅同政治经济学专家，而且同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人种学理论家等等进行思想交流。他们还进一步希望建立一个旨在不强调伦理—政治，以纯科学的方式去解决大量问题的团体。

426

韦伯也为此承担了一些组织方面的准备工作。他草拟并寄出了宣传材料，建立了大量的通信联系，筹集了经费，并为将要进行的第一批集体研究项目拟订计划。因为对他来说，比一个口头交流的新聚会场所更为重要的是，为那些由于其规模的原因，只能通过综合性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重要成果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基地。因此，他向筹备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工作大纲，建议将对社团的调查、对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调查作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韦伯立即着手去落实单个的学者，让他们领导对他们特别合适的项目部分。可这里也同样表明，筹划学术上的共同行动比筹划任何其他事情都难。你不能命令和强迫别人做事情，只能提出建议和请求，你无法让很多学者放下他们个人的学术兴趣来从事集体研究项目。

韦伯多次前往柏林和莱比锡（Leipzig），试图以自己的热情感染那里的同行，但并不成功。他们本职工作的负担甚重，谁都没有精力再去承担新的项目。韦伯很生气：“今天我终于找了至少几个社会学学会不可或缺的人物一聚。可是我们没有取得进展，



令人绝望。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工作和兴趣。至于行动，他们什么也不做！”接下来还有礼仪问题。韦伯自己感兴趣的是这项工作，而不是领导。结果是，有几位学者认为自己是现代社会学鼻祖，尤其是觉得国家授予他们的大学职务与自己的学术地位不相称，因而更加希望自己的地位得到彰显。韦伯让主席一职由三人担任。然而结果是，谁也不主动管事，事情继续压在韦伯的肩上。

1909年，韦伯手中同时牵着三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集体研究项目的线头：心理物理学研究项目、新闻业调查的准备工作和《概论》。他的能量在往四面八方散发，危险在于，他的精力会像水雾一样消散。因此，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妻子希望他把精力放回自己的著作上，创造出持久的东西。“实际上，我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亵渎神明的愿望：让社会学学会见鬼去吧！为了这个学会，你在一些琐事上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为除了漂亮的会议以外，这个学会仍然将只是一部空转的机器。”对此韦伯回信说：

427

那好吧，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会如愿以偿，尽管我并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重要成果。反正我现在也必须为《概论》撰写各种各样的论文，必须探讨一些可能引出新课题的问题。只是一切的进展都会相当缓慢，因为事物的孕育过程本来确实得更长一些。我还远远没有完全吸收所有的新东西，还没有使这些东西变成我自己的财富。

※ ※ ※

1910年秋天，社会学学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这里相聚的有戈特海因、西默尔、佐姆巴特、特尼厄斯、特勒尔奇、冯·舒尔策-格费尔尼茨、康托罗维奇（Kantorowicz）、米歇尔斯等人——一批很杰出的人物。当时社会学还不是一个专门学科，而是专注于知识的整体，所以与所有的学科都有联系。大会的主要议题体现了这一特征：“交际社会学”、“技术与文化”、“经济与法律”、“法学与社会学”、“种族与社会”等等。

马克斯·韦伯在每一项议题的讨论中都发了言，他以“工作报告”这样一种谦虚的形式阐明了他希望加以定义的学会的任务，尤其是以纯科学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对待所有的社会问题：“应当问的问题是，什么为是，为什么一件事情恰恰会是这样，而不是要对此做出判断，看它是否是我们所希冀的东西。”

然后，他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涉及新闻和社团的那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可供探讨的问题，而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涉及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那些现象如何影响

了现代人的特征？例如，在新闻方面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了人们对超个人的文化价值的态度，它在大众的信仰和希望，在他们的生活观和可能的态度方面毁灭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同样，对于社团社会学（它的范围恐怕必须包括从保龄球俱乐部一直到政党和宗教派别）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或许就是不同的社团活动内容对人的整个面貌有什么影响。韦伯以德国男声合唱团的政治影响为例来说明他的意思：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习惯于将胸中强烈的感受通过歌喉加以宣泄，而与他的行动不发生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对这种表达出来的强烈情感并没有以相应的强有力的行动来做出适当反应——这就是合唱团艺术的本质，那么，简而言之，这个人就会很容易成为一个消极意义上的“好公民”。难怪君主们都如此喜爱这样的活动。“哪里有歌声，你就可以在哪里安下心来。”这里没有伟大而强烈的激情和强有力的行动……

对于一个有求知欲的外行来说，这类聚会所带来的一般性的启发和精神上的刺激比其结果更为重要，因而参加聚会的日子又是一个节庆日。这些学界人物本身至少也同他们提供的知识一样有吸引力。不拘形式的自由发言最能生动地体现他们自己，其间他们的手势和声调的抑扬顿挫比词句更能表现出他们的个性。虽然这个圈子的人并不能幸免于学者特有的职业缺陷，但他们的尊严（这种尊严产生于他们通过长期艰苦的思维活动而获得的智慧）弥补了这项不足。他们进行学术交流的气氛让人着迷，所幸的是，至少还都能听得懂。可是韦伯的标准却不一样，他在这之前生过太多的气。

事后我要请您原谅，我在我们的交谈结束时没跟上趟。我对于这种“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感到实在太厌恶了：在这里谁也不承认别人，谁也不给予别人什么东西，谁也不愿意哪怕在极短的时间里牺牲一丁点个人的学术利益——而这些人认为自己比那些可恶的“正教授”要高尚得多。……如果您不能容忍我的坦率，请告知。如果您有什么地方对我的行为不满意（我肯定会常常给您这样的机会），我请您告诉我。这只会增进我对您的友谊……当我只是想像一个普普通通的马车夫一样尽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些“了不起的先生们”的这种过分敏感败坏了我干工作的兴致。

结果表明，这些“了不起的先生们”中没有人愿意主动促进集体研究计划，因此新闻调查的组织工作仍然靠韦伯一人扛着。几个月里他费了好大的劲将这个项目开展起来，可基本上不得不依靠学术领域的新手。有几项颇有价值的调查最终还是完成了，但

是鉴于获取材料的困难程度，它们只能涵盖部分领域。社团社会学研究的情形也是如此。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之后，韦伯意识到，他在这上面极不相称地耗费了自己的精力：“自1911年1月始，我将退出执行委员会，以便让一个法学家或类似的人加入进来。我现在必须回到学术工作中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因为我是剩下的唯一一个牺牲自己个人学术利益的人，而结果则是除了继续让一部空转的机器勉强维持运行之外，一事无成。”

在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之后，韦伯从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彻底退出，为这个组织他曾付出过那么多精力，对此他做了如下解释：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参加了这个学会的创建工作，目的只是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从事价值中立的学术工作和学术讨论的地方。因此我不能与这样一个理事会共事，它的主席之一G [Rudolf Goldscheid]先生认为自己在法兰克福的会员大会上公开抨击相关的宪章基本原则的行为无可指责，而且在我后来跟他的通信中对此加以规劝之后，仍然**拒绝**承认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在1912年柏林会员大会上，除了唯一的例外（L. M. 哈特曼），其余所有的正式发言人都违背了同样的学会宪章基本原则——这一直让我觉得是这一原则行不通的“证据”。我在柏林就明确表示过，如果理事会**不能**保证违反宪章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会怎么做。在所有将这位G先生选为主席的理事会成员中，**没有**谁会怀疑，我会说到做到，由此为我自己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假如G先生的虚荣心仅仅在于对外代表学会，那么这么一个人事问题对我来说完全无足轻重。然而不幸的是，他有自己所谓的**世界观**，并且标榜在从事一门相关的学问，其方式排除了我同他合作的任何可能性。自然，我并不指望任何人照我这样做。

但愿这些先生们好好待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吧，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抑制自己——因为事情正是这样！——而不用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的主观“评价”来打扰我。让我不断地以堂吉珂德的角色登场，去追求据说是不能施行的原则，去演出那些令人尴尬的“场景”，对此我绝对受够了。

※ ※ ※

1909年，海德堡科学院成立了。一个曼海姆的大工业家通过这笔捐赠为自己树立了纪念碑。马克斯·韦伯被授予特殊会员的荣誉。这不但未能让他高兴，反而令他生气。其理由颇具特色：

一个科学院应当在平等基础上包括**所有**相关学科院系和研究所的负责人士，而不应当是一个由要人组成的康采恩。如果各种各样的**外地**历史学家和像我一样的**局外人**加入到里面，而将自己的历史学家和那些年轻的政治经济学家拒之门外，这是不行的。即使在这种本身并不重要的事情上，同事之间的礼貌也应当遵守，即便是为了学生的缘故。

韦伯对这种武断的遴选原则不满意，因为它伤害了一些杰出的年轻学者的自尊心。此外，他觉得科学院按照传统模式组建不合时宜。因此，他谢绝了所授的院士，并在给历史—哲学部主席 W. 温德尔班德的一份很详尽的建设性批评中说明了理由。下面是这份长长的备忘录式的通信的摘录：

431

这个科学院是照传统模式组建的，这种模式难以促进现代系统的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院士遴选不是出于专业的考虑，而是论资排辈；科学院只设置了两个部，一个是自然科学部，另一个是历史—哲学部。

然而，科学院的组织结构表明，系统的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学科在这里并没有一席之地，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正如我后面将要说明的），即使科学院有意为之。

韦伯认为，正是系统的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这种基金会的支持，因为不管是使用埋在统计部门的研究材料，还是通过集体努力调查新的事实和收集新的资料都耗费巨大，单个学者不可能自己掏腰包承担这样的开销。如果一个现代科学院支持那些为揭示当代生活而迫切需要的调查，而不是把钱花在由单个学者独立完成起来要容易得多的历史和哲学的专门研究之上，那它的作用会大得多。

这个科学院的存在完全应当归功于现今存在的力量，而调查现在的生存条件属于系统的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尽管如此，这些学科还是受到这个科学院的如此待遇——这种过分蔓生的历史主义的结果在我看来如此荒谬，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公开表明这一点，尽管我这种抗议行动……注定完全不会起什么作用。

1909年8月7日

由于温德尔班德向韦伯暗示，拒绝授予他的荣誉会被认为是一种蔑视行为，由此而可能对科学院造成伤害，韦伯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但仍然坚持他的批评。他的批评毕竟是有成效的，这之后，科学院很快就拨款支持了在韦伯领导下开始的对新闻业的研究调

查项目。

※ ※ ※

1911年秋天，高校教师大会在德累斯顿（Dresden）召开。在一次关于美国大学的讨论中，韦伯再次做了一个很长的讨论发言，其中有些论点引起了轰动并引发了公开争论，促使他加入了内容广泛的论辩。分歧主要集中在他对商学院的评论上。在几个当时最现代的商学院中，流行着对那些有自己服饰穿戴的学生社团生活的逼真模仿。韦伯从中看到一种危险，那就是这些商学院的青年学生从严谨的学业上分心，被误导去追求“享有决斗权”（Satisfaktionfähigkeit）和社会特权：“全是这么一些东西，它们让我不得不自问，如果将这些东西教给我们的年轻一代，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与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竞争。”报纸刊载韦伯评论的方式激起了相关学校的强烈抗议，所以韦伯只好花力气以一个详尽备忘录的形式向他们表明自己的看法。下面是若干摘录。

432

学生社团培养的这些形式在“享有决斗权”的理想中达到了顶点，在韦伯看来，这些形式对年轻商人来说尤其显得荒唐而又趣味低俗，对开拓性的商业工作有害无益。因为由此而产生的浮夸和自负会在他们与同级、下级和其他圈子的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而这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在韦伯看来，也应当成为世界的笑柄：

我不惮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说出来（……谁要有兴致就此开玩笑，悉听尊便），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知道要改掉身上那些自己尚未成熟时在大学里不自觉地养成的手势有多么困难。就学生社团成员的饮酒习惯对其工作精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此我自己也经历过，而且有相当严肃的经历——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令人担忧的不是我们的人民在偶尔的豪饮中的快乐，而是把定期按规定饮酒的义务作为那些学生社团**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

韦伯还指出了把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商人作为一个新类型来兜售所包含的其他一些危险。他说自己虽然确信任何精神方面的训练，尤其是在商学院里进行的精神训练是有益的，但怀疑商学院的学生和其他类似的职业学校的学生一样，常常更期望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所谓的**向上流动**，而不是增长知识。文凭贵族的兴起在商业雇员中造成的新的等级差别可能妨碍人们的工作乐趣，扰乱办公室内的安宁，尤其是如果那种学生团体制度制造出一个要求获得并非基于商场业绩的特殊声望的阶层来的话。

433

因为今天的学生社团生活到处都在追求一种前所未闻的训练和排他性，所以就

有这样一种危险：某一个学生社团的成员没有可能再成为另一个学生社团的成员，甚至越来越切断了与其他学生的交往，这样一来，就把这个学生社团的成员囚禁在其同伴圈子里，并因此使其精神视野变得狭隘。



在同一个大会上，韦伯对国家官僚机构与德国大学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批评激起了更为激烈的冲突，他的批评针对的主要是普鲁士当局从刚刚去世的伟大组织者阿尔特霍夫那里继承下来的某些惯例。韦伯以自己做年轻讲师的亲身经历为例描述了“阿尔特霍夫体系”造成的危害和危险<sup>①</sup>；他充分肯定了死者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从道德上讲不赞成他的目的—手段体系。

谈论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就这个词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且是一个视野非常广阔的人。他对德国大学所做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朽的。可是他在处理人事关系上的出发点是，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不是一个无赖就是一个追名逐利者。这给那些得依仗他的年轻讲师带来很大的危险。为了使他们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他期待他们做一些不正派的事情。

434 韦伯这里指的是，譬如说，一个讲师未经系里同意或不顾系里反对而从当局那里接受一个教职或类似的东西。“如果部里一位高官期望一位年轻人做那样的事情，我不能向这个落入圈套的人扔石头。”韦伯自己曾经不得不抵制这样的诱惑，之后其他人都屈从了。为了学界新生力量的利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仍然有如骨鲠在喉。“我很坦率地承认，当我那个时候离开普鲁士教育部门管辖的区域来到巴登州教育部辖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片空气更干净的地方。”

韦伯的这些言论——它们部分被媒体耸人听闻地炒作，部分被误解——激起了轩然大波。一个记者甚至将上面引述的一段话的意思弄颠倒了，以致巴登州当局（而不是普鲁士当局）陷入了尴尬境地，受到了一份中央党主要报刊的猛烈抨击。因此，巴登州当局请求韦伯公开澄清。他还不得不对他讲话的很多其他方面也做了修改和补充。这样的经历让他再次体会到，部分新闻界的一贯伎俩就是，“时不时会毫无顾忌地迎合轰动性新闻的需求，在缺乏这种新闻时会不择手段去欺骗读者”。

普鲁士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也发表谈话，说没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韦伯所言属实。这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211页（德文原著页码，即本译著边码。——译者注）。

是想用注重事实的方法对韦伯进行反驳，而韦伯也以同样实事求是和冷静的口吻，用小心谨慎的措辞作答，就像他自己说的，希望以此来动摇那位官员的说法——“不在档案里就等于不存在（Quod non in actis non in mundi）。”普鲁士教育部再次作答。韦伯回答说：“尽管很不情愿，我还是不得不借此机会再次明确地公开说明，我对现今的教育部的责备是什么，而且这次要让法庭有实据可查。”（1911年11月10日）

# 5

让我们再回到1910年，首先看几个能够体现韦伯作为斗士的公开论辩。这里有必要谈及细节，因为不管是就事情本身而言还是从传记的角度看，这些细节都具有重要意义。 435

1910年秋，德国妇女协会联合会（Der 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在海德堡召开大会。这次对妇女运动节日般的检阅美好而鼓舞人心，妇女们怀着热忱和信仰相互激励。其反响出乎意料地大。大学和当地政府表达了祝贺，这个城市甚至把城堡装点得灯火辉煌以向大会致意，权威机构现在看来是承认了妇女斗争的理想主义和必要性。令人感到最愉快的是，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终于不再被视为漫画人物，视为她们自己那个性别的异类，而是被看作一种新型妇女，认为她们有理由努力去试图让数以百万计被迫独立和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能够胜任自己新的使命，给这些妇女解释这个新使命的意义，从而将坏事变为好事。终于有了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让她们非常兴奋。但是妇女们知道得很清楚，她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承认任何时候都会受到质疑。这种情形确实很快就发生了。

只要“真正的德国男人”是一个囿于传统的男性自我中心者，他就会感到妇女运动的成功对自己是一个威胁，他就不愿放弃被要求放弃的在家庭和国家里享有的神圣家长权威。就像在所有这类利益冲突中一样，赤裸裸的单纯防卫机制在这里也被包裹在一种冠冕堂皇的关切之中。

一个年轻讲师通过扮演卫道士和公众教师的角色来掩盖自己学术上的微不足道，发表了一篇反对这个妇女圈子的谩骂文章，赢得了很大一部分男人的赞同：“终于有一位勇士站了出来，甚至敢于向大学里的女士们宣战。”在一本小册子里，他声称：“妇女运动的参加者都是些未婚女子、寡妇、犹太女人、不孕女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她们不是母亲，或者不想履行母亲的职责。”韦伯的夫人没有孩子，她负责海德堡地区的妇女运动，所以矛头是指向她来的。韦伯愤怒至极，但是他不能马上出击。先是韦伯的妻子本

436 人给那位谩骂作者去信要求他收回他的攻击。那个谩骂者拒绝下这个台阶，于是韦伯以玛丽安妮的名义开始了公开的讨伐，但从文章的犀利尖刻中人人都能看出合作者是谁。那个年轻人抱怨说，文章作者的丈夫躲在了妻子身后，而他不能向这位妻子提出决斗的要求。韦伯得知后决定给那个年轻人一个机会以满足他的愿望，随即公开宣布自己支持妻子所说的一切。然而，年轻人并没有提出挑战。这位遭到讨伐的人宣称自己反对决斗，并向法庭控告韦伯诽谤罪，但很快又在第三方的斡旋下撤诉。之后不久，多家外地报纸都刊载了一篇令人恶心的耸人听闻的文章报道这起事件，题为《古老的海德堡，你这高雅的城市》，并提及了当时在媒体中已炒得沸沸扬扬的“B [Ludwig Bernhard] 事件”。文章摘要被到处刊载，甚至让大洋彼岸的读者取乐。文章最添油加醋的地方是结尾那一段：据说 R [Arnold Ruge] 博士问韦伯教授是否愿意代其妻子与他决斗，韦伯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引述的消息来源是 R 博士本人，但 R 博士立即否认了这一点。

韦伯常常称自己是决斗的拥护者，视这种流言蜚语为“闻所未闻的卑劣行径”。他感到这不仅有害于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有害于公众利益，因此一连几个月里不惜耗费精力去维护这些利益。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仅反映了韦伯的个性，而且典型地反映了新闻媒体的一些惯常做法：他们在编辑部消息来源保密的托辞下用关于名人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来取悦读者，然后让受到牵连的人很难通过随后的自卫行动来抵消轰动新闻的影响。这次，所有参与者都将接受一次教训。

韦伯起初以最客气的方式要求有关的外地报纸发表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

437 注明 1911 年 1 月 6 日发自海德堡的一篇标题为《古老的海德堡，你这高雅的城市》的文章，除了其他内容不实之处外，在结尾处还声称：R 博士先生向我提出了某种性质的询问，对此我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请允许我说明，这种说法从头到尾纯属随意虚构，与实际发生的情况毫无共同之处可言。如果你们的投稿人能够告诉我 R 博士在何处向何人做过如此陈述，我将为此证据而感谢他。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件事情就算彻底结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需要我就这件事情的真相公开发表意见。敬请尽快发表这封信，谨致崇高的敬意。

马克斯·韦伯

假如他们发表了这份正式辟谣，事情至此也就结束了。然而，编辑部却作了如下回复：

尽管我们很愿意满足您的愿望，但很遗憾，根据我们的记者——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他是值得信赖的——提供的信息，我们无法轻易相信您与此相矛盾的说法。



当然，如果您提出要求，我们会按照新闻法发表您写的更正。不过，我们和我们的记者也必须保留我们回应和反驳的权利。我们不能向您透露我们记者的姓名，因为正如我们必须坦率地加以承认的，根据我们现有的信息，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位先生和他提供的信息。

对此韦伯回答说：

如果您认为一个没有依据 R 博士先生自己的言论来如实报道的记者值得信赖，那是您自己的事情。如果您的职业责任感不能促使您对一个已为当事人所否认的不实报道——说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向我提出决斗挑战未果——做出公开更正，如果您将以疏排法印刷而加以强调的指控——这是唯一带根本性的东西，也是我的那份正式辟谣针对的要点 [同时，这个指控在《海德堡日报》(Heidelberger Tagblatt)上已经被另一方称为“纯属无稽之谈”]——视为“无关宏旨”的话，那么，我对今后让你们的报纸做出任何关于我的更正已不再有什么兴趣了。你们可以继续从我这里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更正”。

而后编辑部表示，如果韦伯能够使他们确信他自己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他们愿意向韦伯赔礼道歉，可是韦伯这次却不愿再像上次那样，只请求登一份正式辟谣就轻易让他们过关了。他再次花费精力逐点逐条地揭露出那篇耸人听闻的文章中的不实之处，但随后补充说： 438

鉴于你们记者的那些我在上面强调过，而他至今尚未收回的言行，鉴于在我向你们指出了他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的那些言论之后，你们只要认真做一下调查就一定能认识到他的品质，我要向你们宣布：你们轻率地雇佣了一个诽谤者（我是一个预备役军官）作为记者，因此我要求这个记者和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你们记者的行为被当地一份报纸称为“无耻”，而他居然还有胆量侈谈什么“证据”。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我将保留采取我自己认为适当的行动的权利。我所要求的是一个公开声明，说你们的记者“欺骗”（我要求用这个词）了你们，而且他在自己的虚假报道被质疑和被公开反驳之后，仍然坚持这种欺骗。

编辑部不愿以这种方式透露他们的记者的身份，因为他们认为他值得信任，并且总是这样来回复韦伯的言论，他们向韦伯保证说那位在海德堡为他们提供信息的人是“一个有名望的人物”，这个人坚持自己的说法。

为了逃避韦伯提出的严厉要求，编辑部把韦伯在他要求辟谣的短信里那句“没有一个字符和事实”——这句话清清楚楚是专指所谓的决斗挑战一事——解释为是针对记者的整篇文章而言的（这篇文章还包括很多其他的谬误）。他们说：“其中有的内容是真实的。”至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声称记者的消息来源极为可信，而且是来自大学圈子的一位先生：

因此，我们准备说明，根据您的说法，R 博士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向您提出过挑战。经过对整个事件最为缜密的调查，除了这个重要的失误之外，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错误的东西。……因此，您也许会认为，称我们的记者想要诋毁您的声誉是没有根据的，应当收回这一说法。

439

这种顽固对抗使韦伯越来越愤怒，尤其是他并不相信提供信息的人会出自大学圈子。难道 R 博士就是那个始作俑者吗？他毕竟暗示过挑战韦伯的意思。韦伯现在要求得知那位记者或者他的消息来源人的姓名，或者想法让那个始作俑者自己站出来——“如果这个人属于‘大学圈子’（而非子虚乌有！），那么他为了自己的荣誉当然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自然，按照这件事情的现状，如果你们不透露你们记者的身份，或者提出证据说明那位先生是谁，他能够证实什么，而只是提供简单的甚或对个别事实表示出遗憾的更正都是不够的。”

那个已经被逼到角落里的记者（他此时已经被提升为该报编辑）现在提议，以刊登广告和匿名读者来信的形式澄清事实，但是不愿意公开他自己或是信息提供者的名字。韦伯鄙夷地拒绝了这项提议，当他再次不容置辩地要求刊登他的声明又遭到拒绝之后，他粗鲁的斥责迫使这家报纸及其编辑以侮辱罪对他提出起诉。他现在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出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他不能相信，一直隐藏不露的会是自己的一个同事。

经过几个月的信件往来之后，这个案子在德累斯顿经过了两级审理。初审判决双方均有罪，不过韦伯的罚款比两个原告加在一起还要多。第二审出乎意料地以庭外和解结束。那位匿名肇事者的身份意外地被暴露了。原来他果真是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那个记者并没有披露他的身份，因为他感到自己应对那位教授感恩戴德。他以前是那位教授的学生，就在那篇趣文发表后不久，这位教授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和一个干练的记者”，推荐他担任新的职务。记者曾多次请求得到这位庇护人的许可公开他的名字，但都遭到了拒绝。

440

韦伯现在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年轻人了。韦伯为他恢复了名誉，以几乎像父亲一般的态度向他指出了他所犯的错误。然后韦伯写道：

我想再说一遍，我期待于您的，只是简单和不带任何色彩而又客观地说出所有的事实，当然只是那些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能够宣誓保证其真实性的事实。毕竟，我让自己吃官司并不是为了要揭露出 N. N. [Adolf Koch] 教授，也不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法庭上证明我是对的，而是无论如何要弄清真相，不管这真相是什么，您都应当为此尽一份力。……在客观事实弄清楚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为那位教授辩解的了。然而，除了确确实实应当由他承担的责任之外，我们谁也没有责任去错误地指控他别的什么。

这件事情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教师，那位教授在培养未来的报界人士；他喜欢夸耀自己在新闻界的影响，这给了他一种令人生畏的权力。他同韦伯并不直接认识。然而，他会不会让自己的庇护人去写那篇文章，以此来恶意中伤那个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他评价不是很高的学术圈子呢？抑或是他也特别想诋毁韦伯，因为韦伯考虑了第三者的异议而没有让他参加对报界的社会学调查呢？

然而，无论是这位教授的行为动机（也可能并无恶意），还是他对那篇文章到底应负多少责任，所有这些都不能确定。当他的名字在诉讼过程中透露出来后，韦伯试图让他澄清事实。那位教授回答说，关于决斗被拒的谣言是他在自己家里偶然谈起的，那位记者作为朋友是他家的常客，他对此事被传播出去感到遗憾。是这么回事吗？如果是，那么另一个人就应承担全部责任。这位教授可能仅仅是在转述一些有趣的流言蜚语。当着一个人讲这些事情虽然有些谨慎，但也可能并无恶意。不过，他也可能有意将谣言变成了事实，将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信息转达给这位年轻人，目的是利用这些信息来整治一个同事。他是不是有意让这个信息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见诸报端呢？如果是，那他的意图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开自己作为始作俑者的身份呢？是谁在说谎？是老师还是他的学生呢？

441

要对这两个人做出评价，他们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重要性，因为那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也绝非无可指责。在经历了这么多令人讨厌的麻烦之后，韦伯想要弄清楚整个真相，无论这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件事关系到的已经不再是他的声誉，而是公共利益，即大学的尊严和清除新闻界的恶习。假如那位教授真的是有意识地出于卑劣的动机怂恿受他保护的人，那就不能让他继续掌握培养未来新闻界人士的权力。韦伯因此给这位教授写了一封长信，告诫他说：

不过，我现在必须回过头来对您的行为做几点评论。您的行为导致了这场诉讼，无端地给法庭增添了麻烦，使双方花费不菲、损失了时间并陷入了种种窘境。即使您确信那篇文章里关于我的报道是真实的，人们还是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动机让您这么做？您向一个专业记者传播关于一个同事的这类事情，又如何与您在大学里的身份协调一致？然后，正如可以预料到的，这些材料被媒体利用之后，您怎么能够**隐身不露**？假如这仅仅是因为不小心造成的，您又为什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公开或私下里予以补救？

442

……您显然是出于一种令人不快的动机，完全是有意识地将这篇文章扔给了报社，然后，您又煞费苦心地不让报社向我做理所应当的赔礼道歉。当由此而导致了诉讼时，您又躲在编辑部消息来源保密的庇护伞下，直到我立足于事实的质询堵住了您这条去路。……您相当清楚，下面这种说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个一再公开声称支持决斗的人，一个同当地穿着制服佩戴的学生社团（他曾是该社团成员）一直保持着联系的人，一个每年都要接到军事命令的军官，竟然利用因健康原因不能佩戴武器这个臭名昭著的虚假托辞拒绝保护妻子的名誉。……在蒙受了很大损失而将事实真相澄清之后，我自然没有一丁点儿兴趣让您遭遇什么麻烦，更没有兴趣让这件事成为有损于大学声誉的公开丑闻。但是，如果您认为能够否认上述事实，我会把您送上法庭或者送上负责纪律检查的机关。……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您认为自己有资格在这所大学里培养未来的新闻界人士，可无论是您在上述事件中的行为还是您对我的态度，在我看来都与您自己的看法相抵牾。

韦伯仍然希望，这个不幸的人能够通过自愿辞去教职而至少避免公开受辱，并准备成全他这样做。因此，当他把上引的那封信的抄本寄给系里的时候，他给系主任附上了下面几句话：

私底下我只想告诉您，如果 N. N. 自愿切断与大学的关系，我可以**保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算**结束**了，没有人会知道此事，那些已经知道的，也会保持沉默。他毕竟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也不会有什么丑闻；而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心平气和的解决办法，不管系里做出怎样的决定，这样的丑闻就总难免发生。

然而，那位教授并没有选择这条出路，而是以侮辱罪对韦伯提出起诉。他希望能够把责任都推给那位记者。

那场新闻官司是在德累斯顿打的，那里自然无人关注。如果是在事件发生地海德堡，情形就不同了。教授之间的矛盾闹上法庭，对市民来说是上演了一出闹剧，让他们感到逗乐，同时又表示反感。对韦伯来讲，也要冒不少风险。因为在他自己那个圈子里，多数人对上法庭和公开相斗都有些畏怯。即便是他的大多数朋友也反对出现这样一

个丑闻。他们觉得，对于品格低下的人的诽谤，以嗤之以鼻作为惩罚，比起将此弄成一个事件来——毕竟这个世界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要显得有“教养”得多，也更有益于韦伯的身体健康。韦伯对他自己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把握吗？他被认为是一个对名誉很敏感的人，对自己和别人都有过高的伦理要求，就像他的外公老法伦斯坦一样，被认为有走极端的倾向。假如他做得太过分，拿不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那该有多么难堪！然后他会把脸丢尽，还会因此而让学校蒙羞。即便是他（因为形式上构成侮辱）只受到象征性的惩罚，那也会很难堪。人们将会像以前那样嘲笑他，说他是堂吉诃德第二，挺着长矛冲向风车的叶片而让自己摔得鼻青脸肿。或者，按照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把他说成是一个像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那样喜欢抱怨的人。的确，那些对韦伯不甚满意的朋友们已经在使用这个说法了。人们暗地里打算以成败来评价韦伯的行动。如果他胜诉，他事后当然就会得到赞同；如果他败诉，他的信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原告在两个律师的陪同下出庭，传唤了15个证人作证。经过没完没了的法庭辩论（原告的律师想以此来模糊事实真相）之后，到了那位记者宣了誓叙述事件过程时，庭审变得紧张起来。记者说，那位教授给他看了登有R反对妇女运动的文章以及韦伯女士回应的剪报，然后谈到了R提出的决斗挑战。据说，海德堡一份享有盛誉的报纸的两位编辑谈到过此事，他们的消息来源是R本人。然后那个年轻人问那位教授：“这不正是可以见报的材料吗？柏林大学那场争论刚刚发生过，现在把这登出来会是一件大事！可这件事是真的吗？我最好在刊登之前与R博士或者韦伯教授核实一下。”可是那位教授劝我不要这么做：“这对您没什么用处，因为R会加以否认，原因是，如果他提出决斗挑战，那么他就是在做一件要受到惩罚的事情；韦伯对这事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难堪，即使他因自己身体不好有正当理由拒绝决斗挑战。R本人就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想，如果一个讲师这样说了，一个教授又这样转述，而且有名有姓，那这肯定错了。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寄给了五家报社，其中三家接受了。”

这番证词之后，在记者和他的庇护人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激愤的场面。那位教授没有勇气通过公开承认来减轻自己的过失，却一口咬定自己庇护的人撒谎和无耻，以此作为自己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真相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整个由怨恨和不满精心编织的谎言被拆穿，事情最终水落石出。原告变成了被告。韦伯不得不再次代表真理参加审判。不过，同事们现在也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个人利益与公共道德是一致的。树立一个恶意诽谤的反面典型最终还是值得的。

然而，他对手的可怜相越是暴露，韦伯就越是怜悯他；举证责任的天平越是有利地朝韦伯这边倾斜，他扮演法官的功能对他就越是个折磨。当在场的人们在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紧张气氛中发现原告及其家庭成员的证词相抵牾，而后有“伪证”这个词冒出来

时，感到震惊的韦伯跳起身来喊道：“听到这个词我深感遗憾！完全有可能这个证人情急中说出了客观上不正确的东西，但在主观上，她确信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韦伯为这么多的不幸而深感震撼，就在判决即将做出之前，要不是他妻子毅然决然地从中间阻拦的话，对方的律师恐怕已经说服韦伯同意庭外和解了。玛丽安妮知道，这是一个事关韦伯自己声誉的重要问题。不知情的人永远不会相信，韦伯出于骑士精神宽恕了这个处于劣势的对手。任何一个不了解这个案子的细节的人，都只会将此视为韦伯在这个诉讼里的事实和论点不足。

因此，这个案子必须按程序继续下去。就在宣判之前，那位教授撤回了他的控告。韦伯的律师宣布，所有的证据无不证实了他的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这时韦伯说道：“我的律师为了保护我的利益，在其辩论的最后部分走得要比我自己更远。”他接着补充说：“鉴于昨天那些可怕的场面及其给那位教授带来的折磨，我对于这次审理不得不发生而445 感到最为深切的遗憾。有鉴于此，我必须说我希望主管学术的机构和教育部能够认识到，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按照医生和律师的模式建立一个名誉法庭。”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诉讼对个人的意义引向它对事的客观意义，他同时还谈到了对新闻界的一个教训：在涉及私事时应当放弃编辑部消息来源保密的做法。

这个令人震撼的戏剧性事件结束了。人们费了不少劲才成功地阻止韦伯去将一根倒下的芦苇又重新扶植起来。与自己最早的出发点相反，他在诉讼仍在进行时就写信给系主任说：“我只能请求系里届时对那位教授从宽处理。既然教育部拒绝了对我进行纪律处分，那么如果他因我之故而被解聘，那将令我非常难堪。”诉讼刚一结束，韦伯便写道：

关于那位教授，我一周之后将给系里递上一份请求，谈谈在我看来没有得到证实的东西。这在我是一种礼节上的义务。希望他能自愿辞职，这将是上上之策。不过，即使他不这样做，考虑到他可怜的妻子非常值得敬重的家族，我现在也必须以高姿态对待他。这种面对面的斗争确实令人毛骨悚然！就我来说，这一幕绝对不能再重演了！

韦伯夫妇长期以来一直抱着这样的看法：道德的沦丧比肉体的毁灭更加不人道。玛丽安妮在给海伦妮的信中这样写道：

诉讼令人恐惧。当庭审按照自己的程序进行，脱离了起诉人的初衷时，当雪球变成了能够毁灭一个人的雪崩时，诉讼是令人恐惧的。尽管如此，韦伯成功地在每一点上引领着真理走向胜利，却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此外，你可别笑，我们现在又

在打官司了。埃拉（Ella）正在离婚，尽管她有兄弟和姐夫，但她仍然请求得到韦伯的帮助。由此又带来了很多事情和不安定。但是韦伯的乐于助人是无边无际的，他在这方面的无节制至少不下于他愤怒时的那种无节制。

446

※ ※ ※

N. N. 教授的诉讼案结束两个月后，韦伯又卷入了一场重大争论，他把这场争论看得特别严肃，因为争论的核心也涉及对他人名誉进行攻击的问题。为这件事而做的那些非同一般的工作耗费了他几乎一年的时间。像在其他论辩中一样，这次争论也并非因他而起。这里根据文献材料所叙述的，跟以前一样，只是能够体现韦伯的人格和行为的那些内容，除非对于理解韦伯的反应有绝对的必要，否则对他的对手的情况概不公开。

这场争论的背景是这样的：出版商保罗·西贝克（韦伯与他在多年真挚的合作关系中结下了友谊）多年来一直想要出版一部舍恩贝格《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的新版本，可是都未能如愿以偿。他无法争取得到知名学者的合作，因为这本手册已经过时了。一位曾被舍恩贝格自己挑选来担任新版本共同编辑之一的年轻学者——我们暂且称他为Z [Bernhard Harms]——没有获得成功，并明确宣称他的努力失败了。大约一年之后，西贝克邀请韦伯编撰一部新的文集来取代这本过时的著作。韦伯于1909年夏天为一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书拟定了一个大纲，其目的、内容和撰稿人都完全不同于舍恩贝格的书。韦伯也邀请了那位年轻学者Z写一篇论文，但后者拒绝了这一要求。

三年以后（1912年），Z要求出版商支付一笔酬金给舍恩贝格陷于贫困之中的继承人，他们得到过保证，说是一旦此书新的版本问世，他们便可以得到这笔钱。他的意图是好的，但这个意图却是以一种——尤其是针对出版商而言——十分有损于他人名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因为Z暗示旧书出版的新版本通过使用不同的外表来逃避对贫穷者的义务。他还补充说道，他“是在一种从法律上讲奇怪的情形下被（从新版本编辑的位置上）排挤掉的”，说他所幸手上握有韦伯写给他谈及“更新”旧手册的“证据”。

按照韦伯对自己和别人的伦理要求，他感到这个年轻同事针对出版商但同时也涉及他自己的指责简直闻所未闻，因而在这个年轻人毫无保留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前，韦伯拒绝与其本人讨论这事。另一方面，韦伯为了出版商也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因为Z的论辩依据也包括出自韦伯手笔的一个词（“更新”而不是“取代”），这或者是由于韦伯惯常的字迹不清所造成的，或者是他无意间让这个词溜进了他多年前写给Z的信里。

447

所以他给西贝克写了一封意在Z的信，尽可能详尽地说明了实际情况，同时也包括了下面一段话：

这样一位先生胆敢不仅对我，而且对第三方，也就是我的出版商声称，说我“一直让”某人误信（大约肯定是意在帮助您据称是赖掉对舍恩贝格继承人的义务）；他还进一步暗示，说他Z先生（据信是在我的参与下）“是在一种从法律上讲奇怪的情形下”被逼到了这一步，“其后果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甚至使用了这样一些说法，诸如他Z先生“所幸”还保存着我写给他的一封信，“手上握有证据”。对于这样一位先生，我今后自然只有通过法庭打交道，或者如果他更愿意的话，通过安排决斗的助手们来打交道。我是**不会再**与他有私人信件来往了。……如果您现在对舍恩贝格的继承人让步，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让步，那么我将断绝与这本手册的一切关系。您也必须理解这个条件。因为**假如**舍恩贝格继承人的物质要求的依据是Z先生的断言——我争取到的是舍恩贝格手册新版本的撰稿人，那么，这就会纯粹是针对我来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半点授权**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您要偿付我欠下的债，尤其是违背我的意愿这样做，那就会损害我的名誉。

448 这样犀利的言辞——虽然就事情本身而言是有道理的——显然使那个年轻人难以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过，他还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半步，但他使用的措辞再次表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怀疑。他无视自己与韦伯之间包括年龄差别在内的差距，宣称韦伯的拒绝是一种病态的反映，他长期以来一直因此而认为韦伯在处理个人事务上颇为缺乏理智，“所以我不会回应他的侮辱性的诽谤，这最多只能激发我真诚的怜悯心”。

在争执过程中，这个争论的要点产生了诸多变异。尤其是，Z将这件事情在不可能了解事实真相的一批年纪大一点的同事中传播开来，并希望他们发表看法，这就导致了事件的进一步恶化。西贝克从这个圈子里的一个人那里得知，“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指责出版社吝啬，指责其违反道德义务，甚至违反了法律义务”。另一方面，Z则以为贫苦孤儿行侠仗义的骑士面目出现，“他的计划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如果需要的话，“他将很快广泛动员公众起来反对出版社”。韦伯用打字机打出的12页纸的内容广泛的陈述再次回应了这种威胁，以向那些反对出版社的先生们说明情况。他在结尾处写道：

事实弄清楚之后，我当然完全不会去理会Z先生对我个人的无礼行为，也随他照自己说过的那样再去添油加醋。那些没有道德勇气将自己的严重过失**毫无顾忌**地铲除掉的人，却对那个给他们指出了他们行为性质的——显然“颇为缺乏理智”的——对手产生了“真诚的怜悯之心”，这种现象如今已是司空见惯，对此我无须多费唇舌。

关于他就这件事情本身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我想说：如果一个显然尚不很成熟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有责任知会一个声誉完美无瑕的大公司的年长而又经验丰富的



负责人，说照他自己的主观看法，这位负责人对第三方负有“道德义务”，那么，他就义务和责任特别……做到两点：（1）要严格克制自己，不要不负责任地在道德上怀疑别人，否则客观的讨论就不可能进行下去。（2）由于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我尤其想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要严格避免将他个人在感情方面受到的一点点伤害与他所标榜的崇高目的搅和在一起，就像在这里发生的情况一样，否则事情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449

接着，Z——他早前曾将自己的指控撤回了一些，尽管并不充分——便坚持声称，新的集子只是受舍恩贝格思想影响的旧版缩写本而已，出版社想以此逃避自己的义务。他表示今后随处都还会清楚地表明这个看法，不管是韦伯的诡辩还是对事实的歪曲都不能让他改变这一做法。他声称，韦伯只满足于玩弄辞藻，在他提供证据的地方，给出的都是捏造之词；又称，韦伯蓄意撒谎，因为韦伯称Z把对于舍恩贝格继承人的兴趣与个人在感情方面受到的一点点伤害搅和在一起，而这种说法是“无耻的诽谤”。然而，他却不愿考虑诉讼，原因之一是，他把韦伯当作病人而酌情予以原谅；此外，他也不愿为一个有损德国教授声誉的审判承担责任。他也不愿考虑提出决斗的挑战——出于他不愿加以解释的原因（从指控信的上下文来看，他指的是韦伯的病情）。

接着，韦伯“以学术界所能允许的最为严厉的条件”向他提出用剑决斗。当时正好是圣诞假日期间，韦伯坚持在对方所在地立即进行。然而，当对手提到其承担的教学义务，要求将决斗延迟到期末进行时，韦伯考虑了妻子的意见，撤回了决斗挑战，因为韦伯自己也觉得，几个月后他不可能拿起武器。“几个月后，我肯定不能够以冷静的态度，不带任何愤怒和激情去决斗，因为学生社团的行为准则和荣誉守则要求我这样做。真见鬼！”本来嘛，一个四十八岁的人同一年轻得多的人为这样一个原因而决斗，总有点近乎可笑。可是，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因为Z声称韦伯并没有提出支持西贝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所以韦伯向一个由同事组成的仲裁小组提交了所有的证据，并在用打字机打的16页纸的辩护书里对此逐一做了说明。 450

这件事对一个不带偏见的人来说必定是一清二楚了，这个人也许同时会感到钦佩和惋惜：钦佩的是，作者为洗清别人的名誉表现出的小心谨慎的程度和付出的工作量；惋惜的是，这样的洞察力没能用到别的事情上，而且作者最终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即让别人认识到他们的错误。韦伯的陈述以下面这段话作结：

也许这个特殊事件的材料证明会让诸位先生相信，当我以表面上看来没有必要的严厉来对待某人的时候，我通常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在每一个其他事例中，我都愿意像这次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提供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在其他那些事例中，我

也知道，那种表面现象有时也出现过。每次都是具有同样性质的问题——在此我还是不要进一步说明为好——让我怒火中烧。这当然不是说，我在这些事件中并没有犯过错误。不过，我有资格这样说：只要是因我的错误而让别人受到了伤害或者我不公正地对待了别人——这肯定发生过多次，我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大度去承担后果……

451 结果那些先生们（只有一个例外）以他们的“时间宝贵”为由拒绝仔细研究原本为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准备的那份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在这个材料上花费的努力又白搭了。不过，它倒是产生了另外的效果：阻止了出版社遭受进一步的公开攻击——对手曾威胁说要这样做。这之后韦伯还主动提出要给外地的同事做一次口头解释。这样的请求也被好几位同事拒绝了，他们无法改变自己所持的态度，不想再让这件现在已经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打搅自己。于是，他们想通过一项联合声明全身而退，声明肯定 Z 和韦伯——但没有提到出版社——都拥有“诚意”。接着，韦伯再次站出来说话，告诉他们：

你们在联信中虽然肯定了两位教授的“诚意”，但是却保留了对西贝克先生的行为做出判断，尽管我已经给你们提供了最为精确的保证，尽管你们的同事 B [Otto Baumgarten]（他至少了解部分情况）也同意我做出的保证，尽管我从来没有给过各位任何借口让你们误以为我与出版社一起干过某种“不公正”的事情。我把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案例交给你们，并没有把你们作为一个仲裁小组，相反，我是想当面告诉你们，向你们证明，各位既容忍了不公正，自己也做出了不公正的行为。我指望你们把给我这样做的机会视为自己具有骑士风度的义务。……

我被书面告知，诸位先生的时间太“宝贵”。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你们的尊姓大名也同样非常“宝贵”，因而不能将它们任由主观感受支配。……很遗憾，诸位同事不肯赐我机会，让我根据文件材料向你们说明出版社在同舍恩贝格先生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骑士风度和小心谨慎，并解释西贝克先生被疑违背了对舍恩贝格或者他的继承人所担负的义务的事情。……一个局外人总是有这样的印象，即在一场争论中肯定双方都有不是之处。可是，在一件我完全确信自己绝对正确的事情上，我不能做出丝毫让步。

这件让人激愤的事情还有一个续篇。在那些受 Z 的诱导而站在反出版社一面的外地同行中，有一位韦伯十分尊敬的年纪较大的朋友。让韦伯感到尤为痛苦的是，即便是这个朋友也并不理解争论双方水平的差异和他们各自论争的方法。

不过，让我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您竟然不理解这样一点：假如您像我一样是一个深受疾病折磨的人，有人居心叵测地将您的疾病拽进一场冲突之中，并将此在第三者中传播，以达伤害您的目的，那么，您最基本的狭义情感不会是对那个人感到愤怒吗？我想，即使我对这个人负有义务，我也不会放过他的。这一点我是可以向您保证的。但是我并不要求别人这么做，因为在这方面我已经渐渐习惯了不被人理解。您那个“圈子”没有向那位先生明确表示，一个人不能向一群局外人散布像针对出版社那样的诽谤言论，为此您那整个“圈子”要承担严肃的责任。……即使这样的要求我也不会提，因为很显然，要想让那些先生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低俗也是不可能的。 452

这位朋友仍然不能认识到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于是，韦伯便以下面这些话告别了自己与他的友谊：

您谈到“一个自年轻时起便生活在赞扬、理解和成功之中的人”（我），这表明，您虽然曾与我同处，可是眼睛却什么也没看见，否则您就不会偏偏把我这个人描绘成那样。然而，您经历的那些如此凄惨的艰难生活（即使您不告诉我，我也能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明白，在我看来就是人们用来糊弄黑人的**玻璃珠**一样的东西，却让您看得**眼花缭乱**。可是，不管怎样，对您来说仍然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这并不是指责，因为这不是您的过错；不过，这是事实。我们应当干脆脆地承担这一事实的后果，用不着相互指责，也不用为此而神经过敏。

我要特别感谢您努力去为满足我的愿望而铺平道路，从而在这件事情上尽到了您所担负的共同责任。您现在不能比这做得更多了，这一点我可以向您证实。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有关我名誉的事情上——这类事情并不像您所相信的那样是转瞬即逝的——我没能获得您的理解。在学者们的一再敦促下，我接受了这部倒霉的《手册》的编辑工作，他们随后又不光彩地让我晾台。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这部手册大概不仅会使我的学术声誉（对此我从来不太注重）受到损害，而且还会由于那位先生的缘故而玷污我无瑕的名誉。这一切对您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您非常盲目地相信，“如果一个教授指控一个商人什么事情，那他肯定有些道理”。对这一点我不能置若罔闻。我的观点没有变，但我们的关系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衷心地握您的手，祝您将来一切顺利。 453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因此而一锤定音。在回复这个朋友令人宽慰的复信时，韦伯写道：

我不能让您充满骑士精神和高尚情操的信就这样泥牛入海。让我们丢开这件事吧。或许今后有某个好的时机来谈论它。我感到现在无法再指责您，尤其是在您的说明之后……如果我在一时情绪激动之中（如您所说）对您有失公正，我由衷地感到抱歉。我对您的高度尊重您是知道的，而且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只是，在我看来，我们相互有些生疏了。更多的我就不想说了，或许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您知道，我通常是一个很生硬暴躁的人。我自己觉得，一般说来我只是在我自己有理由这样做时才很生硬暴躁，就像在乙先生这件事情上，我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按照自己当时的看法，在这件事情中对您进行的反驳也许过于激烈，以致在客观上不可能正确，那么，我请您原谅。当时我觉得自己正身陷一场为我的好名声而进行的斗争，反击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攻击。对您表达的衷心祝愿，我回报以同样的衷心祝福。我比别人看起来更需要这样的祝福。希望您不致如此。



还有另外一件有关他人名誉的事让韦伯投入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搭上了自己的声誉。韦伯朋友圈子里的一位年轻学者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一个同行在书评中严重损害了这个作者的学术声誉和个人名誉。其中一项指责是剽窃，而且这种指责并没有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而是隐含在字里行间——这似乎更糟糕，因为从法律上讲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454 韦伯认为，这种于学术无益且对个人声誉有害的批评应当受到谴责。他在作者的反驳之后附上了一篇“后记”，其中依据仔细核实逐点逐条地指出了书评的褊狭与错误，试图揭示那篇书评的“鄙俗的动机”。结果韦伯不仅招致书评作者的反击，而且受到后者所在大学同事的攻击。书评作者的同事们支持本系的教员，并发表了一篇很长的东西，称韦伯的反批评过分、毫无根据、不公正，进而对他劈头盖脸地加以痛斥。不用说，新的“教授之争”再次被某类日报加以相应的评论大肆炒作。韦伯现在不得不努力去逐点逐条地驳倒这份由集体撰写，已经被寄给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各大学院系的东西，同时为自己和那位受到伤害的作者辩护。他那篇虽然复杂，但仍然不失清晰的论证中，几乎所有的段落都以这样的句子结束：“我坚持自己的异议”，“我坚持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拒绝系里对我的指控”。

然而，这件事情不仅再次表明韦伯在帮助别人时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也在另一个方面显示了他的性格特征。我们已经知道，韦伯的一个基本道德要求就是，一个人必须做好准备去认识、毫无保留地承认并补救在精神上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过失和错误。然而，总令他吃惊的是，犯错误的人几乎从不承认错误。他们总是认为，一旦这样

做就会有失体面！若就争论的事情本身而言，韦伯在争论中实际上总是对的；但是他在激愤之时就变得固执，并由于他指责的严厉程度，或者由于他误解对手的行为动机而常常不公平地伤害对手。不过，他愿意让别人说服自己事情并非如此，而且力图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只要另一方也表示愿意这样做。

在上述事件中，当那位受到韦伯斥责的书评作者的同事中有值得信赖者向韦伯保证说，书评作者无意指责那位年轻学者学术上行为不端，他的批评并没有卑劣的动机时，韦伯便立即在一家期刊和一份日报上发表了如下声明：

对于 N. N. 先生的陈述我想做如下说明：他解释说，他自己与 X 先生的研究 455  
领域并不相同，这表明以假设他们的研究领域相同为出发点而得出的结论对他而言无疑是不公正的。很遗憾，我在这一点上相信了一种假象。同时我很高兴能够改变我原来对他的看法。

不过，在收回自己的指责——这甚至发生在书评作者系里那篇东西发表之前——的同时，韦伯也发出了下述呼吁：“N. N. 先生看到了，我们可以诚实地让一项不公正的指责消失。他有必要按实际情况无条件 and 毫无保留地对 X 先生做到这一点。我没有必要诉诸他的‘判断力’，因为他拥有这种判断力。我是要诉诸思想品质。”然而，这项呼吁是徒劳的，因为现在 N. N. 先生的系里出面来为他辩护。前面已经说过，韦伯在与书评作者的同事进行的论辩中，就内容而言丝毫没有退让。但是为了给 N. N. 先生向那位受到伤害的作者履行他的义务提供方便，韦伯再次“强调”指出：“……与书评必然会给人的印象相反，我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指责书评者想要‘诋毁’那位作者的名誉，同样也不能再对他进行‘剽窃包打听’和诸如此类的指责……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强调说明这一点。”

这里远远没有道尽韦伯古道热肠的骑士行为，我们也不可能对此完整地加以叙述。当大家知道了韦伯多么热心地帮助陷入困境的朋友时，就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他会被拽入别人的争端里去，接受他帮助的人会耗费他太多的时间。至于他如何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的不幸女人，我们将在另一个场合通过一个例子加以说明。通过毫无保留地使用自己受过法学训练的敏锐心智以及那种一般人通常只是在涉及自己利益时才会有的谨慎，他作为律师顾问成功地帮助别人解决了好几个棘手的案例。

毫无疑问，这种斗争给他带来了刺激，让他更多地了解了生活，使他得以从纯粹的思维活动中得到放松。其中的危险在于，他易激惹的情绪有时候使得他太容易站在寻求 456  
保护者一边。这些人毕竟是朋友，他首先不加批判地以他们的眼光看待一切，与他们站在一起。尽管他有如许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的深刻洞见，但他有时却像一个保持着单纯质

朴本色的人，受外来影响的诱导而行动，一如奥赛罗——只是具有不同的素质——别人向他吐露点什么他都相信，并据此而行动。

就争论的事情本身而言，他实际上几乎总是有理，最终总为当事人赢得胜利。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他攻击对手的猛烈程度却使他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抨击常使对手的态度变得强硬，以致无法认识到他们自己的不公正之处。韦伯经历过很多争端，但没有一次是肇始于他。每次都是他受到挑衅，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朋友把他拽入了争端。不过，毫无疑问，他在那些争端中任由自己的遗传秉性恣意发挥；可悲的是，这样的秉性因他的病情和政治形势而不能恰当地在伟大的对象上发挥效用。这种秉性就是吕佐夫的老兵法伦斯坦所具有的那种英勇的行为和天生的骑士精神。

## 第 13 章 美好生活

# 1

1910 年的春天给韦伯的生活环境再次带来了变化。阿道夫·豪斯拉特在 1909 年秋永远闭上了他疲惫的双眼。他的后人将这栋由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建造的老宅修缮后出租。恩斯特·特勒尔奇和马克斯·韦伯各入住一层。海伦妮的孩子们搬进这栋房子遂了她的一个心愿。她一直怀念这栋父母的老院：对她来说，这里曾经珍藏着她青春时期全部的诗意，尤其是珍藏着她心中的楷模。她母亲在那里终其天年的那些年头，她和家人每年总要来这里度几周假，恢复精神；他们每次都让自己生命的根汲取了新的养分。她把嫁给豪斯拉特的姐姐亨里埃特和姐姐的孩子们视为自己的家人。儿子的入住让她感到又重新拥有了这栋住宅。她像庆祝节日一样以充沛的精力庆祝这一时刻的到来。

海伦妮现在六十六岁，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她漫长的人生总是充满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斗争。她是一位气质典雅的老妪，一块黑色花边头巾包裹着褐色的头发，面容显得有些苍白但却透着坚毅。谁要是看见她健步急行地上下楼梯，看见她忙着收拾箱柜，看见她在花园里挖地掘土，谁都会钦佩她刚强的精神力量，感到神清气爽。唉，要是她那活泼的爱能像屋外的井泉一样成为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那该多好啊！无法想象有一天她将会不在人世。她仍然非常热爱生活，但也随时准备着那一时刻的到来，准备着将自己完全交到她的主手里。

这栋房子上年纪了，见证了很多沧桑岁月。对海伦妮来说，它仍然充满着逝者的

458 精神。宽敞的楼梯和朝南向阳、庄严高大的房间拥抱着她，其美妙一如往常，将建造者的慷慨大度活生生地展现在她眼前。一扇扇窗户仍然将外面世界的神奇镶嵌成了一幅幅画屏：林木覆盖的山峦呈缓缓的弧形，壮观的废墟，熟悉可爱的房屋群簇拥在哥特式教堂那母亲般的躯体周围，河里水光潋滟，河上横跨着一座桥。当清晨的阳光以胜利者的姿态将雾霭驱赶下河谷的时候，海伦妮每次都在其中体验到了一个深刻的象征：天国之光战胜了尘世的黑暗。

在房屋正面的花园里，父亲种下的“神树”——中国白蜡树——仍然擎着她们造型完美的树冠；淡绿色的一串串小果实在羽状树叶丛中装扮着表现力丰富的枝条，这些枝条现在已经伸展到屋顶了。屋后山坡上的花园里，梓树粗壮的树干上，整个夏天都仍然覆盖着丝绒般柔软细腻的绿色伞形树叶和呈泡沫状的芬芳的白色花朵。在斜坡上掘出的那个爬满常春藤的宽大洞穴里，那个欢快的泉眼——狮泉——仍然流水潺潺。海伦妮每次离开这里时都要喝这里的泉水，以确保自己的归来。祖父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树木霸道地伸展着它们的手臂，覆盖了整个花园，树根已经无力再为所有的树枝提供新的养分了。同样古老的黄杨树已经变成了虬屈的灌木丛，像桃金娘科植物一样经年常绿，给花园带来了南方的色调。灌木丛前面有一块古代祭祀石，上面刻着贺拉斯的一首颂歌和以前在这栋房里住过的那些人的名字：格维努斯、本内克、戈尔德施密特和豪斯拉特，都是些著名学者。豪斯拉特种植的两棵山毛榉的树枝在祭祀石上方垂下身来，山毛榉树正值盛年，给这块地方提供了庇荫之处。

459 韦伯夫妇第一次拥有了一块土地，他们的生命之根更加深深地扎进了尘世这片土地之中，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春天的甜蜜。报春的首先是对面城堡所在的山坡上那些幼芽织成的嫩绿的薄纱——当树干、树枝和林间地面仍然隐约可见时，这景象格外漂亮。然后是前院的木兰花的花萼绽开。站在窗户边从上往下可以看到花萼里面的花冠——真可谓奇迹！阳光从无形无状的黑色土地的神秘创造力中诱出了如此美妙的造物！随后，山坡上哲人小道附近那些老果树穿戴上了新娘的装束。每一个春天都赠送给他们如许的快乐。玛丽安妮这样描述了她的所见：

花园里罩上了第一层绿纱，比通常早了四个星期。雪花莲已经冒出了土，颇感诧异。人们为这种冒失的生命渴望感到担忧，不过仍然欣赏它们的到来，自己也感到年轻，心存感激，准备着焕发青春。今年大厅的窗台上自家种的风信子芳香扑鼻。

今天早上我们在山坡上的灌木丛中种下了报春花和雏菊，这样那里就不会再是光秃秃的了。可是天哪，现在下起雪来了！天上的那位老先生，或不管是谁在代表



他掌管这尘世，再次表现得缺乏理性。他先是提前三个星期引诱所有的花儿含苞和所有的绿色植物发芽，然后才想起来我们今年还没有冬天呢。外面看起来很凄惨，木兰花变黑了，郁金香低垂着头；如果今夜再像昨晚一样出现冰冻，绿色植物也会变黑。

花园里新种下的幼苗生长得很慢。我们给那棵黄杨树浇了很多的水，也倾注了很多的爱，每天都跑去看它有没有重获生机。山毛榉新长出的叶片向着暗蓝色的天空在挥动着褐色的羽毛。山坡上闪烁的亮点是雪白的花朵，丁香花开始绽放了。

真是个美妙的复活节！阳光和煦，花木丛中传出温柔的飒飒声。外面的公路上已经是尘土飞扬。在我们的花坛里，黄色和红色的郁金香盛开了，花朵很像是为那些乖孩子准备的复活节彩蛋。要是我们能够一块儿欣赏就好了！你能记得这些年里我们经历过这样明丽的春天吗？我是没有经历过。这里让人陶醉，令人动情。一切都骤然而至，现在已经渐渐有了夏天那种更为浓郁的色调了。我身上仍然有真正的春天的躁动，迫使我走出去，出去漫步。马克斯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没想到他能回来得这么早），同我一起在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又进行了一次多年不曾有过的真正的散步，这是一个令我高兴的礼物。我们乘登山火车去了科尼斯图尔（Königstuhl），然后徒步经由科尔霍夫（Kohlhof）去了内卡格明德（Neckargemünd）。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山毛榉最初吐出一层嫩绿和穿入林中的金色阳光。为什么唯独我们人类不能够像树木那样每年春天都更新一次呢？顺便提一下，马克斯看起来颇有年轻人的灵 460  
活性。

从昨天开始这里就已经是夏天了，阳台变成了一个绝好的庇护所。晚上夜莺鸣唱，令人陶醉，丁香散发出幽香，泉水潺潺地流着，真是美不胜收。我们一起开辟了一块地，种上了豌豆和其他豆类。大家一个个拼比着，都想比别人种的面积大。

今天贡多尔夫、萨尔茨、格鲁勒、拉德布鲁赫斯（Radbruchs）和雅斯贝尔斯在此做客。我们在花园里坐在有花格图案的布上面，然后又去了上面一个爬满葡萄藤的走廊。贡多尔夫给我们朗诵了诗歌，他的主意很多。他能够以他的思想和可爱的欢乐打动整个圈子的人。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大家在一起享受春天。

韦伯自己在初夏时写信给海伦妮说：“在多云的天空下，我们现在充分享受着美好的春光；夜莺在林中鸣唱。晚上我们坐在月光下的狮泉旁边；特勒尔奇一家和一位朋友

坐在茶桌旁，这位朋友在那里或拉琴或唱歌——我们都非常快乐。”

旧式的室内陈设也同样由美来主宰。尤其是那个摆着旧式家具、色彩协调的大厅：深绿色的墙，蓝色的地毯，大厅将新旧东西配置成一个统一体，而活生生的人就像移动画面一样交替着出入背景。一尊在罗马购买的《德尔斐的执缰人》（*Delphischer Wagenlenker*）铜像复制品静静地守卫着大厅，也许这尊雕塑塑造的是一个奴隶的形象，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让人感到心情有些沉重，因为他身上透出这么多的高贵与尊严。透过三扇镶嵌着整块玻璃的几乎落地的窗户，整幅的风景映入眼帘。如果你从中间一扇门走到由圆柱支撑起来的宽敞的阳台上，拥抱你的是阳光和一块福佑之地透着欢乐的富庶，这块地被大自然和人手绘制成了一幅画卷。谁要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长河落日是如何在城堡废墟略呈红色的沙石上洒下紫色的生命，或者看到九月弥漫在空气中的芳香如何让所有的颜色和轮廓都显得高贵，谁就会受到深深的触动。当格奥尔格·西默尔第一次获得这种印象的时候，他说：“这简直是太美了，美得让人无法承受。”

461

在这样的环境中韦伯夫妇每天闲暇时得以好好休息，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求。

这栋沐浴在阳光里的住宅前面有如此美景，后面有绿荫下的野趣，这里很容易让人产生梦想，让人就像植物一样存在，向着太阳伸展。当然，若能从事辛勤的脑力劳动，那就是锦上添花了。……经历过所有这些艰难的命运之后我们所学会的，正是让自己无忧无虑地享受阳光和花香。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任何强烈印象的刺激了。唉，从此以后我们如何再离得开这个种着红色天竺葵和紫色牵牛花的阳台呢！……

也许你会感到吃惊，我怎么居然比你还要依恋这栋住宅。这的确是我们双方各自的性格使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与其说是虔敬，不如说是为鲜活的美所陶醉，这是一种我能够亲身经历的美，这种美在我每一根血管里都注入了它的甜蜜。我只是在尘世中陷得比你深，而你对一切现象更加不动心。我喜爱它们，需要它们，而你却能不受它们的诱惑。

韦伯不喜欢在他的工作时间内去徒步漫游，因为这很快就会让他筋疲力尽。他现在中午时要在园子里悠闲地做点什么事情，并在户外于梦幻中度过漫长的夏日夜晚。

马克斯现在已不再断然声称，对他来说住在大街两旁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只是因为我他才留在昂贵的住宅里。他渐渐与花园产生了感情。十四天来，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玫瑰藤架上忙乎些什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至今仍然没有将它们完全修剪停当；不过，所幸的是，烟斗草和枸杞不断长出卷须枝蔓来，必须

剪掉或者系住。即使是正在盛开的玫瑰，也需要拨弄，让它们朝着一定的方向长。希望他干活儿的范围再扩大一些，可惜我现在还不能带他去爬山。

即使是在冬天的黑暗中，当生存的意义比在夏天更多地靠自己的活动能力来创造时，也有一些充满着美的时刻。

充满节日气氛的房间里有一棵大的圣诞树，树上装饰的灯静静地放射出光芒，给它带来一种庄严；我最亲爱的人赠送给我的芬芳的花朵；贝尔塔的好性情以及琳琴的幸福——这一切都那么宁静，那么美丽。之后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享受着《浮士德》和我们之间的温情给我们的启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崇高伟业，仍然庄严辉煌如创世之初。”（Die unbeschreiblich hohen Werke sind herrlich wie am ersten Tag.）<sup>①</sup> 462



朋友们和各种各样的求助者现在比以前来得更频繁了：

我们的生活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每天都有人来访，至少会有一个探寻求索的人。但常常有好几个人来访：生活孤独的妇女和姑娘、未来的学者和年纪大一些的朋友都来到这里。优美的环境——给人带来欢乐的阳台和绿荫掩映的后花园——令人心旷神怡。这一切都很美、很丰富，但有些来访必须得视为工作的一部分。然而也有这么一些来访者，他们不是来索取，而是来给予，这类人中近来尤其要数施特凡·格奥尔格为最。这个人自身的纯朴与他那些复杂和充满庄严激情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他显然受到韦伯——他同格奥尔格最重要的门徒贡多尔夫也建立了友谊——的吸引，将后者视为获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生活的一个知识源头。

1910年12月

韦伯自己幽默地描述了幻觉中异常丰富的一天：

昨天的日程如下：一个好觉睡到早上八点。从十点半开始，先是戈特来，他在

<sup>①</sup> 此句出自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天庭序幕”。引文有误，其中“unbeschreiblich”应为“unbegreiflich”。——译者注

这里用了午餐，一直待到下午两点钟打字员来，后者待到三点四十五才离开。他前脚走，丽娜·拉德布鲁赫后脚就到了，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用茶点到四点半，然后贡多尔夫和萨尔茨加入进来（喝了茶、果汁，吃了不少糕点），四个人一起待到五点十五。然后丽娜离去，我和贡多尔夫、萨尔茨待到六点。而后戈特海因和赫尼希斯海姆加入进来，待到六点四十五，然后戈特海因离去，又过了一会儿贡多尔夫和萨尔茨也走了。我和赫尼希斯海姆待到七点半，拉斯克加入进来（先同拉斯克两人单独谈，而后大家一起聊）聊到八点，然后拉斯克离去。同赫尼希斯海姆共进晚餐，他一直待到晚上十点。然后贝尔塔把他打发走了，说：“教授夫人真的要责骂了。”之后我把身边的电灯打开想要读报。贝尔塔拿来了油灯，把电灯关了：“教授先生肯定会忘记关电灯。”然后我服了大量安眠药，睡得还凑合。当天谈论的是整个世界和三个村庄。



463

住进旧宅后的第一个夏天里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与施特凡·格奥尔格建立了私交。十三年前还在弗赖堡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格奥尔格最早的崇拜者之一，就试图让韦伯对格奥尔格的文学作品产生兴趣。格奥尔格当时已写了诗集《颂歌》（*Hymnen*）、《朝圣》（*Pilgerfahrten*）、《阿尔加巴尔》（*Algabal*）和《牧人之歌》（*Lieder der Hirten*）。李凯尔特能够非常精彩地朗诵这些诗歌。但他的努力只是白搭，格奥尔格的早期诗歌对韦伯来说完全是对牛弹琴。从根本上说，韦伯在这些诗歌里看到的只是一种与自己不相干的艺术唯美主义。总的来说，沉溺于情感的抒情诗与当时那个强壮的男人不合拍。现在情况早就不同于前了。患病这些年，他偏离了自己的发展轨道，打开了以前关闭着的秘密心房。他现在能够欣赏那些让情感不断得到深化的艺术创造了。他沉浸于各种各样的现代艺术作品之中，尤其是里尔克（*Rilke*）和格奥尔格的作品之中，而且现在还朗诵得不错。这个夏天，他给妹妹寄去了一本里尔克选集，并写道：

寄上你想必已经知道的里尔克诗集中的一本。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对这个集子里的东西还不太了解。我在令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做了记号。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给你什么提示，或者期待恰恰是做记号的诗行会对你有吸引力。相反，我对此完全没有把握，甚至不知道这本小集子里有多少诗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里尔克那里有时候也有些庸俗无聊的东西，这在每一个神秘主义者那里都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出现。这里我绝不是说，这个情感的世界与我情投意合。只是在我看来，

它确实是值得了解的，某些东西在某些时候可以获得它们自己的重要性。就写到这里吧，你自己会了解的！对了，你知道施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吗？你知道梅特林克的《卑微者的财宝》吗？

关于里尔克我还想回头说几句。你谈到了里尔克诗句的结构，特别是当诗行含有在意义上无须强调的词句时，他让这些诗行渐渐弱下去，把它们断开，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贴切。不过同时我也觉得，这个实际上读起来立刻让人觉得陌生，起初引起反感的特征，是同诗人自己的内在意义和内在节奏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人们接受这种意义正因为它们具有主观合理性。我不见得就肯定认为，这些东西完全是“有意而为之”——你显然是这么看的；毋宁说，我相信它们反映了一种无意识和具有主观必要性的反叛，一种对诗韵**形式**的反叛，这种形式是由我们对旋律完整性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我们正是带着这种需要去欣赏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这是试图把具有纯粹逻辑内容的诗尽可能地从十四行诗的要求中解放出来，从下面这种诗中解放出来：这种诗将其内在体验向外导入“自然”之中，然后在那里**被赋予形式**之后再接受回来。

464

里尔克是个神秘主义者，而且就秉性而言更接近于陶勒（Tauler）的神秘主义，而不是迷狂或半色情的〔贝尔纳式（Bernhardinisch）〕神秘主义。他具有完全不受形式拘束的个性，他的诗就是这种个性的产物；不是“他”在作诗，而是“诗”在他的心中自然酿成。他的局限就在这里，但这也是他独具的特征。在我看来，由于这个原因他感到，形式完美的诗歌（例如施特凡·格奥尔格的诗）中诗行节律的完整导致了太多情感内容的损失，尽管任何一种艺术的**形式要求**都是建立在这种放弃的基础之上的。形式的大师在制约和极限中方显本色。里尔克想通过冲破这种诗行的规则，通过使用正确的抑扬顿挫朗读他的诗所产生的那种情感的回荡，尽可能地传达出深层体验中难以表现和不可形塑的东西，即所谓的通过赋予它形式来拯救这种体验。我还觉得，我们的确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这样做是不是使用了一种不再成其为艺术的（即使也许不能完全说是反艺术的）手段？不过，我相信，这不是“故意”诱惑，不是作秀或者是过分考究，而是按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有其必要性的自然结果。

1910年9月20日

韦伯也早就沉溺在格奥尔格的诗里了，并同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一起就此进行过讨论。这些诗高度的艺术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这些诗里韦伯并没有看到格奥尔格的门徒封给大师的那个**宗教先知**——正如他拒绝任何一种对同时代人的个人崇拜，拒绝以任何形式将个人作为“被神化的造物”而赋予他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诗人

465

对于现代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持否定态度，尽管韦伯自己也很尖锐地看到了现代文化的弊端，但他不同意诗人的这种看法，并认为它是徒劳的。

对韦伯来说，诗集《第七枚戒指》(*Der siebente Ring*)中那些时代之诗所具有的贵族主义和对大众孤傲的蔑视尤其令他感到缺乏博爱精神。韦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基督教义深深的敬畏，因此与非基督教的“虔诚”有些抵触，这种非基督教的虔诚把神性在尘世的化身作为存在的最高意义加以崇拜，并把有形式的美，把希腊的美和善的统一(Kalokagathia)视为人类发展的最高标准。韦伯深信精神和道德独立的绝对价值，因而否认他自己和他的同类需要新型的个人主宰和为某个人服务。不错，他可以为一个事业和一个理想服务，为其无条件地献身，但不会为一个有限的尘世之人以及他有限的目标这样做，不管这个人多么出色，多么值得尊敬。

1910年，在与格奥尔格建立私交之前，一个才女的著作使韦伯有所触动，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对于像施特凡·格奥尔格这样一个具有真正伟大特征的现象，要停止讨论并非易事。比如说，与对他的其他诗作相比，我对诗集《心灵之年》(*Das Jahr der Seele*)的评价要高得多，觉得它远不像您倾向于认为的那么“苍白”。在这一组诗作的很多诗里，我想要看到诗人对捕捉到的大量心灵感受的可能性所做的表达，这种表达固然常常在有意识的简洁和升华中消解了，但的确不失为一种表达。

要找到像在这里和有时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的以及在有如“我不容你去……”（《创世记》，32：26）中表现出的艺术力量，那只得追溯到荷尔德林(Hölderlin)了。不难理解，格奥尔格在这些创作中被一种要发前人未发之声的感觉攫住了，就像但丁在《新生》(*Vita Nuova*)里一样，他在风格上也滑入了但丁式的激情。在他心中同样燃烧着能点燃那种熊熊烈焰的火花，这一点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他付出了巨大而艰苦的努力，想把一切都压缩成最为简洁的、常常简约得让人无法理解的表达，这种努力也是那种激情燃烧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人们对他正在发展中的艺术抱有的几点基本的疑虑，与其说是产生于他缺乏艺术才能，不如说是产生于他追求给自己的“使命”所赋予的意义——虽然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在那些您注意到了他缺乏艺术才能的地方，他的表达确实远远未能言其志。

不过在我看来，真正值得疑虑的地方还在于下面这一点：这些诗越长，就越是表现出**意欲**达到某种目的。如果说格奥尔格文学圈子确实具有所有构成宗派团体的特征，也包括这种团体特有的魅力，那么，他们顶礼膜拜马克西敏(Maximin)的方式简直可以说是“荒唐”，因为不管他们使出多大的劲，也无法说出任何东西来让除了同他有私交的人之外的任何人相信这个转世救世主具有神性。格奥尔格、沃

尔夫斯克尔 (Wolfskehls) 和贡多尔夫的诗就是最清楚的证明。这一点无须我加以说明。不过,除此之外的一个事实是,格奥尔格所有新的作品都要求、宣告、允诺和宣传“救赎”。在他的《生命之毯》(*Der Teppich des Lebens*)和《第七枚戒指》中,格奥尔格自己走出了审美的寺院,为的是要(以很多其他禁欲主义者为榜样,作为一个具有审美特征的禁欲主义者)改造和统治这个他起初逃离过的世界。

由此他让我们有权利提出这样的问题:“救赎”——从哪里获得救赎呢?在我看来,剩下的唯一积极目标就是追求**神化自我**,追求在自己心灵中直接欣赏神性。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有两条:要么是销魂的痴迷,要么是静观的神秘主义。在我看来,格奥尔格流派和格奥尔格自己都选择了前者,因为只有这条道路可以让他使用自己独特的但丁式的表达方式。可是这条道路——这是他的厄运——绝不会导向神秘体验(不管人们对里尔克怎么看,毫无疑问,他从完全纯正的意义上了解了这种体验),而毫无例外地只会导向一种迷狂的声音的轰鸣,这种声音继而作为一种永恒的声音出现。换言之,他绝不会导向**实质内容**,而只会导向充满激情的竖琴声。一个保证让人获得救赎体验的巨大许诺被另一个更大的许诺超越:总是有关于未来的新兑票开出,尽管这些兑票显然无法兑现。因为无法再超越这种纯形式的先知了,所以诗人便不断地追求他的预言所假设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是他永远捕捉不到的。照我看来,格奥尔格最近写的组诗让他走进了死胡同。他的门徒[参见《思想运动年鉴》(*Jahrbuch für die geistige Bewegung*)]如果不走上惯常的批判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和类似思想的道路,也会步他的后尘。

467

1910年5月9日

1910年秋天,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诽谤格奥尔格文学圈子的文章。这篇文章激怒了作曲家保罗·冯·克勒瑙(Paul von Klenau),他要韦伯对此发表意见。韦伯写道:

在这样一份杂志上看到 R. B. (Rudolf Borchardt) 这样的文章,令我惊诧莫名。当然,他的观点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在有的看法上我跟他比跟他的对手更为接近,而且他完全有权利以如此尖锐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容。我不喜欢在论辩中蹑手蹑脚。无论我多么高度评价施特凡·格奥尔格与他的学生们的艺术和意愿,可是在决定性的问题上,说到底他们和我侍奉的也许是“不同的神”。这一点并不因为下述事实而有所改变:我确实从内心里感到有必要无条件地、从**纯粹人性的角度肯定**施特凡·格奥尔格以质朴和真正的严肃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使命,肯定贡多尔夫以诚挚和真正的献身精神忠于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宗师。不过这绝不意味着我有义务或者打算赞同《艺术之页》(*Blätter für die Kunst*)和《思想运动年鉴》中发表

的一切东西。任何在这些刊物中受到攻击的人都可以并且应当为自己辩护——以诚实的武器，因为不管人们对格奥尔格的追随者所持的观点有什么看法，我并没有发现他们使用了不诚实和缺乏骑士精神的手段——即使是在我不得不彻底拒绝他们的地方。

不过，R. B. 先生的文章——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理由对他这个人和他的意愿产生反感——必须被视为一次**严重的出格行为**，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南德月刊》居然会予以发表。即便是一个激情达到沸点的人也不能用肮脏的东西作为攻击的武器。而这里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我们最优秀的杂志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不仅仅是这一个杂志本身的损失。激情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人一切行为的口实，但如果它出现在公众场合，它就是一种**客观的**无礼行为，一个对公众来说完全不可原谅的事件。（我很难相信 R. B. 先生主观上有这种卑鄙的意图。）

1910年11月26日

※ ※ ※

当1910年夏天韦伯被告知诗人要来拜访时，他感到有点为难：自己能与这个秉性不同的人找到一座沟通的桥梁吗？可是当他们相见时，一切由格奥尔格追随者们的崇拜所制造的顾虑都统统化为乌有了。这位大师没有丝毫的做作，表现出质朴的尊严和真诚。所以韦伯立刻对这位人物身上的超凡脱俗心生敬重，愿意接受诗人建立在自己创造力基础之上的高贵人性所具有的巨大引力的感召。面对存在的实体，思想和情感的差异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这两个人看起来的确完全不同。他们“体现”了人的两种相反的可能性，他们用迥然不同的工具创造了各自的精神世界：韦伯是通过洞穿整个物质文化的理性，并借助于对现实的直接体验和形象化的创造力来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格奥尔格则是通过在严谨和具有独特风格的语言结构美中加以控制的高度想象力和形象表现力来创造自己的内心世界。两人都对他们的时代充满责任感。可是韦伯按其本身的面目来把握现实力量，即将其作为可以加工铸造的材料，作为一种使命来把握；而格奥尔格只看到现实中邪恶的一面，试图以他的否定来战胜这种邪恶。格奥尔格赋予自己先知和领袖的职责，寻求指向过去的逆转和变化；韦伯明确拒绝这一点。韦伯能够吸取对世界作诗性体验所获得的成果，并以此来滋养自己的心灵；格奥尔格则对通过学术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持拒斥态度，认为这种认识对智力的要求只会窒息他创造性的想象力和对心灵体验的塑造。不过，他所拒绝的那些在书本中通过严格的概念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也许他想通



过同韦伯的直接接触而从源头活水中去汲取。韦伯的确善于在口头交流中将他的知识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他对任何内在体验也都不觉得陌生。多数时候，他们的交谈只是围绕着简单的人情事理，在这方面他们的交流很轻松；有时候他们也会讨论到终极价值和分歧，这时候韦伯就得小心，不要以辨析考证让诗人不知所措。所以韦伯宁愿与贡多尔夫讨论自己对格奥尔格文学圈子的观点所持的异议。玛丽安妮记录下了其中一些交谈：

我们与贡多尔夫讨论的起因是《思想运动年鉴》中发表的纲领性的长篇文章。一个门徒秉承大师的意旨在这个刊物中对整个现代文化发出了革除教门的诅咒，这些现代文化包括理性主义、新教和资本主义。马克斯关于新教伦理的著述被用来作为新教产生机械化影响的证据。“开明”、不遵从权威和信奉上帝的现代妇女也被作为阻碍英雄产生的“首恶”之一而受到谴责。一连多天，我们都在同格奥尔格要求的对当代的一切加以诅咒的观点做斗争。在同贡多尔夫的讨论中，我们很快确定了产生不同立场最深刻的原因。格奥尔格文学圈子拒绝把伦理自主作为教育理想，拒绝承认个人灵魂具有的价值。臣服于英雄的权威，女人服从男人，这就是他们的“信念”。格奥尔格要求渺小的人物要从根本上臣服于伟大的人物，他把后者理解为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较大成就的人。就像贡多尔夫在他那篇题为《楷模》的文章里明确指出的，格奥尔格放弃个人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以寻求从主观主义中解脱出来。我们则肯定个人拥有让自己尽可能地得到发展的权利，并且相信，如果心灵让一个陷入迷误的人来为自己制定规则，如果心灵意识到那个人是错误的，但仍然牺牲自己的信念，那么，心灵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不同信仰之间真正的冲突开始之日，正是另一方开始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之时。照我们看来，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遵从神的戒律，并且在遵从从神的意志中变得伟大；但是，如果他让自己的良心从根本上顺从于一个尘世的因而会陷入迷误的“英雄”——不管这个英雄有多么伟大，那么他就不可能变得伟大，更不用说顺从于其他尘世之人了。

470

12月1日，星期五，马克斯和贡多尔夫做了一次即兴长谈。他们一直谈到了带根本性的问题，最后终于由此建立起了一种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需要建立的那种坦诚，同时贡多尔夫又不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因为是他自己吹响了开始战斗的冲锋号。尽管他坚持己见，可是他非常谦虚，我们和他的友谊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在很多地方赞同格奥尔格的追随者的看法。诸如赞同他们渴望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渴望从自我崇拜中得到解脱；赞同他们寻求心灵结构的新形式和寻求新“法则”的努力。然而，支撑他们学说的基石是，将尘世的人加以神化和建立一个以格奥尔格为中心的宗教（正如贡多尔夫顺便提到的，现在这已经是这个圈子的意图了），这在我们看来是那些不能完全胜任当下现实生活的人的自欺欺人罢了……

星期一，大师自己也来了。我猜想他希望见见我们两人，鼓起勇气就来了。我们相见甚欢，末了大家都兴致勃勃。我们谈到了格奥尔格·西默尔和格特鲁德·西默尔，谈到了女性的特殊敏感性，谈到了一般女性问题，然后格奥尔格一度似乎想要讨论“纲领”。不过，对此我们心里感觉不太踏实，于是便开始谈论巴黎、基督教、新教和主观主义。至此我们已经到了现实问题的门槛，当格奥尔格想要用马克思的观点为自己反对现代妇女的观点辩护时，马克斯毅然跨入了这个门槛。格奥尔格梳理成波浪发型的狮子一般的头颅凑近我，低垂的眼睛射向前方，问我道：“您相信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他们自己的法官吗？”——“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使他们为此做好准备。”——“那您希望成为您自己的法官吗？”——“不错，这是我们的希望。”然后我们展开了朋友之间的争论，也许他在我们的“褻渎”背后确实感到有一种信仰。不过尤其美妙的是，他着意要拔掉《思想运动年鉴》中那根羞辱人的刺，并且能够超越我们与他之间的基本对立，致力于保持友谊。他甚至说，我们误解了一切，他针对的并不是我们。这一点我当然只能理解为他友好感情的表示，而不能当“真”。他在我们那里待了两个钟头，当贡多尔夫来接他时，我们相互之间感到比以前更近了一层。也许人们仍然有办法让他不那么僵化死板。对这个人的印象仍然在我们脑海中萦绕，这是一个把诗人的职业视为履行先知职责的人。他这样做对吗？不过他的意愿确实是伟大的。

471

1911年12月

前天施特凡·格奥尔格再次来访。他来这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一直没与我们联系，所以我们心想他是不会再来了。是不是与秉性相异的人接触对他来说震动太大了呢？不过他还是来了。高兴之余，我们感到，作为个人，我们对他有那么尊敬。我们坐在井泉边爬满常春藤的花园山洞里，这次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而又亲切。他比平常更加畅所欲言，谈吐精彩而深刻。其中有的内容源于尼采，诸如将恶视为普遍原则，你无法靠软弱的手和精神武器来战胜它。他还谈到战争对人类的英雄本色而言是一件幸事，以及斗争在和平时期的卑劣；谈到了世界日益增长的和平安宁造成了我们的麻痹和衰弱，让我们连一只鸡都杀不了。他也承认自己无力从事这一勇敢的行为。然后他谈到了奥赛罗和雅戈（Jago）以及他们的“宇宙”意义。我觉得奥赛罗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可怕的人物，他几乎可以说有一颗极度冷酷的心。我这种观点在格奥尔格看来是一种纯心理学的、错误的和女性化的观点。“小姑娘哟，小姑娘！您必须从宇宙意义上来理解它，而不是把它作为个人命运来看待。”

我们谈到了现代人之间日益增长的思想斗争所具有的重要性，这种思想斗争也许创造了精神而不是肉体的英雄主义，这时他说：“罪过啊，罪过！您想要继续把

一切都变成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却摧毁了肉体。”他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恰恰是他自己其实最需要高山流水的和者，而不是那些古代勇猛无畏的杀手。然而“观点”是什么呢？我们禁不住喜爱的是他身上表现出的热情、通达人情和充满力量的东西。在他身上，除了那些查拉图斯特拉观点之外，还有更为广博的东西。

472

1912年6月

不过，诗人对秉性不同的韦伯的好感以及对后者无拘无束的态度并没有持续下去。除其他原因外，对世界大战不同的理解以及对德国人的态度看法相左，都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尽管战争是一台没有人情味的可怕的屠戮机器，但韦伯同时也看到了战场上和在后方英勇无畏的伟大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他亲身体验到了，人民普普通通的子弟是如何为自己并不完全理解的目标而奋斗的，他们是何等地驯服，他们的忍耐又多么令人震撼。在他心灵中燃烧着对艰难困苦中产生的伟大和美好带着敬重的热爱。世界大战在诗人心中激起的反响却不同。对他来说，世界和德国人民的悲剧是他们“累积下来的罪恶”应得的结果。

……累积下来的罪恶

被世人称作强迫性冲动和幸运，人  
悄然蜕变成了幼虫，要求得到救赎

……

应尽的义务仍然黯然而缺乏光彩  
堕落的时代何谈牺牲

……

格奥尔格再也没过来了。

※ ※ ※

与此相反，另一个可爱的人则仍然每年都来造访，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瑙曼。与格奥尔格不同，他是韦伯的朋友中置身于当前现实斗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玛丽安妮写道：

他们二人是两个极端，我很高兴对两人都有所了解。假如我们必须在他们二人中选择一个建构生活的力量，那我们可能会选择瑙曼，因为他兼有博爱所具有的洞穿世界的力量和强烈而灵活的现实感。不过，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做这种选择，

在我们的心灵中，艺术家的福音与社会关怀完全能够和睦相处。的确，要让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力量在心中同时各占一席之地，显得有些矛盾；但在二者的张力中感受生活的丰富性，也有其美妙之处。

473

1912年，瑙曼失去了经过无数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议席。在他那个选区，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政治所造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人民再次拒绝追随这个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从人性的角度讲，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产生的唯一伟大的领袖。韦伯夫妇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担心，瑙曼经过艰苦努力好不容易获得的政治影响又被剥夺，会使他的神经和心灵遭受严重打击。他生存的整个基础似乎已摇摇欲坠。因此，当瑙曼败选后旋即来访时表现出毫不气馁，安之若素时，韦伯夫妇就更加感到惊讶和快乐了。

瑙曼在我们这里待了两天。以前我们极少像在他败选后这样强烈地感受过他朴实无华的伟大以及他的力量和充实。他是刚在海尔布隆（Heilbronn）进行完各种告别活动后来我们这里的。我们原以为将要见到的是一个疲惫和悲戚的瑙曼，然而，他却以一种极高贵的姿态超越了自己。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同时以美好的博大胸怀对待人世间的一切，并且通过融合艺术家的情感和艺术家的创造力而丰富了自己。毫无疑问，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对他的心理产生了某些限制性的影响——他对单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他看到的只是经济和社会力量，只是大众和人民。

※ ※ ※

韦伯夫妇还结识了一些在那个时代声名鹊起的东欧哲学家，他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匈牙利人卢卡奇（Georg von Lukacz），韦伯夫妇和他成了密友。卢卡奇当时正在进行一项美学研究，这项研究是他未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期望以此为他的学术生涯铺平道路。韦伯对此做了深入探讨，做了如下评论：

对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确信，这样提出问题绝对是正确的。人们先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近来又从创作者的角度研究美学，现在终于让“作品”本身来说话，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我很想看到您的形式概念出现后情形会怎么样。毕竟，被赋予形式的生活不仅止于那些超越了体验的价值因素，即便是在意识的“监狱”里最深、最边远的角落里出现的那些性因素也被赋予了形式。它们与其他所有被赋予形式的生活一起承载着负疚者的命运；它们反对一切来自“不具形式”的神

的王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甚至跟审美行为很接近。性因素的地理位置必须确定，我期待着看到它们在您的体系中的位置。

474

给韦伯留下持久印象的还有卢卡奇的一篇论精神的贫乏的艺术作品，这篇寓意深刻的作品承认，能够产生救赎效果的爱情所具有的创造性力量有权利突破伦理规范。

末世论希望超验的上帝派来一个新的使者，这种希望打动了这些青年哲学家，他们从建立于友爱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看到了得到拯救的前提条件。卢卡奇把世俗文化的美妙，尤其是具有审美内容的世俗文化视为对神的挑战，视为同上帝的影响力进行路西法式（*luciferische*）的竞争。不过，这个领域应该得到充分发展，因为不能减轻个人在它与超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难度。上帝与路西法（*Lucifer*）之间的最后决战还未到来，而这将取决于人类的决定。终极目标是从这个世界中得到拯救，而不是像卢卡奇和他那个圈子的人所认为的，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实现。

这些人的精神氛围重新刺激了韦伯对俄国人本来就有很强烈的兴趣。他早就打算写一本关于托尔斯泰的书，记载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体验。海伦妮和玛丽安妮非常关心这个计划。他想要为她们而写这本书。但其他已经开始的项目不容他有剩余的时间来写这本书。不过，他喜欢不时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胞们接触。

前天我们相当放任不羁，在咖啡馆里坐到凌晨三点。正是你儿子让我们着了迷，他听不进唠唠叨叨的妇人的任何理性劝告。事情是这样的：俄国学生庆祝阅览室的五十周年纪念日，邀请到韦伯（他曾经经常使用这个阅览室）在庆祝晚会上讲话。就在晚会的前一天，他觉睡得不好，原本想要取消自己的这次活动。可是这一次我却不想让魔鬼的捣乱得逞，没让他取消。庆祝活动很有些奇特，人们身着舞会装束，有三个严肃的演讲、一个没完没了的音乐节目，舞会大约在深夜一点钟开始。可惜马克思不得不中断他的讲话，因为时间太晚了，同时也因为他有顾虑，不想在舞厅里讲一些深奥的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又重新在这里做一个事先确定下来并承担了义务的公开演讲。他有点累，不过他仍然努力完成了一个力求完美的演讲。非常可惜，他在讲到很关键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他又变得兴致勃勃，又健谈起来，我们在咖啡馆里与我们的哲学家们一起坐到凌晨三点。

475

1912年12月21日

※ ※ ※

不断有新人加入到年轻朋友的这个圈子里来，他们多数是希望同韦伯交流思想的年

轻学者。因此，韦伯在考虑如何才能做到既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自己又不至于损失太多的工作时间。韦伯夫妇很愿意敞开这栋美丽住宅的大门，可是韦伯的身体状况并不稳定，这迫使他不得不注意别让自己体力消耗过大。所以，他们决定，在学期中每个星期下午他们家向年轻的朋友们开放，尽管他们也有顾虑，担心韦伯能否经受得了这样的束缚。年轻的朋友们很高兴，立刻纷至沓来。可是他们相互并不熟悉，传统的德国社交方式让他们显得木讷寡言。韦伯夫妇自己也不擅长社交场合的交谈。韦伯感兴趣的只是重要的思想交流或者亲密的私人交谈。若仅就一些介于学术和人事之间的事情轻描淡写地玩精神游戏，韦伯就跟以前在舞会上或遇到调情时那样显得笨拙。

所以，第一个“周日”聚会进行得相当吃力，一个个茕茕孑立，融不到一起，也没有关于基本问题的交流。直到一半的人都离开以后，韦伯与贡多尔夫之间才有了一场才气横溢的生动交流，内容是尊重历史的文化建构问题。贡多尔夫认为，历史的文化建构只是在一个自身缺乏创造力的时代仅作为一种临时代用品才有保留价值，他自己倒是宁愿将其砸碎。客人们终于离去之后，韦伯愤怒地将自己房间的门砰然关闭于身后：“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为了说话而说话，难以忍受，又不道德！”是不是还应该再试一次呢？不过，第二个星期天就完全活跃起来，并有了家庭气氛：“这一次我们放心了。当人们相互熟悉起来之后，在人比较多的情况下进行有价值的交谈不再让人难受的时候，这种形式是可行的。尽管这样，与我们关系更密切的朋友们在平日里也仍然来访。”

476 从那以后，这样的聚会几乎总给韦伯带来快乐。这的确是他在一个较大的圈子里让自己丰富的学识定期得以倾泻的机会。他无须为单个的客人费心，但是对于最年轻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他也像对待重要同事提出的问题一样表现得态度友好而又兴趣盎然。作为聚会的主心骨，他坐在大房间的某个角落，任由人们从他那里汲取学识。多数时候，所有的人都愿意倾听他所在的那个角落里在讨论些什么，所以只有当韦伯偶尔缺席的时候，才会有大家都畅所欲言的讨论。“我确实让这些人感到有压力”，这是韦伯自己的解释。只有像贡多尔夫或卢卡奇等几个客人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好，以至成为独立的关注焦点。

在这原是为年轻人而设的聚会形式确定下来之后，韦伯夫妇也邀请了与他们同龄的朋友来参加，这些朋友心态都仍然年轻，不会给年轻人造成心理压力。于是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每一根琴弦都被拨动了。常常还有从外地来的朋友丰富星期天聚会的内容。有几次是格奥尔格·西默尔和格特鲁德·西默尔给聚会的气氛定了调子。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特奥尔多·豪斯-克纳普（Th. Heuß-Knapp）夫妇有时从海尔隆过来；两个政治经济学家——阿尔特曼（Altmann）教授和妻子伊丽莎白·戈特海涅（Elisabeth Gottheiner）常常从曼海姆过来；另外还有非常崇拜韦伯的生理学家 E. J. 莱瑟（E. J. Lesser）和他从事艺术工作的妻子，她也是前辈学者弗里德里希·克纳普的女儿。

有时候他们采用迥异的聚会形式，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纽带只是德语而已——不得不相互交流。

星期天璠曼来了，我怀着很难受的心情独自接待了我们的其他客人。后来他们二人终于屈驾光临，慷慨地给我们散播一些思想的光芒。我们成功地让璠曼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故事。一个犹太哲学家新秀碰巧在那里，这个年轻人头上有一大绺黑发，也有同样大的自信。他显然自视为新弥赛亚的前导，希望别人承认他是这样一个前导。他从自己对世界末日的推想出发，居高临下地向璠曼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璠曼非常和蔼，不过他显然感觉到自己所应对的是一个有点疯癫的人。

他们的年轻朋友中有很多犹太人，犹太民族的问题常常被毫无顾忌地提出来讨论。从给莱瑟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韦伯与莱瑟讨论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一次“重要交谈”的余音，其中韦伯承认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可能性，但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犹太民族心灵中的问题。他在下面一段话中表述了自己认为解决办法在何处。

477

犹太教，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有一个**极为**具体的“希望”作为内在前提。一个有利可图的殖民地、一个拥有自主权的小国、医院以及好的学校将会被认为是“满足”了那些巨大的希望呢，还是在更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那些希望的批评呢？即便是有一所大学又能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希望的**意义**——它与移民区的经济目标完全不同——在于，犹太人借助于这个远古圣地的存在和通过对它在精神上的占有而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重建自己的**尊严感**：就像流散在外的犹太人曾经在马加比王国（Makkabäereich）抗击塞琉古（Seleukiden）世界帝国的独立战争之后，借助于马加比王国而维系自己的生存一样；就像世界各地的德国人借助于德意志帝国和伊斯兰借助于哈里发（Khalifat）而维系自己的生存一样。然而，德国是（至少看起来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哈里发王国仍然拥有辽阔的领土。可是今天的犹太国在最佳境况下能是什么样子呢？有一所只能提供与其他大学同样内容的大学又如何呢？的确不能说它无所谓，但也不能将它与古老的**圣殿**相提并论。

那么，主要缺乏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缺乏的是圣殿和大祭司**。假如在耶路撒冷（Jerusalem）有**圣殿和大祭司**，那么其他一切就是次要的了。不错，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要求有一个教皇国，即便这个国家的版图是最小的。然而，即使没有这么一个教皇国，这位天主教教徒也会在这样的基础上（没有教皇国就更加如此）增强自己的**尊严感**：身居罗马的那位政治上毫无权力的教皇只做两亿人纯粹精神上的统治者，要远远甚于做意大利的“国王”，并且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假如有一

个世界上 1 200 万人口（他们反映了犹太人到底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的祭司长，那他对于犹太人的尊严感来说当然会具有真正的重大意义，至于他们信不信教则无所谓。可是撒督（Zadok）的后裔在哪里呢？在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正统派——他们会服从这样一位祭司长，他（按照律法！）能被允许享有教皇在每一个教区和主教辖区所享有的重要性的十分之一——呢 [而教皇享有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依据对行为举止的规范（disciplino morum）和普世的主教职权，而不是依据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绝对正确性]？今天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那种真正关系到犹太民族同时又与宗教前提紧密联系着的价值；在我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真正的问题是与此一事实联系在一起。

1913 年 8 月 18 日

※ ※ ※

日常生活中的担忧好像与韦伯圈子里的人们完全无缘！他们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安稳环境中，为自己身为一个欣欣向荣和受人尊敬的国家的公民而自豪。然而，他们并没有自满自足，而是不断地争取获得丰富的内心生活，并且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应当深深感谢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种具有高度张力的生活的那些社会阶层的人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内心的自我发展，或者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其中几乎一半的人都在从事著述。显然，对于丰富的德国知识界来说，除此之外几乎很少有别的表达和创造形式。他们中的一部分妇女也在通过写作和艺术创作来实现自己。他们在自己创作的同时还拨出时间来沉浸于朋友的作品中。同时我们也有其他一些可爱的活动来点缀严肃的创作。1912 年韦伯在给海伦妮的信中写道：

昨天“两面神”聚会在这里进行。玛丽安妮讲了希腊的婚姻问题，讲得很精彩，讨论很热烈。今天是我们“接待来访者”的日子。那些旧房间在长时间的孤独之后会感到纳闷，不过我相信它们会高兴，因为这让它们物尽其用。此外，五个工作日中我们平均每天都会有一个人来访。这当然会消耗我用于工作的精力，可是我们应当放弃这样做吗？

※ ※ ※

不过，星期天的这些聚会有一个方面并未达到其目的。工作日里继续有人来访：星期天的聚会难以打发老朋友们。的确，有些熟人星期天常来聚会，因而获得了与韦伯夫



妇单独会面的权利；而韦伯夫妇在自己的工作里如果没有几个小时的私下思想交流的点缀，也已经不堪设想了。一般情况下，韦伯夫妇只有在晚上才能彻底清静下来。尽管如此，有时候这些来访还是太多了，尤其是当他们不得不一连几个星期把陪伴那些来访的可爱的亲戚列入每天日程的时候。

479

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宁，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些对我们提出这么多要求的人有些冷酷无情。今年夏天人们成群结队地来访，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已经记不清各次来访的纷繁印象了。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在炎热的夏夜里总是与不同面孔的人一起坐在梓树下，有时候有中国的灯笼和特勒尔奇年轻的朋友马格（Maag）伴着琉特琴的美妙歌声。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把我们追来赶去，越来越匆忙，越来越无情。不，我们不会让别人这样对待自己。让各色人等蜂拥而至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此疲于奔命又是为了什么？与较少的人交往而让交往更加深入一些难道不是会更有成效吗？给少数人很多东西难道不更甚于给很多人一丁点儿东西吗？

如果晚上睡得好，韦伯现在大约在早上七点半起床。不过他常常要睡到半晌午才起床，以保证他能有总共七到八小时必不可少的休息时间。玛丽安妮保护着他，让他早上睡好，但却并不知道他晚上睡得怎样。他有时候在床上，有时候则是在吃早餐时看信读报。他以“对角斜线”的方式看报，也就是说，他试图将整页报纸的标题一览无余。然后他从容地开始工作。一旦他扎进去了，尤其是在他自己的著述中，外界的一切他都毫不在意，完全不受干扰。他的主要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半，吃午饭之前要到外面待一会儿。午饭很准时，他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用完午餐——以前家里一大家子人吃饭时间较长，让他很不耐烦。午饭之后他小睡一会，然后立刻喝茶清醒一下，便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工作到有人来访，没人来时便工作到傍晚。这样他花在学术研究时间上的时间是五到六个小时。公务上的信件往来大多数时候是在特定的日子里完成的。晚饭后，他通常必须得进入完全的休息状态，有意识地关掉自己的思维机器。

韦伯在生病前能够一直工作到半夜，然后进入深睡眠，现在听起来这简直像是个童话。他现在只是在屋外和妻子房间的沙发上出神。他们都很安静，只是偶尔交换一些亲切的话语。他在十点钟就寝。多年来，为了使第二天工作起来精力充沛，韦伯晚上都坚持严格的作息制度。只是在旅行途中，他才被允许即兴而为。回家以后，他可以有时在晚上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去会朋友。经过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他会抽着雪茄在大厅里坐很长时间，让自己安静松弛下来。

480



1911年夏天尤其快活，天气热得爽性，热气蒸腾前所未见。草地干枯，水果都干瘪了，从树上掉落下来。然而，微微的南方灼热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愉快生活。尽管人们都很清醒，但所有的努力追求都松懈下来，斗争停止了。韦伯一直渴望暖和，此时得到了满足。他白天工作，然后在黑黝黝的凉爽的后花园里度过漫长的夜晚。白天在常春藤中酣睡的萤火虫跳起了像星星一样闪亮的圆圈舞蹈，夜空中闪烁的星光穿过树枝照射下来。从一个年轻人的口中传来了悦耳的古老民歌：“有一个收割者，他的名字叫死亡……”韦伯会自己唱起这首歌来，并在他们新近购置的钢琴上找寻它的旋律，直到自己的心灵被唤醒：

过去十天以来一直很宁静——像是一次休假。没有人来，也没有紧迫的任务。只是阅读、梦想、写作，伴之以阳光灿烂的夏天。在紫叶欧洲山毛榉树荫下的草坪上，围成花环状的秋海棠现在真的争妍斗艳起来，梓树下盛开着倒挂金钟。夜晚后花园的人造山洞里地上放着的防风灯，从下面将灯光星星点点地洒在梓树树枝和藤蔓攀缘的凉棚顶上，屋后的黑暗拉开了幕布，让一束黄色的灯光从窗户里照射出来——这一切让人感到置身于黑幽的森林深处，傍着一栋童话般的房屋。在心灵的深处，新的创造力量正在逐渐聚集起来。……

昨天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天，非常美妙。早上柔和、珍珠般的薄雾罩着熟悉的万物，让它们沉浸在一种奇特的静谧之中。时间屏住了呼吸。丹青色的福祿考花在长得高高的灌木丛中迷梦般地摇曳，带着一种温柔而又充分享受的极乐。下午我们两人一起坐在后花园里。骄阳施威，让一切又回归到现实中来。可是得到满足的感激之情仍然保持着。我们快乐吗？我相信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感到快乐和心满意足，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夏日之梦的美就美在心满意足。

481

我们在阳台上的梦境中度过月夜。梓树花香溢满整栋住宅。夜空中的银盘在山坡上的冷杉后冉冉升起，将一条光带抛向正在缓缓流淌着的漆黑的河流。那个小小的泉源在娓娓动听地闲聊着。海德堡那座废墟幽灵般地矗立在夜幕中。尘世的重负消失了。世界的奥秘在心灵中轻声低语，这些心灵在为一切伟大和美好的东西能否永恒存在而担忧，在渴望着自身的永恒。可这是人所不能得到的。“唉！为什么你们众神全都不朽，无一例外，而唯独我们的幸福是有限的？”

## 2

这一段时间里（1911年），韦伯的老朋友圈子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格奥尔格·耶利内克去世了。之后不久耶利内克的女儿结婚，韦伯给孩子们描绘了他朋友的一幅很精彩的画像。就像他在其他庄重时刻写的类似的东西一样，韦伯在这里也无意中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征。这两个人的秉性极不相同，可是韦伯关于自己朋友的幽默足以征服世界的那些话，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我把他的讲话记录在此，以作为对二人的纪念：

《旧约全书》开篇谈到婚姻时，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一对伴侣要一辈子结为连理，就得永远离开他们的父母。从外表上看来，事情确实如此，而且在内心里一开始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当幸福走向她时，她正处在自己完美人生朝气蓬勃的清晨，出奇地美丽，好像能够改变一切，能够将过去的一切遗忘。现在两人都在为了对方，并仿造对方来塑造自己，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全新命运；这个命运掌握着那个年轻的生命，对其加以形塑、施加影响，将其变成一个独立的似乎脱离了过去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壤的人类命运。然而，“按照你人生开始时所遵循的法则”（歌德语），我们被赋予的禀性，是不会那么轻易就失去的。

根据人们各自的特性，命运的实现在不同的人那里会不尽相同。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父辈那里情形是否跟我们这一辈相同：在我们之间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大概都不一样。如果我对我们这位年轻姑娘没有看错的话，那么她就会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除继承了其他很多秉性之外，还继承了命中注定的美好的沉思冥想的秉性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内在需求。我常常在与此相似的人们身上看到，在一个年轻姑娘的生活和婚姻的发展中，在她陶醉于自己巨大幸福的时候，不管是早是晚，她在某个时候总是会经历奇特的孤独时刻，无论是丈夫对她还是她对丈夫的深深的爱都无法消除这种孤独。这种情况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总是有什么东西会以看不见的手向她伸去：自己的本性、家乡以及一切过去对她允诺和强加在她身上的东西。然后她似乎又慢慢地回到自己的本性和之前的人生经历：“你不得不如此，你无法逃避你自己。”（歌德语）我实现了秉性赋予自己的潜力吗？而那又是什么？父母的家庭遗产和传统又给了我什么东西？一个外人也许可以提醒这个家庭的女儿她将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应当到此为止，因为他没有胆量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也许可以尽可能证实，这个女儿的父母过去和现在对他这个外人意味着

482

什么。

请允许我在这里首先对今天我们看到的披着遗孀面纱的女士表示深深的敬意，这种敬意正是多年来将我和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她强烈渴望明晰和真理，坚决拒绝半途而废和妥协，努力做出明确的决定，她对自己的人格抱着骄傲的自信——所有这些都根植于一种强烈而严肃的尊严感（这里“尊严”一词完全不局限于它通常的意义），根植于她彻底摆脱了对人的一切恐惧。处于身边的悠悠万事之中，这一点总能让我精神振奋。这给了她以内心的自信去面对生活和生活的安排，也去面对痛苦和死亡。

483

最初，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今天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人在很多方面都迥然不同。我十四年前应聘来海德堡时，我来自一个有些复杂的环境。基于以前在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想自己进入了一个复杂得多的环境中。按当时的情况，我尤其觉得自己同我现在正在谈论的这个人的关系会复杂得多。与此相反，我今天站在这里满怀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这位那时候比我成熟得多的长者给了我少有的友谊和对朋友的忠诚，即使在那些我自己在思想上没有能力给别人提供任何帮助的困难时刻，这种友谊和忠诚也始终不渝。这种友谊让我谈起他来的确感到很困难，因为它把他的形象跟我的眼睛贴得太近了。

我很快便意识到，这个人能够与个性极不相同，有时甚至是最难处的人保持持久而又坚实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对他们是有意义的。这里我只略举两人为例，他们是秉性迥异的埃尔温·罗德（Erwin Rohde）和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从最广泛和最好的意义上讲，耶利内克是一个善于调解的人，总是倾向于同别人友好相处，对别人做出让步，从别人的不同立场去看待人和事，现实地考虑问题，小心谨慎地权衡方法、结果和所有的顾虑，不喜欢片面和带偏见的决定和观点。然而，这位天生的学者就其性情、行事的方式和他的局限而言肯定不同于她——那位雄心勃勃地代表自己那个性别的利益的人，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与她却完全一致。俾斯麦曾谈到，必须得抓住他那个年迈的皇帝佩剑上的缨带，才能让他立即做出反应。这也适用于这个看起来极度迁就和谨慎小心的人。

484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一个所有的教授都曾抱怨，并且现在仍在抱怨当局的干涉，却并未采取任何严肃应对措施的时代，这位身无长物的人却是少数几个在受到无理待遇时将教授头衔扔回给政府当局的人。这一点恰恰说明，事关个人尊严的时候，正是能够让他从调和态度转向义无反顾地绝不退让的关键时刻。他也尊重别人的尊严。在他那里，我听他诙谐地谈论过一些出类拔萃的学者，但从来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而这后面一点正是教授们的一种惯常的恶劣做法。因此，他也要求自己享受这样的尊严，并且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也要求自己的成就得到承认，并且并不

讳言自己精通本行。

他确实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这个圈子并不是将他作为学者来谈论的场合。不过，尤其是我也许应当指出，在命运让我能够完成的著述中，他的重要著作给了我多少重要的启发。这里我只列举几个细节：在方法论问题上，他在《主观公法体系》（*System der subjec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中将自然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区别开来；他提出了“社会政治学”（*sozialen Staatslehre*）的概念，澄清了社会学模糊的任务；他提供了“人权”起源中宗教影响的证据，从而启发了人们在他们起初根本没有进行过探索的领域去研究宗教因素的影响。在此还请允许我指出，与很多其他人一样，我始终认为，这是我们在人事上一种很特别的“愚蠢”所制造的产物：作为一位在他的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一个完全以独特的方式代表自己学科的人，一个年复一年地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优秀学子的人，他却被排除在他理应得到的最高级职务之外，以致他教学的天才所表现出的伟大艺术无法产生广泛影响，而只能被局限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大学里——毫无疑问，这让该校从中受益，也让我们这些当地朋友感到快乐。

他克服了这种恼人之事，因为在这个人（他自年轻时起就得克服各种生理和情感上的障碍）的性格中有幽默，一种他所特有的幽默，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我们应当明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他的“诙谐”，尽管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诙谐风趣的人。任何人只要听到自己讲述的那些故事经他之手雕琢成玉，流传开来，而后又得以重述的时候，都会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这个领域里拥有高超同时也是纯形式的艺术。在仍然活着的人中，我知道只有阿尔弗雷德·多夫（Alfred Dove）的诙谐〔听说约瑟夫·翁格尔（Joseph Unger）也同他秉性相同〕在这方面可以与我们的朋友相媲美。这是一种最为纯正的诙谐，严格地剔除了一切“不相干”的东西，将蕴藏在一种情景或者某种思想组合中真正属于风趣的东西提炼出来，然后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整体。

485

不过，我们这里谈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幽默（Humor）并不是简单的诙谐风趣（Witz）。塞万提斯不是一个嘲弄者——我正在谈论的我们这位朋友的精神特质与塞万提斯意义上的荒诞有相似性，当人们面对现存世界的限定而想要实现自己的纯意念时，这种荒诞就是那种纯意念不可逃避的命运。然而，这样一种“幽默”在其最高、最美的表达中使一个人获得对整个人生最终可能采取的态度之一。我们的行动和遭受的痛苦毕竟交织着充满意义和毫无意义的因素，从而构成了“命运”。他通过抓住生命中这个终极的内核，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最精美意义上的真正的幽默赠送给我们的是一种由衷、健康、善意和舒心畅快的笑，远离了一切嘲弄。这也正是我们的朋友在他状态好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在它背后并不是今天又变

得时髦的“浪漫主义反讽”，因为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夫人身上都没有浪漫主义者的血脉。在这方面，他根本就不是根植于我们充满朦胧幻想的北方，他在内心的最深处具有“古典的”秉性。像他那样充满着对清晰的渴望——这也在他妻子的性格中打下了烙印，尽管其形式完全不同——他的故乡也许应当是在雅典广场。

此外，还有最后一点。他的出身和家族传统传继给了他一种从温柔和纯洁的东方情感世界飘向我们的优雅芬芳。这里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他性格中最核心的人性所具有的伟大的纯洁和善良，也不仅仅是他的精神那颗闪光的宝石是如何镶嵌在他的品质这块纯金之中的，他的这种品质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作为人你深感于心然而又无法言说的愉悦。我们想到的更是那种心灵面对世界所采取的独特而又信心十足的态度，这是一种在各种情绪起伏之后始终又恢复平衡并保持这种平衡的态度，我们可以按古代东方的意义把这种态度称为“人生智慧”。当他的内心处于完全平静的时候，当他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他的身上就会放射出那种人生智慧的温柔之光，我所理解的他那种“幽默”中的极品就出自这样一个源泉。如此看来，这种幽默不仅是我今天在这里已经提到过的那种令人麻木的日常生活的主宰和战胜者之一，而且也是这样一种形式：它使我们能够意识到，人类尊严甚至无须向强大的神力低头。

这种幽默也为这样一种美好地结束了的幸福婚姻做出了贡献，使它能够从第一天起就一直保持在那种美好的高度，直到迅速、美好和不失尊严的死亡将它结束为止，而且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结束的，即在疾病和衰老还未抹去那位年轻人容颜的光彩之前。这是一种他看到并接受了死亡，令我们羡慕，因为我们这些人今天已经完全忘记了如何带着尊严去面对自己的死亡，去接受别人的辞世。假如我们今天在这里带着悲伤和颓丧的情绪停留在因他的逝世而失去的东西上，那么这不符合他的心愿。

# 第 14 章 旅行散记

## 1

即便是在这些年里，旅行对韦伯来说仍然必不可少。如果说他在神经失调的时候不时威胁说要搬回位于主要街道上的三居室公寓，那么困扰他的问题可能正是，他们是否还有余钱以敷旅行之用。他精力的巨大消耗以及一直仍不稳定的工作能力，都十分需要定期离家外出放松。“大量的晚上聊天使他身体遭到了报复。马克斯睡眠不好，情绪很坏，神情沮丧。这意味着，他个人能量消耗太多，以致不敷著述之用。他必须再次走出家门，以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目前状态引开。”当太阳老躲在云层后面不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在春天，韦伯就仍然会谈及将来移居意大利的计划。除了不时出现的脑力衰竭之外，他如此躁动不安的原因也许在于，他需要不断用新获得的印象来冲破日常生活的平淡，这种日常生活没有让他承担足够多的责任重大的行动。他常常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庆祝冬天的结束，现在多数时候都是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在那里逗留的日子主要是为了聚积新的力量，而不是获得新的感受。他有时候也做一些生理尝试，诸如禁食、饿自己一段时间，以此来观察在自己身上的效果；他也许还想确认自己能够不依赖于物质需求和日常习惯。

下面是他来信的部分摘录，记录了他在南方的一些经历：

我乘坐前往萨尔扎纳（Sarzana）的驿站马车穿过无边际的橄榄种植园，它们覆

盖了这里的一切，一直延伸到与马格拉（Magra）平原相接的大海湾。这个古老的偏僻小镇本身除了一个内部很漂亮的哥特式大理石教堂外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越过桑树林、葡萄园、绿油油的菜地和粮田放眼望去，阿普亚尼亚（Apuania）境内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倒是很壮观，以前我和母亲在菲耶索莱（Fiesole）时，从那里往最右面看出去，看到过最北侧矗立着的阿尔卑斯山脉的这一段。然后再乘马车前往马格拉河的出海口，回程则是乘船穿过小丘陵地带。大海对你来说也许太过于躁动不安了，不过云层低低地压在海面上，呈绿色和白色的浪峰永不停息地汹涌澎湃着，倒也不失为美景。随后可以看到挂着红、黄、白三色船帆的五彩缤纷的捕鱼船队归来，非常漂亮。船队后面停靠着的是庞大的战舰，黑黝黝的不成形状……

昨天下午我乘一艘帆船去了波多维内尔（Porto Venere），去时旅程很美，棱角犀利的细小海浪的浪尖上腾起白色水雾，船身就穿行在这水雾中。但回程风更为强劲，水手有些害怕，便把帆船系在一艘空载货轮上，弄得这艘小帆船在大浪中前后颠簸，船上的人都泡在咸咸的海水里，回家时浑身都湿透了。……今天又刮起了强劲的干热风，暴雨如注。太阳时隐时现，天气也随之变换着，一会儿暖，一会儿又冷起来。海浪卷入了港内，一直涌上了大街，汽船东倒西歪地使劲摇晃，战舰停靠在拉斯佩齐亚（La Spezia）军港深处。美丽的绿色浪峰覆盖着大海。所有的山都近得似乎触手可及，所有的颜色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所有的鸟儿都没有一点声息。绿色、黄色、紫色和鲜亮的蓝色交织在一起主宰着色彩的调配，大海在港口里现在像是发了疯。

1910年4月2日于莱里奇（Lerici）

※ ※ ※

非常感谢你的两张明信片。每次早上我拿到床上来看时，它们都给这个房间带来一小束光芒。这里没什么新鲜事，睡眠一般。我右边的房间里住着一个德国人，他在深夜十二点半睡觉前刷牙弄得震天响。这情形让人觉得托尔斯泰对洁净的怀疑是令人信服的。左面房间住着一个英国牧师和他的妻子，牧师晚上十点半到十点半之间给妻子诵读赞美诗。当我第一次被这声音吵醒时，引得撒旦咆哮着从我身上蹦跳出来。接下来是鸦雀无声的寂静。随后他们又开始吟唱起赞美诗来，虽压低了声音，但同样让人不得安宁。天气非常好，不过很凉。早春来临，已经出现了新绿。但是很难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躺下来休息，这里根本就没有南方的那种充满幸福感的愉快和恬静。

1911年4月14日于沃韦（Vevey）



韦伯继续南行，途中在都灵逗留，看望了年轻的朋友和同事罗伯特·米歇尔斯。他对人观察得非常细致，并以素描的方式将其勾勒出来：

我昨天中午来到这里，米歇尔斯与纤巧娇媚、美丽宜人的玛农（Manon）到火车站来接我。我在一个简易的旅馆下榻，中午在米歇尔斯家里用午餐。然后下午是讨论，晚上与不同的人谈到夜里十一点。睡眠还算过得去。我现在还要在都灵待几个钟头，参观一下艺术博物馆和类似的地方。下午继续前往里维埃拉的旅程。

1911年4月20日于都灵

你可能会对我一天半以来缺少音信和言语寥寥感到生气。不过在都灵我几乎一直都在米歇尔斯家里。他们的寓所不大：三个小卧室，一间很小的侧屋，没有客房；寓所的环境倒很优美。孩子们跟保姆一起睡，大儿子睡在那个侧屋的沙发上。第一天晚上有三个意大利人在，第二天我们单独在一起，一直争论到深夜一点半。米歇尔斯的太太还是那么漂亮，那么优雅。米歇尔斯自己倒像是有了点魅力的森林技术管理员……

当米歇尔斯的太太腼腆地对他和玛农破坏婚姻的行为——这是扮演给我看的，那个小淘气很醉心于这一表演——提出异议时，米歇尔斯显得十分尴尬。大儿子马里奥（Mario）显得很紧张，眨巴着眼睛，他身体不怎么强壮，可是亲切可爱，招人喜欢，显然非常善良。玛农是个极讨人喜欢而又敏感的小淘气，她具有天真无邪的风情，举手投足跟演员似的，扮演起打情骂俏来无论是动作、表情还是对白都很精彩。可是当我说她将会成为一个演员时，她的父母都在道德上感到震惊！最小的一个孩子大约四岁，是个迷人的小女孩，健康、开朗、聪明、精力充沛而又活泼，你没法让她静下来。孩子们总是在我身边跳来跳去，米歇尔斯然后同孩子们探讨，看在我、拉加德尔（Lagardelle）和戈尔德沙伊德三个人中间谁更英俊、善良、可爱，等等。我只是在会玩的天赋这一项上获得了第一名，其余都名落孙山。孩子们在做出判断的时候毫不拘束。当然，我同米歇尔斯夫妇就性爱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改日相见时再讲给你听。意识到自己具有征服能力据说可以让人保持青春……

1911年4月22日

我在这里一个很小的意大利客栈里住了下来。客栈紧靠着大海，海滩很漂亮。这是个令人陶醉的小城镇。这就是意大利，祭祀众神之地！人们都应当直奔这里来。与此相比，日内瓦湖则很具有北方特色。一周以来我一直愉快地生活在炎热之中。晚上睡得很好。阳台的门敞开着，大海的阵阵涛声传进房间，暖风吹拂着我。

这里一切都很快快乐，意大利历来都是如此。你年届四十七岁的老丈夫使足力气给你一个深深的吻……

今天天气绝佳，又热了起来，但不像昨天我乘马车去游绿色山峦时那么闷。大多数时候我只是躺在旅店前海滩上晒得滚热的沙子里。夜里我房间阳台的门都敞开着。今天清晨海上日出的景色美不胜收。这里的人都很靓丽：小伙子个个英俊，比姑娘们还漂亮。旅馆前面，年轻人在摄氏18度的海水里游泳，其中尤其惹眼的是几个风度翩翩的法国小伙子，还有女人，包括那个非常漂亮的旅店女主人。然后他们都在温暖的沙滩上翻滚，穿着泳装在海滩上尽可能长时间地消磨时光。大家都显得没有什么要紧事情需要去做。

1911年4月21日于阿拉西奥（Alassio）

※ ※ ※

我整天就躺在俯瞰着大海的小松林里或者阳台上的藤椅里，什么也不读——所以睡得还凑合，尽管很不安稳——吃得很少。没有任何关于德国的消息。在当地的报纸上甚至看不出这个国家还存在于世。一切都沉入了遥远的雾海深处而消失殆尽。我仿佛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在一段时间里这是相当有益的。我不知道今天能否再收到一张你寄来的可爱的小小明信片。

这里一直都很漂亮。阳光充足，空气清新。不过花倒不是很多。到处是群山连绵，满山遍野都是朴素矮小的五针松林、灌木林和含羞草等等，一切都异常普通而庄重，一点也不奢华。顺便提一下，旅店里有一个婴儿可以连续不断地啼哭十八个小时（我几乎没睡着觉并整天待在旅店时，坐实了这一点），就像由留声机放出来的那种音控很大的管风琴声。这已经超越了你通过演讲训练能够达到的成绩了吧，抑或你现在也有此功夫了？三月底你还要再做一次这样的演讲，对吗？

491

1912年3月9日于普罗旺斯的埃格贝尔（Aiguebelle）

假如这里有紫罗兰或其他小一些的花卉（可惜这里只有南方那种茎秆粗壮的大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含羞草和五针松之间，放不进信封里），我会在这封信里放上几朵。这封信可能正好在我们订婚纪念日的时候到你手中，它是要感谢你十九年（！）——你能相信这时间吗？——来带给我如此丰富的爱、财产和幸福，感谢你在顺境中给我带来欢乐和自由，在逆境里使我不致沉沦，尤其要感谢你让我内心保持年轻，我曾一再感受到，现在在这里也感受到了这种青春的活力，尽管春天并非人一生中真正美好的季节。……现在让我长久地拥抱你，无数次地亲吻你。现在回

想起生活开始将我们带到一起时的经历多么曲折，这种感觉真是美好！它肯定有某种特别的目的地——的确，它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不知道你那里是否仍然是春天，或者又回到了春天。我得说这里已是盛夏了。夜里在旅店的下边，人们在月光下的海滩上躺下来，暖风吹拂，犹如情人的手臂搂在脖子上……昨天在内格雷角（Cap Nègre）一直待到深夜，重重叠叠的岩石上有些俯瞰着大海的令人眩晕的小道，呈现出闻所未闻的美。与塞贝罗尼（Serbelloni）别墅没什么区别，只不过那里你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而这里所看到的则是大海和伊比利亚岛（Iberischen Inseln）。当然，塞贝罗尼别墅更漂亮一些，但现在那里天气仍然寒冷。这个时候，也许除了西班牙南部，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风和日丽。有时候我希望附近有一个城市，然后这种愿望突然又消失了……

接下来我要去马赛（Marseille），然后依天气好坏而定，去普罗旺斯的阿尔（Arles）、尼姆（Nimes）、塔拉斯孔（Tarascon），也许还要去古老的、衰败了的抒情诗人的“情侣爱巢”，然后去阿维尼翁（Avignon）。昨天晚上我再次沿着美丽的滨江路散步，西罗科热风吹拂着，像夏夜一样很暖和。这里的颜色都朴素单纯，很不引人注目，南方的暖风真的是“温柔地吹拂着我们”，确是怡人。人们真的喜爱这个地方的偏远孤独。没有汽车——什么也没有。唯一的问题是这地方太贵。我想明年去罗马或雅典，与你一起去。

1912年3月21日

※ ※ ※

亲爱的，昨天收到你星期六的来信，非常非常感谢。可是你总是把我弄成一个那么重要的人物！我庆幸自己的命运，让我无功而享受了这一切，我只是希望命运能够让我也能够表达出这么多让你能看得见的爱。

1912年3月26日

“死水之城”是一座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曾由十字军战士圣路易（Ludwig d. Heiligen）建造，如今孑然矗立在罗纳河三角洲滞塞的沼泽地里。笔直的街道、完好无损的城墙和塔楼颇为壮观，披上棕树主日盛装的小教堂挤满了人，从那里飘出女声合唱优美的歌声。孩子们戴着月桂和含羞草编织的花冠——这个一度十分重要的城镇呈现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奇特的静谧。

昨天下午我从阿尔出发，坐了很长时间的马车，穿越时而欢乐时而严肃的普罗旺斯，前往阿尔附近的勒博（Les Beaux），去看看莫里卡（Maurika）领主们古老的情侣爱巢。这座宫殿屹立在一片呈圆锥形的嶙峋岩石上，俯瞰着凸起的灰色石壁——就像人们从布尔戈斯（Burgos）出发途中所见的一样——环绕着的绿色山谷。这个地方在中世纪曾有3 600人居住，现在的人口是100，到处都是废墟。以前这里的领主在普罗旺斯可谓首屈一指，他们是抒情诗人的中心，其中一位还做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普罗旺斯的街道覆盖着雪白的白垩粉，加上雪白的石灰岩垒起来的墙——一幅绝妙景致。夜晚马车迎着强劲的暖风驶过宁静的乡村——这一切让人感到美不胜收。然后我们来到阿尔这个地方，圆形露天剧场和罗纳河沐浴在月光中，还有罗马时代的陵墓大道，紧挨着大道旁边是一口又一口石棺（就像庞培的那些陵墓，还记得吗？），足有15分钟那么长的一段路程。人们将死者安葬在流动的生命之中。而这整条罗马大道也被融入了欢乐但远不如昔日辉煌的现实之中。这一切都很美，让我感到莫大的享受。明年我们一起去希腊，对吧？今天晚上我去尼姆，明天去蒙比利埃（Montpellier），然后前往阿维尼翁。

1912年3月31日于普罗旺斯的艾格-莫特（Aigues-Mortes）

呵，现在到达这次环游最远的地方了。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虽然只是隐隐约约）远处的比利牛斯山脉在向你示意。这个小教堂在施瓦布（Schwab）的民间话本中是由美丽的马格隆资助建造的，它孤寂地坐落在海边沙丘上的松树丛中，一面濒临大海，另一面则面对着大片盐沼地。这是由希腊人建造的一个古老港口城市留下的唯一遗迹，它是由加洛林王族从撒拉森人手中夺过来的。这是一个十分扭曲的建筑，经历了这个除荷兰外欧洲最多风地区风暴的洗礼。不过，沙丘上生长着葡萄，渔民便壶里的内容给它们提供了养料。晚景和暮色中的气氛简直让人击节叹赏。四处是棕色、紫色和淡绿的色调，不过在极为强劲的海风中也会感到寒冷。

1912年4月2日于蒙比利埃附近的马格隆（Maguelone）

今天早晨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库尔贝（Courbet）的画，这是除巴黎和里尔（Lille）之外法国最好的博物馆。这里的风景画也很让人想起伯克林（Böcklin）。除此之外，蒙比利埃的水塔尤其引人注目，那是引水高架渠入城的地方。昨天我在那里的时候，明月高照，让人叹为观止。

(致海伦妮)从法国南部回来,我毕竟消除了一些疲劳,至少让我还可以应付工作,而在冬天我的工作能力通常非常不尽如人意。我在这个独具特色的国家看到了很多美丽的东西,特别是在真正的普罗旺斯省,我在那里多花了八天时间或乘车或徒步四处游览。这个罗纳河的冲积平原也许是地球上最多风的地区,即便是荷兰也没有这么多的风,而且它也跟荷兰一样,平坦得像一只盘子。然而二者差别何其巨大!不同于荷兰的草地和牧群,这里交替出现的是绵延数英里的盐沼地和布满大面积葡萄园的原野,其中可以看到现已弃置的中世纪城镇,巨大的要塞城墙给它们披上了盛装。后面远处是一座座山峦,各自都造型奇绝;山峦高地上难以企及的圆锥形岩石上矗立着抒情诗人们那些古老的情侣爱巢的废墟。一个富有魅力的可爱的民族,下午和晚上美妙的光照,以及包括从罗马遗址到具有哥特式晚期风格的艺术古迹,十分壮观。只是发疯一样无休无止的北风(为了防风,农田都用厚厚的灯心草和柏树篱墙保护起来)有时足以让人绝望……

494

于蒙比利埃

## 2

1913年和1914年春,韦伯是在意大利北部一个湖畔小镇度过的。这个地方为那些与资本主义社会分道扬镳的形形色色的奇特人物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这些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回归自然的人、素食主义者,以及其他想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并由此为世界新秩序打下基础的现代流派。前面提到的那位弗洛伊德门徒的追随者们,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尤其强调摆脱一切传统规范的束缚,主张在贫穷和动荡中生活,弃传统而提倡打破常规,主张心灵冒险,在各种各样的窘境中为坚守自信而奋斗。

这就产生了后果严重的(并非由习俗造成,而是具有强烈本能冲动的)冲突,尤其是对于那些牵涉其中的妇女而言。有一起复杂的诉讼牵扯到一个孩子,诉讼过程长达数年,假如没有韦伯的帮助,其结果很可能对母亲不利。韦伯在这个案子上花了数月的时间,以长篇诉讼辩护书的形式给好几个律师提供指导,亲自到国外同他们商讨,获取证人。简言之,他为此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热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机敏。同时,他还帮助另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女性打了一场同样困难和同样漫长的离婚官司。案子涉及成堆的卷宗和信件,在这个案子中,同样是韦伯的努力付出才使这场诉讼获得了预期的结果。他的动力来自他的友爱和乐于助人的精神,来自他对斗争的喜好;他的回报是人们对他

怀抱感激之情的友谊，是获得能够丰富自己阅历的洞见，即洞察那些各方面取向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特殊的的世界，以及他们行为的结果。下面的文字记录了他在罗迦诺（Locarno）的经历在他心灵中的反映：

495

我昨天从邮局回来时，一个金发妇人在我房门口向我迎过来，她带着一个金发和一个黑发的孩子——自然，这是多拉（Dora）。我们相互打了招呼，她给我讲了女伯爵的事儿，然后谈到她的孩子们。天晓得，她就住在我这栋房子里；孩子们和女仆住在斜对面的湖港旁边。她现在的“丈夫”，也就是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还关在苏黎世（Zürich）的监狱里。她独自一人，需要有人说说话。……

今天天气很冷，不过在昨天无休无止地下了一天雨之后，终于出了点太阳。昨晚睡得不好也不坏，早上起得晚，现在我正坐在我这个大房间里，在第四层，应该说是第五层，可以看到房子旁边陡然往上升的小花园，也能看到湖。房间里有两张床、一个小小的壁橱、一个抽屉柜、一个破旧的玻璃柜，还有一个大沙发床、一张大桌子、一个铁皮做的盥洗台、一个床头柜、几把老掉牙的软垫椅子、一盏电灯、几张非常陈旧的印刷复制的油画、一面镜子和一个衣架。四壁是黄色的，房间还包括一个小小的厨房，卫生间在洗澡间旁边，一切都在关闭起来的楼层里。如此设施对当地那些回归自然的人中的“幸福情侣”来说倒是很理想的，他们至多不过偶尔做一次燕麦粥而已。

房前是一条大道，然后往下就走进一个盛开着鲜花、飘散着馥郁醉人的紫罗兰花香的湖畔小花园。那里有一个鸡舍，一个小小的湖船停泊处。房主是律师和公证人，每天都在自己办公室里。他妻子以前肯定很漂亮，即使现在也非常俊俏，属于富裕农村主妇那种类型。她同仆人一起打扫房间，一溜小跑去邮局。简而言之，她的地位与当地小酒馆的Q女士毫无区别。这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的意大利偏僻小镇，尽管小酒店因为住在这里的意大利人还算有点品位。这里的伙食对我来说确实是太好了。早上我吃点饼干和无花果干。在为主张回归自然的人开设的商店里，你可以买到很好的东西。此外我也吃些燕麦饼干、枣、无花果和橘子。每隔一天我中午去一次Q女士的小酒馆，不过我的体重并没有减轻。……

还是把卢卡奇的《灵魂与形式》[*Die Formen der Seele*（应为 *Die Seele und die Form*）]寄给我吧，我可以在这里阅读。我已经读完了《玛丽·多纳迪厄》（*Marie Donadieu*），把它给了多拉，她给了我女伯爵的新书作为交换。女伯爵的书是一部以慕尼黑的施瓦宾艺术家居住区那种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其中写到的人物有格奥尔格·沃尔夫克尔、安德里安（Andrian）伯爵和她自己。书写得不错，不过只能吸引对施瓦宾感兴趣的人。《玛丽·多纳迪厄》写得很精彩，深刻而细腻，对性

爱的批评具有很高的水平，只是结尾写得有点儿仓促：波斯湾旅行确实不足以表达超越性爱的生活的丰富和伟大。不过，我还会重读这本书。我遗漏了很多细节，因为我的法语词汇量不足，可以说很贫乏。 496

这里冷得够呛，我写信时手都冷得发青。昨天在多拉那里围着火炉坐了几个小时。她很需要找人说话。上星期她去探访了监狱里她的那位朋友。这个人也对一个没有嫉妒的未来社会怀有宗教般的信仰：这个社会充满真正的（即思想得到解放的）“自由”恋爱。多拉自己对此也有一番理论。可是当我对她说，在嫉妒问题上，高尚的行为是件好事，不过，如果一个人已经“亏欠”了另一个人那么多，还从那个人那里接受一切恩惠，那么骑士风度何在，问她，在这上面她是不是为了一个怪念头而在极度浪费自己的情感力量时，她一下子喊出声来：对呀，真是可怕，完全令人绝望。……她是无可救药了，因为她与那个人的关系决定着一切。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她就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环境所接受——这倒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与此有关的一切，因为她只是靠超乎常规和变换的经历才得以维持下去。……

今天天气阴沉沉的，不过倒挺暖和。银灰色的天空下群山的轮廓看起来很美；更美的是，在漫长的黄昏时分，欣赏以钢灰为底色的各种颜色并不引人注目地调整配合，逐渐改变其色调。也许我今天还要去一趟罗迦诺，或者推迟到明天去，以此来庆祝生日。我的上帝！我的生命都跨入第五十个年头了！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很奇怪，我还这般年轻！抑或是因为你的年轻，亲爱的，让我造成了这种错觉？作为生日礼物，让我们在通向花园的两个桥头水泥柱上放上两个木盒子，里面可以放进盆栽的漂亮花卉——我在这里突然想到这个主意，不知道为什么。……

……在结束我们的谈话之前，多拉还想要告诉我，哪些是我对她不应抱有的看法。昨天她（对她儿子）说了这样的话：“是的，是的，当那些女人不让她们的孩子跟你一起玩儿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昨天她的坦率再次让我对她很有好感。我确实学到了很多！——尽管这都是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刚刚收到你（为我们的订婚纪念日写来的）那封美好的来信。亲爱的，关于你在信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你伟大的爱所创造的美丽“诗篇”。我自己无法像你一样用伟大和美好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所以在我眼中我没有“得到”这一切，而毋宁说是“放弃”了这一切。不管怎样，现在不是去弄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的时候，相反，我们现在应当愉快地享受使这样的“诗篇”得以产生的美。但愿我永远能够证实，至少它们不是谎言，能够让你的心灵永远保持创造新的“诗篇”的能力。如果在这个领域诗能够给我们人类带来真，那么，诗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真实”的。…… 497



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分别吃了几个橘子，除此之外，从星期五晚上到现在什么也没吃。除了这震撼世界的实事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应该告诉你。我们急切地等待着律师的消息，并且在考虑法官有没有可能会告诉他说：“如果她放弃同卡尔的关系，孩子就归她。”可是她至多只能在形式上满足前面这项要求。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清楚地意识到，卡尔不会在此久留，只是对他今后会怎么样绝对是一无所知。据说卡尔始终在等待着内心大彻大悟的那一时刻，届时他将会有先知先觉的伟大举动。一切都取决于对他的判决，这几乎让人觉得可怕。即便是多拉也觉得无法解释，虽然人们确信绝对的恶是社会的基础，可是他为什么如此“不切实际地高估”这些观念。此外，他希望通过**性爱**的无宇宙论（Akosmistik）观点来使善和博爱臻于完美。我已经告诉过多拉，为什么这种观念行不通。多拉也承认，实际的后果将会是托尔斯泰式的禁欲，他也一直有此倾向。……

这里的事情还很多。昨天我口授了对诉讼函件的评论。今天我要起草对无政府主义者卡尔的专家鉴定，明天由女伯爵让人用打字机打印出来。作为对女伯爵的回报，我真的是昧着良心为她炮制了一项申请鉴定的请求，看有没有可能让她儿子免去德国公民身份（服兵役的义务）。但愿这项努力将无济于事，希望他无法避免服兵役。在过去的八天里，我在晚上只吃了四公斤半橘子，两杯不加糖的柠檬汽水，三杯茶。今天的感觉跟八天前一样，也就是说，常常是饥肠辘辘。我的状态跟平时不完全一样，但与平时相比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我的体形没有任何变化，也不比以前更容易激惹。我跟往常一样地行走、阅读，只是写作有点吃力。明天早上我要开始用生茴香补充营养。……

498

多拉的朋友很有**深度**。不过他甚至缺乏表达简单思想的能力。监狱生活的影响让他无法停止思索善的意义。善行的**结果**常常荒谬至极，“善意”的行为带来坏的后果，诸如此类的事实让他感到困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否**应当**行善——这是从**结果**出发，而不是从内在价值出发对道德行为做出判断。他目前还看不到自己的看法中有一个谬误。我要想办法给他找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Die Brüder Karamasow*），然后给他弄一本卢卡奇关于精神贫困的对话录：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今天收到律师厚厚的一封信，促使我得去一趟苏黎世。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找到人为卡尔作证，为他的品质和他在政治上的无害性提供适当的证明。然后看看是和米娜·托布勒前往乌弗瑙（Ufenau）岛（尽管天气变幻莫测），还是在苏黎世待半



天，和她一起待在她可爱的姐姐那里。

现在我马上要“回家”了。如果说我还能把这个充满了妖妇女巫、妩媚、狡诈和幸福欲望的世界称为“家”，只要现在必须得办的事情在那里还没有办完，那么，我就算没有白忙活了。我不得不说，在对这个追逐轰动效应的世界所留下的这些漂漂亮亮，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人性”但脱离了背景的印象当中，昨天在这里与这样一个女孩子一起前往乌弗瑞岛的行程是一处纯洁的绿洲（我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来描述它），这孩子很不一样，但她含蓄细腻的痴迷方式使她显得如此“高贵”。……

天气极佳，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春天，百花争艳，万物披绿。昨晚这里举行了复活节游行，人们打着灯笼，举着基督画像等等。一切都用星星点点的灯火装饰起来了，咖啡馆前面的大街上有栩栩如生的天使报喜画像——伴之以一轮圆月当空！令人陶醉。这一切都与苏黎世湖畔迥异，那里有“文化”。绿草地上的一栋栋小房屋一直延伸到山里，无声无息地把最小的缝隙都填满了，所到之处都带去了人们那一颗颗或悲伤或快乐的心。这些房屋的背景都是高耸的山峰。那些村庄好像被粘贴在那高处，成了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像这些村庄一样开放，同样也像它一样闭塞，不能超越自己——这也是美的，虽然缺乏一点人性，像画中裸体人像一样缺乏亲昵行为，也正像这里人们的生活一样。没有什么背景，但并不缺乏骄傲和风度。不错，我确实同情多拉，因为她一直保持了自己的本色，不过我不可能长时间在这样的氛围中呼吸。我对女伯爵没有一点兴趣。亲爱的，代我向母亲致以千百次的问候——不知对此她会怎么看！！你的马克斯拥抱你，他已经流落到了一个奇特的寓言世界里。

……顺便提一下，那个小瓦尔特（Walter）是个很会形象思维的孩子，他对人的定义很漂亮：“那人是谁，瓦尔特？”——“那是吉娜（Gina）。”——“吉娜是谁？”——“就是那个从罐子里舀牛奶时流着鼻涕的人。”对一个女孩子还有更多需要了解的吗？……今天我寄出了对起诉书的回复。又是一份很长的文件。但愿这是最后一份这样的文件了。……昨天，多拉和我就“谎言”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N不能作假证。她认为国家又不是朋友，而X教授（奥托·格罗斯的父亲汉斯·格罗斯）是敌人，二者都不能真正要求她和她朋友说出真情。只有朋友才有权获得真情，别人都不行。我向她指出，我永远不可能确切地断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不是她自己所宣称的那种“朋友”。然后她要知道，这不是我对她这么疏远的原因。我对她说，这原因在于我的经验。在某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很喜欢特别“性感”的女人（她想必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自己内心绝不会对这个女人产生一种依恋，或者信赖她的友谊。因为事实表明，对这类女人来

说，我不是一个合适的朋友，实际上只有性感的男人对她们才有价值。我从来不相信她们那种同志式情谊的主观感受——不管它有多么强烈——会持久，会靠得住，因为经验表明，即便有最良好的意愿，所有的言辞和感受一旦经受考验，都会证明是靠不住的。当然，她对这样的说法感到不太受用，不过这个话题也就到此为止了。……

今天一大清早我就去了三角洲。天空乌云密布，黑黝黝的山峦云遮雾罩，如此构成的装饰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树木现在已不再像恩斯特·贡多尔夫（Ernst Gundolf）的画里那样，都成了直线；草地上开满了花，红色的桃花四处盛开，紫丁香花正在吐艳。在我身后，身着金色服饰的女海神卡里普索（Kalypso）溜出了她的穹洞宫殿。为了躲避她（因为她不适于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加快了脚步，然后左躲右闪。最后她想必明白了自己无法得到奥德修斯（Odysseus），便回转身去，愤怒地将一场雷阵雨劈头盖脸地浇泼在我身上，弄得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把我的帽子也变成了一个可悲的面具，赶得我飞快往家跑。不过这也不啻为美丽的。

1914年4月9日于苏黎世

※ ※ ※

下面是韦伯给那位女性朋友的通信摘选，可以表明韦伯是如何帮助她的：

……不管您做什么，有一点您是绝对可以放心的：我们有办法保护您的孩子不被夺走，并且我也会为您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包括**极端暴力**。在巴塞尔（Basel）我随时可以为您以及您的朋友（如果他觉得有用的话）解释法律情势。

您放心，我会**严格按照您**所希望的方式给您提供帮助，所以，如果我提出了什么错误的建议，您也不必生气，而是可以径直告诉我的：“您是头蠢驴。”我也许会明白，也许不会，但我不会生气。……关于卡尔，我想X教授或许会要求他与您和孩子分开居住。早在一年半以前，我就向您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因为若是这样，您的对手就无法对您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一点上，您和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旦你们做出了选择，你们绝不会听到我说：“你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唯一的建议只是：“你们选择的时候要保持头脑清醒和冷静。”

……现在我要再次回到也许我早就应当彻底讲清楚的一点：假如我早就这样做了，我也许会省不少心，也会免去你们对我的一些责难。您瞧，在您的信中，我—再发现这样的字句，读起来让我觉得您好像是在说，我在指望或我在努力让您和卡

尔的关系变得复杂，或者说我站在那些想要切断这种关系的人一边。亲爱的多拉女士，如果在我与您二人友好地交往了数星期之后，您仍然当真相信这些话，这才是**唯一**可能危及我们友谊的东西。不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我想要十分明确地表明我自己的看法。您知道得很清楚，造成最大困难的当然是您二人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本身，也不是“无政府主义”本身，而主要是卡尔的**失业状态**。

我无须告诉您二人中的任何一位，外人冷漠的眼光将这种情形看得多么丑陋。要对人做出正确的判断，你必须了解他们。您和卡尔——让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根本就不能要求一个外人像我一样看待这些问题，甚至不能要求他们像我在来到罗迦诺之前那样看待这些问题。由此可以解释一切有关第三者的态度问题。对此，一个人可以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在一些小事情和次要问题上也必须做到更加不屈服。”相信我，我懂得这一点。并且我也明白，你们并没有采取那个简单和纯粹技术性的措施，即暂时将你们二人的住所在空间上分得开一些：您和孩子们与卡尔住在不同的房子里。这一点我也很能理解。可是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二人必须明白，作为朋友我首先要向你们建议的是**智虑**，而不是这种形式的“加图主义”（Catonismus）。所以我当时就建议你们做出这样的让步：只要有任何可能，两个家庭就应当正式分开。因为这样一来，您公公的提议立刻就会彻底失败。我不能**重复**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这毕竟涉及你们双方最隐私的事情。

为什么要谈到这一切呢？因为我待在罗迦诺那一整段时间里，一直不得不对此保持**缄默**，因而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且，尽管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是高高兴兴地做的！）都是为了避免让您必须在与卡尔之间的关系和您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可是我心里**仍然**总是感到不踏实，也必然会感到不踏实，心想：“尽管我做了这一切，但她会不会认为我倾向于让他们俩分离呢？”然而这是难以忍受的。……我写给您的关于庭上作证的那些东西也只是建议您要明智。您能理解吗？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是很有把握的。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也没问题，我还是会尽我之所能帮助你们。不过，这样的话，你们的行动将会是**非常**不明智和轻率的。我敢肯定你们会后悔……（这里略去的是一些详细的指导）。我想最终一切都会有很好的结果，我期待着自己被传唤到布拉格出庭。——亲爱的多拉女士，现在您将不会再收到“让您不高兴”的来信和让您感到痛苦的通信了，因为我在上面已经说出了压在我心头而又难以启齿的东西。最后愿您能对您这个并不总是让人愉快而又有些笨拙的朋友保持友好的情谊。

马克斯·韦伯

亲爱的多拉女士：

现在一切情况都再好不过了，您这是自寻烦恼！在法庭上您已经说出了实情，并且还有机会加以补充，也就是说，路径已经廓清了。因此，客观地说，您做的是对的，没有任何人能碰您一根毫毛，这种可能性已经可以排除，对此我感到莫大的轻松。您现在正好也不能够胜任这类事情，必须得恢复精力才行。我多么希望现在能与您在一起，或者亲自去您那儿一趟。可是我现在绝对走不了。玛丽安妮和我九月份来看望您。很快我会再给您写信。这封来信的目的只是想请您完全放下心来。我很高兴看到您所做的这些事情。祝一切进展顺利。

# 3

503

韦伯主要是利用夏末和玛丽安妮的共同旅行来满足自己对于文化体验的需求。向别人展示美好的事物能够增加他的快乐。1910年夏天他们旅行的目的地是英国。诺曼—哥特式大教堂的庄严宏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被鳞次栉比的房屋簇拥着德国大教堂不同，诺曼—哥特式大教堂从地毯一般平坦的草坪上自由自在地拔地而起，跟日常事物保持着庄严的距离。坎特伯雷大教堂（Kathedrale von Canterbury）是他们所见过的最为庄严崇高的创作物之一。如此鬼斧神工之作难道是人的脑子设计，是人的双手完成的吗？到底是人的精神将那不可思议的东西对象化了，还是上帝通过其仆人为自己建造了这么个地方？唉，单是在现代人的艺术升华中就有多少远离了上帝而酿成的贫困和深深的痛苦啊！

这一对旅行者在莎士比亚的诞生地经历了另一种震撼：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城镇，在这里那位天才留下的遗迹被商业化了。汽车的轰鸣和匆匆的乘客使人无法沉溺于欣赏，也让人无法感受到诗人个人生活的氛围。然而，那条在银色的垂柳下蜿蜒流淌着的幽深的小河，至今仍然在轻声低语着奥菲莉亚（Ophelia）甜蜜的忧伤。不过，在安葬着莎士比亚和他妻子、女儿的古老教堂内的侧厅里，面纱则被微微撩起。那里悬挂着的是这个人最后的面部造型，这个人在辞世之前有意识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做了个了结。

像前些年一样，英国文明在其他方面让这一对旅行者最为关注的是土地分配问题。不管在哪里，土地都属于贵族大地主。如果你想要从海岸边高耸的岩石上欣赏一下大西洋壮阔的景象，你首先碰到的就是花园的栅栏，只能在指定的日子和时间付费入内。整个村庄，譬如在西海岸迷人的克洛弗利（Clovelly），都是“私人财产”。在有些地区，你可以看到一些城堡，城堡那些禁止任何形式的经济开发的畜养鸟兽的苑囿都扩展成了

公侯领地。领主们每年狩猎时来这里住几个星期。这样一片可以给数十万人提供生计的土地却被用来养活几百个仆人。在这些闲置的土地上，你听不到人们抱怨，因为那些可能会抱怨的人早已被驱赶进大都会的贫民窟里去了，他们已经不再适合在农村生活了。自由的农民消失了。与此相较，韦伯十分投入的德国农业宪法则显得很明智。

在令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中获得了多种多样的印象之后，韦伯夫妇心怀感激地回到家里。令他们高兴的是，迎接他们的是这么多美妙的景色：“艳阳高照，秋日蓝天下的温煦日光给山峦和河流披上了一层珍珠母色的光的面纱，荡涤了一切琐屑之物，使山水的轮廓显得那么伟大而又静谧。花园里单片的树叶已经开始稀稀落落地掉下来，玫瑰凉亭上的五叶地锦正在改变颜色，有几朵紫苑还在盛开。”

504

※ ※ ※

韦伯现在冬天大多会在柏林度过一些时间，以便推动一些集体研究项目，为社会学协会鸣锣开道，也为了让自己了解和把握政治时局。在柏林他每次都沉溺于艺术之中。1911年初他的兴趣主要在音乐上。韦伯在几封信中谈及了这一兴趣，他后来写下的一些艺术感受也一并录于此：

我听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然后是施特劳斯（自己亲自指挥的绝妙）的《唐·璜》（*Don Quixote*），《唐·璜》是一部神奇之作，充满精神及音的层次色调，不过也许缺乏永恒的价值。接下来的海顿（Haydn）的B大调交响曲对此有所补救。演奏都在上午，然后晚上再重复一遍，很值得推荐。皇家交响乐团非常出色，这样的音乐会它每年只举行七次到八次。昨天西默尔也在交响乐团的贝多芬大厅，显然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音乐里了。很明显，他是个很有音乐细胞的人，他对色彩的感受也高度发达。他收藏的单色中国花瓶颇值得观赏……

唉，我们没有一块儿在这里，真是可惜。昨天我听了贝多芬的五首钢琴和大提琴奏鸣曲——先是作品第5号，然后是102号，可谓美妙至极。贝多芬的整个一生就存在于这两部作品之间，从那个喜爱花腔和无拘无束的海顿派艺术家开始，直到孤独地倚着岩石的那个感情深沉而激越，同时又有自制力的人，他以深沉、响亮和严肃的声音抗衡世界上所有的辉煌：“不错，它确实美丽；我知道它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但也知道，什么是它所没有的。”

昨天我观看了《莎乐美》（*Salome*）（理查·施特劳斯据王尔德的戏剧改编成的同名歌剧）。像这样的题材居然能用音乐表达出来，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成就，即便

音的色调几近于小气。这出歌剧很有创造性，绝不会无法理解，有些部分真的非常美，铜管乐器的处理简直妙绝。观众默默地离开了剧院，精神上有被摧毁的感觉，似乎在干坏事时被当场抓获了。这个题材被王尔德歪曲成了令人作呕的内容。现在我有些急切地期待着我要听到的最后一个作品——施特劳斯的《死与净化》（*Tod und Verklärung*）。……

在德国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的《兰斯洛特》（*Lancelot*）是一个可悲的失败品。第二幕是这样开始的：一张凌乱的中世纪双人床，晨曦中骑士站在窗前，呼唤着他的情人，亚瑟王（*König Artur*）的妻子让她和自己共同观赏旭日。一个穿着长长的睡衣的金发姑娘从床上爬起来，向亚瑟王解释说，她并不是骑士以为自己正在亲吻的那个女人，她是被宫廷的忠臣们当作王后给偷偷换到他这里来的，要她像那个“真正的情人”一样给他那种“销魂的爱”等等。这就是被赖因哈特（*Reinhard*）和该剧作者施图肯（*Stucken*）称作神秘剧的东西！嘴唇紧闭的观众们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心里想的是肯平斯基（*Kempinsky*）餐厅。女士们在吵嚷着。——昨天晚上听了爱乐乐团演奏的门德尔松（*Mendelssohn*）、李斯特（*Liszt*）和两位很现代的俄国音乐家的作品，然后观看了《死与净化》。《死与净化》非常精彩。整出歌剧并非从头到尾都很深刻，但采用了打动人心的出色的音乐形式。……

昨天的音乐**非常精彩**，特别是安佐尔格（*Ansorge*）谱曲的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用德默尔（*Dehmel*）的诗谱成的曲，像一座伟大的丰碑屹立在虽然优美有趣但失之于牵强生硬的胡戈·沃尔夫（*Hugo Wolf*）的东西之间。托布勒小姑娘的伴奏极佳；在此期间她还演奏了莫扎特和肖邦，后者尤为出色。她的身姿也非常优雅，同时洋溢着蓬勃生机，给人带来了快乐。……

昨天与母亲一起观看《费加罗的婚礼》，她再度体验了那种纯粹的快乐！真的，在这里音乐让那些敏感和有些滑稽的表演变得高尚了，**一切都被澄清提纯**，只剩下抽掉了内容的《轮舞》<sup>①</sup>了。要不然，母亲和外祖母——她曾用细声细气的小孩般的嗓音唱剧中人物凯鲁比诺（*Cherubino*）的唱段——不会这么欣赏这出歌剧，因为她们完全拒绝一切有性爱内容的音乐。

---

① 这里可能是指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作品《轮舞》（*Reigen*），其中有当时被认为是伤风化的色情内容。——参见英译注

昨天观看了斯特林堡的剧作 [《一出梦的戏剧》(*Ein Traumspiel*)], 令人颇感不快。印度教之天神因陀罗 (Indra) 的女儿下凡, 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不幸和愚蠢。不少单个场景很漂亮, 然而, 一切都在“说教”, 还使用了一些糟糕的技巧和令人伤感的过激手段——这是他晚年的一部作品。不过这还算不得什么, 最奇怪的是, 在现在这个时代, 剧院的这样一出剧居然四十场门票均已告罄。确实几乎难以理解, 也让人丧气。……

506

昨天观看了斯特林堡的《同志》(*Kameraden*)。内容是一个同志式的婚姻——一种对妇女运动的尖锐批评, 表演出入神化, 对话精彩绝伦。对艺术上精准表达的欣赏让人忘记了主题的失真。观众感到很有趣, 他们中间有不少身着军灰色衣服, 有不少人是小资产阶级。当男人们看到那个获得了妇女解放的坏女人如其所愿吃了大亏时, 瞧他们那副如释重负和喜不自禁的神情!

1916年5月

※ ※ ※

1911年夏天, 韦伯夫妇第一次打算要透彻地了解一下慕尼黑的文化宝藏。他们任由熟谙现代艺术的朋友格鲁勒博士引导, 格鲁勒无所不知, 而且借助很少的一点暗示便能阐明当时最新的——诸如“土地”(Scholle) 这种艺术流派的——画作所具有的奇特性。那时, 深受希尔德布兰特 (Hildebrand) 影响的造型艺术正在追求古典雕塑的静穆和基于建筑空间而构思的线条; 而在绘画领域, 主流倾向认为, 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对象只是作为光和色的载体才具有意义, 并且拒绝进一步追求富有意义的内容。在剧院里, 韦伯夫妇观赏了施尼茨勒的滑稽剧的机智和自嘲的轻薄, 以及奥芬巴赫 (Offenbach) 的轻歌剧里充满酒神精神的感官刺激, 赖因哈特的导演让这出剧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绚烂色彩。《纽伦堡的工匠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那极为高贵的艺术让他们的精神得到升华, 感觉到身处德意志精神的庙堂之中。其他没有哪一个国家给世界馈赠了蕴含着如此丰富意义的音乐, 能够如此揭示一个特定民族最深刻的精神财富所具有的特质, 同时又能为整个文明世界所理解。

外面是明媚的夏日, 阳光赐福于万物。美丽的建筑将其轮廓清晰地沐浴在纯净透明的空气和南方明亮的光彩之中, 这种空气和光彩只间或垂青于这座城市。因此, 从意大利借鉴来的建筑线条在此很合适, 韦伯夫妇对德国和意大利在艺术创造方面的结合感到高兴, 对德国人能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这样伟大的建筑感到自豪。韦伯在旅途中写给母亲的信中对此说道:

我们先在慕尼黑待了八天，看了美术馆、艺术展览馆、建筑、《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和赖因哈特导演的一组戏剧中的奥芬巴赫的轻歌剧，还有一些风景，诸如沼泽、伊萨尔（Isar）河谷。我们同格鲁勒博士一起去了湖泊，他感觉敏锐，就像喜爱自己的家乡一样喜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非常优美地坐落在施塔恩贝格湖（Starnberger See）畔的小村庄度过了美好宁静的八天时间，这里没有车马的喧嚣，你目光掠过湖面可以眺望到阿尔卑斯山脉，看到美丽庄重的湖岸以及大片的森林和沼泽。现在我们将启程回慕尼黑，然后前往巴黎。

韦伯夫妇在施塔恩贝格湖畔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日子之后，在巴黎则做了些真正的“工作”。

马克斯具有无限的接受能力和热情。大多数时间我都能够跟随在他身后，只是偶尔不知不觉地走在他身旁，让他带着我一起走，这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某些事情的缘故，也就是说，是为了感受到我的心就在他的心旁边跳动。他生气勃勃，在精神上不知餍足，这些方面他非常出色。只是有时候他会因为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麻烦而受到激惹，诸如在他正好需要搭乘有轨电车时，电车偏偏就不来，餐馆里服务疲沓等等。

不错，韦伯常常缺乏耐心，因为他想要看所有的东西，想要汲取一切：他对法国的音乐感兴趣，因为他在酝酿着写一篇音乐社会学的论文；他对现代绘画和雕塑感兴趣，因为他打算将来某个时候写一本囊括所有艺术的社会学著作。不过，即便没有这些创作冲动，他也会仅仅因为想要尽可能多地理解这个世界而沉溺其中。

他在慕尼黑的所见是这个更为陌生、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前奏。韦伯夫妇很快就适应了莫奈（Monet）、马奈（Manet）、德加（Degas）、雷诺阿（Renoir）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杰作，然后理解了塞尚（Cézanne）、高更（Gauguin）和凡·高（Van Gogh）。不过，对于那个宣称自己使用一种“科学的绘画方式”，并且试图以很多鲜亮的彩虹般的小点来捕捉光的画家，他们宁愿将他留给热衷于“最新事物”的美国人去欣赏。韦伯夫妇认为凡·高有些难于把握，但最让他们感到震撼。他们不知道是否应当接受凡·高对这个世界的表达：强烈的色彩，撕裂的空间被硬塞进一个平面，那些威胁着天空的绝望的树枝，像死人一般的自画像突出的是深重的灾难和无法言说的痛苦。然而，他们在凡·高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一颗在孤独地挣扎、充满张力的心所具有的伟大和激情，这个心灵致力于用线条和色调对尘世的现象表达超验的洞见。



他们心中不断涌现出在最美丽的德国城市起作用的文化力量与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法国大都市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对比。韦伯夫妇意识到，慕尼黑的绘画模仿的是那些无与伦比的法国大师。不过，在他们看来，法国的戏剧尽管艺术上很完美，但要落后于德国的戏剧。古典悲剧那种道德化的悲怜已经不合时宜了；现代演员在剧中的举动就像在化装舞会里一样，他们速度过快的道白破坏了英雄的庄严雄辩所具有的语言美。与此并行的，是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剧院上演的那种表现现代腐败和混杂着淫荡与感伤的通奸剧。只有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的童话剧堪称纯洁而严肃。即使是在巴黎，他们也只是在瓦格纳和其他德国大师的作品中才发现了崇高的现代艺术。

就某些方面而言，巴黎这座城市似乎没有孕育出什么新的东西。比如说，在一次手工业产品展览会上，看不到像在慕尼黑所能见到的表现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艺术作品，只有对1789年前的王朝时代的洛可可线条和闺房色彩的典型模仿之作。脱离了它们产生的环境，将其移植到资产阶级社会之中，它们就显得轻率和冷漠。不管在哪里，一直到郊区，街道都是以大道两旁宫殿式的宏伟建筑为主要特征，只是偶尔会有几处模仿外国风格特征的丑陋建筑夹杂在其中。

与这个古老和富丽堂皇的皇权以及帝国权力之都相比，德国城市慕尼黑的美或许得降为省级，但是慕尼黑显得年轻，体现了年轻德国的成长和追求新形式的努力。那个已经达到全盛和超越了全盛时期的世界文化之都，似乎还能守住旧日的辉煌，但却没有什么可供发掘的隐秘了。当然，这个城市的富庶和渗透于历史之中的美也许是不可超越的。在林荫大道上，阳光多么欢快地穿透树枝在铺筑过的人行道上翩翩起舞，古老的卢森堡公园多么快乐地炫耀着公园里悠闲散步的人群，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沐浴在秋天温柔和浅蓝色的晨曦晚霞中，豪华马车穿行其间，其优雅非别处所能媲美，充满了如此闻所未闻的节庆喜气！还有在优雅的咖啡馆门前可以观察到的一切！尤其是巴黎女人举世无双的品位那时正给整个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带来朴素的深色调，这就使当时德国衣着服装流行的缤纷色彩在这里显得不合时宜。韦伯夫妇是多么欣赏在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里那些翩翩起舞的裁缝女自然的优雅！他们二人并不属于这个追求形式完美的世界，但乐于赞赏它，乐于从中汲取营养。韦伯在给海伦妮的信中就此写道：“巴黎就是一个庆典。头两天夜里我还服安眠药，就像在施塔恩贝格湖那样，每隔两天服一次。然后就再没有服用过了。然而我们所见所闻的一切多么有趣！的确，闲逛和观赏美好的事物，这简直太棒了。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也不错。”

509

※ ※ ※

不过韦伯并不想因国外旅游而忽略了解自己祖国的宝藏。当人们提醒他这一点时，他总是说待年龄大了再做不迟，届时会有足够的时间。但他在1912年夏天还是决定待

在德国。他们夫妇与一个朋友——女音乐家 M. 托布勒一起观赏了拜罗伊特（Bayreuth）音乐节，还顺道观赏了班贝格（Bamberg）维尔茨堡（Würzburg）的美景。韦伯写道：“我想要在我们的女钢琴家朋友的陪同下，通过尽可能好的表演再次熟悉一下这位伟大的魔术师（瓦格纳），因为我对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我极为佩服他的才能，另一方面则厌恶很多不真实和不自然的东西。我现在想看一看，到底哪一种看法将会占上风。”

510 拜罗伊特和《帕西法尔》（*Parsifal*）令人失望。演出真的是在演戏。音乐中有的地方让人感到一种空洞的甜蜜，或者是性感和基督教象征主义不纯净的杂糅。他们一点也没有体验到在巴赫、贝多芬和李斯特的杰作中展现的那种宗教虔诚。与此相反，他们在慕尼黑观看的《特里斯坦》（*Tristan*）所具有的艺术真实和伟大则令人信服。他们夫妇并非第一次观赏这出歌剧，两人新婚燕尔时就在柏林看过一次，不过那时此剧对他们不啻为对牛弹琴——当时是一位不谙音乐的表兄陪同观看的，此兄明显在那里受罪，他们自己也感到无聊之极。从那以后，他们的艺术接受能力得到了全面发展，那位音乐家朋友非常出色地为他们理解这部作品做好了准备。所以他们完全沉浸在作品的迷狂状态之中，把这部艺术作品视为尘世的最高净化。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也再次为他们提供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乐趣。在一个漂亮环境中举行的工业展览让他们为德国的能力感到骄傲。

我们沉湎于音乐和绘画之中，这次我们征服了《特里斯坦》和马雷斯（*Marées*）。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消失了，唯有美成了主宰。太阳出来时，处于节日气氛中的城市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星期天，正在举办展览的那个美丽的公园里，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熙熙攘攘的。每个角落都有音乐和某种适合各种不同趣味层次和教育程度的演出。令人感到满意的是，在那里也能看到普普通通的人。马克斯工作能力又表现得很有些惊人了。他跑起来像一头猎犬，四处观看，不知餍足，晚上必须拽着他，他才离开咖啡馆。他的情绪一直很好。

韦伯自己在给海伦妮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班贝格很漂亮，维尔茨堡无与伦比，对拜罗伊特的印象比较强烈，但不清晰。《帕西法尔》不再能体现瓦格纳的全部艺术力量；当然，我们拒绝将它作为宗教体验来感受，因为这简直是可笑。两天以后在这里的（慕尼黑）国家大剧院观看莫扎特的《女人心》（*Così fan tutte*）时，我们则完全沉浸在了纯粹美的享受之中，尽管该剧主题轻浮。与此相反，昨天的《特里斯坦》完全是一部罕见的杰作，具有伟

大的人性真实和空前的音乐美。这里全然没有那些非人和超人之类的画蛇添足的东西。这部作品与去年我们在这里观赏的《纽伦堡的工匠歌手》一起可以说是瓦格纳仅有的堪称“永恒”的作品。我们还看了一些别的东西，诸如沙克（Schack）艺术馆里的费尔巴哈（Feuerbach）的画作和施温德（Schwind）的小幅画作——以及在这个魅力无与伦比的幸运城市里的很多别的东西。

※ ※ ※

1913年秋，韦伯夫妇又一次——最后一次——结伴游历了意大利。他们参观了阿西西（Assisi）、锡耶纳、佩鲁贾（Perugia），然后再次去了罗马——这是时隔多年后第一次去那里。途中他们碰到了阿道夫·哈纳克，同他一起观看了一些东西，欣赏了他的智慧、和悦和儒雅。在佩鲁贾，他们忘情于以金黄色为背景的绘画中深沉的虔敬。这之后的大多数意大利艺术，尽管它们提供了丰富的表达手段，但在他们看来都显得肤浅。在锡耶纳，他们去追寻圣凯瑟琳（die heilige Katharina）的踪迹。她不愧是人类的一个奇迹——在这个灵魂里，爱所具有的令人迷狂的力量与英雄所具有的能量同样强大，政治直觉和真正的女人稚气的直率一样真切！他们也佩服那个教会，它善于以同样纯朴的智慧保存自己那些圣人形象的现实性。圣凯瑟琳被做成了木乃伊的头颅（虽然有些难看）不是比任何叙述都更能生动地表明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吗？

511

阿西西那时正好是大批德国朝圣游客涌入的时候，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有几个头脑简单的妇女心中自是纳闷儿，疑惑这里是不是海滨度假胜地。另有一些人则是被廉价旅游机会吸引至此。他们无意中听到一个在陡斜的街道上气喘吁吁地费力行走的肥胖朝圣者操着一口纯正的柏林口音说：“在柏林的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我同样可以赦罪，丝毫不亚于罗马。”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把在这里看到的東西作为真实来体验，并且深深感动于一个雕刻精致、真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像，就好像它真的就是那位死去的救世主。

的确，教会靠圣方济各（dem heiligen Franz）赚了很多钱，而他几乎被视为一个异教徒；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以赤贫如洗、谦卑和对耶稣第一代使徒的热爱来对抗教会在尘世中日益增长的辉煌。仿佛是魔鬼的作弄，一座巨大的供人朝圣的教堂富丽堂皇地矗立在圣方济各自己小得可怜的教堂之上；这是一座冷漠的白色建筑，一座反宗教改革的纪念碑。不过，那些装饰着以圣方济各命名的古老教堂的早期大师们的杰出画作，倾吐着真正的虔诚。在难以计数的画作之中，最让我们感到震动的是契马布埃（Cimabue）那幅《圣母》（Madonna）画中超越尘世的尊严，画中圣母周围有天使和圣方济各的动人形象；是西蒙·马尔蒂尼（Simone Martini）的《圣克莱尔》（Die heilige Klara）

的可爱的尊严；以及受到约翰内斯和弗兰茨推崇的洛伦泽蒂（Lorenzetti）的《圣母》（*Gottesmutter*）画中让世界为之倾倒的虔诚。洛伦泽蒂这幅静穆的画表现出完全沉浸在神秘之中的情感，韦伯夫妇之所以对此感受如此之深，原因在于它再次把他们带回了在他们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的境界中。在教堂的周边地区，圣方济各的精神仍然活着。白色的城市就像一道花边领子环绕着那座光秃的小山，山坡上都是石头，寸草不生，只有远处山谷里可以看到一片灰绿色的橄榄树。狭窄的街道存在着无法战胜的贫困。

罗马经历了丑陋的变化。新建筑物显得很失调，尤其是那座冰冷的白金色大理石纪念碑——意大利统一的表达和象征。甚至柏林的胜利大道都比它强。就像是糕点师傅做出来的一样，这座纪念碑不仅毁掉了古老的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tia），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它通过整个布局的位移而压倒和遮盖了矗立在它后面的朱庇特神庙（Kapitol）。新的罗马城居然像暴发户一样肆无忌惮地要与古罗马比肩而立，它的艺术家没有什么品位，尽管他们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竭力效仿的榜样。坎帕尼亚区（Campagna）壮观的荒凉也在消退。映入眼帘的是翻过的耕地、苗圃和新建的白色小房子——对于政治经济学家和卫生学家来说，这是一幅令人满意的景象，可是对于那些不负责任地只想要欣赏过去的风情韵味的人来说，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是，古老的遗风最终还是从现代日常生活中浮现了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加激动人心。跟以前一样，这次同样是古老的陵墓大道尤其让他们印象深刻，这条大道从罗马的喧嚣中像箭一般笔直地、无穷无尽地伸向坎帕尼亚的沉默之中。一排排幼小的柏树像仪仗队似的陪伴了它一程，然后便只有古老的伞形意大利五针松像沉默的卫兵一样散布于沿途颓败的坟丘旁边，将蓝色的阴影投在不再为活人所用的寂静大道上。这条大道通向何处？它的目的地在哪里？看起来它的目的地就是那些蓝色的山峰，山峰将这画面框住，同时又指向存在于山后的某种东西。在这里，大自然与镶嵌于其中的那些巨大的废墟一起构成的共同体令人叹为观止。一切的画面都是譬喻，一切的一切无论远近都以神秘的方式蕴含着意义。过去的伟大虽然仅见于断井颓垣，却逾数千年而继续产生着影响，同时作为流逝和永恒的象征而令人震撼。

## 第15章 母亲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海伦妮的形象。她生命的黄昏过得丰富充实，不断给她带来新的使命、喜悦和忧虑。她现在独自居住在一所小房子里，房子带一个极小的花园，没有半点大城市的气派：她越来越需要自由自在的日常生活。不过，她并没有多少寂寞的时候，除非是清晨或别人都已熟睡的深夜。她住在外地的孩子们以及甥男侄女经常享受她的热情款待。她家的对面是莫姆森的住宅，住着克拉拉多子多女的一家人。 513

海伦妮还在继续尽自己母亲的职责。她对两个女儿的产孕之事极为关切，几乎她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由她帮着接生的。她是一个非常娴熟的、经验丰富的产褥女护士，连做医生的女婿都顺从她那“老一套”。在这种亲自操持和尽情帮衬中她可谓如鱼得水，并且确信自己的能力（这在其他时候难得一见），且乐在其中。她会一连几个星期紧张忙碌着，一心扑在守护生命的幼苗上；在这宁静的几周里，她得到的回报是同女儿和女婿凝成的亲密关系。

直到了现在，年轻一代才充分了解到母亲形象的高大和她特殊的品质。海伦妮的女儿们在自己的成长期有时会觉得母亲有些烦人，现在却把她看成了不可企及的榜样。对于成长中的孙儿孙女们，海伦妮也有许多事情要做，要记挂在心——光是那么多的生日和圣诞节就够她忙乎的！海伦妮坚持要亲自给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送礼物，每次外出旅行总要被给所有的孩子们带“小礼物”的问题困扰。不过，她也试图通过与他们一起阅读将孙儿孙女们导入她的精神世界里来。荷马、卡莱尔（Carlyle）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事迹和弗里茨·罗伊特（Fritz Reuter）又被搬了出来。布雷希格（Bräsig）大叔有趣的滑稽故事总能不断引发孩子们童稚的哄堂大笑。尤其是女儿们需要休假时，她总伸出援手，常常是一连几个星期替代她们的位置，完全融入了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她那一双苍老的 514

手多么灵巧，多么勤劳啊，所有针线篮里需要缝补的东西都被她一扫而光。

就这样，年轻的生命让她一刻也不得停息。不过成年的儿子们也渴望得到她的帮助。她的儿子们都没有孩子，这似乎是一件好事，反正生活中已经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同他们一起分享。仅此一种无穷无尽的操劳就可以让她整天无暇他顾。她六十岁以后，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便开始出现，尤其是她最为劳顿的四肢，这时孩子们就试图让她少做点家庭之外的事情了。可是没用，因为自从丧偶之后， she 就把那时已经开始做的社会慈善工作视为自己的“职业”了。

这些年里有什么事情没有经过她的手呢?! 她总是感到自己心中有一种需要，要直接为穷困的弟兄出力；她也从来没有丧失过自己能够在道德上帮助他们的希望。比如说，为了抵制酗酒，冬天的严寒一开始，她就在自己家门口挂上一块写着“热茶”的牌子，以这样的方式邀请那些邮差、送牛奶的人、面包师和其他在工作时受冻的人进屋来暖和暖和。又例如，在任何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之前，她就用自家的炉灶为那些无产阶级家庭的产妇烧菜做饭，并设法让她们在家里得到帮助。

515 因为她有常年这样帮助别人的经历，对那些无产者的困窘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开始组织社区援助时她便能够在各方面出点子。她是夏洛腾堡“青年之家”（Charlottenburger Judendheim）最早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旨在在放学后的时间里帮助照管各个年龄段的劳工家庭的孩子，并给他们提供充满爱心的关照，以此来防止他们在大城市里堕落。年轻人推出的一些个人创意使这个青年之家发展成了一个模范组织。当助人为乐的种子以这种方式生根发芽，并结出了硕果的时候，她有多高兴啊！不断找到愿意为整个社区服务的新志愿者，给有产者圈子里的年轻妇女们灌输社会责任感，这些的确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她帮助建立起来的夏洛腾堡“家庭护理协会”（Charlottenburger Hauspflegeverein）也让她非常惦记。协会为穷苦人家的母亲们分娩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尤其是为她们送去家庭护理人员。海伦妮的一个主要伦理信念就是，丈夫也必须同妻子一起经历她分娩时那些最困难的时刻，必须感受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感受在孩子刚出生的那些日子里充满担心的幸福。因为妻子不在家里分娩丈夫就不能充分体会到自己责任的分量。时常惹她生气的是，劳工丈夫经常毫不体谅产褥期需要休息的妻子，在她分娩后很快便要与她行房，或者在妻子住院期间找一个“女友”来代替她。她坚信，如果丈夫能把女性承担人类衍延使命的重负铭刻于心，如果夫妇共同体验生死搏斗带来的震撼能将他们在超乎日常关切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那么丈夫就会有更好的自制力。

海伦妮在自己家里有一个“募捐物品收集点”，为孕妇和婴儿收集必要的食品和用具（从燕麦片一直到婴儿车），单是这个收集点就让她家里人来人往。此外，随着岁月流逝，她还增加了很多其他项目，尤其是夏洛腾堡的福利中心。海伦妮出主意，要把一

些市区各种各样分散的慈善工作加以整合，由一个中心领导。这项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要做的事情包括争取让那些本来是各自为政、以嫉妒的眼光看待一切新事物的协会之间相互合作；雇用训练有素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哪里有新的需要，就在哪里建立新的机构。这样一种协调一致的共同工作——拥有办公中心，除志愿者外还有领薪水的雇员——之所以迫切需要，其原因之一就是，事实表明，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儿童”同时从不同的地方接受照料，而那些羞于贫困的人则站在一边，并未接受帮助。所有分散的救助资源现在都应当被连成一个拥有多种渠道的网络，小心谨慎地加以分配，尽可能使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帮助，同时又不让任何人被诱导去做职业乞丐。这项由海伦妮倡导、很快得到了市政当局支持的试验属同类中的首创，成了其他大城市福利中心的样板。 516

海伦妮始终非常关心如何解决福利制度削弱接受者的道德力量和自尊心的问题，所以她总是力图通过为其寻找就业机会帮助弱者和能力有限的人。而这一点尤其难以做到，因为它不仅需要事业心——她的事业心很强，而且需要经商的经验——这是她所缺乏的。不过，胜利属于勇者！妇女们互相鼓励，群策群力，并乐于接受海伦妮的鞭策。她的经验如此丰富，总是那么兴高采烈、干劲十足，而且让自己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将自己放在人们最不愿意待的位置。就这样，共同的热情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她们给贫穷的妇女找到了长期的缝纫和针线活计，并为她们提供训练。她们为失业的男人建立起了“读书写字的地方”。

海伦妮最喜爱的一件事情是回收修复废旧物品。把那些损坏不能使用而注定要被销毁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其拥有者来说不过是累赘）巧手修复，让它们重新获得生命，这对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这样的方式，某些贫穷家庭就可以增添一些家庭用具。一开始没有找到地方做这件事情，她就把这些东西弄到自己家里来，亲手去做这个令人讨厌的工作，从一车车龌龊的废旧物品中挑拣出有用的东西来。

对海伦妮来说，没有什么努力她不能付出，也没有什么工作过于卑微。就让别人去劳心吧，她一直希望用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来为别人服务。她常常为一些个人东奔西跑，在集体项目中她也乐于填补空缺。她自称特别喜欢做年轻人觉得无聊的事情。那些别人感到力不从心的事情，例如亲自去说服酗酒者、游手好闲的人或者粗暴的丈夫，她则能以纯真的坦诚让问题得到解决。这位“市议员夫人”的猛烈抨击常常是卓有成效的，令人肃然起敬，不少遭到她严厉批评的过失者可能还以为她是个什么政府官员呢。在某种意义上，她后来果然有了这么一官半职：1904年夏洛腾堡市政府委派她在福利管理委员会就职，在普鲁士她是被委派这种职务的第一位女性。她在那里很快就与对她表示理解的市议员结成了朋友，并且能够从女性的新视角给他们展示很多东西。 517

如果是为了帮助个人冲破官僚机构的机械和僵化，她会坚决果断地同当局理论。她是“市民住宅”管理委员会成员，这种住宅对那些贫困老人开放，让他们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任何人不得携带自己的家具入住，而家具正是那种萦系人心的东西。海伦妮觉得这个规定不人道——假如女人掌握了权力，她们做事情将会多么不同啊！——然而她的斗争是徒劳的。不过至少有一次，她不顾一切规章，通过力争终于让一对老夫妇带着自己心爱的家什入住。对她来说，任何个人的命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无足轻重；她任何时候都不会倦于为这些个人而努力，为他们的福祉而操心。她与一些受自己保护的人逐渐建立起了难分难舍的情谊。当她感到“神圣的火花”在失去文化和社会传统的人的心中闪烁时，她是多么兴奋激动啊！不过，即便她清楚地认识到，确有无数量素质很差的人终归不可救药，她也并不气馁。一次一个在慈善机构接受培训的十六岁的孩子又从负责培训他的机构人员那里逃走了，海伦妮便把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里，每天早上6点钟亲自叫他起床，给他制订一天的作息时间表。直到一年之后，海伦妮才确信，即便是她自己也无法让这个孩子沿着正道走下去。

每年海伦妮与自己的孩子们都会发生一点口角，因为当盛夏时节人人都想要离开这座炎热的城市时，孩子们却不能诱使她离去——在这段时间里，谁来照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在这个季节志愿者们不能保持其责任感，对此她经常感觉有些不快，她自己定然不愿树立一个坏的榜样。她的行为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有很重要的意义，也不断激励着她的孩子们，正如玛丽安妮在下面一段文字里表达的：

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人无法做到的？有什么东西是人不能适应的？只有妈妈的生活在我看来完全超出了一切可能性。那所小房子不断被电话铃声吵翻。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打扰她，从原则上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她。对她来说，一天中留出哪怕是一个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家里像个满是“可怜人”和“受她宠爱而心怀感激的人”的鸽舍。这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一天从清早到夜里十二点独自一人所做的事情，从数量上讲让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深感**汗颜**，所以我总是跟她开玩笑说，谁要同她一块儿生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跟她生活的那个人会丧失一切自尊。然而，她并非机械地做任何事情，她的一切活动中都有热情的生命在搏动，都充满着她的精神。而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这些妨碍一个人集中精力于精神生活，同时又让她接触到那么多的贫穷苦难的琐屑之事，她仍然能够欣赏一切美好与欢乐，能够敞开心扉接受清新的东西。我们一起观看《无事生非》(Viel Lärm um nichts)的时候，我再次体会到了这一点——她表现出对粗犷、纯粹的快乐透着青春气息的陶醉！由此她确实确实让自己得到了放松。她是一个双脚踏在尘世土地上的**圣徒**。现在获得了内心和谐之后，她完全处于肯定尘世生活的健



康状态之中。

在给海伦妮的信中，玛丽安妮写道：

我再次感到完全置身于你无穷无尽的爱的海洋之中——天底下只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母亲！无疑让我们感动羞愧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做到像你这样。如果说“我们”有时候有点抱怨你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让自己不至于被自卑感压垮。不错，事情正是这样的。当然，我不能同意让电话主宰你的生活，这也太不近人情了。一个老妇为了让女仆们开心而一直待到凌晨一点才睡，这就更加令人不能接受了。不过，**其他一切**我都赞同！

人们需要不断地告诉海伦妮她对别人意味着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还很不满意。跟早年一样，她现在还总是对自己要求过于苛刻。年轻时，当对她个人提出的要求和激情压向她，让她感到难以驾驭时，她常常渴望着老年，将此视为获得自由和外在安宁的人生阶段。现在她自己的活动却总在制造新的斗争和紧张。她的心灵仍然年轻，可是她的身体却不再总能听从意志的指挥了。她的记忆接受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的能力衰退了。她为此感到痛苦，就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过错一样。她说自己把事情都弄颠倒了，说脑子已经老化，没什么用了，如此等等。至于自己身体的病痛，她只是一笑置之——她很不愿意被人问起这事。然而，脑力衰退则迫使她做出最后也是最困难的放弃。

519

她的家人对于她因自己而遭受的痛苦感到心疼，恳求她放弃她的部分工作，但被她拒绝了。只要她一息尚存，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正是**她**的工作，即无声无息地去做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无人能够代替。她不愿承认，她的存在本身——这种绝对无私的爱力量——的意义远比她的行动重要得多。所以，除了向她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之外，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减轻她的负担：让她暂时到汉诺威（Hannover）同尚未娶妻的儿子卡尔住一段时间，卡尔已经有相当长时间健康状况不稳定了。让她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工作和自己那个圈子而去适应一个陌生环境，这对海伦妮意味着要做出重大的牺牲，不过她准备好做出这种牺牲了，于1914年年初搬到汉诺威去住了一段时间。不过，在这之前，她要在家中庆祝自己的生日。

1914年4月，海伦妮的生命走完了第七十个年头。她现在真的成了老妪，身体略显佝偻。患疾的双腿使她在室外坚硬的铺石路面上行走越来越困难。不过，除此之外，她敏捷而精力充沛的行动仍然优雅而有力。她光滑整齐的头发的仍然是棕色的，不时有一小绺头发无意中溜出来，覆盖着布满皱纹的前额——这作弄人的一抹缓和了她其他时候

的严肃。她硕大而形状高贵的鼻子现在主宰了细窄的鹅蛋脸，赋予了这张脸以意义。她的双眼闪烁着发自内心的慈祥，嘴唇紧闭时常常透出感伤，但仍能露出会心的微笑。她容易兴奋，情绪热烈活泼，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一件事情都很坚决。她仍然力图理解与自己秉性并不相适的新事物，即便是抗拒天帝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在她心里也有一席之地。唯一让她默默地摇头拒绝的事情就是怀疑理想和逃避道德法则。如果有什么事情打动了她的心，青春的火焰就会让她纤柔白皙的皮肤透出红晕，激动的脸上每一个表情都会传达出深深体会到的生活的丰富，也会表达出对自己或别人的不足的悲哀，以及痛苦的放弃和虔诚的顺从。

520

为海伦妮准备的庆祝活动让谦卑的她不知所措。这次我们必须得让她知道，她自己人们对人们意味着什么。她满怀深情地播下了爱的种子，现在这些种子成了呈现在她面前的一束色彩缤纷的神奇的花。这是一次朝圣。人们用音乐和诗歌表达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她的朋友们送给她一颗金制的心，借以象征海伦妮自己那颗心。这颗金制的心里面装的确实是金子——这次她有东西捐赠了！庆祝活动的前一天自己家人聚集，是孩子们动口动手的表演。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那些家庭女护理人员就唱起了圣歌，然后是军乐队演奏的音乐，这是做军官的小儿子去订的，结下来是市里各个协会的代表，还有受她保护的人和朋友们。生日庆祝的活动安排对这个老寿星几乎有点太不人道了，但她是不会感觉疲劳的，因为她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以充满爱心和感激的言辞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玛丽安妮事后给海伦妮的信中谈到了这一天：

……爱得到爱的回报，人们在这一点上到底是公正的，世界的构造在这一点上也是合理的，这让人感到美好。当然，回报给你的爱的成色不如你付出的爱，我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你的爱是真正神圣的，因为它从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从所有我们这些世俗之人那里得到的回报是世俗的，给予这些回报时我们的心灵中有更多的私心，也不如你的心灵那么纯洁。尽管如此，我们回报的爱也仍然放射出美好和温暖的光芒。我们不能不如此爱戴和尊重你，这也许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

那天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海伦妮身边为她庆生，唯有海伦妮的大儿子马克斯不在场。他当时正在南方的旅途中，一些重要的事情使他无法赶来。不过，虽然身在远方，他看到的母亲的形象却更加清晰。他向母亲伸出了坚强的手。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比口头表达能力更强；他用文字写下的对母亲性格和命运的阐释，对母亲的意义也许像他亲自到场一样丰富：

亲爱的母亲：

距离你千里之遥自然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尽管要做出别的安排会很困难。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要恰当地表达自己的心愿也绝非易事。

让我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从我最初在埃尔富特产生与你有关的记忆算起，差不多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那时我总是把版画中的《西斯廷圣母》（*Die Madonna Sistina*）——当时是我们小寓所的“艺术珍品”——看作是你，把自己（典型地不懂得谦虚的人）看作是你怀中抱着的那个幼儿时的耶稣，而把其他兄弟姐妹都看成是天使。那时除了父母之外，对我来说仅存的人就只有蒙茨（Monts）阿姨（那位退休的铁路局局长）、“小索菲”和蒂德（Tiede）一家人了。那个时候，父母所做的一切孩子似乎都能理解，反之亦然。假如我们一直待在老地方不搬动，情形会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很大一部分问题以及后来遇到的所有麻烦都确实是迁居到柏林在那种环境中生活的结果，尤其是在早期的老朋友诸如弗里茨·埃格尔斯（Fritz Eggers）、尤利安·施密特和弗里德里希·克纳普一个个相继去世，而霍布莱希特（Hobrecht）一家变得日渐老迈之后。已经消失和被遗忘了的这一代资产阶级（他们的历史永远没人去写）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他们也给我们家里带来了一种思想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一个人去抗衡大都市氛围中的异化。这种氛围会对孩子们——至少是男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这些孩子有点神经过敏、易于受外界影响或性格内向的话，而我们几兄弟几乎都是这样的少年。你生活中最早经历的那些艰难苦楚，包括小海伦的夭折，我都完全没有同你一起共同感受，因为正如你之所知，我在智力上成熟得早，而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成熟得很晚。相反，那时正是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通常开始给父母，尤其是给母亲带来苦恼和担忧的时段，而她则完全无法进入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我在这方面做得尤其过分，就像我常说的，远远超过你今天能记起的程度。不过，这一切都这样淡忘了也许是件好事！然后是学生时代，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给你带来了新的严重忧虑，而我回应你的担忧的唯一方式就是疏离。

在那些年月里，成长中的男孩子们往往都特别不愿向母亲敞开心扉，原因是，他们那时感觉需要“独立”，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还力不从心，知道母亲的担忧和劝诫很有道理，正是道理在母亲一方这个事实最让他们难以忍受。我清楚地知道，从那时开始的艰难岁月的最初年头里，你儿子结束了肯定是并非所有方面都如人意的大学生活之后回到家里，他一开始没有给你提供任何支持，后来提供的支持也微不足道，这让你感到很失望。这种情况非常缓慢地得以改变。即使在情况改变之后，在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上，我也应为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承担责任。很多时候，我不仅没有让事情得到缓解，反而使情况恶化，直到最后一刻。

521

522

但是不管怎样，情况最终还是有了好转。或许你并没有体验到，但我确实体验到了这种变化在我心中产生的无限美好和温暖。我不仅将对此的**记忆**带入了我的生活，还带入了其他方面。假如我没有以当时那样的方式认识到你的生活——外在生活的艰难和内心生活的美好，那么我和玛丽安妮之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那些美好的东西就绝不会形成，也得不到发展。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很可能已经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主要让玛丽安妮对此向你致谢吧。这种变化并没有在我的兄弟姐妹身上立刻发生，由于他们年龄小一些，所以没有带着同样的意识马上经历其中不少的事情。不过，或迟或早，这种变化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确实发生了，在每个人那里方式都不同。虽然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迥异，但是这种变化给每人指出的方向则都相同。也许鲜有一个母亲曾养育过相互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如此难以抚养的孩子，而要让这些孩子**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则更是困难。然而，如果你撇开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的**的确确微不足道的**那么一点儿紧张关系，如果你不去考虑那不可避免或者是咎由自取的命运给个人带来的不幸，那么，你回首往事时就会说，他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要继续下去的一生都没有虚度。

因此，今天——我们怀着对过去艰难岁月的回忆，带着对身内身外困难的充分意识，例如不可避免和反复地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产生于所有参与者多少有些复杂的特性的困难——真的**是一个充满莫大喜悦**的日子。至少对我是如此，希望对你也一样。“她做到了尽心竭力”，这句话适用于你和我们父亲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不易处，到最后就更加困难了。我们所有的人今天对他都肯定有了一个公正的看法。在忘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之后，我们都能够欣赏他这样一个具有的确不寻常的、坚定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我们知道，他生命中的瑕疵是他那一代人的悲剧，他们的政治和其他理想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看到它们被年轻一代继承下去。他们已经丧失了古老的权威信念，但却仍然以专断的方式考虑问题，而**我们**已经不再能够接受这种观念了。假如没有你的爱——尽管面对各种冲突，你的爱却从未泯灭——他的生活将会很艰难。我相信，尽管他正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碰巧）有过一些艰难的经历（事实上毋宁说是有过对这种艰难经历的明确意识），但他今天也会这么认为，而且他甚至在当时就明白了这一点。

可是自那以后，你在同儿女和孙儿女的共同生活中，在大量的社会服务中获得了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现在要你在一段时间里为了履行人道义务而中断这样的生活，并且将你的部分工作从此移交给别人来做，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担心你今天会花更多时间怀着某种不安去展望未来，而不是满怀喜悦地回顾过去。不过，你想想，你居然能够下决心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而我们也居然能够期望你做出

这样的决定，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除你之外，有哪一个像你这个年纪的女性能有这种毅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与此相比，具体细节和其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你有这样的**意志力**，并能够将其付诸行动。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待你的这个孩子，你也会像对待你的两个大儿子和对待更小的孩子们一样，而他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对你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

我这里正是绿意盎然，群芳吐艳之时。我之前曾给玛丽安妮写信谈到过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南方**的春天。这里的春天不是一个莽撞的男孩儿：他奔跑着穿过原野和森林，让万物欢呼歌唱，让激流奔涌，万物复苏。这里的春天带着严谨的形式走进程式化的景致之中，给她带来了新绿和鲜花，仿佛有人将一个轻盈的花环戴在一个成熟女性的头上。这是一种即使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人——像现在的我一样，或者说像你这样年龄再稍大一点的人（并没有大多少，因为你生我的时候还是个年轻姑娘呢）——也能够在我心中拥有的春天。怀着一个人能够让这样的春天在心头永驻的想法，我用发自内心的古老而强烈的爱**祝福你**，亲爱的母亲。

524

你的马克斯

1914年4月12日于阿斯科纳（Askona）

# 第 16 章 为国效力

## 1

525

尽管韦伯仍然周期性地感到心力交瘁，但是现在他的工作精力和机敏活跃性都很稳定；有时候要不是回想起患重疾时的黯淡情形，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健康人了。他的亲朋好友们常常想：“唉，要是有一股巨浪掀起，将他卷入生活的洪流之中，那该有多好啊！”

1914 年的夏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夏至节前夕，大学生们在山林里欢庆节日。参天大树搭成的拱形树荫下的林间空地被火把照得通明。学生们在这里以精湛的演技表演了一出莎士比亚的喜剧，然后在火把之间欢快地穿梭奔跑。观众们都依偎在林间温暖的土地上。七月，海德堡大学副校长埃贝哈德·戈特海因在什未钦根（Schwetzingen）的城堡公园举行了一次聚会。通过兴高采烈的年轻人的言谈举止，你可以再次感受到轻松愉悦的气氛和讴歌世界的诗人精湛的机智幽默。下午的阳光弥漫着节日气氛，衬着希腊神庙的背景，这一切几乎比火把光照下的景致还要漂亮。在这个具有贵族气派的公园的林荫大道上，节庆的时光在悄然流逝。人们在夏日的蓝天下轻松地自由地徜徉，欣赏自己同学的艺术精神——世界是那么妩媚可爱。

此后不久，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韦伯家的“大厅”里挤得满满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同一拨青年和老年朋友，不过现在的气氛却不同了。他们挤在一起，谁也没有留意别人。一个邪恶的事件——萨拉热窝（Sarajewo）刺杀案——制造了新的邪恶；这具

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十多年来一直威胁着人们的那场灾难现在降临到了他们头上。但是他们仍然在反复争论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同可能性。战争的阴云以前也曾常常像现在这样压得很低，但最终总被驱散，也许这次也不会例外。他们对战争的恐怖还存在着各种想法，因而并不完全拒斥，因为他们认为，紧张局势的爆发、暴风骤雨的到来、冒险和世界秩序的崩塌，这一切难道不伟大，不激动人心吗？它们不是会释放被缚的能量吗？不管什么样的预感让人们心头战栗，一道深渊已经横亘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没有任何感知的力量能够跨越这道深渊。

那天下午，来的所有人都怀着紧张的心情聚集在韦伯的周围。他们的问题涉及了整个世界；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他们聚精会神地倾听韦伯说的每一句话。正是在同样的季节，在同一个房间里，韦伯有过他孩提时代最重要的经历——1870年战争的爆发。回顾往事，他感觉那时候的气氛似乎与现在不同，比现在要更加严峻，更为庄严。不过，事情尚未成定局，人们仍然可以与命运周旋。然而，有一点今天已经显而易见：这些年轻人之前一直在社会整体之外寻找自己存在的形式和内容，现在却准备牺牲自己而为社会整体效力。谁也没有用语言表达来亵渎自己的意愿，不过谁都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在学术和审美基础上形成的圈子，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太尊贵而不值得去服役。他们没有相互告别，然而在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就已经各自奔赴天涯了。

※ ※ ※

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而且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崇高感。然而，外部事件在这个小城市并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在教堂和市政厅之间的集市上，几乎只有来自旧城区街巷里的人聚集在那里打探消息。在那里听不到庄严的慷慨陈词。人们静静地站在一起听，然后又悄悄地离开。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最庄严的时刻——一个忘掉自我的时刻，一个大家团结成一个整体的时刻。对于社会整体的热爱打碎了自我的桎梏。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同胞情同骨肉，与他们结成了手足之情；他们愿意毁灭自我而为这种手足之情效力。

在归途中，韦伯夫妇在那座老桥的高处逗留了一会儿；夏夜的晚霞让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完美，落日的余晖像火炬一般在山坡上房屋的窗玻璃上燃烧。天高云淡，河流抹上了一层温柔的蓝色。世界幸福地沉浸在美中，然而它很快就将渴饮成千上万人的鲜血。这个世界将用黑幕罩住年轻人的双眼，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欣赏这个世界，对它的丰富内容还未充分了解；这层黑幕也将笼罩成熟的男人们夏日般的辉煌。人们现在心怀恐惧地处于现实的边缘。还有一些人的命运比年轻人的命运更加动人，这些人自觉而又清醒地从生命的巅峰走进黑暗。



然而，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行动的机会在哪里呢？与这一时刻相比，以往的生活全都显得那么苍白。昨天还充满意义的、重要的东西今天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每一个人都在找寻新的方式去行动和效力。他们找得到吗？韦伯早已离开军队，现在已年届五十，虽说看起来挺拔有力，但要长途征战是绝对不行了。他对于自己不能带领一个连队开赴战场深感痛楚：“在你的儿子中，我可能是天生最热衷于战争的一个。可是我却只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历这样的命运和这样一场（不管怎样）伟大而神奇的战争，它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我还可以罗列很多其他事情。即便如此，生活仍然不断带来很多使它值得活下去的新东西。”

不过，韦伯立即去卫戍部队司令部报了到，旋即被任命为预备役部队医院管理委员会的纪律督察官。由于一时找不到别的适当人选，他还被指定负责在海德堡建立预备役部队医院。韦伯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接受战备动员后的第一天早上8点就去了办公室：“我上班时间是13个小时。也许我还有机会被派到一个要塞或类似的地方去。可惜我不能长途行军，因此上不了前线，这的确让我难以接受。”

528 好几家大型部队医院必须在十天之内建立起来。他看到的计划和指令都很混乱，一点准备都没有。二十年前拟就的供货合同已经不适用。韦伯首先花了数日与未能按照当时商定的价格供货的那些愤怒的商人进行谈判。他不得不完全靠自己将所有的事情从头做起。为了处理好自己从未应付过的事务，他一头扎进了那些忙乱无序的事情中。成百上千种供伤员护理使用的物品必须尽快、尽可能便宜地想办法筹措，同时还得照顾当地的供应商。现在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些连名字都叫不出的物品——这些物品的义务就是当人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会理所当然地安安静静待在那里——包括勺子和使用勺子的厨师。韦伯甚至还急急忙忙地采购了厨房设备——这是平时与他无关，而且他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

最初几个星期的忙乱弄得他非常疲劳，他能够坚持住吗？他很容易被激怒，遇到上司和政府当局给他努力要办的事情设置障碍时，他就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例如，当设在卡尔斯鲁厄的军需处询问为什么要在一个部队医院里安装一部电话时，他将来函原件寄回，并附上这样的批注：“原件寄回。正常人都知道为什么那里需要一部电话，对不正常的人我则无法解释。”一次，一个不在规划之内的战地医院急切需要一批物品，尽管如此，同一个军需处还是要求首先提供一个所需物品的清单，因此韦伯就发给这些官僚们一份足有一米长的电报，以示惩罚。同样让他生气的是那些不必要的打搅，尤其是响个不停的电话；打电话的人离得太远，因而无法迫使他对他们礼貌相待。例如，有一次，从卡尔斯鲁厄的内廷总监处打来长途电话：“伤员情况怎么样？”韦伯：“哪些伤



员？”——“嗯，所有的。”韦伯（嘲讽地）：“喔，很好。”——“大公爵夫人殿下让我来请问您：你们是否欢迎她来访？”——“我不反对，不过我没时间领任何人四处观看。”对话到此结束。韦伯的军中同事——一个少校军医听说此事后感到惊恐，立即给来电话的内廷总监处打电话，非常谦恭地向对方保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大公爵夫人殿下的莅临视为尊夫人赐予我们的荣幸和恩惠。

如果说韦伯并不适于做“下级”，那么他倒是很适合做上司。他做上司的时候，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努力要获得他的认可，喜欢并尊重他。当时大学正在放假，他的一个朋友——解剖学家赫尔曼·布劳斯（Hermann Braus）志愿担任韦伯的私人助手，每天都来办公室。这个明智谨慎的人充当了韦伯与风云激荡的外部世界之间有益的缓冲器。其他跟韦伯是朋友的同事也伸出了援手。学术研究已不可能，人人

529

人都争先恐后想法以某种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韦伯让他们负责监督建立医院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志愿者做助手，他们现在不仅能够设法帮助治愈伤残的肢体，让伤员们投入新的战斗，同时也能设法让那些因战争的恐怖变得麻木僵化的心灵在爱国热情中复苏。当第一批伤员到达时，这些志愿者们都在场。他们拥抱、亲吻伤员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帮着把被鲜血浸透的军装从伤员身上剪下来的时候，目击了惨不忍睹的一幕。“这是为了你”——这种让人充满责任感的意识在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心中激发出了爱的力量。

这家部队医院现在是一个按照自己的规章制度运转的世界。每一个被命运的巨浪冲到岸边，带着残损的肢体来这里的人，都成了一件新赠的珍宝，值得所有健康的人倾尽全力将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每一个新近为了大家而承受无情牺牲的人都将在这里重新获得他生的权利。在这里充满同情心的爱是对这些个人的重大亏损所做的补偿。无数普通人家的子弟还从未像在这里一样感受到这么多的爱。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医院变成了他们的新家。激越的感激之情也从外部渗透进了军队系统的每一个缝隙。这个小城市的居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运送重伤员的长长的担架队穿过街道。每个伤员在他们眼里都是英雄，礼物铺天盖地而来。德国多么富有啊！面包师、屠夫和杂货商都捐款捐物。没有意义？不理智？不错——这种过分关爱必须得有个限度。不过，能够出现这样的热情，秩序井然、自尊自爱的市民们能够如此慷慨，的确是一件大好事。这头几个月真是不可思议地美好！所有的内在生命都简化成了单纯而伟大的线条。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都消失了。每个人都怀着良好的心愿。每天都会采取一些行动，每天都有紧张气氛出现。个人的考虑在超个人的利益中被扬弃了：这正是存在的最高点。

530

从英国站到敌国一边的那一刻起，韦伯就认为德国的形势非常严峻。不过，当德国的旗帜在那慕尔（Namur）和列日（Lüttich）飘扬时，他感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然而，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整个民族的这种态度，这种战斗力、忍受痛

苦、牺牲和爱的力量本身似乎是崇高的。在战争势所必至的情况下，韦伯为能够经历战争而感谢自己的命运：“因为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神奇的。”（1914年8月28日）“这场战争尽管残酷无情，但仍然是伟大而神奇的，值得去经历，更值得去参与。但遗憾的是，战场上不需要我。假如这场战争发生得是时候——比如说在25年前，也许我是可以上战场的。我的兄弟都上了前线或在服预备役，我的妹夫就牺牲在塔能贝格（Tannenberg）。”

通常独自伏案的韦伯，现在却要在最高强度的集体劳动的激流之中航行。一个不断扩展的网络是通过他的办公室连接起来的。在他的管理下，当地新建了九个部队医院。在这些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之后，他担任的另一项令人不快的的工作——惩戒违纪行为——便被提上了日程。韦伯作为纪律督察官的职权范围包括整个地区的约40家部队医院，对人的认识和体验范围很广。这些认识和体验展现了与精神振奋相反的不那么崇高的一面，展现了回落到平凡的一面。

韦伯现在每天的工作涉及对部队医院里病人违反纪律的小过失进行处罚，这类工作的单调乏味常常让他感到烦恼。整个监狱已经爆满，那些可怜的过失者常常要等上一个星期才能服刑。为此韦伯常常情绪不佳，不过他的恪尽职守值得赞赏。韦伯的“同事”们乐意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都推给韦伯去做，并且声称他自己缺乏耐心做这件事。

虽然韦伯对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人所犯的过失很敏感，但那些布衣的叛逆和恶习（尽管他必须对其加以惩戒）并不妨碍他对这些人持有的好感。

531

有些东西一再向我们表明，生活是有价值的，我们这里的人们给我的印象也属于这一类东西，尽管作为海德堡地区后备役部队医院的组织者和纪律督察官，我看到了这些人几乎**所有**令人反感的方面。我们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生活在高雅文明中的人们，同时又能应对外面战争的残酷（后者对塞内加尔的黑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成就！），然后回来（**尽管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仍然像绝大多数我们的人民一样行为**非常得体**——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令人不快的恼人作为，但我们**绝不**应当忽略这种人性。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种体验将永远存在。

1915年1月13日

除了与部队医院的病人和医务人员打交道，韦伯还得接触各色人等：医生、红十字

会的官员、护士、护理员和厨师。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在这样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团体中事情每天都会发生——人们就会找到他，把他当作所罗门王一样的法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他来调停，例如：医学权威们插手管了相互之间的事或者擅自做出了某种安排，监察员对护士举止失礼，主任医师的情妇冒犯了别人，护士不经意对一个粗野的家伙出言不逊，鸡蛋和葡萄酒被盗，甚或某个歇斯底里的女厨用炖汤锅洗了头！或者韦伯负责的区域里某个镇长大人亲临办公室，声称这样一个早已建成的漂亮部队医院应该已经住满伤病员了；他辖下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强烈要求分配部分伤员给他们。这位镇长被告知，很不幸，不可能单单为了先生您而让更多的军人在战场上受伤。或者还有一次，结果发现另一个地方的镇长擅自在夜间将部队医院运送伤员的列车截下几个车厢，然后携带战利品凯旋。如此各式各样的逸闻趣事汇入了韦伯的逸事宝库。韦伯频繁外出，他的汽车每天都在这个地区疾驰而过，人们把他的车叫作“黄祸”，而称他为“飞翔的荷兰人”。

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出现，例如对敌方伤员，尤其是法国人的态度。韦伯希望这些伤残的俘虏只是作为需要被诊治的人类同胞。他认为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人道和审慎地对待敌人从政治上讲是明智的；这也必将改善德国人在敌国的命运。所以他也允许娶了法国太太的阿尔萨斯（Elsaß）的施教授 [Schneegans] 和瑞士的 F 教授探访法国病人，并以小礼物来愉悦他们。然而，这在某些圈子里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尤其怀疑那个阿尔萨斯人，惊动了地区司令部。但是韦伯以军人的荣誉来打动他那个优秀的上司，向上司表明，屈服于公众舆论非男子汉所为，以此让他的同事得以继续来探访。可是韦伯的朋友，另一位教授 [特勒尔奇] 对此不以为然。这位教授负责的医院里有一些法国步兵分队的士兵。在阿尔萨斯同事来探访时，他在并未知会韦伯的情况下让一个军人陪同。这位阿尔萨斯同事本来就感到身边敌视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此时更将此事视为对他缺乏信任的标志。他深感受伤，因此拒绝再来探视。韦伯激愤不已，以粗暴的方式与这位教授朋友断了交。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不成比例，类似的情形在韦伯那里时常发生。他后来为自己的过激行为道了歉，同时也期望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对方并未这样做，因此二人也一直未复交。直到五年后，他们的妻子才使这两个固执的男人言归于好。

对于施教授而言，继续待在海德堡已经不可能了。他主动辞职，打算移居瑞士。可是地区政府拒绝给他及其妻子发放护照。韦伯写了一份很长的请愿书向当局求助，其中把对施教授的怀疑称为战争心理的影响，并指出当局的举措在政治上尤其不明智。试想，如果弄出一个“施某事件”来的话，那么不仅会在敌对国家，而且会在中立国家里造成恶劣的影响！试想这在阿尔萨斯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护照随即签发下来了。

虽然韦伯感到需要保护那些拥有双重国籍、内心严重冲突的人们，但是对于那些在

533 民族冲突中不是保持沉默，而是聒噪不已的人，他也决然弃之，不再往来。例如，不管是英裔德国人张伯伦（H. S. Chamberlain）的亲德言论，还是旅居国外的德裔批评自己危难中的祖国，都同样让他感到厌恶。当一个老朋友这样做的时候，他对其作了严肃的劝诫，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此韦伯以下面一段话与这位朋友终止了友谊：

您有两个祖国。这是您的命运。对此您没有任何选择，您也并不想改变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给了您某种权力。我们的祖国正在生死线上挣扎——在世界强国中她是**唯一**一个处于这种命运的国家，在这一刻您可以在很多方面与我们其他人有不同的感受。不过，您也因此而对自己出生的国家负有某种义务……尤其是某种情况下**保持沉默**的义务。没有哪一个德国人会承认您有权对如何缔造和平说三道四，更不消说您的那些必定会让仇者快的高论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体面的和平吗？我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喔，别急，确有这种可能性！而它也许就来自意大利，假如我们可以无赖到毁弃自己的盟约，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是德国人的话……够了！显然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再相互理解了。对此我感到遗憾，因为您是知道的，我对您一直颇有好感。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也包括我自己。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您的错误更加具有灾难性。您没能很好地应对当前的局势，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每一个人都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自己**无权**去做的事情。

※ ※ ※

最初几个月的繁忙常常挑战了韦伯精力的极限，尤其是他平时有早上睡觉的习惯，现在却认为自己应当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估计到圣诞节自己的身体就支撑不住了，但结果身体并没垮。相反，他不稳定的生理机制却越来越适应了这种公务，似乎因此而获得了平衡。这是一个奇迹。韦伯过去几年里常有的患病感觉难道只是一种“幻觉”？不，因为就对神经中枢的要求而言，即便是一个公职人员最紧张的工作，也显然远远不及**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病态心理唯一的遗留症状是韦伯对限期完成任务仍有恐惧感。新的体验现在覆盖了深深埋藏在心底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不断地造成那种恐惧。韦伯现在痊愈了。

534

生活现在要简单多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有一个旋律，时光如奔腾的激流一般飞逝而过。每个人都常常为能够帮助别人和为别人提供咨询而感到由衷的巨大喜悦。韦伯星期天也要值班，只是下午才在家，而星期天下午总有很多朋友聚集在他家里。即使是在度假期间，星期天也非常忙碌，因为人们想让韦伯分析当前的战事，提供他对局势的判断。这是谈话的唯一主体，不过这个主体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时常也有从前线归来的朋友来参加，他们因伤而在家乡休养一段时间。只要他们在场，就会成为聚会的焦点。他们的故事总让人听不够，因为他们每个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他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反映出了大难不死的幸运和为崇高目标而献身的精神。看着他们挺拔的身躯真让人精神愉快。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久前还是年轻人，现在穿上军装俨然是成年男子了。大多数休假中的军人都显现出一种奇特的紧张特征，反映出他们内心始终保持着的警惕、自己沉重的责任感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他们很自信，但同时也明白，自己的视线所及仅仅是规模庞大的战线中一个小小的断面，自己经历的也无非是自己的行动而已。他们现在也很想听听自己的家乡是如何评价整个形势的。这些军人大都同意韦伯的观点，因为他们感到，尽管我方取得了许多胜利，敌方力量的优势正在日益增长。

相反，在某些留在后方而现在也乐于谈论政治的人们眼里，韦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将这次战争仅仅视为一场防御性战争，而且认为应当尽早结束。任何想要长期占领战争中夺得的领土——不管是在东线还是在西线——的想法在他看来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管是常鸣的欢庆钟声，旗帜飘扬，还是激动人心的胜利，都没有一刻模糊过他对局势的看法，即认为德国面临危险的局面，时间对德国不是有利，而是有害。早在1914年9月，他就要求政府将比利时确定为一种“动产抵押品”（Faustpfand），答应将来会完璧归赵。十月份他写道：

我们应当如何来设想和平呢？和平什么时候到来呢？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我们外交上的极端无能而在流血牺牲——遗憾的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即使这场战争最终有一个好的结局，我对于持久和平也不抱希望。假如一切都像军队领导这般出乎意料的好，我们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他多么希望看到事实能够证明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啊！

※ ※ ※

后方的服务不断会有新的任务：组织照料残疾军人，然后得为那些缓慢地恢复健康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对这些人来说，部队医院的枯燥乏味很危险。韦伯为伤员们开办了成人教育班和教授他们手工技艺的课程——这项工作对志愿者们来说既新鲜又有吸引力。在讲授临床医学那个半圆形的阶梯教室里，一排排坐满了身着浅色病服的人们，成年男人中夹杂着很多稚气的面庞。韦伯自己亲自登上讲坛，他身着朴素的军灰色制服，很配他高贵的身材。他给这些听众解释了什么是货币的本质，另一次他谈到了俄国和德国农业宪法的区别。

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马克斯在下班后为伤员们搞了两次讲座！部队医院里现在开设了成人教育班，以便让正在康复的人们有点事情做，也让他们有提高的机会。所以马克斯试讲了两次，他的讲座非常清新，非常生动，仿佛这16年来他并没有停止授课！而且讲座并没有给他身体造成任何伤害。如此看来，非战争不能智胜他精神上的障碍。

536 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到处都深深地沉浸在爱、诗意和庄严的气氛中。赠送和接受礼物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眼睛湿润了，像孩子一般快乐，其中很多人以前还从来没有以这样典雅的方式接受过礼物。在那些向接受礼物的人们致词的人中也包括韦伯。当他站到高大的圣诞树前，接触到人们投向他的目光时，他的矜持中透出了内心的激动。他知道，这些人必须回到战火中去。他的声音像管风琴的音响一般沉重。他谈到了战死沙场的伟大，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死亡的降临令人无法理解，是一种非理性的命运，从中无法推导出任何意义。我们只能接受它。然而你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明白，如果命运如此安排的话，你们是为了什么而死，为了谁而死。任何一个征战不还的人，都给未来播下了一颗种子。为了我们民族的自由和荣誉而英勇牺牲是至高无上的伟业，将会激励我们的子孙万代。没有比这样死去更加荣耀，更有价值的方式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了。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死赋予他们一种完美，而这种完美是生或许不能给予的。

韦伯这些话对听众的心灵有什么样的触动呢？每个人都有权利希望，死亡不要降临到自己头上。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告别时能够坦然而直接地说：“只要德国能够永存——即便我一去不复还也在所不辞。”

## 2

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里，韦伯一家遭受了重大损失。他最小的妹妹莉莉的丈夫赫尔曼·舍费尔，在塔能贝格附近阵亡于大战前的小摩擦中。他是一个高尚的人，非常亲切善良，品格高洁，是个严于律己的艺术家。所以他觉得承继自己天才的父亲，那位新哥特式建筑师卡尔·舍费尔的精神遗产殊非易事，日常生活也常常给他带来沉重的压力。战争一爆发，他就情绪高昂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作为一名军官入伍参战。他满腔热情地奉献自己的一生，他的娇妻也很清楚，自己没法不让他从军，尽管她预感到自己也许永远见不着他了。现在死亡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么快就夺走了他的生命，留下

了一个年轻的遗孀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然而韦伯不仅看到了他的牺牲对于整体的意义，而且也看到了它对于死者个人的意义。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

毫无疑问，他想要与你共同生活下去，因为你给他带来了他生来应该得到的一切幸福。然而，既然人固有一死，那么，在这场战争中像这样死去是他所不愿意逃避的。因为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战争本身的伟大和神奇超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想。而超乎这种预想的并不是战场上的成功，而是战士们精神，在这里的部队医院里，我们可以看到，而且每天都确实看到了这种精神；总的来说，人民的精神也超过了我们的预想，至少在我们这里是这样。我从来没有企盼过这场战争，而且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都不应忘记这一点。即便是一个美丽而丰富的生命也值得去血洒疆场。这是**他**可能有的想法。自然，就像我们大家一样，他会惦记着你和孩子们。 537

※ ※ ※

1915年韦伯夫妇还遭受了两个对他们具有深刻影响的损失：老朋友埃米尔·拉斯克和韦伯的弟弟卡尔·韦伯都战死疆场。他们两位都是颇有成就的大学教授，自愿投笔从戎；他们在处于自己事业的顶峰时，带着各种各样的使命和计划告别了人生。在这里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勾勒一下他们的人生。

犹太人拉斯克是一位哲学家，在具体行动的世界里他是个陌生人。他的世界是在哲学思辨那个白雪皑皑、高不胜寒的峰顶之上。在那里，他熟悉所有的路径，迈着自信的步伐前行；在那里，他可以做别人的向导。他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将普遍的形式赋予了大量混乱的个别现象。这种普遍形式对他来讲是神圣的，因为他将其不可动摇性视为自己渴望的绝对真理之保障。然而，他炽热的心灵不仅热爱超现实的东西，也同样热爱人间具体的现象世界，任何一种形式的美他都喜爱。他的聪颖睿智像闪电一样划过一切人性的东西，他幽默机智的火花善于照亮人性的弱点。不过他也以满怀崇敬的心情诚服于一切伟大和美好的东西。不管在何处，只要某个人身上这种伟大和美好打动了**他**，他就会从此以后将它们视为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一旦热爱鲜活的美所具有的魅力攫住了**他**，他整个身心都会因兴奋激动而像在燃烧一般，然后他的诚服就会导致自我放弃。即便是友谊的微弱表示也会激发他的献身精神，也会铸就他的忠诚。尽管如此，他仍然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他不善于为人处世。每当他面临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刻，他总会陷于忧郁的斟酌考虑之中，陷入苦思冥想和绝望。当幸运惠顾时，他会同时看到幸运的转瞬即逝；他的先见之明让他畏缩不前，不能断然采取行动。

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为国效力的决定。在大地浸透了同胞鲜血的时刻，**他**

不愿以供奉神庙来保存自己。他已经不年轻，也不强壮；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已经不可能享受驰骋沙场，让生命的活力尽情挥洒的乐趣了。从军的路上并没有幸运、桂冠和指挥权在向他招手。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兵踏上了征程，等待他的只是服从和忍受。在后方长期担任了一些单调乏味的工作之后，他终于（作为一名军士）奔赴战场。他因近视而不能射击。命运让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致命的枪弹旋即击中了他。从学术角度看，这可被视为一种无谓的牺牲。然而，谁有权利阻止他违背自己的自然禀赋去做崇高的事情呢？谁有权利阻止他的这样一种始料未及的终结呢？

韦伯在给家人的信中说：

要告别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特殊人才，很难一下子找到一种恰当的态度，尤其是想到他仅仅是在加利西亚（Galizier）的荒郊野地里与野蛮人的战斗中无数阵亡者之一。最初让人感到的是不折不扣的愤怒。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死证实了对学生的教诲，这并非毫无意义。他是一个心里不存什么幻想的人，只是把奔赴疆场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对此高谈阔论完全有悖于他的秉性。然而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与他在讲坛上所持的观念是吻合的；同时他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所有的人都常常不能够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尽管他希望继续活下去——这我们是知道的，不过假如他能够回首自己生命的终结，他现在也会赞同自己做出的选择。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假如他做出了其他选择，他就会不断对自己产生怀疑，就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对一个生性非常勇敢，可就是不适于从军的人，更合适的方式是献身于自己的职业。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观点。不过我们知道，假如是这样，那我们以后就不可能让他摆脱这样一个痛苦的想法：“你应当像别人一样去行动。”他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诚实的人，因此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短暂的犹豫之后便走向了战场。

※ ※ ※

卡尔·韦伯的死与拉斯克的死不尽相同。卡尔·韦伯是一个斗士，天生尚武，他的血液里沸腾着军旅生活的冲动。他带着对生的迷醉奔向了死亡。卡尔和马克斯兄弟之间年轻时彼此疏远，只是在战争爆发前一年才找到了心灵的默契。弟弟当时内心十分苦恼，从哥哥那里获得了支持。韦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卡尔的死也持积极态度，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了始终一贯的朴实，正派的内在客



观性，默默无闻地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对“得到承认”不屑一顾——简而言之，培养出了一切让我们现在如此欣赏的性格，这对于他这样秉性的人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历程啊。他年轻时性情可完全不同。他性格中的活力和严肃来自于命运和他自己的修养。直到成年为止，他一直是一个让你操了多少心的问题孩子啊；多年来他的性格赢得了我们所有人无条件的信任。而且他最终彻底理解了您，而获得这样的理解在他曾经是那么困难。我和他之间最后几次谈话中，他表现出了美好和动人的情感；其中一次谈话表明，**完全理解和透彻地了解您**对他意味着什么。最后，他是在当下唯一值得献身的地方死去的，他死得其所。

1915年9月4日

卡尔·韦伯（1870—1915）年轻时曾有不少问题，成人之后则成为了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善良、可靠，富有献身精神。他以前非常讨厌上学，待他好不容易上完中学后，便在天才的导师卡尔·舍费尔（他对舍费尔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指导下开始过一种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生活。他的艺术才能和做教师的天赋得以发挥，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激情。作为政府雇用的建筑工程师，他年纪轻轻就接手了一些重要项目，其中包括修复多布里路克（Dobriluk）和奥利瓦（Oliva）的教堂。在但泽（Danzig）以及后来在汉诺威做教授时，他在自己身旁聚集了一批学生，他们崇拜和追随他，就像他自己和当时自己那个圈子的人当年崇拜和追随他们的导师舍费尔一样。

海伦妮播下的爱的种子接出了丰硕的果实。他这个儿子是她的孩子中最崇拜也是最爱她的了。少年时代他很少听母亲的话，走上了迷途。当他后来迷途知返，通过艰苦努力而清醒过来，达到高尚纯洁时，他将此归功于母亲对他的影响。他确信母亲的榜样和教诲所播撒在他心里的种子已经发芽生长。战争一爆发他便立即奔赴战场，但很快就因患重病身体垮了下来。经历了好几个月久病不愈之后，他身体勉强有了好转，随即便不顾医生的忠告，跟随他的部队去了东线；似乎他的康复就只是为了重返前线。他挣脱了亲人的怀抱，家人也不敢阻止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光焕发。他走了，陶醉于为伟大事业而捐躯的兴奋中；胜利还仍然在向他招手，德国军队似乎还仍然由一股神力在引导。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夏末。在向东挺进的最初几次战斗中，他被一颗子弹击中。这在他的意料之中。海伦妮肯定他为伟大事业而献身的行动。卡尔死去很长一段时间后，韦伯在给卡尔遗孀的信中这样描写了自己的弟弟：

540

亲爱的玛尔塔（Martha）：

我曾经在独自一人乘火车长途旅行时读过卡尔的这些信，现在又静下心来重读一遍。带着受到深深震撼的心灵，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您表现出的这种

令我感动的信任。这些信中动人地表现出的极大的真诚和深刻，以及细腻的情感，让我更加痛彻地感到遗憾，因为最近几年才建立起来的理解的纽带没有时间和机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彼此很少见面；我们年轻时的那一层隔阂，从那以后相互不得而知的许多各自的经历，都必须先退居脑后，让位于新近的共同感受。

我们这些当哥哥的——或者至少是我——年少时对卡尔很不公正，从根本上讲这在于我们没能意识到，当时他的外在表现方式，他的言行举止，并不是装腔作势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在我这种缺乏诗意的人眼里看起来那样，而是艺术家的一种完全真诚和合理的言行。可那时我对此却一窍不通！在杰出的导师舍费尔指导下工作让他感到非常兴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由于我们彼此没有见面，所以他的激情并没有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卡尔命运多舛——对此我也只有部分了解，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放荡不羁地享受生活了，他有了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他的外在性格，只是在我们变得亲近起来之后我才看到这种性格的改变。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令我一时竟完全忘了问，这一切是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不过与此同时，我的生活阅历和对人世的了解让我明白，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年轻时的卡尔，那时我们对他是不公正的。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开心见诚将这一切谈开。可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541

不过我怀着非常高兴和激动的心情看到，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对您深深的爱，这种爱重新发掘出了他心里那些深深埋藏在（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经受了令他人伤心的艰难经历之后）灰心丧气和过度自责之中的东西，他以毫不容情的诚实对自己进行了这样的自责，因为他曾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信任的人。应当感谢命运让他从根本上摆脱了灰心丧气和过度自责，给他带来了如此辉煌和成熟同时又如此富有魅力和朝气的生命的第二春，以此作为他为追求最高目标而上下求索的生命的完成。在你们彼此的关系处于关键时期的通信中交替出现的乐观自信和失望沮丧，充满了人间的真诚，同时也表现出卡尔对自己宗教态度的诚恳表白，他的这种态度与我们时代的命运是合拍的。这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它让我看到，他在这方面也“毫不虚伪”，而今天很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在这方面常常显得虚伪，这些脆弱的心灵不能接受现今生活的真相。而他能够面对这种真相，没有在如此坎坷的命运和如此严厉的自我批评中迷失，这些都证明他心中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仅仅这一点就让人不能不喜爱他。

我们因此而感谢您——或者毋宁说，亲爱的玛尔塔，看到您明确表达的信任之后，我只能打心眼儿说——我们感谢你<sup>①</sup>以如此美好的形式赠给了这个行将赴死者

① 韦伯在此有意把信中更为正式的称谓“您”（Ihr）改成比较亲切的称谓“你”（Dir）。——参见英译注

令人赞叹不已的爱情，这种爱情渗透在最后这些感人信件的字里行间。不管怎样，他的一生是伟大的，如果你继续向这个辉煌的伟大生命敞开你的胸怀，你的生活就会几乎总是与他的精神同在。

1917年6月20日

※ ※ ※

卡尔的死亡创建了新的亲密关系。韦伯的小妹妹莉莉在丈夫战死后带着孩子搬到了卡尔那里，他们兄妹在青少年时代最为亲近。现在，还没等这里变成她自己的家，这个家本身也解体了。之后，莉莉在海德堡为孩子们建立了新家；韦伯开始了一项新的任务，对莉莉履行自己做哥哥的义务。他乐于承担这个新的任务，告诉莉莉说，自己亲妹妹近在咫尺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同时他似乎也在无意之间撩开了一点覆盖在他自己身上的面纱：

……值得一提的是，我也许会继续比自己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内向，或许更加孤寂，还会继续是一个不那么易于接近的人；我天生不是一个好交往的人，一些曾爱过我和仍然爱着我的人常常为此而感到痛苦，或许还在感受着这种痛苦。因为我对于客观事物非常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只是在罕见的美好时刻才决定对涉及个人的事情发表意见），这就让那些对此抱有错误看法的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你是不怕与人打交道的，所以也千万不要对此感到吃惊。然后一切都会顺利。

只要时间允许，韦伯就会去关照这个孤儿寡母的家庭，并很快就与这个家庭的利益结下了难解难分之缘。

今天早上，孩子们非常可爱地在小克拉拉的指挥和带领下为我唱起了小夜曲。发现自己成了被“祝贺”的对象，这种场合让我感到有些窘迫，在类似场合我总有这种感觉——试想想莉莉吟诗作赋的情形吧！不过这令人感觉非常惬意，这显然将我归入了《马克斯与莫里茨》（*Max und Moritz*）、《虔诚的海伦妮》（*Die Fromme Helene*）书中讲到的“老”大伯一类了。代我向莉莉致以最美好的谢意。她的孩子们很讨人喜欢。

1916年初，韦伯陪着妹妹去了埋葬着她丈夫遗体的军人烈士墓。墓地坐落在遥远

的东部边境地区，保护这个地区不被波兰化一直是韦伯深为关切的问题。从下面这封他给海伦妮的信中可以看出，在这次旅途中，这个地区的个人和整体的命运多么深刻地打动了她：

543 我们往返东普鲁士的行程不错，甚至对我的脑子也有裨益，它已经变得非常迟钝和疲倦，而这并非因工作所致，而是那种不尽如人意、算不得真正工作的工作造成的。不过我只是倾向于保持沉默而已，我最近一直是如此。在那里，坟墓躺在新翻犁的土地上，奇特的小型“贵族村庄”由于经济衰退而彻底变了样，那里还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这里，一种以奇特方式承受着重负的生活以一种美丽而有意义的方式结束了，最终从过量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在那里获得的所有这些印象以及大量的回忆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既无法也不想用语言来加以表达。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印象眼下可能还没有什么意义。……我发现玛丽安妮的精神状态很好。她心灵深处的开朗乐观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次又一次地给了她帮助，将来不管什么事情发生，这仍将帮助她渡过难关。



1914年底——这时战争看起来已经是要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了，所有早先的那些经历都恍若隔世——韦伯递交了辞呈，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所做的工作感到厌倦了，而是因为在军队的一个同仁重新恢复现役，因而成了他的上司。对于承担主要工作的韦伯来说，这样一种关系有些不合适。但是上面并不想放弃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于是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韦伯又继续毫无间断地干了九个月。当雅菲试图吸引他去布鲁塞尔待几天，为筹办一个社会政策项目提供咨询时，他回信说：

您知道，我是自愿报名在这里服役的（因为我已经不必再服役了），任上尉和海德堡后备役部队医院委员会的部队成员，委员会下辖整个地区的42家部队医院，其中我负责新建了九家，并且基本上独立负责这些医院的纪律和经济管理。这里的公务不允许我较长时间的休假，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只休息了两个星期天；我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或八点一直都在办公室或在医院里。如果我接到命令或者得到军事当局的许可而受到派遣，我当然做好了准备去做任何事情，或者去任何我能派上用场的地方，可是我自己并没有去“谋求”任何东西。由于我无法行军骑马，因而在前线的战斗中派不上什么用场，这让我非常沮丧。因此我只是想要向我自己表明，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在1915年秋，长期以来并不合法的后备役部队医院委员会不得不解散，委员会的职责要由那些不适于执行战地勤务的军人来接管。当韦伯得知统帅部正在为如何“安排”他而绞尽脑汁时，他请求获准退伍。

尽管他基本上已经厌倦了马不停蹄的办公室工作，他起初的主要感受仍然是一种悲伤，因为他不能再直接提供帮助了。他曾怀着令人感动的奉献精神忠于职守，做着那些日益变得枯燥乏味的工作，现在再次失去了工作。他的下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的离职都感到遗憾。他们敬重他，同时又因他富有人情味的为人处世而感到身心泰然。由于他总是在“上司”面前庇护他们，所以在他领导下工作令他们感到愉快。他们煞费苦心地将送给韦伯一个纪念相册作为临别赠物，相册里是韦伯领导下的所有医生、文职公务员和部队医院的照片。这着实让韦伯感到开心。

他现在应当如何提供帮助呢？当时比利时的社会政策项目又在呼唤他。他便前往参加讨论，但那只是一个临时的任务，后来就不了了之。

在布鲁塞尔可以看到一种怪诞的幽灵似的生活。美国的救济基金会像一个“平行政府”一样隐秘地存在着，给比利时人提供生活食品，因此比市长们更有权力。比利时政府的各个部（国防部和殖民事务部除外）主事的都是德国人，一般官员则为比利时人。同时还有一个德国的行政机构，其中每个部门都各行其是。布鲁塞尔的生活变了：优雅高贵、车水马龙和精美服饰都已荡然无存，那些“精美”房屋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除此之外其他一切看起来跟在德国国家里差不多，只是在司法官顶上架着的大型火炮和政府部门前的机枪提醒着人们这里紧靠着前线。公园、政府各大部门前和其他地方的岗哨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大型精美的饭店几乎无人光顾，早早就打了烩。德国官员以及其他雇员的情绪和意向显然大相径庭。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对吞并。然而具有这种观点的人们现在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我们每获得一个胜利，距离和平也就远了一步，这就是形势的荒谬之处。……

1915年10月1日

在他重新埋头于自己搁置下来的手稿之前，韦伯以很快的速度写下了一份准备呈给当局的报告，叙述他在部队的活动以及自己的体会；这份报告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报告表明，他以非常注重细节的方式观察了军队这台庞大机器中所有那些小小的齿轮，并想要为将来如何防止弊端出现，推行行之有效的方法提供一些自己的见解。他的许多经验很容易就归入了自己社会学的结构类型之中，并为此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比如说与后来的公务员管理相比，为应急而建立起来的非专职人员管理所具有的特征，以及从前一种管理向后一种管理的过渡。他描述了志愿辅助人员如何被整合进军队的组

织结构，描述了这些志愿人员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的不可或缺性，赞赏那些“自由职业”的护士，阐述了她们与职业护士相比的长处和不足。他探讨了部队医院住院病员与日俱增的犯罪行为的原因，从中得出了具有实用价值的结论。这份字迹难以辨认、匆忙写就的草稿一直留在韦伯的书桌上。也许把它交给当局会被认为是自鸣得意的举动。所以这里不妨将这份报告摘录如下，以作为显得并不那么光彩夺目的效力于后方的实录。

## I. 概述

当地部队医院的管理开始时几乎是一种纯粹的非专职人员管理。在以前的预备役部队医院委员会（到最后由两名非职业军人组成）被一位接受任命的主治军医取代之前，这个管理机构一直没有完全丧失这种特征。因此，对部队医院发展的描述也就是对从纯粹非职业的自由管理向有组织的官僚化管理过渡的描述。

546 这份报告的签署者向卫戍区的医院办公室报到时，除了医务人员之外，唯一有经验的军人只有军士 L，他是一周前调到这里来的。他同时要承担办公室主任、文书和医院督察的工作，因为文书和勤务兵都没有。主任督察员 H 先生被指定为委员会分管财务的成员，他实际上也是几天后才露面。然而，他那时不仅因为健康状况欠佳工作起来十分勉为其难，而且他在卫戍区的工作也很忙，开始时在我们那里的工作只能以小时计。那些被征召来督察待建医院的先生们，直到这些医院已经充分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到达——照计划这些医院要在战争动员日后第 10 天投入使用。自然，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有可能让这些先生们对像在此地建成的那种部队医院的运转有哪怕最低程度的了解。实际上，只有等到行政管理中心的办公室组成以及分配到各个医院的督察人员最后落实之后，这些人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才谈得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常工作，而这种组织和分配只是在战争爆发后六个星期才得以落实。然而，即使这些人在参军前曾做过公务员、行政官员、企业主等等，但他们都没有在军队中管理事务的经验。那么，直到那些组织和人事落实之前，这些部队医院的运转，尤其是这些医院的建立是由什么人来完成的呢？

1. 承担文书工作的有字写得简直跟鬼画桃符一般的我这个报告签署人，有后来才到的公务员，他们到来之前还有簿记员 L 中士。所有订货的信函以及与无数承包商的所有来往函件悉数由本人处理，这些事情都没有做日记账。承包商的所有重要来函均由本人收集，按公司顺序依次排列整理，因此都有案可查。其他一切事宜若有必要，均由本人用铅笔作了记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能，因为我无法想象有谁能写下这些函件并将其记入日志。

2. 所有通信兵的职责——尤其是当时还不能享受免付邮资待遇的本地邮件投

送——都由中小学校的学生们自愿承担。他们或骑自行车，或乘电车；当时任何持有证件的人都可免费乘坐电车。后来有关公司虽然为了追逐眼球效应（这在海德堡很典型）为伤兵提供了数千张免费乘车卡（伤兵们则借此机会在城里和周围地区漫无目的地转悠），但是我们那些得辛勤工作的工作人员和投送信函的人员起初没有得到一张免费乘车证，后来也只发给了我们几十张而已。通过如此渠道投送信函自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以这样的方式投送不可能有信函投寄记录，不可能保留邮资发票，而且有些信件甚至没有准确投递到位。学校开学后，学生不再露面，我们便不得不使用男护士充当通讯员，直到卫戍区司令部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人手（但是数量非常有限，绝对不敷使用）。正是在最初那些日子里，日渐增多的简短信函每天总计大约有500件之多。

547

此外，本人总是亲自去同供应商见面，去医院视察，除非我们能够让供应商到医院来，但由于他们业务十分繁忙，这种情况只是偶或有之。刚开始时我们根本没有汽车，后来也很难有车使用，直到R. Sch先生将自己的汽车提供给委员会使用。

3. 假如没有志愿人员的帮助，要建成这些部队医院（每隔三公里就有一个）是不可能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公务员还未到达，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必须先熟悉了解这里的工作。所以每一个医院都任用了一名“文职督察员”。这些先生们大多是教授，他们同我、中小学校的学生、其他志愿者、后来陆续到达的护士和警察，以及最后到来的公务员们一起，接收货物，临时安排一下床位和安置一下器械；如果我不能赶到的话，他们便根据自己的判断，或者根据我拟定的要求行事。当第一列载着伤兵的火车到达时，医院尚未完全准备就绪，他们帮助医生安置和照顾伤员，并通过征集各种各样的捐赠物资以满足伤病员们一切可能之需。在最初的日子里，这些非正式的志愿者“文职督察员”手上有实权；其他工作人员都服从他们的领导，因为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别的权威，而且因为有我这个负责人为他们撑腰。他们只是在实际上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赋予正式权力，例如他们被赋予全权为收到的货物提供收据。这显然是违反规定的，但要建成医院却又不可避免。然而，这导致了重大的弊端，即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一个准确的交货记录，还有因为伤员到达时交货还仍然在进行中——由于原材料匮乏和工人短缺，交货无一例外地延期——所以交货常常需要打电话重新安排。然后这些安排又以最快的速度由各种各样的志愿辅助人员（学童）去完成，以致无法将衣物和床上用品的清单做出更加有序的管理。作为非职业官员受任担任这一职务的此报告签署人对于这些（尽管作了种种努力）后来再也无法理清的清单承担全部责任。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务员不应为此承担责任。开初交货时他们甚至还未就职，就职之初他们也无法控制交货情况，后来则发现由于那些衣物和床上用品每天都在被匆匆忙忙地重新调配安

548

排，有效地控制这些东西的去向几无可能。

这种非正式和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管理逐渐被政府官员按规则管理所取代。不过，直到大约十一月这个过渡才在各个部门完成。此后，之前一直在行使“文职督察员”职权的人同他们的助手或者一起离职，或者改任“捐赠物资管理员”。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只是（1）有限的办公空间，（2）接收捐赠并按规定样式开出收据的**专属权**。因为如果像最初发生的情形那样，把公众的捐赠送到医院随意交给一些未经授权且之后无法查证的人，那就会导致严重弊端。看来绝对明智的做法是，不让医院的行政管理机构经手这些捐赠的现金和物资，由此而让他们不用去承担自己根本无力承担的责任。

这样的捐赠物资管理为部队医院提供的服务不可替代，其正式管理机构由于所承担的其他任务的性质而绝对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服务。一方面，它通过下述服务来满足纯粹的人道需要：对个人进行鼓励，找来阅读材料，提供就业机会和私下为伤员介绍工作。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些服务的实际意义：这样的捐赠物资管理机构的存在与否同**被监禁的人数**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被监禁的人最多的地方恰恰是那些没有这种捐赠物资管理机构的医院，是人们不得不面对医院生活的寂寞和懒散的地方。另一方面，捐赠物资管理机构筹集所需的资金，部队医院的行政管理机构或者根本无法提供这些经费，或者提供的经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求。与整个军队的预算和红十字会的财力相比，由这些“志愿者组成的医院管理”机构（捐赠物资管理机构）募集的款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一年中有总数超过2万马克的筹集资金供各个医院捐赠物资管理机构使用，这些钱主要是大学教师们，也包括其他本地市民捐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钱比红十字会提供的资金分量要重得多，因为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满足个人虚荣心的机会，而这正是红十字会在募捐时常常不得不利用的方法。因为除了捐赠物资管理机构的负责人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些捐款人的任何信息，他们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些资金，加上大量价值绝对不可低估的捐赠实物，不仅用来置办了香烟、简单的嗜好品、游戏用品、娱乐用品、用于编织的原材料、让房间住起来更舒适的装饰用品、书籍、各种增强体力的药物、为身体弱的伤病员准备的好一点的葡萄酒，以及用于授课和讲座的实际支出，而且还要支付能够呼吸新鲜空气的卧疗室和卧疗用椅、需要增补的医疗器械、理疗物品、不在预算之内的衣物和床上用品和各种各样可供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皇家军需处在通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或者难于同意拨款购置。用捐赠的款项还可以举行漂亮的圣诞庆祝活动和在部队医院里分发圣诞礼物，这样就不一定要去求助于红十字会。我们认为，后备役医院在财政上依赖于红十字会的充足资金（顺便提一下，红十字会对我们拨款时从未犹豫过）是不合适的，因此除非是绝对必要，我们



尽可能不使用这项资金来源。只是在我负责管理的最后几个月里，有几个医院才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红十字会的资源，而且它们需要的主要是实物，而不是现金。

捐赠物资管理机构还在组织为伤员培训**授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提供的培训包括让伤员们编篮子、裁剪和粘贴纸版、编织各种物品。它还让尽可能多的伤员们有工作做，让他们能在手工业同业公会的师傅（他们的资格和条件都经过事先调查）那里做计时付薪的工作（红十字会为安排伤员在车间工作做了非常令人钦佩的工作）；或者组织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然而，所有这些努力的价值都有限。尤其是在工作机会方面，尽管报酬不错，很少有人利用这些机会。

虽然很大一部分伤病员没有任何求知的兴趣，只需要那些低级趣味的读物，但也有为数不算少、难能可贵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无法忍受部队医院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喜欢刺激和精神活动；如果他们的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人就会有违纪的危险。正是为了这一部分人我们组织开设了一些课程。在有些医院里这完全由捐赠物资管理机构的领导负责。课程中有一部分是职业培训课程（速记、法语和簿记），另一部分则是通识教育（历史、战争地理、经济状况）。出于维持纪律的考虑，后一类课程被作为**军事教育**而定为必修课，按规定时间上课，教室里有军士作介绍并进行监督。参加授课的主要是一大批先生们，多是大学教授、公立学校教师，有时后备役部队医院委员会的成员也帮忙授课，有资格并且有兴趣的病人有时也提供帮助。总的来看，在几个月的漫长冬夜里，人们上课的注意力是值得肯定的。医院建议夏天暂停授课，因为夏夜气候宜人，课堂无力与此竞争，学生明显缺乏兴趣，令教员不快。选修课程通常安排在下午。必修课程每周四到六个半小时不等，晚上授课，大多在晚饭后，这样就不至于影响医生的查房和有益于健康的户外活动。从维护纪律的角度来看，这些课程**效果很好**；被关禁闭的人数在秋天大幅上升，到了冬天则降下来，从中可以看出良好效果，而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也正在于获得这样的效果。

随着应征入伍的公务员接受越来越多的训练，越来越多的军职人员陆续到来，随着医院管理从前几个月临时的过渡状态向正常的持久运转逐渐过渡，正式任命的官员，尤其是医院督察员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并把那些志愿辅助人员和他们的影响视为讨厌的竞争。虽然也出现了摩擦，但总的说来，双方都礼貌得体，保证了志愿辅助人员能够顺利地逐渐退出自己最初几乎对整个运转的全盘控制，转向捐赠物资管理所开展的辅助性工作。由于行政工作变得越来越单调，“非正式”雇员一个接着一个都消失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算是最初那个几乎纯粹是非专业性管理仅存的残余；而我在未从军时一直囿于书斋，因而几乎没有任何管理和维持秩序的才能。

很大一部分病人的护理工作最初也是由非专业人员完成的。战争之初这里流行的看法是，这里护士并不适用。因此一开始这里并未雇用专业护士，而是听凭医生自己决定，如何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尽管医生们强调说，他们绝对不能放心地将伤员和病员随便交付给一个未经训练的护理人员。不过医生们还是使用了城市居民中来的志愿人员，数目在各个医院不等。专业护士成功地发起了宣传鼓动运动，要求每100张床位至少要有6到8位护士，要求雇用经过专业训练、如果可能的话雇用国家承认的专业护士；之后我便同各个不同的组织联系，请求他们给我们分派这样的护士。结果，这样的请求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得到满足。几乎所有可供使用护士都已经分派到别处去了，尤其是去了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我们拥有的护士数量绝对不可能达到官方规定的最低要求（每1500张床位90到120名护士）。所以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满足于使用非专业护士。尤其是在二类后备役部队医院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丰富的使用这类非专业护士的经验。她们在那里无偿工作了七个月，直到今年初在通过了国家临时组织的考试之后才领到了正常的护士薪水。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概述。

毫无疑问，如果一个护士加入了一个得到承认和在和平时代也会继续存在的组织，如果她把护理病人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固定职业，那么，这个护士的专业能力及其行为得体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如果成员中有人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违反行为标准，表现懒散怠惰，护士协会就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而采取行动；护士们知道，避免与护士协会发生冲突符合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此不同，典型的非专业护士仅仅是因为战争才从事护理工作，她们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个人理想，只是由于家境较好和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而得天独厚，因此具有一般来说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为不言而喻，在大多数情况下（虽说不是绝对的），在志愿者中挑选护士时，只有受教育程度相当高的姑娘才有可能得到像专业护士一样的同等看待。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长远来看**，这里也与其他地方一样，仅仅出于理想的热情而献身于护理工作，并不足以取代为培养人们做平淡无奇的专门工作而进行的职业训练。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个与此相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一提，惩戒一个不称职的非专业护士要比惩戒一个专业护士容易得多，因为后者很容易导致与护士协会的冲突（在教团和有位高权重的人保护的组织中，这种冲突尤其容易发生）。而在具体情形中，专业护士的这个优势有可能因下述情况而减弱：医生们不忍像对待专业护士一样对非专业护士在业务要求上那么严厉。不过一般说来，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医生相比，德国医生非常注重强调自己的权威，即便是在形式上亦是如此。

在那些申请做非专业护士的人中，可以清楚地区分出两种类型的性格。一种是

典型的德国“年轻姑娘”，她们大都怀有非常真挚的激情，多愁善感，不自觉地追求有轰动效应的东西。这种类型的人不适合在部队医院做护理工作，她们总是倾向于纵容病人，不时还显露出严重出轨的危险。另一种类型则是知识型的或者受过职业训练的姑娘和妇女。总的说来，这一类人很适合在部队医院做护理工作，常常与那些在战争期间留在后方的专业护士不相上下，有时甚至还胜过后者。这后一种类型的姑娘和妇女在对护理工作的理解中习惯了**讲求实际**的观念（这一点至关重要），至于她们是在哪一种职业中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习惯了这种观念的，这显然并不重要。

无论就其业务表现还是就其同病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可靠性而言，令我们最为满意的莫过于那些比较成熟，也就是年龄在25~35岁之间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们曾经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中工作过（例如曾是小提琴家或者作家），或者在自己的职业中经受过某种严格的专业训练（诸如理疗、按摩等），或者经历过严酷的生活，与艰难困苦做过坚决的斗争。在十五个月的战争期间，具有这种背景的人在毫无间断的工作中做出的业绩完全超乎意料，可以肯定地说，在克服了开始时遇到的困难之后，她们的业绩至少不亚于受过特别良好训练的专业护士，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一个专业护士的一般水平，比如说在大多数时候，她们对待病人完全不像专业护士那么机械刻板，远比她们要更为个性化；她们不仅能够满足病人医药卫生和身体康复方面的需要，而且能够满足他们在纯粹人类情感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同时又能按照规定与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要做到这些需要有相当高的教育程度、谨慎以及责任感作为前提。

如果说这些非专业护士的业务一般来说相当令人满意的话，她们个人的行为举止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同样令人满意。在那些被医生选中作为助手的非专业护士中，只有两人毫无疑问是真的挑错了人，这个情况以适当的方式得到了纠正。此外不难理解，在专业护士中也不乏举止行为应受指责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些非专业护士异乎寻常的毅力；根据十四个月的观察来看，只有极少数人辞职，而且这些人之所以离开也是因为有其他紧迫的义务需要去履行。按照规章制度的字面解释，这些非专业护士只能做听命于专业护士的助手；而假如我们严格照章办事，那么这些非专业护士就肯定不会对工作表现出（像以上的例子说明的那种）同样程度的兴趣和热爱，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毕竟比专业护士要高。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雇用这些护士意味着我们毕竟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首先，她们成为国家正式雇员之前，在被她们所取代的每个专业护士的工资上，一个季度就可以节省100马克。她们取代了25~26个专业护士，这种状况持续了9个月，加起来总共节省了7500马克。其次，因为照料病人并不需要所有按计划正式

招聘的护士在医院里过夜（专业护士通常是这样做的），长时间下来，这就节省了20张床和相关用具，加上床上用品，一共节省了大约1500马克。此外，她们的伙食和餐具加起来大约是8000马克（按1.4马克的伙食成本计算）。到1915年5月1日对此加以统计时截至，总共节省的钱大约是1.6万马克。节省下来的床可以用作病床，节省下来的空间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在那些非专业护士通过统一考核受到国家正式聘用之后，在床和床上用品上节省的开支继续保持不变，同时现在在医院就餐的护士大大增加，因此到1915年10月1日为止，总共有望节省大约1.8万马克的开支，更好地利用医院的空间还不计在内。不过这里应当补充说明，根据所有的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非常值得推荐的是，对那些**表现好的**非专业护士（至少在她们工作期间）提供膳食。所有的人也都应有资格享用午餐和下午的咖啡。对那些值班护士应当提供全部膳食。希望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能够做出相应的改变。

从相对的数量上讲，我们医院的内部发展很自然地将那些由志愿人员组成的非专业护士（她们开始时是医院仅有的护士）日渐推向后台。这一方面是因为执行上边的指示，也因为很多医生觉得与护士长和专业护士一起工作要省事，尤其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训练作辅助工作的志愿人员；最后也是因为市民中这样的志愿者在逐渐减少。

这种非专业人员的运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它至少是共同形塑了这个地区部队医院的个性特征，尤其是捐赠物资管理机构更为这些医院增添了光彩。它的弱点主要在于具有重要意义的财务管理秩序方面。我们所有参与这种非专业运作的人，特别是这份报告的签署者，对于有关的重要规定都不熟悉，或者由于工作过于繁忙，在每周连续工作七天之后没有时间和精力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弄清楚这些规定的内容。尤其是我们对于记账和报表等一无所知。关于这些事情的规章制度虽然可能很不完整，非常过时，但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是长期经验的积累，忽略这些规章制度是要受到惩罚的。

## II. 部队医院的纪律

**惩戒。**应受惩戒的行为发生率总的来讲相当高，这种情况可以被视为部队医院病员中士兵质量的外在表现特征。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平均每天都有一人被关禁闭，这在一个3000到4000人的现役部队中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数字。这个数字有一些颇具特征的波动。头两个月左右，医院的纪律一直很好。过了很长时间才有第一批人受到惩处。1914年晚秋，违法乱纪现象上升，在仲冬以后明显下降，可是到了1915年春又开始上升，夏天稍有下降，然后入秋后又再次上升。违法乱纪现象产生这种波动的原因可以从下述情形中得到解释：

1. 首先，违法乱纪行为增加是因为病人身体逐渐康复，恢复了精力后，他们违法乱纪的能力和倾向也随之增加，也对被禁锢在医院无聊的生活中越来越反感。

在部队医院所有的护理工作中，仅次于医疗的核心问题毫无疑问就是：如何防止医院的病员受到在身体恢复期强制性的空闲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这种影响严重危及部队的纪律以及病员未来的就业能力。那些感觉自己几近痊愈，但仍在医院里被供养着的人们，得接受长达五到六个月没完没了的整形外科治疗，每天在器械上锻炼几次，每次锻炼半个小时；很多这样的情形虽然从身体条件上讲（可能会！）有助于他们日后的就业能力，但在心理上无疑会对这种就业能力带来至少是同样多的危害。尽管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终未能给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每天治疗的时间分配使得安排病员在院外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而且院外工作本身带来的纪律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再者，这里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也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在医院内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也未获成功，因为很难对工作进行有效监督；如果要让企业主给医院提供用于加工的材料，那么这种监督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医院也腾不出地方来。部队医院的就业问题很难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以远比现在大得多的规模把康复期的病员转到后备部队的**康复连队**中去。部队各单位都有自己需要干的活儿，而在部队医院里，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同样的非议：这只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设，并非因为有任何客观需求。而且部队里有军人负责监督管理工作，而医院则完全没有这样的人手。病员一旦不再需要每天接受治疗，继续待在部队医院绝对是有害的，要尽可能减少这种情况。引进类似于部队操练之类的尝试也很难实施。即便是进行真正的军事教育，首先也必须得有一名军官有时间负责这件事情。从病员中找一个军士来替代是不行的。

557

2. 对于病员在医院里无所事事造成的这种后果，当地市民的愚蠢行为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些市民对士兵们抱有很自然的感激之情，与这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凑热闹的心理需要和以廉价方式满足这种需要，并实现自己的“伪爱国主义”的愿望。他们将士兵们邀请到自己家里，在家中或在饭店里以饭食和酒水盛情款待——士兵们尤其受到饮酒的诱惑，对此他们已经不习惯也无力胜任了；他们激发了士兵们吹牛夸口和闲聊胡扯；他们批评部队医院里令人遗憾的状况，因而勾起了伤病员们的不满和执拗。起初病员对医院的伙食赞美有加，现在则开始对此责骂不休，匿名信和各种各样的抱怨书堆积如山，而伙食供应的质量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可以得到确证的。事实表明，不管是最高统帅部还是当地政府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权管这件事，因此我们迫切期望能够在战争期间和在军队握有行政权力的过渡时期，应当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军事当局有权禁止旅店老板和（这

558

一点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私人向士兵提供酒和其他形式的刺激物,违者将受惩罚。由于他们的权限不清楚,本人要求采取类似行动的请求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海德堡卫戍区司令部颁发了命令(此命令也适用于海德堡之外的后备役医院),禁止伤员进入酒店;不过事实证明,仅有这项措施是不够的。

3. 起初,这些部队医院里的病员几乎都来自北德和巴伐利亚,均不是当地人。后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部分原因是大量伤病员被转移到了自己家乡的后备役医院,其他原因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巴登州的伤员被送到了巴登州的部队医院。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医院纪律的急剧恶化。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部队医院里那些人地生疏的病员并没有感到自己是当地民众的一部分,而仍然觉得自己是部队中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并且据此而行动。而当地的伤员觉得自己土生土长,而且是有功之臣,因此有资格提出各种要求,很自然他们就成了当地民众溺爱纵容的主要对象。很清楚,这些对军队纪律非常不利的因素与其他一些有利因素也可能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同在异地他乡比较起来,部队的病员即使自己尚未成家,通常在家乡也能够以比较人道,不那么野蛮,从身体健康方面讲也更少危害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在异地他乡,他主要靠娼妓满足自己的性欲。在家乡他至少可以通过出谋划策,也许还可以通过与家人一起做点什么事情从经济上给家里提供帮助。如果他料定自己将会终身残疾,那么他就更容易采取必要的过渡措施,找一份合适的职业。然而,军队纪律与这种资产阶级道德和关怀照顾的观点原则上是不相容的。下述见解现在已经成为共识:那些预计很快就可以重新服役的轻伤员应当留在尽可能靠近前线的地方,也许只是在重回部队之前允许他短暂地回家探亲;而对于那些终身致残的伤员则尽可能快地让他们回到家乡和自己家里。处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则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维护纪律而言,有两类人尤其棘手,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1915年春违法乱纪现象又开始大量增加。一类是性病患者(不下于200人),他们由于医疗上的原因需要被隔离开来;另一类是接受**矫形外科**治疗的病员(约有400—500人)。这两类人中都有那些身体确实强壮或只是感觉自己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从维护纪律的角度讲,他们极难对付。这里似乎尤其应当谈谈接受矫形外科治疗的病员。

众所周知,矫形外科之所以享有超乎寻常的声誉是与变得日益重要的**抚恤金**密切相关的,而这种状况主要应归因于我们社会政策方面的立法。对于必须支付抚恤金的当局来说,如果在矫形外科上的巨大花费能够使巨额的抚恤金总支出减少10%—15%的话,那么这项支出就是非常漂亮的投资。借助医疗器械工作的矫形外科医生提供这种服务,凭借由此获得的地位,他能够将越来越多的手术包括进自己的业务中来,首先是神经缝合和其他一些属于他专长的手术,然后是一些其他方面

的手术，最后几乎则囊括了所有跟肢体有关的手术。他这样做不仅出于经济利益，而且也出自精神方面的利益；单是操控那些矫形外科器械和帮助病人使用这些器械是一项极为无聊的工作，实践证明它几乎不能让医生感到满意。因此我们这里也跟别处一样，是由未经矫形外科训练的年轻医生和其他人员在负责对矫形外科锻炼的实际监督和指导。大量矫形外科的床位，加上旅行和假肢问题，还有对矫形外科作为一门学科的一般兴趣，单单是这些就使最初负责的矫形外科医生不可能花很多精力去处理单个病例。我所认识的那些受过教育的矫形外科病人异口同声地抱怨，他们在器械上锻炼时基本上是自行负责，与按摩治疗相反，他们感到没有任何真正的好转。查阅医院的主要医疗记录证实了这样的看法，即治疗常常无限制地延长，将那些本来早就可以至少在卫戍区服役的人禁锢在医院里。也许值得加以考虑的是，如果把这类人中的大部分分派到驻扎在当地的部队中去，让他们在服役的同时接受矫形外科训练，将来这样做是不是更为合理；如果在很多其他情况下让他们过渡到做一些需要体力的职业工作，这样是不是更为合理。无论如何，这类人不是通常意义上部队医院的病人，他们自己也不会有一个普通病人的感觉。相反，他们倒觉得自己有些像被安置在一个膳食公寓里，如果要用部队医院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那就会给维护纪律带来最大的问题。因此，随着矫形外科病床的增加，违法乱纪现象也在同步增长。

560

4. 冬天受惩罚的人数减少也许与那段时间里得以开设的课程有关；春季这个数字的回升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形之外，还与春天情感（性欲）更加亢奋以及不得不停止授课有关。

5. 1915年秋病员薪金的增长导致了纪律的松弛。在很多情况下病员把钱全用来买酒喝。从维护纪律的角度看值得讨论的问题似乎是，给3 000个病员个人加薪意味着一年多支出约20万马克，如果将这笔钱作为基金用于一些共同的目的（从物质上讲，可以用来改善晚餐；理想的用途是花在给病员提供合适的职业上），这样做是不是更为合理。

6. 维护纪律越来越困难最后还因为医院的警官们得不断接受体检，以确定他们能否服兵役。结果是所有身强力壮和精力充沛的警官都被抽走了；再加上这些警官得负责列出各种各样的清单，造成了他们负担实在太重。（接下来韦伯对休假批准程序作了详细叙述，还有一段是关于军事当局与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不过都没有写完。）

# 第 17 章 革命前夜的政治家

## 1

561

从部队医院辞职后，韦伯起初埋头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履行公务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就已经开始每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这项研究了。他论述《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系列文章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1915年9月号上开始连载，首先刊出的是阐述历史哲学的“导论”和论儒教的前几个章节。这些论述早在两年前就已成文，本来打算与他为《经济与社会》写就的对宗教社会学的系统论述同时发表，以期达到相互阐发和相互补充的目的。韦伯现在放弃了这个计划，在杂志的十一月号上发表了他关于中国研究的结论和《中间插入的反思》，这篇论文讨论了各种救赎宗教的类型学以及这些宗教对于“世界”的态度，对此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章节和论文也是战前写就的。现在韦伯想要探究其他亚洲宗教（首先是印度教和佛教）的经济伦理意义。为此他需要去柏林图书馆查阅英国的人口普查报告。于是他十一月便前往柏林的夏洛腾堡，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研究资料中。不过，吸引他去帝国首都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研究，他主要也想去呼吸政治空气，触摸到世界大事的脉搏跳动，并且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尤其是当时德国的局势如何呢？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的尾声，夏末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战绩：对俄国的战争捷报频传。俄国人被逐出了立陶宛（Litauen）、库尔兰（Kurland）、波兰、西加里西亚（Westgalizien）和匈牙利。土耳其挫败了英法联军的进攻，坚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n）。保加利亚（Bulgarien）战胜了塞尔



维亚 (Serbien)，站到了同盟国一边。然而，一些重大事件也使敌方的力量得到增强：前三国同盟成员之一的意大利正在与奥地利交战；西线的推进在很大一部分战区早已在消耗严重的阵地战中受阻；在佛兰德斯 (Flandern) 和其他一些争夺激烈的地区，德军甚至被击退。此外，人们也已感受到了敌军封锁带来的影响，例如最重要的食物现在必须定量供应。最后，自卢西塔尼亚号 (Lusitania) 邮轮被击沉之后，德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奥地利听任与意大利的关系破裂时，韦伯难以遏制心中的愤怒。在他看来，这本来是必须通过适时做出让步而加以避免的。“不错，形势的确糟糕。整个过去二十五年的治国之才而今荡然无存；我‘一直如此告诫’——这种不幸而言中让人难以产生满足感。战争现在可能会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了。”他认为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邮轮是一场重大灾难，因为一个有荣誉感的中立大国虽然或许可以容忍财物被损毁，但不会容忍杀戮它的公民。韦伯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在维持现状（我们既无领土损失，也无领土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停火，我们就应当立即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拖下去对德国有害而无利。还有：战争以超乎寻常的张力激发了一切勇敢的力量和可爱的牺牲精神，就这一点而言，战争是伟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变成了人们常年的日常生活，它就会被视为彻头彻尾的邪恶，会消磨掉遭受折磨的人民身体和道德的抵抗力量。 562

大约在那个时候，韦伯在一篇论文中写下了他关于缔结和约问题的想法，这篇文章显然是写给政府和国会议员的备忘录，不过却一直搁置案头。当时不许公开讨论战争的目的，而私底下大的利益集团则更为变本加厉地煽动在东线和西线吞并领土。韦伯以“冷静”的头脑和确凿无误的洞察力与之针锋相对。他表明，德国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在结盟政策的基础上推行世界政策，要么推行在欧洲的扩张政策，后者将使所有世界列强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有关殖民地的世界政策须以获得英国的谅解为前提，但如果我们在西方占领地搞吞并或“归并”，要达成这样的谅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吞并或“归并”甚至无助于德国扩展其对付英国的海上基地，反而会树敌更多，尤其会增加来自俄国的威胁，因为这样一来，一旦发生冲突，俄国将不仅得到法国，而且会得到英国的支持。“如果德国把和平强加于人，而其主要结果是得罪所有欧洲国家，那这将有悖于德国的利益。”韦伯还看到了吞并政策的另一个威胁，那就是它会导致这场战争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不管结果如何，战争的无限期拖延本身将会使非欧洲国家、尤其是美国人获得工业优势：“我们的经济将滑入外强中干的境地，我们将耗尽国内资本，我们的工业将会因为可供使用的资源逐渐枯竭而陷于瘫痪，我们将失去经济扩张的实力。” 563

另一个引起韦伯极大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德国同奥地利联手共同征服俄国治下的波兰。他一向把长久性地保卫德国东侧，以抗衡俄国巨人的压力看作是德国最重要的民

族使命。自服役时起，他就了解被德国兼并的波兰地区，一直关注着普鲁士的波兰政策，并常常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还是一个年轻教授的时候，他就指导过好几个学生对这个地区进行了经济学研究。其中一个莱奥·韦格纳（Leo Wegener），他尤其服膺韦伯，后来在任德国合作银行经理期间将波兹南地区德国化视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之一。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建立一个摆脱了对俄国的依附关系的波兰，使它作为同盟国的“保护国”而成为同盟国的盟友。然而这首先得厘清一大堆的困难问题：如果切断同俄国腹地的联系，波兰的工业能生存下去吗？德国和奥地利能否就各自的主权和关税问题达成谅解？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不归还早已被德国和奥地利兼并的领土波兹南和西加里西亚，这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占领者推迟了做出最终决策，对占领区先实行共同管辖，帮助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建立以波兰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华沙大学，想要通过此举和其他“文化”举措，以期获得波兰人的友谊。

韦伯认为这有些操之过急，因为他对整个问题的复杂性做了全面考察，预见到了军事当局将会犯更多的政治错误。这一时期，他最希望做的事就是能够通过与波兰人的个人接触而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帮助和咨询。1915年12月，他发表了两篇政治意识很强的文章，通过分析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而提出了自己关于处理比利时和波兰问题的指导方针。韦伯认为波兰问题的症结在于：重建波兰的国家独立需要对波兰政策进行全新定位。目前现实的力量让德国和波兰相互靠拢，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俄国威胁对两个国家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波兰不应当被作为敌人对待，而应当将其作为盟友争取过来。所以普鲁士对兼并地区的政策也必须另辟蹊径。只有通过普鲁士辖区的波兰人达成谅解，才有可能勉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来对付目前正在出现的各种严重的利益冲突。然而在普鲁士，人们还远远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我要试着学点波兰语，然后争取同波兰人建立联系。”可是与瑙曼和其他政治家朋友的交谈很快让他怀疑当局是否会起用他。很多其他政见与他相同，并准备跟他合作的政治家自己也未受雇用。

我在这里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事情可做，瑙曼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几天我很可能要开始至少去拜访几个人。然而一切都已经“敲定了”。他们已经有太多自愿找上门的谋士，而他们自己对这些人则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让每个人都陈述己见；无论是谁碰巧在场，这个人说的总是“对的”。他们的确不知道如何让事情取得进展；由于奥地利的关系（而奥地利的处境似乎又相当困难），所以他们的行动很受限制，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德昂伯格 [Dernburg] 和所有当时曾签署反对吞并比利时宣言的人士，现在都与政府绝对无缘，对什么都不知情。由于那些狂热的利益集团作梗，政府不能与他

们有任何接触。S (Max Sering) 想要将立陶宛殖民化，但他却没有考虑人力和资金应当从哪里来，也没有考虑德国人在那么一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去做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对事情加以综合考虑，缺乏一个政治家！这样的人并不存在，而这样的人是无可替代的。

1915年11月25日

瑙曼同样也未受政府雇用，他当时在筹划着自己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并想要争取得到韦伯的帮助：他准备与盟国建立一个名曰“中欧”的经济联盟，而后还要建立这样一个政治联盟。韦伯认为，这个计划仅就工业领域而言就有很多问题存在，但他仍然能够理解朋友的意图，愿意为朋友效力。

亲爱的朋友：

您过高估计了我所能做出的贡献。虽然我会每天、每个周日和星期天，从早到晚都在办公室，会做任何需要我做的事情，可是我对此类事情一无所知，贸易政策方面的工作需要有专门的训练。开始的两周里我所能做的将只是倾听；我已经有二十年未对贸易政策问题作过任何研究，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奥地利。直到这一刻我一直都在做着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事情。非常不幸的是，我却没有机会参与政治问题（诸如波兰和立陶宛）的讨论！不过我会去做，而且会愉快地去做任何眼下手头上的事情。只是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正在以某种方式参与一件政府代表可能会在场的的事情。我很快会给您讲一件关于比利时的事情。我总是告诉别人说，我在与“政党政治家”一起做一件纯属私人性质的工作。

韦伯仍然期望这项工作能够使自己进一步靠近作为中欧问题一部分的波兰问题；基于这一看法，他试图争取让受到他高度评价的同事弗兰茨·奥伊伦堡参加瑙曼的委员会。

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波兰**。看起来外交部已经提出把俄属波兰（Kongreßpolen）交给奥地利人了，并询问奥地利准备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接受它。这个在政治上 [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 极端危险的局势要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一来**，我们同奥匈帝国的关系会怎么样？很清楚，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建立**非常牢固**的同盟关系，包括经济和关税同盟。这是些什么样的关系呢？（以下省略的是对此的详细阐述）……如果将波兰划归奥地利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划归普鲁士（让**那些犹太人**自由地来我们这里!!）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必须要考虑，如果波兰成为两大强国的保护国，对波兰采取什么样的关税政策才恰当。这就要求两国在这

566

个特别的问题之外也要达成谅解和一致，否则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问题在于这种谅解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尽管我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但我觉得与瑙曼、耶克（Jäckh）和佐马里（Somary）的合作就目前来看在策略上是明智的，因为我期待着这种合作会产生某种结果（这种结果也许与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完全不同，也许从表面上看远远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这些毕竟是富有才干的人们去与空想家为伍。如有可能，请您也参加这种合作。

韦伯所期待的机会有时确实也会出现：

今天同一个德籍波兰人就波兰问题进行了讨论 [只涉及了波兰脱离俄国所带来的——几乎是无法解决的——**经济**后果，这将意味着罗兹（Lodz）和华沙地区工业的崩溃]。就问题本身而言相当有趣，因为这个人很聪明，并且在罗兹投资了一家大工厂。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尽管——天知道——这与“永恒的价值”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他期望自己和同事能够仅仅以个人身份（但获得政府同意）访问波兰，并能接触到官方资料的愿望未得到批准。

昨天我设法同副国务卿进行了交谈，内容涉及**是否能**让人前往**波兰**，或者以其他方式与波兰企业家建立接触。因为如果当局出面直接阻挠这种努力，这件事情是肯定办不成的。这次着实让我生气的谈话表明，**很不幸，他们正是这样做的**；尽管我在交谈中提到中央党一位颇有地位和影响的议员支持我的看法，可还是无济于事。我被告知说：（1）**不希望看到任何**与波兰人的谈判发生；（2）这种谈判须由官方进行；（3）我们**不得接触**官方资料。他给出了一大堆理由，都不过是托词而已。实际上这些先生们是不想让任何人涉足这类政治事务，害怕“竞争”。整个柏林的这种气氛令人作呕，在这样的气氛中，**才华出众**的人们被充斥着帝国官府的可恶的愚昧弄得丧失了行动能力。我待在这里只为瑙曼的缘故，以帮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16年3月28日

局势再次变得无可救药，韦伯不得不在近旁眼看着军事当局执行完全错误的政策。1916年秋天，政府在对若干重大问题尚未做出决定之前就毅然宣布——在韦伯看来这为时过早——一个新波兰王国的诞生。德国人希望以此吸引波兰志愿者来增强自己对抗

俄国的武装力量。然而在宣布成立波兰王国之后随即进行的征兵动员并未奏效。他们失算了，白白地浪费掉了手上的这张王牌。

※ ※ ※

1915年初，德国帝国议会中的左翼提出质询：德国在什么条件下才准备进行和谈？对此，帝国首相宣布，德国准备讨论和谈建议，但自己不会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德国人民坚信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认为，我们的信念坚如磐石，没有任何弱点和不确定因素可以动摇我们的信念。……对德国政府来说，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现在仍然是一场德国人民的保家卫国之战。”在右翼政党的压力下，帝国首相对战争的目标含糊其辞：“我无法说帝国政府——比如说在比利时问题上——会要求得到什么样的保证，这样的保证又需要什么样的实力基础。”

韦伯驳斥了这种相互矛盾和模棱两可的态度，认为局势要求明确的表态和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一封致《法兰克福报》编辑的信中，他写下了下面一段文字，阐述了自己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我反对任何吞并，也包括在东线进行的吞并。假如在军事上可行的话，我倒是宁愿支持波兰、小俄罗斯（kleinrussisch）、立陶宛和拉脱维亚（lettisch）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也让我们有权在华沙以北、让奥地利有权在华沙以南建立并拥有军事基地。另外只需与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建立关税同盟，除此之外让这些国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在我们的疆域之外德国不应推行国家移民政策。在西线，实行军事占领：长期占领卢森堡（Luxemburg），占领那慕尔和列日二十年，保证军队届时会撤出，作为交换条件比利时应当加强和防卫奥斯坦德及其南部边境。（在欧洲）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只采取军事上绝对必要的措施，而不推行任何形式的“吞并”政策。

我在柏林得到的印象以及很简单的政治考量让我提出了这些看法。不过我将完全放弃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我估计我们实际能够获得的结果达不到这些“最乐观”的要求。

1915年12月

我们首先要降低自己的“期望”，缩小自己的“胃口”。和平不应当达不到被激起的期望，至少不能落后于期望太远。而这正是政府至今所持态度所造成的结果。早在1914年9月我就要求在比利时问题上使用“动产抵押品”的表述。

1915年12月25日

只要有可能，韦伯就在私下里通过影响自己能够接触到的圈子来反对吞并的欲望。“1914 学社”（Gesellschaft von 1914）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是柏林的一个政治俱乐部，在这里带着各种政治倾向参政的政治家与对政治感兴趣的学者和公务员一起聚会讨论。

今天晚上我听了泽林关于向库尔兰（Kurland）（!）移民的讲话——简直是痴人说梦，好像这世界上除了我们自己别无他人似的。

昨晚去了“德意志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跟往常一样，还是在争论泛日耳曼主义问题，然而气氛倒是很友好。不过要让这帮好说大话的人改变自己的看法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自告奋勇要作一个关于美国民主的讲演。然而因为我被视为一个“让人扫兴的人”，这些先生们的态度虽然客气，但没有表现出想要赶快促成此事的兴趣。

1916 年 3 月 13 日

569

星期一我到底还是在“德意志协会”就美国生活中的民主作了一个讲演；让我顶替戈尔（他因事不能出席）的邀请来得很突然。这些先生们一直“害怕”听到我要讲的东西。

至于人们是否喜欢我前天的讲演，我不得而知。讲演的内容非常“现实”，因为我对“1914 学社理念”那些陈词滥调腻烦透了。不管怎样，他们在那里专注了两个小时，听到的都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愿听的东西（诸如妇女的地位、德国人的性道德、国际法等等）。反正我讲了我想要讲的话，就这样了。

## 2

1916 年 2 月，一场新的灾难如剑悬头顶，那就是与美国决裂；这场灾难肇始于日益加剧的潜艇战，其重要性超过所有其他问题，让韦伯忧心忡忡。两国政府当时仍在就德国未提出任何警告就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邮船一事进行谈判。美国要求德国明确

承认这次事件的非法性，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拒绝。国务秘书和首相都告诉美国新闻媒体的代表，德国宁可与美国绝交，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屈辱。韦伯对事件的发展愤怒至极，写信给瑙曼说：

如果德国政府不能够不惜**任何——任何！——**代价解决与美国的争端，那么我们的工作跟其他的努力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那样的话，我们在九个月到一年之后将不得不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希望您的党，或者党内严肃的政治家个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毫不含糊地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实例，然而在德国居然**没有人**了解美国的竞选是什么以及这个竞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不啻为空前的丑闻。

韦伯还在同一天写道：

齐默尔曼（Zimmermann）的访谈比我最坏的担忧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公开承诺呢？相反，他应当回答说：潜艇攻击自然是“违反了国际法”，但这是对另一方同样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报复措施**。570 我们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友谊，因此（众所周知）已经承担了后果，给潜艇部队下达了全新的指令，将尽最大努力做到慎之又慎。今后这种不宣而战的**做法将是**违法行为，而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答应给与“赔偿”。以此解决这起争端可让双方都满意。事情如此即可了结！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Eum Deus perdere volt, quem dementat）。如果与美国关系破裂，**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这将意味着战争将延长两年，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崩溃——如此一来，那个“中欧”的项目还有什么意义呢？您的**党**是如何行动的呢？

1916年2月7日

韦伯自圣诞节起在家里待了几个星期，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1916年2月他应瑙曼的请求又回到柏林时，发现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由此造成了极为混乱的局面。关于卢西塔尼亚号邮船事件，两国政府此时就一个解决方案已经达成了一致。然而，恢复对武装商船“进一步加剧”的潜艇战——亦即不予警告并发射鱼雷攻击，立即又引发了新的冲突。美国提出要求，说根据国际法规定，出于自卫而武装起来的敌方商船不应作为战舰对待；此时德国在海军元帅冯·蒂尔皮茨（v. Tirpitz）的领导下掀起了一阵狂热的宣传鼓动，不仅要求潜艇战升级，而且要求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也就是说，击沉所有在交战区出现的敌方和中立国的船只。蒂尔皮茨及其追随者认为，用这种方式

可以封锁英国，通过切断其供给线而迫使它投降，从而以武力促成和平。他们却不想知道，这样一来，与美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且意味着给德国带来巨大灾难。海军元帅不顾首相的反对，赢得了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1916年2月26日韦伯写道：

就政治而言，这里的一切都让人难以放心。谁都不知道，波兰的情况将会怎样。人们仍然怀抱着能够与俄国单独媾和的那种非常值得怀疑的期望。尤其是德美关系的局势**相当**严峻。人们希望可以通过延宕和谎言——简言之，通过“雕虫小技”——来应付“可以预料到的新冲突”发生。这他们就错了。可是海军则一味热衷于试验他们的新潜艇，其他一切对它都无所谓。谁也不知道土耳其还能支撑多久；尤其是那里的食品供应已是岌岌可危。人们对罗马尼亚的局势很乐观，**但愿**这并非毫无根据。日久自会见分晓（qui vivra verra）。

1916年2月23日韦伯写道：

但愿那些疯狂的泛日耳曼主义者和帝国海军人士别把我们拖入同美国的冲突中去！否则后果将是：（1）我们整个商船（其中四分之一停泊在美国的港口，另外四分之一停泊在意大利的港口）的一半将会被没收，并用来**对付**我们，这样首先就会出现英国船只的数量**增加**——这一点这些蠢驴们并未加以考虑；（2）我们业已疲惫的军队将会面对由志愿者组成的50万身强力壮且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这一点这些蠢驴们并不相信；（3）我们的敌人将有400亿现金供其支配；（4）战争将会再持续三年，我们注定会遭受毁灭性的失败；（5）罗马尼亚、希腊等国将会**反对**我们。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蒂尔皮茨先生能够“露一招”。其愚昧程度可谓空前。

1916年2月27日，韦伯写道：

现在我们与美国关系破裂真的是迫在眉睫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其原因无外乎在公众集会上实际问题总是被作为“荣誉问题”（point d'honneur）来对待，总是拉扯上“屈辱”及其类似问题，这样一来便无路可退了。这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简直是在犯罪；尤其是现在，在我们想要为凡尔登（Verdun）战役而感到欢欣，几乎一切都进展良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好像是被一群疯子统治着。你问我们应当怎么办？**无论如何**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讲演；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讲演，也不要那么“慷慨激昂”，而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要有理性的算计。商船出于“自卫”的目的是允许装备武器的，这一点不可改变；我们一再重新践踏这项美



国人视为“神圣”的国际法，如此做法只有在我们**确信**自己能够获胜的情况下才可以原谅。而我们恰恰**不能**确信这一点。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一旦德美关系破裂，**我们**（停泊在美国港口的）船只就会被我们自己的潜艇击沉，因为那些船只将会被美国用来对付我们。然后敌对阵营就会**增加**50万身强力壮且装备精良的军队同我们那些日渐精疲力竭的可怜的士兵作战，就会增加价值400亿元的黄金作后盾。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那几十艘潜艇！“被困死”的将不是英国人，倒可能会是我们自己。我们竟连阻挠敌方运送**部队**的舰船都做不到！够了，再往下想就太可怕了。这场战争还将持续**数年**，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他们必定会背弃我们。

3月5日，他写道：

同时，与美国的争端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觉得统治我们的好像是一群疯子。两周前还同意我的观点的人现在都突然变卦。有的人两周前还在说：“嘿，美国人**绝不会**向我们开战的”，现在却说：“哼，美国人是打定了主意要打这一仗的”——这种态度与当时在对待意大利问题上如出一辙。这里少数几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一旦美国参战，这场战争就输定了。因为在财政上，我们的战争债券便会无人问津；在经济上，我们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美国参战将使我们无法继续得到这些原材料。此外，还因为罗马尼亚届时也会向我们开战；如果我们的财力耗尽，土耳其在半年之后将会单独媾和。这一切足以令人发疯。如果你要试图**客观地**说服这样的战争狂热分子，你就会感到不可名状的愤怒。

地主们知道：即使战败了，人们也得花钱买**面包**；届时工业和船运业将会被摧毁，**这些人**将不再是他们争夺权力的对手。部分出于沮丧，部分出于将人们推向革命的绝望，工人们会让权力握在大地主手里，然后君主也将在这些地主的掌控之中。因此得孤注一掷（*va banque*）。希望**债券销售**的考虑将会给德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愿这缕黯淡的希望之光不至于消失。如今这是唯一的机会，希望这个机会得到利用。

3月7日，他又写道：

军队和政治家对于同美国交战所持的乐观态度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私下里同那些负责经济——原材料供应——的人们交谈，情形则**大不一样**。工业界代表的态度也是这样，**除了**生产手榴弹的厂商和大庄园主，因为战争延长的时间不管长短，

总会给他们的产品带来更高的价格。

※ ※ ※

573

韦伯竭尽全力阻止即将面临的灾难发生。他和佐马利共同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旨在给各政党领袖提供他们自己的见解，并支持首相反对海军元帅。<sup>①</sup>备忘录的论证并没有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出现，而是坚持不懈地反复指出潜艇战要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依赖的无数无法满足的条件；备忘录中每一个犀利的字句都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并清醒地、正确地权衡过得失吗？你们即便只是在某一点上估计错误，结果都很可悲，因为这样一来，即使德国的英勇举世无双，也不能幸免于战败和经济上濒于崩溃的厄运。

三月初，这份备忘录先呈送到外交部，大约在3月10日前后送交到各政党领袖手中。在贝特曼和黑尔费里希的影响下，3月4日已经做出了决定：推迟无限制潜艇战，解除蒂尔皮茨的职务；但是“业已加剧”的对付商船的行动又得以重新开始。韦伯的备忘录——它同样反对日益加剧的商业战——已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但却能够给首相撑腰，助他反击右翼政党正在开始的对他的攻击，并起到启蒙开导的作用。不过狂热分子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的。

明天我要将一份关于美国的备忘录寄给各政党领袖。这份备忘录早些时候呈送了外交部，他们立即（差人送来）回信，认为我**确实**应当寄给各政党，而且这非常值得期待；他们会立即将这份备忘录呈送到帝国首相那里。其实备忘录中也只是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看法！可见他们的处境必定很艰难。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正是这些不管是谁都可以预料得到的该死的“意外事件”让我们觉得自己正坐在火山口上。加之土耳其渴望独自媾和，谁又能责怪它呢？**我们**想要的是吞并，在这方面我们能给土耳其什么好处呢？罗马尼亚的态度恶劣。唉，也许情况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糟吧。但愿他们在西线不要牺牲那么多人！正如我之所料，我们打算进行的那项特别研究遇到当局的严重阻挠，我去波兰的使命看来更是无从谈起了……

574

我心绪不宁地等待着首相在帝国议会上的讲话，根据以往所有的经验，我对此感到担忧。所有这些都如此“正派老实”，没有一个是政治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重大胜利，但仍然会从中一无所获。唉，日后情况也许会有好转吧。那个备忘录将会让战争煽动者的满腔愤怒都倾泻在我身上，我将会被视为

<sup>①</sup> 此文收在《政论文集》(Gesammelte Politischen Schriften)中。

“懦弱”的胆小鬼。如此更好。

(未注明日期，应写于1916年3月6日至13日之间)

随信附上备忘录，将其寄送给性情急躁的保守分子很可能会使那些难以名状的愤怒劈头盖脸地都冲我而来。这不会有什么用处（尽管外交部让我将备忘录寄送给巴伐利亚总理和各种各样的重要人物），不过我尽了自己的义务。自然这次也仍然不会有人同我一起做的！

(未注明日期)

备忘录你已经收到了，是吧？蒂尔皮茨下台后现在可能会出现反弹。据说我们有10艘新潜艇。以此他们便想要封锁英国！我的同事L [Hermann Levy] 是海军司令部的皮提亚 (Pythia)！而他在粮食供给问题上曾经做出过如此不靠谱的错误估算，以至于现在已经彻底失信于粮食收购协作社 (Getreideeinkaufsgenossenschaft) 了。不知道这些人能否提供真正可靠的估算，这我让感到不寒而栗。

1916年3月16日

与美国开战的危险在周五和周六还处于危急关头，现在暂时过去了。帝国首相战胜了蒂尔皮茨，我们将**做出让步**。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又不损害自己的尊严，不让那些吹牛大王破坏我们做出让步所产生的**效果**呢？这才是问题所在。蒂尔皮茨玩弄了一场不负责任的把戏。他必然**知道**，自己在一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击沉足够多的英国船只，从而能将英国——**假如**他们使用我们的生活标准，采用**我们采取的措施**——“困死”。这纯粹是胡言乱语。然而现在他却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赌注越下越高，宣布说：只有允许他击沉靠近英国海岸的所有船只，包括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等国的船只，他才能“保证”获得成功。**这就是**他心里盘算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与荷兰、丹麦等国开战。正是**这一点**让事情出现了转机。就像这个“英雄”大帝歇斯底里的心理崩溃——想要找出办法来结束战争——起初导致了危机，现在害怕对美开战——在这个问题上事态比我们的报纸所报道的远为严峻——所导致的心理崩溃给局势带来了另一个转机。至于这是否来得太晚，尚有待观察。在我们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国家如此这般的统治让人感到绝望。

1916年3月15日

我确实并没有告诉政府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对其尽了一份义务而已。备忘录送

到了议员们的手里，或许对 Sch [Gustav Stresemann] 和另外少数几个议员产生了影响，也许对中央党的议员有些许影响，然而他们自己都是些聪明人，同政府的关系在他们那里是第一位的。如果说这个备忘录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肯定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产生了真正的效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了决定。

1916年3月19日

那段时间里，韦伯认为蒂尔皮茨大元帅所具有的心理影响仍然是有害的，因此带着激情同这种影响作斗争。可是这位爱国者倒台的方式则激起了他的义愤：

蒂尔皮茨是以粗暴的方式被赶走的——在他接到命令要他辞职的时候，对外公开宣布了他“突然患病”的消息。就在同一天，这位骁勇健壮的人站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前面，对着有事向他询问的枢密顾问基里亚尼 (Kiliani) 高声喊道 (周围所有的人必定都能听得见)：“您问我有没有**请求**辞职？我是奉命辞职！——**奉命!!**——奉命!!! (他的声音震耳欲聋!) 辞职。”这样的做法会产生可怕的仇隙，肯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这是极不明智的做法，就更不用提在人情方面让人作呕的一面了，**这位**君主在这一点上向来如此。蒂尔皮茨客观上做出了让步，事情必须到此为止。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他承认失败。与美国和平共处现在看来也许有保障了，可是为此也用不着在他下台时还对他踹上一脚。

1916年3月16日

蒂尔皮茨被迫下台给国际国内留下的印象有如一场失败的战役。他是准备留任的。在处理这个问题本身的时候，人们非但没有设法排除节外生枝的危险，留住这个人；相反，他们击沉了一艘荷兰船只，并当着整个世界的面在这个在大众中唯一受欢迎的部长身上踹了一脚。结果是：我们的债券至少比预期少卖出20亿。皇上殿下 (S.M.) 不管做点什么事情，他保准会把事情给弄拧了。这般的靠不住和如此朝令夕改让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抑郁沮丧，德国政府部门目前的情绪显然相当低沉。

1916年3月17日

3月17日，右翼党派与中央党一起试图向首相发难，重新提出了无限制使用潜艇的动议。不过，这件事在议会的预算委员会里按首相的意思得到了解决。

现在我们了解到了议会委员会会议的如下一些详情：(1) 海军部明确宣布，完全封锁英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能够服役的潜艇比我预计的

还要少)。到明年一月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潜艇来完成这项任务（照我的估计，即使到那时我们也难以如愿）；（2）黑尔费里希拒绝对美国的干涉在财政上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所有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邪恶的右翼反对派瓦解了——但愿一去不复返了。帝国海军部居然如此玩火，真是一桩丑闻；尽管首相只是让“新闻局”曝了光，实际所指的却完全是另外一拨人。一切都是虚张声势的恫吓。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不得不做出潜艇战升级的样子来，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让人觉得我们以前做“错”了。所以我们便继续击沉敌方船只，然后再让事态逐渐缓和下来。可是这种做法有可能（通过“偶然事件”）将我们拖入同美国的战争！这种做法的愚蠢之处正在于此！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尽管荷兰的动员——看起来并不是冲我们来的——必定会在华盛顿那边产生煽动性效果。我不能不说，统治这个世界的人缺乏理智！

1916年4月1日

4月5日首相到帝国议会阐明外交形势，他的出发点仍然是没有被战胜也不可战胜的德国人民，他们未来的战争目标将由可以预见到的胜利来决定：“我们并没有受征服和领土扩张欲望的驱使……我们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然而今非昔比……在经历了这些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之后，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维持现状了。对此韦伯评论道：

577

政治空气现在变得比较透明一些了。除非首相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有任何严肃的和谈前景，他的这个讲话才站得住脚。也许局势也确实如此。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他完全缺乏精明老练，政治上也很不明智，虽然这篇讲话比他以前的讲话要好，尤其较前更为雄辩。他没有在一开始就表明，比利时不应当被保留下来，他的这一失误到现在已无法更改了；在东线，库尔兰人（Kurländer）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又燃起了希望。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有用的，人人都缺乏判断力。尤其糟糕的是，人们处理所有这些事情时都完全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首相必须表明他自己是个“强人”——像蒂尔皮茨一样“强”，否则他就会因保守派反对而失败。保守派和工业巨头们的政策很简单：战争拖得越长，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越向“左”倾，这对于作为皇权和教权支柱的我们就越有利。不能通过妥协而求得和平，否则让步就会成为一个竞选问题。这就是隐藏在整個潜艇风潮后面的真正原因。由于我们的让步，同美国冲突的危险现在的确减少了，但只要战争继续下去，这种威胁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遽然出现。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收成如何。如果收成好，英国人也许就会放弃；如果收成不好，他们就不大可能放弃。

咖啡供应只能坚持一个短时期。糖的供应会得到改善，而配给的肉食将变得极为稀少。

1916年4月7日

其间又出现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新事端：德国潜艇无意中击沉了法国客轮苏塞克号（Sussex），船上很多乘客来自中立国家，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四月中旬，美国断然要求“立即”停止未发出警告就攻击商船的行为。

的确，击沉苏塞克号绝对堪称无耻之极，简直愚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船上的乘客是来自（西班牙等）各中立国家的优秀人士及他们的家眷，受害的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但愿不会！——我们肯定将会同全世界开战。在各政党中没有任何权威人士表示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谴责这样的行为。人人都觉得，蒂尔皮茨的下台和那个给了潜艇战鼓吹者沉重打击的决议已使这件事情得到了完满解决。

1916年4月5日

在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还是做出了让步——然而跟往常一样，我们没有勇气开诚布公和毫无保留地做出让步，而是要“保全面子”，这是让人感到遗憾之处。这些人既没有远见也缺乏尊严感。这就已经够令人讨厌了。更加上他们带给我们这样一着臭棋，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令人十分痛心。当这些该死的采访出现时，人人都能看到必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唯独这些人看不到呢？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胆怯，害怕保守分子。现在事态严峻了，这些夸夸其谈的人全都躲进了他们的老鼠洞里。在如此大肆胡诌所谓通向体面和平的“唯一途径”之后，现在要淡化这种必定会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印象谈何容易！

1916年5月2日

然而德国做出不可避免的让步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美国得要求并确实做到让英国保证“航海自由”，即解除封锁。韦伯认为此举又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向美国递交的照会出来了。可以说这是个难产。虽说孤立地看其中不乏亮点，但从总体上看仍然仅仅是旨在“保住脸面”。谁都知道，一旦做出让步，就不可能收回，除非冒立即爆发战争的危险。谁都知道，时间拖得越长，人们就越不可能去

冒险（与美国）开战。谁都知道，在这期间英国人正在储备食品。我们加上这些附加条款又有何用呢？实际上**唯一**值得我们做的只是坦白地声明：“好吧，我们做出让步。现在让英国人接受‘国际法’关系到你们自己的荣誉”。接下来就是我们“彻底做出让步”。总是这样作茧自缚！这件事情能否让我们向前跨进一步颇值得怀疑。帝国首相已经被弄得精疲力竭，根本不能胜任这类事情。而他最无力对付的就是**国内**的那些完全肆无忌惮的对手。唉，等着瞧吧。

1916年5月7日

这种批评后来证明是正确的。结果是德国在外交上又遭受了新的失败：美国政府“根本不予考虑，更不用说讨论这样一个条件：德国海军当局尊重美国公民在公海上的权利应当以任何方式或者在任何程度上取决于某个第三国政府的行为。在这类事件中各自所负的责任没有关联；这种责任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对此韦伯评论道：

的确，美国的照会让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不过我们仍然是失败者。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地上演了这么一幕，奢谈什么“耻辱”，如此等等——现在威尔逊（Wilson）的照会让我们可以断定，我们仍在原地转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们唯一得到的东西是：现在每一个“偶然事件”都仍然可能意味着战争，英国正在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加强封锁。我们愚蠢地提出的保留意见，即也许还会不予警告便击沉船只，这给了威尔逊口实说，“我现在并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我要看你们如何行动，然后——我将拭目以待。”接着就发生了苏塞克斯号事件：如此愚蠢的抵赖，尔后又不得不承认，这不啻为灾难。我自始至终对此没有一丝怀疑。“图班齐亚”（Tubantia）号事件给我们造成了十分恶劣的负面印象——简而言之，这整个事件都极为不幸；给我们带来这种失败的那些人应当被钉在耻辱柱上。因为他们本来应当知道是否能冒与美国开战的危险，如果不能冒这种险，那就不要去滋事。威尔逊（他的学究气对我们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是一个绝对信守诺言的人。而这正是这里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即有人居然会以如此**纯粹**拘泥于形式的方式推行政策，就像一个法学者在课堂上或在博士论文答辩时一样；即使是威尔逊照会结尾的那句话，也一定是出自于他大学听课笔记本里关于国际法中承担责任的课堂笔记。另一方面，我们则对自己奉行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如此自豪，并据此推导出了一套理论。这位美国总统推行政策就好像在学术争论中进行**法学**讨论。

1916年5月10日 580

# 3

经历了这些令人激动不已的事件之后，韦伯虽然竭尽了全力，但仍然找不到任何重要的事情可做。政府部门和当局仍然拒绝给他提供任何机会，关于中欧贸易政策那点研究工作也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我的工作——如果这也可以称为工作的话——进展缓慢。也许到五月份这里会活跃起来，因为届时感兴趣的人们准备在一起聚会。这样做一个“多余的人”让人感到无聊。我几乎更愿意在部队医院工作！我非常想家；得同政府的阻挠作斗争，又是一个我并不熟悉的领域，工作起来并非易事。人们都是这么极度的谨小慎微。如果连内政部的部门负责人都不让去波兰，那我以私人身份不能前往确实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我感兴趣的唯有波兰问题，而且一般说来关注的只是政治方面；其他一切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

所幸的是与此同时他一直在进行学术研究。

我一开始弄起中国和印度问题来，感觉就非常好，并感到自己有能力工作，我非常渴望做这项研究。处于半失业状态让人难以忍受。现在事情终于有了些起色，也变得有趣了。不过，我已经等了三个月，足够了。我很想念海德堡，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现在就离开这里，把手头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不管怎么说，我绝对是“问心无愧”了。

海德堡的朋友们早就认为，该是韦伯将全副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著述中去的时候了。妻子写信告诉他：

卡尔·雅斯贝尔斯前天晚上来看我，跟平时一样谈的多半是你。他对你十分推崇，说你是那种新型的人，这种人尽管没有丝毫的幻想，却仍然有力量控制并超越自身巨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生活中的矛盾，即便是患病甚或让自己出丑也无伤大雅。雅斯贝尔斯把追求知识和真理视为人生最高的价值，他说的下面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这个马克斯·韦伯一天不把精力用在他自己的自我客观化



上，而是把它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这一天就令人遗憾。”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正是在眼下这个时候你必须再考虑一下，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上天赋予自己的才能。你知道，我现在非常乐意将你奉献给祖国，可是如果政府机构如此僵化，掌控这些机构的人又如此庸俗卑下，以至找不到真正合适的工作给像你这样的人去做，那么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这些琐屑事务上。也许命运要让你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581

韦伯毫无结果地等待着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这让他在柏林的生活变得很“扫兴”。海伦妮发现儿子常常沉默寡言，情绪不佳，便试图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这时韦伯写信向母亲吐露了心曲，当时正是德美关系处于最紧张的时期：

你再次谈到自己无法“给予”我什么东西。这倒奇了，因为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正是我自己不能在精神和情感上给予你任何东西，而这是因我当时所处的情势所致。我相信在你所有的儿子中，我生来具有最强烈的“尚武”天性。然而，现在正直用武之时，我却爱莫能助——更何况连一份自己满意和无疑有用的其他职业也无法找到，这让我陷入了一种尴尬和不得满足的心境之中。我很赞同梅特林克关于共享沉默（Zusammenschweigen）的看法。不过，这种颇有些困难的局面——虽然在别人做出惨烈的牺牲时，自己还在这里谈论此事可谓品位全无——也令人缄口无言，尤其是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祖国危在旦夕而承受着压力的时候。现在这些潜在的危险已经变成了现实，因为以和平的方式与美国妥协似乎难以想象，即便有这样的妥协也可能只是将冲突推迟而已。局面已经起了变化，再去苦思冥想这类事情及其不可避免性已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我也已决心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别人不需要我，不需要我去做有必要做的事情，那我就干脆撒手不管，平心静气地等待，等待着也许什么时候有真的能用上我的那一天；如此一来，我回来的时候就会好得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消沉。

不用说，我在部队医院工作时感觉要好一些，甚至可以说要好得多，尽管说真的任何一个督察员都做得了我那份工作——不过那倒无所谓。柏林的这个项目不啻是浪费光阴，同各色人等瞎扯一气，感觉则是一事无成。……一个人要“在其位”才能做成事情。为了能够“有点事做”而老是上门去找在办公室里那些感到烦不胜烦的人们，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随时可以受任。 582

1916年4月17日

对于自己在政治上不受重用一事，他的态度实际上也并没有太过激；毕竟其他头脑

“非常聪明”的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对于其中几位的命运，他感到的愤怒不亚于对自己命运的感受：

但愿您最终能够找到您所应得的、从实用的观点看绝对有用的工作！难道只有做蠢驴或野心家才能为当局所接受吗？对于下面这段话，人们应作何感想呢？这儿的总参谋部的将军甲说：“中尉乙先生，您在这里写到了关于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成本，是吧？只有工业才有生产成本，农业压根儿就没这玩意儿。拿回去修改吧！”这位后备役中尉，（受雇于总参谋部的）经济学教授回答说：“遵命，长官！”愿上帝保佑，让情况有所改变！

※ ※ ※

五月中旬，韦伯准备启程回家长住一段时间，这时意外地出现了对他颇有吸引力的一项任务：代表“中欧”的利益去一趟维也纳和布达佩斯（Budapest），与实业家商谈关税政策。这种已经久违了两年的远行给他带来了一直渴望的刺激，暂时缓解了他心灵上因德国的命运而受到的沉重压力。韦伯在旅途中的来信不仅洋溢着喜悦，而且在政治上也充满了信心，与之前他表达的严重关切迥然不同。这种乐观的色调是他有意为之，目的在于提高信检当局的士气。不过，奥地利当时正在突破南蒂罗尔（Südtirol），攻入意大利本土；1916年6月，德国海军在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峡的胜利让人人都充满着愉快的自豪。此外，不管情况如何，只要有一线希望之光，韦伯就总是愿意促成这希望的实现。在维也纳，他受到朋友、历史学家 L. M. 哈特曼的热情款待，很是兴奋：

583 抵达这里已经两天半了，整天四处奔波，见各种各样的人，连喘口气寄一张问  
候明信片的时间都没有。了解人们的情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这里情况非常令人满意，与我们想象的迥异。这里的人们在为我们担心，怕我们挨饿——就像我们为奥地利人担忧一样。实际上这里已经有很多事情组织安排得比德国要好。在南蒂罗尔取得的辉煌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正在显现出来。不管怎样，此处获得的印象让我很开心；奥地利人将会坚持到底。由于我只是以私人身份为自己收集资料，所以我当然也只是同人们在私下进行接触。不过，奥地利人的和蔼可亲 and 率直坦诚的确极富吸引力。

1916年5月26日

维也纳正在充分展示她古老的魅力；非常令人愉快的是同时也看到，奥地利军队正经历如此光荣的时刻，即便是很多悲观主义者脸上也显现出了另一副神情。尽管人们对此谈论不少，然而和平仍然还很遥远，不过人们还是有信心，相信一切都会有好结果。这一次奥地利人毫无疑问独立做了点事情，而且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这也是件好事，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在这里都做些什么呢？我一天到晚都在忙于见各种各样的新朋老友，从下午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一直到半夜。昨天我见了不少有智识的实业家。我得承认，他们的智识水平很高；就是在德国也不容易与商人进行这样的交谈。

1916年5月29日

市政厅飘扬着的那些美丽的长条旗令我心生喜悦，因为它们标志着德国海战的胜利，而这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惊讶的奇迹了。我为我们的海军官兵而欢呼雀跃！如果说现在东线一切进展顺利（这在意料之中），那么奥地利在意大利的胜利（这给了那帮意大利人应得的教训）可以说在心理上结束了这场战争。谁会想得到局势能有这样的发展？明天一早我就启程回德国，很快就能回到海德堡。现在我在柏林完全是个多余的人，决计要回家了，对此我感到欣喜若狂。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很多别的令人愉快的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些人都同样温文儒雅，相处愉快，又善于交际，我们这里十分缺乏这样的人。这里的气候极为舒心宜人，对维也纳所有的爱在我身上又复活了。在所有讲德语的地方，除了慕尼黑，维也纳是最美丽的城市！尽管如此，我仍然盼望着返回故乡。

584

1916年6月5日

※ ※ ※

韦伯在家里度过了几周宁静的夏日。他立即沉浸在学术研究之中，享受着思想者那种有规律的生活以及静谧的和谐。然而到了八月底，他又回柏林作了短暂停留——此行是应瑙曼之邀再次讨论中欧事宜。在此期间外面的局势恶化了。奥地利早就丢失了五月份攻占的南蒂罗尔的阵地，现在意大利已经踏上了奥地利的国土。东线也不敌俄军的攻势；在西线，德军的战线正受到英国人蚕食推进而后撤。八月底罗马尼亚站到了协约国一边。与俄国的和谈失败。形势不妙。威望最高的兴登堡（Hindenburg）被任命为盟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以此作为灵丹妙药来对付业已开始出现的沮丧情绪。他是民族英雄，大家都一致相信他的军事天才和他人格的伟大。韦伯写道：

人们的普遍感觉是，贝特曼“无法继续留任”，因为他在与俄国的和谈以及与奥地利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中遭受了失败，据说他不具备**决策能力**。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就像那个年轻的小毛奇（Moltke）谈不上是个战略家，这个可怜的家伙也压根儿不是个“政治家”。可是**如果他**离职，那就只有兴登堡能够将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任何人能够缔结和平。而**兴登堡**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总而言之，这里的情况不妙。人人都如此不知所措；很有些奇怪——然而又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就在于这无穷无尽的战争！

1916年8月22日

585 人们现在想得更多的不是战况，而是**经济状况**。战局现在似乎逐渐稳定下来了。然而如果战后得征收40%、45%或者50%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如果**战争继续打到明年夏天，这就势在必行了——那么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得改变。当然我们会怀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么做。我希望至少能争得体面的和平，让我们不至于无谓地做出这种生命和财产的巨大牺牲！不过，这样的和平仍然还十分渺茫，十分遥远。

1916年8月23日

罗马尼亚参战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得而知；其军队未经受过考验，素质如何还不清楚。毫无疑问，局势是严峻的。像D. Sch. [迪特里希·舍费尔]之流那样肆无忌惮的荒唐言论总算也该收场了。不过我一贯主张，今天仍然主张我们应当**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无疑，我们的未来将受到影响，就像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外交上会越来越孤立，对盟友和朋友的选择范围会越来越有限。除了军事前途未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它将给我们的世界政策带来很大的局限。兴登堡直到帝国处于危难之际才受任，颇为遗憾。不过，他所缔结的和平——不管是什么样的和平——这个国家都会接受。这就是此事的意义所在。

1916年9月8日

※ ※ ※

韦伯从柏林启程去了博登湖（Bodensee），在连续两年不间断的忙碌之后，终于有几天闲暇与妻子一起共同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宽广的湖面多美啊！变幻的光线投洒在悠闲自得的湖岸线上，呈现出变化无穷的魅力。九月温柔的蓝天倒映在湖面上；浸润在秋

色秋香中的大自然荡涤了人类可怜的作为——堪称超凡脱尘。然而，幽暗的记忆闯入了这和谐的画面之中。韦伯十八年前正是在这个湖畔努力康复未果，预见到自己面临着一条漫长的痛苦道路。多年来，这也是韦伯夫妇第一次重游康斯坦茨和康斯坦茨旅店。过去像一个不可名状的可怕人物赤裸裸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可是这已经不能够再伤害韦伯了。他已经经受住了考验，让他受到触动的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命运。如果说他又在深受痛苦的折磨，其原因在于德国。现在，尽管所发生的这一切，韦伯的精力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因此他也许会觉得，那些年的损失对于获得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来说也许不能算是太高的代价。

586

我觉得，对往事的回忆对你的影响比对我要大得多。它们对我的压抑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让我担忧的毋宁是“**大众的命运**”，现在还看不出这种命运的遭遇何时得以结束。实现和平后——何时得以实现呢？——我们应当立即考虑去康斯坦茨待一段时间。不管怎么说，上次在那里与你一起徜徉林间的时光**非常美妙**，对我颇有裨益。这样的事情今后我们得经常做。多谢！

# 4

八月底，主张无限制潜艇战的鼓动又开始甚嚣尘上。国民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严重。无党派社团和委员会也力图影响政治舆论。一派力争通过谈判很快实现和平；另一派则要增强人们的必胜信念，促成首相下台，并要求毫不留情地使用各种武器和权力手段，尤其要使用潜艇这个武器。将军们和海军司令部构成了一个平行政府。韦伯再次表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是政治上愚昧的表现。他致信瑙曼说：

重续有关潜艇的鼓噪让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最高当权者是不是丧失了理智，失去了勇气，以致继续姑息就采取**军事行动**进行煽动**这样一种**卑劣行径——在任何一个敌国都找不到类似的例子。让我们假定（对此我并不相信），使用潜艇这个武器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讲我们都无需担心，或者不足虑；然而，将这种军事行动**事先**就公之于天下，以此向敌方发出**警告**，让他们得以进行相应的**物资储备**，这不啻为绝顶的荒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理直气壮地公开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做！”政府应当在私下清楚地告诉右翼政党领袖，他们自己喋喋不休的鼓噪将会使我们**不可能**有效地使用潜艇，他们应当在媒体和自己的讲

587

演中**无条件地**禁止或限制这种讨论。所有这些都如此显而易见，特别写出来和说出来都让人难为情。然而眼下最简单的事情似乎被人遗忘了。我不再能够理解帝国首相了——除非是他**无法**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如果情况确乎如此，那么他就应当辞职。

1916年9月18日

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对一位媒体代表声称，说战争将会继续，直到德国被彻底打败为止。当他的这些言论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韦伯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他的政界朋友。他在给格哈特·舒尔策-格费尔尼茨的信中写道：

尊敬的朋友：

我希望至少贵党中不会有人被劳埃德·乔治的言论所迷惑。他是个狂热之徒——不过他**这样**说是别有用心，企图用这种荒唐的恐吓来进一步激发那些坚持不住的人们在潜艇问题上的歇斯底里的情绪（说它是歇斯底里可谓名副其实），让我们在使用潜艇问题上干下蠢事，好让美国和其他中立国家迁怒于我们（置我们于死地）。他这些言论只能这样来理解。不过从英国保守派的媒体中可以看出与英国媾和的真实条件。所以不要去干蠢事。当然，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愚蠢的言论来吓唬国内那些爱好和平的懦夫。不过我们必须对于这些言论在**国内的影响**在政治上做出正确的估价。但愿这次我们能在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做出正确的估算：如果英国（1）运输棉花和羊毛的船只使用得当；（2）不进口谷物而进口面粉，不进口牲畜而进口罐头和冻肉，那么它总共需要**多少**吨位才能“经受住”潜艇的封锁等等。

今年春天我看到那些备忘录（它们无一例外都很糟糕）的时候，没有一个包含有这样的估算；而一切都取决于这种估算。蒂尔皮茨打算击沉的船只共计是400万吨位，这根本就无济于事。要让那些先生们意识到这一点！谁在负责做这种估算呢？请原谅我仓促写下的这些文字！可是关于潜艇的这些荒唐和可耻的喧嚣正在给我们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让我们在外作战的军队和国内的人民误以为有某种**缩短**战争的办法，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参战将使战争延长两到三年。如果德国决定进行潜艇战，同时又让敌人有所察觉，因而得以储备物资，那将是一种犯罪行为！贝特曼要么下令禁止直接和间接谈论所有军事行动，要么他自己就应当下台。

依我之见，必须从上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这种潜艇战的蛊惑**硬压**下去——否则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被称为“君主政体”。此事至关重要！

1916年10月2日



将近年底的时候，德国军队再次创造了奇迹：西线稳住了；在东线，兴登堡又开始向前推进，尤其重要的是征服了罗马尼亚，由此为德国军队和人民开辟了一条新的食物供应渠道。据年度统计记载，俘敌达数百万，占领的土地有几十万平方公里之多。伸出和平橄榄枝的有利时机似乎终于到来了。十二月中旬，德国向敌方递交了媾和提议，到圣诞节时，希望又增大了。然而政府认为自己有理由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在照会中引用了诸如同盟国“不可战胜的力量”和取得巨大胜利之类的词句。另一方面，对于和平的具体目标却总是讳莫如深。政府仍然认为在东西线均可获得领土方面的让步和战争赔偿——那些负责任的政党领袖对此并不相信，但仍然做出相信此举的样子，以免被认为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协约国的回答带着讥讽和敌意。劳埃德·乔治声称，英国的和谈条件是完全“恢复”被占领地区，并提供“赔偿”。这样一来，政府便对陆军最高将领和海军司令部的压力做出了让步，决定于1917年2月1日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除了这种铤而走险似乎已经别无出路了。让美国保持中立的希望还仍然存在。韦伯认为那个送交美国的照会——就像大多数德国的外交行动一样——这次还是不明智。1917年2月3日，他在给瑙曼的信中写道：

589

为什么给美国的照会（对潜艇战升级做出解释，旨在在美国造成某种“印象”，同时让威尔逊能更容易做出最终或许能够保持和平的决定——为此这个机会选择得很好）中没有写进这样一句具有决定意义的话：“一旦敌方同意我们的建议，在平等和避免未来出现威胁的基础上调解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这项措施就将立即取消”——也就是说，在和谈会议之后？毕竟很清楚，这将使我们对手的处境尴尬，而我们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假如我们能加上这么一句：“我们进行的不是一场掠夺性战争”而不是把这句话仅仅让给奥地利人去说，我们也同样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且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省略了这句话是不是害怕泛日耳曼主义者呢？如果是这样，那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的形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利的。

不过，政府一旦做出了决定，韦伯还是站在政府一边，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还抱有这样一线微弱的希望：别人或许是对的，而自己则弄错了。正是抱着这种希望，他写信鼓励一位对即将临头的厄运感到绝望的年轻朋友。韦伯陈述了所有的理由，说明这一危险的举措并不像年初那样看起来毫无希望，然后他补

充说道：

尽管如此，这仍然可以说是孤注一掷。我们手上握有一些王牌，也有一些我并不了解的因素对我们不利，对此做出评估很困难。无疑，这与1914年8月初相似，也有些类似于当意大利和当罗马尼亚向我们出击的时候。有可能这一次事情会弄砸。要是这样，我们也只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说：“难道你觉得，因为并非所有的美梦都得以实现，我就应当跑到沙漠去不成？”相较于世界迄今为止对我们冷漠的蔑视（这样的蔑视不会再有了）而言，世界对我们的仇恨要更加容易接受。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事实上一直很缺乏的那种“距离”。被“排斥在外”让我们感到痛苦，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否则就难于解释为什么政治的天空取笑的始终只是**我们**？过去25年里，眼看着这个君主歇斯底里的虚荣和自负损毁着一切在我看来是神圣和珍贵的东西，让我感到痛苦；现在我感受到的痛苦与此相比要少一些。以前应归咎于人类愚蠢的东西，现在应归咎于“命运”，而“命运”我们是可以对付的。今后会证明，值得做一个德国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即使**结果会很糟糕，而这一点是大可怀疑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战争像这样拖延下去，这倒是很有可能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当然也得在国内都经受住这一考验。

※ ※ ※

韦伯已经又开始在小范围内经常发表讲演了。1916年10月底，慕尼黑的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领袖豪斯曼（Hausmann）博士成功诱使他参加一个论坛——对韦伯来说这是十九年来第一次。他肯定会注意到，自己又能够即席演讲，能够把握住听众的心灵了，这时他自己作何感想呢？也许他当时全神贯注于演讲的内容，以至于无暇顾及及其他。他讲演的题目是：“处于欧洲列强中的德国”。韦伯并不想作为一个党派人士讲话，因为“我一向是从民族的观点来看待政治问题，不仅在对外政策方面是如此，对待一切政策均是如此。”——跟年轻时的看法完全一样。因此，行动的最终标准不是国内政策，而只能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利益：德国作为一个强国的特殊处境，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像德国这样四面为大国列强所包围。这样的地理环境要求现实的，而非凭感情用事的政策；要求默然的行动，而非夸夸其谈的虚荣；要求富有远见的结盟政策，而非掠夺政策。

就这种政策的实际内容而言，韦伯尤其赞成与英国达成谅解，因为在他看来，俄国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他认为来自俄国的危险——产生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和俄国农民对土地的饥渴——是唯一直接针对德国的威胁，关系到德国作为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生存。



英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海上贸易，法国可能夺走我们的土地，而俄国的胜利则威胁着我们的独立和民族文化。因此，东线的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相比之下，在西线的争端将来会显得无足轻重。讲演结束时，韦伯用寥寥数语阐述了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导致这场战争的真实原因是德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国。我们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争做强国的民族呢？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出于对历史承担的责任。 591

假如我们不加任何抵抗就听任世界霸权——这归根结底关系到未来文明的特征——划分为二，一方面是俄国官僚的条例规则，另一方面则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习俗惯例，也许再加进一点拉丁的“理性”，那么，未来的人们，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不会认为丹麦人、瑞士人、挪威人和荷兰人应当为此负责；他们会认为我们应当为此负责，而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拥有七千万，而不是七百万人口，因为与那些小国不同，我们的重要性可以使历史的天平朝某一面倾斜；因此正是**我们**，而不是那些小国负有历史赋予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是说，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有义务和责任，要起来与两大列强抗衡，反对他们独霸整个世界。我们民族的**荣誉**要求我们不能怯懦和漫不经心地逃避这项义务；这场战争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要修改版图和获取经济利益。

※ ※ ※

1917年春，当最后一张牌——无限制潜艇战——打出时，这个民族所有人的神经都极度紧张。分歧弥合了，整个民族团结一致。皇帝的“复活节诏书”许诺，要迅速消除普鲁士在投票权问题上的阶级差别，同时也要采取步骤使政治制度民主化。潜艇战最初获得成功似乎证明了这一冒险是值得的。人们又重新陶醉于击沉敌方船只的巨大吨位数。继而甚至出现了有助于同盟国的奇迹：俄国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革命政权宣布，俄国的战争目标是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的和平，不追求领土兼和战争赔偿。然而新政府中有分歧：一方是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米留可夫（Miljukow），另一方是奇赫泽（Tscheidsee）和克伦斯基（Kerenski）。因此韦伯起初提议要格外谨慎，并再次向瑞曼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

只是等到米留可夫倒台之后，他才希望进行虽然审慎但不失为广泛的协作： 592

鉴于俄国当权者目前发表的声明——不管人们对此作何评价，（出于您所知晓的原因，我对此评价不高）——帝国政府都得对俄国表达自己**非常**恳切的态度。否则，我们不仅会强烈地煽起俄国的战争狂热，激起中立国（斯堪的纳维亚）反对我

们，而且将以一种也许是危险的方式加深奥地利的恶劣情绪，尤其会使受俄国影响很大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变得强硬。此外，**正因为**我们确信，此时此刻和谈不会取得**任何结果**，明智之举定然是，立足于俄国人发表的声明，无论如何做出下述声明：

(1) 我们准备在下述基础上立即与俄国缔结和平：无领土吞并，无战争赔偿，相互保证杜绝任何可能威胁到对方的军事行动，由仲裁法庭起草一份条约；(2) 像俄国政府在声明中宣布的那样，我们也同样没有“奴役”波兰的企图；(3) **只要**西方列强坚持的战争目标根本就不值得加以讨论，不符合俄国的声明，我们就不会对此再发表任何声明。

我认为下述做法将是明智的：别的什么也不要再说了，尤其要**避免**任何道德说教，避免不友好地旁敲侧击，把英国人说成是“好战分子”，以及避免对俄国“不得不为英国流血牺牲”表示遗憾。没有哪一个民族乐意让别人拍着自己的肩膀，受到别人的怜悯。在我们以前的声明中所有这类说法（与奥地利所做的相反，他们避免使用这类措辞）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损害。……（以下省略的是一些细节）。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么，鉴于敌人公开表明要征服我们，要通过牺牲我们的利益而致富，我们当然要保留未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我确信，这场战争现在将会**继续进行下去**；这项声明的措辞越是冷静客观，越是实事求是，它在国际国内产生的效果就会越显著。在布尔战争中，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说过：“我们**不想获取任何**钻石矿藏和金矿。”这个声明十分有效。但后来等到军事和外交形势最终**允许**他得到并安全地保留这些钻石矿藏和金矿时，他则**当仁不让**。我们迄今为止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这是“**诚实**”。然而我们应当能够在私下里让军队和有头脑的中央党和右翼政党明白，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做法是二者中更为明智的方式。就我们的情形而言，这也是在更高意义上的诚实。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的结局如何。如果到明年我们在外交上的处境依旧，在食物和煤炭供应方面甚至比现在更为短缺，那这场战争基本上就完全输掉了，因为到那时（1）国内局势将完全无法控制；（2）我们在**财政**上将不可避免地会**破产**；这样一来，不管和平的条件多么有利，我们未来的几代人都根本无法推行任何形式的世界政策和殖民政策，或者缔结任何**财政同盟**，而美国的援助将会帮助我们的对手度过这场灾难，使他们在政治上具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这些实实在在的理由毫无疑问在告诫我们，不要做任何延长战争的事情，也不要发表任何比上面提到的**更加缺少**善意的声明，或者发表一个隐含着这种危险的类似声明。最糟糕的情况是，根本就不发表任何声明，或者发表一个对俄国含糊其辞的声明。如果在法国和比利时问题上能够明确拒绝“吞并”和“奴役”的意向，当

属善举。

即便是潜艇战所获得的辉煌战绩，也无法弥补战争拖延到明年所带来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后果，更不用说绝对不能排除一种技术工具被另一种技术工具制服的可能性。一直让我担忧的是，帝国首相会让泛日耳曼主义者给吓住。如果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现和平，如果在缔结和平的同时，或者在这之前，政府向普鲁士宣布：594  
在选举权问题上，任何一个留在后方的人都不能优于任何一个曾在前线服役的人，如果是这样，那这一帮泛日耳曼主义者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1917年5月8日致瑙曼

## 5

韦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无法只潜心于学术研究。由于他既没有机会去部队服役，也无机会做些实际工作，于是便坐在书桌前作为一个政治教育家而发挥作用。从1917年初开始，他经常在《法兰克福报》上就外交政策问题阐明自己的立场。那年夏初他开始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宪法问题的重要论文。毕竟，战争拖的时间越长，国内改革问题——在韦伯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完全属于第二位的问题——就越来越重要。似乎只有当人民大众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在政治决策中相同的影响力，只有当集权国家变成了人民国家的时候，人民大众才会愿意为了自己并不很清楚，离自己的生活相当遥远的目标而在外继续流血牺牲。这就要求在政治上取消官僚统治，废除普鲁士等级选举制，建立议会制政府，实现所有国家机构的民主化。

这些文章<sup>①</sup>旨在讨论具有高度争议性、早就应当实行的宪法改革，其风格与他关于外交政策的论文大不一样。后者完全是就事论事，语调非常沉稳，其说服力全靠缜密的论证和对历史的把握。虽然前者也同样需要政治家的博识，但具有论辩文章的特征。这些论文对威廉二世时代百弊丛生的政治过失作了鞭辟入里的批评，不过他责备的主要是制度，即国家和政府的结构，而不是负有责任的个人。同时，“文人”，即那些没有接受595  
过任何实际政治训练的不负责任的作家（其中也包括教授）也受到了应有的批评，斥责“他们一向充当统治阶层的吹鼓手”，而在需要对政府所犯的错误共同加以抨击的时候，却总也见不着他们的人影。相反，这些人却责骂帝国议会中的政党（因为这样做不用冒多大的风险），不自觉地为了他们自己的优越地位而反对民主的发展；他们并没有注意

<sup>①</sup> 参见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S. 126 ff.

到，自己在国内“软弱无能的意志”与对外国夸夸其谈什么“权力意志”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对照。他们把制造花样繁多的“1914年理念”作为自己的能事，据说战争就是因为这些理念而起，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因而人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声称，现在不是谈论国内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大概是指那些留在后方的人。这些人得做什么事情呢？痛骂敌人吗？靠痛骂是赢不了战争的……或者在我们‘缔结和平’之前，首先就‘我们必须吞并的一切’发表谈话和做出决定吗？”

韦伯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合理的，因为这样可以使政府首脑免受政治竞争的影响，从而保证路线方针的某种稳定性，保证政府对各党派保持独立性。他还认为，从文化政策的角度看，继续保持单一的德国王朝是可取的。当然对他来说，民族和民族在世界上的未来要“远远高于”政体问题。几十年来，政治领袖一直在拿民族进行赌博。

假如这场战争不是一场民族战争，假如这场战争只关乎**政体**，或者说假如这场战争只是为了保住这个无能的王朝和这个缺乏政治才能的官僚机构，那么，我决不会开一枪，也绝不会买一块钱的债券。**假如**只是政治家，而不是像威廉二世之类徒慕虚荣的半吊子统治着这个国家，我也完全不会在乎什么政体。要让这类人“靠边站”，我看除了不顾一切，彻底实行议会制之外，别无他途。官员应该对议会负责。他们只是**技术官僚**。在纯粹的议会制国家里，他们的权力跟以前一样大，然而这是那些权利**应有的归属**。在德国，他们则滥用自己的权力去玩弄“政治”。这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有目共睹！我们也目睹了他们是如何奴颜婢膝地面对那些半吊子君王，而这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在我看来，政体只是一种机械的东西，就像其他机器一样。如果一位君主是一位**政治家**，或者有望成为一位政治家，我同样会为这位君主抨击议会。

596

从他的一封信中摘引的这段话，将上面提到的论文里讨论的政体问题概括在这简短的几句话中。俾斯麦这位外交政策大师给国内政策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素养和政治意志的民族，这个民族习惯于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管理其政治事务。他摧毁了强大的政党，不能容忍独立的政治人格。他享有的巨大威望所带来副作用，就是议会丧失了权力，思想水平大为降低。其结果就是官僚的垄断。

这一点对政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其结果是在政治家的主导精神应当盛行的地方，“公务员精神”大行其道。这两种精神截然不同，且理应如此，因为人们对二者提出的要求完全不同。例如，公务员不能坚持己见，即便自己认为上司的命令是错误的，也应当服从；而如果一个政治领导人照此办理，他将遭人鄙夷。公务员应当超然于政党

之外，也就是说，应当置身于那种为自己争得权力的斗争之外；政治家的本质特征正在于为自己争得权力的斗争，在于对自己的事情自行承担责任，而后者产生于争得的权力。但凡事关尽职尽责地完成明确界定的任务，德国的公务员都做得很出色；可是一旦处理政治问题，他们则一塌糊涂。韦伯指出了俾斯麦倒台后官员们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此论证了自己的论点。他多年来的担忧现在变成了现实，他对于“人治”的愤怒现在证明是有道理的。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那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的所作所为都是不负责任的，在所有大国的政治生活中也堪称绝无仅有。他们容忍君主在公开场合露面和君主的言论公开发表；而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则要求君主事先与政治领袖进行磋商，如果君主不采纳政治领袖的意见，那后者就应当辞职。德国之所以未能如此运作的原因在于国家结构上的缺陷，这种结构将具有“公务员精神”的人放在了本应属于具有自己的政治责任感的人的位置上。 597

在君主制的框架内唯一能与官僚统治抗衡的，是一个能够推行富有成果的政策强有力的议会。只有议会制度——按照这个制度，行政首脑或者来自人民代表，或者需要获得多数的信任——才能培养这个民族的政治思维。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天才的领袖人物才会觉得值得从事政治活动。

对韦伯来说，以正确的方式选择政治领袖是议会制和民主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议会制还是民主化都不等于“民众统治”；始终只是一小部分人，或者是作为获得人民信任的“恺撒式”个人，凭借其纵横捭阖的能力来主导政治行动。多数议员应当总是追随加入政府的那些领袖人物。只有当政党的存在取决于它的代表晋升到这个执政圈子中的能力时，政党制度才能得到升华。然后，具有政治天赋的人才能够更容易胜过党内要人和地方权贵。

韦伯拟定了周密的宪法改革建议，以期能够更有效地选择领袖人物，并阐明了这些建议对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首先他要求扫清阻碍政治领袖同时成为议会议员和政府成员的法律障碍，这些障碍使得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不能参与对国家的领导。当然，仅此还不足以保证正确的领袖选择机制；同样必须保证的是，政治家得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德意志帝国议会再也不能“继续被称为蠢笨的外行”了。因此，重要的是让议会获得持续有效地控制政府的权力。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拥有质询权，让议会得以了解事实真相，熟悉政府工作。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基于现实的训练，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议会，使其成为选择政治领袖的地方——并非仅仅选择民众领袖，而是选择称职的职业政治家。这项建议的原型是英国议会中的委员会制度。 598

然而，韦伯要求议会中少数派拥有质询权，这一点相当新颖，而且非常重要，我们稍后要谈及这一点。在讨论宪法问题时韦伯的另一个新颖之处是，他的建议并不是建立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上，而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明确而有意识地从实际和实

用的观点出发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国家只是一个民族生活于其中的框架而已，如果国家的结构导致了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失去了归属感，那么他们必须得有改变这个国家的自由。韦伯怀疑，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形而上学都不过是一种模仿，特权阶层在权力领域的重新调整中借此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与卡尔·马克思的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如出一辙。

当前的需要——而非绝对准则——是议会制和民主制，前者通过消除无法控制和不负责任的影响以保证有更好的外交政策，后者旨在维护国内安宁，同时也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此外，民主制也是公正的需要。因为如果现代国家给了它的每一个公民某种意义上的命运均等，尤其是要他们战死沙场，那么国家就有责任以普选权的形式赋予每一个公民最低限度的政治影响。

韦伯讨论了一切可能提出的反对民主的理由，尤其是其中的一条，即民主化将摧毁高贵的传统，摧毁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的政治智慧。他反问道：

具有高贵传统的德国贵族在哪里呢？假如它果真存在，我们倒是可以讨论一下。可是除了几个王侯的宫廷之外，德国贵族压根儿就不存在。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讲，贵族需要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一个贵族必须能够为国家而活，而不是靠国家为生。他必须在经济上不具有依赖性，这样才能够在国内外为政治目标效力。只有享有大笔年金的人和大绅士才能与为经济利益产生的争斗保持足够的距离。在德国，也可以零零星找到这种人，但他们不像在英国那样构成了一个政治阶层。普鲁士的容克早就变成了农业企业家，并因此而卷入了利益的争夺。如果这些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的容克，做出种种封建的姿态而把自己打扮成贵族，那只能暴露出他们暴发户的嘴脸。旧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和德国文化的支柱，不管是不是贵族，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讲，都无可否认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

因而在韦伯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的广度和政治传统的德国贵族阶层，所以也谈不上这个阶层被摧毁的问题，同样也谈不上什么高贵的社会形态。因为领导阶层和官僚制度的新生力量所受的典型社会教育（德国有自己服饰佩带的学生社团），不适于将整个民族培养成为充满自信的做主人的民族（Herrenvolk）。<sup>①</sup>具有决斗能力（Satisfaktionsfähigkeit）是一个特殊的德国观念，它为人们打开进入社会的大门，而这个概念是无法民主化的。相反，它在形式上构成了一种社会等级的习俗；从物质上讲，它并不具有贵族特征，而是具有平民特征。“德国人是一个平民构成的民族，或者说得

<sup>①</sup> “Herrenvolk”是后来纳粹常用的一个词，通常译为“优等民族”，韦伯在此恐无此意。——参见英译注

中听一点，是一个由资产阶级构成的劳动人民。唯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形态，适宜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因而才是真实和高尚的。”

※ ※ ※

韦伯无法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撰写论文和通过信件来发挥作用。1917年5月初，他呈送给议会宪法委员会成员康拉德·豪斯曼（Konrad Haußmann）两份修改宪法的详细草案。其中一份涉及取消阻碍议会制政府形式的宪法第九条，按照这一条款，帝国首相不能是帝国议会议员；草案还要求成立一个帝国枢密院（Reichskronrat），其职责是杜绝君主一时冲动发表的政治言论得到扩散。另外一份草案分为十六项条款，旨在赋予国会以通过建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权利。这种所谓的调查质询权应当按照宪法扩展到隶属于立法、行政以及议会监督的各种事务。韦伯的目的是想通过文件检查、传讯、交叉询问以及让证人和专家宣誓作证的手段，对行政机构加以控制并厘清事实真相。帝国议会有义务应四分之一议员的要求组成这样的委员会——这就是议会中少数派的质询权。韦伯提出这些建议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必须控制官僚机构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任何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不管其形式如何——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得到增长；这种权力不仅仅是基于专门的职业训练和专业知识，而且基于被作为“职务机密”仔细地加以保护的业内知识（Dienstwissen）。面对这样的特权，简单的议会权利都化为乌有了。质询权将会是最适宜的应对之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迫使行政机构做到公开透明，如果没有客观理由需要保守秘密的话。

600

此外，在他设想的结构之中，议会中的少数派也能对政府和行政机构施加影响。因此他设想的结构可以有效地防止“多数派管理”的越俎代庖和其他危险，这正是其他议会制国家所缺乏的。

※ ※ ※

韦伯的政治论文发表于一个局势重新变得极为紧张的时期，引起了轰动。他收到的来信中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他修改宪法的建议被纳入了左翼党派的纲领之中。他的一篇文章将姑息君主的政治错误归咎于政治领袖人物，遭到了军事当局对《法兰克福报》的审查。这一时期，德国再次分裂为好几个阵营。人们对于潜艇（能像所许诺的那样）最迟于夏末促成和平已经丧失了信心。美国部队开始在欧洲登陆。与俄国单独媾和的希望消失了。社会主义左翼宣扬放弃领土吞并和战争赔款，“通过和解取得和平”；右翼则主张“靠实力赢得和平”；居中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德国式的和平”，不在欧洲搞吞并，但要夺回殖民地。右翼和左翼都要求首相相对战争的目标做出明确说明，并对国内政策做出决断。即便是这个时候，首相仍然不愿明确表态说明他是主张征服还是主张放

601

弃，并且推迟了履行复活节公告中的承诺。只有一些意义并不重大的改革得以实现；议会制未获多数支持。在普鲁士，保守党人阻止了取消三级选举制度的努力。不管是皇帝还是首相，都不敢采取任何有力措施。

议员埃茨贝格尔（Erzberger）发现了潜艇攻击有效性计算中的错误，并要求在1914年8月4日的政策基础上颁布和平宣言，此举使紧张局势发展成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危机，在各政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右翼竭尽全力反对这一议案。但是左翼和中间派在七月中旬促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有关和平的决议，要求放弃领土吞并。左翼要求立即实行议会制。在普鲁士，德皇下令起草一份关于帝国议会选举权的草案。德国首相被推翻了，他既未能成功地统一德国对战争目标的认识，也未能推行明智的外交政策和大刀阔斧地实行宪法改革以满足人们的愿望。韦伯从康拉德·豪斯曼那里得知，这场危机深受他那些论文的影响。韦伯则对于人们把国内政治改革与和平决议联系在一起而深感不幸：

人们注意到，遥遥无期的战争、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前景和埃茨贝格尔以及政府处理这次危机那种令人震惊的笨拙方式造成了这种激奋状态。首先是帝国议会中引起的哗然。然后是这样一个口号：议会制带来和平！此举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因为到底谁希望听到这样的口号呢？将民主化与和平的希望拉扯到一起，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国外得到的印象是，我们已成强弩之末，将会寄希望于革命——结果将会是战争的延续。在国内人们会说，我们做出这些妥协是出于国外的压力。这件事情真是极为不幸。新上任的人（米夏埃利斯 Michaelis）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官员。可他是一个政治家吗？从他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看不出他是个政治家；相反，他似乎只是一个贝特曼，不过意志力强一些而已。意志力强确实是个优点，但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

1917年7月17日

这次新首相的任命仍然没有政党的参与，这位首相很快就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无能。韦伯在修改自己的论文时分析了这些事件，将其作为富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来说明，在面临国内危机的时刻，议会如何表现出了缺乏领导能力：

如果帝国议会中压倒多数的人坚持要求政府做出一项积极的决定，整个制度就会立即瘫痪。不知所措的政府代表只得做出让步，因为他们在政党组织中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帝国议会自身缺乏政治领袖人物，给人的印象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因为所谓的政党领袖在政府中从未有过一席之地，即便是在那时，人们在选择



未来的政府首脑时他们也不在考虑之列。各政党面临着一项迄今为止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视野、因而在组织上和人事上均无法胜任的任务：由政党自己组成政府。自然他们也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这方面的尝试。因为从极左派到极右派，没有哪一个政党中能找到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就像在官僚机构本身中一样，找不出这样的人物来。

正当韦伯准备将他的政治论文结集出版时，军事当局的审查机构要求巴登州的教育部劝说作者删除文中的某些部分。教育部给韦伯的信写得很婉转，韦伯的回答也很周到。他说自己已经修订了这些论文，使其在形式上更具有学术性，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可能自愿放弃出版了。他这样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动机：

603

看来我对皇帝公开发表自己政治言论的评论有悖于军事当局的观点，我这样说大概不至有错吧。从大量对此表示赞同的来信中我推断出，人们在这些评论的字里行间读到的是对君主本人的暗中抨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对其作了全面改动。如果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君主本人进行批评，那么我无论如何会公开地进行。然而这里讨论的是那些负有责任的政治领导人，那些非军人组成的内阁，以及宫廷机构所犯下的严重过失。涉及皇帝本人的仅只是一点，即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这些言论本身常常是非常有道理的。二十年来，在德国国内——不管是什么政党，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阶层，甚而至于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王侯——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对德国的政治而言，在这里出现某种变化要比所有选举权问题或者宪法改革都远为重要。我的出发点原本是完全不同的，我的政治观点之所以发生变化，只是出于这样的印象，即在德国没有任何其他有关当局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促成这样的变革。我一直在从事纯学术研究，假如君主身边那些人在战争期间没有表现出绝对的不可救药，我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也不会认为我这样做会有益于局势），通过“逃到光天化日之下”的方式指出这个对我们的现状最为严重的损害。（以下省略了一些人们熟知的例子。）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政治惯例不可或缺的改革和必然的变革，在德国似乎总是要到面临来自国外或来自下面的压力时，总是要等到于事无补的时候才得以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尽管我知道，大公爵治下的教育部并不会认为我这里论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仍然认为自己应当把它们说出来，以打消人们可能会得出的印象，好像这里涉及的只是新闻记者的即时论辩。大公爵治下的教育部知道，我打算全身心投入纯学术研究，打算将来什么时候或许重续教职，并不希望积极参与政，也不希望将政治上

604

的价值判断扯进**教学**活动中去；基于**原则**，我比很多其他教授更为严格地杜绝这种做法。

1917年8月8日

# 6

前面曾提及，尽管柏林的局势动荡不安，韦伯自己在政治上也处于兴奋状态，但他从1915年底起就一直在撰写关于印度教和佛教的论文，在1916年秋天埋头研究了古犹太教。他的希伯来语足以让他从原始资料中汲取知识。“马克斯现在几乎是‘骨瘦如柴’，不过他非常勤奋，总的说来还算健康。他研究了《旧约全书》、分析了《先知书》、《旧约全书》中的《诗篇》和《约伯书》，有时候他会在晚上读一点自己刚写下的东西给我听。”不过，由于他除此之外还在撰写政治论文，同时还要推敲《经济与社会》中的个别章节，因而他的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未能完成预定计划。韦伯也打算将《诗篇》和《约伯书》放在一起加以分析，然后着手分析《犹太法典》（*Talmud*）中的犹太教。战前他就为撰写《经济与社会》中的宗教社会学部分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605

在现存的关于古犹太教自成章节的部分中，韦伯尤其对古犹太先知作为一种特别类型有独到的见解，并作了令人难忘的阐述。他将这些古犹太先知视为具有历史上可信度的第一批“政治煽动家”，把他们的预言集视为“最早和最直接的实事政论文献”。韦伯表明，先知们总是在强大势力威胁到家园，犹太民族的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出现的。然后他们便处于政治分歧和利益斗争的漩涡之中，在对外政策方面尤其如此。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与当时主持对外政策的人为伍。几年前，韦伯在对宗教社会学作系统研究时，论及古犹太先知类型时还没有使用这些概念。显然是战争和政治活动的经历给了他这方面的启示。尤其打动他的是那个预言不幸的先知耶利米（Jeremia）。像在他对清教徒的分析中一样，从韦伯对耶利米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巨大的情感投入。当他晚上把手稿的片断读给玛丽安妮听时，后者看到了韦伯在很多段落中表达了自己的命运。

耶利米祈求上帝免除他预言的责任。他并不想说出，但又不得不说出非说不可的东西，他感到这是一种可怕的命运。遵耶和華之命，他在街市上当众说出预言，而且总是反对自己同胞的统治者，反对国王和国王家族。耶和華通过耶利米来传达自己的意旨，迫使他预言灾难，诅咒国王，因为国王没有遵守与耶和華订立的誓约，对别的神做出了

让步。这位先知炽热的激情不可阻挡地喷发出来；然而，这位“发出神圣诅咒的巨人”并不受自己的支配，而是受耶和华的使命主宰。他的预言被证实之后，他没有丝毫胜利者的欢乐，也不像先前那样感到忧郁的绝望，而是在经历深沉悲哀的同时又看到了希望，那就是上帝的仁慈和更好的未来。尽管对自己听众的冥顽不化感到怒不可遏，他仍然遵从耶和华的告诫：不得使用鄙陋的语言，以免丧失为上帝代言的权利。这位预言灾祸的先知令人生畏，遭人忌恨，常常受到迫害。在国王那里他得不到支持，因为他的建议和告诫国王在政治上派不上什么用场。与他针锋相对的先知冒了出来，试图通过暴力、诡计和嘲讽来诋毁他的预言。耶利米在孤独中苦苦思索着自己预感到的东西，在宣布了他的预言之后，这个让人感到恐惧和战栗的人回到了自己家里。他的魅力是他得天独厚；他的目的从来不是让自己的听众也被“精神”内容攫住。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像基督教的先知那样，依靠一种精神上的共同性。相反，他不为大众理解，被他们憎恨。他从未有过像基督教的先知那样受到同道的支持和关怀的感觉，而是陷于内心孤独的悲怆之中。他没有成群结队、如醉如痴的拥趸追随，只有单个或者几个门徒与他分享他孤独的迷狂以及同样孤独的痛苦。他从未要求做救世主，做堪称楷模的宗教大师或者做无罪之人。他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救赎方式。他敦促人们注重道德，服从上帝，不过并没有宣布任何关于上帝的新观念，也没有提出任何获救的新途径，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戒律。他只是要人们深化内心的宗教生活。他是众所周知的上帝的代言人。

606

## 第18章 间奏

607

1917年夏天也让韦伯暂时摆脱了日益增长的忧虑，得到了一段放松的时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奥灵豪森生活的恬静和谐之中。他在那里很受宠，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维娜的一个孙子让他感到非常愉快，这孩子在他两腿搭成的高高的拱门之间窜来窜去。下午，在妇女们做针线活儿的时候，韦伯给她们朗读施特凡·格奥尔格的诗和贡多尔夫论歌德的著述里的某些段落。虽然她们并不能全懂，但他富有音乐性的声音仍然能拨动他们的心弦。他们不时敦促韦伯为更多的听众作讲演，例如讲讲印度的等级制度，犹太先知或者音乐的社会学基础。这里尚未遭到任何破坏，时间似乎停滞了，好像在编织一个关于这片土地的梦，在梦中一切如故。令人愉快的画面萦绕在他的心头：

我在一个照例是非常漂亮的房间里就寝，在一个古色古香的书桌上写作。一切也在呼唤着“故乡，故乡！”阴晴交替的天气配上这一望无际的德国乡村，美不胜收。你不能同时在这里，实在是莫大的遗憾，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想到你。二十四年前的圣灵降临节在舍雷克虏格（Scheerenkrug）旅店——你还记得吗？一顶小帽戴在你浓密的短发上，颜色鲜红似一朵小玫瑰。还有在那边的大厅和隔壁房间里举行的婚礼。这里宁静，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我想这对我颇有裨益，也许来这里是对的。《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书》、威廉二世、《法兰克福报》——这一切都恍如隔世。

这个乡村的美真令人难以置信。草原低地现在正在失去自己先前那种大海一般无边无际的寂寞；映入眼帘的已经不再是略呈红色的石楠了，眼前展现的一边是深

色的育林区，另一边是麦田。不过景色依旧十分迷人，在波尔塔·韦斯特伐利卡（Porta Westfalika）峡谷的另一侧，一切都没有变，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取之不尽的丰饶和富有特色的居家般的闲适。不过，峡谷两边都是一派无尽的祥和——让人感到既不可理解也难以想象，这个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斗争之中。

现在又有如仙境般的美，尤其是这清晨，晨曦柔和而温暖。从书斋的窗户极目眺望富庶的平原，其美丽一如往常。……她们在非常成功地对我进行“填鸭式喂养”；我担心自己心灵的美在减少，而体重则在增加。不过在我看来，您尊夫人的确有此愿望；总之，间或有这样一次也蛮不错，因为冬天和明年夏初局势会很糟糕。



夏初和秋天，在劳恩斯滕堡（Burg Lauenstein）则有整天安排得极为紧凑的思想和争论。城堡孤独地矗立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峦之巅，俯瞰着图林根沉郁的杉树林，灰色的城墙以蓝天为背景勾勒出了自己的轮廓。很长时间里，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些无产者家庭，后来有一个人对这里情有独钟，把它买了下来。他倾其所有，将城堡修复得很有格调，然后把它变成了旅馆。在这里，耶拿的书商欧根·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召集了各行各业的人们到此，交流各自对我们时代的意义和任务的看法，这些人包括学者、艺术家、政治作家、“生活的实践者”、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Freideutsche Jugend）成员。

参加这次聚会的著名学者包括：克鲁西乌斯（Crucius）、迈内克（Meinecke）、贾菲、松巴特、滕尼斯、韦伯；出席的艺术家有 R. 德默尔、恩斯特（P. Ernst）温克勒尔（J. Winckler）、费尔斯霍芬（Vershofen）、冯·莫洛（W. v. Molo）、政治作家和“生活的实践者”博伊默尔、豪斯、格拉博夫斯基（Grabowski）、坎普夫迈尔（Kampfmeier）、舍弗勒（Scheffler）、毛雷恩布雷希尔等等。参加这次聚会的年轻人中有布罗格尔（Bröger）、克罗纳（Kroner）、乌普霍夫（Uphoff）、托勒（Toller）等年轻艺术家，他们不仅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而且想要开创一个社会的新纪元。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把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挂上钩。聚会的主要组织者还希望，这次聚会将促成一种立足于宗教的新德意志精神。

609

会址的环境很有气氛。房间的家具古色古香，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树木葱茏的山坡，同时可以俯瞰好几个山谷。会议在骑士大厅或者城堡的庭院中举行。五叶地锦色彩斑斓的蔓藤卷须爬满了城墙。房顶上飘扬着德国国旗——象征着超越个人的共同性。

周围一切古老的东西无视时代的狂风暴雨，倾诉着德意志文化的共同渊源，诉说着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有自己预定位置、都充满了意义的过去。与此相反，这里聚集的现代德国人的情感和思维则极不统一；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然而彼此却难以理解。老一辈的人之间主要因政治信念不同而分裂，而年轻一辈又因拒绝所有传统价值，尤其是拒绝那些总是导致战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同老一辈人分道扬镳。他们渴望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集体，一种新的信仰。在他们看来，目前这个同上帝疏离的世界该是被毁灭的时候了。他们期待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这个世界将是一个超越民族的联合，它最终将由和平、友爱、团结和社会主义来主宰。

老一辈的人也同样因欧洲遭受的灾难而受到深深的震撼，不过他们都立足于自己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知道，外部秩序的革命性变化无法改变基本的人性——而正是基本的人性这种东西在阻止年轻一代实现自己的希望。年长的一代人中，有一位观点变换不居，当时带有“泛日耳曼”倾向的作家马克斯·毛雷恩布雷希尔，他试图宣扬自己保守的政治理念，把它们作为具有德国特色的理念与西欧“民主化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照他的看法，国家作为一种“理念”，一种“绝对”的客观化应当凌驾于主观主义之上。

610 当其时，一切都取决于促成必要的国内改革，所以韦伯痛恨这样一种浪漫的政治观念。他激烈地反对毛雷恩布雷希尔的观点，两人之间的政治交锋险些窒息了所有其他的讨论。对韦伯来说，威廉二世时代政治上的无数过错还历历在目，因而让他感到愤慨的是，连这个圈子里的知识分子都居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对漏洞百出的国内政治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些人到底是仍然无法看到还是不愿看到这一点呢？难道就永远没有希望让他们丢掉幻想，立足于真实吗？他曾满腔激愤地对自己的同道豪斯说：“一俟战争结束，我会一直羞辱皇帝，直到他起诉我；这样那些得承担责任的政治家如比洛、蒂尔皮茨和贝特曼-霍尔韦格就会被迫宣誓作证。”

在比较安静的夜晚，年轻人通过自己私下交换看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或者聚集在户外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的古城堡高高的城墙下（这样的诗意出现于战争的硝烟弥漫之中，多么具有幽灵般的超现实性啊！），或者聚集在其中一间用黑色镶板装饰，陈设着古老家具的房间里。在这里，一个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的成员倾吐了年轻人对于新的预言启示的热望。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所说的东西好像是杂乱无章的夸夸其谈，是一种过于自负的表达。性格内向的韦伯对这样的自我表白同样有些格格不入。他难以忍受那种逃避日常生活中的艰苦奋斗，遁入另外一种氛围之中的狂热。不过他仍然设身处地地了解这些年轻人，力图与他们一起努力厘清思想，弄明事理。他试图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民族自信——拯救德国——是时下的要求，与此相较，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假如民族衰败了，还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赢得自己的灵魂呢？人们在第一次会议上

就想借助一出中世纪的神秘剧来唤起一种宗教性的团体精神，韦伯将其视为一种严重的迷误而加以拒绝。他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像年轻人期望的那样，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谈论世界的秘密和忏悔的义务！在写给一个与会的年轻人的下述文字中，他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对于您的愿望有很多话可以说，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确定，想要“让人知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谓的“终极立场”是什么？这除了带来信口开河和耸人听闻之外，一无用处。重要的是，根据长期的经验以及基于原则的信念，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只有把自己主观想象的“终极”看法放在对十分严峻和**非常具体**的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上加以检验，个人才能看清楚自己真正的愿望。提出一项建议来，比如说“和平主义”（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不过我的确感到这与你们的观点很接近），或者提出你们想毫无保留“坦诚”加以讨论的东西来。如果我继续与会，我一定会参加这一讨论。不过对此我要说的只是一点：不仅是这个问题，而且——尽管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所有的文化问题都将受到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纯粹是外在的前提问题的影响：**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因为这将决定德国在这个世俗世界里未来的特殊使命。**所有的**终极问题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纯政治事件的影响，尽管这些政治事件看起来完全是外在的。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尤其是我们这些没有参战的人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没有什约束力。尽管如此，这样的讨论题目仍然是有可能的。对我来说，“忏悔”只限于那些“神圣”的东西。它们只属于人生中最有意义上的“美好时刻”，只属于最亲密的朋友圈子，而不属于一个有“听众”的“集会”——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会”。这里的“听众”我指的是任何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唯有先知或者圣人和艺术家（用他自己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行动，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行动。 611

在劳恩斯滕堡的日子里，韦伯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深厚的知识底蕴和经历只需要些微的触及就会喷涌而出。他整天都在讲话，一直到半夜。好几幅小照片都摄下了他正在谈话的生动场面，周围是聚精会神的听众。在秋天举行的以讨论“国家与文化中的领袖问题”为主题的会议上，韦伯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人格与生活方式”的主题讲演。

他让人应接不暇的丰富材料令人震撼，他渊博的知识让人感到压抑，尤其是对追求表现主义的简约和单纯的年轻艺术家们来说，更是如此。这些人的思想接收能力有限，难以接受这样奔涌而来的精神内容。对此他们在内心持反抗的态度。这就是令他们痛恨的学术，它无法指出一条解决实际问题的简捷方式，因为学术探讨的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612

的那些过程的整个网络系统，对每一种社会建构的“理想”都要提出问题（诸如通过何种手段和必须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实现这种“理想”），因而学术妨碍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学术的这种清醒的准确无疑使他们没有勇气去耽于幻想。对于韦伯的讲演，他们既感到厌恶，又受到磁石般的吸引，因为站在这样一种学术性后面并作为这种学术的代言人的这个人，同时又如此神奇地生气勃勃；他绝不仅仅是一个学者而已。观其讲演时的言谈举止，难道不能说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吗？对有的人来说，他似乎是“撒旦”，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又仿佛是他们的“良心”。韦伯晚上走过城堡中的院落的时候，不经意听到在某个角落里年轻人将他戏剧化了。他不仅刺激了他们的思想，而且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多数人都感受到了他沉稳的气质。要是他们能够争取让韦伯来做自己未来的领袖和先知就好了！可是韦伯拒绝了。他没有宣布任何他们渴望得到的新的救赎；只要事关德国，只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外战死沙场，他就不会对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感兴趣。如果他们能知难而进，他愿意做他们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导师。“在这些方面我相信自己精通本行。”然而任何想要师从他的人首先得认识到，思想正派是朴实的学术美德；学术是一种职业，需要以专业的方式来对待，它服务于自我认知和认识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是预言家和先知所赐的礼物，能够带来救赎和启示。很多年轻人翘首以待的先知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命中注定要生活在远离上帝，没有先知的时代：“论度玛的默示：有人声从西珥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旧约全书·以赛亚书》，21：11）

※ ※ ※

613 韦伯从劳恩斯滕堡去施瓦茨堡待了几天，遁入了图林根森林的静谧之中。孩提时代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四十年前，他与父亲和弟弟在此远足，给母亲寄去了一生中最早写下的有关旅行的信件。他现在喜欢回顾那一段时光，仍然还记得很多细节。他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仍记忆犹新，且津津乐道于此。从舒缓的山脊上，韦伯夫妇俯瞰着色彩缤纷的山坡和绿色的山谷。风将金黄色的树叶吹集到路边的沟渠里，铺成了一张柔软的床，他们怡然躺在这张床上。秋天在展示着她的成熟与平和。那一刻，他们忘却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庆幸无须面对未来。

※ ※ ※

因为劳恩斯滕堡会议，有几个信奉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学生在1917年到1918年冬天来参加了韦伯家里的星期日聚会。战争的经历让他们心灵深处受到震撼。恩斯特·托勒是其中之一。他在那里渐渐与大家熟悉了，带来了自己的诗作读给大家听。颤动在



诗中那颗纯洁的心灵打动了听众，这颗心灵相信人类的本性善良和团结，相信有可能让那些遵各自政府之命相互残杀的人民抛弃自己的武器。韦伯说，现在还不是向德国人宣传和平主义的时候，德国人的民族自我保护的意志还不能够被摧毁，那些在外征战的士兵们身负的艰难职责不应遭到诋毁。不过他认为，如果战争在不能给任何一个民族带来裨益的情况下自行毁灭，那和平运动就会成功。

然而，托勒则试图在青年学生中兜售自己的信念。他组织了一个小组，小组成员希望韦伯能领导他们，并赞同他们的呼吁，其中包括要求由爱统治世界和消除贫困。这个纲领的含混不清和缺乏现实感着实让韦伯大为惊讶，但他仍然准备与这些年轻人进行辩论，但学生们拒绝了。正当托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始鼓动总罢工时，他被逮捕了。紧接着韦伯便请求出庭作证，促成了托勒获释，但却无法阻止大学开除那些年轻人。

1918年晚秋，就在革命爆发前夕，韦伯在法兰克福一次小型聚会上再次与人辩论和平主义问题。他一如既往，仍然拒绝充任年轻人的领袖，并公开表示，如果他们不能严肃对待自己的理想，不能信守基督教博爱伦理的全部戒律，他自己将成为他们的反对者。韦伯指出，他们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遵循登山宝训的原则，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都做到宽容大度，亦即放弃任何形式的武力；要么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不能根据这样的法则构建起来的世界上，战争只是多种斗争形式之一，而且也许并不是最卑鄙的一种。他的态度令年轻人颇感不悦，因为他们想要的是革命。就在这次聚会后不久，一位年长的和平主义者 G（戈尔德斯泰因 Goldstein）教授在致韦伯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信念，并指责韦伯在海德堡学生们陷入困境时撇下他们不管，并用诡辩来对他们进行敷衍塞责，即给他们提出一个具有“诱惑性”的问题，问他们是否愿意按照登山宝训的教导来塑造自己的整个生命。戈尔德斯泰因要求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承认自己对战争负有责任，并以此作为人类道德重建的前提条件之一。对此韦伯回信说：

614

尊敬的同事：

非常感谢您友好、详尽而又严肃的来信；我本想更为详尽地作答，可这里的现实情况不允许我这样做。您说我1917年在这里“撇下”学生们不管，我必须坚决驳回这一说法。这些年轻人很不成熟，但其中不乏严肃认真者；他们把“呼吁”送给我的时候，我提出与他们就其内容作深入的讨论。但他们拒绝了，至于是出于什么原因，则不关我的事。之后我写信给他们的领导者托勒，拒绝对那一类事情承担责任。在他因号召总罢工的言论而被捕之后，我立即设法在军事法庭上作为证人出庭。我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涉。他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照此看来，您的消息来源有误。当然，我也不能同意您的另一说法：说我对诸如革命、罢工等等的提示具有“诱惑性”。我简直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说的是非此即

615

彼！要么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使用暴力抗恶，然后就像圣弗朗西斯、圣克莱尔、印度和尚或者俄国民粹主义者（Navordnik）（？）一样生活。除此之外都不过是骗局和自欺欺人；对于这种**绝对**要求，只有一条**绝对**的路可走：那就是**圣徒**之路。或者：愿意用暴力抗恶，因为否则你就得共同**承担责任**。但一直让我大惑不解，而且将继续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内战或者其他形式的暴力——例如每一次革命都把暴力至少（**最起码**）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加以使用——应当被认为是“神圣”的，而正义的自卫战却不“神圣”。如果现在在波兰入侵但泽和托恩（Thorn），或者如果捷克人入侵赖兴贝格（Reichenberg），我们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唤起德国的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a）情绪。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由于健康原因无力从军。但是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学生们必须这样做。民族统一主义意味着使用革命性暴力手段的民族主义。对您来讲或许这种情况比“战争”更值得同情。然而它们实则是一回事，我说的当然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也要公开陈述这一点。

我对别人在战争中“负疚”的问题保持沉默，也没有参加对战争作令人恶心的道德诠释，双方的论点都同样令人恶心。因此我现在可以说：我在不少地方看到人们对负疚感津津乐道，这是一种**病态**，就像宗教领域里为赎罪而自行鞭答（Geißlertum），像性虐待狂。过去两年中的政策不啻为犯罪，这并非因为它是一种战争政策，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轻率**和**欺骗**的政策。我们战前的政策很**愚蠢**，并不是由于它在道德上应予谴责，这根本就谈不上。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管我们能否达成相互谅解，我都要感谢您的来信，感谢您思想作风的严肃性。

1918年11月13日

※ ※ ※

616

我们再回过头来按时间顺序讲述。1917年晚秋，韦伯再赴维也纳，这次是为了私事前往。维也纳大学希望聘他担任教职。战争即将爆发前，慕尼黑的同事问他是否愿意考虑在那里任教，他很坚决地谢绝了；当他感觉到妻子希望他不妨一试时，非常生气：“你们这些人居然还没有放弃我能够重新执教的**想法**，真是可怕！”现在他的想法有了改变。痛苦的记忆隐退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工作能力比那时更为稳定。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去尝试一下对他很有吸引力，反正他在战后也必须谋一份稳定的收入。双方的私下协商一拍即合，没有任何障碍，因为维也纳大学缺乏杰出教师。只要他来，学校愿意满足他所有的愿望，教学活动的范围和方式由他自己决定。他受了感动，决定试一试，接受了1918年夏季学期正教授的聘任，试教一个学期。

不过从一开始韦伯就感到自己不会永远离开德国，也不能承受全职工作之累。他在四月份于开学前几个星期搬迁到维也纳。早春的气息轻柔地弥漫在这座瑰丽的城市里。

尽管受到艰难时运的压抑，欢乐和美丽似乎永远是这座城市存在的意义。一切都在对他微笑：自然环境温暖让人有置身南方之感；同事们都热情相助，其他人也都友好而且豁达。他见到了自己认识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发现他们与柏林那些人不同，即便在当时也仍然没有官僚的傲慢，仍然坦诚和心直口快。白天，他在图书馆安静地工作；晚上，他有时去剧院看演出。已匮乏多时的高蛋白食物让他感到身强力壮。生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然而，让人不胜其烦的“义务”——拜访系里的同事——很快就闯入了他心怀感激地享受着的假期生活。韦伯向来注重遵守学术和社会礼仪，所以自己并不想疏于这些礼节。于是大城市不利的一面就凸显出来了：每次拜访都是一次受罪的旅程，都要面对交通工具不便，然后要走很多的台阶，忍受无关紧要的交谈。多年来他已经不习惯于这种无聊和多余的形式了：“跑路和站着乘电车弄得我筋疲力尽。再这样下去，我能否授课这一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类拜访是一种可怕的累赘，我已经吃不消了。”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的杂事占用了他很多精力，在这里没有人帮他处理这类事情；还有行政机构按成规惯例办事的拖沓。还在学期开始之前，韦伯就已经有预感，觉得这份工作可能不行。阔别将近十九年后重返讲台，韦伯在最初几次讲座上确实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讲座的内容是他在宗教社会学和国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题目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证批判”。首先他必须重新适应上大课，他给自己授课的评价只是“中等”。不过，讲座听众数量的不断增长很快表明，他做教师的魅力犹在。没过多久，他的课在学校最大的礼堂里也听众爆满，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成年人，包括政治家、公务员和大学教师。他的课成了一件“大事”。 617

圣灵降临节之后，他的妻子也坐在听众中，心潮起伏，颇有些紧张。韦伯讲座的内容是宗教社会学，多数时间他一口气讲两个半小时，中间没有休息，直到夜幕降临到用镶板装饰的礼堂。他还没有恢复自己惯常的讲课风格。毋宁说多数时候他呈献给听众的是引人入胜的艺术成就。他以创造性的方式把极为丰富的材料组织起来，一切都讲得形象生动，在最遥远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的运思方式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地让人们通过那些久远的东西对熟悉的现实问题豁然开朗。比如说，在讲述印度的种姓制度根据什么宗教观念制造出反对革命的思想时，他也同时将此与现代欧洲社会主义与此相反的信仰背景进行比较。

韦伯的讲授是纯科学性的，介绍的是价值中立的经验知识，但人们可以感到他内心深处的波澜起伏。如果问及缘由，他只是说：“事实本身就已经是如此趣味横生。”正像他在自己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的序言中所说：人类命运的历程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胸。每一次像这样即兴发挥的侃侃而谈，即要求浓缩的知识，也需要驰骋想象，得消耗大量的精力。他妻子激动之余又带着几分担忧：像这样他自然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

618 的。每一次在这种长时间讲授之后，韦伯都会感到精疲力竭。之后他还要耐心回答在走廊里拥挤在身旁的人们提出的问题，然后他才一言不发地悄悄溜到“银井饭店”（Silbern Brunnen）。在那里美餐一顿，抽支雪茄，他便慢慢地恢复过来，重拾信心，相信第二天也能坚持得住。然后他对自己提出了不近情理的过分要求：“如果我想要做教授，就必须每天都能像这样讲课。”他的妻子接茬说道，也没有谁能够每天都演唱特里斯坦这个角色；她说他的授课全然没有学究气，有些过分宠溺自己的学生。

韦伯的同事和校方都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争取让他决定在维也纳长期呆下来。最为困难的是拒绝年轻人，包括年轻学者的恳求，他们希望他成为学术思想的中心。他犹豫了，让恳请者们去找另一个负责人：“我夫人负责我的事宜。”而玛丽安妮从一开始就觉得，在维也纳的逗留应当只是一次“历险”而已，因为韦伯无论如何应当属于德国。同时，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和法律系也都十分恳切地邀请他至少每年花部分时间在他们那里任教。但愿他能把这个学期坚持下来！出现新的精神崩溃将会是一场灾难。下述经历和其他事实表明，这种危险的确存在。

619 一个假日，韦伯夫妇去卡伦堡（Kahlenberg）作了一次怡人的郊游。韦伯欣赏着这个伟大城市的瑰丽景色，宽阔的多瑙河，周围缓缓的丘峦绿荫覆盖，远处高峻的山峰依稀可见。他兴致很好，称赞景色“柔美”，富有德国特色。傍晚时分，他们漫步穿过成熟的玉米地走下一座小山，准备去乘坐郊区的有轨电车。不等他们走到车站，韦伯便感到精疲力竭，突然开始烦恼起来。这时他猛然想起，忘记了将安眠药处方送去药店取药。好在他还带着处方，但当时是星期天晚上，他通常去的那家药店已经关门。他们继续徒步往前走，终于找到一家昼夜营业的药店。可是药店说没有医生签字不能照以前的处方再拿药。韦伯一个医生也不认识，而且时间又很晚了。他又累又气，陷入了绝望。明天要上大课，今晚自然是睡不好觉了；他觉得第二天将完全无法上课，可是课又没法取消。“真不该弄出这么个倒霉的郊游来，也不该有漫步这种愚蠢的主意，这下我肯定又要病倒了！”所有安慰他的努力都白搭，他连床都不愿上。午夜过后，妻子已束手无策，绝望地由他去了。这时她无意中发现自己还有几片安眠药——谢天谢地！韦伯立刻从恐慌中解脱出来了，面容松弛了下来，露出了笑容。现在他可以安稳下来了。他的确也睡着了，第二天站到了讲台上。

但是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学期中间他便递上了辞呈，不过答应今后有时会来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这下他心中如释重负，他的授课经验也渐次显露出来。不过他经常受到邀请，由于期待着进行重要的政治对话，他没有拒绝。这类活动，加上大城市生活的其他一些劳顿又几度将他推到了神经激惹的危险边缘。不过最终他还是完成了所有的工作，还额外做了一件事情：为军官们作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最后一周里他每天都在上课和论辩。一家维也纳报纸的文化版描述了他作为教师的个性特征。韦伯生气地

将其斥之为“戏剧评论”。不过下面援引的这段报道作为一个局外人的反应倒也有趣：

这位蓄着大胡子的高个子学者看起来像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德国石匠。只是他的眼睛没有艺术家的自然无羁和感官愉悦。他的目光源自心灵的最深处，走过了隐秘的路径，投向了最遥远的地方。这个人的表达方式与其外表相称，具有某种极为形象生动的东西，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近乎于古希腊观察事物的方式。他的词句简洁，在其静穆的单纯中，这些词句令人想到独眼巨人的巨石。如果他观察的焦点落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他的观察立即就会变得不朽，每一个特征都像是雕刻在大理石上，并用最强烈的光打在上面。他的讲演不时会伴有轻微的手势。他的手生得精巧而狭长，手指尖细，拇指显得有些任性。从这只手来看你似乎觉得他更像是一个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学者。自翁格尔、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和伊林以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还没有哪个教授像韦伯这样吸引了这么多的听众。不过这种超乎寻常的吸引力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雄辩的口才，也不是因为他运思具有原创性和严格的客观性；毋宁说这首先是由于他具有一种能力，能够唤起潜藏在别人心中的感受。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清楚地表明，他把自己视为德国历史的传人，充满了对后辈的责任感。

620

※ ※ ※

夏天的几个月里，维也纳受到的压力增大了。奥地利前线局势不妙，进攻意大利失败了。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后方人们都在忍饥挨饿，一些大学教授的家庭也未能幸免。这些人在公共食堂里用餐，以穿着破旧为荣。营养不足的公务员趴在办公桌上打瞌睡；街上有乞丐溜达。人们有灾难临头的感觉。从他信中摘引的下面几段可以说明他自己对维也纳这段日子的感受：

我来这里已经八天了，沐浴在春天里的城市美得令人迷醉。刚去过宫廷剧院（Hofoper），参加过系里的会议，到过普拉特（Prater）游乐场；我每天都在图书馆呆很长时间，我首先要看看自己如何在这里生存。不管怎么说，我感到非常孤独。“社会交往”在这里也凝滞呆板，晚上大家都早早就寝，只有咖啡馆在傍晚时分还总是很有吸引力。我的胃倒是乐于不再消化德国土豆，因为这里没有那样的东西，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如果有能力**支付**，你可以吃到鸡蛋以及肉食和春季的时鲜蔬菜。我总是终日饱食，这么多蛋白质让身体很受用。价格自然是极棒！我的住所还不错，尤其是**很干净**。让我心烦的是隔壁住着的一对年轻夫妇于那年轻夫妇的事

情，尤其是在饭后，否则一切就近乎“理想”了。因为在我窗前树木葱绿苍翠，几乎完全遮盖了这栋房屋平淡无奇的背街一面。万籁静寂。天气很暖，外出行走时几乎穿不住大衣，我房间里的窗户总是开着。今天中午或明天我要开始出去拜访，想到距离不近，我便有些发怵。我这里很好，这一点无可否认。我的脑子目前还好使，我对一切都满意；至于以后会怎样，我不敢肯定，不过现在我感到满意。

1918年4月14日于巴尔蒂克膳宿公寓（Pension Baltic），  
斯科达街（Skodagasse）15号

这座城市依旧是美得迷人，不管是初春季节，还是大街上古典的优雅，抑或是具有浓厚巴洛克风格的庭院，都一样迷人。只有跟“国家”打交道时，事情才变得令人讨厌。例如，尽管我什么法子都使过了，可是**直到今天**仍然还未拿到**钱**。弄得我这期间不得不向哈特曼夫人借钱！让人几乎难以置信。同样，我的课在公布的课程表上自然也完全给弄错了，本来安排的是每次一个小时的课被弄成了两个小时，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有的图书馆都没有适用的卡片目录，本来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图书馆因此而大打折扣。还有很多别的类似的事情。尽管如此，这儿很美，只是上课不能超过五个小时，否则，这**肯定会**严重影响神经易激惹的人。不过这学期将会很顺利。克勒瑙在这里，我们聚了一晚上，星期二晚上要演奏他的交响曲，星期一我要去看《伊莱克特拉》（*Elektra*），因为“伟大的理查”（施特劳斯）在这里，并将亲自担任指挥。之后星期三或者星期四也许去看莫伊斯（Moissy）的演出。你看，我什么都不会错过，现在还可以这样逍遥，一旦开始上课，就不能有这份悠闲了。

除此之外，我过得**很好**。星期六在膳宿公寓是“无面包日”，然后人们就吃鸡蛋，乐于有这样一个借口，因为玉米面包确实难以下咽。我一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早上喝过茶之后便去图书馆，待到十二点半，然后去午餐，餐后休息半个小时，这期间那对倒霉的年轻夫妇好像是打定了主意不让我睡觉。之后三点到六点在图书馆，然后去咖啡馆或者散步，完了再回图书馆待到晚上八点。此后去克洛姆泽尔（Klomsers）的餐馆和别的饭馆用晚餐，之后回家抽一支雪茄（通过“关系”才弄到的珍奇！），然后就寝。

1918年4月19日

海伦妮·韦伯生日之际致她的信。

在这里，我窗前有一个大的内院，院内古老的大树长得很密集。树上有鸟儿栖

息，除此之外则是一片寂静。这样的环境只可能出现在维也纳的市中心。我的住所离大学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距离，大学位于皇家剧院（Hofburgtheater）对面的“环形大道”上，我住所门前有开往普拉特游乐场等地的电车。这里只能远远地听到一点城市的喧嚣，假如不是隔壁那一对年轻夫妇折腾他们那点儿事，这里简直就是“理想”之地了。不管怎样，我的生活环境从健康上讲是再有利不过了。我刚从维也纳森林归来，林中已经弥漫着初春的气息——气候温暖而多春雨。现在离上课还有十四天。

你知道我们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和我们对你有什么祝福。愿你对我们的爱像往常和现在这样美、这样强烈和富有生气，愿你保持对生活的乐趣。这个时代既是可怕的也是伟大的。正处于这样的进攻战役期间，我们肯定每天都要想到在前线的人们，尤其是克拉拉的儿子，他正置身于战火之中。每天早上我们都要重新想到战事“仍在”进行，而这往往难以忍受，心里堵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你在海德堡时也在我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然而，如果不得不如此，人们也应当感激自己能够经历这些事件。

1918年4月14日

（致海伦妮）多谢你充满慈爱的来信。这里事情开始得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要到下周才开始上课。在此期间，还有一些拜访的苦差事，由于路途遥远弄得我非常劳累。可恶的奥地利国家储蓄银行到现在已经“优哉游哉”地拖了两个半星期，至今还没有决定把我的钱支付给我。不过除此之外，一切都**非常**迷人，春天装扮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清晨，在犹如公园一般的巨大庭院里，栖息在我窗前古树上的画眉将我唤醒。除了维也纳，在其他大城市中心无法找到这样的景致……

只要付得起钱，你可以尽情享受鸡蛋、肉食、脆饼、精美的咖啡和精致的厨艺。我可以每天早上在大学对面的咖啡馆里吃两个鸡蛋，这在德国简直是难以想象！剧院和歌剧院离我这里都很近，最近去听了莫扎特的《后宫诱逃》（*Entführung*），很快要去看《李尔王》。在维也纳森林里远足令人神往，可惜我到现在鲜有机会去，我会与玛丽安妮一同弥补这一不足。当然，这里不可能成为我的“家乡”，我现在就可以断定，在大城市的环境中，我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623

的确，我们在爱沙尼亚（Estland）和利沃尼亚（Livland）的政策非但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对未来是相当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至于**国内**政策，现在则极不稳定。必须由从战场归来的人们按**他们的**意愿建设自己的祖国。然而我们只要想一想自己免遭了何等的厄运（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也就会抛开一切“悲观”情绪了。

1918年4月22日

（致妹妹）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屋后是一个维也纳那种古老、美丽的巨大庭院，像公园里一样古木丛生，画眉在院里婉转鸣啼。古老的城市以处于各种状态的最怡人的春天装扮着自己迷人的典雅：你可以乘齿轨列车登上卡伦堡山去呼吸早春的气息，或者流连于花儿正开得最为繁盛的果林之中，或者享受普拉特游乐场提供的丰富乐趣，欣赏那里的草地、林荫大道和春天举行的彩车巡礼。**殷实人家**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战争的痕迹。剧场和歌剧院与我的住地近在咫尺，演出最为诱人的节目，票总是提前一周就告罄。这里到处都显得非常优雅。像在和平时期一样，你花不多的钱便可享受一顿美餐；你的眼睛可以享受绝色美女的盛宴，观赏非常漂亮的马车，虽然汽车的出现已经使颇有绅士风度的出租马车夫绝了种。你可以领略这里渗透在文化积淀中的人文气氛，这种气氛在资产阶级中表现为尽情而又不失雅致地享受生活之乐，而在上层社会中则表现为漫不经心的优雅和舒适的慵懒。

这里不可能成为我的“家乡”。不过每隔两年来这里待上半年倒是没问题。这里的行政机构办事都有点“马马虎虎”和不紧不慢。你要不对他们发火，他们会忘记付你钱。刊印的课程表也出错。在学校的院系里有一种幼稚的懒散之风。这一切都不可救药。要对此负起责任来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倒也非常吸引人——**假如**我能够忍受得了的话。我绝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环境里任全职正教授，这一点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无可奈何，同时又感到宽慰，如此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了。……

624

在这里让我感到劳顿的是**大城市**生活。这些没完没了的拜访！早上我没有机会工作，下午又由于在拥挤的有轨电车上站了半天而累得筋疲力尽。人人都住在四楼层上，离我这里半个小时路程。走这么多的路！这正是我根本无法做到的。所以尽管有这种吸引力，这里仍然不适合我待下去。在这里弄“一套房”对我们并非易事。搬家费用不菲，房屋价格昂贵，建房则没有可能。简而言之，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事儿没法办，因为我做不了这种事情。不过，圣灵降临节期间我们将在一起欢聚。前天晚上我去拜访了信贷银行董事哈默尔施拉格（Hammerschlag），跟平时一样八点半到，八点四十五分用晚餐，大约十点钟“餐后客人”到来：两位要员，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永（Friedjung）博士和其他人。跟往常一样，大家无拘无束，热烈而活跃。只是**这类**活动时间拖得有点晚：不到凌晨两点无法上床睡觉，而晚上11点钟以后“咖啡馆”就关门了。星期二第一次开始上课，今天和明天出去拜访，星期三和星期四也是拜访时间。……

第一堂讲座课也上完了。我星期一晚上有两个小时的课（六点到八点），星期



二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星期三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星期二和星期三的课下星期才开始上。现在课上有60~70个学生，可能会缩减到30~40个（根据做笔记的人来判断）。上课上得我精疲力竭！我宁愿作十个小时的即兴“讲演”，也不愿上这两个小时的课！我得看看自己能否坚持得下去。不管怎么说，今天我的身体状况告诉我，全职授课我无法想象。学生们听课很专心，这一点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不过拜访和诸如此类的东奔西跑我却无法承受。这让我大脑陷入非常糟糕的状态，需要服用安眠药。然后还得像这样一本正经地提高嗓门讲课，又唯恐学生听不懂我的讲授。简言之，这种辛劳不能长久。我的讲授算得上“中等”吧。要是在一周之前，我会讲得非常好。可是，在20个不同的市区奔跑，几乎总要爬上四层楼，加上一肚子气已经弄得我半死不活了。我要到星期一才能拿到钱，简直难以置信！这还是因为我向地方当局提出了申诉，说我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的状况，威胁要立即辞职！

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春天（星期一晚上我去了维也纳森林）、古老城市的美、这里的人，还有宽敞的办公室等等。可我是一个学者，不幸由于健康原因不再适合做教师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625

好了，第二堂讲座课（即从六点到八点两个小时的课）也上完了；紧接着要上第三堂课，明天要上研讨课。听课的人数增加了，尤其是一些同事也热心地在听课并做笔记。天哪，这可真是累死人了！同这两小时的讲座课比较起来，十个小时的即兴讲演根本算不得什么。受课程大纲的限制，又要照顾听课者能做笔记——真是难以置信。这种课每周要超过两到三个小时是绝对不行的。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的讲授最多只达到了中等水平，尽管备了课（或许正是因为备了课的原因），而备课毕竟是不可或缺的。罢了，我生来就只能舞文弄墨，做做讲演，而不是上课的料。这种经历对我来说有些痛苦，是明摆着的事实。

唔，又上完了两天的课；相当费劲，因为听课的人数又增加了，现在大大超过了300人，有的人只好靠墙站着，再也找不到更大的授课大厅了。不过跟往常一样，在经历了长时间晚上休息不好之后，现在好多了。大后天是个节日，可是年轻人要求搞他们的研讨会，所以我明天晚上得去做这件事。明天中午我去西格哈特（Sieghart）阁下家里见冯·普勒纳男爵（Baron von Plener），星期六晚上要去罗雷小屋（Rohrerhütte）旅店见工商部的里德尔（Riedl）司长和部里其他官员。我的课程何时结束还定不下来。认真的学生们恳请我一直讲到八月份，这我做不到，别的不说，单是我的钱就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在此期间，德意志帝国议会又在侈谈

一些该死的谬论；可怜的奥地利人在皮亚韦河（Piave）战役中又倒了霉。两件事都不顺心。

这几天我基本上不得不待在家里。强烈的过度刺激影响了我的消化系统，胃一个劲翻腾，星期五我不得不告假，好几天几乎是24小时躺在床上。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过去了，缓和了一些，差不多恢复了以前的状态。明天又要上讲座课，星期二也一样，然后还有五次课和五次研讨会。当然，我只是在计算着我还得熬多长时间，不过我想我能坚持下去。

在胃神经镇静下来之后，头脑也清醒多了，如果我能够避免夜里睡不好觉，我想我可以坚持到7月17或18号。今天我在一个军官团体（“阻击和平宣传”）就“社会主义”问题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听众（约300人）相当友好，然后还有“提问”。明天有研讨会，后天在西格哈特阁下家里进餐。过去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课比较难，不过看起来好像仍然受欢迎。不管怎么样，来上课的人跟往常一样多。

我的情况比以前好一点。讲座课仍然爆满，上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我还得加快进度，否则内容讲不完。昨天我跟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一道去拜会了萨克森公使冯·诺斯蒂茨（v. Nostitz）。霍夫曼斯塔尔是个睿智而有品位的维也纳人，不过全然没有他的《提香之死》（*Tod des Tizian*）让人觉得他会有的那种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以友好的方式谈及格奥尔格和贡多尔夫，尽管他知道这两人都蔑视自己。今天晚上我去听了一个关于中国的讲演，讲演者是非常友善的冯·罗斯托恩（v. Rosthorn）（驻北京公使）。要是我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就好了。有人说是7月22号！万事都总有个结束的时候。我确实希望这里的事已经结束了，因为总担心着自己健康并不是一件宜人的事情。不过，我打算撑过余下的这四个星期。

昨天，星期六，我在西格哈特阁下家里同德国大使以及几位政治家共进晚餐，晚餐很愉快，然后与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的年轻人聊到晚上十一点。今天又同萨克森公使饮茶。明天又要上讲座课！我不知道明天上课情况会怎么样，一场“感冒”弄得我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过分激惹的症状始终存在，不是这里有麻烦，就是那里出问题。若为稻粱谋，我倒是愿意过教课这种半人半兽的生活，因为那是非如此不可。但如果是为了“理想”的目的，如果从“理想”的观点来看，我是不愿意这

样做的！为此而牺牲一切生活乐趣，那太恐怖了。这与二十年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丝毫变化也没有。

又上完了两天的讲座课，现在还剩下两次两小时的课，另外还有两到三次晚上的研讨班课程。然后我就算挺过来了。希望我能坚持得住。昨天来听课的人仍然很多，在这个大阶梯教室里不少人靠墙站着。 627

过去一周里，我每天都在讲课；来上课的人仍然不少，尽管课已经讲完，正处于考试阶段。在给海德堡大学的法学家和哲学家的回信中，我告诉他们明年夏天我也许愿意在海德堡开一门小课。这里的先生们想让我与他们一起做点什么事情，我请求他们在聘用正教授之前，现在无论如何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玛丽安妮致海伦妮）设想一下，马克斯昨天晚上回家来了——居然还活着，虽然瘦得不成样子，尽管他每天都吃两顿肉、四个鸡蛋。不过我希望，这里夏天的宁静和美丽可以弥补他的朵颐之快，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维也纳的那种朵颐之快最终不过是可怕的精神劳顿所能得到的唯一补偿。因为他在最后一周里仍然天天上课，研讨课常常长达三小时之久。在他那里人们的求知欲望总没有满足的时候。谢天谢地，他总算没有崩溃。不过现在他必须重新学会不靠安眠药睡觉，并且不要暴饮暴食。他不喜欢谈论战争和政治，这对他没什么益处。不过昨晚“回到家里”他非常高兴，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不会让他扫兴。

※ ※ ※

韦伯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感到很疲惫，但是原来设想的那种精疲力竭的状况则没有出现。他很快又投入了工作，经历了一段清静的美好时光。九月份，韦伯夫妇前往奥灵豪森与海伦妮和其他亲属团聚。他们曾在这里举行过“绿色”婚礼，并将在这里庆祝自己的银婚。维娜早就为招待客人做好了准备。数月之前她就将一只大烤鹅封存在锡制器皿中埋了起来，一时成了全村的趣谈。尽管时事维艰，有了这样一番准备，他们仍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庆典。秋日的阳光洒在花园里，树叶已经变了颜色，然而花坛里红色的天竺葵仍然在阳光下闪烁着。早上，大家都到园中去找用来榨油的山毛榉坚果。这次团聚的人比以前要少，因为一些可爱的人早已离开了人世。维娜那些魁伟的儿子中也缺少了一个，他绽放着青春的生命已经长眠在一座埋葬牺牲者的山坡上了。 628

不过，韦伯家族的两支——海伦妮和维娜的后裔——还仍然蓬勃兴旺，两位母亲还

仍然在管事。像当初一样，清晨人们唱起了圣歌《我的心啊，你要赞美主》。姐妹俩再次用双手献上了礼物和银色的花环，同时朗诵着海伦妮写的诗。用餐时，参加聚会的人们互致祝辞和答辞。人们的话语中淡淡地流露出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岁月中所有的美好和艰辛，犹如从酒杯底微微泛起的珍珠般的小泡泡。他们相互之间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感谢：玛丽安妮感谢丈夫将自己作为并肩而立的伴侣，给了她充分的自由，让她按自己的意愿发展；韦伯感谢妻子在日常生活中赐福于他。大家都感谢母亲们永不枯竭的爱，感谢命运让他们经受了考验，同时也给了他们力量去承受这些考验。不过韦伯夫妇并不觉得自己是处于一个安定平和的终点，而是觉得自己正处于一个更加困难的新阶段的起点，这个新阶段要求他们接受新的考验。韦伯生命的航船又重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簸。有谁知道这艘航船能否到达新的海岸呢？即便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和谐幸福，也似乎并不是那么安稳保险的财富；相反，他们知道，这种和谐幸福每一天都得从日常生活的平庸之中重新获得。

这次庆典过后一个星期，保加利亚就崩溃了——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获得可以让人接受的停战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要是放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不可能搞这种庆典的。韦伯变得非常沉默和内向——“现在有一个铁环箍在我心上。”他很痛苦，不时褻渎那位世界的操纵者。

# 第 19 章 革命后的政治家

## 1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接着叙述一下政治局势。到 1917 年底，人们寄托在潜艇上的希望早已幻灭了。德国军队虽然仍在敌国境内，但却越来越被迫处于防守态势。国内的矛盾冲突又重新激化。冲突的焦点始终是同样的问题：媾和与宪法改革。“无党派人士”从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这些年来经受住了考验——那里分裂出来，成为带有激进的和平主义和革命倾向的一派；而于 1917 年秋组建的“祖国党”（Vaterlandspartei）所追求的东西与此正好相反，蒂尔皮茨和卡普 [（Wolfgang）Kapp] 在这个党里聚集了泛日耳曼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该党反对和平解决方案和国内改革，要求永久占据比利时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领土，鼓吹向军队施加政治影响，以反对在相互谅解基础上实现和平和反对政府。特别是该党大肆吹嘘自己比别的政党更具有爱国主义的特质，因此它的策略毒化了国内的政治斗争的空气。该党遭到了“自由与祖国人民联盟”（Der Volksbund für Freiheit und Vaterland）的反对，后者是一个超党派组织，要求“在相互谅解基础上实现和平”，要求在自由的基础上立即实行对所有国家机构的改革。在十二月底发表的一份声明上，马克斯·韦伯也签了名，同时签名的还有勃伦塔诺、G. 博伊默尔、H. 德尔布吕克、瑙曼、昂肯、特勒尔奇等人。战争爆发之初让大家团结一致、群情振奋的民族一体感现在已消失殆尽。受到共同威胁的同胞现在相互仇恨，同室操戈。

例如，在 1917 年 12 月人民联盟召开的大会上，韦伯批评了祖国党的蛊惑方式，尤

其批评了该党使军队政治化的做法，认为此举非常值得怀疑。韦伯引用了布吕歇尔（Blücher）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名言，可是有一个听众在自己的脑子里把韦伯的意思完全弄拧了——这些话受到极右的反对派的欢迎，被他们当作例证材料，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去弄清楚自己的说法是否具有准确性。韦伯在下面的声明中对此进行了反击：

我对所谓祖国党的智力所做的估计本来就低得可怜，下面这一事实说明其智力甚至比我的估计还要低。他们居然相信在海德堡有“公民”会自以为从**我的嘴里**听到了这样一句话：“**笔墨恢复了刀剑所毁灭的东西。**”令人遗憾的是，尔后一个类似的传言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被重复，并成为发往国会的一封电报的内容，因为这样的胡说八道只会使海德堡的市民成为别人的笑柄。我乐于尽自己的义务，公开澄清我到底说了什么，以及我当时没有说的话：“军队的政治化，尤其是个别政党通过电报和示好的言论把军队的最高统帅部拖入政党之争，都促使我们要提请我们伟大的军事领袖们注意：小心，别让人日后说，您用刀剑所获得的东西，又因为您让自己被拽入国内党派之争的喧嚣和被推上这种斗争的薄冰而遭毁灭的命运。”因为如果一个军官进入一个自己不能驾驭的领域，他就是拿自己在部属和民族中享有的权威（在这里他理应享有这种权威）去冒险。<sup>①</sup>

631

大约就在此时，国外一个真正巨大的奇迹帮助了德国：处于革命中的俄国在春天就已显露出崩溃的迹象，现在彻底崩溃了。这个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国家在十二月中旬要求停火，提出了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谅解，这尤其应当包括俄国的周边国家。德国原则上准备接受这一方案，但却拒绝在实现全面和平之前放弃波罗的海地区，听任其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在其他问题上，参加谈判的德国将军也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因此谈判陷入了僵局。俄国人希望革命之火烧到德国领土上。结果是德国与乌克兰单独媾和，而与俄国的关系则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战争虽然停止了，但并未缔结和约。德国军队又重新向东推进，韦伯评论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wsk）发生的事情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结果将会表明这种没有必要的生硬态度会带来什么结果。不过我觉得托洛茨基（Trotzki）比我们的人要机智。”几个星期以后，当谈判陷入僵局时，韦伯写道：

如果不对其施加绝对的压力，就没有哪一个俄国人能够做到把里加（Liga）拱手让给德国。任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和平都将只是虚假和平而已，只有在俄国陷

<sup>①</sup> 1917年12月10日写给《海德堡日报》（*Heidelberger Tagblatt*）的读者来信。

入困境时，这种和平才能够维持下去。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占领大片的俄国领土，所以托洛茨基对和平也不会有真正不可抗拒的兴趣，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谈判取得进展，原本就不应当选择军方要求的那种方案。霍夫曼（Hoffmann）事件是个丑闻。他有可能葬送我们达成协议的机会。正是对我们领导层的悲观看法导致了沙伊德曼（Scheidemann）和他的同事推行的悲观政策；换句话说，因为他们坚信，事情反正怎么也弄不好，那就随它去吧。

1918年2月7日

对西线的攻势已经做出了决定（预计的伤亡数字如天方夜谭，非常恐怖！），人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出击上。这样做有道理吗？我敢以2：1的赔率打赌，秋天有望实现和平。更高的赔率我就不敢赌了，因为我们的军队真的疯了。如果选举权法案出点差错，出现总罢工，那就有可能出现严重问题。拉特瑙（Rathenau）打赌说战争还要打三年。这不可能，肯定会爆发革命。不过一切都不能确定。

1918年1月17日

祖国党的出现导致了极左派采取危险的应对措施。他们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组织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组织了军工厂的工人多天的罢工。这次罢工的目的在于促进世界和平，促进被延宕的民主化。帝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仍然站在主子的立场，拒绝与罢工的领导者对话。不过，由于工会反对罢工，社会主义者中的多数派领袖重新获得了对工人的控制，一场严重的灾难这才得以避免。韦伯就此写信给昂肯：

632

柏林的政治事件足以令人绝望。然而，所有在十四天前看到这个政治疯人院的人，对此都不应感到惊奇。战争新闻署的行为——把在布列斯特问题上同军方关于职权范围的分歧以及霍夫曼的讲话捅给了新闻界——在维也纳，因而也在柏林，葬送了一切。左派中没有任何人相信会有平等的选举权（瑙曼也同样不信）；人们确信，社会民主党会因此而不能够再劝阻工人们（他们一直在阐明这一点，并指出了后果）。他们的处境颇为不易，因为最近的事件使人们都向左倾，倒向了非党派人士。

1918年2月1日

尽管如此，仍然有理由抱有新的希望。俄国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已经没有作战能力，必须在三月底被迫签订合约，将大片国土置于德国控制之下。假如西线没有营养良好且配备了最精良装备的美国军队的不断补给增援，那么一个可以接受的和平现在也许能有

保障了。可是现在怎么样了呢？所有的胜利似乎使得德国距离这样一种和平更加遥远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攻势发动之前就已经对可怕的伤亡数字作了“估算”）旨在迫使战争结束。好几个月里，这场攻势接连获得了辉煌战果。德国军队挺进到了法国纵深地区，巴黎已经遭到远程火炮轰击，青年军官们已经在幻想着开进巴黎了。当六月底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屈尔曼（v. Kühlmann）在帝国议会宣布，单靠武力不能结束战争的时候，他是在暗示政府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他不得不对泛日耳曼主义者的攻击做出让步。但到了七月中旬，敌方在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从八月开始，敌方的优势兵力迫使德军全线撤退。最终人们再也无法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了：人力、食品，尤其是军需物资的储备已经告罄，奥地利已经陷于崩溃。军事统帅部已经断定，同盟国用军事手段无法摧毁敌方的作战意志。

现在德国方面展开了以唇舌为武器的“和平攻势”。可正在向前推进的敌人则无意于谈判。政治家们继续着横跨大洋的对话，德国听到的始终是同样的要求：比利时必须恢复独立，归还被德国占领的所有领土，赔偿一切损失，让阿尔萨斯-洛林和波兰拥有自由出海口。这些要求此时已经纳入了威尔逊的世界和平计划，即他的所谓“十四点计划”。他掌握着欧洲命运的天平，人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德国，“通过实力实现和平”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两派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然而，不管是在东线还是在西线，对于德国不能被肢解这一点，所有人意见都一致。政府承认攻势已告失败：“形势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沮丧。”多数党现在敦促实施议会制。可是帝国首相冯·赫特林（v. Hertling）跟他的前任一样，受军方的政治影响而宣布反对此举，随即辞职。宪法改革的道路廓清了，可是德国正处于最危险的关头。应当由谁来掌舵呢？很多读过韦伯的争论文章，听过他讲演的人都觉得，马克斯·韦伯可当此重任。他年轻时在柏林的一位朋友于1918年10月2日写信给海伦妮·韦伯说：

最近我经常想到您，感到非给您写几句不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一直不能释怀，那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内政治危机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那就是您的儿子马克斯。我越想越觉得，他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在这个危难时刻成为我们的领袖。今天有几个来自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在我这里谈点事儿，由于他们刚刚参加完一个议会党团会议，所以自然就谈到了政治问题。他们告诉我，说一直还没有找到首相的合适人选。他们都很不喜欢马克斯·冯·巴登（Max von Baden）亲王。于是我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去找另一个巴登州的马克斯，也就是马克斯·韦伯呢？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也许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人。”他们对这个想法颇以为然，并要在今晚召开的议会党团会议上把他的名字提出来讨论。只要将他付诸讨论，我觉得希望就很大，而且我相信，多数党的所有党员都会一致同意他这个人选。此外，



我坦率地承认，对于马克斯以前的政治活动我并非都赞成，例如，我对他当初热情支持贝特曼很不理解。然而，他的政治天才、渊博的知识、杰出的雄辩才能、极为丰富的智慧都注定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只有最杰出的人才能胜任的时刻，他比任何人都更适于担当领袖的重任……

1918年9月2日

当时，很多置身于政党体系之外，对其内在运作机制不甚了解的人都有这种想法。

然而，职业政治家根本就不会考虑一个置身于现实政治和政党活动之外的人。像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这样一个温和而精明的贵族大公的作风似乎也能让保守派接受。他当上了首相，决定支持多数党的纲领：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实行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在国内政策上主张实行议会制和普鲁士的民主化。这个危难中的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似乎终于重新达成一致，走上了理性的道路。左派的代表进入了内阁。人们仍然心存希望，希望民主能够拯救德国。前线毕竟还没有被突破，德国军队仍然在敌国领土上。正值国家改弦更张之初，军队的最高统帅部——鲁登道夫（Ludendorff）——要求立即向威尔逊提出一个和平提议，尤其是要提出一个停火提议。帝国首相反对此举，但不起作用，将军们仍然坚持己见。德国国内举国震惊，国外则将此视为德国濒临崩溃的征兆。10月1日，韦伯在给瑙曼的信中对此评论道：

鉴于政府所承担的可怕的责任，它必须采取行动，在实现和平和军人复员之后，在选举之前，立即给全国一个**政府工作的总结报告**。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现在就着手进行**，现在就得开始**弄清楚**导致重大决策的**事实**，**详细**提供所有的证据，给出日期和人名，包括所有对局势负有责任的那些个人发表的看法。这件事由谁来做倒无所谓，但这**无论如何**得做，否则我们会追悔莫及。

635

我在公开场合暂时（至少到现在为止）还绝对保持沉默，其原因在于，就像每一个局外人一样，我完全不知底细，担心自己的看法会被实际的事件和步骤否定。我承认，从柏林听到的一切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我们**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的民族可能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希望事情不至于此。现在灾祸已经酿成，我倒完全镇定自若了。希望您也如此。

韦伯再一次料事如神。就在第二天，他向政界的朋友格哈特·舒尔策-格费尔尼茨、汉斯·德尔布吕克和瑙曼指出，只有皇帝立即主动退位，君主制和王朝或许才会有救。1918年10月11日，他写信给舒尔策-格费尔尼茨教授：

作为（虽说得受到议会限制的）君主制，尤其是作为德意志王朝的真诚拥护者，我坚信，当朝皇帝为了帝国和王朝的利益必须退位。如果他发表下述声明，他便可以充分保存自己的尊严，全身而退：他按正义和良心不得不这样做；他自己时运已不济，不愿阻碍自己的臣民奔向新的未来。在一个被肢解的德国吃“嗟来之食”——实际将会如此——**有损他自己和皇权的尊严**。如果他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现在就退位**，他的退位就是光荣的，整个民族就会为他的豪侠举动而满怀同情之心。最重要的是，如此王朝的地位就得以保存下来。如果他继续恋战，那么，人们在不可避免地追究严重的政策失误的责任时，也会把矛头指向他，这是无法改变的。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君主认识不到这种情势的情况下，向他说明。我坦率地承认，我对他的统治方式一直非常反感。然而为了帝制的利益，我不能希望皇帝有一个**不体面**的下场，不管是他以后在外来压力下被迫退位，还是他继续在皇位上苟延残喘，都是我所不愿的。如果皇帝退位，我们的境况会有好转，其实这还是次要的，尽管这最终并非无足轻重。可是，试想一下，如果不退位，他将会面临多么可怕的羞辱！想来都令人毛骨悚然！且对子孙后代将会有持续的影响！在给璩曼和德尔布吕克的信中我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眼见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动静，韦伯焦急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信：

皇帝退位的事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个关键问题。他要是马上退位那该有多好啊！我承认，现在一切都更加困难了，但此事**必须**得做。这并不等于承认他自己或我们在**道德上负疚**。不过，他确实犯了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此他自己**必须**承担责任，这样才能既让他自己，也让整个民族生活得有尊严。……至关重要的是，**右翼**人士要认识到这一步骤对于王朝的未来毫无疑问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这里右翼人士主要是指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至于极右派，我不相信他们能有这样的眼光。……这里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没有一个人据此采取行动。

这一步骤没有实现，后来就更加难以实现了，因为现在被请求进行斡旋的**威尔逊**提出了如下**要求**：“美国不愿与德国的军事当局和专制君主进行谈判。对于他们，美国要求的不是和平谈判，而是**投降**。”

现在军队将领敦促把战争进行到底，很多人对此做好了准备。不过这项要求在帝国议会未能获得多数支持。民众疲惫不堪，以及诸如帝国濒临崩溃等其他问题决定了此举必定遭到人们反对。例如，韦伯在慕尼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如果要呼吁‘全民抗战’，巴伐利亚就会自动从帝国中分裂出去。这里所有的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党都持这

种看法。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冠，皇帝将别无选择。”（1918年10月6日）四周后，韦伯又写信给昂肯说：

下面关于巴伐利亚局势的信息眼下得严格保密。两周前，中央党主席、议员和最近又做了部长的 H. [黑尔德 (Held)] 在州议院当着多人的面对自由党主席说：最好避免使用左派的宣言中提出的“效忠帝国”的口号，因为我们不知道帝国将来会怎么样，因为如果我们丢开帝国，转向讲德语的奥地利，包括在财政上（考虑到帝国债务），这对我们或许是有利的。不幸的是，这件事至少已有上百人知晓，因为进步党在纽伦堡 (Nürnberg) 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对此作了“内部”传达，并进行了讨论——这非常不合时宜。在一个公众集会上，我奚落了这种分裂的观念，提醒人们回想一下解除关税同盟和当时的关税分离所造成的后果；会后我接到一个工程师的电话，宣称这种论点完全不足以令人信服。我对他说：“不信那您就试试吧。”他只是回答说：“我们会试的。”谁都知道，皇室不见得不乐意见到这整个情景。“效忠帝国”的只有左派，但社会民主党附加的条件是威廉二世必须退位，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此外，即便是在最杰出的人们中间，普遍的看法也都是：无条件支持，尽一切努力实现和平——因为任何组织抵抗的企图都会立即导致无政府主义，这将足以令人绝望。

1918年11月6日

※ ※ ※

在军队被置于帝国议会控制之下后，鲁登道夫辞去了军队统帅的职务。不过，兴登堡继续留任；他此时所做的一切，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普遍敬重。皇帝逃进了总司令部，左派在要求他退位。威尔逊手中掌握着世界的命运。那段时间里，韦伯在写给《法兰克福报》的一封简短的读者来信中警告威尔逊，不要提出更苛刻的条件：

如果我们答应他的要求，让德国政府接受一个令其无力再进行军事抵抗的停战条件，那么，不仅是德国，在极大程度上就连他自己也将对缔结和平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自己作为世界仲裁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取决于而且仅仅取决于，德国的军事力量至少在没有美国军队介入的情况下，绝对不至于被迫投降。假如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敌国那些决不妥协的强硬派（毫无疑问有那么一批人存在）将会占上风，就可以对总统迄今为止提供的帮助客气地道声谢，然后将他晾在

638

一边。这样一来，他的角色也就扮演完了……<sup>①</sup>

可是灾难正在降临：11月3日，停泊在基尔（Kiel）港舰队的水兵哗变。11月4日，韦伯应人民进步党之邀，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政治讲演。那时，慕尼黑已经不断有极左派的集会和游行队伍。他讲演的题目是“德国的政治新秩序”。据几个听众说，他们觉得这是韦伯一生中最富有激情的讲演之一。“尽管他在分析形势时有意识地尽量保持冷静，然而激情还是不断喷发出来。”<sup>②</sup>他诉诸有男子气的人们面对敌人时自我保护的本能，诉诸维护帝国存在的意志：“‘脱离普鲁士’的口号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这个世界有一个奇特的命运：第一位真正统治世界的人是一位教授 [伍德罗·威尔逊]。从他极其愚蠢的举措——他的停战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的确是位教授。如果他不能阻止德国在进入谈判时完全丧失其武装力量，他自己的统治也就寿终正寝了。然后法国将军们就会说：“多谢了，现在我们要单独对付德国，无须您参与了。”实现和平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政治家的道路，一条是登山宝训似的道路。政治家缔造的和平必须使当事各方都能够真诚地遵守和平协议。另一种方式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如果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愿意把登山宝训的伦理也运用于其他领域，那人们可以对他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如果和平的条件令人不能容忍，那么，是否会重新爆发民族自卫战争的问题得由前线的士兵们来决定。革命不会带来和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军事独裁，跟其他军事独裁没有什么两样，也会像其他军事独裁一样崩溃。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可能通过革命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样一种革命的结果将会是敌人的入侵，以及将来反动派得势。

639

听众中有的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成员，有的是极左派——受千年至福论希望感召的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莱菲恩（M. Levien）和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后者直到那时一直是作为具有典型波希米亚风格特征的施瓦本人而为人所知晓的。听到韦伯在讲演中反对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和反对革命时，莱菲恩不时高声呼叫着打断他的讲演，对此韦伯以越来越嘲讽的口吻予以回击。讲演还在进行时听众就已经是群情激奋了，敌对的气氛直逼讲台。这些人不能也不愿再去理解他。在讨论中，这些人满口的共产主义口号，他们完全听不进韦伯的论点。听众中的中产阶级保持着沉默。这是第一次民众的敌意本能地冲着他来，而他却无法加以控制。他觉得这种蛊惑民心的行径很“丑陋”，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讲演之后，韦伯在卡岑斯泰因（E. Katzenstein）家里见到了部分听众，K几天后

<sup>①</sup> 参见 *Gesammelte politische Aufsätze*, 340ff.

<sup>②</sup> 据几个听众的描述。

领导了占领慕尼黑警察局的活动。当时在场的人们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进行革命。韦伯坐在他们中间“像一个古代骑士”，情绪激动地谈论着皇帝的失误，即他没有采取唯一能够拯救君主制的正确步骤。人们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现在应当怎么办？”对此他回答说：“这必须由前线的士兵来决定。”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自己曾经在前线待过，确信只有摆脱军队才会有正确的认识。

当时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还在革命与民族爱国主义之间犹豫不决，他们对韦伯的阐述有何看法，对他有什么希望和期待，都典型地反映在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克莱因(G. W. Klein)〕下面这封信中： 640

照我看来，最杰出的人都把政治希望寄托在您——教授先生——的身上。简单地说吧，我最大的希望莫过于看到您出任帝国首相，因为在所有从政的人中，我的确没有发现一个像您一样能够让我信任，一个像您一样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而您想要做的绝对是最具有男子气概和最出色的事情。此外，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并且在当前也是非常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做什么，而且是**怎么做**。我们现在需要的应当是一位教育家，他能够教导全民族如何理解这类事情，以让他们能够从中有所得。让我最感到遗憾的是，我在海德堡时没能同您有个人的密切接触，以让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您能否恕我提请您注意由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以及我本人提出的几点异议……

人们主要是说您不能与时俱进。我可以告诉您，我并不同意这一指责，尤其是这种指责来自那些意识形态的盲目追随者。这种批评我在海德堡就听到过，现在在您讲演时又出现了。关于您的讲演，我得坦率地承认，从内容上讲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正让我激动的是您的态度和您演讲时表现出的巨大活力。我相信，您不能，也不可以像我们这些仍然具有可塑性、对各种环境更容易适应的年轻人一样，以同样的速度改变自己的观念，而这种改变即便是对我们这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必要的。因此我的印象是，虽然您并没有说，但您对变化是顺其自然；也许从根本上讲，您最为关心的是，在这个重估一切价值——这有使一切价值都变得无价值可言之虞——的时代，您想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持一个严肃而富有骑士精神和绝对正直的人的立场。在别人指责您时，我就是用这样的解释来应对的…… 641

我们之所以迫切需要您成为领袖，这并不是要解决我们应采取哪一种态度的问题（绝不容忍不义，还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而是因为您能够阐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的显著矛盾。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当分秒必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广大民众是放任自流呢，还是迅速行动起来，努力将业已爆发的群众运动引入一条能使它做出有价值的事情，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美好

和活力的轨道……

在经历了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灾难和罕见的普遍悲哀之后，在经历了那种劳工阶层不得不过的悲惨生活之后，人们一心只想着幸福、幸福、幸福，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现在陷入内战，那我们的悲惨状况将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我们剩下的唯一感觉就是，让这种状况彻底结束吧，让我们悲惨的生活中能有一点幸福吧！这一点在您的讲演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您的整个态度代表了一种**高标准**，而您讲演的听众想要听的只是能让他们高兴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一想到为某种他们认为是假想的标准哪怕再多做出一点牺牲都会令他们深恶痛绝。听众根本就没有理解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或许觉得您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如果有人像您一样大声呼喊：“德意志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热爱你！”今天还有谁能够理解？对于这些听众来说，这种词句在他们心里已经激不起一点涟漪，每个人想到的都只是自己，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1918年11月6日和7日于慕尼黑

韦伯刚从慕尼黑回来，那儿就爆发了革命。巴伐利亚宣布成为自由州（Freistaat），按照俄国的模式成立了由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组成的“人民政府”。柏林政府仍然希望能够控制这个运动。皇帝仍然相信自己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能够重新恢复国内秩序。帝国首相仍然相信，可以通过君主退位而阻止国家遭到全面颠覆。然而，现在一切又都太晚了。在皇帝退位的那天，“德意志共和国”（Die deutsche Republik）也在柏林宣告成立。同时共产主义者也宣布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成立了“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Die freie sozialistische Republik）。次日，德国接受了糟糕透顶的停战条件。很多人通过投身于令人心醉神迷的革命活动来压抑自己的绝望情绪。他们幻想自己走到了一个更加完美的社会秩序的门槛——似乎终于看到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通向和平、民族和解、共同一体和人类团结的天国。当然，其他的人，即那些旧制度的中坚人物则把民族遭受如此大规模的灾难归咎于革命。他们制造了一个“背后捅一刀”的神话，辱骂“民众不忠”，未能振作起来决一死战。

不管在哪里听到这种判断，韦伯都很生气；如果是他的教授同行站在受到保护和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这种话，那就尤其使他感到愤慨。不过他也同样强烈地反对革命以及寄托在革命之上的希望。目睹了慕尼黑发生的事件和年轻人撕掉从前线归来的军官们的肩章那一幕后，韦伯把这场革命称为“一场不配使用‘革命’这一光荣名字的血腥的狂欢节。”当他意识到这场革命势不可挡时，他同时也预言，在这一时刻发生的革命将削弱德国获得和平的机会，导致国家的财政崩溃，同时又不能使社会主义的建制长存。几十年来，他一直非常同情无产者为获得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甚至常常考虑

自己能否作为一名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去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每次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一个人只有真诚地准备接受无产者的生活方式，至少能够放弃那种建筑在他们的劳动基础上的文化生活，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基督徒”。而韦伯自患病以后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他作为学者的生活只能靠资产获得的年金来维持。此外，他这个人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尽管如此，假如换一个时间，他对彻底的经济改革——经济的“社会主义化”——的尝试将会有浓厚的兴趣。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这类试验都会进一步削弱国家的结构，加重民族的灾难。

一个产生于这次灾难性失败和耻辱的新秩序将很难扎下根来。诚然，即使一个人不赞同这一“信念”（社会主义的未来），但仍然可以欣赏它。虽然我自己对我们的这种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可是我并不赞同它。我担心，很多最虔诚的信众一旦认识到，信仰虽然足以撼山，可是却难以振兴业已财政崩溃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他们的失望——加上他们已经失去一切——将使他们难以承受，会造成他们心理的崩溃。如果我保持身体健康，能够工作，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信仰也能生活。

643

1918年11月

※ ※ ※

在那几周里，韦伯时刻都准备着为国家做任何事情，准备着对年轻人加以引导，可是并没有人追随他。他关于民族的伦理在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里不受欢迎，这其实并不奇怪，这些人希望看到他们所向往的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可是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倾向于传统观念的年轻人身上，这就只能作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症状来加以解释了，即战争导致了彻底的道德疲惫。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海德堡的一次学生集会上。一个朋友对此作了下面的描述：

韦伯直接明了、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当代人对局势所持的政治上的绝望态度，其目的恰恰是要根据自己的民族信念从这种绝望中得出当时并不为人所理解的结论。他说：“您知道，如果军队不再有抵抗能力，那么要顶住入侵的敌人会意味着什么？您知道1905年俄国革命所使用的方法。那时的口号是：‘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信心，放弃个人所有的希冀。’对于活着的人，等待他们的命运则是遭监禁或者面对临时军事法庭。当您决定，不作任何慷慨陈词，而是默默地让第一个胆敢踏上但泽土地的波兰官员吃一颗枪子儿的时候，当您决定走上一条必定得走的道路的时候，那个

时候，我将为您出力，那个时候，**就到我这里来吧！”**

644 说最后这句话时，他使劲挥动着手臂，仿佛想要将自己的同道拉到身边，可得到的只是冰冷和无人理解的沉默。沉默可以有另外的意义，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这里的沉默并没有其他意义。韦伯继续阐述当前存在的各种可能性，谈到了学生的荣誉，谈到德国——照特赖奇克的说法，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经历了第二次青春的国家——现在希望能有第三次青春到来。然后在演讲结束时他说：“不过，只要德国还一蹶不振，谁要仍然身着学生社团的制服佩戴，他就不是个好东西！”听众仍然继续沉默，然而在这一个问题上，不理解很快变成了愤怒。身着学生社团制服佩戴的学生们挑衅性地在韦伯的住宅前溜达。不久，他很客气地将自己的绶带送还了他所属的社团。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谈到过在明知必遭厄运的情况下抵抗敌人的意志了。

## 2

韦伯并没有听凭怨天尤人的绝望态度主宰自己，而是重新找寻新的方式提供帮助。不管在哪里，他只要碰到真诚的善意，都会感到欣喜。尤其令他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Mehrheitssozialisten）具有的谨慎的责任感和朴实的勤勉，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致力于控制住该党并不赞同的革命。应他们的邀请，韦伯一度参加了海德堡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相信自己的知识对委员会或许有用。他与劳工领袖相处融洽，真正的非理性似乎还没有在巴登州这块幸运的地方站住脚。所以他对德国人，对德国的信念总能补充新的养料。在他那里谈不上幻想破灭，因为他不抱什么幻想。因此，他坚定地支持自己周围的人们，而他们以前常常感到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悲观主义者，“压制”他的洞见。

关于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艰难，我改天再叙！而这之前多年的默默担忧甚至比这更为艰难！抬起头来！和平到来之后会有事情做的。那些能够以全副精力投入的人们是幸运的。我最多只能有一半的精力。

几周之后他写道：

鲁登道夫的倒台、军队的士气低落（长期以来想用无法兑现的承诺来激发“士



气”所造成的结果)、目光如此短浅、对事物的可能性如此缺乏眼力,加上皇帝有失尊严的举措和半吊子政府的漫不经心——凡此种种都令人感到痛苦。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将不得不承受我们的荣誉所遭受的损毁,在巨大的苦难到来之前,现在唯有对“革命”的迷狂是一种麻醉剂,帮助人们去承受荣誉的损毁。漫天的空话也同样可怕,模糊地希望和浅薄地玩弄跟以前一样遥不可及的“幸福未来”令人沮丧。令我欣慰的是工会这些普通的人以及很多士兵(例如在这里我加入的那个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士兵)朴素的现实主义。我得说,他们的事情干得非常漂亮,而且没有任何废话。像这样的民族的确是一个有组织纪律的民族,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一旦这种纪律松动,其他一切也都会动摇,连人们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也会发生动摇。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遏制疯狂的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一千人。他们会搞暴动,这一点无法改变。不过问题在于,得很快把这种暴动压下去,随后不要有过分的反应,而需采取现实的政策。我们必须抱有这样的希望,但却无法知道事情是否会如此发展。如果事情办砸了,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得听任美国人来整治。希望我们不必蒙受受敌人支配的耻辱。这一切几乎让人忘掉了我们在梅斯(Metz)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损失!谁曾想到过居然有这种可能!……

1918年11月18日



十一月底,韦伯去法兰克福待了几个星期,应《法兰克福报》编辑部之邀提供政治咨询。在那里他写了关于“新政体”的文章,为制定新宪法做准备。十二月二日,他目睹了一支并未被战胜的军队开进法兰克福的一幕,这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所有的房屋都装饰着花环,窗前和房顶上人头攒动。人们欢声雷动,迎接这些做出了超人业绩,忍受了非人痛苦的将士们。他们的穿戴仍然那么整洁!每一顶钢盔上都顶着一个小小的花环,每一根枪管上都插着一束花。歌剧院上空飘扬着一面红旗,军队指挥官及其随从在这里停止了行进。对面是先皇骑着骏马的铜像,象征着统一的帝国。一位身着军灰色制服的普普通通的人、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第一个向将军致敬。这一刻,前线和后方所发生的一切都交融在一起了。高级军官们嘴唇紧闭,目光凝滞,头发灰白的男人们留下了热泪。

国内局势每况愈下: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力图从社会党人手中夺走一场不流血革命的领导权,以社会主义共和国,即建立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民主共和国。慕尼黑的领导人、巴伐利亚总理K.艾斯纳(Eisner)发表了一些文件,向敌人提供材料以证明他“对战争负有负

疚感的谎言”。和平主义者希望通过这种“忏悔”来获得比较宽容的和平条件。十二月初，在柏林和慕尼黑发生了最初的流血暴乱。敌人的入侵迫在眉睫。

在那些日子里，韦伯从法兰克福来信说：

在这里大家都认为，柏林的内战不可避免，德国随后将会四分五裂，这就足以令人绝望了。不过，威尔逊很可能会再次强调指出，他不会给社会主义者提供食物，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和平。这一点今天已经宣布了。然而对于李卜克内西这一帮人来说，这完全无所谓。他们将进行劫掠，根本不会顾及后果，因为他们很快就会逃之夭夭。法兰克福是否会成为占领区尚不确定。市民中有些懦弱的无赖甚至希望如此，因为他们害怕社会主义！让他们见鬼去吧！

1918年11月22日

豪斯曼来信说，他已经提议让我出任驻维也纳的公使。可以肯定，这不会有任  
何结果。因为从和平主义的意义上讲，这些人也只是想要**受骗**而已。同时我们的对手极度傲慢，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他们来说，埃茨贝格尔还不够软弱！唉，竟有这样一个平庸的和平委员会！

1918年11月25日

目前的局势乱成一团，整个局势急转直下，正在酿成一场灾难。慕尼黑的人们完全发疯了，丧失了尊严。然而，对此我们却束手无策，在我看来，协约国的入侵基本上会发生。万事终有结束之日，我们将会重新崛起！**但愿糟粕终能被清除干净！**现政府绝不会用我，我也绝不会为其效力。哈塞（Haase）先生及其同道跟王公贵胄一样——与工会的人和艾伯特（Ebert）不同——只需要阿谀奉承、奴颜婢膝和毫无个性的人。空谈家、无理取闹的人得宠，仇恨当道。

1918年11月29日

现实中的一切都十分**可怕**，非常可耻。我们手头还有事情可做，真是值得庆幸，否则真得疯了。这样一种狂欢还得闹腾多长时间？我们的经济状况在急剧恶化。局势将会乱成一团，所有的储备消耗殆尽，我相信最终的结局将是暴动和被占领。然而，我们正在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骨气**，缺乏尊严。听到了邻桌的少尉们**那一番**交谈，那些陈词滥调和就事论事的态度真令人难以置信！

韦伯看透了这一切，不过他仍然感受到在人民——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中蕴藏

着无法摧毁的力量和素质。正如他相信自己一样，他相信这个民族，不管什么样的外在的命运，不管压力有多么沉重，都不可能摧毁这个民族的精神实质。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克鲁修斯（Friedrich Crusius）<sup>①</sup>请他谈谈自己对时局和未来的看法时，韦伯才能够在那样可怕的日子里，写出下面的文字：

如果说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因为我基本上确信，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吃尽可怕地遭受屈辱这种苦头。鲁登道夫疯狂地“赌博”，然后是对他的冒险做出反应的这次“革命”，已经瓦解了一切正常运转的权力，尤其是在柏林。政府没有一支真正效忠于自己的军队可以用来对付李卜克内西一帮人，因而有它不可避免的弱点。如果暴民政治继续下去——这无疑是可以预料的，甚或通过暴动——这肯定会发生——而（暂时）取得胜利，那么不管是否受到邀请，敌人都会来“救援”，都会占领这个国家。只要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难以公开说点什么。

与此同时，我试图在《法兰克福报》上阐述一些更多地涉及体制的问题。只要如此大量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仍然缠绕在我们心头（像现在这样，并将继续如此）——这涉及大众的基本生存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在心里真正去思索文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也包括重建那种完全平淡无奇的道德“准则”，我们曾经（从总体上说）拥有过这种道德“准则”，后来在战争中丧失了——这是我们在战争中最严重的损失。这将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教育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美国的俱乐部形式，不管俱乐部的目的是什么；在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中可以看到这种俱乐部的雏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因为独裁——我对此没有任何偏见——现在彻底失灵了，唯教会属例外。拒绝从神秘主义到“表现主义”的各种形式的精神麻醉剂，将“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真诚和培养羞耻感——面对展示内心崩溃的那种令人恶心的表现癖——的唯一方式，只有这能够带给人以“主心骨”。

目前，我们的“脸”是丢尽了；没有哪一个民族曾陷入过类似的窘境，不管是阿哥斯波塔米（Aigosptamos）战役和喀罗尼亚（Chaironiaia）战役后的雅典，还是1871年的法国都不曾如此。但是目前那种据此做出的廉价判断是卑鄙的、不公正和冷酷无情的——这种判断（当然）是由那场输掉的赌博的支持者们做出的。我们忍受了四年多的饥饿，尤其是四年多蛊惑煽动的樟脑和吗啡注射——其他没有哪一个民族非得忍受这样的经历不可。如同1648年和1807年一样，我们将再一次从头开始。这就是目前明摆着的事实真相。只是今天的生活节奏更快了，人们工作的速度更快，也更加积极主动。我们这一代还不行，可是下一代就已经可以看到重建开始了。

① 慕尼黑的古典语言学教授。

当然，诚实的自律要求我们承认：德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已经结束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统治地位——正如梯也尔（Thiers）就德国统一对俾斯麦说过的，“哦，是我们成就了此事”（ah, c'est nous qui l'avons faite）——已经成为事实。这是一件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我们却避免了更坏的一劫——**俄国的暴力统治**！这项荣誉将继续归属于我们。美国在世界的统治地位不可逆转，有如古罗马在布匿战争（Punischer Krieg）之后。希望这种统治地位继续不让俄国分享。对我来说，这是我们未来国际政策的目的，因为我们只是暂时避免了俄国的危险，而没有永绝后患。眼下法国人歇斯底里、令人恶心的仇恨当然是主要的危险。至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我就像奥伊伦施皮格尔（Eulenspiegel）爬坡一样<sup>①</sup>，是个**绝对的乐观主义者**，不过这只是从长远观点看。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民族所有的弱点，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看到她出色的勤奋、朴素、实事求是，以及创造——并非已经获得！——“日常生活之美”（而不是别的民族那种迷狂和做作的美）的能力。接下来的十年将仍然会是可怕的。至于那些不知羞耻的和平主义者的政治——社会受虐狂——我们的敌人会设法让其消失；这些和平主义者现在正纵情沉溺于“负疚感”之中，似乎战争中的**成功**就像上帝的判决一般，提供了某种内在的证明，似乎战神并没有站在“更强大的军队”一边（我们已经表明，并非**总是如此**）。我们必须让狂暴的阶级斗争自行消退，在即将到来的可怕的国内虚弱时期，我们需要操心的只是，这种阶级斗争不要从自身演绎出一种理论来，而是要坦白地承认自己具有的性质。总的说来，当前**诚实**是第一位的东西。

一百一十年前，我们就向世界展示了，我们——也**只有我们**——能够在外族统治下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民族。我们现在将再次做到**这一点**。然后，历史——它已经赐予了我们（也**只有我们**）第二次青春——将赐予我们第三次青春。我对此毫不怀疑，您也不会怀疑——不管发生什么事（quand même）！人们眼下在**公开场合**所说的，当然总适用于“情势变更”（rebus sic stantibus）原则，而不是永远（pour jamais）不变的，这一点应“时刻谨记”（Toujours y penser）。

致以衷心的问候并握手致意。

您的老友马克斯·韦伯

1918年11月24日

十二月底，斯巴达克团起义采取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形式，此时韦伯再次写信给克

<sup>①</sup> 奥伊伦施皮格尔也许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其故事见于作者佚名的《梯也尔·奥伊伦施皮格尔在布伦瑞克》。每当费力爬上山时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想想下山的时候该是多么轻松啊！”——译者注

鲁修斯：

我担心的是，我们无论如何都难免陷入内战和遭到入侵。但是不管这会有多么艰难，多么可怕，我们也必须得经历。因为我相信这样一个德国是坚不可摧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德国正蒙受耻辱这些最晦暗的日子里，如此强烈地感到做一个德国人是上苍的恩赐。虽然时运非常艰难，但您得有点忍耐精神。

1918年12月26日

# 3

通过自己十一月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的关于新政体的文章，韦伯加入了为重建德国政治而努力的人们的行列。他的几个基本思想如下：俾斯麦所建立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现在应当何去何从？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实行共和制？即便是现在，前者仍然要优于后者，因为君主立宪制“从技术上讲有最强的适应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最强的政体”。它不见得会阻止一种极端的社会民主化。不过近来发生的事件让人无法主张采取这样一种制度。“因此，我们不得不支持共和制。”当然，不仅是当前的政治局势，从长远的观点看也有重要原因要求实行共和制：培养资产阶级富有责任感和自我意识的新政治意识。几十年来，居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是当局保护下的安全感，害怕任何革新——简而言之，意志薄弱导致了国内政治的软弱无力。共和国将结束这种状况。中产阶级现在也要像工人阶级一样自立。有生以来这个阶级必须头一次意识到，“君权神授这把庇护着自己神圣的经济利益的保护伞已经收起来了”。

650

韦伯讨论了在共和制允许范围内的各种宪法形式。他不受既有宪法理论的限制，完全从历史现实和当今需要出发。德意志帝国是一个由很多部分组成的联邦国家。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应当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制？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经济也许会促进统一的国家的发展，但是在一个需要国外的信贷进行重建的贫穷国家，这种组织方式是不可能的。在共和制的土地上，也必须得有联邦制存在的空间。韦伯自己期望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解决办法，但认为这一时还无法实现。

现实要求联邦制国家，那么，这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在此之前存在着的大普鲁士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已经瓦解，尤其是帝国最高领导人与普鲁士首脑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接下来的问题是：除议会之外另需建立的机构是应当按之前的联邦参议院的方式，由来自各州的代表组成呢，还是应当成为一个联邦议院（Staatenhaus），也就是说，

成为一个由各州议会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韦伯原则上倾向于联邦议院，因为它是一个更加民主的机构；尽管如此，他仍然推荐了由各州派代表组成的机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州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中央政府，以此减少地方主义的权力追逐。

651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方式来说）是：对于共和政体的结构，我们应当追求的是纯议会制，还是全民投票？只要德国仍然由君主领导，韦伯就主张由议会选择国家领导。现在君主已经退位，这要求国家的最高领导——帝国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并由此而获得独立于议会的权威。他应当是行政首脑，在议会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直接诉诸人民。全民直接选举总统还意味着在选任部长时限制政党的影响，同时从广义上说也意味着限制在用人上搞恩惠政治。反对议会制的人对此会感到高兴，因为民主和议会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就在韦伯论宪法的文章发表时，新任内政部长普罗伊斯（Preuß）博士正着手起草一部帝国宪法。他邀请了包括韦伯在内的少数专家私下进行磋商。这是一项韦伯希望能够参与的工作：

我们昨天开了会。普罗伊斯把他的工作做得很漂亮，他确实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明天就应该结束了——从来没有哪一部“宪法”这么快就拟定了。局面之所以如此幽灵般的飘忽不定，是因为这一切也许都会成为一堆废纸，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为历史车轮的前行不会顾忌任何人和任何事——除非现在艾伯特的独裁出现，这是有可能的。

现在这部帝国宪法原则上已经准备就绪了，跟我的建议很接近。我与非常聪明的人在一起紧张工作了一整天。这是一项令人愉快的工作，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四晚上才结束。今天我第一次踏踏实实睡足了一觉。

1918年12月13日

韦伯在很多点上都同意这次会议负责人的看法，但并不赞同他的基本观点，即拆散普鲁士，让其变成若干单个的自由州，以减轻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压力。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确信，这个计划不可行，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力量反对，而且也有国家管理和经济方面的技术原因。他也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他只是预见到了，历史现实暂时还要求联邦制。因此应当在一个联邦宪法中尽量融入中央集权制的内容，而不是相反——像普罗伊斯主张的那样。

652 后者的观点在草案中占了上风，不过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就已经大大缩水，而后在国民议会上没有获得多数支持。帝国的联邦特征保留下来了，不过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各

州被置于联邦的控制之下。在有一点上，韦伯的工作在宪法中留下了可以追溯的印迹。在普罗伊斯的宪法草案中，韦伯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引入少数派亦同样享受的宪法赋予的质询权。如前述，韦伯早在革命前的政治论文中就提出过这个要求，并拟定了具体的立法提案。<sup>①</sup>制宪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议会内部这个新的监督机制不仅可以防止议会的腐败，而且可以使只是被迫扮演反对派角色的少数派发挥积极的作用，并通过这两项功能而成为相互冲突的议会各派力量之间的平衡手段，亦即成为议会制的一般调节原则，“使议会的形式理智化”，“使其从多数派的专制下解放出来”<sup>②</sup>。这一具有创意的条款（《德意志宪法》第51条）也被各“州”采纳，后来还被写进了但泽和拉脱维亚的宪法。

韦伯要求修改的另一项条款关涉议会的控制：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其权威地位在草案中得到阐述并被写进了宪法。尽管如此，第一次选举仍由国民议会进行，此时韦伯在柏林的一家报纸上再次强烈呼吁第二次选举应为普选，“就像那些最高贵也最明智的君主为了议会机构而适时地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一样，议会也应当自觉承认民主的《大宪章》——全民直接选举领导人的权力。”



韦伯现在是否将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发挥作用呢？很多人期盼如此，一时间这也似乎要成为现实。主要是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倡导下，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于十一月中旬成立。种种事件掀起的巨浪将大部分以前“民族自由党”中的资产阶级和“进步党”聚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个顺应时代的新党派。这个组织试图成为一条连接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纽带，就像瑙曼的民族社会党以前所做的那样。很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个党，他们恰如社会主义的工人一样，坚定地支持真正的民主，但与工人不同的是，他们拒绝经济体制的试验，把民族理念凌驾于国际理念之上。

653

韦伯并没有签署建党宣言。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支持保持君主立宪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摇身一变成为共和主义者。现在时代呼唤着人们支持共和制原则的决定。就像他对德国革命的态度一样，起初他对此缺乏激情。但是他看不到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拯救德国，于是毅然决定站在这个新党一边。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和一月份，他在威斯巴登（Wiesbaden）、哈瑙（Hanau）、海德堡、法兰克福、卡尔斯鲁厄和菲尔特（Fürth）为该党作了重要的政治讲演。现在他对左派的抨击比以前要更加激烈，因为在他看来，社

① 参见本书第598页（指德文原著页码，即本译著边码。——译者注）。

② W. Lewand, “Enquesterecht und Aufsichtsrecht im Archiv des öffentl.” *Rechts.* Heft 3, 315ff.

会民主党多数派面对共产党人表现出的优柔寡断，由此而产生的斯巴达克团专政的危险，发生在柏林和慕尼黑的血腥暴动，尤其是柏林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可怕的管理不善，这一切都不啻为严重的民族灾难。再加上“对国内企业家愚蠢的仇视，由此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让外国资本在百废待兴的德国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韦伯的讲演材料丰富，结构严谨且充满激情，尽管他摒弃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而且对政敌始终持公正态度，但他的讲演总是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因此，他能够赞赏鲁登道夫的军事天才，以及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理想主义：

654

民众专制以我并不愿看到的方式结束了。李卜克内西无疑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号召民众起来进行斗争，而自己却在民众手中丧生。工人—士兵委员会也同样是诚实的。资产阶级不能忘记他们诚实和正直的劳动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可是他们在柏林的总部在政治上却一无是处，其外行的管理方式糟糕透顶，完全毁掉了军队的纪律性。

全盘社会主义化目前行不通。我们的状况不允许排除私有企业家。信贷只会提供给有头脑的人。如果一个政府背后没有享有同等权利的、独立的资产阶级和企业家，这个政府是无法获得信贷的。

如果经济像这样继续崩溃下去，我们真的会处于外国的统治之下，我们的商人在自己的工厂里就将变成美国人的雇员而已。如果和平以我们不得不担心的方式出现——不合时宜地爆发的革命对此也得负责——那么，在德国将会出现持续好几年的空前的沙文主义。如果外国统治到来，那我们将经历民族情感醍醐灌顶般的觉醒。

韦伯仍然富有魅力，他青春的活力似乎复苏了。他在菲尔特的集会讲演结束时，共产主义者提着椅子腿逼向他，然而却被他的镇定自若降伏了；之后他收到集会组织者的来信，其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在那些认识到学术现今也必须为政治服务，并由此而为德国的事业服务的学者中，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在这里如此公开、明晰和无畏地剖析我们的局势，并作为人民的领袖高擎着知识的火炬……”

在菲尔特的集会结束后，韦伯又登上了海德堡的讲台。他面色苍白，但思维仍然敏捷。讲演结束时，听众中一位因德国的耻辱和四分五裂而抬不起头来的老人站起身来，感谢韦伯让他重新树立了对祖国的信心。

※ ※ ※

12月1日，韦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为民主党作了一次讲演。讲演结束后，在



场的民主党党员自发地要求将韦伯的名字放在黑森-拿骚（Hessen-Nassau）选区候选人名单的第一位。在法兰克福地区党组织于12月19日召开的内部党员大会上，参加者置执行委员会的提议于不顾，除两票外再次一致同意将韦伯放在候选人名单的第一位。党的口号正是：“谁具有坚强和杰出的人格，谁就应进入国民议会。” 655

在这种情况下，韦伯便同意成为候选人。他自己是不会主动进入实际政治领域的，因为他不敢肯定，自己的神经能否承受得了从政的要求，当自己情绪激动时能否在行动中保持头脑冷静。他也知道，要融入与自己知识水平有差距的团体中会有困难。他绝对没有打算在一个党团内部按照通常的程序做出努力，“逐级往上走”，然后获取一个席位：这太不适宜。不过他现在不费任何周折便被选为政治领导，从中他感受到了在自己内心深处期待着的“召唤”。

法兰克福的党员为自己不拘一格的行动感到自豪，报纸也称赞他们选择领导的方式堪称楷模。通过这种方式，韦伯作为法兰克福的候选人就公开定下来了，这样别的选区也就不会再把他定为候选人。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韦伯没有再去关心此事，因为为这种事情忙碌太不符合他的本性。可是在圣诞节后，就在上交候选人的名单的前几天，人们在海德堡纯属偶然地得知，在十九选区召开的韦茨拉（Wetzlar）会议在背后强奸了选民意志。法兰克福一个当地要人现在名列候选人名单之首，韦伯的名字远远地排在后面。人们非常愤怒，尤其是海德堡民主党的同志，因为在这整个时间里要是法兰克福没有把韦伯据为己有，人们也许可以将他放在巴登州的候选人名单上。

1919年1月2日，韦伯在海德堡作了一个关于德国重建问题的讲演。他走上讲台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以有力的手势让掌声停了下来。他再次指出了威廉二世时代直至最近德国犯下的种种错误，他以生动而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自己丰富的思想：“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必须被进行到底，因为荣誉要求我们这样做。将来有一天历史会称赞德国，因为她把世界从沙皇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讲演结束时，集会的听众强烈要求敦促巴登州民主党领导，在这最后一刻将韦伯放在该党巴登州候选人名单的第一位。他们派了代表去卡尔斯鲁厄交涉此事，可是已经太晚了。名单已经敲定，名单上的人都不愿为韦伯让位。海德堡的党员请求得到他的同意，撇开党内的委员会而采取行动。但是韦伯拒绝了这一动议，这种违反纪律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656

韦伯对整个事件处之泰然。他了解政党的运作机制和人们对席位的渴求，也承认职业政治家有权占有这些席位。只是当一位好心的党内同仁——他在一个胜算颇大的选区里竞选——告诉他，自己打算试一试，在最后一刻将韦伯放在全国候选人名单上时，韦伯才大发雷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愤怒地拒绝被人怂恿着，在别人的保护下去追逐议席。这位党内同仁觉得只是尽了自己的义务，对于因此而道德上受到谴责感到

极为震惊。1919年1月5日，韦伯在《法兰克福报》发表声明：

从原则出发，我对于继续公开讨论我未被列入黑森-拿骚州候选人名单一事感到颇为不快。因为我不是职业政治家，这件事对我也并不重要。希望在国民议会中有能胜任的人参加起草一部切实有用的宪法。至于您的暗示——别的选区本来是可以提名由我做候选人的——我要说的是，我之所以接受法兰克福的提名，**仅仅是**因为其民主程序严格；我当然鄙视向党内权贵**做出任何让步**——顺便提一下，看得出来，他们的权力通过本应该是非常民主的比例代表制而得以增强，这就导致了讨价还价。

这就决定了韦伯拒绝充当政治领袖，拒绝在实际政治中大展身手。这是第二次韦伯的政治天赋未能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得到发挥，不过这一次并非由于他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运作的奴性，由于资质平庸者的虚荣而搁浅。在人人都在呼唤着领袖的时刻，  
657 这个民族却没有给他用武之地。

## 4

现在韦伯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选择。夏天他已经拒绝了哥廷根的延聘意图。在柏林有人敦促他去那里接受一所商学院的教席，这同时也意味着他有机会间接地发挥政治影响。法兰克福的朋友希望请他出任公共福利研究所所长，同时在大学担任讲师并担任报纸的编辑，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也在跟他商谈聘任事宜。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激情喷发的日子，韦伯感到在精神上比半年前在维也纳时要更加稳定。在目前这个必须在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时刻，他觉得仅仅使用自己的笔头是不够的。他需要以某种形式直接对人产生影响，需要有一片可以从中汲取力量的新的土地。

普鲁士高教部部长，以前海德堡的同事贝克（Becker）给韦伯提供的聘任条件尤其慷慨。他高薪聘请韦伯去波恩，特地为他设立了一个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席，每周只上两个小时的课。不管怎么说，这个职位照顾了他的精力，有利于促进他的学术研究。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韦伯就同慕尼黑的两位朋友和同事在商讨去慕尼黑的事情，这两位朋友就是勃伦塔诺和洛茨。勃伦塔诺那个著名的教席新近空了出来。早就熟悉的美丽城市和那里的挚友吸引着他。可是韦伯不愿再教政治经济学和金融，他的学术兴趣已经转移。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但一俟校方和政府同意他主要教授社会学课程，抉择的天

平就向着慕尼黑倾斜了。夏季学期，韦伯打算只上一个小时的讲座课，另加讨论课，正常的教学工作自冬季学期始。因为在和平缔结之前，政治是不会让他完全脱身的。

一月份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文章<sup>①</sup>，并在其论述中为国际联盟未来的战争行为条例提出了建议。在这篇文章中，韦伯驳斥了德国和平主义者的“忏悔”，将其视为某些人完全丧失尊严的行为，这些人无法面对现实，因此为自己设想了一个世界秩序，在这里失败必然是负罪的结果。然而，战争的结局并非上帝的裁决。获得战争的胜利根本就不能说明是非对错，历史上无数尸横遍野的战场表明了这一点。自然，德国确实犯了错误，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蒂尔皮茨推行的战舰政策——德国建造舰队的规模必定会让英国感受到威胁。可是关键的责任应当由沙俄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来承担，这种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会企望战争，为达其政治目标也必须要企望战争。 658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已经告别官场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同韦伯建立了联系，两人默契相通，彼此很有感情上的共鸣。假如在另一个时间，如果他们各在其位，那他们的合作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现在不在其位，他们能有所成就的机会已经烟消云散了。一切都取决于，能否从协约国那里争取到可以忍受的和平。巴登亲王和他的属下与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如豪斯（House）上校、特雷夫格利安（Trevyglian）、莫雷尔（Morel）等人保持着联系，想通过他们的帮助努力摆脱对战争罪责的教条进行的讨论，争取让英国就具体事宜进行谈判。不过大家也知道，海外传来的消息也证实，除非德国人民自己振作精神，有一个自身统一齐心的政府加强控制，否则这些努力就不会奏效。首先必须做的就是重建一支军队。

今天又有一个英国人来我这里。我对他说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么像绅士那样交谈，要么像“老处女”一样对话。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谈话的内容就必须是关于“罪责”和类似的问题，这对双方来说都不光彩。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就会说：“在这场较量中我们输了，您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应当如何行动来面对历史的责任。”鉴于这样的对待方式——唯一配得上英国和德国的对待方式——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理解英国的政治家。如果他们的观点没有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一切就毫无希望，因为我们可以忘记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如果我们的荣誉受到伤害，那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不会同一个“教条死板的人”坐到一张谈判桌前。此外我还告诉他，只要德国政府对军火储备没有绝对控制权，我认为它就没有能力进行谈判。如果协约国提出这项条件，我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然而目前正在讨论的其他的条件（限制武装力量等等），则是带有侮辱性地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而且 659

① 参见 *Gesa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S. 381。

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些条件毫无用处，并不带来**实际**利益。

1919年2月19日致昂肯

在巴登亲王的倡导下，海德堡公正政策协会（Heidelberger Vereinigung für eine Politik des Rechts）二月初在韦伯家里成立了。该协会的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布伦塔诺教授、阿尔弗雷德·韦伯教授、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A. Mendelssohn-Bartholdy）教授、托马（R. Thoma）教授，还包括退休将军马克西米利安·冯·蒙舍拉（Maximilian von Montgelas）伯爵、科林·罗斯（Colin Roß）上尉、霍尔齐（Holzing）将军，几乎都是在整个战争中一直反对领土吞并政策，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而努力的爱国者。蒙舍拉伯爵因为反对入侵比利时而被免除部队的职务。这批人决心继续有组织、有系统地反对国外关于罪责的教条，驳斥敌人制造的关于德国“暴行的宣传鼓动”，讨论重建军队的各种可能性。科林·罗斯认为，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支招募来的雇佣军；冯·霍尔齐则希望能够效仿瑞士的方式迅速建立民兵制。

协会首先公开要求委任一个中立的国际委员会以调查战争发生的原因，同时呼吁人民帮助政府为建立一支新的国防军奠定基础。英国对于德国政府相关提议的回答表明了它对此所持的否定态度：“因为德国政府应对战争爆发负责，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韦伯根据巴登亲王的提议，要求德国外交部开放德国的档案，安排相关人员在<sup>660</sup>一个听证机构作证，这个机构的组成应当能让每一个不抱偏见的观察者，尤其是后代放心，真相会被查明。

外交部正希望有人公开提出这样的要求，随即便先责成考茨基（K. Kautsky），后来是蒙舍拉伯爵和许京（W. Schücking）发表所有的官方文件。后来议会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被协约国指控的政治家和军事首领举行听证；韦伯认为这个委员会犯了一个大错，因为犹太人出身的政治家占了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一，而这是一个像兴登堡、鲁登道夫、贝特曼-霍尔韦格等人必须出席作证的委员会。

韦伯鄙视反犹主义，可是他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实际情况：那个时期革命领袖中有如此多的犹太人。如果他被问及现在是否反犹，他会愤怒地断然拒绝这种可能性。他认为，从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处境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骨子里具有这种革命性。然而，依照目前流行的看法，允许犹太人担任领袖，并以领袖的身份出现，从政治上讲是不明智的。他从现实政治的观点出发考虑问题，看到了一种危险，即本身是值得希冀的政治才华会因此而在公众心目中丧失信誉。在犹太人问题的这些方面，他跟自己的犹太朋友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与这些犹太朋友一向坦诚相见，从未有过二心。



根据巴登亲王的提议，韦伯受到邀请，参加由伯恩斯托尔夫（Bernstorff）伯爵负责的“和谈委员会”会议，并陪同代表团去凡尔赛（Versailles）。这次会议和代表团中有不少人死乞白赖地硬要政府让自己承担这一令人兴奋的使命，一想到自己将与这些人为伍，韦伯便感到极为尴尬。对任何一位德国的爱国者来说，凡尔赛之行都将是最为艰巨的使命。新共和国时代的人们怎么居然也像以前的君主主义者对待宫廷活动那样，以同样急切的心情对这件国事趋之若鹜，好像这是一个什么轰动事件一样！当然，他并不想避开这个提供帮助的机会。带着这样的复杂心情，他给伯恩斯托尔夫伯爵写了下面这段话：

661

鉴于凡事都得参与这样一种爱好虚荣和喜凑热闹的普遍倾向——这是我们所谓的革命赠送给我们的礼物——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遇事总要问问自己，是否真的有某种客观需要让自己去参与。对此我不能做出判断，除非给我具体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或者学术工作做，而且有可能这些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做得跟我一样好，或比我做得更好。听说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有意推荐我参加巴黎谈判，在此我想要强调指出，照我看来，目前在凡尔赛的人就已经太多了，所幸其中包括不少非常优秀的专家，诸如瓦尔堡（Warburg）先生、梅尔希奥（Melchior）先生和其他很多人，他们的专业知识非我所能企及。虽然我对于某些事情在政治上（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应当说什么、何时说和怎么说的问题有过，现在仍然有自己的看法——虽说这些看法谈不上独到见解——可是等到谈判开始时，这些问题就应该已经解决了。单是这个原因就可以说明，没有理由让我随团去巴黎，更何况这些正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们要处理的事情。

最终人们还是让他放弃了自己的保留态度，或许这次还真有他一直企望的为国效力的机会也未可知。在柏林他的担忧得到了最初的证实：那些不应受此重任的人的聚首商议毫无用处。

昨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得漫无目的，毫无结果：关于事态的那些冗长的“报告”大多没有什么新东西，也几乎没有讨论。在两个问题上我参加了意见，不过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效用”，很难说是不是在对牛弹琴。这样的会议百无一用。我觉得自己完全多余，而且尖锐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星期三第二次——最后一次！——会议，听余下的报告。没有任何人能够向我解释，我们到

底为什么到这儿来。所以我明天要去找主持会议的伯恩斯托尔夫伯爵，让他给解释一下。我在这里待到星期三，如果没有得到很有说服力的回答，我就会离开，不会随团去巴黎了。我在这里纯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1919年3月30日

今天我跟会议主席伯恩斯托尔夫伯爵谈过了。我们在此的**目的是**：一旦得知谈判的条件，我们便对于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些条件做出鉴定。为此我们大约需要在凡尔赛待两至三周。**这件事**我可以参与，然后我的任务也就完成，可以返还了；我不会参加“最后的谈判”，因为那不是我做的事情。不过协约国有可能干脆说：“参加人数不得超过20人”，如果是这样，我根本就不去那里。选取“鉴定者”的方式（纯属党派政治！）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必将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例如，斯蒂内斯（Stinnes）应属当然的人选，却被拒之门外。起初说我们有12人，后来又增加到17人。实属荒唐！正如我说过的，我觉得人数会缩减。

1919年4月2日

由于政界朋友的敦促，韦伯最终还是决定随和谈代表团去凡尔赛。此行仍取道柏林。同时消息传来，协约国确实将引渡军事统帅、政治家和皇帝作为和谈条件。韦伯愤怒至极。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个险恶的企图，也就是要摧毁一个伟大民族的荣誉。在那几周里，韦伯有一次曾提到向往南方碧绿的大海，可以走进那海里——越走越远——一去不还。“但我不能对玛丽安妮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就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极度的羞辱了吗？办法是有的，假如他处在那些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立即跨过莱茵河，主动将自己交到美国当局手中，要求在国际法庭上举行听证。这样一种具有道德自信的行为也许能让这个民族免受闻所未闻的非分要求之辱，能够在道德上给世界留下良好印象，此外还可以在國內重建对战争结局负有责任的那些人的声誉。

德国崩溃之后，对鲁登道夫的指控紧接着就开始了，那时韦伯就计划写一篇文章为他辩护。如前所述，韦伯一月份在海德堡作的政治讲演中就称赞了鲁登道夫。一个伟大的军事将领的道德只能以适合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将军必须要有信心，必须敢于冒险。如果他失败了，我们不当以成败来论他。伟大英雄人物的尊严不应受到侵害。

不过，后来当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军队统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在对待波兰人和土耳其人<sup>①</sup>的政策上负有责任时，韦伯则感到非常气愤：这种越权行为将损毁一个军队统帅的

① 1950年版将土耳其人改为捷克人。此处照1926年版原文译出。——译者注

道德价值。他的法则是对自己加以限制。将军必须听命于负有职权的政治家，不允许从政，对此他们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在危机时刻利用军队的不可或缺性而在政治领域进行敲诈勒索。韦伯现在放弃了为鲁登道夫辩护的打算。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后者人格的尊严和伟大。他确实想要相信这一点。

现在出现的局面给这位将军提供了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伟大的机会。他可以主动自首而先发制人，以对付协约国的无耻要求（这种要求给德国带来了无法解决的新麻烦），由此他可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同时挽救民族的荣誉，给敌人制造最大的麻烦。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具有骑士风度的英雄行为将增强民族自信，提高德国在世界上的道德声誉。

带着这种想法，韦伯在即将启程赴凡尔赛之前给鲁登道夫写了封信。在给妹妹匆匆写下的短信里他谈到了此事：

我马上就要启程赴凡尔赛——受到急切的催促，原因尚不得而知。我对自己和要办的事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去做吧。之前我给鲁登道夫写了封信，向他提出了忠告。鉴于敌人的引渡要求，他和蒂尔皮茨、卡佩勒（Capelle）、贝特曼等人必须知道，自己一定得立即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只有自愿将自己的“头颅交给”敌人，军官团才能光荣地浴火重生。他们将如何行动，我们拭目以待！

※ ※ ※

当韦伯从凡尔赛取道柏林回来时，他还没有收到将军那封持否定态度的简短回复。因此，他感到迫切要去面见这位将军，向他口头阐释自己的观点。通过几位德国国民议会议员的斡旋，他同将军作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二人心中都同样充满着英勇的爱国主义激情，可是相互理解却不容易。韦伯就军队高级将领所犯的政治错误批评了鲁登道夫，后者则指责韦伯应当对革命和新政权犯下的罪行负责。最终在重建德意志这一点上共同表示了自己强烈的意志，当然对于重建方式他们的意见相去甚远。这次谈话长久萦绕在韦伯的脑际，他常常双手比划着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次谈话。当他独自待在自己书房的时候，那几周时间里心底深处的政治激情有时会以高声的对话形式表达出来。他与对手论辩，让对手反诘。韦伯跟朋友描述过与这位军队统帅的谈话，其中一部分后来被朋友们保留了下来。

**鲁登道夫：**（从韦伯的信中他知道韦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您为什么带着这种东西来找我？您怎么能指望我做那样的事情？

**韦伯：**只有您主动自首，民族的荣誉才能得到拯救。

鲁登道夫：别拿这个民族来烦我吧！竟如此这般地忘恩负义！

韦伯：尽管如此，您必须为我们再做最后一次贡献。

鲁登道夫：我希望为这个民族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韦伯：如此看来，您的话也许并没有多少诚意。此外，这不仅关系到德国人民，而且关系到能否重建军官团和军队的荣誉。

鲁登道夫：为什么您不去找兴登堡？毕竟他才是德国陆军元帅，不是吗？

韦伯：兴登堡已是七十岁高龄——而且连孩子都知道，那时您是德国的头号人物。

鲁登道夫：谢天谢地！

谈话很快转向了政治问题，转向了溃败的原因以及军队的最高统帅部对政治的干预。

665

鲁登道夫：（被逼入了困境，欲转移话题。）现在您得到了自己赞赏的民主！您和《法兰克福报》对此要负责！现在到底有何改进之处？

韦伯：您相信我会把目前这种乱七八糟的混乱局面视为民主吗？

鲁登道夫：如果您这样说，也许我们倒是可以相互理解了。

韦伯：不过，这之前那种乱七八糟的混乱局面也并非君主制。

鲁登道夫：那么什么是您所理解的民主呢？

韦伯：在民主制度中，由人民选择自己信任的人做领袖。然后当选的人会说：“现在闭上你们的嘴，听我的指挥。人民和政党均不得对领袖的工作随便干涉。”

鲁登道夫：这种“民主”倒是颇合我意。

韦伯：之后人民可以做出评判——如果领袖犯了错误，他就要受到惩罚！

两人的交谈起初很有些情绪化，最后则平声静气、颇为友好，尽管双方仍然各执一词。不过韦伯却深感失望。个中缘由与其说是这位将军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他并非贪生怕死——不如说是出于他人格上的原因。韦伯得出的结论是：

也许他不该去自首对德国更好一些。他这个人将会给人留下不良印象。敌人将会再次发现，若能让他这一类人靠边站，则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整个世界都要反对象他这样的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如果他再要涉足政治，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由德国外长布洛克多夫-兰晁（Brockdorff-Rantzau）率领的和谈代表团最后由80人组成，其中包括重要的政治家、对政治感兴趣的学者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如拉特瑙、瓦尔堡、德尔布吕克、蒙舍拉伯爵、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教授——堪称德国在思想和实践领域里知识分子的精华。他们似乎受到了保护性拘留，给他们指定下榻的旅馆位于凡尔赛公园边上，用栅栏与外界隔开。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Der Oberste Rat）进行面对面的口头讨论磋商的希望未能实现。在递交和谈文件时，他们被告知，只允许作期限很短的书面谈判。条约内容的可怕程度超过了他们所做的最坏打算。战胜国从对战败国的战争罪行起诉中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有权把无法接受的条件强加在一个解除了武装的国家身上，以达到其进一步摧毁这个国家的目的。此外，德国人还应当签署一份附在条约中的认罪书。惊骇的呼叫促成了德国人民团结一心。政府和各政党，包括极左派，都宣布这些条件无法接受。开展全民战争的想法开始萌生。不过人们仍然希望，这种共同的压力会让敌人的条件变得不那么苛刻。

666

德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又一份的照会，并且提出了反建议。最高委员会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委员会关于“战争挑动者的责任”这个报告基础之上的。他们拒绝公布这份报告的内容，但法国新闻界透露了其中的关键部分。于是德尔布吕克教授、蒙舍拉伯爵、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教授和韦伯受托做出回应。韦伯写道：

经过一天两夜的奔波，我于周五早上赶到这里。乘车穿过巴黎，沿着林荫大道，经过凯旋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和圣克鲁德公园（St. Cloud），到达了那个围着栅栏的地方。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在公园里散步，可是房间不舒适、很局促，写东西尤其不便。德尔布吕克明天到，蒙舍拉伯爵后天抵达，然后要校订关于“罪责”的照会，就是为此才把我召到这里来的。之前我已经就“东线一照会”提出了若干建议，希望能够被采纳。如果德方打算接受和允许自己的尊严受到损毁，那我无论如何不会染指这项关于罪责问题的照会。前天我和西蒙斯（Simons）在布洛克多夫处用餐，布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倒是很想知道，他是否也很**坚定**。这里的工作非常**琐碎**，编辑能力不足。人们的情绪**相当低落**。你越是仔细地读那些**经济**条款，就越是会发现这些条款非常可怕，十分诡诈，即便只接受条款的一半，我们实际上也就像在把目光投入一个黑洞，极目远望，却看不到一丝亮光。很难说我们能争取到**什么样的**结果。假如我们在领土问题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问题上不能取得任何进展，政府和代表团都决心**拒绝**和约。

667

1919年5月中旬于凡尔赛

5月28日，德方递交了《战争罪责问题调查》的备忘录。备忘录正文分为六个部分，另附有十一份加注的附录作为证据。这份长达150页的文件是作为德国的白皮书（关于战争挑动者的责任问题）正式发表的。该文件各种实事求是的阐述旨在逐条逐项反驳敌方的断言，没有任何隐瞒掩饰。白皮书对奥地利的行为颇有微词。文中指出奥地利所犯的严重错误包括对塞尔维亚提出了为时甚短的最后通牒，拒绝让英国居间调停和拒绝与彼得堡交换意见。然而，主要的责任应归咎于沙俄的帝国主义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泛斯拉夫主义，毁灭奥匈帝国，在巴尔干进行扩张，以及占领土耳其海峡。“德国人民于1914年同仇敌忾、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战争，正是因为他们将此视为一场反对沙俄政府的自卫战。”

德方的阐述和证据完全没有改变敌人的态度。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回复再次以带有戏剧性的令人感伤的笔触把这场战争称为是“有史以来一个自称为文明民族的国家蓄意……对人类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德国提出的反建议遭到了拒绝。敌方勒令德国支付最大限度的战争赔款，解散德国军队，交出战犯，拒德国于国际联盟之外等等。不过，敌方也做出了一点让步。最主要的是协约国允许将来可以对和约进行修改。

距离签署条约的日期已经近在眼前。敌人正屯兵德国西部边境，渴望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在德国土地上进军。怎么办呢？韦伯写道：

唉，在凡尔赛的日子真可怕！没有任何人來找我（正式地找我）咨询任何事情，最后他们却向我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现在由您来写这份草案的前言。”我有意以自己知道他们不会同意的方式写就了这篇前言。因为如果我不知道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理要求（一千亿的赔款！解散军队！）是如何产生的，并且只给我们三小时的时限作答，那我还能做什么？如果布洛克多夫伯爵不能告诉我，一旦我们的草案遭拒，内阁到底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案，内阁的态度是否会继续保持坚定不移，那么，我又怎么能回答他提出的“怎么办”这个问题呢？

虽然一度看起来大家都一致持勇敢的态度，但当敌人坚持要求德方无条件接受协约国条款时，德国人自己内部便出现了分歧。右翼政党和民主党人投票要求无条件拒绝这个条约——这不仅是出于英雄主义，而且是因为他们预见到，德国无法履行这个条约，而这将会给法国以借口，对德国采取难以预料的报复措施。然而，除了“无党派人士”之外，埃茨贝格尔和他那个党的部分成员也宣布接受和约。他们赢得了社会民主党人多数派的支持，后者担心倘不如此，恐会出现新的布尔什维克骚乱。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决定签署和约，以“拯救尚能拯救的东西”。至于他们做得对不对，历史将会做出判断。韦伯属于拒绝接受和约的阵营。

韦伯认为，人民和政府应当让敌人长驱直入，不做任何抵抗，将帝国交给他们来管理。很可能他们很快就会确信，此举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因而愿意重开谈判。不过，韦伯也能够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反的看法。

我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感到一筹莫展。就我个人来说，不管会冒多大的危险，我都主张**拒绝**和约。不过，我估计随之而来的将是公民投票，其结果是接受和约；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因为这样一来，在国内我们自己的手脚就会被牢牢**拴住**。这整个事情真能让人因愤怒和绝望而被气得病倒。

1919年6月20日

这件事现在发生了。唉，真是可怕！刁难现在真的要开始了，因为和约提出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于是我们将遭受一长串的羞辱和折磨——这方面法国人是能手。669 即便是一个完全公开和确实残暴的外国统治，以及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目标，也要比这好上千百倍！当然，独立社会民主党（USP）的**这种**卑鄙伎俩给一切都打了问号，我理解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让我们等等看东线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只是到了现在，我们的身心才真正体会到最近几个月意味着什么，体会到人们私下里是多么渴望某种“奇迹”发生——或者说期望我们的荣誉得到拯救，就像德国勇敢的水兵们在斯卡帕湾（Skapa Flow）<sup>①</sup>的行动那样。要是鲁登道夫当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一个别人将会效法的决定——那该有多好啊！这样他就能够让我们**免遭**“引渡义务”这种极度羞辱，或者至少可以先发制人。现在这样做为时已晚。他宣称愿意在一个“不带偏见的”特别法庭里出庭。这有何用？于事无补。668

1919年6月26日

我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和平实际只是悲惨境遇的**开端**。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满足和平协议的要求，法国人现在将要开始找我们的麻烦，开始羞辱我们，将莱茵地区（Rheinland）分割出去，如此等等。我担心我们将陷于“无穷无尽的恐怖”之中，并且最终还是将遭受部分领土被占领和帝国被肢解的命运。不错，这并不是说**必然**会发生，让我们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在这里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我们拒绝签约，有可能很快会导致巴伐利亚分裂出去，导致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神职人员的“革命”。我可以理解与此相反的意见。除此之外，我现在对于局势看得还不很

① 1919年6月21日，德意志帝国海军官兵为了防止舰船落入敌手，将停泊在斯卡帕湾的52艘军舰凿沉，是为世界海战史上有名的大规模自沉舰船行动，亦称“彩虹行动”。——译者注

清楚。和谈代表团**以及**所有的专家一致**反对**接受合约，这种态度的根据毫无疑问是他们从巴黎和其他地方获得的印象。不过和约已经签署了，现在我们必须做的是推行积极的政策。因此，不采取任何行动（像国民议会里的民主党人士一样）从根本上讲当然是错误的，不过这种情况肯定只是暂时现象。唯一的希望之光是斯卡帕湾，希望鲁登道夫和其他一些人现在（当然，这已经为时过晚！）还能够找到某种方式，让我们以体面的方式避免将他们引渡给敌方。至于皇帝，他倒是安全无恙——为此付出代价的是他的王朝。

1919年6月28日

你说我没有写下关于这次和平的任何文字。唉，我真是**疲惫**不堪，“麻木不仁”，因此我能够**理解**这个民族筋疲力尽的状态。当然，“拒绝”不可能是**不接受**，而恰恰意味着政府的解体和将主权移交给国际联盟——意味着这种或类似的使战争手段成为不可能的行动。假如拒绝签字，至少**这一点**是可能会发生的。当然，如果我仔细考虑一下在巴伐利亚这个地方人们的情绪，我自然也会问问自己，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任何可能会带来好结果，例如唤醒民族心中的抵抗意识。……我想，现在我将完全不涉足政治，至少眼下会如此。

1919年7月1日

**可悲**的是，皇帝**从来**没有做出过正确的决策。兴登堡的信也整整迟了两个月。一旦协约国提出引渡要求，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立即**亲自过去自首。可是他们对这类事情根本就浑然不知！

1919年7月9日

## 第 20 章 教师与思想家

# 1

韦伯在伊萨尔峡谷时就写下了关于和平条约的评论。从凡尔赛归来之后，他需要一段时间彻底休息一下，以从心灵和神经的极度疲惫中恢复过来。他的课程要到六月才开始，因为学校为那些参战归来的人专门增加了一个春季学期。韦伯夫妇计划到秋天才迁居。他深居静处于沃尔夫拉茨斯豪森（Wolftratshausen），一段时间里他仿佛是在旅途中度过似的：

整整三天我都无所事事——就是说，我睡了（扎扎实实地睡了）两个晚上和星期五差不多一整天，到星期六仍然很迷糊。昨天和今天我都花了数小时散步，也许走得有点太多了。因为我现在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疲乏，这妨碍了我的一切思维和行动。倒是这从未见过的高原地区的怡人气候和沁人心脾的微风总诱我出门，然后我便在伊萨尔森林中或是在高地上迷了路，于是就只好不停地走。我真想知道，一旦要开始“工作”，我这脑子还好不好使。刚刚寄出了我的课程表，星期二开始上“社会学最普通的范畴”。我想给年龄大一点、成熟一点的学生每两个星期上一次讨论课——给他们上课要比给没有实践经验的人上课少费点劲。不过我当然很想知道，我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672 由于最近发生了最为血腥的骚乱，慕尼黑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在那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未能像在柏林那样，迫使革命进入正义和秩序的轨道。国外的共产党人在这里的活动也比别的地方更为活跃，艾斯纳就已经在想要以苏维埃政府取代“议会这个泥沼”了。他的遇害促使温和派也变得激进。三个社会主义政党联合起来，在二月底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了。普选产生的议会被迫进行社会主义试验。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诺伊拉特（O. Neurath）受托负责巴伐利亚的“全面社会主义化”，以期遏制日益膨胀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并未奏效。

四月份，布尔什维克分子夺取了政权，第二次宣告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次还建立了一支红军队伍。该政府的领导最初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政治冒险家，然后是一个叫恩斯特·托勒的学生和波希米亚人埃里希·米萨姆，最后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莱菲恩·利文内-尼森（Leviné-Nissen）、艾克塞洛特（Axelrot）。最后三个都是外国人，属于不同的族群。帝国军队不得不向慕尼黑进军。托勒是一个红军支队的指挥，苏维埃政府几乎所有的政令都由他签署。现在血腥的狂欢真的享受着极大的满足。有几天时间，慕尼黑笼罩在红军专政的恐怖之中，出现了人质遭到杀害的事件。最后，经过一番激烈巷战之后，政府军于五月初获胜。民众对革命者以及他们来自国外的犹太领导人义愤填膺，由此增强了他们对外国人的仇恨，进一步激发了反犹太主义和泛德意志民族主义。钟摆现在摆向了另一侧；巴伐利亚现在想要成为日耳曼帝国内一个“秩序井然的组成部分”，并力求恢复君主制。如果他们在这里获得成功，那么，对革命的反动就会波及帝国的其他地方。或者这将会给巴伐利亚提供一个从帝国分裂出去的机会，由此而最终摆脱北德的霸权。蓝白邦联和黑—白—红邦联<sup>①</sup>都在努力寻求自己的追随者。这些邦联中的成员有的相互争斗，有的则具有一致的目标：让历史的车轮倒转。

673 在大学圈子里，人们对苏维埃时期的社会主义化企图以及一度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也表示了愤慨，并在校园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重建的意志占了上风，学生们投身于政治之中，教师和学生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

对叛国罪的审判接踵而来。韦伯又有了帮助危难者的机会。他出庭为负责社会主义化的专员诺伊拉特作证，以证明诺伊拉特政治上的正直；他尤其为托勒作了证，他确信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毫不怀疑其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巴伐利亚革命有一个荒诞的特征，就是像托勒一样的年轻人确实统治了一段时间，并能赢得民众的支持。韦伯在法庭作证时把托勒说成是一个“为思想信念所支配的伦理学家”，在政治现实面前不谙世事，不自觉地诉诸民众歇斯底里的本能：“上帝发怒，让他成了政治家。”

<sup>①</sup> 巴伐利亚的州旗为蓝白二色，黑白红三色旗为德意志帝国国旗。普鲁士于1867年统一德国北部，建立北部德国邦联，采用黑白红三色旗为国旗。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黑白红三色旗最终于1892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国旗。——译者注

在那几周里，韦伯写道：

这个城市仍然呈现出一派战争的场景，人们还在继续深挖战壕，加固带刺铁丝网等等，或许是因为政府又想要迁回这里。逮捕正在不断地进行，昨天，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安斯巴赫（Ansbach）<sup>①</sup> 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被连锅端了，同时缴获的还有一些通信和俄国货币。我仍然十分疲倦和麻木，以至于难以把握整个事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会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好，只是现在看起来很有些可怕……由于可怕的政治局势和现在感觉到的筋疲力尽，这封信写得有点无精打采。不过其他一切都很不错。

※ ※ ※

六月底，韦伯迁居慕尼黑。他有一个舒适的住所，在大学里用的是布伦塔诺那间漂亮的办公室。当他在那间屋的门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心中微微泛起一股喜悦之情。谁会想到，他有一天居然会在这个城市里承继一个著名教席！他的第一次讲座讨论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观察。据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课堂上谈论政治，因为政治不属于课堂，也不属于学术研究，而是属于有自由的批评空气的地方。他激动地谈到了德国的悲剧：我们事实上处于外来统治之下。像犹太人一样，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民族，德国政府只是代表外国利益的听差，被迫对自己的同胞采取报复行动。我们只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将和约变成废纸。目前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任何人也不能够夺走我们反抗外来统治的权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沉默的艺术，重新习惯于平凡的日常工作。

674

在韦伯的办公时间，很快学生们便络绎不绝地来找他；他给这些学生指教，给他们布置作业。学生们对他充满敬畏，觉得他看起来像“一头雄狮”般“威严”。当他的额头从鼻梢向上拧成两道深深的犁沟，双眼放射出光芒的时候，学生们就会心生畏惧之感。不过，当学生来向他请教时，他的目光则非常和蔼，让人感到放松。上韦伯的讨论课的一些年轻人与他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在他们眼里，韦伯并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尽管他自己并不想扮演别的什么角色。他们暗地里尊崇他，就像印度教徒尊崇他们的“师尊”：在印度教里，师尊是智慧的导师，人们同时把师尊视为救难者、导师和心灵的抚慰者。不过他们也感到，唯有通过对学术的献身，他们才能接近他这个人。只有当韦伯感觉到一种学术热情的时候，他的兴趣才会被激发起来。具有犀利的批判精神的耶尔

<sup>①</sup> “Ansbach”疑为“Ambach”之误。——参见英译注

格·冯·卡费尔（Jörg von Kapher）是韦伯最成熟也最具有高尚情操的学生之一，不过他唯一期望的只是以爱戴的心情理解韦伯。卡费尔以下面的文字概括了年轻人对韦伯的印象：

他是一个彻底讲求实际的人。他身上体现出了一种讲求实际的十足的英雄主义，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吧。因此，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种取之不竭的阅历。所以他讲求实际的讨论和讲演就像一件件艺术作品——并非就形式而言，而是就其本质而论。……重要的不是他就一个对象说了些什么，而是这个对象本身似乎以其不可穷尽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他只是这个对象的阐释者……他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是建立在**实事求是**这个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关系对我们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对每一个研究领域都不乏兴趣，同样，他对我们的每一种思想也都表现出兴致，而且他的兴致从来不是敷衍应付。他对待自己的工作极为严肃，也以同样的严肃态度对待我们的学业。他对我们的课业加以考察，提出批评——并不是轻率地加以批评，因为他的批评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的批评一点不留情面。然而，一旦他发现任何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想法，他就会倾全力给予支持，以使这个想法得到进一步阐发；同样，他认为没有任何思想是微不足道的。他会以无限的宽厚和爱心呵护培育这样一种思想，使其萌芽。不管是谁，他只要觉得在你身上发现了某种思想和有价值的思想的火花，他都会对你展示自己的满腔热忱。这样的热忱令人振奋，给人以力量，也给人带来希望。因此，在他的指导下问学，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学识，而且可以使自己的力量和乐趣得到增长。

这位年轻人高尚的情操使他不愿在自己敬爱的老师那里争取得到特别的关注。他这种自谦的结果反映在下面一段文字中：

一旦我们离开了由血亲关系维系的那个圈子，也许就只有这种非个人化的关系才能让我们得以分享一个人的奉献能力和欣赏这个人的天赋。也许这种力量的法则正是：这种力量最终能够激发一些人的活力，而正是这些人不能是它注意力的中心。如果一个人所能给予我们的只有良好的意愿和助人之心，除此之外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别的东西，那么，他对我们就绝不可能有什么帮助，有时反而是个负担。那些对别人奉献最多的人，那些拥有无边无际的爱的人，他们是一个陌生人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是事业的仆人。以这样的名义，他们可以向人们提出最难于做到的事情：“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我。”（《马太福音》，10：38）他们并不安慰你，



但却给你力量。

※ ※ ※

置身于他的学生中间，韦伯好像获得了第二次青春：他的职业生涯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不过，他仍然非常疲劳，教学工作也很耗费他的精力。同时他还得整理出版自己的著述。早已告罄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现在终于要同其他宗教社会学著作在一起集结成集，重新出版，这里还有好些事情要做。他的两篇讲演“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正在付印，后者已经扩充成了内容丰富的长篇论文。他与大多数学生之间的智识差距非常大，因此，为这些学生服务，而不是致力于自己的著述，似乎不大合情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不得不反复口头讲述自己关于社会学范畴的学说有助于他更精确地界定这些范畴。所以，他情绪的大起大落取决于自己工作效率的高低。所幸的是，有忠诚的朋友们照顾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对他颇有裨益的新朋友中，包括年轻的同事卡尔·罗滕比歇尔（Karl Rothenbücher）——他教授政治经济学。两人由于政治观点相同，所以关系比较密切。

676

我感到疲劳不堪，昨天上第一堂课时就感觉到了。听课的人太多，相当一部分人站着听讲。不过这一次他们很快会溜走，因为我（有意）讲得很抽象，讲的是纯粹概念性的东西。很多人选了我的研讨课，这门课我得慢慢地开始。冬季学期我排了两个小时的<sup>经济史</sup>，两小时的“国家、阶级和社会等级”以及“学术研究导论”，后者是不拘形式的个别讨论，或者也有可能每两周上一个小时的讲座课。希望这种安排不会有问题。真是奇怪，这样一种体力劳动竟让我感到如此疲乏。

第二堂讲座课也上完了。这次课堂又拥挤不堪，令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喊。这是我上过的课中最累人的一门课，的确上得我精疲力竭，感觉比在维也纳上课之初还要累人（也许是因为我被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以及凡尔赛耗尽了精力，这一点我能感觉到）。还有，这里的气候也确实不适合我，缺乏高地给人强烈感受的清新空气带来的放松感——而这正是我现在这种工作所需要的。因此，上完讲座课后我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充其量也就能干一两个小时，然后就不行了。

“研究工作”做得很有节制：一天一两个小时。我感到惊人地疲乏，脑子不灵。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慢慢适应也许是恢复工作能力的唯一途径。我现在准备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付梓，然后着手“经济伦理”，之后还有社会学，

其导论正是我这门讲座课的内容。等等看吧，看事情进展如何！我现在是个**秉笔**写作的学者，而**不是**登台执教的教师。然而，该做的事就一定得做。这里的教学并没有**快乐**——这与在维也纳开始上课时不一样。什么都无济于事，但我可以想办法对付。我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除了埃尔泽·雅菲（她的仆人安娜给我送来了鸡蛋）之外，还有萨沙·萨尔茨（Sascha Salz）给我提供了黄油——所以我还能有什么事情呢？我确实相信，我们在这里是**能够**习惯的。这里一切都富有生气，不管是城市还是这里的人均是如此，只是气候**恶劣**。这一点我得指出。到今天雨已经下了足有三个半星期了，还不知要下到何时！

我准备出版《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其他文章的工作进展缓慢，不过我能够坚持下去。我想，经过好好休息，等困扰着我的抑郁症消失之后，冬季学期也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可能，把那个黑色的文件夹给我带来，里面有我的《音乐社会学》。等你来这里的时候，我要在研讨课上讲这个题目，如果你愿意，届时你可以来听，怎么样？此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好好**享受一下，也要听听音乐（莫扎特、瓦格纳音乐节），对吧？希望这**令人沮丧**的天气晴起来——这种天气真让人恶心，**冷得**够呛。除此之外，我一切都还不错——这要归因于处于绝对的懒惰状态，对此你和埃尔泽的建议要承担责任。这里一切仍然处于平静状态，而且会继续保持平静；可是鉴于目前**这样**的失业状况，煤炭又**如此**缺乏，冬天会怎么样呢？想到此，我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你可爱的短信虽然写得“匆忙”，读起来仍然令人快乐，希望你那里**真**的一切都还不错。

星期四比平时多用了点功，昨天我正打算去这里的“英国公园”，埃尔泽·雅菲从伊尔申豪森（Irrschenhausen）打来电话，告知布伦塔诺要来访，问我是否愿意去她那里为客人“助兴”。我当然乐于为之，由于天气变得非常好——**终于**，到底还是有了好转——我待的时间长了点，错过了火车，然后同她们一家子挤着住了一晚。今天一大早，美丽的骄阳六点钟就照射在阳台上——这栋小住宅你是知道的。当大家都还在沉睡的时候，我就出门在阳光的沐浴下散步。有了这一番“历险”之后，今天中午我又得返回城里。清晨的**森林**非常美丽，没有一丝风，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从这一切你可以看出，我现在的状态完全可以说还过得去。不过这大概是用前所未有的懒惰为代价换来的：除了上课之外，《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可是你批准的。

母亲星期二要来这里。不幸的是，我这些天不仅要上研讨课，还得作为证人参

加诺伊拉特的审判，之前我已经为托勒做过证人——他被判监禁五年，关在一个要塞监狱里。当我在法庭上讲述我们在劳恩斯滕堡的整个奇遇时，法庭的情绪不错，这总是有所助益的。感谢你可爱的短信，虽多有感伤，但读来仍令人愉快。不错，这的确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篇章。在这里，有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像我们在海德堡那样做得尽如人意。让我们等一等，看看如果我（照我所希望的那样）在这里能挺过来，将来会怎样。

※ ※ ※

到了这个短暂的学期快结束时，韦伯已经可以说适应得不错了。他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那个以大学为中心的社区，并以他典型的热情参与其间。妻子八月份待在慕尼黑的那段时间里，他于繁忙中抽出时间跟妻子一起享受各种各样美好的事物：观赏了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去异地漫游之前绘制的《祭坛》（*Der Altar*），然后去玫瑰岛作了一次夏日短途旅行。这给这对夫妇提供了一个机会，将他们的心同这一片山峦起伏的广袤土地紧紧相连，这是一片现在将要成为自己家园的土地。他们在脑子里编织着各种各样的美梦：要是能像很多其他慕尼黑黑人那样，在郊外湖畔有一个夏日居所，可以远眺逶迤群山，那该多好啊！

在剧院，他们观看了易卜生的《布朗德》（*Brand*），该剧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内容深深打动了他们，这种心灵感受溢于言表。布朗德是一个心灵被严厉的上帝主宰的人，他把自己对绝对的服从付诸激进的实践。不过，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出一切牺牲，而且想要引导别的世俗凡人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他未能使他们跟随自己；他们首先想要的是过上幸福生活，然后再侍奉上帝。因此，他们让这个总是对他们提出过分要求的领头人陷入了绝世孤立。只是在临终时刻，布朗德才体验到了，上帝的仁慈高于上帝自己的律法。

也许在韦伯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他也曾面临过这种可能性，即成为一个持“绝对标准”的人。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宽大为怀，接受别人整个的丰富而充满矛盾的世俗生活；他一次又一次地怀着爱心、以研究考察的态度关怀人类的一切事情。他以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但却并不把这种标准强加于任何人。他确实宁可把自己归在罪人之列，而不愿被视为“正义”之身。

679

※ ※ ※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韦伯再次回到海德堡，在旧宅里度过了几周气候宜人的秋日。他曾有一种感觉，以为自己已经不再依恋这个地方了，可是他在给妹妹莉莉莉〔她带着孩

子已经迁居奥登瓦尔德（Odenwald）寄宿学校」的信中却写道：“以后我们大家都到这里来汇聚一堂。”海德堡的朋友们为将要离开的韦伯聚会送行，一年前的这个时间正巧是他们夫妇庆祝银婚的日子。

韦伯的生活远离海德堡大学，以至于年轻人称他为海德堡的传奇；很多同事所了解的韦伯只是一个不易相处和容易激动的人，他超人的思想学术造诣是一个负担，他的道德标准太高，对同行政治行为坚持不懈的批评令人不快。然而，很多人出席了送别聚会，以期同他再相处一次。女士们向临别者献上了音乐和诗歌，男士们则以祝词和答词为他们饯行。当宅邸狮泉的水仙唤起韦伯对青春的回忆时，这对夫妇用胳膊肘轻轻地相互碰了碰：“真像是闹婚之夜。”埃贝哈德·戈特海因和赫尔曼·布劳斯的讲话饶有智慧，后者后来将这次讲话作了笔录。作为一位医学研究者，布劳斯诙谐地把韦伯对大学机体的影响比作新发现的“荷尔蒙”对于人体的影响。从人体中去除这些荷尔蒙将会造成危及生命的机能缺失现象，可是如果一位聪明的医生将其移植到身体的另一个部位，它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造福于整个机体；同样，即将告别的这位也将会在慕尼黑继续对海德堡产生影响。之后布劳斯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事情：

我回想起在战时作为您的同事，在您的领导下工作，同您一起经历了很多严肃的事情，也不乏快乐和奇特的经历。那些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得把这些事情放在那个伟大时代的背景下来看待。很多在您身边的人经历过完全不同和更加重要的事情。然而，不管经历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任何接近您的人都目睹了您的骑士风度和正直的男子气概，都感受到了您对自己信念的坚贞不渝，把您看作仿佛是丢勒（Dürer）画笔下那个在死亡和魔鬼之间行进的骑士的现代化身。我还记得您在工作中做出的顽强努力，在您看来，只要是服务于一项伟大的事业，即便是最细小的事情也不可能微不足道。所有认识您的人，谁也不会忘却的重要经历是：自己体验了人类最高标准的丰富智识和最为全面、有深厚根基的能力，以及坚信狄俄尼索斯并没有死去。

680

韦伯在答谢词中感谢所有的人，他们是被超个人的共同命运维系在一起的。他强调了自己对德国不可动摇的信念以及对这个美丽国家的热爱，在她的森林中你可以感受到她的灵魂。他也稍稍透露了一点关于自己的信息，谈到了自己患病的岁月，也谈到了在自己缓慢地恢复并开始一种新生活时，海德堡的温柔和煦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说自己仿佛是离别故乡，前往一个美丽但却冷漠的陌生之地。不过，现今谁也无权过一种奢侈的生活。由于现在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因而人们的第一要务便是单纯地从事自己的职业。



冬天提前到来，令慕尼黑猝不及防。一天早上，骄傲地排列着的杨树——它们给凯旋门外的大街平添一种伟岸的气象——仍然十分青翠的树叶一下子都冻上了。冻死的树叶让风吹拂着，悲哀地发出飒飒的声响。不过，很快树木身上便引人注目地裹上了一层白霜——从凯旋门一眼望去，在蓝天映衬下白衣卫士列队而立，真是一幅奇妙的景象。在寒冷清冽的空气中，大学周围典雅的淡黄色房屋展示出勇气和力量。韦伯现在做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充分准备。他和玛丽安妮起初暂居在朋友家熟悉的环境中，然后搬进了紧挨着英国公园的海伦妮·伯劳（Helene Böhlau）曾经住过的小宅子。同海德堡宽敞的住宅相比，这里的房屋狭窄一点，却也舒适，合乎韦伯的愿望，即在这个艰难时期过一种朴素的生活。小小的湖滨街（Seestraße）是舒适的一隅。在这里，大都市与施瓦宾（Schwabing）的一个小村落融为一体，而这里曾经是一个离城市很遥远的地方。小小乡村房舍的房顶伸手可及，窗外不怎么时髦的植物还在梦乡里，而这些房舍仍然与骄傲的大都市姐妹比肩而立。

681

韦伯的书房比海德堡的那间小，但在结构上相仿。从窗户望出去是一个极小的花园，两棵白桦树和一棵幼小的欧洲山毛榉挡住了对面丑陋的防火墙。临街的一面，可以看到有欧洲赤松和桦树的小树林，这两种树都是高地之子。街道的尽头是英国公园，伊萨尔河的一条支流从这里奔流而过。再往前走几步就是一个浩渺的湖泊，湖中聚居着鸭和海鸥。韦伯夫妇发现，那个袖珍型的比贝尔施泰因城堡（Biebersteinschloßchen）完全像在歌德时代一样，依然矗立，似在梦中，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喜悦。不必被困在大都市街道边那些石头砌成的冰冷的监狱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啊！



就在韦伯冬季学期开始上课前，海伦妮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生命意志顽强的女人一直期望着死亡慢慢到来，以便让她能够体验自己生命的终结。可是现在死亡猝然而至，未能赐予她款款告别人世的机会。就在夏天，她还在海德堡跟玛丽安妮一起待了几个月，后来又去慕尼黑看望了儿子。她身材矮小，佝偻着腰，走起路来气喘吁吁。她常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应当回到家里，因为她想给孩子们省点儿麻烦。她当然希望再活些日子，希望看到德国振兴。此外，她还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她唯一尚在人世的姐姐、地理学家贝内克的遗孀，也是战后被赶出斯特拉斯堡的人之一。她回到父母的老宅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瘫痪了多年，心智也不健全，但她生命中最本质的那个神秘的核心犹在。她现在住进了韦伯家里。海伦妮想要跟她一起过冬，让她沐浴在爱中，同她一起共享对往事的回忆。后来她又打算搬到莫姆森的住宅去，跟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

682

海伦妮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奉献给了对她来讲颇为典型的善行。相当长时间以来，她的心脏就已经不行了，走路和上楼梯都很艰难。她住在五楼，每天最多只能上下走一次。可是在她去世的这一天，她不声不响地上下爬了两次楼梯。她有一个曾一起共过事的朋友，孑孑一人，同样也是居住在要爬多层楼梯的公寓里。海伦妮想，这位朋友休假就要归来，她回家来应当受到她的朋友——焦煤渣炉——“温暖”的迎接，而生这种炉子得花不少时间，还得小心谨慎。海伦妮一大早就拎着一个沉重的袋子出门了。她吃力地提着煤饼和自己的午饭，有人看见她佝偻得很厉害的身影在蹒跚而行。她艰难地爬着数不清的楼梯，拾级而上，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焦煤渣炉的死灰变成了红彤彤的炉火，因此而感到由衷的满足。当天晚上，她开始心脏衰竭，一件婴儿的外套从她那双勤劳的双手中滑落下来。临终前她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女儿克拉拉陪伴在她身边。

海伦妮所有的子女齐聚在她的灵柩旁，他们并没有料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了。母亲慈祥的脸上刻下了历经沧桑留下的痕迹。像现在这样安然躺在那里，缄默自守，不同任何人交流，这全然不合她的性格，因为她的整个生命仿佛就是永不停息、不断创造和奋斗的一生。然而，她不会就此而中止对自己所爱的人（并通过他们）继续产生影响。孩子们现在跟她告别，不过，他们将来会回到她的身旁去。她的长子在敞开的灵柩旁致悼词，回顾了海伦妮的人格、形象。他尤其称赞海伦妮对生活的热爱和她充满激情的力量，称赞她在人生的沉浮中始终保持着无穷无尽的幽默感。

伊达的儿子奥托主持了追悼会，他一向与海伦妮灵犀相通。他谈到海伦妮积极追求道德虔诚，“如饥似渴地寻求正义”和毫不妥协地严于律己；谈到她在生活中总感到不安，因为她无时无刻不痛楚地感觉到人类的最高追求和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间存在的距离。对于女人们来说，这还不足以概括她的全部魅力。正如一个男人只会把男人视为自己的标准和榜样，一个女人也只会把女人作为自己的标准和楷模，因此一个女人秉性中的特殊价值最能深刻打动另一个女人。玛丽安妮解释了令人敬重的女性所感到的海伦妮的魅力——创造性的、绝对的爱，这种爱的丰富不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回报，这种爱从来不满足于一时的快感，而是致力于有益的行动，让她周围的人都能受益。

※ ※ ※

683

这之后韦伯便开始了冬季学期的工作。由于学生感到他的范畴学说太难理解，于是他便在学生们的敦促下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决定给学生讲授一门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这就意味着他要讲授一门新的课，涉及的材料可谓浩如烟海。他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所要用的知识，但这些知识需要加以组织，某些新的研究成果必须加以考虑。讲座安排在学校最大的讲堂，听众达 600 人之多。每上一节课他都需要付出很多的心血。此外

他还要上一门社会学研讨课，并应同事的请求，主持了一个青年教师学术研讨会。这种学术交流给他带来了许多喜悦。

他为此而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因此必须小心谨慎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事实上，还在刚开学的几周里，以前的担忧就又重新向他袭来：他担心自己无法长时间胜任全职教学工作。此外，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煎熬的一件事情是，他无法减轻同事洛茨的工作负担，在新的经济学教员尚未到位之前，洛茨承担着过重的教学负担。他考虑将自己的正教授换成即将设置的副教授职位，并为此递交了申请。现在他心里感到轻松不少，不过他的申请并没有得到回复。然而，还未到圣诞节，他就已经适应过来了，对教学工作应付裕如，感到越来越自信，这跟他在维也纳的经历和感受截然不同。

生命绽放出这样的第二春，确实是一大奇迹。韦伯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可这种状况能否持久呢？在每年例行的校庆时，韦伯身着政治系教员的红宝石颜色的礼袍，高大的身躯迈着气概不凡的步伐，略带笑意的目光迅速地瞥了妻子一眼。他知道，自己这一瞥触动了妻子的心灵。然而，担任教职是不是他的最后归宿呢？要放在以前，这恐怕就是不可超越的高度了。不过，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德国的重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将需要每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在那段时间里，有一次玛丽安妮对他说：几年后，等他年纪再大一点，身体再强壮一点，国家最终会向他发出召唤，“然后，你会不顾一切危险，挺身而出”。韦伯点点头，严肃庄重地说：“不错，我有一种感觉，生活似乎还为我保留着什么东西。”

684

※ ※ ※

1920年1月中旬，刺杀库尔特·艾斯纳的年轻人阿尔科-瓦雷（Arco-Valley）伯爵获减刑，这一事件重新掀起了政治波澜。韦伯虽然同情这位刺客，但却不赞成这一判决，因为这不仅缺乏公正，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政治谋杀会成为时髦。”阿尔科被那些信奉民族主义的学生视为同道，他们在校园里举行了集会，以庆祝这项判决，而且具有泛日耳曼主义思想倾向的校长也在场。他们在这次集会上无意中透露，假如阿尔科未获减刑，他们将会在一支部队的帮助下发动政变。当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生提出不同看法时，他遭到了学生会一位成员的谩骂。这位校长阁下并未对此表示异议。之后，受到侮辱的少数派学生情绪激昂地到韦伯那里倾诉不满。韦伯便替这些学生跟校长交涉，请求他立即采取措施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告诉他：“必要时我会不讲情面，不要低估了这种可能性。”过了两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韦伯便便开始上课时大约说了下面一段话：

通常我在课堂上并不谈论政治问题，不过我不能不就上周六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说几句。您有权利要求得知我对**具体事件**的真实看法。您赞赏阿尔科，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富有骑士精神，不管从哪方面讲都表现出了男子气概——对此我也**这样认为**。他的行为是出于信念，因为他确信，库尔特·艾斯纳一次又一次地损毁了德国的荣誉。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只要我们是一个有法制的国家，给他减刑就是件坏事。假如我是部长，我会对他执行枪决。你们的示威游行不会让我改变主意，而是适得其反！然而，司法部却屈从了你们的压力。库尔特·艾斯纳的幽灵现在仍然缠绕着我们，阿尔科的墓碑原本是可以驱除这个幽灵的，可是因为阿尔科还活着，艾斯纳现在将会作为烈士活在人们心中。这对这个国家有害无益。你们的示威游行把阿尔科变成了什么人呢？毫无疑问，只是变成了一个咖啡店的明星而已！我倒是希望他有更好的命运！星期六有人在这里对人横加指责，直到今天这些指责还未被撤回。不撤回这些指责的人简直就是**下流胚**！

还有一件事情。正是在那次集会上有人提到，帝国军队准备跟学生一起搞政变。先生们，**这些人**是我所不屑的阴谋家，他们居然如此恬不知耻，竟然在公开场合**有意泄露**这样的事情。对于这件事情本身不值得多费唇舌。

不过让我告诉你们：为了重建德国昔日的辉煌，我一定会同地球上任何力量，甚至同魔鬼的化身结盟，唯独不能同愚蠢的力量结盟。然而，只要是疯子从政，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我都会远离政治。

1920年1月19日

两天后，持社会主义观点的学生遭辱骂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样，韦伯在下面一堂课开始时也撤回了他关于假想的“下流胚”的说法。尽管如此，正当他准备开始讲课时，口哨声和狂喊声便开始喧嚣起来。泛日耳曼主义者派到课堂上来的兽医学院的学生和其他一些极右派青年，他们既不认识韦伯，也没有听到他前述的声明，在这里使用了他们在竞选集会上学来的一套。韦伯冷静地站在讲台上，对这一群人报之以嘲笑，于是他们变得更加疯狂。韦伯的学生正想要揍这帮人一顿，此时灯被关掉，大厅也清了场。紧接着韦伯去参加了一个相当大的聚会，非常兴奋，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政治上的较量显然总能让他精神焕发。

※ ※ ※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韦伯的研讨课上正在讨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那本受到广泛关注的书——《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韦伯认为这本书的历史哲学观念出自一个非常有才华和学问的“外行”，这个



人将历史研究的结果装进自己推想的建构之中。课上有几个人认识书的作者，希望斯宾格勒、韦伯和其他几位思想家就此进行一场辩论。这几人都为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做好了准备。一个寒冷、清冽的冬日，他们聚集在市政厅里。好几排年轻人环坐在这几位学者周围，他们多数是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成员，其中也有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和属于其他各派的年轻人。这场精神的竞技比赛持续了一天半，非常引人入胜。韦伯的出击十分小心谨慎，使用了最具有骑士风度的武器。他尊重思想观念不同的人，这使他的批评不至于令人无法接受。其他人的批评则不留情面。斯宾格勒的思想建构被一砖一瓦地拆除，但他仍然表现得颇有涵养。不过就斯宾格勒的基本论点而言，辩论的双方谁也无法让对方信服。论辩中知识学问的博大精深让年轻的听众再次倾倒，但却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应当怎么办？”

之后，其中有几个年轻人拉着韦伯和作家保罗·恩斯特以及社会主义者奥托·诺伊拉特到他们的圈子里，希望最终能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在湖滨街的一个微型乡村小宅子里，他们有一个自己聚会的地方。这里除了一张桌子和若干椅子之外，只有一个棕色的瓷砖壁炉。那个冬天的下午非常寒冷，因为燃料不足，炉子热得很慢。不过，贫困和战争让这些青年男女对艰苦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他们以俭朴为荣。韦伯穿着皮大衣坐在壁炉前的凳子上，后面的瓷砖映衬着他给人印象深刻的头颅，平直的头发像年轻人一般浓密而呈棕色，但胡须中已交织着不少银丝，他不时用纤细的手指将不羁的胡须归拢在一起。他的双眼透出慈祥和愿理解年轻人的真诚愿望。

让这些年轻人情绪激荡的是这样一种信念：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的绿洲（如乡村聚居点等），便可以创造一些自然的细胞，导向一种新的和更高的世界秩序——以和平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或者至少能够将那些真诚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人从其桎梏中解放出来。通过一起从土地中获得食粮，他们也希望能够摆脱专业化的职业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工作具有一种扼杀心灵的强制力量。不过，他们仍然想要继续做有文化的人；斯宾格勒将此戏称为“农业加工艺美术”。最近几年来，作家保罗·恩斯特自己在非常勤劳和聪明的妻子帮助下经营着一个农场，以此为自己的精神活动创造物质基础；他知道，经营一家农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因此对年轻人提出了警告。有几个年轻人也曾做过具体尝试，不过都失败了。其中一个特别大胆的年轻人想要带一大帮知识分子和无产者去西伯利亚（他是通过战争了解到这个地方的），跟他们一起在那里建立一个模范共产主义社区。他心中向往的不仅是集体生活和工作，还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从国家形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韦伯竭力想让他们明白，没有法律和暴力，只能组织家庭似的小型团体，而不可能组织比较大的集体社会。不过，他们充满幻想的热忱打动了韦伯，他不愿意摧毁他们的信念，不愿意泯灭他们的活力，所以告诉他们，自己愿意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给他们提供

咨询。然而，年轻的拓荒者们觉得韦伯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同道。他们感到失望，因此将他弃于一旁。

在家里，韦伯同保罗·恩斯特及夫人的交谈持续至深夜，度过了思想交流非常活跃的几个小时。之后不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来韦伯家里拜访，他们的交谈再次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当被问及他的历史哲学的构建时，斯宾格勒承认，自己是个“诗人”。

## 2

除此之外，这个冬天韦伯把精力集中于孜孜不倦的工作上。他的讲座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同时他还在校改自己有关宗教社会学著述第一卷的清样，尤其着力于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的社会学范畴学说。这部著作的第一批校样早就印出来了，次年春便要付梓。这里我们要谈谈这部著作（它是韦伯学术生涯的结晶）的形式和方法，以期有助于一般读者对此书进行理解。

“理解社会学”（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由在方法论上不同的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均不完整。一个是系统的类型理论以及与这个理论有部分关联的著述，在这些著述里历史的具体性通过类型概念来相互联结和加以组织。换句话说，在著述的第一部分，韦伯就对在探索历史进程的描述性部分使用的那些概念建构加以系统安排，并尽可能清晰地表述出来。这样，概念的学说要以对历史具有广博的知识为前提，因为与思辨的思想建构不同，它不是从普遍的重要定理和原则演绎出来的，而是直接依据具体的史实来建立，通过归纳法来建构的。因此，韦伯在战前就写下了对历史加以分析和描述的论文，而且是“凭记忆”写下的，未加任何注释。为此，他并不需要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他胸中装着浩瀚的知识海洋。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把精力集中在范畴理论上——1918年在维也纳以及一年之后在慕尼黑开设的讲座课程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项努力。现在，在去世前几个月，他确定了范畴理论的最后形态。他反复琢磨推敲那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概念，在校样上做了很多修改。

韦伯最后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简明精确的表达方式。不错，“人们对此会摇头”表示不解。他明白，自己的方法是把全新的内容放进人们早已熟悉的历史、经济、法律和神学的思维结构之中，所以他们一开始不仅会觉得难以理解，而且会感到奇怪。我们下面很快会谈到个中缘由，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谈谈这部作品的形式。

这整部著作，尤其是概念学说的文体风格与他的其他著作大异其趣：句子几乎总是很短，主语和谓语紧挨着，中间没有插入句。书的内容用了很多数字和字母编排，一句

接着一句，有接踵而至之感。概念都是用最简洁的形式加以表达，句式颇具特色，诸如“社会学应指……”“社会行动应指……”“企业应指……”“统治应指……”如此等等。不过，这些祈使句并不是要求让这个新的建构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学的框架之外仍然有效。相反，它们的意义在于：“在我的概念学说中，这一概念应当是这个意思；出于某种方法论的目的，我这样来称呼这样一种建构，唯有由此得出的学术成果才能证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其他的社会学，尤其是其他学科尽可以为了自己的认知目的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大多数嵌插在定义之间的说明和阐释（它们将前面刚刚浓缩的内容又掰开揉碎）也是用简明清楚的句子结构来表达的。运思缜密紧凑，仿佛有一种节奏感，任何能够理解这种运思的人，都会为其逻辑的力量所倾倒，被它引导着在本书的材料中徜徉。不过，能有这种经历的人起初不会很多，因为每一个简洁的句子都代表着一个超越时空、内涵丰富的观念序列的符号。谁要不能把握这些内涵，那么，那些符号对他而言也只能是空洞无物的一堆符号。

689

下面我们对韦伯的方法和他为何使用这种方法的学术思考加以评述，读这些文字需参看本书第10章325页以及后面几页<sup>①</sup>的阐述。

韦伯将“理解社会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来加以研究——“一种既不应该也无法强加于任何人的界定”。这种理解社会学的对象只是历史中那些不重复、能够被理解的因素，亦即个人和多人具有意义指向的行动，这些行动彼此关联，因此被称为“社会”行动。理解社会学对这种行动进行阐释性理解的同时，也就对这种行动作了因果性的说明。我们从第10章的评述知道，韦伯想要确定的行动的意义，不是某种通过思辨而建筑在现实之上的思想建构，而是一种主观的意义，一种行动者本人的行动所具有的“主观意指”的意义，行动者将这种意义视为具体的、可以通过经验把握的终极现实。

因此，理解社会学将自己与法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其他一切规范科学区分开来，这些科学企望在自己的对象中探索到“有效”、“正确”和“真实”的意义。理解社会学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它跟历史学一样，具有一种超科学的因素，也就是说，它要从无数种无关紧要的事件中选择具有文化意义的东西；此外，它也具有科学的因素，即因果归因和作为认知工具的阐释性理解。不过，历史学感兴趣的主要是探索重要的单个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此相反，社会学研究的是类型，是建构类型概念，从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社会行动“过程”中找寻普遍规则。就其对普遍性的兴趣而言，社会学跟自然科学相近；然而，它又不同于自然科学，这不仅因为后者的对象不同，而且因为后者的一般概念具有不同的逻辑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sup>②</sup>

690

① 指德文原著页码，即本译著边码。——译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327页及后面几页（指德文原著页码，即本译著边码。——译者注）

不过，由于韦伯在这部著作中重新建构和系统地整理了这些“理想类型”，因此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对韦伯而言，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而将这些理想类型归入一个体系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类型并不是要成为最终的定型，而是要成为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认知长河中暂时的立足点而已。此外，经验的研究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统一的原则，使人们能够据此以确定的和在科学上有说服力的方式对现实中具有文化意义的内容加以整理。毋宁说，经验研究始终只能导致多种多样的终极价值理念和生命力量——“神祇”——这些神祇为了争夺对存在的统治而相互较量。当然，不言而喻，这种有意对自身加以限制的经验科学，自始至终都明白自己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前提，并且将此视为自身的先决条件。一般文化价值理念就是这种先决条件之一，根据这种理念我们从不重要的东西中筛选出重要的东西来。此外，还有研究者本人特殊的“理念”，即尽可能清晰、尽可能客观、尽可能普遍地认识过去如何和现在怎样，尤其是尽可能洞悉现代生活中的各种力量。有一次，韦伯被问及他的学术对他自己有何意义，韦伯回答说：“我想要看看自己的承受能力有多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或许他想说，自己的使命是要承受存在的二律背反，而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摆脱幻想，同时又毫不动摇地坚守自己的理想，并保持自己有为理想而献身的力量。

这样的理念存在于经验研究及其概念的背后。对事物的认知本身不允许思辨的思想建构参与，也要明确和有意识地避免超现实的概念或关于令人信服的客观有效性领域的观念，这些观念不属于经验科学的课题。这种理解社会学的特殊性质（诸如某种可能呈现为逻辑悖论的东西——脱离了现实的类型概念的理性建构），产生于它所具有的特别意图，即把典型社会行动中现实的核心从一切价值思辨的外壳中解放出来。韦伯考察了整个世界社会行动的规律性，并将这些规律性用这样一些概念来加以表述：这些概念假设行动的过程不受非理性的亦即无法预料的影响干涉——这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发生。借助这些抽象，具体行动中那些非理性成分就能够被作为“偏差”而看得更清楚。这样，就经验社会学而言，它也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存在的特性要通过面对不存在的东西——理性的抽象——而被认识。然而，这里涉及将逻辑的思想建构用于现实的问题。抽象服务于科学的真理，而将伦理的、政治的和形而上学的建构用于现实则是服务于超科学的（亦即“实用的”）和由研究者主观选择的目的。

此外，韦伯所欲了解的对现实的认知不仅要求在运思过程中排除各种各样的“规范”观念，而且要求掀开某种特定的逻辑面纱，而其他学科如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则有理由使用这种逻辑面纱。这些学科概念的构建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似乎存在着行动着的集体人格。因此，这些学科把诸如国家、民族、社群、股份公司、家庭等等复杂的建构作为单个的人来加以考察。理解社会学则不是这样。它要突破这些逻辑的虚构，以期深入到所有可以理解的现实，深入到一个和若干个单个人具有意义指向的行动。我很快会举

出几个这样的例子。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也可以称作是“理性主义的”和“个体主义的”；然而，如果认为这意味着对个体主义的评价，“那就如同把概念建构中的理性主义特征看成是相信理性动机的主导地位，甚或看成是对理性主义做出积极的评价一样”，二者都同样是误导。理解社会学的方法，只是要不带任何幻想地了解现实的核心。 692

这一点看起来如此简单、不言而喻，甚至索然无味，然而，对众所周知的概念进行适当的重新建构，却具有一场逻辑革命的特征。尤其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的定义在法学界、他的宗教社会学的定义在神学界都非常令人诧异，以至于法学家和神学家们起初也许会感到无所适从。韦伯有意识地消除了诸如正当秩序、法律、协会、统治、权力、国家、民族、教会等等概念中通常带有的价值内涵，从而赋予这些概念以全新的、纯粹逻辑的，因而也自然是出奇地冷漠和缺少激情的意义。尽管韦伯从未要求将这些概念绝对化，但是传统的思维和感受对此仍然很不受用，因为仅仅是这些概念本身的存在，就让人们注意到其他相同的思想建构中那些超科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间接地表明这些思想建构在哪些方面从逻辑上讲并不能服人，也不能将其强加于任何人。此外，在很多人那里，这种对历史建构的逻辑“祛魅”不可避免地会附带产生一种结果，即另一种评估。例如，存在于所有上面提到的社会集合建构之中的现实的核心，“毫无例外地都存在于可能性（Chance）之中，即行动是以某种具有意义的方式发生的，不管这种可能性是源于心理上不可抗拒的观念，还是源于外在现实的强制，抑或是同时源于此二者……从社会学角度看，那些社会集合建构只能构成于以如此方式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为了逻辑地把握实质性的东西（诸如整个社会行动中具有共同性的东西），而在这里把“可能性”这样一个在日常语言中显得模糊的词提高到范畴的高度，那么真的就像韦伯所说的，仿佛是骷髅用那双冰冷的手想要抓住温暖的生活。那些用以把握各种各样“可能性”的特殊内容的其他定义，也让人有这种同样特殊的客观冷静的感觉。例如，“如果一种秩序通过一批专职人员借助施行身体和心理强制的可能性而从外部得到保障，这种秩序就将被称为‘法律’……如果（只要）一个强制性政治实体的行政官员，为了贯彻其规章制度而成功地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这种政治实体就将被称为国家”，如此等等。法律、国家、教会这些似乎同形而上学的观念有着不解之缘，并渗透着客观有效性要求的建构，在这些定义中真正摆脱了这些东西。较之于仅仅排除主观判断（关于某种东西是值得赞同还是值得反对，是值得希冀还是不值得希冀，是好还是坏）而言，价值中立科学的理念似乎通过这些定义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除此之外，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剔除掉的东西，不仅是在所有“规范性”科学中，而且也是在几乎所有历史学中都无法证明的前提条件：经验的有效性（作为心理内容确实对行动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所有价值观念）应当具有超越个人意识的“客观”有效性；经验的有效性构成了一个毫无疑问超越现实的领域，一个理所当然地主宰着现实存在的正确的或“真正 693

的”意义领域。

在他的社会学中，韦伯将这些经验上能够把握、属于客观超现实领域的观念排除在自己对现实的认知之外。尽管如此，各种各样的规范判断和意识形态对他的社会学当然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也就是说，作为现实性，作为一系列具有“价值理性的”（wertrational）重要动机（这些动机存在于几乎所有具有意义取向的行动中，并且常常对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韦伯社会学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探讨由内容决定的具体判断和阐释的因果重要性。不过，从内容上讲，研究者的眼睛始终只是注视着这些动机在经验中的实现，而不是它们也应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在发展自己的概念的过程中，韦伯反复解释了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实际有效性与其作为客观有效性的价值区分开来的。例如，他在支配类型理论中将魅力称为“超凡品质”，这样的措辞本身就表明，至于这种品质作为魅力在具体情形中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这并不属于他的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承认某人是一名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是基于一批准备服从此人的门徒和追随者对于他超凡和超人的品质所做出的主观评判。……至于如何从某种伦理学、美学和其他角度对这里所说的超凡品质客观地做出正确的评判，在这里则完全无所谓。”

方法论的结果就是，不管是“富有狂热尚武魅力的狂暴斗士”，还是军事头领、蛊惑民心的政客，抑或是宗派创建者、先知和救世主都属于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对于日常思维和来自其他学科的思维（这些思维习惯于要求对现实的认识具有客观有效性），这样的结果不仅会显得奇怪，而且会引起反感，并且常常会显得是毫无意义地让人感到幻灭。只有那些深入了解韦伯运思过程的人，才能够理解他为何要对那些渗透着价值的建构进行极端的“祛魅”，并代之以一种新的真实的内涵。韦伯在追求真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清除魔力”。

不过，从对现实进行全新的逻辑处理中，学术圈外的人期待着获得对自己的整个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面对韦伯的思想建构，他也禁不住会问：这对谁有用呢（cui bono）？我能从中获取引导我生活的指南吗？如果不能，他就会感到失望。理解社会学明确地拒绝宣布规范、要求和实际的价值评估，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自然不能满足这种要求，至少不能以“直接的方式”满足。不过，关于韦伯这种思想对实际行动的人所具有的实用价值，我们也许可以从《以政治为业》这篇论文中得出某些结论。这篇文章是在一次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那是在1918—1919年那个爆发革命的冬天，韦伯在慕尼黑给学生作了这个讲演。在这篇文章里，韦伯将自己对政治社会学的认识应用于实际行动的一个重要领域——政治之中，这是一种作为职业的政治，即具体的人的活动形式。酝酿这篇论文的背景是德国的崩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年轻人的那种遇上世纪变革般的兴奋。他们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责任，真心诚实地希望能够成功地建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迥异于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结构，其间充满

着正义和友爱的道德和宗教理想。然而，发生在俄国的事件很快就表明，通向这个世界的道路是漫长的，会遭遇极不人道的经历，而且还不能保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首先，韦伯迫使他的听众不抱任何幻想地认识所有以典型方式决定着政治活动的社会—政治的演进和现象。他讲述了各种国家形式及其历史发展、政治支配的不同类型，提出了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类型，并从历史普遍性的角度出发，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国家所拥有的特殊（虽并非唯一的）手段，在任何时候都是基于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威，政治始终意味着追求享有政治权力。也就是说，谁要从政，谁就是在追求权力，不管他是为了权力本身，还是为了理想的目标，抑或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追求权力。为了获得权力，一个人必要时就会动用他可以使用的物质和心理力量来反对别人。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历史经验进行逻辑梳理而获得的科学论断。不过，在给年轻听众所做的这篇演讲中，韦伯使用这些论断作为立足点，来讨论一个极为重要和具有“存在”意义的问题，即阐明受到年轻人强烈关注的政治和伦理的关系问题。

基督教不仅将战争作为不可避免的恶加以默许，而且在所有国家都极力以福音书的名义来美化战争，甚至激发民族仇恨。宗教信徒们一定会觉得这是误入歧途，痛楚地感到荒谬和不真实。现在，革命又在创造一种相似的悖论。信奉和平主义的共产主义追随者认为，他们有权利通过最邪恶的暴力形式——内战——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有过很多讨论的问题，诸如政治和伦理之间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政治伦理，都成了热门话题。有的人对此加以否认，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必须将应用于其他一切领域的同一种绝对道德应用于政治行动。

696

跟以前一样<sup>①</sup>，韦伯拒绝这一观点，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如此，政治行动绝对不属于与道德无涉的领域。正因为政治的特殊手段是使用暴力，所以需要伦理导向，亦即需要权衡目的和手段，以负责的态度考虑，看看所追求的目的是否有足够的价值为所使用的手段进行辩护，并能够减少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因为政治行动不可避免地与暴力和强制联系在一起，所以，适用于其他领域的道德不适于政治行动，这就好像我们不能制定同一内容的道德戒律来规范人们所涉及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关系。在某种情况下，每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人都会被迫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伤害别人。所以他不能遵从一种绝对的道德规范，尤其不能遵从福音书的道德规范。对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来说，“放弃你所拥有的一切”（《路加福音》，14：33）这种无条件的要求——只要我们不能强迫每一个人都接受它——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分要求。再例如，另一项要求，无条件地将“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而不问一声为什么那个人有权利打自己，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道德”——除非你是圣人。或者，关于爱的道德诫命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336和337页（指德文原著页码，即本译著边码。——译者注）。

说：“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5：39）而适用于政治家的是一个相反的诫命是，要与恶人作对，而且要用暴力与恶人作对，否则你就会对恶行当道承担责任。这是基督教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以及这两种伦理导向的行动之间的分水岭，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二者有很多相通之处。

697

从根本上说，道德行为要么取决于信念，要么取决于责任。作为一种独特的信念伦理（Gesinnunsethik）信奉者，真正的基督徒只是自己“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也就是说，他的良好意愿和他的绝对生命使他的行动变得神圣。上帝命他做事，所以他不问自己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事成也不居功。事情要办砸了，他将此归咎于这个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意旨。作为一种旨在拯救自己和别人心灵的内省生活的表现，这种态度虽然非常了不起，但政治家却遵循不同的法则。政治家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因此需要面对实际存在的现实世界本身，需要面对人们的弱点，甚至利用这些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治家特有的伦理是激情、责任和眼力。激情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不管这事业的主宰是上帝还是魔鬼”；责任作为一种意志，是要冷静和睿智地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并为此承担责任；眼力是指对人和事要保持距离，没有这种距离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重要的是，不管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想要摆脱碌碌无为的诅咒，就始终得对这些目标坚信不疑。不过，政治家事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动机，也取决于自己追随者的动机，而后者大多是鄙俗的。

因此，纯正的目标常常只能通过道德上可疑的手段来实现。所有的暴力中都潜伏着魔鬼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两套法则清楚地表现出它们之间的截然对立。信念伦理的信奉者——从逻辑上讲——谴责一切有使用不道德手段之嫌的行动。相反，政治家必须准备采取这样的行动，从而甘冒自己良心受到谴责的危险。信念伦理的信奉者拒绝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非理性；按照这种非理性，恶果常常出自善，而善果有时也出自恶。政治家必须能够承受这种非理性。“一个人想要奉献于世，可是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愚蠢和鄙俗至极，不值得自己的奉献，只有面对这种情况而确信自己不会动摇的人，才能以政治为‘天职’。”

698

如果说韦伯基于自己的社会学洞见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领域里决定行动的理想力量所具有的二律背反，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二是为了让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之前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这种对存在的各种根本问题不带任何幻想的阐发，对很多人或许意味着又一次新的幻灭——这些人献身事业的能力受由激情煽起的思想影响。而其他不需要这种帮助的人会发现，以“受过训练的冷峻眼光”按其本来面目来看待这个世界，将会使自己更有力量承受它，更有力量胜任这个世界上的日常事务。



# 第 21 章 生命的最后乐章

## 1

工作消耗了韦伯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程度跟他从事教学的头几年不相上下。他留给“生活”的时间所剩无几，但他的工作精力却越来越稳定，睡眠也几乎不靠安眠药维持了。只有政治事件还常常扰乱他心中的平静。三月中旬的卡普政变表明，具有破坏性的势力仍然在国家内部活动，这让他情绪非常激动。难道这帮愚蠢的家伙还要把这场输掉的战争残存的一点东西也毁掉吗？那段时间里，有一次他曾独自哼唱起赫尔韦格（Herwegh）那首古老的《骑兵之歌》：“令人不安的夜晚已经过去，我们静静地策马而行，默默无语，我们正向着毁灭驱驰。”

接着是假期，四月初又是复活节。女士们想要庆祝这个节日，诱使韦伯去了伊尔申豪森（Irschenhausen）的森林边上的那个小木屋，他夏天曾在那里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不过，这次他却非常勉强，原本他是不想出门的。火车上拥挤不堪，令他大为不快：“你们真该让我待在自己的书桌旁。”山里纯净的空气改变了他的心情，他开始有了兴致。春天尚未至，然而，新翻的土地已经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预告着大地上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森林仍然披着褐色的冬装，草地的灰色还没有褪去，然而灌木丛已经绽出新芽，深绿色的龙胆在阳光明媚的山谷中闪烁。他们的目光掠过跌宕起伏的大地，有森林和草地错落其间；伊萨尔河在深深的河床中奔流。这里的地形让我们想起家乡威斯特伐利亚，不过，这里有巍峨的卡文德尔（Karwendel）山脉壮丽的轮廓装点

山前地带。

沐浴着温柔的阳光，他们在一派祥和中度过了几日。尽管时间短暂，他们还是让孩子们找寻复活节彩蛋，让他们晚上围绕着复活节篝火玩耍。他们在外面阳光下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复活节早上，韦伯朗读了不乏深刻内涵的《女武神》（*Die Walküre*）剧本，他们准备在节日的最后一天一起去欣赏这出歌剧。那天下午，外面细雨蒙蒙，他们都闲坐在小木板屋里，讲述着年轻时的往事。外面的世界消失在白雾织成的帷幕后面。韦伯（正像他后来所描述的）顿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就好像是某一部俄国文学作品中的氛围：一种黑黝黝的东西正在逼向拥挤在一处高地上的人们——一个将要吞噬他们的深渊。

《女武神》非常令人赞叹，尽管作品的意义并没有完全从反思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加以表现。韦伯尤其喜欢西格弗里特<sup>①</sup>与预告死亡的女使者之间的心灵较量，后者许诺引领他进入英灵殿，不过那是英雄的天堂，不能带恋人随同前往。而西格蒙德回答女使者说：“关于英灵殿那种短暂的狂喜，你实在是用不着跟我谈起。”



这几天节日过后的那个早上，一条简短的信息带来了韦伯的妹妹莉莉逝世的消息。她还不足四十岁，举止优雅，活泼有生气，自信而心灵绝对高尚，容不得半点瑕疵。在海伦妮所有的孩子中，莉莉的容貌特征与母亲最像：一张细窄的椭圆形脸长得精巧，棱角分明的鼻子显出高贵，雅致的嘴唇约成弧形。在其他很多方面，莉莉又不同于母亲；她尤其缺乏海伦妮那种不可动摇的生命活力，她的命运是不带任何幻想地生活。应付日常生活对她来说常常是一个很重的负担——这一点跟埃米莉·苏谢-法伦斯坦家族中很多女人的命运相似。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她似乎已经在贝格斯特拉塞（Bergstraße）地区坐落在山坡上的那所优美和充满友爱的农村寄宿学校里安顿下来了。在那里，她那几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都很开心，莉莉身边也充满了温暖的友情。她的身心已经投入了丰富的新生活中，年轻人是这个生活的中心。

现在，一次意外的事将她抛入了神秘莫测的深渊！<sup>②</sup>她身后留下了四个年纪尚幼的孩子。这一可怕的打击令人觉得大地都在摇晃。韦伯夫妇立即赶往出事地点海德堡。到那里看到的是一片花的海洋。唉，一家人离别半年后，竟以这样的方式重聚！现在，这几个孤儿该怎么办？韦伯夫妇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是我们的孩子”——这想法完全出乎预料，仿佛源于偶然。朋友们感到这个决定过于仓促，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他

① 这一幕中与女武神布伦希尔德一同出现的不是西格弗里特，而应为西格蒙德。——参见英译注

② 韦伯的妹妹莉莉系自杀，死于煤气中毒。——参见英译注

们提出劝诫：“你们年龄太大，已经完全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任何怀疑和对各种困难的考虑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夫妇俩感到一阵狂喜。如果说莉莉的死动摇了他们生命之树的根底，那么，这个重大决定又把它重新牢牢地植入了大地。坚强的韦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又感到由衷的喜悦。在他看来，做母亲仿佛是玛丽安妮女性命运的最高点，是女性所能得到的真正的满足，而她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这种满足。当然，玛丽安妮不愿听这些。她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在她看来，韦伯就是自己生命中得到的恩赐。韦伯竭力要从妹妹的死亡中寻出意义。在前往奥登瓦尔德寄宿学校的路上，他神秘地说道：“如果一个人在离世之前能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升华，那是非常美妙的。”像黑色的翅膀扑哧一拍，韦伯在玛丽安妮的脑海里闪过。

在海德堡，韦伯接待了所有好友的来访。朋友们发现他非常开诚坦率，非常活跃，异常地温和。他说：“我现在工作起来跟三十年前一样，思如泉涌。”他像朋友们保证，海德堡仍然是他的家，他很快会再来。莉莉和孩子的问题是谈话的焦点。朋友们得到的印象是：“没有任何的命运能够再伤害这个人了。”

随后，他就回慕尼黑去了。他是独自一人走的，因为妻子得去“被占领区”讲演，以支持那里受压迫的妇女，这是前一段时间就安排好的。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义务，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同时她还担心丈夫神经系统的旧病会复发。他的神经过度紧张。另一方面她也知道，他的工作现在也需要他一人独处。然而，在慕尼黑等待着的是政治上的激愤。据说巴伐利亚总理冯·K（Gustav Ritter von Kahr）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暗示，巴伐利亚可能从帝国分离出去。国外的媒体也报道了这则传闻。官方作了正式辟谣，但韦伯和他的政界朋友并不信任这个巴伐利亚人的政策。韦伯拟就了下面一则报刊简讯：

据报道，巴伐利亚总理曾发表过可以构成煽动叛国罪的言论。这些言论遭到了 702  
断然否认，否认之坚决足以让那些讲信誉的人们对事实真相不致存疑。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位总理先生肯定会乐于宣誓保证他没有发表过此类言论。因此我想说，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必定会将那个把这些言论栽赃于总理的人视为下流胚。现在我希望，这位先生至少能公开站出来面对法庭。我之所以做出这项声明，是因为这些言论在法国人那里必定会造成错误的印象，这种印象实际上宜于被他们用来推行自己的计划，坚定他们自己的意向。

1920年4月13日

这则简讯的目的，是要迫使那位假定的冯·K总理诽谤者站出来控告韦伯侮辱其人格，由此彻底弄清事情的原委。然而，报纸拒绝刊登这一挑战，理由是，对那次会议的

一个参加者的讯问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因此诉讼将会以败诉告终。对此韦伯回答说：“如果您给出的理由是真正的理由——对此我并不怀疑——那么，您就不应该让我失望到这步田地（原谅我的措辞）！假如那个下流胚控告我，说我把栽赃冯·K的人称为下流胚，那我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有一刻我曾认为您有政治上的理由。这一点看来是值得讨论的。”不过，现在韦伯还是让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

在那些日子里，对韦伯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避免德意志帝国的分裂。他似乎有意再次超脱一切党派关系。在四月中旬给妹妹克拉拉·莫姆森的信中，有下面一段话：

由于（德国民族）党指望我协助搞“社会化”，而眼下我认为这是瞎闹，所以我决定退党。政治家**必须**妥协，而一个学者则不能**迁就**。你们也应当退出这个德国民族党（Deutsch-Nationale Partei），——“看到你跟这样的人为伍，让我心疼”<sup>①</sup>，看看这个党做了些什么。这里的总理据说谈到过要“从帝国分离出去”，因为那些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害怕斯巴达克团的人。如果帝国瓦解了，那将是这帮人[卡普、吕特维茨（Lüttwitz），我恐怕还得加上鲁登道夫]所为。他们恐怕**不会**被枪毙，也**不会**被送进监狱，而一个没有他们那种“教养”的工人如果做了同样的事情，就难逃这样的下场。

※ ※ ※

现在，韦伯注定得经历一段时间严重的神经衰竭，为他在海德堡期间的极度紧张状态付出代价。他现在意识到了要完全重新安排生活有多么困难。有时候他会担心：自己能做一个父亲吗？去拜访他的朋友看到他的脸色都吓了一跳。他还谈到过一次心肌梗塞：“这部机器不行了。”他说自己曾躺在沙发上，无法工作，脑子里思考着死亡的问题。“谁也说不清死亡是什么——难道死亡是‘母亲带我出来的那个夜的黑暗王国吗’？”然后他有力地挥手作了一个拒绝的手势，充满着对生活的渴望：“现在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我们仍然活着！”随后他的抑郁症逐渐消失了。玛丽安妮当时不在他身边，对他这种糟糕的状况一无所知。他的朋友埃尔泽·雅菲女士这段时间以令人着迷和机智的谈话转移了韦伯的注意力。这之后不久，她对韦伯说：“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触摸过您。”韦伯严肃郑重地回答说：“不错，埃尔泽，正是这样。”一个月夜，韦伯和埃尔泽坐在伊

<sup>①</sup> 韦伯这里借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诗。诗句中玛加蕾特厌恶陪伴浮士德的墨菲斯托，因而对浮士德说了此话。——参见英译注

扎尔河堤的一张长凳上，久久注视着湍急的河流后浪推前浪，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不错，确实是这样，一浪紧跟着一浪；不过，河流却始终是同一条河流。”并不是他这句话的内容，而是他的语气，表明在那一瞬间他仿佛窥透了终极秘密。

到四月底，心灵的震撼平息下去了，时钟又重新平稳地嘀嗒走着。韦伯以全副精力投入了自己的工作。有一次他说，他手头的工作足够自己干上一百年。当他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手抚着论文，透出明显的满足感：“这是第一篇，写得不错。”有时候，他甚至也被吸引去参加社交活动。除了工作，他精力花得最多的是那几个孩子。 704

在慕尼黑，草木也终于开始吐绿了。一株年轻的欧洲山毛榉的褐色树叶在韦伯的窗前摇曳；晚上，韦伯时不时到下面的小花园里歇息。隔着木栅栏，邻居后院的家禽舍的气息有时会飘过来；这让韦伯想到，他们可以去给孩子们弄几只兔子来。两个年纪小点儿的孩子计划很快就要来慕尼黑，他期望看到妻子成为“真正”的母亲。有一次他说：“如果我出点儿什么事，她也不至于太寂寞。”然后他又开始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心孩子们难以适应，担心他们自己的财力不足等等。过去的阴影和现在正出现的麻烦交织在一起，但这并没有压倒他。毋宁说，在这个非常时刻，塑造他生命的一切精神力量全都重新得到升华，奏出了一个完美的和弦，这些力量包括丰富的创造力、政治激情、温馨友谊和忠诚的爱情、准备接受需要承担责任的新的使命、享受生命的细微之处以及酣畅的幽默。

这几周里，韦伯几乎天天都给妻子写信，以减轻她离别的惆怅。他从极度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写下的这些信，以他的其他信件中少有的直接，透出他内心深处的激荡和对生活的深情相拥。同时也反映出他情绪的起伏波动：一方面喜于新近获得的幸福，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精力有限。不过，他一再设法克服了自己精力不足的问题，让玛丽安妮得以安心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里是他的最后这批信件的摘录：

你瞧，一切都没问题。亲爱的，我没找到 K 的地址，把你的地址也弄丢了！“成为父亲并不难”，不过，这之后你会加上一句，“做父亲却很难”。我在将自己吃胖——很快很快地赶在你的其他孩子到来之前让自己吃胖。你是不会同意我这样做的。不过，我也在吸烟，而目的是“戒烟”——这你是同意的。最亲爱的，你怎么样？如果你在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收不到我的只言片语，你会不会很生气？也就是说，现在对你来说，孩子必然要比这个老在“工作”且脾气又坏的“丈夫”重要千百倍。此外一切都好。“此外”？一切都好，除了研究工作之外，什么也没干。工作也会干起来的。必须得干！我亲爱的宝贝儿，会有困难出现，所有那些“挣钱”的事也都不容易。尽管如此，万事却又都“不难”。巴伐利亚看来也会留在 705

德国。

你目前正在开始做母亲，感觉如何？仍然是我享受快乐，你承担重任。你还是那么心胸开阔吗？因为他们所谈及的“狂喜”在第二天就被清醒取代了，这样的清醒也令我感到愉快。这里已经是迷人的春天，晚上有点凉，树叶正在绽开。不过将来孩子们想起奥登瓦尔德寄宿学校来，对这番景象就不会“赞叹不已”了。他们会经历严重的心理困难，一开始会感到很不高兴。这对你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主要的问题是你对付这种情况。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做起来了。怎么样！代我问候你那里所有的人，继续保留对“老爸”马克斯的好感。

这么说来你真的已经到达科隆，并且在烦恼和过度劳累中还“想着4月21日”（韦伯的生日）？这真是太好了。我希望你相信，我也在想着“一些事情”。有几天我感到相当疲劳，不过现在不错。我在做大量的工作，如果能做这么多工作，对我很有好处。每次一想到这荒唐的政治局势或者被勾起对这种局势的思绪，都实在让我恶心。对于讲座课我始终提不起兴趣——快要上课了，不过只剩下两个星期了！我还有大量的校改要做；《宗教社会学》的第一卷已经脱稿，校样已经看完三分之二。你瞧，事情还是有进展的。

啊，你庆贺我生日的来信给我带来了何等的喜悦！令我高兴的还有恩肯多夫（M. L. Enckendorf）的书（不过我现在没时间读）、《达默先生》（*Herr Dahme*）一书和巧克力——我随即就吃掉了。埃尔泽让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个精美的蛋糕，莉丝贝特也烤制了一个。这些都正好适合一个“老爸”的口味。亲爱的，你考虑一下什么时候带孩子们过来。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否应当另找一处住宅。谁知道我们有没有必要保留现在的寓所呢？G对于大城市的顾虑的确很重要。不管怎样，对这件事我们不要操之过急。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这并非不可能——那孩子们在这里的情况就会很糟糕。我倾向于再稍微等一等，大约等到1921年的春天再让他们来这里。这也是你的看法。我正在相当紧张地工作，只是对上讲座课还鼓不起劲。不过这会有所改善的。我现在睡眠又正常了。一度我只能靠服用Nirvanol（一种安眠药）睡觉。前一段我感到有些疲惫，现在又“好起来了”。天天读校样，几乎快要全部完成了，不过我的那堂讲座课还是让我有点发怵。对了，去年夏天，埃尔泽设法在我身上变了各种各样的戏法——这个女魔术师还真有两下子——让我挨过来了。这次她也应该如法炮制，如果这次成功了，那以后就会百试不爽。

亲爱的，我要能见到你做一个真正的母亲，有儿女相依偎，那该多好啊！上天正是为此而让你降生于世的——而不是为了照顾我这么一个粗壮笨拙的人，照顾像我以前那样一个病怏怏的大孩子。不过得小心！还有“挣钱”的事？不错，是得挣钱，不过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挣钱。为此我得去**这里**的一家报社或出版社工作（我对这类工作并无任何异议），而不是做教授。毕竟，这种行政工作我可以干得更好，胜似在讲座课上唠叨，这样的唠叨从来没有让我在精神上得到过满足感。

感谢上帝，这学期要到5月11号才开学。这正合我意，因为近来一直在忙着看校样（足有数公斤重！），而备课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做。我现在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圣灵降临节期间也不得休息。说实话，**严重的神经衰竭**确实发生过，不过现在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所以我能够很冷静地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面对所有的事情；尤其是，如果你和孩子们因为上学的原因（这倒不见的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原因）今年秋天就到这里来，那就更好了。当然，谁也无法让我相信自己天生就是块“做父亲的料”。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我喜欢孩子，不过老天爷知道，我不是个“教育家”——真正让我感到喜悦的，是**你**那颗做母亲的心萌动复苏而透出的美。要紧的是我的**身体**要能撑得住。如果这个夏天过得顺利，对此我就可以放心了……

埃尔泽到这里来了。她坐了下来，拿着一本小书在看，打算稍后在这里吃饭。我现在没有很多时间陪她。我们再次谈到了孩子的问题，这是你要她做的事情。她基本上同意我们的看法，不过也有很深的疑虑。她很“尖锐”地强调了一点，而她在这一点上也许是对的：我确实不能对自己“做出保证”，在身体健康方面（无论如何）做不到，就我的脾气而言也做不到；正如她所说，我也确实可能不是很有资格做“父亲”的人。这一点也需要考虑。最好是你不要在**最近**就做出最后的决定，而是按照你的打算，过一年左右再说……一旦你做出决定，所有的疑虑就会消失。我不会有问题，而后会感到高兴…… 707

莉丝贝特身穿系着小红围裙的“装束”，圆圆的活像一个保龄球。我得承认，她总是高高兴兴，做事心甘情愿。她多次被P主任和夫人邀请去共进**晚餐**，一次同去的还有一位画家，另一次就她一人；她说只是在那里弄弄音乐。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他们的下萨克森背景！这确实非常妙，堪称“民主”了。除此之外，她每隔几天就有一次聚会，或者是在月夜散步——**她**的生活的确很充实；同时我的生活也过得这么好——因为她把我照顾得很好——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我顶住了好天气的诱惑。我又完全恢复了，正常了，眼下做了些摘录，准备了讲座课，因为下星期二就要开学了……花园里和其他地方已是万物苍翠——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晚了，而在此地这算是早的了。我居住的小园子里有一株纤细的紫叶欧洲山毛榉，长得特别诱人。昨天，我应邀去了萨尔茨夫妇家，同去作客的除我之外还有从海德堡来的K博士和埃尔泽。萨尔茨夫妇**遭到驱逐**。我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以阻止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可是“上巴伐利亚州政府”觉得萨尔茨“可疑”。萨莎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对待——她毕竟是一个有自尊的、出色的女性——虽然部里对这件事情还未做出决定，但他们可能会自愿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购置房地产安家。他们的寓所——那是一个宫廷侍臣的住宅，是宁芬堡宫廷（Nymphenburger）的一部分——真是**漂亮极了！**看那些圆形的房间！丁香花正在盛开——现在我面前还插着一束他们给我的白色丁香——宁芬堡公园就在附近。我匆匆朝里望了一眼，只见里面路径荒芜，杂草丛生，不过所有的栗子树上都繁花似锦，但同时很多树还是初春时节的样子，呈褐色，而不是绿色！**我们**的小庭园现在是一派褐、绿之象。桦树和幼小的山毛榉将我们家与邻居隔离开来。爱德华·鲍姆加藤（Eduard Baumgarten）——他对一位不知名的美国人资助的奖学金感到高兴——在这里待了一会儿，同他叔叔奥托就宗教问题谈得很热烈；他将要参加我的研讨课。我的讲座课星期二开始，自然跟以前一样，**两堂**讲座课都在大阶梯教室上；到前天为止，社会主义那门课注册人数几近600人，政治学一课的注册人数也将近400人。又会消耗大量的**体力**。不过，等你过来时，我已经适应了。现在一切进展**顺利**。

这个莉丝贝特，真是“过上流社会生活的人”！常常跟安娜尤其是跟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在一起，或毋宁说是跟霍尔韦格先生在一起，此人同那位政治家一样有情性，耽于幻想，不过似乎喜欢丰满的女性……下萨克森人家中的舞会据说非常美妙。喏！她说，弗丽达只跳过两次舞（她没学过跳舞），至于莉丝贝特跳过多少次，对此她谦虚地保持沉默。不过，每月都有一场舞会，对此她感到非常满足！今天她病了。作为“老爸”，我让她在床上躺下，给她煮了三个鸡蛋，然后自己吃了面包加黄油……

昨天在爆满的大阶梯教室上政治学讲座课（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旁听者”）。今天开始上“社会主义”一课。其他一切均好，不过我现在必须备课了。你在海德堡好好休息一下！不要仓促行事。静下心来同格鲁勒和雅斯贝尔斯谈一谈。圣灵降临节无法旅行，因此在圣灵降临节那个周末等你来。届时我的课也备好了，我们可以有一天时间“休息”一下，同你这个做母亲的人“好好聊聊”。我上讲座课前是



不是有点怯场呢？我有点恶心的感觉，假如我**不能够**上课，那关系到上千马克。这毕竟也是一笔收入……

今天上了政治学课，这是第二堂课，仍然有很多人听课——课上得“还行”。接下来我可以休息两天，然后一周要上六个小时的讲座课，此外还有一个小时的研讨课。我有点好奇。不过情况还不错。只是我花了很多钱买**食物**！给可怜的孩子还能留下多少钱呢？我们的工资大约跟一个锁匠差不多（每小时六马克）……这么说，你现在要在卡尔斯鲁厄发言了。完了就此**打住**吧！然后要**休息**，圣灵降临节休息期间会会亲戚朋友。迄今为止，我这里的情况不错，这是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埃尔泽让我能够转移一下注意力。这种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闲聊**颇有益处**。不过现在不行了。圣灵降临节我得“拼命”干活。这里右翼的政治活动很猖獗，在学生中亦是如此……耶尔格·冯·卡费尔想要把左翼学生组织起来。我不想参与此事。

昨天上了一堂讲座课，加上一堂很活跃的研讨课，一共三个小时，所以我没有写信。现在是休息。天气不好。当然有无数的校样得完成！不错，以后我们的收入**肯定**会不如今年。一旦聘了第三位正教授，我上讲座课最多只能指望有一千马克的收入——**至多不过**！要不然，我就得去教挣钱的讲座课——让人恶心——我也教不了……你觉得托布勒会来吗？她倒是想来，不过我没有多少时间招待任何人。在圣灵降临周我得着实干工作。不过在那期间倒也可以。我给她的信里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709



五月的最后一天，圣灵降临节后的那个星期六，玛丽安妮终于回来了。初夏灿烂的阳光洒遍了大街小巷，这座城市第一次让她有了家乡的感觉。回到家里，她心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激之情。韦伯手持玫瑰迎接她；他看上去不错，兴高采烈，心情开朗。让他有些发怵的头几节讲座课已经上下来了，尤其是他的社会学范畴理论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令他满意：“等我老了，恐怕就不会再有这样敏锐的概念性思维了。当然，对此人们会摇头，一开始不知道如何理解它。”

韦伯夫妇花了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促膝相谈。玛丽安妮考虑之后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把孩子们接过来，等到他们找到一个更大的住宅，并且她自己在妇女运动中卸任以后。还有，她从韦伯的信中看出，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履行自己的专业职责的同时承担起做父亲的义务。起初韦伯显得有点失望，他想要有这种新的体验，而后他或许又感到松了一口气。傍晚时分，韦伯夫妇去了英国公园，在一片新绿丛中散步。一切

都充满了欢乐。湖面上倒映着蔚蓝的天空，将这倒影作为一颗微微泛光的蛋白石镶嵌在黝黑的大地上。他们在海滨路和伊萨尔河支流相交之处驻足停留，心里想着，那尚未开垦、绿草覆盖的河岸斜坡上——坡上一只白山羊正在守护着她的孩子们——会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好地方。

710 那天晚上，天气骤变。第二天下起雨来，天气恶劣而阴冷。下午，韦伯夫妇在邻居家饮了茶。晚上，作为特别款待，韦伯给妻子读了雅姆（Francis Jammes）的《兔子传奇》（*Hasenroman*）中的段落，这本书是韦伯送给妻子的圣灵降临节礼物。他喜欢那个情感真挚的圣·弗朗西斯和那些跟他一起走向死亡的动物。尤其打动他的是，那只兔子——它是唯一没有经历过死亡就跟着溜进了动物天堂的动物——在天堂并不幸福。它渴望回到自己挚爱的下界，尽管这里充满动荡、危险和恐惧。朗读过程中，韦伯的声音稍稍有点浑浊。第二天早上，他的嗓音变得有些沙哑了。始终有些担惊受怕的妻子恳求他取消当天的讲座课，但他坚决地拒绝了。讲课期间，他克服了嗓音沙哑的困难。妻子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该不会是他上的最后一课了吧！”这样的症状持续了三天。星期四是圣体节，学校放假，韦伯很高兴有这么一天假。天气又暖和起来了。晚上，他们夫妇同一位女性朋友坐在小庭园里闲聊畅谈。

第二天早上，韦伯病倒了。头天夜里他受到寒热侵袭——这是流感吗？讲座课被取消了。他发了高烧。可是医生除了支气管炎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什么问题，说是上讲座课时费力讲话可能让喉咙感染扩散到了支气管。“完全没必要担心。”帝国议会新选举定在6月6日，星期天。这次选举很重要，因为民主制度正处于危险境地。医生认为，韦伯出去参加选举并没有什么妨碍。但他自己并没有想要去。他觉得有些昏昏沉沉，迷糊着躺在床上。他不想谈论政治，因为政治局势太令人不快。他持续高烧，医生说，这比体温上下起伏要好。

从患病的第二个星期开始，韦伯便处于欣快状态——充满着爱和带有欣喜的感激。他觉得每一杯牛奶、每一个草莓都美味可口。不过这个学期可能会泡汤了，讲座课的讲课费也不得不退还给学校。尤其是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让其获得学位是当务之急，不能再拖延下去了。韦伯想让这个博士生的考试在自己的病榻旁进行。后来院长让人告诉韦伯，说他的同事将会替代他，这才让他如释重负。6月7日，星期一，韦伯同他的一711 位女性朋友（埃尔泽）谈及将要出版的书要题献给谁，他想把一本书献给海伦妮，另一本献给玛丽安妮，要让他妻子感到惊喜。

星期三，韦伯开始处于轻度的谵妄状态，出现了起初并没有被觉察的幻觉。他讲述了各种各样从未经历过的奇遇，透出迷人和可爱的神情。星期四早上，医生到来的时候，韦伯吐字清晰地高声唱起费加罗的咏叹调“你想要跳舞，我的小伯爵”，以表明他完全没有病。不过，有人听见他后来又唱起了另一首歌：“在绿色的荒野上为我挖一个

小小的坟墓。”他说：“下星期我又要回去上课了。只是我的心跳得这么慢，脑子这么小。”据他说，在他患神经性疾病的时候，有一次他也是这样躺着，审视着墙纸上的图案。“不过那时候，我仍然能够思维，同可爱的上帝进行了较量。他不能用这样的疾病来让我对他感到敬畏。噢，假如这次我真的得了肺炎，那我就该对我的一生做个总结了。”他有没有感到后悔，有没有负疚感呢？他想了想，然后断然说道：“没有。”

病人现在咳嗽很厉害，医生终于诊断是深度肺炎。谵妄症状更加严重了。临终前两天的夜晚，他误以为自己的学生就在床边，对他进行了考核，以一种感人的语调称赞他。他对学术和人情世故都非常关心。有时候他用几种不同的语言辩论，显然是在同敌人进行政治交锋。不过，尽管处于昏昏沉沉的深度模糊状态中，他仍然能够辨认出身边所有的人，并赠他们以亲切可爱的话语。他已不再能控制自己饱受折磨的病体，不再能控制已经迷离的精神，但他仍然是他自己。他仍然那么伟大，不仅伟大，还那么优雅，那么富有幽默感。

他并没有抵抗那股黑暗的力量。他多次委婉地作过告别。有一次，他（显然是针对自己尚未完成的著述）以绝对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现在这些对我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另一次，他仿佛带着冷静的期待语气说：“我们会看到现在病情会如何发展。”弥留之夜，他提到加图的名字，声音带着深奥的神秘感：“真理就是真理。”人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将他从死神那儿拉回来。他耐心地忍受着一切，然后说道：“唉，孩子们，别再费事了，反正也无济于事。”他的心脏已经不能够再承受高烧了。

712

6月14日，星期一，外面的世界一片静寂，只有一只鸫鸟在不停地唱着思慕的歌。时间停滞了。傍晚时分，韦伯完成了最后一次呼吸。就在他辞世的时候，一场雷阵雨袭来，一道闪电划过他苍白的头颅，将他定格成了一幅辞世骑士的画像。然后他在无法洞悉的神秘之中庄严地安息了。他的面庞透出祥和，道着崇高的别离。他已经去了那遥不可及的地方。世界改变了。

# 书中提到的韦伯著作索引

马克斯·韦伯-舍费尔 (Max Weber-Schäfer) 编制

[索引页码为德文原著页码, 即本书边码]

索引中文章在通常使用的韦伯文集出的出处在括号里标出。下表左边为这些文集的缩写。

- PolSchr 《政治论文集》*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3. Aufl. Tübingen 1971 und folgende.
- RelSoz I 《宗教社会论文集 I》*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d. I, 1. Aufl. Tübingen 1920 und folgende.
- RelSoz II 《宗教社会论文集 II》*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d. II, 1. Aufl. Tübingen 1921 und folgende.
- RelSoz III 《宗教社会论文集 III》*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d. III, 1. Aufl. Tübingen 1921 und folgende.
- SozuSozPol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Tübingen 1924
- SozuWiG 《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1924
- WissLe 《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3. Aufl. Tübingen 1968 und folgende.
- UTB 122 《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Die rational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Musik* Uni-Taschenbücher Nr. 122 Tübingen 1972
- WuG 《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ß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5. Auflage, 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1976

《中世纪贸易商社史》*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Nach

- südeuropäischen Quellen*. Stuttgart: 1889. (SozuWiG S. 312 - 443) 120
- 《罗马农业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意义》“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 Stuttgart: 1891. 121 - 122
- 《德国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的状况》*Die Lage der Landarbeiter im ostelbischen Deutschland*.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Leipzig: 1892. 136
- 《农业劳动法》“Die ländliche Arbeitsverfassung.” In: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Leipzig: 1893, S. 62 - 86. (SozuWiG S. 444 - 469) 136
- 《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Entwicklungstendenzen in der Lage der ostelbischen Landarbeiter.” In: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7. Band, 1894, S. 1 - 41. (SozuWiG S. 470 - 507)
- 《为格尔辩护》“Zur Rechtfertigung Göhres.” In: *Die Christliche Welt*. 6. Jg., 1892, Sp. 1104 - 1109. 141
- 《德国的农业工人》“Die deutschen Landarbeiter.” In: *Verhandlungen des 5. Evangelisch-sozialen Kongresses zu Frankfurt*, Berlin, 1894, S. 61 - 82. 144
- 《交易所 I-II》“Die Börse. I. und II.” In: *Göttinger Arbeiterbibliothek*, 1. Band, 1894, S. 17 - 48 und 2. Band, 1896, S. 48 - 80. (SozuSozPol S. 256 - 322) 209 (*Eine Börsen- und Bankfibel für 10 Pfennige*)
- 《德国交易所调查结果》“Di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Börsenenquete.” In: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Handelsrecht*, 43. Band S. 83 - 219 u. S. 457 - 514, 1895; 44. Band S. 29 - 74, 1896; 45. Band S. 69 - 156, 1896. 208
- 《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Akademische Antrittsrede, Freiburg 1895. (PolSchr S. 1 - 25) 214, 229 - 231, 320
- 《施图姆男爵的论战方式》“Die Kampfweise des Freiherrn von Stumm.” In: *Neue Preussische (Kreuz-) Zeitung* Nr. 96 v. 26. 2. 1895 und 119 v. 12. 3. 1895. 231
- 《罗舍尔和科尼斯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问题》“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I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I. 27. Jg. S. 1 - 41, 1903; II. 29. Jg. S. 89 - 150, 1905; III. 30. Jg. S. 81 - 120, 1906. (WissLe S. 3 - 138) 272, 291, 319 - 321, 324, 340
- 《引言》“Geleitwort” (雅菲于 1903 年买下了由布劳恩出版的《社会立法与统计文库》杂志, 将其改名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 由韦伯、佐姆巴特和雅菲任主编。此文是韦伯为改版后的杂志首期写的引言。)(der Herausgeber zum Übergang des *Archivs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auf die neuen Herausgeber Werner Som-

- bart, Max Weber und Edgar Jaffé) .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 Band, 1904, S. 1 - 7. 290
-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 Band, 1904, S. 22 - 87. (WissLe S. 146 - 214) 291
- 《从农业统计和社会政策观点看普鲁士信托遗赠问题》“Agrarstatistische und sozial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zur Fideikommissfrage in Preußen.”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 Band, 1904, S. 503 - 574. (SozuSozPol S. 323 - 393) 341 - 342
- 《古代农业状况》“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 Auflage, 1. Band, Jena; 1909, S. 52 - 188. (SozuWiG S. 1 - 288) 343 - 344, 371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0. Band, 1904, S. 1 - 54 und 21. Band, 1905, S. 1 - 110. (RelSoz IS. 17 - 206) 340, 350 - 357, 359, 676, 677
-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势》，《俄国向伪君主立宪制的过渡》“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ßland, und Rußlands Übergang zum 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2. Band, 1906, S. 234 - 353 und 23. Band, 1906, S. 165 - 401. (PolSchr S. 33 - 111) 342 - 343
- 《施塔姆勒对唯物史观的“克服”》“R. Stammers ‘überwindung’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4. Band, 1907, S. 94 - 151. (WissLe S. 291 - 359) 369
- 《调查报告：选择与适应——统一的大工业中工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命运》“Erhebung über Auslese und Anpassung (Berufswahl und Berufsschicksal) der Arbeiterschaft der geschlossenen Großindustrie.” Altenburg; 1908. (SozuSozPol S. 1 - 60) 344
- 《论工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学》“Zur Psychophysik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7. Band, 1908, S. 730 - 770; 28. Band, 1909, S. 219 - 277 u. 719 - 761 und 29. Band, 1909, S. 513 - 542. (SozuSozPol S. 61 - 255) 345, 397 - 398
- 《德国社会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和讨论发言》“Beiträge zum Ersten Deutschen Soziologentag.” In: *Verhandlungen des Ersten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vom 19. - 22. Oktober 1910 in Frankfurt a. M., Tübingen; 1911, ‘Geschäftsbericht und Diskussionsbeiträge’* (SozuSozPol S. 431 - 477) 427 - 428
- 《社会学和经济学“价值中立”的意义》“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ologischen

- und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 In: *Log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7. Band, 1917, S. 40 – 88. (WissLe S. 489 – 540) 329 – 337, 423
- 《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 Vortrag vor dem Freistudentischen Bund. München, 1919. (WissLe S. 582 – 613) 329 – 337, 675
- 《社会经济学概论》序言 “Vorwort zu: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I. Abteilung,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S. 7 – 9, Tübingen, 1914. 423 – 425
-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宗教社会学提纲》“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Religionssoziologische Skizzen.”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1. Band, 1915; Einleitung, Der Konfuzianismus I. u. II. S. 1 – 87. Der Konfuzianismus III. u. IV. , Zwischenbetrachtung. Stufen und Richtungen der religiösen Weltablehnung. S. 335 – 421. (RelSoz I 237 – 573 u. RelSoz II 1 – 378) 346 – 350, 561
-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和目前情势》“Bismarcks Außenpolitik und die Gegenwart.” (I. Dreibund und Westmächte. II. Deutschland und Rußland. ) In: *Frankfurter Zeitung*, 60. Jg. 25. 12. 1915. (PolSchr S. 112 – 129) 564
- 《缔结和约问题》“Zur Frage des Friedensschließens.” ca. 1915/16. (PolSchr S. 130 – 141) 562 – 563
- 《关于潜艇战升级的备忘录》“Der verschärfte U – Boot – Krieg. Denkschrift”. März 1916. (PolSchr S. 146 – 154) 573 – 574
- 《德国议会制的过去与未来》“Deutscher Parlamentarismus i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I. Die Erbschaft Bismarcks. II. Beamtenherrschaft und politisches Führertum. III. Verwaltungsöffentlichkeit und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 In: *Frankfurter Zeitung* 61. Jg. 27. 5, 9. 6, 10. 6. u. 24. 6. 1917. Später als Buch: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 In der Reihe: *Die innere Politik*, München, 1918. (PolSchr S. 306 – 443) 594 – 599, 652
- 《关于“战争罪责”问题》“Zum Thema der ‘Kriegsschuld’ .” In: *Frankfurter Zeitung* v. 17. 1. 1919. (PolSchr s. 488 – 497) 657
- 《以政治为业》“Politik als Beruf.” Vortrag vor dem Freistudentischen Bund. München, 1919. (PolSchr s. 505 – 560) 675, 694 – 698
- 《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Die rational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Musik*. München, 1921. (大约写于 1911 年) (UTB 122) 349, 677
-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古典犹太教》“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Das antike Judentum.”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4. Band, 1917/18, S. 52 – 138, 349 – 443, 601 – 626 und 46. Band, 1919, S. 40 – 113, 311 – 366, 541 –

604. (RelSoz III S. 1 - 400) 604 - 606

《停战与和平》“Waffenstillstand und Frieden.” In: *Frankfurter Zeitung* v. 27. 10. 1918.

(PolSchr S. 447) 637 - 638

《未来的德国政体》“Deutschlands künftige Staatsform.” In: Zur deutschen Revolution,

Flugschrift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1919. (PolSchr S. 448 - 483) 645, 649 - 651

《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III. Abteilung,

Tübingen: 1921 (WuG) 425, 687 - 694, 709



# 马克斯·韦伯年表

马克斯·韦伯的逗留地点及旅行行止并书中页码  
(索引页码为德文原著页码, 即本书边码) 马克斯·韦伯-舍费尔编制

1864	4月21日	马克斯·韦伯出生于埃尔富特	33
1869		韦伯家从埃尔富特迁居柏林夏洛腾堡	35
1870	夏	探访在海德堡的外祖父法伦斯坦家宅	42
1878	夏	随父亲和弟弟阿尔弗雷德去图林根和莱茵河畔旅行	44~48
1882	春	开始在海德堡上大学	69
	圣灵降临节	前往斯特拉斯堡探访鲍姆加藤一家	72
1882/1883	冬	活跃于海德堡的“阿雷曼人”学生社团	73~75
1883/1884		作为“一年兵”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	75~85
1884/1885	冬	在柏林继续学业	100 ff
1885	春	在斯特拉斯堡接受军官训练	82~83
1885/1886	冬	在哥廷根完成学业	113 ff
1886—1893		住在柏林夏洛腾堡父母家	120 ff
1888		在波兹南和施里姆接受军训	155~158
1892	秋	去德国南部一个疗养院探望埃米·鲍姆加藤	187
	秋	与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订婚后前往斯特拉斯堡看望伊达·鲍姆加藤	191
1893	秋	在奥灵豪森举行婚礼, 搬入自己柏林的新居	203
1894	春	在波兹南接受军训	204~205
	秋	迁居弗赖堡	213
1895	秋	游历伦敦、苏格兰和爱尔兰	218~228
1896	11月	前往埃尔富特参加民族社会协会成立大会	233~234
1897	1月	前往萨尔布吕肯讲演	236

	夏	迁居海德堡接替科尼斯的教席	239 ff
	秋	西班牙旅行	246
1898	春	日内瓦湖（格里昂）旅行	247~248
	夏、秋	康斯坦茨疗养院	248
1899	夏	去艾伯湖并从那里取道费恩隘口去威尼斯	248
1900	7月	因病放弃海德堡的家	255/256
	7—11月	在乌拉赫一所疗养院疗养	256~259
	11月—1901年 3月	逗留于法国阿雅克肖	259~261
1901	3—4月	逗留于罗马	260
	4—5月	索伦托，那不勒斯	262
	5—6月	罗马	263
	7—9月	瑞士的格林德瓦尔德和策尔马特	265
	10—1902年 3月	罗马	264~268
1902	3—4月	佛罗伦萨	270
	4月20日	38周岁生日那天回到海德堡	270
	7月	前往柏林夏洛腾堡参加妹妹莉莉的婚礼	271/272
1903	1月	前往直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奈尔维）旅行	274, 281
	3月	前往罗马	275, 281
	6—8月	荷兰的斯赫维宁根，奥斯坦德	281~286
	9月	汉堡，赫耳果兰岛	279, 281
	10月	荷兰	281~286
1904	8—12月	赴美，去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做学术讲演），周游美国	292~317
1906	春	在海德堡乔迁新居	362
	10—11月	游西西里岛（巴勒莫）	364~366
		前往都灵（看望罗伯特·米歇尔斯）	368
1907	春	意大利的科莫湖畔	369
	夏	荷兰	370
	秋	住在奥灵豪森亲戚家	370
1908	春	意大利里维埃拉	387~389
		前往佛罗伦萨	389~391

	秋	赴奥灵豪森	397~401
1909	春	在南方	418
	夏	黑森林(鲁斯坦)	418/419
	秋	维也纳(参加社会政策协会年会)、莱比锡	419/420
1910	1月	前往柏林(参加社会政策协会召开的理事会)	425
	4月	意大利(莱里奇)	487
	春	搬进在海德堡的外祖父母的老宅	457~460
	夏	游英格兰	502~504
1911	1月	柏林	504
	春	旅行:意大利的沃韦、都灵(看望罗伯特·米歇尔斯)和里维埃拉(阿拉西奥)	488~490
	夏	游慕尼黑和巴黎	506~509
1912	春	法国普罗旺斯	490~494
	夏	游拜罗伊特(和巴伐利亚)	509~510
1913	春	瑞士的提契诺(阿斯科纳)	494~498
	秋	游览意大利(阿西西、锡耶纳、佩鲁贾和罗马)	510~512
1914	春	瑞士的提契诺(阿斯科纳和苏黎世)	494~500
1915	秋	布鲁塞尔之行	544
	冬	柏林	564/565
1916	春	(与妹妹莉莉一起)前往东普鲁士	542/543
	2—5月	柏林	570ff
	5/6月	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行	582~584
	夏	游博登湖	585
	秋	前往慕尼黑讲演(19年后第一次公开讲演)	590
1917	夏	奥灵豪森	607
	5—10月	参加图林根的劳恩斯滕堡会议(会后去了施瓦茨堡)	608~612
	10月	于维也纳商谈在维也纳大学就职事宜	615~616
1918	夏	维也纳大学授课	617~627
	9月	在奥灵豪森庆祝银婚	627~628
	11月	在慕尼黑作政治讲演	638~641
	11—12月	为《法兰克福》提供咨询	645~649

	冬	在威斯巴登、哈瑙、海德堡、法兰克福、卡尔 斯鲁厄和菲尔特讲演	653~654
1919	3月	柏林（为去凡尔赛和谈作准备）	660~662
	5月	前往凡尔赛（和谈会议），在柏林（跟鲁登道夫 交谈）	663~668
	6月	在沃尔夫拉茨豪森恢复精力，迁居慕尼黑	670~673
	秋	告别海德堡	679
1920	复活节	伊尔申豪森	699
	4月	赶往海德堡参加妹妹的葬礼	701
	6月	韦伯在慕尼黑逝世	712

# 人名缩写和真实姓名密钥

马克斯·韦伯-舍费尔编制

(玛丽安妮的《马克斯·韦伯传》1926年发表时，大多数当事人都还活着，作者使用人名缩写很多时候旨在将当时不便披露的真名隐去。)

原文页码	姓名缩写	真实姓名 (参见人名索引)
25	“G.”	格维努斯 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02	“Sch.”	舍尔哈斯 Schellhass, Karl
140	克雷默 (Kremer)	克雷默 Cremer, Hermann
152 - 153 u. 161 - 163	“V.”, 青年神学家 (junger Theologe)	弗格特 Voigt
192	多拉 (Dora)	施洛菲尔 Schloffer, Frieda
210	商务枢密顾问 (Geh. Kommerzienrat X.)	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 Mendelssohn-Bartholdy, Ernst von
221	“G.”	吉尔克 Gierke, Otto von
231	“H.”	哈默施泰因 Hammerstein, Wilhelm von
258 - 262	奥托 (Otto)	贝内克 Benecke, Otto
265 - 267	“R.”	拉特根 Rathgen, Karl
	“Sch.”	舍尔哈斯 Schellhass, Karl
	H. 博士 (Dr. H.)	哈勒尔 Haller, Johannes
270	“D.”	德尔布吕克 Delbrück, Hans
284	“R.”	伦勃朗 Rembrandt van Rijn
309 - 343	弗里茨大叔 (Onkel Fritz)	米勒 Miller, Francis
	吉姆 (Jim)	米勒 Miller, James
	杰夫 (Jeff)	米勒 Miller, Jefferson
	贝蒂 (Betty)	罗蕾 Rawley, Elisabeth
376 - 385	X. 博士 (Dr. X.), 弗洛伊德门生	格罗斯 Gross, Otto

- (Freudjünger) “K” 弗里克 Frick, Ernst  
 K. 的女友 (K. s Freundin) 格罗斯 Gross, Frieda  
 395 - 96 “X. ”, X. 事件 (Fall X. ) 伯哈恩德 Bernhard, Ludwig  
 政治杂志编辑 (Herausgeber einer 德尔布吕克 Delbrück, Hans  
 pol. Zeitschrift. ), 先生 (Herr …)  
 411 “v. H. u. d. L. ” 海德勃兰特 Heydebrand und der Lasa,  
 Ernst von  
 “D. ” 德尔布吕克 Delbrück, Hans  
 412 “Sch. ” 施密特 Schmidt, Richard  
 413 - 417 H. S. 博士 (Dr. H. S. ), S. 博 西蒙 Simon, Heinrich  
 士 S. 博士 (Dr. S. )  
 “S. M. ” 威廉二世 (Seine Majestät) Wilhelm II.  
 “F. ”, 副校长 (Prorektor) 法布里齐乌斯 Fabricius, Ernst  
 429 - 30 “G. ” 戈尔德沙伊特 Goldscheid, Rudolf  
 436 - 445 B. 事件 (Fall B. ) 伯哈恩德 Bernhard, Ludwig  
 R. 博士 (Dr. R. ) 鲁格 Ruge, Arnold  
 某教授 (Prof. N. N. ) 科赫 Koch, Adolf  
 446 - 453 Sch. 手册 “Sch. (sches Hand- 舍恩贝格 Schönberg, Gustav von  
 buch)”  
 “Z. ” 哈姆斯 Harms, Bernhard  
 “B. ” 鲍姆加藤 Baumgarten, Otto  
 467 - 68 “R. B. ” 博尔夏特 Borchardt, Rudolf  
 494 - 502 弗洛伊德门生 (Freudjünger), 格罗斯 Gross, Otto  
 “X”, X. 博士 (Dr. X. )  
 多拉 (Dora) 格罗斯 Gross, Frieda  
 多拉的朋友 (Doras Freund), 卡 弗里克弗里克 Frick, Ernst  
 尔 (Karl), 无政府主义者 (der  
 Anarchist)  
 女伯爵 (Gräfin) 雷纹特洛 Reventlow, Franziska Gräfin zu  
 托布勒 (Tobelchen) 托布勒 Tobler, Mina  
 X. 教授 (Prof. X. ) 格罗斯 Gross, Hanns  
 532 “ Sch. ” 施内甘斯 Schneegans, Heinrich  
 教授朋友 (befreundeter Profes- 特勒尔奇 Troeltsch, Ernst  
 sor)  
 540 玛尔塔 (Martha) 里格尔 Riegel, Martha  
 565 “S. ” 泽林 Sering, Max

574	同事 L (Kollege L.)	莱菲 Levy, Hermann
575	“Sch.”	席费尔 Schiffer
576	“S. M.”	威廉二世 (Seine Majestät) Wilhelm II., Kaiser
585	“D. Sch.”	舍费尔 Schäfer, Dietrich
590	H. 博士 (Dr. H.)	豪斯曼 Haussmann, Conrad
614	G. 教授 (Prof. G.)	戈尔德斯泰因 Goldstein, Professor
637	“H”	黑尔德 Held, Heinrich
658	特雷夫利安 (Trevelylian)	特雷夫利安 Trevelyan, Charles Philips
701	“v. K.”	卡尔 Kahr, Gustav Ritter von
708	“G.”	格鲁勒 Gruhle, Hans Walter

# 人名索引·注释

马克斯·韦伯-舍费尔编制

[索引页码为德文原著页码，译文中在页边标出。页码后面引号里的缩写是该人名在正文中出现的形式。方括号里的内容由译者所加，用于指出正文中的人名拼写错误和使用的人名变体。]

## A

阿恩斯佩格尔 Arnspenger [正文中误作 Arnsberger (阿恩斯贝格尔)], Paul。巴登州内政部处长 (1900)。254, 255

阿尔科-瓦雷 Arco-Valley, Anton Graf von, 1897—1947。库尔特·艾斯纳的谋杀者。684, 685

阿尔特霍夫 Althoff, Friedrich, 1839—1908。普鲁士文化部高教局局长 (1897—1907)。174, 179, 211f, 433

阿尔特曼 Altmann, S. P., 1876—1931。国民经济学教授。476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267

阿列克西斯 Alexis, Willibald, 1798—1871。作家。52

埃茨贝格尔 Erzberger, Matthias, 1875—1921。政治家。601, 646, 668

埃德曼斯多夫 Erdmannsdorfer, Bernhard, 1833—1901。历史学教授。70, 239

埃格尔斯 Eggers, Fritz。出入于韦伯父母家的朋友。521

埃吉迪 Aegidi [正文中误作 Aegidy], Ludwig Karl, 1825—1901。国民经济学家教授。42, 102

埃克 Eck, Ernst W. E., 1838—1901。法学教授。179

艾伯特 Ebert, Friedrich, 1871—1925。魏玛共和国总统 (1919—1925)。646, 651

艾克塞洛德 Axelrod [正文中误作 Axelrot (艾克塞洛特)], Tobia, 生于 1887 年。1919 年慕尼黑苏维埃政府成员。672



- 艾斯纳 Eisner, Kurt, 1867—1919。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总理。646, 671, 684
- 爱德华七世 Edward VII., 1841—1910。英国国王 (1901—1910)。402
- 安德烈耶夫 Andrejew, Leonid, 1871—1919。俄国作家。380
- 安德里安-维尔本 Andrian-Werbung [正文中写作 Andrian], Leopold Freiherr von, 1875—1951。奥地利作家。495
- 安娜 Anna, 韦伯家女佣莉斯贝特的女友。694
- 安赛尔 Anseele, Edouard, 1876—1938。比利时工人领袖。286
- 安佐尔格 Ansoerge, Conrad, 1862—1930。德国作曲家。505
- 昂肯 Oncken, Hermann, 1869—1945。历史学家。122, 123, 418, 629, 632, 637, 659
- 奥登巴内佛 Oldenbarneveldt, Jan van, 1547—1619。荷兰政治家。288
- 奥尔登贝格 Oldenberg, Karl, 1866—1936。编辑、政治学家。157
- 奥芬巴赫 Offenbach, Jacques, 1819—1880。作曲家。506
- 奥伊伦堡 Eulenburg, Franz, 1867—1943。国民经济学教授。419, 420, 565

## B

- 巴尔 Bar, Karl Ludwig von, 1836—1913。刑法学教授。114, 115
- 巴尔特 Barth, Theodor, 1849—1909。自由思想党和自由思想联合会政治家。406
- 巴赫 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作曲家。509
- 巴克爾 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英国文化史学家。76
- 巴姆贝格尔 Bamberger, 1823—1899。德国政治家。123
- 巴瑟尔曼 Bassermann, Ernst, 1854—1917。自由派政治家。410
- 柏拉图 Plato。71
- 拜斯特 Baist, Karl Gottfried, 1853—1920。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教授。217, 270
- 班扬 Bunyan, John, 1628—1688。英国宗教书籍作家。354
- 保尔森 Paulsen, Friedrich, 1846—1908。哲学家、作家。198
- 鲍姆 Baum, Marie, 1874—1964。争取妇女权益活动家、作家。373
- 鲍姆加藤 (爱德华) Baumgarten, Eduard, 1898—1982。奥托·鲍姆加藤的侄子。707
- 鲍姆加藤 (埃米) Baumgarten, Emmy, 1865—1946。韦伯的表妹。99f, 154, 170ff, 187, 192ff, 197
- 鲍姆加藤 (弗里茨) Baumgarten, Fritz, 1865—1913。语文学者, 韦伯的表弟。51f, 61, 64, 84, 216
- 鲍姆加藤 (赫尔曼) Baumgarten, Hermann, 1825—1893。韦伯的姨父。18, 23, 29, 46, 76, 83—97, 99, 122, 124, 127, 131, 133, 173, 175, 270
- 鲍姆加藤 (伊达) Baumgarten, Ida, (婚前姓“法伦斯坦”)。赫尔曼·鲍姆加藤的妻子。

- 18, 30-32, 51, 61, 75, 84, 87-90, 92, 97, 99, 101, 133, 149, 170, 190, 191, 216, 270, 682
- 鲍姆加藤（奥托）Baumgarten, Otto, 1858—1934。韦伯的表兄、神学教授。18, 71, 72, 73, 84, 89, 98, 100, 102, 121, 133, 140, 142, 147, 148, 150-1, 176, 201, 223, 235, 451 “B.”, 682, 707
- 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on, 1770—1827。作曲家。504, 509
- 贝尔塔 Bert (h) a, 韦伯家女佣。217, 252, 461, 462
- 贝克 Becker, Carl Heinrich, 1876—1933。东方学家、普鲁士文化部长（1925—1930）。657
- 贝克尔 Bekker, Ernst Immanuel, 1817—1916。罗马法教授。69, 239, 240
- 贝克斯特 Baxter, Richard, 1615—1691。英国清教教会领袖。354, 356
- 贝内克（埃米莉）Benecke, Emilie,（婚前姓“法伦斯坦”），1864—1922。韦伯的姨母。75, 84, 192, 681
- 贝内克（恩斯特·威廉）Benecke, Ernst Wilhelm, 1838—1917。地质学教授。18, 75, 83, 458, 681
- 贝内克（奥托）Benecke, Otto, 1879—1903。韦伯的表弟。258-262 “Otto”
- 贝尼希森 Bennigsen, Rudolf von, 1824—1902。汉诺威政治家。41, 122-125
- 贝塞勒 Beseler, Georg, 1809—1888。民法学教授。102
- 贝特曼-霍尔韦格 Bethmann-Hollweg, Theobald von, 1856—1921。德意志帝国首相（1909—17）。410, 573, 75-578, 584, 588, 602, 610, 634, 660, 663, 708
- 贝希 Bessie, Aunt。（“贝希大婶”）美国一俱乐部的黑人女佣。306
- 倍倍尔 Bebel, August, 1840—1913。政治家。198, 410
- 比德曼 Biedermann, Alois Emanuel, 1819—1885。基督教福音派神学家。71, 76
- 比洛 Bülow, Bernhard von, 1849—1928。德意志帝国首相（1900—1909）。405, 406, 408, 410, 610
- 俾斯麦 Bismarck, Otto von, 1815—1898。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29, 42, 86/87, 122-130, 139, 212, 230, 409, 483, 564, 596, 648, 649
- 毕布路斯 Biblus [应为 Bibulus 之误], Marcus Calpurnius. 58
- 伯哈恩德 Bernhard, Ludwig, 1875—1935。国民经济学家。395-396 “Herr X im Fall X”, 436 “Fall B”
- 伯恩斯托尔夫 Bernstorff, Johann-Heinrich Graf von, 1862—1939。德国外交家。660, 661, 662
- 伯克林 Böcklin, Arnold, 1827—1901。瑞士画家。493

- 伯劳 Böhlau, Helene, 1856—1940。女作家。680
- 伯姆 Böhm, Franz, 1861—1915。巴登州政府官员。275
- 勃伦塔诺 Brentano, Lujo, 1844—1931。国民经济学教授。134, 236, 279, 352, 360, 405, 419, 420, 629, 657, 659, 673, 677
- 博德尔施文格 Bodelschwingh, Friedrich von, 1831—1910。牧师、比勒费尔德的伯特尔医院创始人。140
- 博尔夏特 Borchardt, Rudolf, 1877—1945。德国作家。467 “R. B.”
- 博努斯 Bonus, Artur, 1864—1941。基督教福音派神学家、作家。140
- 博伊默尔 Bäumer, Gertrud, 1873—1964。争取妇女权益活动家、作家。373, 608, 629
- 布劳恩 Braun, Heinrich, 1854—1927。社会民主党政论家。272, 289
- 布劳斯 Braus, Hermann, 1868—1925。解剖学教授。528, 679
- 布劳斯坦 Blaustein, David, 1866—1912。纽约教育同盟负责人。316
- 布龙纳 Brunner, Heinrich, 1840—1915。法律史学家。102
- 布罗格尔 Bröger, Karl, 1886—1944。工人诗人。608
- 布洛克多夫-兰晁 Brockdorff-Rantzau, Ulrich Graf von, 1869—1928。魏玛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665, 666, 668
- 布吕歇尔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 (1813)。630
- C**
- 策尔贝 Zerbe, 韦伯父母家的佣人。43
- D**
- 达尔曼 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历史学家、政治家。86
- 戴斯曼 Deissmann [正文中写作 Deißmann], Adolf, 1866—1937。神学教授。358
- 但丁 Dante, 1265—1321。意大利作家、诗人。60, 465
- 德昂伯格 Dernburg, Bernhard, 1865—1937。帝国殖民部官员。565
- 德尔布吕克 Delbrück, Hans, 1848—1929。历史学教授。232, 270 “D”, 395 “政治杂志编辑”, 396 “先生...”, 411 “D”, 629, 635, 636, 665, 666
- 德加 Degas, (Hilaire Germain) Edgar, 1834—1917。法国画家。507
- 德里施 Driesch, Hans, 1867—1941。生物学家、哲学家。397
- 德吕安德尔 Dryander, Ernst von, 1843—1922。威廉二世的宫廷大牧师。140
- 德默尔 Dehmel, Richard, 1863—1920。德国诗人、作家。505, 608
- 狄尔泰 Dilthey, Wilhelm, 1833—1911。哲学教授。42, 323, 324, 325
- 迪德里希斯 Diederichs, Eugen, 1867—1937。出版商。608
- 迪特里奇 Dieterici, W., 韦伯青年时代的朋友。50

- 迪特里希 Dieterich, Albrecht, 1866—1908。古典语文学教授。358
- 蒂尔皮茨 Tirpitz, Alfred von, 1849—1930。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元帅。570, 571, 573, 574, 575, 578, 610, 629, 658, 663
- 丢勒 Dürer, Albrecht, 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679
- 东克尔 Duncker [正文中误作 Dunker], Max, 1811—1886。历史学家。86
- 杜恩 Duhn, Friedrich von, 1851—1930。考古学教授。358
- 多夫 Dove, Alfred Wilhelm, 1844—1916。历史学教授。114, 484
- 多马策夫斯基 Domaszewski, Alfred von, 1856—1927。古代史教授。358

## E

- 莪相 Ossian, 一度被认为是凯尔特诗人。49, 53, 58
- 恩肯多夫 Enckendorf, Marie Luise, 作家格特鲁德·西默尔的笔名。705
- 恩斯特 Ernst, Paul, 1866—1933。作家。608, 686 - 687

## F

- 法布里齐乌斯 Fabricius, Ernst, 1857—1942。历史学教授, 1911年时任弗赖堡大学副校长。413 - 417 “副校长 (Prorektor)”, “F. 教授 (Prof. F)”, “F”
- 法伦斯坦 (贝蒂) Fallenstein, Betty. 11
- 法伦斯坦 (爱德华) Fallenstein, Eduard. 18
- 法伦斯坦 (埃米莉) Fallenstein, Emilie (母), (婚前姓“苏谢”) 1805—1881。韦伯的外祖母。27, 30, 33, 48, 700
- 法伦斯坦 (埃米莉) Fallenstein, Emilie (女), 贝内克之妻。韦伯的姨母。18
- 法伦斯坦 (弗兰克) Fallenstein, Frank, 1858—1929。G. F. 法伦斯坦的孙子。309 - 313
- 法伦斯坦 (弗里茨) Fallenstein, Fritz. 309 - 313 “在美国的弗里茨大叔”, (参看 F. 米勒)。G. F. Fallenstein 的儿子。
- 法伦斯坦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Fallenstein, Georg Friedrich。韦伯的外祖父。1 - 8, 12 - 14, 303, 456, 457
- 法伦斯坦 (海伦妮) Fallenstein, Helene。老马克斯·韦伯之妻 (参看 H. 韦伯), 韦伯的母亲。8, 13, 18 - 26
- 法伦斯坦 (亨里埃特) Fallenstein, Henriette, A. 豪斯拉特之妻。18
- 法伦斯坦 (伊达) Fallenstein, Ida, H. 鲍姆加藤之妻 (参看 I. 鲍姆加藤)。18, 23
- 法伦斯坦 (奥托) Fallenstein, Otto。5 - 7 “Otto”
- 菲利普维奇 Philippovich von Phillips berg, Eugen Freiherr von, 1858—1917。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420, 422
- 菲舍尔 Fischer, Kuno, 1824—1907。哲学教授。70

- 腓特烈大帝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皇帝。409, 514
- 费尔巴哈 Feuerbach, Anselm, 1829—1880。画家。510
- 费尔斯霍芬 Vershofen, Wilhelm, 1878—1960。作家。608
- 费希特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哲学家。94
- 冯特 Wundt, Wilhelm, 1832—1920。哲学和心理学教授。324
- 弗格特 Voigt, 韦伯父母家聘请的家庭教师。152, 153 “V.”, 161—165 “青年神学家”
- 弗赖塔格 Freytag, Gustav, 1816—1895。历史小说作家。123
- 弗兰肯施泰因 Franckenstein, Georg Arbogast Baron von, 1825—1890。巴伐利亚政治家。122
- 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II., 1831—1888。德国皇帝 1888。86, 123, 129, 409
- 弗里德永 Friedjung, Heinrich, 1851—1920。奥地利历史学家。624
- 弗里克 Frick, Ernst, 385 “K”, 495 “无政府主义者 (der Anarchist)”, 497 “卡尔 (Karl)”, 498 “多拉的朋友 (Doras Freund)”
- 弗里森 Friesen, Karl Friedrich, 1794—1814。德国体操的创建人之一。2
-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医生、心理学家。375, 376, 378—384
-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法国哲学家。[267]
- 福肯贝克 Forckenbeck, Maximilian von, 1821—1892。巴伐利亚政治家。123
- 福斯勒 Vossler [正文中写作 Voßler], Karl, 1835—1917。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教授。254, 273, 371, 397
- 富兰克林 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家、作家。354, 357
- G**
- 高更 Gauguin, Paul, 1849—1903。法国画家。507
- 戈丁 Gordin, Jacob, 316 (意第绪语剧作《真正的力量》作者。)
- 戈尔德沙伊特 Goldscheid, Rudolf, 1870—1931。德国社会学协会的创建者之一。429—430 “G”, 489
- 戈尔德施密特 Goldschmidt, Levin, 1829—1897。法学教授。42, 120, 157, 174, 196, 209, 211, 458
- 戈尔德斯泰因 Goldstein。教授。614 “G. 教授 (Prof. G.)”。
- 戈特-奥蒂利恩费尔德 Gottl-Ottlilienfeld, Friedrich von, 1868—1958。国民经济学教授。324, 325, 419, 462
- 戈特海涅 Gottheiner, Elisabeth, 1874—1930。阿尔特曼之妻。476
- 戈特海因 Gothein, Eberhard, 1853—1923。历史学家、政治学教授。358, 371, 411,

418, 427, 462, 525, 679

歌德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作家和诗人。46, 54, 164f, 313, 321

格奥尔格 Georg, Stefan, 1865—1933。德国诗人。333, 462, 463, 464—467, 468—472, 474, 495, 607, 626

格尔 Göhre, Paul, 1864—1928。福音派神学家、关心社会问题的政治家。140—143, 151, 175, 233, 235, 350, 569

格拉博夫斯基 Grabowsky [正文中写作 Grabowski], Adolf (\* 1880)。政治政论家。608

格拉赫 Gerlach, Hellmut von, 1866—1935。德国政治家、民族社会党 (Die Nationalsozialische Partei) 创始人之一。406

格鲁勒 Gruhle, Hans Walter, 1880—1958。精神病学教授。371, 372, 460, 506, 507, 705 “G.”, 708 “G.”

格罗斯 (弗里达) Gross, Frieda, (婚前姓“施洛菲尔”)。O. 格罗斯的妻子。A. 里尔的侄女。192, 385 “K. 的女朋友 (K. Freundin)”, 494—502 “多拉 (Dora)”

格罗斯 (汉斯) Gross, Hanns, 1847—1915。O. 格罗斯的父亲, 奥地利刑法学教授。499—500 “X. 教授 (Prof. X)”

格罗斯 (奥托) Gross, Otto, 1877—1920。376—385 “X. 博士 (Dr. X.)” 494, “弗洛伊德门生 (Freudjünger)”

格吕内瓦尔德 Grünewald, Matthias, 1460/1470—1528。画家。678

格奈斯特 Gneist, Rudolf von, 1816—1895。法学家、政治家。102, 134

格瑙克-屈内 Gnauck-Kühne, Elisabeth, 1850—1917。基督教福音派社会妇女小组创建人, 后来成为天主教妇女联盟创建者。232

格维努斯 (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 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历史学家。1, 4, 14, 15, 21, 24f, “G”, 86, 270, 458

格维努斯 (维多利亚) Gervinus, Victoria。20, 22 “G. 夫人 (Frau G.)”

贡多尔夫 (恩斯特) Gundolf, Ernst, 1881—1945。画家、F. 贡多尔夫的弟弟。500

贡多尔夫 (弗里德里希) Gundolf, Friedrich, 1880—1951。文学教授、作家。372, 460, 462, 464, 466, 467, 469—471, 475, 476, 607, 626

## H

哈根 Hagen。韦伯的大学同学 1886。147

哈勒尔 Haller, Johannes, 1865—1947。历史学家。266, 267 “H. 博士 (Dr. H.)”

哈默尔施拉格 Hammerschlag, Paul。维也纳银行家。624

- 哈默施泰因 Hammerstein, Wilhelm Baron von, 1838—1904。保守派政治家、《十字架报》主编。124, 231 “H”
- 哈姆斯 Harms, Bernhard。446 - 453 “Z”
- 哈纳克 Harnack, Adolf von, 1851—1930。新教神学教授。140, 302, 303, 376, 510
- 哈塞 Haase, Hugo, 1863—1919。德国政治家。646
- 哈特曼 Hartmann, Ludo Moritz, 1865—1924。奥地利历史学家。419, 429, 582
- 海德勃兰特 Heydebrand und der Las a, Ernst von, 1851—1924。普鲁士政治家。411  
“v. H. u. d. L.”
- 海顿 Haydn, Franz Joseph, 1732—1809。作曲家。504
- 豪普特(约翰) Haupt, John (Hans)。美国北托纳旺达(Nord Tonawanda)牧师。294
- 豪普特(玛格丽特) Haupt, Margaret, (婚前姓“康拉德”)。294
- 豪斯(爱德华) House, Edward Mandell, 1858—1938。美国政治家。658
- 豪斯 Heuss [正文中误作 Heuß-Knapp], Theodor, 1884—1963。政治家、作家。476, 608, 610
- 豪斯-克纳普 Heuss-Knapp, Elly, 1881—1952。F. 克纳普的女儿, T. 豪斯之妻。476
- 豪斯拉特(阿道夫) Hausrath, Adolf。教会史家。18, 71, 457, 458
- 豪斯拉特(亨里埃特) Hausrath, Henriette, (婚前姓“法伦斯坦”)。韦伯的姨母。71, 100, 457
- 豪斯曼 Haussmann, Conrad, 1857—1922。政治家。590 “H. 博士(Dr. H.)”, 599, 601, 646
- 荷尔德林 Hölderlin, Friedrich, 1770—1843。德国诗人。465
- 荷马 Homer。49, 53, 54, 58 - 60, 365, 513
- 赫尔韦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政治家、诗人。699
- 赫克内尔 Herkner, Heinrich, 1863—1923。国民经济学教授。420
- 赫尼希斯海姆 Honigsheim, Paul, 1885—1967。社会学家, 后来在美国做教授。373, 462
- 赫特林 Hertling, Georg Graf von, 1843—1919。德意志帝国首相(1917)。633
- 赫维 Hervey [正文中误作 Hervay], William Addison, 1870—1918。纽约德国语言文学教授。296
- 黑恩 Hehn, Victor Amadeus, 1813—1890。文化史学家。52
- 黑尔德 Held, Heinrich, 1868—1938。巴伐利亚政治家。637 “H.”
- 黑尔费里希 Helfferich, Karl, 1872—1924。德国政治家。148, 573, 576
- 亨泽尔 Hensel, Paul, 1860—1931。哲学教授。240, 241, 271, 292, 297, 372
- 华盛顿(布克) Washington, Booker T., ca. 1850—1915。美国黑人领袖。307, 309

-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美国总统。309
- 霍布莱希特（亚瑟）Hobrecht, Artur, 1824—1912。普鲁士财政部长。42, 521
- 霍布莱希特（詹姆斯）Hobrecht, James Friedrich Ludolf, 1825—1902。建筑师。  
42, 521
- 霍尔齐 Holzing, von,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将军。659
- 霍尔韦格 Hollweg, Herr, 莉斯贝特的女朋友（1919）。708
- 霍夫曼 Hoffmann, Max, 1869—192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将军。631, 632
- 霍夫曼斯塔尔 Hofmannsthal, Hugo von, 1874—1929。[奥地利作家、诗人] 626
- 霍迈尔 Homeyer, 韦伯大学时的朋友。148
- 霍伊塞尔 Häusser, Ludwig, 1818—1867。历史学教授。13

## J

- 基里亚尼 Kiliani, 柏林枢密顾问（1916）。575
- 基斯提亚科夫斯基 Kistiakowski, T., 俄国政治流亡者（1905）、宪法学教师。342
- 吉本 Gibbon, Edward,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76
- 吉尔克 Gierke, Otto von, 1841—1921。法律史学家。102, 220f “G”

## K

- 加尔文 Calvin, Johannes, 1509—1564。宗教改革家。354ff
- 加图 Cato, Marcus Porcius, 古罗马政治家。58, 711
- 杰斐逊 Jefferson, Thomas, 1743—1826。美国总统（1801—1909）。309
- 西贝尔 Sybel, Heinrich von, 1817—1895。历史学家。42, 86
- 喀提林 Catilina, 古罗马革命家。56—58
- 喀提林 Katilina 见 Catilina
- 卡岑斯泰因 Katzenstein, E., 慕尼黑革命者（1919）。639
- 卡尔 Kahr, Gustav Ritter von, 1862—1934。巴伐利亚总理（1920/21）。701 “v. K.”
- 卡费尔 Kapher, Jörg von, 韦伯的学生。674, 708
- 卡夫坦 Kaftan, Julius, 1848—1926。神学教授。140
- 卡莱尔 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513
- 卡尼茨 Kanitz [正文中误作 Kaniz], Hans W. A. Graf von, 1841—1913。普鲁士政治家。210
- 卡佩勒 Capelle, Eduard von, 1855—1931。德国海军将军（1916—1918）。663
- 卡普（弗里德里希）Kapp, Friedrich, 1824—1884。普鲁士政治家。41, 42
- 卡普（沃尔夫冈）Kapp, Wolfgang, 1858—1922。德国政治家。（卡普政变 Kapp-Putsch）。521, 629, 699, 703



- 卡普里维 Caprivi, Georg Leo Graf von, 1831—1899。德意志帝国首相 (1890—1894)。131
- 卡图卢斯 Catullus, Gaius Valerius。古罗马诗人。58
- 凯 Key, Ellen, 1849—1926。瑞士女教育家。375
- 凯莉 Kelley, Florence, 美国伊利诺伊州企业督察员。315
- 恺撒 Caesar, Gaius Julius, 罗马共和国军事统帅、作家。58
- 坎普夫迈尔 Kampffmeyer [正文中误作 Kampfmeier], Hans, 生于 1874。政论家。608
- 康德 Kant, Immanuel, 1724—1804。哲学家。48, 63, 93, 94, 165
- 康拉德 Conrad, Johannes, 1839—1915。国民经济学教授。266
- 康托罗维奇 Kantorowicz, Hermann, 1877—1940, (Cantorowicz)。刑法学教授。427
- 考茨基 Kautsky, Karl, 1854—1938。社会主义政治家。660
- 考尔豪恩 Calhoun, John C., 1782—1850。美国政治家。309
- 科恩 Cohn, F., 韦伯青少年时代的朋友。50
- 科赫 Koch, Adolf, 生于 1855。历史学教授。440—445 “某教授 (Prof. NN)”
- 科尼斯 Knies, Karl, 1821—1898。国民经济学教授。70, 237, 241, 272, 278, 291, 319, 321, 323, 324, 340
- 克尔纳 Körner, Theodor, 1791—1813。德国诗人。3
- 克莱因 Klein, G. W. (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成员)。640
- 克勒布斯 Klebs, Otto (也许名应为 Georg, 1857—1918。植物学教授)。418
- 克勒瑙 Klenau, Paul August von, 1883—1946。丹麦指挥家。467, 621
- 克勒佩林 Kräpelin, Emil, 1856—1926。精神病学教授。345, 397
- 克雷默 Cremer [正文中写作 “Kremer”], Hermann, 1834—1903。神学教授。140
- 克雷默 Cremer 见 Cremer, Hermann。
- 克里斯 Kries, Johannes von, 1853—1928。生理学教授。217, 324, 326
- 克林格尔 Klinger, Max, 1857—1920。画家、蚀刻画家。213, 215, 362
- 克鲁修斯 Crusius, Friedrich (很可能指的是 Otto Crusius, 1857—1918。古典语言文学家)。608, 647, 649
- 克伦斯基 Kerenskij [正文中写作 Kerenski], Alexander Fyodorovitch, 1881—1970。俄国政治家。591
- 克伦威尔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政治家。228, 354
- 克罗纳 Kroner, Richard Jacob, 生于 1884。哲学教授。608
- 克纳普 Knapp, Georg Friedrich, 1842—1926。国民经济学教授。134, 136, 419, 420, 476, 483

肯梅尔 Kenmare, Earl of, 英国大土地主。227

库尔贝 Courbet, Gustave, 1819—1877。法国画家。493

库齐乌斯 Curtius, Ernst, 1814—1896。古代史历史学家。52

## L

拉德 Rade, Martin, 1857—1940。神学教授。140, 142, 151, 233

拉德布鲁赫斯（古斯塔夫）Radbruch, Gustav, 1879—1949。法学学者、教授。460

拉德布鲁赫斯（琳娜）Radbruch, Lina, 462

拉赫法尔 Rachfahl, Felix, 1867—1925。历史教授。352

拉加德尔 Lagardelle, Hubert, 1874—1958。法国国民经济学家。489

拉斯克 Lask, Emil, 1875—1915。哲学教授。371, 372, 397, 462, 537

拉斯克尔 Lasker, Eduard, 1829—1884。普鲁士-德国政治家。123

拉松 Lasson, Adolf, 1832—1917。哲学教授。397

拉特根 Rathgen, Karl, 1856—1921。国民经济学教授。255, 265 “R.”, 358, 420

拉特瑙 Rathenau, Walther, 1867—1922。商界领袖、政治家。631 - 665

莱菲 Levy, Hermann, 1881—1949。国民经济学教授。574 “同事 L. (Kollege L.)”

莱菲恩 Levien, Max, 1885—1937。生物学家、俄国革命家（1905），后成为德国革命家。639, 672

莱克希斯 Lexis, Wilhelm, 1837—1914。国民经济学教授。210

莱瑟 Lesser, Edmund J., 1852—1918。生理学教授。476

赖因哈特 Reinhardt [正文中写作 Reinhard], Max, 1873—1943。戏剧导演。505, 506

兰茨贝格 Landsberg, Otto, 1869—1957。德国政治家。273

兰克 Ranke, Leopold von, 1795—1886。历史学家。70

朗格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哲学教授。72

劳埃德-乔治 Lloyd George, David, 1863—1945。[通常译作劳埃德·乔治，正文中采用此译法]。英国政治家。587, 588

勒文施泰因 Löwenstein, Karl, 1891—1973。韦伯的学生，政治学家。373

雷诺阿 Renior, (Pierre) Auguste, 1841—1919。法国画家。507

雷文特洛 Reventlow, Franziska (Fanny) Gräfin zu, 1871—1918。494, 495, 499 “女伯爵 (die Gräfin)”

李卜克内西 Liebknecht, Karl, 1871—1919。德国政治家、革命家。645, 646, 647, 653

李凯尔特（海因里希）Rickert, Heinrich (父), 1833—1902。政治家。41, 123, 151

李凯尔特（海因里希）Rickert, Heinrich (子), 1863—1936。哲学教授。215 - 216, 218, 239, 270, 272 - 273, 323, 324, 325, 359, 369, 372, 412, 463

- 李凯尔特(索菲) Rickert, Sophie. 216, 270
- 李斯特 Liszt, Franz, 1811—1886。作曲家。505, 509
- 李维 Livius, Titus, 古罗马历史学家。53, 55
- 里德尔 Riedl, Richard, 1865—1944。奥地利外交家。625
- 里尔 Riehl, Aloys, 1844—1924。哲学教授。216
- 里尔克 Rilke, Rainer Maria, 1875—1926。德国诗人。463, 464, 466
- 里夫 Riff. 牧师。60, 72
- 里格尔 Riegel, Martha, 540-541 “玛尔塔 (Martha)”
- 里希特 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家。122
- 利文内-尼森 Levine-Nissen [应为 Leviné-Nissen], Eugen, 1883—1919。俄国革命家 (1905)。672
- 利希特霍芬 Richthofen, Else von, 1874—1973。E. 雅菲之妻(参见 Else. 雅菲)。242, 289
- 莉斯贝特 Lisbeth, 韦伯家女佣。707-708
- 琳琴 Linchen, 韦伯家女佣。461
- 卢卡奇 Lukács [正文中误作 Lukácz], Georg von, 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473, 476, 495
- 卢森堡 Luxemburg, Rosa, 1871—1919。社会主义政治家、革命家。646, 653
- 卢梭 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法国作家。267
- 鲁登 Luden, Heinrich, 1780—1847。历史学家。2
- 鲁登道夫 Ludendorff, Erich Friedrich Wilhelm, 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将军。634, 637, 644, 647, 653, 660, 662, 663-665, 669, 703
- 鲁格 Ruge, Arnold, 生于 1881。讲师。436-443 “R. 博士 (Dr. R.)”
- 路德 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家。48, 354-356
- 伦勃朗 Rembrandt van Rijn, 1606—1669。荷兰画家。283, 284 “R.”, 288
- 罗德 Rohde, Erwin, 1845—1898。古典语言文学教授。485
- 罗蕾 Rawley, Elisabeth, 1856—1914, (婚前姓“米勒”), F. 米勒的女儿。309-313 “贝蒂 (Betty)”
- 罗舍尔 Roscher, Wilhelm, 1817—1894。国民经济学教授。70, 272, 278, 291, 319, 321, 323, 324, 341
- 罗斯 Ross [正文中写作 Roß], Colin, 1885—1945。环球旅行者、间谍。659
- 罗斯 Ross, Earl of. (罗斯伯爵)。223
- 罗斯托恩 Rosthorn, Arthur Edler von, 1862—1945。奥地利外交家。626
- 罗滕比歇尔 Rothenbücher, Karl, 1880—1932。政治学教授。676

- 罗伊特 Reuter, Fritz, 1810—1874。低地德语作家。147, 514
- 洛策 Lotze, RudolfHermann, 1817—1881。哲学家。71 - 72
- 洛茨 Lotz, Walter, 1863—1941。国民经济学教授。121, 147, 657, 683
- 洛伦泽蒂 Lorenzetti, Pietro。14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画家。511
- 洛特马 Lotmar, Phillipp, 1850—1922。劳动法专家。272
- 吕措 Lützow, Adolf Freiherr von, 1782—1834。德国志愿军领导人 (1813)。3
- 吕梅林 Rümelin, Gustav, 1815—1888。符腾堡政治家。285
- 吕特维茨 Lüttwitz, Walter Freiherr von, 1889—1942。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将军。703

## M

- 马尔蒂尼 Martini, Simone, ca. 1284—1344。意大利锡耶纳画家。511
- 马尔克斯 Marcks, Erich, 1861—1938。历史学家。86
- 马格 Maag, Otto。后来在巴塞尔做记者。479
- 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正文中误作 Macchiavelli], Niccolo,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48
- 马克思 Marx, Karl, 1818—188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330, 332, 333, 350, 598
- 马克斯 Max, Prinz von Baden, 1867—1929。德意志帝国首相 (1918)。633, 634, 658, 659, 660, 661
- 马雷斯 Marées, Hans von, 1837—1887。德国画家。510
- 马奈 Manet, Edouard, 1832—1883。法国画家。507
- 迈岑 Meitzen, August, 1822—1910。农业史学家。120, 121
- 迈尔 Meyer, Eduard, 1855—1930。历史学家。324
- 迈内克 Meinecke, Friedrich, 1862—1954。历史学教授。608
- 毛雷恩布雷希尔 Maurenbrecher, Max, 1874—1930。神学家、政治家。235, 608, 609
- 梅尔希奥 Melchior, Carl, 1871—1934。德国银行家。661
- 梅特林克 Maeterlinck [正文中误作 Maeterlink], Maurice, 1862—1949。比利时作家。287, 463, 507, 581
- 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 (恩斯特) Mendelssohn Bartholdy, Ernst von, 1846—1909。枢密院商务顾问。210 “X”
- 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 (阿尔伯特) Mendelssohn-Bartholdy, Albert, 1874—1936。国际法教师。659, 665, 666
- 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 (菲力克斯) 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1809—1847。作曲家。505

- 门格尔 Menger, Anton, 1841—1906。奥地利关心社会问题的政治家。323
- 蒙舍拉 Montgelas, Maximilian von, 1860—193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将军, 服役到 1915 年。659, 660, 665, 666
-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1689—1755。法国哲学家、作家。267
- 米克尔 Miquel, Johannes von, 1828—1901。普鲁士国务部长。41, 122, 124
- 米勒 Miller, Francis, 1858—1929, (儿时姓名“F. 法伦斯坦”, G. F. 法伦斯坦的儿子)。309 - 313 “弗里茨大叔 (Onkel Fritz)”
- 米勒 (詹姆斯) Miller, James, 1868—1918。F. 米勒的儿子。309 - 313 “吉姆 (Jim)”
- 米勒 (杰斐逊) Miller, Jefferson, 1847—1932。F. 米勒的儿子。309 - 313 “Jefi”
- 米勒 (阿尔魏因) Müller, Alwine, (婚前姓“韦伯”)。B. 米勒之妻, 韦伯的表姐。184, 201 - 202, 399 - 401, 607, 627 - 628 “维娜 (Wina)”
- 米勒 (布鲁诺) Müller, Bruno。184, 399 - 401 “布鲁诺 (Bruno)”
- 米勒 (格奥尔格) Müller, Georg。B. 米勒的儿子。399, 400
- 米勒 (卡尔) Müller, Karl。B. 米勒的儿子。401
- 米勒 (威廉) Müller, Wilhelm。B. 米勒的儿子。401
- 米留可夫 Miljukow, Pavel Nikolajevitch, 1859—1943。俄国政治家。591 - 592
- 米萨姆 Mühsam, Erich, 1876—1934。革命诗人和散文家。639, 672
- 米夏埃利斯 Michaelis, Georg, 1857—1936。德意志帝国首相 (1917)。602
- 米歇尔斯 Michels, Robert, 1876—1936。社会学家。361, 368, 372, 427, 489
- 明斯特贝格 Münsterberg, Hugo, 1836—1916。心理学教授。216 - 217, 292, 314, 324, 325
- 摩西 Moses, 4
- 莫雷尔 Morel, Edmund D., 英国政治家。658
- 莫里卡 Maurika, Seigneurs von, 492
- 莫洛 Molo, Walter von, 1880—1958。作家。608
- 莫姆森 (恩斯特) Mommsen, Ernst。医生、T. 莫姆森的儿子、韦伯的妹夫。206, 514
- 莫姆森 (卡尔) Mommsen, Karl。T. 莫姆森的儿子。50, 147, 148, 206
- 莫姆森 (克莱尔) Mommsen, Klara, (婚前姓“Weber”)。韦伯的妹妹。513, 609, 682, 702
- 莫姆森 (特奥尔多)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历史学家。42, 52, 58, 102, 121, 122, 175, 206, 331
- 莫奈 Monet, Claude, 1840—1926。法国画家。507

莫伊斯 Moissi [正文中写作 Moissy], Alexander, 1880—1935。演员。621  
莫扎特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作曲家。505, 510  
默勒(赫塔) Möller, Hertha, (婚前姓“韦伯”)。韦伯的表妹。398  
默勒(卡尔) Möller, Karl, (H. 默勒之夫)。398  
默通 Merton, Wilhelm, 1848—1916。法兰克福大实业家。238

## N

拿破仑一世 Napoleon I., 1769—1821。法国皇帝。164  
纳瑟 Nasse, Dirk。韦伯大学时代的朋友。147  
纳图西乌斯 Nathusius, Martin von, 1845—1906。神学教授。140  
瑙曼 Naumann, Friedrich, 1860—1919。德国政治家。141 - 143, 144, 151, 209, 214, 229, 231 - 236, 267 - 268, 289, 403 - 404, 405, 408, 410, 412, 419, 472 - 473, 476, 564, 565, 566, 567, 569, 570, 584, 586, 588 - 589, 591, 594, 629, 632, 634, 635, 636, 653  
内尔 Neer, Aert van der, [正文中写作 Jan van der]。荷兰画家。288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1844—1900。德国哲学家。333, 375, 471  
诺克 Nokk, Wilhelm, 1832—1903。巴登州部长。254  
诺斯蒂茨-瓦尔维茨 Nostitz-Wallwitz [正文中写作 Nostitz], Alfred von, 1870—1953。德国外交家。626  
诺伊拉特 Neurath, Otto, 1882—1945。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672, 673, 677, 68  
诺伊曼 Neumann, Carl, 1860—1934。艺术史教授。240, 271, 358

## P

帕克 Parker, Theodore, 1810—1860。30 - 31, 92  
佩特罗尼乌斯 Petronius, Gaius。公元1世纪罗马讽刺作家。619 - 620  
普弗莱德勒 Pfleiderer, Otto, 1893—1906。神学教授。71  
普勒纳 Plener, Ernst Edler von, 1841—1923。奥地利政治家。625  
普罗伊斯 Preuss [正文中写作 Preuß], Hugo, 1860—1925。政治家、国家法学者。651, 652

## Q

齐默尔曼 Zimmermann, Arthur von, 1864—1940。德国外交部长(1916/1917)。569  
齐特尔 Zittel, Karl。牧师。21  
奇赫泽 Tschaidsee, Nikolai, 1864—1926。俄国政治家。591

- 契马布埃 Cimabue, Giovanni. 意大利 13 世纪画家。511  
 钱宁 Channing, William Ellery, 1780—1842。美国教士、作家。30, 91—97  
 屈尔曼 Kuhlmann, Richard von, 1873—1948。外交家。632

## S

- 萨尔茨 (阿图尔) Salz, Arthur, 1881—1963。国民经济学教授。372, 460, 462, 695  
 萨尔茨 (萨沙) Salz, Sascha, 676, 695  
 萨鲁斯特 Sallust, 古罗马历史学家。53  
 塞尚 Cézanne, Paul, 1839—1906。法国画家。507  
 塞万提斯 Cervantes, Miguel de, 西班牙作家。485  
 沙米索 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诗人。23  
 沙伊德曼 Scheidemann, Philipp, 1865—1939。德国政治家。631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作家。503, 525  
 舍恩贝格 Schönberg, Gustav von, 舍恩贝格《政治经济学手册》编者。423, 446 “舍恩贝格《手册》(Sch. sches Handbuch)”  
 舍尔哈斯 Schellhass, Karl, 1859—1951。历史学家。102 “Sch. ”, 265, 266 “Sch. ”, 267  
 舍费尔 (迪特里希) Schäfer, Dietrich, 1845—1929。历史学家。271, 585 “D. Sch. ”  
 舍费尔 (赫尔曼) Schäfer, Hermann, 1869—1914。建筑师、韦伯的妹夫。271, 536  
 舍费尔 (卡尔) Schäfer, Karl, 1844—1908。建筑学教授、H. 舍费尔的父親。271, 536, 539, 540  
 舍费尔 (格列兴) Schäfer, Klärchen. 韦伯的侄女。542  
 舍费尔 (莉莉) Schäfer, Lili, (婚前姓“韦伯”), 1880—1920。韦伯的妹妹。536, 542, 679, 700—701  
 舍弗勒 Scheffler, Karl, 1869—1951。艺术史家。608  
 圣保罗 Paulus, Apostel (使徒保罗)。352  
 圣方济各 Franz von Assisi, (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 圣方济各会创始人。511  
 圣克莱尔 Klara v. Assisi, [阿西西的克莱尔, 或译阿西西的嘉勒]。贫穷修女会创始人。511  
 圣路易 Ludwig d. Heilige, 1226—1270 年在位。法国国王。492  
 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1768—1834。神学家、哲学家。71, 92  
 施莱格尔 (兄弟)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作家、翻译家, 1767—1845; Schlegel, Friedrich, 作家, 1772—1829。46  
 施洛菲尔 Schloffer, Frieda, O. 格罗斯之妻 (参见 F. 格罗斯)。192 “多拉 (Dora)”  
 施洛塞尔 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历史学家。13

- 施密特（海因里希）Schmidt, Heinrich Julian, 1818—1886。文学史家。42, 521
- 施密特（理查德）Schmidt, Richard, 1862—1944。法学教授。412 “Sch.”
- 施密特-诺尔 Schmid-Noerr, Friedrich Alfred, 1877—1969。美学教授。371—372
- 施密特-龙贝格 Schmid-Romberg, Kläre。371—372
- 施莫勒 Schmoller, Gustav von, 1838—1917。国民经济学教授。134, 291, 323, 360, 420
- 施内甘斯 Schneegans, Heinrich, 1863—1914。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教授。532 “Sch.”
- 施尼茨勒 Schnitzler, Arthur, 1862—1931。奥地利作家。506
- 施尼特格尔（安娜）Schnitger, Anna,（婚前姓“韦伯”）1851—1873。韦伯的堂姐，玛丽安妮的母亲。182
- 施尼特格尔（爱德华）Schnitger, Eduard, 玛丽安妮的父亲。182, 184, 201
- 施尼特格尔（玛丽安妮）Schnitger, Marianne, 1870—1954。韦伯之妻。181, 183—190, 194, 197—202
- 施塔姆勒 Stammler, Rudolf, 1856—1938。哲学教授。324, 369
- 施泰因（夏洛腾·冯）Stein, Charlotte von, 1742—1827。歌德的女友。321
- 施泰因（洛伦茨·冯）Stein, Lorenz von, 1815—1890。宪法学教授。620
- 施特劳斯 Strauss, Richard, 1864—1949。作曲家。504, 621
- 施图肯 Stucken [正文中误作 Stukken], Eduard, 1865—1936。德国作家。505
- 施图姆-哈尔贝格 Stumm-Halberg [正文中写作 Stumm], Karl Ferdinand Freiherr von, 1836—1901。实业家、政治家。231—232, 236
- 施托克尔 Stöcker, Adolf, 1835—1909。柏林大教堂布道者、政治家。124, 139—140, 142, 143, 147, 313
- 施威林-勒维茨 Schwerin-Löwitz [正文中写作 Schwerin], Hans Graf von, 1847—1918。政治家。210
- 施温德 Schwind, Moritz von, 1804—1871。画家。510
- 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ur, 1788—1860。哲学家。48
- 舒恩克（卡尔）Schunck, Carl, 1740—1800。少校。8
- 舒恩克（海伦妮）Schunck, Helene（苏谢之妻），1774—1851。韦伯的外祖母。8
- 舒尔策-格费尔尼茨 Schulze-Gävernitz, Gerhart von, 1864—1943。国民经济学教授。213, 216, 406, 419, 420, 427, 587, 635
- 舒尔茨 Schurz, Carl, 1829—1906。德裔美国政治家。418
- 舒尔特斯 Schulthess [正文中写作 Schultheß], Otto。历史学家。122
- 司各特 Scott, Walter, 1771—1832。苏格兰作家。52, 54
- 斯宾格勒 Spengler, Oswald, 1880—1936。历史哲学家。685—687



- 斯宾诺莎 Spinoza, Benedict (Baruch), 1632—1677。荷兰哲学家。48, 94
- 斯蒂勒 Stielcr, Josef Karl, 1781—1858。画家。8
- 斯蒂内斯 Stinnes, Hugo, 1870—1924。实业家。662
- 斯特劳司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神学家、哲学家。63, 71, 72, 108-109
- 斯特林堡 Strindberg, August, 1849—1912。瑞典作家。505, 506
- 苏谢(埃米莉) Souchay, Emilie, 1805—1881。K. C. 法伦斯坦之妻(参见 E. 法伦斯坦)。韦伯的外祖母。8-12, 14-18
- 苏谢(卡尔) Souchay, Karl Cornelius, 1768—1835。韦伯的外曾祖父。8
- 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Lord (Marquis of), 1830—1903。布尔战争时期的英国外交部长。593

## T

- 泰纳 Taine, Hippolyte, 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267
- 陶勒 Tauler, Johannes, ca. 1300—1361。多明我会布道士。464
- 特策尔 Tetzcl, Johann, ca. 1465—1519。多明我会修士、赎罪券推销者。382
- 特赖奇克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834—1896。历史学家。42, 52, 86, 87, 102, 122, 126-127, 331, 644
- 特勒尔奇 Troeltsch, Ernst, 1865—1923。哲学教授。240, 271, 273, 292-293, 297, 346, 358, 371, 427, 457, 460, 479, 532 “教授朋友 (befeundeter Professor)”, 629
- 特雷夫利安 Trevelyan, Charles Philips, 1870—1958。英国政治家。658 “特雷夫格利安 (Trevygliau)”
- 特尼厄斯 Tönnies, Ferdinand, 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396, 427, 608
- 梯也尔 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648
- 托布勒 Tobler, Mina, 1880—1967。钢琴家。371-372, 498 “Tobelchen”, 505, 509, 709
- 托尔斯泰 Tolstoi, Leo, 1828—1910。俄国作家。96, 336, 417, 474, 488
- 特勒 Toller, Ernst, 1893—1939。革命作家。608, 613, 672, 673, 678
- 托洛茨基 Trotzki, Leo, 1879—1940。俄国政治家、革命家。631
- 托马 Thoma, Richard, 1874—1957。法学教授。659
-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jewski, Feodor, 1821—1881。俄国作家。474

## W

- 瓦尔堡 Warburg, Max, 1867—1946。银行家。661, 665
- 瓦格纳(阿道夫) Wagner, Adolf, 1835—1917。国民经济学教授。134, 420
- 瓦格纳(理查德) Wagner, Richard, 1813—1883。作曲家。508, 509-510

王尔德 Wilde, Oscar, 1856—1900。英国作家。504

威尔逊 Wilson, Woodrow, 1856—1924。美国总统。579, 589, 633, 636, 637, 646

威廉 Wilhelm, Prinzregent (摄政王威廉), 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28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6—1888。德国皇帝 (1871—1888)。53, 129, 409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德国皇帝 (1888—1918)。124, 129, 130—131, 144, 232, 401—402, 403—407, 409, 410—411, 412, 415 “S. M. ”, 576 “S. M. ”, 595, 603, 607, 635, 636, 637, 641, 644, 669, 670

韦伯 (阿尔弗雷德) Weber, Alfred, 1868—1958。韦伯的弟弟、社会学教授。42, 47, 51, 63, 66, 104—107, 108—111, 152, 164, 263, 344, 361, 369, 370, 411, 418—419, 420, 652, 659

韦伯 (安娜) Weber, Anna, (婚前姓“施尼特格尔”) 1851—1873。韦伯的堂姐、玛丽安妮的母亲。39

韦伯 (安娜) Weber, Anna, 韦伯早夭的妹妹。39

韦伯 (阿图尔) Weber, Arthur, 1877—1952。韦伯的弟弟、军官。44, 66, 104, 152, 269, 520

韦伯 (达维德·克里斯蒂安) Weber, David Christian, 1760—1836。韦伯的曾祖父。26

韦伯 (海伦) Weber, Helenchen, 韦伯早夭的妹妹。39, 521

韦伯 (海伦妮) Weber, Helene, (婚前姓“法伦斯坦”) 1844—1919。韦伯的母亲。(8, 13, 18—26), 30—32, 33, 34—44, 50—52, 60—68, 88, 89, 97, 99, 100—101, 113, 133, 141, 146—154, 155, 161, 167, 169, 170, 178, 180, 186, 190—191, 198, 201—202, 204, 206, 208, 219, 235, 243—246, 251—254, 264, 269—270, 272, 275, 289, 362, 364, 368, 370, 373, 389, 394, 457—458, 474, 513—524, 539, 540, 581, 622, 681, 700

韦伯 (卡尔·奥古斯特) Weber, Karl August, 1796—1872。韦伯的爷爷。26

韦伯 (卡尔·达维德) Weber, Karl David, 1824—1907。玛丽安妮的外公, 韦伯的伯父。181, 183, 185, 186

韦伯 (卡尔) Weber, Karl, 1870—1915。马克斯·韦伯的弟弟、建筑学教授。38, 44, 45—47, 159—161, 519, 537, 538—541, 542

韦伯 (克拉拉) Weber, Klara, 1875—1953。E. 莫姆森之妻 (参见 K. 莫姆森), 韦伯的妹妹。44, 66, 103, 152, 177—180, 206—207

韦伯 (莉莉) Weber, Lili, 1880—1920。H. 舍费尔之妻), 韦伯的妹妹。103, 177, 271—272

韦伯 (卢齐厄) Weber, Lucie, (婚前姓“维尔曼斯”) 1804—1882。韦伯的祖母。73

- 韦伯(马克思) Weber, Max(父), 1836—1897。韦伯的父亲。23-32, 33, 35-36, 39-40, 41-48, 64-65, 69, 89, 100, 124, 149-150, 151, 153, 181, 211, 243-246
- 韦格纳 Wegener, Leo, 韦伯的学生。257, 263
-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408
- 维尔曼斯 Wilmanns, Lucie, (K. A. 韦伯之妻) 韦伯的祖母。26
- 维吉尔 Vergil, 古罗马诗人。53, 54
- 维兰德 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德国诗人和作家。58
- 维歇恩 Wichern, Johann Hinrich, 1808—1881。福音派神学家、“国内布道”的创始人。148
- 温德尔班德 Windelband, Wilhelm, 1848—1915。哲学教授。323, 358, 361, 397, 430-431
- 温德沙伊德 Winscheid, Bernhard, 1817—1892。法学家。69
- 温克勒尔 Winckler, Josef, 1881—1966。作家。608
- 文克 Wenck, Martin, 政治评论家。232, 234
- 翁格尔 Unger, Joseph, 1821—1913。奥地利法学家。484, 620
- 沃尔夫 Wolf, Hugo, 1860—1903。作曲家。504
- 沃尔夫斯克尔 Wolfskehl, Karl, 1869—1948。德国作家。466, 495
- 乌普霍夫 Uphoff, Carl Emil (oder Fritz)。德国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家。608
- 西贝克 Siebeck, Paul, 1855—1920。出版家。346, 363, 423, 446-453
- 西格哈特 Sieghart, Rudolf, 1855—1934。奥地利银行家。625, 626
- 西蒙 Simon, Heinrich, 1880—1941。《法兰克福报》出版人。413 “H. S. 博士 (Dr. H. S.)”, 417 “S. 博士 (Dr. S.)”
- 西蒙斯 Simons, Walter, 1861—1937。法学家、政治家。666
- 西默尔 Simmel, Georg, 1858—1918。哲学教授。266, 323, 324, 325, 361, 373, 418, 425, 427, 460, 470, 476, 504
- 西默尔 Simmel, Gertrud, 女作家。(笔名 M. L. 恩肯多夫)。373, 470, 476
- 西塞罗 Cicero, Marcus Tullius, 古罗马政治家、作家。53, 55-58
- 西斯托 Sisto, Max, 伦敦裁缝。285
- 希尔德布兰特 Hildebrand, Adolf von, 1847—1921。雕塑家。506
- 希罗多德 Herodot, 希腊史学家。53, 54
- 希斯 His, Wilhelm, 1863—1934。医学教授。273
- 席费尔 Schiffer, Eugen, 1860—1954。民族自由党国会议员。575 “Sch.”
- 席勒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德国作家。164
- 肖邦 Chopin, Frédéric, 1810—1849。作曲家。505

- 小毛奇 Moltke, Helmuth von, 1848—1916。普鲁士军队将领。584  
兴登堡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584,  
585, 588, 637, 660, 664, 670  
许京 Schücking, Walter, 1875—1935。法学教授、政治家。660

## Y

- 雅恩 Jahn, Friedrich Ludwig, 1778—1852。“体操之父”。2, 4  
雅菲（埃德加）Jaffé, Edgar, 1866—1921。国民经济学教授。289, 363, 371, 372, 543,  
608  
雅菲（埃尔泽）Jaffé, Else（婚前姓“利希特霍芬”），1874—1973。289, 371, 372, 676,  
677, 703, 705, 706, 707, 708  
雅姆 Jammes, Francis, 1868—1938。法国诗人。710  
雅斯贝尔斯（格特鲁德）Jaspers, Gertrud, 372  
雅斯贝尔斯（卡尔）Jaspers, Karl, 1883—1969。哲学家。372, 460, 580, 708  
亚当斯 Addams, Jane, 1860—1935。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创始人。300  
耶克 Jäckh, Ernst, 1875—1959。新闻记者。566  
耶利米 Jeremia。《旧约全书》中的先知。605  
耶利内克 Jellinek, Georg, 1851—1911。法学教授。240, 271, 327, 358, 371, 411, 481 -  
486  
耶稣 Jesus Christus。109, 140, 352  
伊克拉特 Ickrath, 海德堡—旅店店主。72  
伊林 Ihering, Rudolph von, 1818—1892。法学教授。69, 620  
易卜生 Ibsen, Henrik, 1828—1906。挪威剧作家。678  
约伯 Hiob, 《旧约全书》中的人物。604  
约理 Jolly, Julius, 1823—1891。巴登州政治家。86

## Z

- 泽林 Sering, Max, 1857—1939。国民经济学教授。565 “S. ”, 568  
张伯伦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1855—1924。英国/德国作家。553  
佐登 Soden, Hermann von, 1852—1914。神学教授。140  
佐马里 Somary, Felix, 1881—1956。维也纳银行家、政治家。566, 573  
佐姆巴特 Sombart, Werner, 1863—1941。国民经济学教授。255, 279, 289, 352, 363,  
372, 396, 419, 420, 422, 425, 427, 608

# 译后记

韦伯研究在国内外都早已成为显学，在此毋庸赘述。作为韦伯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韦伯的生平与著述的文章和专著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也为数颇多。不过，其中优秀者严格说来都只能算是思想史，真正的传记寥若晨星；而仅有的几种传记也多是毁誉参半，亦不乏为世所诟病者。<sup>①</sup>可以说，韦伯遗孀玛丽安妮于 1926 年发表的《马克斯·韦伯传》至今仍无能出其右者。

玛丽安妮的《马克斯·韦伯传》初次发表时，德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萨洛蒙（Albert Salomon）就曾写道：“这部传记必将对所有未来关于韦伯的阐释和描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80 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社会学家卢茨·克尔贝（Lutz Kaelber）仍然认为：“今天的实际情况仍然是，要了解韦伯其人，我们基本上还得依赖于玛丽安妮关于她丈夫的传记。”这部传记的意义还不仅止于了解韦伯。诚如其英译者左恩（Harry Zohn）所言，身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玛丽安妮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多世纪里德国和欧洲生活的一幅壮观的全景图”。不过也不应讳言，玛丽安妮作此传是抱着高山仰止的心态，“要使韦伯不朽于世”，因而对某些材料，诸如曾让雅斯贝尔斯（Jaspers）感到“偶像坍塌”的韦伯个人情感的纠结，作者似无意涉猎。

玛丽安妮的《马克斯·韦伯传》共有三个德文版本：第一版于 1926 年在韦伯逝世 6 年后由摩尔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出版社出版；第二版于 1950 年在玛丽安妮去世前 4 年由施奈德（Lambert Schneider）出版社出版；第三版系 1926 年初版的重印本，于 1984 年由刊行初版的摩尔出版社出版。作者在第二版中对原文稍有删节，略

---

<sup>①</sup> 这里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于 2005 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思维的激情》（*Max Weber: Die Leidenschaft des Denkens*），作者根据未发表过的原始资料对韦伯的生平进行了研究，叙述甚详，颇具参考价值。

作了校正，并将 19 章与 20 章合并为一章。这一版还增加了人名索引和韦伯著述索引。人名索引出自一位牧师之手，既不完全，也多有纰漏。在第三版中，马克斯·韦伯-舍费尔对人名和著述索引作了充实和订正，并增添了年表和一个姓名密钥表，披露正文中作者当时有意用缩写隐去的真实姓名。

本书根据摩尔出版社 1984 年第三版译出，同时参考了哈里·左恩的英译本，阎克文先生等从英文转译的中译本也有参考价值。（我国台湾李永炽先生曾从日文译本转译过此书，不过似乎只有上册出版。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译本。）德文原文段落太长，译文参照英译本将段落重新划分，并把大段的引文和信件采用缩进的方式与叙述文字区别开来。德文原文中有不少人名地名拼写错误。译文中有的在脚注中纠正，有的在人名索引中作了说明。译文只是在有特殊需要的地方酌情添加注释或援引英译注。译文中的德国人名使用德语姓名的通用汉语译名，但如果在中文里已有人们熟悉的习惯译法，译文则采用后者。例如，Schopenhauer、Jaspers 和 Moltke 在德汉词典里通常被分别译作“邵彭豪尔”、“雅斯佩尔斯”和“莫尔特克”，本书采用中文习惯译法译为“叔本华”、“雅斯贝尔斯”和“小毛奇”。译文中在页边标出了德文原文页码以备检索。

值此付梓之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汀先生和徐德霞女士的协助。

简明

2013 年仲秋

新泽西林肯公园